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法〕加斯东·加恩著



务 印 书 · 馆



K1

彼得大帝时期的 俄中关系史

(1689—1730年)

[法]加斯东·加恩 著

江载华 郑永泰 译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0003262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1689—1730)**
Librairie Félix Alcan, Paris, 1912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1689—1730年)

〔法〕加斯东·加恩著

江毅华 郑永泰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3 5/8印张 356千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300册

统一书号 11017·460 定价 1.25元

出版说明

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的这本著作，对于研究早期的中俄关系史极为重要。它自从 1912 年出版以来，一再被各国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学者所引用。

我们曾于 1961 年出版过本书的中译本，叫做《早期中俄关系史》。它是从舍尔顿·李治(Sheldon Ridge)的英译文转译的。现在我们根据法文原著(巴黎 Félix Alcan 出版社)重新翻译。这次恢复了本书的本来面目，补译了参考书目和全部脚注。由于脚注所占篇幅很大，放在页底有所不便，现改附在每章的末尾。注释中的拉丁文、荷兰文和德文的引文已全部译成中文，以便我国读者查阅。

1980年1月

序 言

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史以两种类别不同的文件为基础：其一是俄国文件，其二是中国文件。第一步的工作是分别研究这两种文件，把每一种文件所提供的资料加以对照，衡量每一件资料的价值，对所有资料都作严格的审查。下一步是将这样双管齐下进行分析的结果，放在一起核对和比较；在俄国档案材料与中国历史材料一致时，史实由于两种独立存在的证据相一致而被确认为有根据；在有分歧的情况下，必须研究差别的原因，并且寻觅事实真相。这是最理想的方法。不幸的是现今这部作品未能完全采用这种方法，而且恐怕这种方法还会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应用。

俄国方面的文件数量如此丰富，可是编入目录和分类的却又如此之少，以致目前逐一加以研究不仅不可能，甚至不能全部通读一遍。试把这个几乎还未开采的宝藏很快地浏览一下吧。关于本书的主题，莫斯科外交部的档案包括有：（1）中国事务，有一个简目；（2）喀尔木克事务，蒙古事务，等等；（3）“穆勒材料袋”。前两部分按年排列，可能是依据早在十八世纪末叶的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分类法编写的，而后来的增补有时使得原来的大纲变得模糊不清（请参见后面的书目）。“穆勒材料袋”塞满了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档案抄本、译文、注释，等等，简言之，这些名目繁多的文件是由历史学家格—弗·穆勒西伯利亚之行（1733—1744）带回来的，或者是他回来后为他的著作而搜集的¹。这些材料大部分存放在莫斯科，有一部分放在圣彼得堡。这些文件数目相当多，品种相当杂，因此应当有一份专门的分析性目

录。至于档案本身，只要想到自 1689 年至 1730 年四十年间涉及对华关系的外交部档案至少有二万至二万五千页手稿，就可想见其数目之巨大²！

然而，外交部的档案只不过是这一历史时期俄国官方文件的一部分。除了枢密院和俄国宗教最高会议的文件外，有关西伯利亚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以及它的商业等文件，原先放在西伯利亚的“Prikaz”(类似西伯利亚事务处或西伯利亚部，1637 年至 1763 年)，后送往莫斯科的司法部档案馆存放。这些存放文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是，司法部该不是保存十七与十八世纪有关西伯利亚档案文件的唯一的地方。纵使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档案在存放它们的木头建筑物失火时大部分烧掉，有一部分还可能被抢救出来，或留有抄本，保存在当地或其他地方。如果没有一份俄国档案的总目录，这种目录实际上也没有，如果没有人对所有的图书馆，不仅是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亚洲博物院图书馆，等等）和莫斯科的图书馆，而且包括西伯利亚，乃至全俄国的所有图书馆，亲自去作一番搜索，那么，怎么可能了解到剩下些什么呢？

如果说国家的文件还没有完全分类编目，更不必说出版，那末，私人文件又从何谈起呢？这些文件是核对官方的论断所不可少的。私人回忆录、传记、私人记事会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可惜与这段历史时期有关的这类文件几乎是空白，而且恐怕今后不会有更多的发现。

极其丰富、分散、不完全为人所知，这就是俄国档案的现状。中国方面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段历史并不缺少文件，可是这些文件既没有汇集，又没有全部译出和加以审查。本书作者曾打算本着上述精神去着手研究这些文件，并把它们与俄文史料对照。但是，作者在远东患了重病，迫使他放弃了汉学的研究，而

只局限于研究已经译出的文件。这一局限和欠缺起初似乎并不太严重。通常中国的编年史对官方最突出的事件只是干巴巴地记载寥寥数语，有关俄中贸易部分一点详情都没有，而私人回忆录提供这方面资料的可能性很小。从翻译过来的编年史片段来判断，除去一些人名和日期外，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参照俄国文件，几乎不可能对双方外交谈判或商务谈判的起因、过程及结果形成某种概念。极其凑巧，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少有一次是这样。俄文档案中有关 1712 年至 1715 年派往伏尔加下游土尔扈特人处的中国使团的记载，只谈到派遣使节路过西伯利亚和欧洲俄国的一些日期和琐事。但是，使团首脑之一，满人图理琛用满文和汉文写了一本详细的有关中国使团的书。他的书很荣幸地有四种西方译本：一本法文译本，两本俄文译本和一本英文译本。同样由于非同寻常的巧合，法国耶稣会教士张诚神甫，身为中国官方译员深深地卷入了 1688—1689 年的俄中谈判，对种种事件作了详细的记述。他的论述为俄国大使公务日志所证实或更正。这两位彼此无关的西方证人就这样逐日记录了各种事件，一个在俄国方面写下了为他的行为辩护的必要细节，另一个在中国方面用具有科学精神的准确性来写书。这样的资料是最理想的资料，使人遗憾的是相同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俄文档案大部分是手稿，中国文件几乎没有译出，这段历史的主要来源的情况就是这样。除了这些资料以外，喀尔木克的和蒙古的史料阐述了散处在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各民族的变迁，这些民族在两个帝国的政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同中国的史料一样，除去少部分外，直到那时为止，喀尔木克的和蒙古的史料既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翻译过。仍然同中国史料一样，这些史料记载得非常枯燥无味，而且比中国史料更不准确，只有经过译者的对比和解释以后才能提供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料。

因此，这部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史所依据的只是一部分俄国官方档案和一些译自中文与蒙文的材料，这些材料够吗？

如果涉及的是一部不再更改的著作，那当然不够。可是这本书并不企图达到这个目的。本书的目标仅在于取得某种进展，明确地提出一些问题，但并不总能加以解答。假如这本书只能指出问题的复杂性，指出在某几点上我们的知识所受到必然的限制，和当前所能达到的地步，它的作用似乎就不是无用的了。

或许正是由于有所抑制和为自己划定界限，这样一本著作才在表面广度上虽嫌不足，但在坚实可靠上却可以得到弥补。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责难它所倚靠的官方材料的片面性。对于俄中政府间的关系，国家档案似乎是最好的史料来源，之所以最好，那是因为在俄国和在彼得大帝时期，是由中央政权控制一切政治事务的。它甚至要管理商业事务，不但靠发布同时期法国科尔贝尔*那样的通用条例和繁琐的规定，而且对商业直接干涉及进行官方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里找到有关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务资料是不足为怪的，官方材料似乎很能说明这些商务来往。

国家档案对于研究俄国财政部商队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了解竞争性贸易是有用的，而由于在俄罗斯，国家就是一切，或者想充当一切，并且由于在这一情况中，国家损害私人利益而自己充当商人，留下了它自己的商务帐册和有关它的竞争者秘密进行交易的点滴情况，因而国家档案更具有特殊价值。

因此，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特别表现在商业、经济和海关方面。但是，在和平还没有来保证两国之间经常性的自由贸易之前，为了铲除困难，消灭误解，找到相互满意的方案及相互谅解

* 科尔贝尔 (J. B. Colbert, 1619—1683)，法国路易十四时的财政大臣。——译者

的办法，必须通过外交进行多次交涉。继起先的围攻、冲突和战斗之后，一个平静的纪元在1689年左右来临，它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外交的任务是为了结束流血的交锋，为了以和平竞争代替暴力和武力。然而，不找出俄国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的动机，就不容易理解外交工作的成果。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形成十七世纪俄中战争与十八世纪的和平之间的过渡阶段：商业和外交是这一演变的两个因素。这一演变便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注 释

1 有关穆勒和班蒂什—卡缅斯基的生平，他们在保存档案以及研究俄中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请看参考书目。

2 柯罗文大使自1686年至1690年的公务日志，共有2,522页；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大使自1725年至1729年的公务日志有2,172页；他的助手、负责边境事务的专员斯捷潘·阔留赤甫在1894年仅三本公务日志就有8开本的手稿6,588页。1726年共有各种文件23本；1727年有29本；1728年有24本；仅仅在这三年中就有76个本子或76束文件。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十七世纪末叶俄中两国间的竞争	1
第一章 柯罗文·费要多罗的出使(1686—1689)	14
第二章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俄国的远东关 税政策	43
第三章 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的俄中早期关系； 伊兹勃兰德·义杰斯(1692—1695)	63
第四章 十八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在中国的俄国商 队	84
第五章 图理琛的出使下伏尔加的土尔扈特 (1712—1715)	109
第六章 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和喀尔木克人 的关系	130
第七章 伊兹玛依洛夫的出使(1719—1722)	152
第八章 从伊兹玛依洛夫到萨瓦·务拉的思拉维 赤；郎克(1721—1725)	173
第九章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出使(1725—1728)	194
第十章 1727—1728年的商队；彼得大帝逝世时 边关的改组	240
第十一章 中俄宗教关系：东正教会在北京	262
结论	291

原始文件·····	297
参考书目·····	356
译名对照表·····	412

绪 论

十七世纪末叶俄中两国间的竞争

从十六世纪末叶到十七世纪末叶，俄国派往中国的仅有两位使臣和两次官方使团；从1730年至1850年，派过两位使臣和三次商队。但是从1689—1730年间，俄国使团或使臣出使中国却不下于四次，而且其中有一次的规模及重要性远远超过其它各次；这期间，中国使臣出使过一次，俄国官方商队来过十二次左右。为什么这四十年间外交和商业来往异乎寻常的频繁呢？这些来往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在整个十七世纪，俄国穿越西伯利亚，一直推进到黑龙江流域。在十七世纪中叶，它似乎已经在外贝加尔区建立了固定的居留地¹，即市镇或修道院，这样，它就与截然不同于西伯利亚西部和中部游牧民族的邻邦中国，面对面地相遇了。它马上就同它的邻邦进行外交的和武力的接触。莫斯科曾两次派遣使臣到北京来，一次是巴伊阔夫，他于1656年3月3/13日²到达北京，同年9月4/14日才离开；另一次是摩尔达维亚人尼果赖，于1676年5月15/25日到达中国首都，并停留到1676年9月1/11日³。介于巴伊阔夫使团和尼果赖使团之间的二十年间，俄国可能曾两度派遣官方使节前往中国：一次是由塔拉的“贵族之子”伯夫列夫和不花刺人阿勃龄携带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离开莫斯科，信件的日期是1658年3月10/20日，于1662年11月1/11日回到莫斯科⁴；第二次只由阿勃龄一人单独回到中国，这是1668年至1672年间的事⁵。这些

俄国早期的外交使节，负责去同中国建立和平的商务关系，结果都失败了⁶。这是由于中国人不欢迎这两位使节本人，而且也因为对于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持续斗争和流血冲突感到烦恼。哥萨克人和冒险家们在黑龙江沿岸建立了雅克萨城；他们的首领之一哈巴罗甫顺河而下，被阻于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并被迫与中国人作战（1652年3月24日/4月3日）；另一首领斯特帕诺甫被围于呼玛尔斯克要塞（1655年3月13/23日），可能于1658年6月30日/7月10日被中国人擒获⁷。另外有两件事更使中国人愤怒：一件是一个中国属民的改信东正教，另一件是雅克萨城的重建。约在1667—1670年间，有一个叫根忒木耳的通古斯王公带着他的家人和奴仆逃到俄国人那里，俄国人就给他们洗礼，并且拒绝把他交还给中国人⁸。于是中国人就在雅克萨的俄国人身上报复：中国人自1683年8月10/20日起就包围该城，1685年6月12/22日攻下该城。以亚列克西·托尔布新为首的雅克萨城的保卫者，虽撤离该城，但，该城不久就得到重建。一支生力军由一个波兰或德国贵族拜顿率领，重又攻打回来，于1685年8月27日/9月6日用泥土和木料建立起新雅克萨，这座城市于1686年春天已开始耸立。1686年7月7/17日中国人兼程前来包围该城，于7月15/25日杀死托尔布新，并且进行严密的封锁⁹。

不过，中俄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方面对于俄国外交上的试探曾多次去信答复，但是都没有结果，理由很明显：这些信件有些从来就没有送达目的地，要不就是几年以后才送到莫斯科宫廷¹⁰。不过，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存在着妥协和修好的意愿。这是因为在十七世纪末叶，中俄两国都要求和平。不过，如果说，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相一致，因而可以获致同样的和平解决，但各自的原因却完全不同。所以，应该对它们一一加以分析。

俄国从最初与中国发生关系时起，就让人家看出它想从与它的邻邦的接近中捞取些什么。给尼果赖的训令（比给巴伊阔夫的训令更为世人所知）表示得很清楚，和好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商业。俄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未来的市场。中国被认为是出产金、银和贵重布匹的地方。西伯利亚盛产毛皮，并且臣服俄国的西伯利亚各民族又都把毛皮无偿地作为贡品送到俄国朝廷；用这些毛皮交换中国商品会获致多厚的利润！俄国由于行政改革，机构扩大和在西方的历次战争，国库日渐空虚，急需中国的金银。只要俄中两国政府能够达成协议，两国间的贸易得到保障，它就必然会给俄国方面带来可观的利益。但是要想使这种希望不致落空，金银锭和硬币就必须全部归国家所有。应该只有国家才能够支配商业活动，并使这种商业带来所期待的全部利益。不过，如果皮毛贸易在中国是这样的有利可图，那么很多人就都想染指。私人会把这种权利让给国家吗？国家肯允许商人独吞各种硬币和全部盈利吗？如果国家干预这种交易，是否会产生妨碍和毁坏这种交易的危险呢？如果竞争对国家不利，国家又怎能不监督这种业务呢？如果仅由国家来进行俄中贸易，它将以何种方式来管理这项业务呢？国家把这种特权让出，招人承办，要在什么条件下呢？如果这种商业由皇家垄断并依靠代理人来进行，是否合适呢？如果这样作的话，路程如此遥远，又受可获巨利的诈欺行为的诱惑，应该用何种方式来有效地管理这些代理人呢？俄国政府由于受到对华贸易可获巨利的吸引，因此冒着与私人、官吏以及各种经济上的劲敌竞争的一切危险，自充官商，从事贸易。

受到内部竞争威胁的官方贸易，还不断受到对外政策的打击。中国方面，在看待自己与“北方蛮夷”的关系上，所持观点与俄国完全相反。使中国发生兴趣的是政治关系，并不是商业——商业只不过是私人的事务。中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在国境四周以进贡部族

来确保边境安全。十七世纪末叶，介于中俄之间有三种主要民族：在西部，在伏尔加河河口及乌拉尔河流域的是土尔扈特人；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发源地一带的是喀尔木克人或厄鲁特人；在外贝加尔区的则是蒙古人。土尔扈特人在种族上与喀尔木克人相亲，最初定居于准噶尔，后来于十七世纪中叶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在十七世纪末叶时，其首领阿玉气汗，成为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各游牧民族的最高领袖。俄国总想法使他成为自己的附庸；连续订立的几个条约表明，这纯属幻想。在西伯利亚的另一端的蒙古人，1686年于基兰·布迟尔地方召开的议会上，由于感到自身太软弱孤立，于是决定委身于中国。可是，随着喀尔木克人逐渐向东推进，他们的地位变得更不稳固了。厄鲁特人是在野心勃勃的首领们领导下的战士，他们居住的地方正控制着从南部进入西伯利亚以及从西部进入中国的各条道路，因此他们有独霸中亚细亚之心。十七世纪末他们降服了突厥斯坦的不花刺人，并使他们成为自己在外交和商务上的代理人，他们又自己充当西藏的保护者，保卫喇嘛佛教，使之免受中国黄教支派的侵害。在把中俄两国隔开的各个民族中，实际上只有厄鲁特部族对这两个帝国真正构成威胁。

中国是了解这一点的，为了易于压服厄鲁特人，中国着手运用全力去孤立他们。鉴于蒙古人已经依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中国此时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使这种从属关系成为不可分离的而已。土尔扈特人对于与他们信奉同样宗教的中国人方面的召唤，是不是会比蒙古人更为冷淡呢？土尔扈特与喀尔木克首领之间的竞争，使得土尔扈特人也置身于反对厄鲁特人的行列中。在西方人和亚洲人之间，在游牧的佛教信徒和信正教的俄国人之间，必不可免地发生摩擦，这结果会不会使他们与俄国疏远呢？中国的外交任务似乎由于这种情况而变得容易完成了，只要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厄鲁特人由于既和蒙古人又和土尔扈特人对立，除了从俄国方面外，得不到任何支援。这种可能性是可怕的。中国因此有必要以一切代价来阻止敌对双方联合起来，因为它们的联合力量将会非常强大，足以破坏努力的均衡而损及中国的利益。喀尔木克人由十七世纪末叶起，作为敏感的亚洲人，不断地考虑着这种联合会产生什么作用，一直在散布着这方面的谣言，并且要求建立这种联合。但是俄国对于厄鲁特人也不过是和其他通过条约附属于它的游牧民族一样看待，它萦回不已的仅仅是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俄国接待了喀尔木克人派来的代表不花刺人，并在与他们进行贸易时给予优待；而对于喀尔木克人本身，则只要求他们在从属关系方面作出外交上的保证。

俄国人和厄鲁特人的这种关系，当然逃不脱中国的密切注意。中国当然不会因他们之间的敌意而不快，而且中国还可能在设法挑起这种敌意。因此，得到中国人友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俄国方面至少应该严守中立。而有关俄国和厄鲁特人互派使臣和成立协议之事稍有谣传，都会立刻使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友好态度，并且狂怒起来。为了对抗俄国人，中国掌握了一项足以打击敌人弱点的武器，那就是收回给与俄国的各种商业上的特权。中国在政治上对俄国的不满，很快就会表现为阻挠俄国人进行贸易，愤懑则表现为与俄国经济关系的完全破裂。但是中国人不能同时与厄鲁特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又与俄国人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因此中国的策略就不得不是使它的两个敌手中的一个解除武装，以便转而与另一个为敌。如果我们说俄国所以希望与中国保持和平是为了它的商业利益，那么中国所以同样希望与俄国达成谅解，就是为了它在中亚细亚的政治利益。

虽然中俄两国的愿望相同，但是经过最初几次会晤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中俄两国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用一个性质较

为广泛的条约补足了第一个和约。这是因为直到十七世纪末叶，两国尚未开始彼此了解。俄国把中国人视为半野蛮民族，称中国皇帝为“可汗”，对他的尊称仅是“阁下”而不是“殿下”；而中国则妄想对这些“北方的蛮夷”行使宗主权，正如它对其他地方的蛮夷一样。由于彼此互不了解情况，俄国和中国甚至对于他们本国的幅员和各自的领土都搞不清楚。俄国对于西伯利亚只有一些极其粗糙和极不精确的草图；而中华帝国连一幅地图也没有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除了把知名市镇附近的几个点作为边界外，还能划定什么边界呢？因此首先是中国，接着是俄国，都要花时间来对本国领土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地图。如果我们说中俄两个帝国被迫不得不从事精确的地形测量是外交为科学服务，那么，为求正确地相互估计以及公平地划分边界而去了解这两个国家之举，同样有益于外交。

达成协议的条件本身要求能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但是，在十七世纪末叶，俄国人既不识满文，也不懂汉文；同时中国人也一点不懂俄文。在中俄官方通信和进行外交商谈时究应采用哪种语文呢？中国人是很熟悉蒙文的，俄国人由于与外贝加尔区的布利亚特人接触的缘故，学蒙文比较方便，因此蒙文似乎是很合用的；可是，不知道是由于俄国人的无知，还是由于耶稣会教士阴谋的结果，最后却选中了拉丁文。这样一来在两个宫廷之间，耶稣会教士既充当了译员，又能够得知国家的机密。中国方面是出于需要而聘用他们；俄国则设法争取他们，他们同俄国在宗教信仰上如果不是全相一致，那就是颇为相似。在十七世纪末叶他们曾向俄国请求让教会信件和教会人士得以自由通过西伯利亚。这些不都是俄国可以笼络他们的条件吗？耶稣会教士的地位始终是脆弱的。耶稣会教士在北京是受到宽容的，但也受到猜忌，略遭怀疑，稍有轻举妄动，都会使他们丧失性命。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会不了解俄

国把西伯利亚开放给他们所带来的好处。他们怎么才能把本教会的利益和这两个敌对的国家利益调和在一起呢？这两个国家同样都会迫害他们，但同样地不得不寻求他们的帮助。耶稣会教士的影响，他们的服务代价，他们善观中国皇帝的脸色而唯命是从的效果，这一切都促使俄国不要利用耶稣会教士从中周旋。但是，训练称职的译员并非易事，用半个世纪来完成这项工作也几乎不够。

因此，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史，实际就是俄国在远东的商业史以及中国政策对这种经济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的历史。这个时期的历史，一方面是追求绝对垄断权的俄国政府和私商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是俄国和中国竞相影响近邻各种游牧民族的斗争。如果说俄国是商业第一，那么中国就特别致力它在亚洲的霸权。俄国的商业和中国的政治，这两个因素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受到几种不同的中间人的阻碍的：即商业方面的私商，政治方面的喀尔木克人和外交方面的耶稣会教士。俄国和中国是否可以摆脱这几种中间人呢？还是这些中间人能够一直维持它们的独立和权势呢？十七世纪末叶使俄、中两国不睦的政治上、商务上、宗教上和外交上的各种问题将要怎样解决呢？研究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起以至1728年恰克图条约之间四十年的历史，便可以得到答案。

注 释

1 十七世纪西伯利亚的历史远远没有弄清楚。穆勒和班蒂什—卡缅斯基只提供事实，丝毫不加评论，而自他们以后，换句话说，就是自十八世纪以后，我们找不到有任何历史著作着力于鉴别证据材料的价值、将它们进行比较和核对的。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判断仍然是假设的和临时性的。

关于城市的建立日期，必须区别使用的名称；随着对于同一地方，用“齐莫埃”（普通的过冬防御地，关于这个词的意义，可参阅穆勒的《月报》，1764年，第1号，第294页，和俄国科学院1745年的《地图》中的《序言》），用要塞还是用

城市的名称,建立的日期会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俄国驻华大使务拉的思维赤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写于1730年,非常后于它所报告的事件),色楞格斯克建立于1664年,而根据斯帕斯基伊,它建立于1666年(参阅斯帕斯基伊,《西伯利亚地图抄本……》,用俄文写,载于莫斯科大学俄国历史和古代史学会《会刊》1849年第3卷第18—20页)。——穆勒(《月报》1757年8月号第122页以下)和菲舍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5分册第5章第853页)肯定尼布楚建立于1658年;而伊尔库次克编年史上说,建立于1654年,后来又说是1658年(参阅《伊尔库次克州首府编年史》第1页)。——雅克萨的建立日期,尤其不能确定,穆勒和菲舍尔只说这个城的名称来自一个当地的王公(《月报》,1757年,7月号,第20—21页,或《文集》第2卷第293页以下;菲舍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5分册,第4章,第798—799页);班蒂什未指明来源地引用务拉的思维赤的《秘密报告》(第1章第13页),说州长帕什科夫从叶尼塞斯克出发,去建立尼布楚和雅克萨。克拉普罗特平常很讲究精确,也忘记告诉我们他是从哪一份中国文件翻译出来的,说雅克萨的建立约在1645年左右(克拉普罗特,《亚洲回忆录》,巴黎,1824年,8开本,第1卷,第93—94页)。

关于在外贝加尔地区建立修道院事件,在梅莱蒂伊的著作中有些记载——未必靠得住。参阅梅莱蒂伊(主教)的:《十七和十八世纪东正教会在达斡尔(外贝加尔)、蒙古及中国》,1901年,梁赞,8开本,俄文版。

2 西奥多·伊萨科维奇·巴伊阔夫接到1654年2月2/12日发出的训令和一封2月11/21日给中国皇帝的书翰,内容完全表达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训令指示他只能把书翰交给中国皇帝本人,命令他拒绝任何侮辱性的下跪,并打听进入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贸易情况,还要他秘密地探听中国的武装力量的情况。巴伊阔夫只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信使”,据说,他曾从托波尔斯克派遣不花刺人阿勃龄到北京去通报他的抵达。他本人则沿着额尔齐斯河取道甘肃和库岸和图进入中国。他拒绝将御书交给中国皇帝的大臣们,拒绝按照中国礼节三跪九叩,这使他的整个事情都归于失败。巴伊阔夫于1657年7月31日/8月10日回到托波尔斯克,于1658年7月19/29日回到莫斯科。参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章,第51页,据班蒂什,第8—11页(书翰的全文见同前第333—335页);穆勒《月报》1755年7月号,第15—57页;《文集》,第4卷(1760年)第473—548页;菲舍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4分册,第7章,第16节,第719—720页,说明资料来源是:尼

厄阔夫的《巴达维亚使臣出使鞑靼大汗 Sungtelus 记…》(原文为拉丁文),阿姆斯特丹,1668年、对开本;韦特森:《蒙古北部和东部》,阿姆斯特丹,1692年、对开本;《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1718年、12开本,第4卷、第156—164页。

关于俄国旧历和公历的差别,见后第1章。

3 尼果赖于1669年是摩尔达维亚藩王驻瑞典宫廷查理十一世的代表,后于1671年12月14/24日在莫斯科使节部(关于这个部可参阅后面第1章注释)担任拉丁文、希腊文和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文翻译;被派到中国皇帝处,作为“使臣”,必要时也可作为“大使”。他收到的训令的日期似乎是1675年1月13/23日(班蒂什说是7月,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因尼果赖在1675年7月已经到达叶尼塞斯克),他带去的书翰的日期似乎是1675年2月28日/3月10日。训令和书翰都说到中国给俄国的信件,是用中文写的,由于没有人翻译,看不懂。尼果赖负有仔细探查通过河道,如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或色楞格河等,进入中国的使命,并负责争取中国派遣一个大使携带宝石、贵金属、布料等前来俄国,同俄国财政部交换商品,或者派遣一些商人;还负责向中国保证沙皇的修好与通商的意愿。

他于1675年3月4/14日从莫斯科出发,随员有使节部的两个秘书尼果拉·魏牛高和宜番·法佛罗瓦。他在托波尔斯克补足了他的随行人员和商品,经尼布楚和满洲到达北京。他被理藩院侍郎和南怀仁神父接见(理藩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到十九世纪为止,受理蒙古和俄国事务,现在,负责蒙藏事务,参阅迈耶斯:《中国政府》,上海及伦敦,1878年、8开本、第22页、第183号)。后来数次被中国皇帝接见(1676年6月5/15日、6月15/25日、7月8/18日、8月25日/9月4日),但他递送的书翰始终没有得到答复,他在北京的商务也受到阻碍,他的使命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中国人所提出的理由是他拒绝遵从中国朝廷礼节和俄国人在黑龙江流域胡作非为。他离华的时候,南怀仁神父托他转交沙皇一封信,在信内南怀仁神父说,他正在用拉丁文写一本中国语法书,还未写完,所以只好请沙皇接受他的一本《解剖学》。尼果赖沿着来华途径回去,于1678年1月5/15日回到莫斯科。以上根据班蒂什的著作,班蒂什扼要地引用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3、4、5章,关于训令,见中国宫廷第3章,第169—233页;班蒂什第23—36页。

关于尼果赖的生涯,欲知详细,可参阅:阿尔塞纳夫:《关于尼果赖1671—1708年在俄官职的新资料》,莫斯科,1900年、4开本、63页。

南怀仁神父 1623 年 10 月 9 日出生于 (法国) 库特拉附近的皮唐地方, 1688 年 1 月 27 或 29 日死于北京。从 1659 年起他就到了中国, 他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使他被康熙 (1662—1722) 选任为这两种学科的教师。康熙授权他建立北京观象台和铸造大炮; 康熙对他恩宠备至, 直到他的隆重的葬礼举行那天为止 (1688 年 3 月 11 日)。参阅: 布韦神父:《中国皇帝的历史写照, 献给国王》, 巴黎, 1697 年, 12 开本, 264 页; 勒·孔特神父:《中国现状新论》, 第 2 版, 巴黎, 1697 年, 12 开本, 第 1 卷, 第 2 封信, 第 58—92 页; 第 2 卷, 第 13 封信, 第 328—329 页及第 335—340 页; 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6 年, 第 2 卷, 第 56—58 页, 第 4 卷, 第 182—184 页; 索马沃热:《耶稣会图书馆》, 布鲁塞尔及巴黎 1890—1900 年, 4 开本, 9 卷; 科尔迪埃:《在中国之中西印刷术》, 载:《东方现代语言学校丛刊》第 3 卷, 第 5 章, 1901 年, 8 开本, 抽印本, 巴黎 1901 年, 8 开本。

大概就是南怀仁神父向教皇建议通过俄国和西伯利亚把传教士派到中国来, 由此而引起了阿夫瑞尔神父和巴纳巴斯神父在 1686 年的尝试 (参阅后面第 8 章)。阿尔塞纳夫前引著作, 第 27 页, 注 1 (南怀仁神父给沙皇的拉丁文文件的俄文译文载前引著作, 第 45—48 页, 其根据是中国宫廷档案第 3 章, 第 453—458 页)。

根据编辑过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著作《外交文献汇编》的弗洛兰斯基先生的意见, 阿夫瑞尔神父可能在他的《欧亚各国旅行记》及所附地图中利用过尼果赖的手稿;《欧亚各国旅行记》于 1692 年在巴黎出版。见班蒂什, 第 520—531 页。

4 俄国的信件只限于重复表达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愿望; 在回国时, 伯夫列夫和阿勃龄带回来了一封中文信件, 由于在莫斯科没有中文翻译, 后来这封信交由尼果赖带到北京交给耶稣会神父。根据班蒂什第 12—14 页, 俄国外交部档案关于这次远行只提供了上述一些资料; 班蒂什引用中国宫廷第 2、3、4 章作为史料来源。

塔拉的“贵族” (Syn boyarskii), 逐字译出是“贵族的子女”。人们以此称呼西伯利亚的一种小贵族或贵族中的后辈。参阅: 穆勒《文集》第 3 卷, 262 页和第 4 卷, 第 203 页注解; 科托奇欣:《在亚历克西·米哈洛维奇统治下的俄罗斯》(考古委员会出版), 圣彼得堡, 1840 年, 8 开本, 第 2 章; 比较德·萨比尔:《黑龙江》, 巴黎, 1861 年, 4 开本, 第 13 页注解。

5 班蒂什第 12—14 页。

6 必须仔细地区分俄国外交代表的称号。有些是一般信使 (gonets, 复数 gontsy); 在他们之上是“使臣”(poslanik), 有时候使臣也负有重要的使命, 可是他们的地位在大使 (posol, 复数 posly) 之下。参照施特拉伦堡:《欧亚两洲东北部概述》, 斯德哥尔摩, 1730年、4开本、第13章、第311页。

巴伊阔夫、伯夫列夫和阿勃龄只是“信使”, 尼果赖是“使臣”。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 在本书所研究的时期, 即自1689年至1730年, 只有过两位“大使”, 他们都是全权代表, 每人同中国签订了一个条约。

7 这些遭遇, 比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建立日期和十七世纪俄中早期关系更需要进行严格的历史审查。各个历史家如穆勒和菲舍尔的叙述充满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 而且他们之间经常不相一致。参阅穆勒《月报》1757年7月号第3—39页; 8月号第99—130页;《黑龙江附近地区史》, 或《文集》第2章(1758年)第293—448页;《黑龙江沿岸地区史》; 菲舍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5分册、第3章第778—794页; 第4章第795—823页; 第5章第826—861页。

8 同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其他事实一样, 根忒木耳的历史也是模糊不清和不明确的。第一个困难是弄清楚他逃亡或受洗的日期。班蒂什(第14页以下)自相矛盾, 起先说1634年, 是根据1710年12月30日/1711年1月11日的一份文件, 他引用这份文件就不甚精确, 仅说是《给西伯利亚的公函》, 过了几页, 他又说是1667年。《史料补遗》第481页上的一个注解说是1684年。可是斯洛夫措夫在他的《西伯利亚简史》(莫斯科1838—1844年、8开本、2卷、第1卷、第183—184页, 第239页注解, 第240页注解)里引用资料(由舒金整理过的伊尔库次克档案, 但他没有说出摘引的资料出处何在)说根忒木耳在1670年以前从齐齐哈尔到尼布楚来(班蒂什引用中国使团=K.D?, 第3章第270页所说的1667年, 同伊尔库次克文件的日期颇相一致; 1684年会不会错印为1634年呢? 班蒂什所根据的文件被斯洛夫措夫阐明了: 那是一道给尼布楚行政长官卡察诺夫的御旨, 命令他赏赐拉里翁亲王, 保尔的儿子, 根忒木耳。

根忒木耳的洗礼教名大概是彼得。尼果赖于1676年12月经过尼布楚时, 可能答应他, 不将他交给中国, 见班蒂什、第15页、注1引用中国宫廷、第4章、第55页; 1685年12月或1686年1月给柯罗文的训令(参阅第1章)中谈起根忒木耳就象谈起一个已死的人。中国宫廷、第9章、第64页背面, 第65页背面, 第66页正面, 第251页正面, 第260页背面至262页, 第373

页,第677页正面。

9 穆勒有关雅克萨的事件的报道相当不完全,参阅穆勒《文集》第1章、第315—326页和第495—515页,穆勒的根据是韦特森的《蒙古北部和东部》,阿姆斯特丹,1692年、对开本(日期应该提前一年;姓名要更正:韦奴高=魏牛高;塔伏罗夫=法佛罗瓦,等等)。相反,《文集》第2章、第293—448页所作的叙述,《月报》1757年、9月号、第195—227页根据当地档案所作的叙述,倒是比较正确的,可惜资料引用得不够详尽。班蒂什、第36—40页,第43页,不注明或很少注明参考文献。请参阅刊登在下列著作里的文件:波列伏依,《俄罗斯文库》,莫斯科,1833年、8开本、第3—10页(雅克萨档案摘要);《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号、第XIII(XII)、XIV(XIII)第241—242页,以及第XVIII(XVII)、XIX、第257—260页(尼布楚档案抄本);同上书、第12卷、第12号、第I—V、第107—114页(叶尼塞斯克档案抄本)。在手稿中,参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0章、第26—30页背面,第43、51—52、66页正面,第68、83页正面至第97页背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201页背面,第202、221—222页背面(柯罗文大使与尼布楚长官维拉索幅的通信),又在同一档案中,有北京邸报的译文,报道托尔布新死于康熙25年6月12日,即1686年7月31日。

关于中国历与公历日期的对比,参阅后面第1章注解。

10 俄国与中国的材料都一致认为,在十七世纪,有许多中国来信没有得到答复(在中国方面,参阅北京邸报的译文,和下面第1章《史料来源》中所引的派克先生的译文)。在俄国的论断中,应判明其价值。

班蒂什(第6页注5,第7页)根据中国宫廷档案汇编第3章、第330—332页,引用了两封中国信件的俄文译文,这两封中国信件的日期是1619年和1649年。中国皇帝万历(1572—1619年)在一封信中,他的儿子“Djou-Khandi”(“朱汉第”〔?〕原文如此,译者)在另一封信里,向沙皇宣称,他们愿意同沙皇直接发生商务关系!索引提供的日期,说明这些信件写了五十六和二十六年以后,才在1675年4月15/25日由托波尔斯克的一个兵士为尼果赖译成俄文!关于这些信件的真实性,讨论是没有用的。

还是根据班蒂什,伯夫列夫和阿勃龄可能于1662年带回来一封中文信件;其次,仍然根据班蒂什,这一次他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材料(中国宫廷、第3章、第273—304页),据他说,尼布楚的总督阿尔钦斯基曾于1670年4月19/29日派遣米洛瓦诺夫、菲勒夫和科比雅科夫三人取道满洲至北京,于8

月 11/21 日回来，带回来了一封康熙 9 年 5 月 13 日即 1670 年 6 月 29 日的信件。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到：1675 年交给尼果赖的训令和书翰曾经说过，由于缺少中文翻译，中国来信无人懂得。在 1676 年耶稣会神父可能将内容解释给尼果赖听，因为尼果赖回国以后，俄国宫廷即知悉中国皇帝抱怨俄国人在黑龙江流域的行为，以及要求引渡根忒木耳。

有两份文件——其实是不完整的、模糊的、不完全一致的——谈到了一封中国皇帝于 1683 年给雅克萨总督的信。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的中国宫廷文件汇编第 7 章、第 55—58 页中，除了转载其他信件外（参阅后面第 1 章注解），还转载了一封“22 年 10 月 9 日”的信；当时任伊尔库次克长官的维拉索幅，在 1684 年 1 月 14/24 日以后，给他在雅库次克的同僚的一份通知中，提到一封“22 年 10 月 19 日”的类似信件，一式三份，一份中文，一份蒙文，一份俄文；维拉索幅是从尼布楚收到的，尼布楚是从雅克萨收到的。（由雅库次克县立小学前任教师拉伊斯基抄录，抄得不甚准确，载《史料补遗》第 10 卷、第 67 号、V、第 237—240 页。不幸的是，除了这些史料不能令人信任之外，象上述那种式样的中国日期，也是不可能有的。）

最后还有一封包围雅克萨的中国军队指挥官给该城的守卫者托尔布新的信，信的日期是 1686 年 6 月 11/21 日，这封信的发出，似乎由于好几个独立的材料互相印证而得到证实：雅克萨档案，载波列伏依上引著作第 10 页；叶尼塞斯克档案，载《史料补遗》第 12 卷、第 12 号、III、第 109 页；托布尔新给尼布楚长官维拉索幅的报告，于 1685 年 6 月 22 日/7 月 2 日收到，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 7 章、第 18—34 页背面；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北京邸报译文（郎坦于康熙 24 年 5 月 20 日即 1685 年 6 月 21 日给托尔布新的信）。

关于 1686 年中国写给俄国、并于 1690 年到达莫斯科的信件，参阅下文第 1 章注解。

第一章

柯罗文·费要多罗的出使· (1686—1689)

1. 俄国材料来源

A. 手稿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7,8,9,10,11,12,13章；尤其参看第10章,内容是柯罗文的公务日志。

尼布楚条约的地图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伊尔库次克“省”地图,第12b。

B. 印刷品

《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汇编》第5卷第114号,第1,2,3卷第175号;《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75,80号;第11章第21,100号;第12章第2,4,8,12,16号(维尔浩土尔城、托波尔斯克、叶尼塞斯克和尼布楚的档案抄本)。

波列伏依:《俄国文库》,莫斯科,1833年,8开本(雅克萨档案抄本)。

穆勒:《实用及娱乐著作月报》1757年4月号,第305—321页,9月号第210—227页,10月号第291—328页;《穆勒文集》第1章第315—326页,第495—515页;第2章第293—448页(根据西伯利亚地方档案复述,这些档案未经正确引用及转载)。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329,1336,1346号。

《保藏在国家外交部之官方函件及条约》第4卷、第197、208号。

班蒂什第335—341页，第418—420页(官方正本)，第49—66页(复述)。

《1689—1881年间中俄条约汇编。外交部编印》第1—10页。

参看索洛维夫的概述性著作：《俄国史》，莫斯科、第5版，1864—1879年，8开本、29卷，第14—18卷；斯洛夫措夫：《西伯利亚简史》，莫斯科、1838—1844年、8开本、2卷，第1卷；安德烈维奇：《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889年、8开本、2卷，第1卷。

2. 中文及满文译文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682—1689年：《中国(北京)邸报译文》，列昂捷夫(阿历克西)译。

满洲编年史摘译，分5部48卷，日期是康熙48年或1709年(《圣明皇帝陛下武力平定西北民族记》)，译者罗索金，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349，第1章第14号。

中国地理《大清一统志》摘译，译者同上(?)，载同上349，第2章、第14节。

克拉普罗特：《亚洲回忆录》，巴黎，1824—1828年，8开本、3卷，在第1卷、第85—115页上载有中国一本著作的译文，译者未注出原作名称。

瓦西利叶夫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札记》第12卷，1857年，第79—109页中，曾将十八世纪初期的一本中国传记译成俄文，但未明确注明出处；德·萨比尔：《黑龙江》，巴黎、1861年，4开本，在第27—34页上曾将俄文译文转译成法文。

两份有趣的传记：《佟国纲传》及《费扬古传》，由赫斯特神父译

自《国朝先正事略》，载《中国评论》第9卷、第3期、第168页及第9卷、第3期、第172页。

派克先生曾摘译《清朝编年史》，发表于题名为：《中国与俄国。罗曼诺夫与爱新觉罗两王朝间最早期的关系》的一篇文章中，载《亚洲评论季刊》1896年、7月号、第12—22页。

在这些中国材料中，还应加上张诚神父的极为宝贵的日记，张诚神父同徐日升神父是尼布楚会议中中国的官方译员，载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5年、第4章，第87—88页，120，131，160页以下，第233页以下，第316，329，348—349页，1736年第4章，第103—104，137—150，157，192页以下，第220页以下，第280页以下，第386，416—418，422—423，428—441，466页以下。

摘录在莱布尼兹的《中国近况》第2版、第1分册，1699年、12开本，第172—175页。

参看德·马依阿神父：《中国通史》，巴黎1777—1785，4开、13卷，第11卷、第110—125，137—138页。

阿米奥神父：《厄鲁特王国的被征服》，载《中国……历史回忆录》，巴黎，1776—1814年，4开、16卷，第1卷、331—332页。

3. 蒙文及喀尔木克文译文

波兹尼叶夫：《准噶尔的喀尔木克人史》，载韦塞洛夫斯基：《炮兵队长伊凡·温阔甫斯基出使准噶尔的理台吉策妄阿喇布坦的朝廷》，《地理学会人种小组札记》第10卷、第2分册，抽印本，圣彼得堡，1887年，8开本，参阅第239—264页。

十七世纪末叶，俄国宫廷已准备与中国朝廷进行商谈，以便停止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敌对行动。这时恰好出现了一个适当的机

会。7194/1685年11月15/25日¹莫斯科接到中国皇帝写给沙皇的两封拉丁文信件，写信的日期是康熙24年4月4日，即公元1683年5月6日²这两封信都提到中国以前曾来过不少信件，可是并没有得到答复。信中要求俄国人撤离雅克萨，不过中国方面的态度似乎是愿意和解的³。

俄国无意规避，于1685年11月26日/12月6日决定不久将派遣使团到中国去⁴，次日(11月27日/12月7日)立即派遣信使前往北京，把这个消息通知中国。信使是米起佛儿·魏牛高及宜番·法俄罗斯瓦，他们曾伴随尼果赖来华⁵。他们所携带的信件通知中国皇帝说，沙皇伊凡和彼得受到和平意愿的鼓舞，惋惜未经宣战就轻动干戈，并说他们派遣一个大使前来商谈⁶。

俄国选派柯罗文·费要多罗为这次出使的外交代表⁷。他被任命为“全权大使”，有权在色楞格斯克与中国的一个或数个代表会谈⁸。派给费要多罗的助手是：尼布楚的行政长官伊凡·维拉索幅和叶尼塞斯克的秘书官(Diacre)西蒙·库尔尼兹柯伊⁹。使团还附有一支不大的军队，约一千五百人，其中一千人左右是射手，有上校四人¹⁰。

发给费要多罗的头几个训令应追溯到1686年年初。¹¹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主要两点：政治和通商。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否则就以其左岸的支流比斯特拉河和结雅河为界，再其次以雅克萨为界，但俄国在黑龙江及其支流有通商的权利，这是俄国让步的最后限度。为了在这项外交任务中得到帮助，柯罗文与蒙古王公阿洽贲僧汗取得联系；他向后者提到其父及其祖父都是与俄国友好的榜样，并许以如订立攻守同盟即可与俄国通商的诺言，来极力劝诱他支持俄国。有关商务方面的命令特别重要；其中有几项重复了给尼果赖的训令。大使应打听有关假道鄂毕河、叶尼塞河(雅木柴夫河?)、额尔齐斯河和色楞格河等进入中国的各条水路的情况。他

应要求中国准许交纳关税，以从事进出口贸易。他应极力促使中国皇帝派遣本国人担任的大使，携带宝石、银、丝绒、花缎、香料等物到莫斯科去，同时也派遣商人携带金银锭和丝到俄国去，这些东西由俄国财政部照市价收买¹²。

柯罗文带着这些训令，率同他的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扈从人员¹³，于1686年1月26日/2月5日离开莫斯科¹⁴。一直到1687年9月10/20日他才到达外贝加尔区的乌丁斯克，1687年10月22日/11月1日才到达色楞格斯克，这离开他的启程期的将近两年¹⁵。在乌丁斯克至色楞格斯克一线上，他又逗留了将近两年，即直到1689年6月24日/7月4日。在这次旅途和逗留在西伯利亚的4年期间(1686—1689)，在莫斯科、中国以及外贝加尔区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俄国派往中国的信使于1686年10月31日/11月10日到达北京，在北京停留到同年11月14/24日¹⁶。他们到达后立刻通知柯罗文，并且告诉他，中国皇帝同意放松对雅克萨的包围。柯罗文于1687年2月18/28日收到他们的信¹⁷；他们在返回莫斯科途中，也于1687年4月14/24日遇到了柯罗文¹⁸。他们由北京带回两封信，一封是蒙文的，简短地通知俄国政府收到了信件；另一封是拉丁文的，写于康熙25年10月6日即1686年11月21日¹⁹。中国皇帝在这封信中诉说对尼果赖的不满，要求引渡根忒木耳，并且通知沙皇，他在一接到俄国要派大使到中国来的消息以后，就已下令放宽对雅克萨城的包围²⁰。除了这两封公函外，信使还带回一封私人信件，写于1686年11月24日，是南怀仁神父写给尼果赖的²¹。南怀仁神父于信中保证他自己以及徐日升神父对俄国的忠诚；并且说信使魏牛高只通晓俄文和西部鞑靼语，不能够谈多少话，因此以后派来的大使或使团里的人员一定要懂拉丁文。中国皇帝委托回罗马去的闵明我神父²²带给沙皇一封信，信中提及的问题和

他以前写给沙皇的许多封信一样，但是从前那些信都没有得到答复。同时中国皇帝又把这封信的一分抄本交给荷兰的大使²³。南怀仁神父在信中又请求尼果赖，假如闵明我神父途经沙皇的国家时，请求尼果赖按照自己的诺言，给他以帮助²⁴。

俄国宫廷甚至在接到北京这些信件以前(这些信件于1687年7月17/27日到达莫斯科，请参看本章注17)，就已经决定进一步对中国让步。1687年6月14/24日俄国政府起草一道给柯罗文的“上谕”，共7条，柯罗文于同年9月30日/10月10日收到。这份新的训令是由杜马秘书官西奥多尔·列昂捷维奇·沙克洛维奇签署的秘密训令。训令中授权柯罗文可以割让雅克萨以换取商务关系；除非在必要情况下，他应避免流血；如果尽一切努力仍属无效，柯罗文应向中国要求在更合适的时机再派遣使团到中国来²⁵。

到1687年年底，俄国宫廷对这样的解决办法仍感不满，又想出新的妥协办法。根据信使们的报告，它认为中国方面也很可能要求在它的领土上举行两国外交会议。为此，1687年10月29日/11月8日俄国政府颁发一道新的训令给柯罗文，禁止他离开西伯利亚，但是命令他先派遣携带这一训令前来的伊凡·洛吉诺夫，携带重申前次训令中的条款的一封信件前往北京。同时柯罗文应请求“喀尔木克的呼图克图”出面为俄中两国调停，即使要呼图克图特地为此事到北京跑一趟也在所不惜。但当这份文书和其中的五项交涉条款于1688年7月7/17日送到柯罗文手中时²⁶，中国和外贝加尔区的形势已经有了变化。

柯罗文从1686年年底起即不断设法与蒙古的呼图克图取得联系，并且用礼品笼络他。他又在1686年11月16/26日派遣扈从人员科洛文到色楞格斯克，以便再送一封表示友好的信件和礼物给库伦的呼图克图²⁷。就在进行这些事情时，俄国宫廷派来协

助柯罗文的尼布楚行政长官维拉索幅，于1687年10月通知柯罗文说，中国军队已解除对雅克萨城的包围，并已回到中国去了²⁸。柯罗文立刻派遣使者卡昌诺幅到蒙古去，为他派遣到北京去的外交事务官的过境做些准备工作(1688年11月20/30日)²⁹。柯罗文接着又收到了直接的报告，证实了维拉索幅传送来的消息。1688年1月6/16日柯罗文收到中国皇帝给他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康熙26年11月11日，即公元1687年12月15日；信中宣称中国皇帝已命令军队撤离雅克萨，并请柯罗文写信给他³⁰。这时卡昌诺幅已动身往库伦去了，他在那里从1688年1月25日/2月4日逗留到1月27日/2月6日，他于2月13/23日回到色楞格斯克³¹。在他之后，柯罗文派遣科洛文到北京去，科洛文从1687年12月7/17日至1688年2月2/12日被扣留在蒙古³²；后来才脱身，越过蒙古，于1688年3月14/24日抵达北京，他在北京逗留到1688年4月17/27日才离开。他带回来一封中国皇帝于康熙27年3月27日即1688年4月27日写的信，信中指定色楞格斯克作为两国开会的地点³³，这也正是俄国政府指定的地方。看来一切都非常顺利，俄中两国代表的会议即将举行了。中国代表于1688年5月30日离开北京，但在7月22日他们停顿下来并且从原路返回中国，送了一封信给柯罗文，(该信于8月1/11日或2/12日送达)，通知他两国会议要推延到下一年³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正当中国对俄国在黑龙江上的斗争节节胜利(1685—1686)，俄国不断让步(1686—1687)的时候，意外地发生了一个使中国感到忧虑的新因素。这个新因素起初迫使中国推迟了与俄国的和谈，后来又因这个危机的严重性，相反地促使中国赶快结束这个商谈。这个新因素就是喀尔木克人或厄鲁特人³⁵对蒙古的突然入侵。

由于对喀尔木克人和蒙古人的历史资料缺少研究，人们对于

他们在十七世纪末叶的历史了解得很少；幸而有了阿·姆·波兹尼叶夫先生汇集、编辑、翻译和注释的若干文件，我们才能记下他们的主要事件。

和多和亲王公是额森的第七代直系子孙，所有准噶尔的王公都自称是额森的子孙，和多和亲王公的头衔是巴图尔琿台吉（西方人音译成“Kontaicha”）³⁶，他死于1653年，遗下十一个儿子，其中两个大儿子车臣汗和卓特巴巴图尔争夺继承权，杀死另一兄弟僧格（1671年）。他的另一个儿子噶尔丹（他后来得到博索克图的称号），居住在西藏，准备做喇嘛，听到兄弟僧格被杀的消息就回到准噶尔，借着另一个兄弟乌常的帮助，约在1676年杀死了车臣汗。卓特巴巴图尔逃到青海，乌常约死于1682年。这样噶尔丹便成为喀尔木克人或厄鲁特人的唯一的统治者³⁷。对于一个野心勃勃而且好战的王公来说，这样的成就还不算大。于是他首先转向新疆，于1680—1685年间征服了新疆³⁸，然后插手蒙古。1686年蒙古人的议会在基兰·布迟尔开会，噶尔丹前往出席。他抓住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借口，宣称自己代表达赖喇嘛，在席位问题上受到了侮辱，因而向蒙古人宣战³⁹。他在1688年率领全军由准噶尔到了奥洛该（该地位于乌里雅苏台与昂岗之间⁴⁰），遇到了蒙古王公们，进行了持续三天的大战，彻底打败了他们；然后兵分两路，他派遣手下的一个军官带领一支军队到北方去掠夺鄂尔浑河上游的富庶的额尔德尼昭寺院；他自己则亲率军队的主力继续胜利地进军，直至克鲁伦。呼图克图以及一些蒙古王公逃向南方，一直逃到戈壁以南，寻求中国的保护⁴¹。康熙的使臣由北京向色楞格斯克进发时，在1688年年中，遇到噶尔丹由蒙古西部往东部去的胜利大军，因此不得不折回。

不仅是中国方面受到喀尔木克人战胜蒙古人的影响，就是外贝加尔地区也立刻感受到这些事件的反响。

也许是由于喀尔木克人在1688年侵入蒙古，因此蒙古人向北迁徙到外贝加尔区。他们在那里遇见了柯罗文，并将柯罗文围困在色楞格斯克，直到1688年3月27日/4月6日⁴²。柯罗文终于脱身，回到乌丁斯克，决心报复。他于1688年8月28日/9月7日从乌丁斯克出发去尼布楚，突然折而向南（9月16/26日），在色楞格河右岸支流的昔洛克河岸与蒙古人相遇，1688年9月30日/10月10日打败他们⁴³，并于1689年1至3月迫使他们签订了表示降服的条约⁴⁴。

柯罗文解决了蒙古人以后，又将注意力转向中国。1689年1月11/21日，按照洛吉诺夫于1688年7月7/17日带给他的1687年10月29日/11月8日签发的训令，他由色楞格斯克派遣洛吉诺夫到北京去。洛吉诺夫于1689年5月13/23日到达北京，在那里住到同年5月30/6月9日⁴⁵。中国政府一点也没有表示不愿意举行外交会晤，它指定尼布楚为会议地点，尼布楚比色楞格斯克更偏于东部，因此比较不易受到噶尔丹的侵袭。洛吉诺夫于1689年5月17/27日从北京通知柯罗文，柯罗文于1689年7月1/11日收到了他的信⁴⁶。

这时，曾经一再展期的会议已经没有什么阻碍了。中国使臣于1689年7月31日到达尼布楚⁴⁷；过了几天，柯罗文也到了⁴⁸。就在这时，柯罗文接到了西伯利亚部于1689年1月5/15日签发的信件，训令他如果中国坚持要求交出雅克萨，就将该城毁掉⁴⁹。俄国使团在尼布楚出席会议时，以柯罗文和维拉索幅为首，辅以库尔尼兹柯伊。他们手下只有一千人，可是他们周围都是不大可靠的通古斯人和布利亚特人。中国使臣共有七名：索桑或索额图亲王，康熙皇帝的舅父佟国纲，理藩院尚书阿尔尼，马齐，马喇，萨布素和温达，还有两名耶稣会教士张诚神父及徐日升神父当译员⁵⁰。这个使团有一万左右军队护送，还有战舰和大炮，同时通过佛教僧侣控

制蒙古人，特别是经过基兰·布迟尔会议(1686年)和1688年的事件以后更是如此⁵¹。

1689年8月12/22日会议在尼布楚附近开始⁵²。据张诚神父说，中国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而且条件苛刻，以致会议很快就中断了。恢复谈判的功劳应归于两个耶稣会译员⁵³。俄国使臣的使节工作日志却提出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耶稣会教士偏袒中国人，给俄国人制造困难。俄国人想用蒙语与中国人直接交谈，耶稣会教士加以反对，借口说他们是官方译员，只有他们可以执行居间传达的任务，同时蒙语译员也不足够。但是俄国人还是用蒙语和中国人交谈了，中国使臣回答他们说耶稣会教士已经超越给他们的指示；然后满洲人开始互相用满语交谈，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对耶稣会教士的提防⁵⁴。另一方面，俄国人又以优待耶稣会的诺言来使耶稣会教士对他们产生好感；但是耶稣会教士不肯走得太远，不肯背叛中国皇帝⁵⁵。实际上，耶稣会教士一方面支持中国人，另一方面不致于刺激俄国人达到造成谈判决裂的程度，最后要使这次和平谈判缔结一项有利于中国的条约，这样做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朝廷为了他们的热心和谈判的成功当然会感激他们，而俄国方面对于能够和平解决也不会不高兴。因此这样一来耶稣会教士必然可以一举而博得一方乃至双方的好感。

经过两天的争执，到1689年8月15/25日和平解决似乎已是不可能了；中国人除了以尼布楚为边界外不肯以其他地方为边界，并且扬言准备拆除帐篷；柯罗文很不安，要求中国写信证明谈判决裂。这时耶稣会教士再度出面调停，提议作一些让步；8月16/26日他们建议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就在这时，包围尼布楚地区的翁可特人和布利亚特蒙古人简直就要叛离俄国人而完全投向中国了，这使得柯罗文不能再坚持：他手下顶多有1500人(1450人)，既有士兵，又有商人和农民，可是中国军队却有它所争取的部族的

支持。于是他让步了，以后几天就用来讨论条文的细节。八天以后，8月24/9月3日，耶稣会士带来一份用拉丁文写的条约草案。柯罗文拒绝谈论蒙古边界问题，因为在这方面他没有得到训令；他提了一些意见，又经过五天的讨论⁵⁶，尼布楚条约才签订而且换文（1689年8月27日/9月6日，即康熙28年7月24日⁵⁷）。俄国人交出一份拉丁文的和一份俄文的条约文本，中国人交出一份拉丁文的和一份满文的条约文本⁵⁸。两国在拉丁文本的条约上签字盖章，因此拉丁文本是可以凭信的。

条约共有六条，可以归纳为二至三项：边境和叛逃者；——以至商务问题。两国确定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的南岸应属中国，又规定以石勒喀河左岸的格尔必齐河为界，边界然后沿着勒拿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分水岭至乌第河以至于海⁵⁹。雅克萨城尽行拆毁，卫戍军队和武器装备尽行撤回。从前的叛逃者仍可留在原地，但今后的叛逃者则将引渡送还；偷盗、抢劫及杀人逾越国境者严厉处罚，如果人数众多，甚至可判死刑。两国维持商务关系，两国商人携有官方文书者即可听其交易。

这样俄中两国的边界在这一点上是确定了，而这正是划定两国边界线的第一步。但尼布楚城东北的广大地区都没有明确划界，不容置辩的理由是双方都不大清楚这些地区。当时“石兴安岭”、“鼻子或圣岬”以及乌第河本身对两国来说，都不过是些含糊不清的地理名词。勒拿河东部及黑龙江北部地区尚未经过令人满意的详细勘察，更不必说，确定其位置和记载在地图上。尼布楚城的西南地区、外贝加尔区以及西伯利亚的其他地区也都没有划界。事实上，尼布楚条约不过是把这一广大地区的一小部分地区的边界确定下来了。如果中国方面使俄国撤离雅克萨，理由很简单，不过是由于它在尼布楚的兵力超过了对方面而且它在蒙古人中间处于有利地位而已。俄国方面也取得了一种在中国看来是微不足道的

特权，在俄国看来却是非常重要的，即它的出口贸易得到了承认，并为它的官商取得了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可是中国方面只是庆幸自己摆脱了一个敌手，似乎并未充分理解这个新纪元的意义。

中俄两方的缔约者刚刚完成外交谈判工作，就立刻各自去对付曾给他们制造困难的第三者：柯罗文在条约刚一签字以后，便立刻向那些把他搞得无法可想的翁可特人和布利亚特蒙古人报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对喀尔木克人却费了不少周折，不得不几次横越戈壁沙漠，进行艰苦的战斗，甚至远达蒙古南部，进行艰苦的战斗，去打击那个好战的，训练有素的，并且居住在山上的敌人。但是康熙皇帝本人和他的一个将军费扬古终于分兵两翼，夹攻厄鲁特人的首领噶尔丹，在土拉河上的昭莫多消灭了噶尔丹的军队，不久以后（1697年）噶尔丹本人服毒自杀⁶⁰。

噶尔丹除了具有一般尚武的游牧民族首领所具有的那种勇猛大胆以外，似乎还有外交才能。柯罗文由于理解到这一联盟会给他以巨大的利益，曾于1689年6月28日/7月8日上书沙皇，请求沙皇交给他一封给博索克图汗的书简⁶¹。噶尔丹甚至没等俄国先动手。1690年2月22日/3月4日回到伊尔库次克的柯罗文，接到噶尔丹派来的一个使者和一封信，建议与俄国成立攻守同盟以对抗两国共同的敌人蒙古人和中国人。这个建议是很有吸引力的，柯罗文感到左右为难。可是刚同中国议和，订立了一项有几位蒙古王公在上面签字的和约，再开始一个敌对时期，就等于把俄国投入一项冒险事业，而这是与他一再表白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柯罗文因此谢绝了喀尔木克人这一提议，不过他在回信时（1690年3月25日/4月5日）⁶²，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慎重细致。他派遣使者基必列夫到噶尔丹处去，以后又有喀尔木克及不花刺的使者被派到托波尔克和莫斯科去⁶³。因此，在俄国和喀尔木克人之间虽

说没有成立正式的同盟,但我们将会看到,至少俄国是一直在厚待这一强大的邻居,因为它的支持非常重要⁶⁴。

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很明显可以看出俄中两国在相互关系上采取了不同政策:中国安抚俄国是为了能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厄鲁特人,因为中国认识到这一任务的艰巨、它的敌人的强大以及不付出巨大的努力就不能致胜这一基本事实。而俄国,由于它的国内改革和在西方的各次战争而感到苦恼,加上与中国订了和约,因此除了一种纯粹精神上的鼓励以外,不能给与喀尔木克人更多的东西。不过,俄国显然对于它在远东的经济利益是最为重视的,而它在1689年与北京进行官方贸易中已经获得了这一重大的报酬。尼布楚条约的后果不久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中国方面是消灭了厄鲁特人,俄国方面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

注 释

1 彼得大帝于1699年12月19/29日颁布谕旨,确定一年的开始是正月一日,年份从1700年起算(参阅1700年1月4/15日沙皇给叶尼塞斯克长官的诏书,《叶尼塞斯克札记》第4章、第251号,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第4章、第133页、第346号),在这以前,俄国的年份是从9月份开始,俄国的纪元比基督纪元早5509年。因此凡是早于1700年的俄国年份,应该减去5509年,才能得出相应的公历年份(参阅穆勒《文集》第4章第201页注解)。7194-5509=1685年或1685年9月至1686年9月;如果我们象穆勒所指出的那样,减去5508年,则7194-5508=1686年。在俄国档案中千数往往省略,因此我们经常看见的是“在194年,在195年……”,这就是说在1685—1686年,在1686—1687年,等等。

至于月日,应在十七世纪的俄历日期加上10天,在十八世纪的俄历日期加上11天,等等,就能得出相应的公历日期。因此7194年11月15日,就等于1685年11月25日。

2 关于中国日期换算公历日期,参阅黄神父:《中国历……》,徐家汇,1885年,8开本,对照表见第1—101页。

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集,第七章,第1—17页以及第34页

背面至第48页背面,提到有6封信从叶尼塞斯克送来,由西伯利亚部转交使节部(关于这些机关,见下文)翻译;其中三封是用拉丁文写的,有两封是中国皇帝给沙皇的,一封是皇帝的将军给雅克萨总督的;另外三封用蒙古文写,既未注明日期,内容同拉丁文的也不尽符合,其中一封是中国皇帝给沙皇的,两封是发往“尼布楚”的,再也没有别的收信人名称。后面这三封信要求交还根忒木耳,而且说同样要求曾经向尼果赖提出过,但不知尼果赖是否完成使命。所有这些信,无论是拉丁文的或是蒙古文的,都一致认为有很多中国来信没有得到答复。上面所引的档案里只有这六封信的俄文译本;原本可能在西伯利亚部。中国宫廷第7章第19页正面。

还有另外3封俄文信(中国宫廷第7章第48页背面至第59页)于193年(1684—1685年)到达西伯利亚部。一封年份只写“24年”,另一封写“24年4月4日”,第三封写的是“22年 octobre(10月,原文如此)9日”。头两封埋怨许多信没有得到答复,还说中国皇帝要派兵攻打雅克萨;第一封建议以雅库次克为界;第二封谈到在哈蒙和其他河流(黑龙江流域)抓到的俄国俘虏。有关这些信件参考资料远没有另外六封那么详尽;人们不知道这些信件是在193年的什么时候,由谁携带、怎样到达莫斯科的;也没有任何资料说明它们象其余的信一样,是盖上中国皇帝的朱红色大印的;最后,其中只有一封的日期是按照中国人的写法写的。

人们也许想从下述文件中找出所有这些信件(6封+3封)经过西伯利亚的路途:1685年8月,叶尼塞斯克的长官什切巴托夫亲王用奏章呈报沙皇,说7193/1685年8月3/13日托尔布新转送给他三封盖有红印的信,一封是蒙古文,一封是拉丁文,一封是俄文;同年8月5/15日雅克萨的两个哥萨克人和商人马克沁姆·福明,代中国皇帝带到叶尼塞斯克6封信,两封是蒙文、两封拉丁文、两封是俄文,另有色楞格斯克总督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7193/1685年7月10/20日,两个哥萨克人和福明从中国经蒙古到达色楞格斯克,带来了这些信件。叶尼塞斯克档案抄本,载《史料补遗》第12卷第16号第120页至122页。可惜叶尼塞斯克档案中某些细节同莫斯科档案中的某些细节不尽相符:例如每种语言信件的数目;带信的人按照叶尼塞斯克档案,是商人马克沁姆·福明,按照莫斯科档案,是哥萨克人格利哥瑞·福明。

最后,即使假定所有这些信件都是假的,还是应该提到它们,因为在当时就是这些信件决定俄国宫廷的决断的。

关于西伯利亚部(参阅《序言》),见穆勒的《月报》1764年6月号第522—

528 页, 菲舍尔:《西伯利亚史》第 2 卷、第 4 分册、第 1 章、第 24—28 节第 558—561 页; 奥格罗布兰:《1592—1768 年西伯利亚部的《卷册》(stolbets, 复数 stolbtay; 关于这个词, 参阅《参考书目》)及札记一瞥》, 莫斯科, 1895—1901 年 4 开本 3 卷, 第 1 卷第 6 页第 3 号。

使节部类似外交部, 这个名称始见于 1549 年, 直至 1720 年 2 月 13/24 日始为外交部所取代。它不仅经管使节, 而且还经管商业、外国教会、医生, 总之所有涉及外国人的一切。从十八世纪开头, “使节旅途临时办公室”(在旅行中临时为沙皇服务)即处理所有日常事务。到 1720 年外交部代替使节旅途临时办公室以后, 莫斯科仍然保留外交部的一个分支机构, 这个机构一直延续到 1781 年 11 月 4/15 日。参阅: 比耶洛库罗夫:《论使节部》, 莫斯科 1906 年 8 开本。

4 中国宫廷、第 7 章、第 58 页。

5 魏牛高自 179 年(1670—1671 年)起就是使节部的二秘, 法俄罗斯瓦则自 182 年(1673—1674 年)起。参阅比耶洛库罗夫前引著作《补遗》D 第 164 页, A 第 131—141 页各处。

6 中国宫廷、第 7 章、第 107 页背面至第 152 页背面; 中国宫廷、第 8 章、第 1—2 页背面。

7 我们不知道柯罗文的出生年月, 我们只知道他是托波尔斯科长官阿历克西斯·彼得洛维奇·柯罗文的儿子, 前者是沙皇彼得的拥护者。在 1676 年, 沙皇阿历克西斯·米哈依洛维奇可能将未来的彼得大帝托付给他; 后来彼得大帝并没有忘恩负义, 把他抬举到高位。可是在 1685 年, 仍然是大贵族在统治, 而不是沙皇, 因此 1682—1689 年任使节部部长的葛利青亲王, 把柯罗文派到外贝加尔地区去, 以便摆脱一个敌手。在 1685 年柯罗文已经是司宾(关于这个词见下文), 这时被任命为布里昂斯克的总督“okol'nitchii”和“namyestnik”。参阅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名人辞典》, 莫斯科, 1836 年, 8 开本、5 卷,《补遗》, 圣彼得堡, 1847 年, 8 开本、3 卷。

8 中国宫廷第 10 章第 1 页正面。关于这项任命的日期, 中国宫廷集、第 9 章、第 6 页记明是 1685 年 12 月 12/22 日(关于这个集的价值, 参阅前面《史料来源》); 可是大使的公务日志里自己记载是 1686 年 1 月 20/30 日, 他的赴蒙古的护照也是相同日期。中国宫廷、第 10 章、第 1 页正面;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1686/7194 年 1 月 20/30 日, 蒙古事务, 第 5 柜、15 左边第 2/6 本。

俄国外交代表的公务日志称为“statéinyi spisok”(这个名称的来源也许

是因为开始时是逐条写的，同训令里的条文相应）。它的真确性是由外交代表或其助手在日志的每页空白上签名，一页签一个字母，因而得到证明；柯罗文的公务日志是由秘书官西蒙·库尔尼兹柯伊签署的。

赴蒙古的护照称为“milostivoé slovo”，逐字翻译是：“仁谕”，是一封给蒙古王公的介绍信；柯罗文的护照是给阿洽贵僧汗的。

9 对于这些特殊的官衔，似乎很难有正确的翻译，最好的办法是设法将它们解释一下。司宾 (stol'nik, stol 的意义是桌子)，相当于西方中世纪时掌握宴会餐事的领班。近臣 (okol'nitchii, 其中 “okolo” 意思是接近统治者的人)，位于贵族 (boyars) 之后，负责主持边疆事务。总督 (namyestnik, 其中 “na” 意思是“在”、“myesto” 意思是“位”) 是沙皇的代表，是总督、副王、副沙皇的意思。参阅：科托奇欣前引著作第 2 章各处；班蒂什—卡缅斯基前引著作第 1 卷、第 429 页；比较德·萨比尔：《黑龙江》，巴黎，1864 年、4 开本、第 22—23 页注解。

后缀 ii, yi, 古俄语作 oi, 所以库尔尼兹柯伊用“柯伊”(Koi) 结尾。

10 很难严格断定柯罗文手下的兵士有多少，各个档案所记载的数字不完全相符。核心是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步兵，然后是西伯利亚募集的新兵，可是各占比重多少呢？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各级官兵共一千四百人，见中国宫廷、第 10 章、第 2 页正面；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步兵是一千一百六十人，见前引档案第 96 页背面，第 617 页背面；中国宫廷、第 9 章、第 323 页背面、第 683 页正面、第 686 页背面；莫斯科步兵是五百零六人，中国宫廷、第 10 章、第 2 页正面；五百人，《史料汇编》第 5 章、第 136 号、第 I、II 第 234—235 页；六百个步兵、哥萨克、龙骑兵、西伯利亚特种兵 (Kazatchyé dyéti, 逐字译是：“哥萨克的儿子”，是特种兵；比较 dyéti·boyarskié= 贵族的儿子)。中国宫廷第 10 章、第 9 页背面；中国宫廷、第 9 章、第 152 页；秋门及其附近各城市新兵共五百九十三名，中国宫廷第 9 章、第 11 页 (总共是 500 莫斯科正规军+600 西伯利亚正规军=1100 人左右)。

11 训令 (nakaz) 仅仅转载在中国宫廷集中，见中国宫廷、第 9 章、第 6 页正面、第 15 页正面、第 58—88 页，第 93 页正面、第 112 页、114 页背面、第 115 页正面、第 251 页正面、第 256 页、257 页正面、259—265 页，第 270 页正面，第 361、370 页反面，第 361 页、370 页背面、371 页正面、373、672 页背面、673 页正面、677 页正面、821 页背面、845 页背面、849 页背面、896 页。

这些训令没有日期，但只能是在 1685 年 11 月 15/25 日至 1686 年 1 月

26日/2月5日、即大使自莫斯科动身之日。

12 如果我们了解“阿尔璘·保尔森”丝绸厂的历史,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有关丝和丝绸的训令;阿尔璘·保尔森是荷兰人,定居在汉堡,沙皇于1681年把他召来莫斯科,叫他织造一些能同波斯及中国产品匹敌的丝绸。他继续努力到1689年,虽然有官方的支持,但终于失败了。参阅:《史料补遗》第10章、第51号、VII—XXIII、第173—198页。

13 关于扈从人员,必须指出有斯捷潘·雅可夫列夫·科洛文和波兰贵族、拉丁文译员安德烈·阿里斯托凡·比亚洛波切斯基,他们在使团中起了一定作用。卫队只包括百余人。关于各人的详细情况,可参阅:中国宫廷、第10章、第1页背面、第2页正面、第77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6、33页背面、34页正面、38页正面、42页正面、96页正面、107页背面、121页正面、122页背面、123页正面、125页正面、128页背面、129页正面、132页正面、135页正面、140、141页正面、144页正面、145—147、165页正面、237页背面、234、354页背面、355页正面、443页正面、723页背面、724页正面、725—727、949页背面、963页正面、968页正面。还有安德烈·比亚洛波切的原始签名,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卷册》第2号第209页。

14 中国宫廷、第10章、第4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154页背面、155页背面;1月20/30日中国宫廷、第9章、第831页背面(事后摘要);穆勒《月报》、1757年10月号、第291—311页。

15 在西伯利亚的主要几个站是:托波尔斯克,1686年3月24日/4月3日至5月29日/6月8日,中国宫廷、第10章、第7页背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154页背面、236页正面;苏尔古特,1686年6月18/28—20/30日,中国宫廷、第10章、第14页背面,第19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157页背面;那里穆柏兴,7月3/13日,第10章、第20页正面,第9章、第156页背面、157页正面;叶尼塞斯克,9月6/16日至9月22日/10月2日,第10章、第49页背面,第57页;第9章、第229页正面、234、242页背面、313页正面;雷布诺耶和十分艰苦的过冬地,自1687年9月23日/10月3日至1687年5月15/25日,第10章、第57页背面,168页正面;第9章、242页背面、243页正面、313页背面、448页背面(9月21日/10月1日,第10章第82页正面);伊尔库次克,1687年8月9/19日,第9章、第477页正面;乌丁斯克,1687年9月10/20日,第10章、第279页正面;色楞格斯克,自1687年10月22日/11月1日至1688年3月27日/4月6日,第10章、第301页正

面、466页正面；乌丁斯克，1688年4月1/11日至1689年6月24日/7月4日，第10章、第466页背面、810页背面、811页正面。

16 中国宫廷、第7章、第107页背面至167页；中国宫廷、第8章、第2页背面、75页正面、153页背面；中国事务、1730年第5号摘要；班蒂什、第40—49页。

17 中国宫廷第10章、第98页正面至第104页；2月15/25日，柯罗文给沙皇的信，同上引第127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250页背面至第252页，第270页背面、第271页。

18 中国宫廷第10章、第145页背面至147页背面；第9章第282页背面。

19 中国宫廷、第7章、第152页背面至167页正面。这些信随同信使于1687年7月17/27日到达莫斯科，中国宫廷、第8章第158页；一封信是用蒙文写的，另一封是拉丁文写的，拉丁文这封的日期如文中所述；这两封信的俄文译本在中国宫廷、第7章、前引页数。根据柯罗文的公务日志，这封信是用中文写的，附有拉丁文译本，中国宫廷、第147页背面、148页正面、541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266页背面、267、284、367、403页背面、404页正面、422页。根据中国宫廷、第10章、第159页背面至166页，这封信的日期是康熙25年10月7日，即1686年11月22日。

20 雅克萨之围最初于1687年5月6/16日放松，然后于1687年8月30日/9月9日完全解除，中国宫廷、第10章、第202页以下，第212页正面、243页背面、253页正面、283页、284页正面、285页正面、288页；穆勒《月报》1757年9月号、第210—227页。

“康熙26年6月6日（1687年5月16日）我军自雅克萨后退20俄里（21公里340）至扎克坦地方……7月11日（1687年8月18日）上谕撤退至宁古塔”。以上是北京邸抄的俄文译文，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21 中国宫廷、第7章、第136页背面至第167页正面。

22 闵明我神父（1639年生于意大利库尼城，1712年11月8日死于北京；1671年即来中国）继南怀仁神父（死于1688年1月27日或29日）任钦天监监正，确曾于1686或1687年回过欧洲一次。除了南怀仁神父的陈述外，还可加上以下的资料：“听人家说，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他给了闵明我神父整个帝国最大的荣誉，把闵明我神父派到莫斯科公国去。”参阅布韦神父，《中国皇帝的历史写照》，巴黎，1697年、12开本、第166页。比较勒·孔特神

父《新回忆录》第2版，巴黎，1697年，12开本，第2卷，第328、335页以下。（1685年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来的六个耶稣会神父，其中五个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中国，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包括布韦神父在内）。——“（皇帝）下令告诉我们，说皇上已经得到闵明我神父的消息，神父不能取道波斯由陆路至莫斯科公国”。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6年，第4章，第173页，日期是1688年9月27日。

23 在前引信使们带给柯罗文的信件中说：“今年195年（1686—1687年）来进谒中国皇帝的大使中，有几个说德语的同我们住在一个馆里……中国人称他们为西洋人；他们带着所谓贡品来朝（“贡”是中国人给外国君主送来的礼物的名称；仅仅由于这些“贡品”，中国人就把他们视为臣属。关于这点参阅克拉普罗特：《亚洲回忆录》，巴黎，1824—1833年，8开本，3卷，第1卷，第82—83页）；但是中国人不让任何人到四夷馆同我们接近；我们等于被囚禁。”中国宫廷，第10章，第103页背面至104页正面。这些讲德语的大使们是不是南怀仁神父所说的荷兰人呢？比较派克：《满洲与俄国的关系》，载：《中国评论》第16期，第44—46页，又同上作者：《中国与俄国》，载《亚洲评论季刊》1896年7月号，单行本，8开本，11页，第7页。但是在1686年有什么荷兰使团在北京呢？

24 中国皇帝给沙皇的一封信，一式三份，一份中文，一份拉丁文，一份俄文，日期是康熙25年7月30日，即1686年9月7/17日；于1690年1月2/12日到达莫斯科。这是由荷兰商人阿伯拉罕，阿道尔夫的儿子，古特芒从阿尔汗格斯克转过来的；他自己又是从巴达维亚经阿姆斯特丹收到的。中国宫廷，第9章，第821页背面至第828页正面。

另外一封中国皇帝给沙皇的信，也是一式三份，一份满文，一份拉丁文，一份俄文，日期是康熙25年8月5日，即1686年9月22日；到达使节部的日期是1690年3月18/28日。这封信是由耶稣会神父“孔德拉泰伊·泰皮洛夫斯基”交来的；这个神父又是从另一个查理·莫里瑟神父那里收到的，莫里瑟神父从伊斯法罕把信送到阿斯特拉罕来。这封信是由莫里瑟神父从果阿的菲利浦·费力克斯·“柯里丘什”那里收到的，因为闵明我神父1688年12月31日经过果阿时，曾经写信给这个神父。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9章，第832页背面至840页。这个果阿地方的耶稣会神父是谁呢？他的姓名在俄国的文件里拼写得很不精确。这个于1689年或1690年在伊斯法罕的查理·莫里瑟神父又是谁呢？

25 中国宫廷、第10章、第246页正面至252页正面,770页背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360页背面至366页背面,672页背面、673页背面、674、736页背面、764页背面、765页正面、846页正面、896页背面、897页。

26 信件,中国宫廷、第10章、第543—547页;五项条款,547页背面至551页;信件的样本,551页背面至556页正面;同时参阅:第684页背面、685页正面、771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369页背面至第405页正面,第412页背面至417页背面,第853页正面至856页正面,898—899页。

27 中国宫廷、第10章、第69页背面、第70页正面、72页正面、75页背面、76页正面;11月14/24日同上引第75页正面。伯夫列夫是负责把信和礼品送到库伦去的,他在蒙古从1687年4月22日/5月2日逗留到5月20/30日。给伯夫列夫的训令没有日期,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卷册》,尤尼材料袋第10号;柯罗文于1687年6月23日/7月3日收到科洛文给他的信,中国宫廷、第10章、第194页背面至199页正面。

28 中国宫廷、第10章、685页背面,686页正面。

29 中国宫廷、第10章、238页背面至242页正面,280页背面至282页,335页至359页,413页至424页;中国宫廷、第9章、第481页至484页、497页正面,568—569页,586—588页。

30 这封信一式三份,一份蒙文,一份拉丁文,一份俄文,象信使们从北京带回来的信一样,盖了皇帝的朱红色大印。中国宫廷、第10章、378至382页背面;《史料补遗》、第10章、第67号XXX第273页。

31 卡昌诺幅给当时在色楞格斯科的柯罗文的信,中国宫廷、第10章、第413至424页。

32 中国宫廷、第10章、第324页背面至326页正面,424页背面、474背面、475、477背面至491正面;柯罗文的公务日志,第500页至528页,612页正面,613页、614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第532页背面至540页正面,581页背面,588页背面至592页正面,594—595,605—607页正面,609、626、640正面,642背面,862正面,948页;《史料汇编》第5章、第175号、第306—307页,《史料补遗》、第10章、第67号XXX、第274页。

33 中国宫廷、第10章、496、606、693、694页正面;中国宫廷、第13章、457页背面,458页。

34 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5年、第4卷、第88、120页;1736年、第4卷、第104—105、143页;莱布尼兹,《中国近况》第2版、第1系、1699年、

12 开本,第 172—175 页。

中国宫廷,第 10 章,577—578,587,594 页背面,597 正面,598 背面至 601 页,714 正面;中国宫廷,第 9 章,第 572 背面,573,582—585,672,639 背面,643—648,652,667 背面至 672 正面,686 正面,687 背面,949 正面。

35 “喀尔木克人,在这里和在他们的家乡都称为厄鲁特人……”,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5 年,第 4 卷,第 39 页;1736 年,第 4 卷,第 46 页。

“在欧洲,人们把厄鲁特写成 Eluth,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真正名称,照蒙古人的写法,应该是 Oloth;中国人写成额鲁特,我把他们称作 Eleuth,以便最接近这儿的发音。”阿米奥神父:《征服厄鲁特人的纪功碑》,载:《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报告汇编》,巴黎,1776—1814 年,4 开本,16 卷,第 1 卷,第 332 页注解。

36 波兹尼叶夫:《准噶尔的喀尔木克人史论稿》,载:韦塞洛夫斯基:《炮兵上尉伊凡·温阔甫斯基出使至准噶尔理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朝廷》,《地理学会人种分组札记》,第 10 卷,第 2 分册,抽印本,圣彼得堡,1887 年,8 开本,第 239—240 页。

37 波兹尼叶夫,同前引著作,第 240—247 页。

波兹尼叶夫先生根据喀尔木克编年史,根据蒙古编年史《额尔德尼·额尔罕》(见上《绪论》),也根据蒙古的历史故事(Saïn noyad'oun aimagoun chastir),来改正炮兵上尉温阔甫斯基(于 1720—1722 年被派到喀尔木克人那里去)的报告,尤其要驳斥在荷尔德的著作中所提到的张诚神父的资料。比较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5 年第 4 卷第 39—43 页,1736 年,第 4 卷,第 46—50 页;毕楚林:《奥伊拉特人(厄鲁特人)简史》(俄文),圣彼得堡 1834 年,8 开本,各处。

38 波兹尼叶夫:《准噶尔的喀尔木克人史论稿》,第 247—257 页。

39 波兹尼叶夫:《蒙古及蒙古人》,圣彼得堡,1896—1898 年,8 开本,2 卷,第 1 卷,第 498—499 页;同上作者:《蒙古编年史》,第 54—74 页,第 275—366 页。

40 参阅下述放大比例的俄国地图(40 俄里 1 英尺 = $\frac{1}{17,240}$):“俄国亚洲部分南部边界地图。由总参谋部军事地图组编辑, XIV 于库伦;由副队长拉法伊洛夫于 1888 年在博尔舍夫上校的领导下绘制;1903 年由国务参赞华西里叶夫增补和改正。”奥洛该标示在那连河边,那连河从北流入杰嘎兰图湖。

41 《蒙古编年史》,第 74—81 页,第 275—366 页。

42 自 1688 年 1 月 19/29 日起,巴图尔珲台吉(不要误认为是喀尔木克的珲台吉噶尔丹博索克图)包围了色楞格斯克。晚上可以看到围城部队的火光。1688 年 2 月 29 日/3 月 10 日一次夜袭被击退了。中国宫廷、第 10 章、410 页背面以下,459、462 页正面、463 页以下;第 9 章、526 页背面至 529 页正面。1691 年 2 月 2/12 日,在柯罗文回国时发给他的表示对他满意的证明文件上写道:“你,皇上的近臣和行政长官,你被蒙古人包围在色楞格斯克 13 个星期。”中国宫廷、第 9 章、926 页;《保藏在外交部的官方函件和正式条约汇编》、第 4 卷、第 208 号、第 623—625 页。这 13 个星期应该从 1688 年 1 月 1 日左右到 3 月 27 日/4 月 6 日;很可能蒙古人在年初就到来,而他们的首领到得比较晚,或者无宁说,柯罗文只是在 1688 年 1 月 19/29 日以后才知道他的抵达。

43 中国宫廷、第 10 章、616 页正面、620—623 页、625 页背面、628、629 页正面、645 页背面、646 页背面、774 页正面、776 页背面、815 页;中国宫廷、第 9 章、第 572 页正面、574 页背面;8 月 29 日/9 月 8 日中国宫廷、第 9 章、682 背面、683 背面、684 正面、709 背面、771、717—719、728 正面、732 正面、739 背面;8 月 30 日/9 月 9 日中国宫廷、第 9 章、707 页背面、767 正面、768 页。

44 7197/1689 年 1 月 15/25 日《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 3 卷、第 1329 号、第 3—7 页;1689 年 3 月 12/22 日,同上引,第 1336 号、第 15 页;《保藏在外交部的官方信件和正式条约汇编》第 4 章、第 197 号、第 596 页。

45 洛吉诺夫的公务日志,中国宫廷、第 10 章、885 背面至 928 正面;柯罗文于 1689 年 2 月给沙皇的报告,同上引 777 背面至 791 页;另外三个报告;1689 年 6 月 26 日/7 月 6 日、7 月 22 日/8 月 1 日,8 月 3/13 日,同上引 817 背面、823 背面、824、831 背面、832、833 正面、837—846、863;中国宫廷第 9 章 743—748、762—765、771 正面、785 正面、786、802 背面、803 背面、857 背面至 860 正面、867 背面;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5 年、第 4 卷、160—162 页;1736 年、第 4 卷、192—194 页。

迪·荷尔德神父所提及的,中国人答复柯罗文的信,作为对洛吉诺夫所带去的信的答复,载《中国概述》、1735 年、第 4 卷、第 161 页;1736 年、第 4 卷、第 193 页;中国宫廷、第 10 章、第 882—883 页;中国宫廷、第 9 章、第 800—801 页正面。这封信发出日期是康熙 28 年 4 月 9 日,即 1689 年 5 月 27 日,信内写明中国大使赴尼布楚的动身日期是同月 26 日,亦即 1689 年 6 月 13

日。

46 中国宫廷、第10章、828背面至836背面。1689年7月22日/8月1日柯罗文给沙皇的报告，见同上引、837至846页；同上第9章、801背面至804页。洛吉诺夫回到大使身边是1689年8月5/15日，中国宫廷、第10章、第871页。

47 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4卷、182页；1736年、4卷、216页。他们于1689年6月13日离开北京，见同上引、1735年、4卷、161—163页；1736年、4卷、193页，195—196页（参看上面注4）。

48 要确定他的正确到达日期可不容易。8月8/18日又涂改为9/19日；1689年10月5/15日柯罗文给沙皇的报告，载中国宫廷、第10章、934页背面；9/19日载中国宫廷、第9章、841页正面，871背面、904正面；8/18日见柯罗文在莫斯科的证言，同上引913页背面。

“（1689年8月）18日，莫斯科的全权大使到达尼布楚”，见荷尔德的《概述》，1735年、第4卷、188页；1736年、第4卷、第226页。

49 由秘书官米舍尔·普罗科贝夫签署，于8月初（日期未注明）由科洛文送给柯罗文。中国宫廷、第10章、第928至929页正面。当时科洛文大概不停地充当大使的信使，柯罗文起先派他到色楞格斯克（1686年11月16/26日），然后去北京（1689年3月14/24日/4月17/27日），刚回来，又派他到莫斯科去（1686年下半年），俄国宫廷又从莫斯科将他立即（1689年年初）派到外贝加尔地区，六个月以后他才到达那里。1689年9月，奉命把一份和约文本送到莫斯科的还是他。

50 1、索额图；2、佟国纲；3、郎坦（阿尔尼）；4、马齐；5、萨布素；6、马喇；7、温达，这是条约文本上的名单，见中国宫廷、第10章、1159页正面，第1162页背面上有拉丁文译文；第1166页背面说明有7位使节，两个耶稣会教士。

科尔迪埃的《中国……关系史》（巴黎1901—1902年8开本3卷）第1卷第81—82页载有：“1、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2、内大臣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3、都统郎坦，4、都统班达尔善，5、镇守萨哈连乌拉等处将军萨布素，6、护军都统马喇，侍郎温达等其他使臣。”（原文为拉丁文）见《1689—1881年俄中两国条约汇编》、第1—2页。

马依阿神父，《中国通史……》（巴黎、1777—1785年、4开本、13卷）第11卷、第111—112页载：“1、索额图，一等贵族。注：索桑亲王是侍卫内大臣；2、佟国纲，皇帝的舅父；3、都统，鞑靼军队的陆军中将；4、阿尔尼，一个法院的院

长；5、马齐，监察院的院长；6、马喇，近卫军军官。”（“索额图的官职是侍卫内大臣，佟国纲是都统公，马齐是左都御史，马喇是护军统领，萨布素是黑龙江将军，温达是理藩院郎中。”——译者）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 349, I, 第 19 号（未注明出处）载：“1、索额图，宫廷大臣；2、佟国纲，一个旗的首领，伯爵和皇帝的舅父；3、阿拉尼院长；4、马齐，最高监督或检察长；5、马喇，近卫军将领；6、温达，边省部副部长；7、阿玉西，一个旗的副统领。”

俄国从北京邸报上翻译过来是：“1、索额图；2、佟国纲；3、阿尔尼；4、马齐；5、郎坦；6、马喇；7、萨都。”

马齐是否就是那个“皇帝的侍卫”，……“后来由于向年轻的康熙告发了吴三桂的谋叛而成为首相和国舅”的马齐？拉米扎在他的《亚洲新杂录》（巴黎，1829 年，8 开本，2 卷）第 2 卷，第 27 页中谈到过这件事。

张诚（让·法郎索瓦），1654—1707 年，1654 年 1 月 21 日或 6 月 4 日或 11 日生于凡尔登，1707 年 3 月 22 或 27 日死于北京。他是路易十四在 1685 年派到暹罗（泰国）和中国去的六个耶稣会神父之一；于 1688 年 2 月 7 日抵达北京。在尼布楚条约以后，康熙一再对他表示宠信，把他同布韦神父任命为管数学和哲学的监正，还为他而颁布了一道有利于基督徒的御旨（1692 年 3 月 22 日）。1700 年 11 月 3 日，张诚神父被任命为所有法国在华耶稣会教士的负责人。他研究数学、历史、地理和语言；他懂汉语和满语。

徐日升（托马），1645 年 11 月 1 日生于圣马丁诺·德·瓦洛，1708 年 12 月 24 日死于北京，从 1673 年起就在中国；他的兴趣在音乐。

参阅索马沃热：《耶稣会图书馆》，布鲁塞尔和巴黎，1890—1900 年，4 开本、9 卷；皮奥勒神父：《十九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巴黎，1900 年，8 开本、6 卷，第 3 卷《中国》；科尔迪埃：《中西印刷术在中国》，巴黎，1901 年，8 开本、第 36 页；同上作者《辞典》第 2 版，第 2 卷，第 1072 条。

51 迪·荷尔德：《概述》1735 年、卷 4、第 183 页；1736 年、卷 4、第 220 页；莱布尼兹：《中国近况》、第 2 版、第 1 系，1699 年、12 开本、第 172—175 页；马依阿前引著作、第 11 章、第 111—112 页。

关于 1688 年以后的蒙中关系，参阅《蒙古编年史》、第 275—366 页；比较迈耶斯：《中国政府》，上海与伦敦，1878 年，8 开本、第 111 页。

在 1691 年在托洛诺尔（Tolo-nor）召开过一次庄严的会议，三个喀尔喀汗和呼图克图对中国皇帝表示臣服。满洲人按照中国的模式改组蒙古，有行

政机构、法典和满汉职衔等等。参阅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207—209、402页；1736年、第4卷、第320—322页。

1693年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告诉俄国使臣伊兹勃兰德：呼图克图和阿治赉憎汗已经投向中国，而且在张家口附近安顿下了。见伊兹勃兰德的公务日志，中国宫廷、第15章、第55页。

52 中国宫廷、第10章、第954—955页；第9章、第873页正面。

53 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189页。

54 中国宫廷、第10章、第985页正面，991页背面，992页正面，1004页背面，1011页背面，1026页正面，1063页背面，1108页，1120页背面，1121页；第9章第886页背面。

55 中国宫廷、第10章、第999页、1012页正面、1121页。参阅《原始文件》。

56 这些外交谈判的细节，可在下述文件里看到：中国宫廷、第10章、954页至1152页背面；第9章、873至884页。比较迪·荷尔德的《概述》，1735年、第4卷、第189—194页；1736年、第4卷、第227页。俄国翻译的北京邸抄上有一段记载，大意是：“在尼布楚会谈时，陆军由索额图统领，由水路来的军队则归郎坦率领。使团为首的是索额图、佟国纲、阿尔尼、马齐、郎坦、马喇、萨图。康熙28年6月10日即1689年7月26日，郎坦及其军队到达尼布楚，费要多罗于16日（1689年8月1日）到达，于7月4日（8月18日）入城。第一次会谈是在7月8日（1689年8月22日）开始举行的。清人提议以勒拿河为界，俄国人拒绝了，次日仍然拒绝以该河为界。于是郎坦带领八旗兵以及围攻过雅克萨后来退至宁古塔的军队暗地渡河。11日（1689年8月25日）经过一次拖到正午而毫无成果的谈判后，郎坦公然摆开阵势，俄国人害怕而且让步了。于是签订了和约，边界划在额尔古纳河至黑龙江，由格尔必齐河经兴安岭到海边为界。7月26日（1689年9月9日）费要多罗与郎坦商议从雅克萨撤退事宜。”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57 尼布楚条约的俄文本在下述的档案里：中国宫廷、第10章、1158页背面至1162页正面（由比亚波洛波切斯基抄写）；中国宫廷、第9章、886页背面至889页正面（抄本）；拉丁文本译成俄文，载中国宫廷、第10章、1162页背面至1166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889页背面至892页。《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章、第1346号、第31—32页登载一份正文，与手稿内容相同，只除了几处拼法不同；相反，班蒂什《补遗》，B、第335—341页则刊登一份正

文,其中字的拼法改用新的,中国大使姓名则抄得不好。

俄文本与拉丁文本都转载在《1689—1881年俄中条约汇编》,第1—6页;满文本转载在第7—10页;拉丁文本又从《汇编》转载在科尔迪埃的《1860—1900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中,巴黎,1901—1902年,8开本,3卷,第1卷、第6章、第81—84页。

张诚神父曾经将拉丁文本译成法语,载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201—202页。

58 对于满文本,俄国人不得不依靠耶稣会教士,由他们证明其内容与拉丁文本相同,因为柯罗文既没有满文的口译员,也没有笔译员。中国宫廷、第10章、1166页;中国宫廷、第9章、893页正面,912页正面。

59 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至少有一份手抄的边界地图,照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边界绘制,这就是那份上有如下名称的《伊尔库次克省地图》第126号,由测地员彼得·斯考贝尔琴和巴西尔·恰提洛夫绘制。这张比例尺很大的地图尺寸是 $\text{cm}357 \times \text{cm}433$,而且用字母标明边界上树有界碑的地方。参阅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载:《科学使团的新档案》新丛书、第1分册,1910年,第77—78页。

(这里所说的边界规定只是大意,尼布楚条约满文本汉译关于疆界的条款是这样的:“一、将自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齐河为界,沿此河之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属中国;其岭阴河道悉属俄罗斯。惟乌弟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道暂行存放,俟各还国察明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义。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为界;南岸属中国,北岸属俄。其南墨里勒克河口现存俄罗斯庐舍,著徙于北岸。”(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页);参看刘选民的文章《截至尼布楚条约签订为止之中俄关系》(载《中国社会政治学报》1940年第一季刊)就更清楚了。刘选民比较了尼布楚条约的俄文本、拉丁文本和满文本,在文章最后说:“规定两国边界沿着额尔古纳河,然后沿着黑龙江直至它的一个支流格尔必齐河,再向前的边界则为沿着勒拿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分水岭,直至乌弟河的发源地。”尼布楚条约的中文本所说的“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外兴安岭正是勒拿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分水岭。所以本书所说的边界是沿着勒拿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分水岭即是条约中的条文:“循此河有石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该河属我界……”。——译者)

60 费扬古的传记由赫斯特从中文译过来,《本朝著名政治家简介》,载:《中国评论》,第9卷,第3期,第172页。噶尔丹于1690年被打败的地方,叫做乌兰布通;中国人的决定性胜利被确定为1696年,噶尔丹之死为1697年。

《蒙古编年史》,第74—81、84页,《说明》,第175—260页,肯定和补充了这些资料:乌兰布通之战发生于康熙29年8月(在1690年7月6日和8月5日之间);准噶尔人躲在一万匹骆驼后面,可是满洲人由于炮队而取胜。1696年的战役发生于土拉河的祖莫多(参照1714年中国派往伏尔河下游的土尔扈特人那里的使臣图理琛的《异域录》里的地图,转载在加恩前引著作,第136页)。

荷尔德在《概述》,1736年,第4章,第59—63、386、416—418、422—423、438—441、466—469、476—481、515—518页里只说:1690年战役发生的地方是“离北京80lieues(法国古里)的地方”;发生的时间是在7月末,国舅佟国纲阵亡。1696年,噶尔丹为了逃避御驾亲征的东路军,上溯克鲁伦河,7月12日在土拉河的太雷尔吉地方,即北纬47°36',遇到了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皇帝的部队那时在沼穆(即沼莫多,参阅当维尔的《全图……》,载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比较德·马依阿神父的《中国通史……》,巴黎,1777—1785年,4开本,13卷,第11卷、第125—369页(1690年之战记载在乌兰布通,1696之战在沼莫多)。

61 中国宫廷,第9章,第732—733、742页背面。

62 中国宫廷,第10章,1220至1233页。柯罗文给沙皇的报告是1690年5月6/16日,载同上书1237页背面至1240页背面;中国宫廷,第9章,952页背面至960页正面。

噶尔丹同时派遣使者带着同样的建议到尼布楚去。《史料补遗》第10章,第67号,XXVIII第268—269页。

63 中国宫廷,第10章,1232—1236页;《史料补遗》,第10章第80号、XI,第363—373页(数字和日期要仔细核对);同上书,第10章,第80号、X,第366—368页。

64 柯罗文,由于路上艰难,于1689年11月16/26日始回到乌丁斯克;他在伊尔库次克从1690年2月18/28日逗留到同年5月18/28日,然后沿着他去时的水路,返抵托波尔斯克(1690年9月6/16日至11月25日/12月5日),最后到达莫斯科(1691年1月10/20日),自他出发以来逐日计算,已将近5年。(乌丁斯克,1689年11月14/24日,中国宫廷,第10章,第1214

页背面;11月16/26日,柯罗文1690年1月26日/2月5日给沙皇的报告,同上,第1216页、正面;至于其余停留的地方,中国宫廷、第10章、第1220页正面,1242页背面,1243、1244页正面,1253页背面,1254页背面,1260页背面,1261页正面;中国宫廷、第9章、844、917页背面)。

柯罗文得到政府嘉奖,被封为贵族,还被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1691年2月2/12日对柯罗文和维拉索福表示满意的谕旨;谕旨中不仅提到柯罗文在外交谈判方面所作的努力,而且提到他热中于收回西伯利亚的捐税,如两年的缎子和丝绸的什一税,共值2,509卢布或113,030.45旧法郎;三年的毛皮贡品,按西伯利亚市价值21,568卢布或971,638.40旧法郎。《保藏在外交部之官方信件与正式条约汇编》,第4卷、第208号、第623—625页;中国宫廷、第9章、927页。关于卢布在十七与十八世纪的相对价值,参阅克柳切夫斯基,《十六至十八世纪之俄国卢布及其与现行卢布之关系》,载:《莫斯科大学俄国历史与古代史学会阅读材料》,莫斯科1884年第1分册《调查研究》第1—72页。

如同他的被保护人和保护人彼得大帝开始他的生涯那样,柯罗文在亚速港之围(1696年)中当上了兵站总监,然后同勒福尔一起,随同沙皇到西方去(1697年3月9/19日)。他到过荷兰和英国(1698年3月),并于1698年4月16/26日同卡尔马森勋爵签订了一个商务条约,我们将在下文第2章谈到这件事。然后他经由维也纳回国。在勒福尔死后(1699年4月21日/5月1日),他被提升为海军上将,并于1700年2月23日/3月5日(据比耶洛库罗夫的《论使节部》,第114—115页,是1700年2月18/29日)出任使节部部长,1700年8月19/30日晋升为元帅。1701年1月23日他同丹麦国王签订了一个条约,同年2月26日/3月9日同波兰国王签订了另一个条约,1703年6月28日/7月9日同立陶宛签订了一项协定,1704年8月19/30日又与波兰订立了第2个条约。他死于1706年8月2/13日。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名人辞典》,莫斯科与圣彼得堡,1836与1847年,8开本,8卷;穆勒《文集》第1章、496页注解。

和约订立以后,那些居间斡旋的耶稣会教士的命运如何呢?这是饶有趣味的事情。回到中国以后,张诚神父和徐日升神父似乎颇得皇帝的恩宠,这恩宠是公开宣布的,而且被康熙于他在位的第31年的2月3日或1692年3月20日颁发的宗教宽容敕令所证实(1692年3月22日得到证实)。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212、214—216;1736年、第4卷、第255、

258—260 页；勒·孔特神父《新回忆录……》第 2 版，巴黎，1697 年，12 开本、第 2 卷、第 8 信、第 328—329、335—340、346—350、355 页。

相反，俄国宫廷对耶稣会神父只给以严厉的对峙和迫害，我们将在下面第 8 章内看到。

第二章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 俄国的远东关税政策

史料来源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4卷(参看以下注解中的号数)。

《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汇编》第5卷第53、150、217、237、242、258、260号2项、261、284、287号;第10卷第75号8项。

《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补遗》第12卷第89号。

《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圣彼得堡1882—1885年版,8开本2卷;第1卷第18、30、64、67、68、70号;第2卷第95号。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第4卷第133号第302—303页,第311页;第327、330、339、340、353、358、360、369、370、377、409、410号。

参看穆勒:《实用及娱乐著作月报》1756年2—4月号;菲舍尔:《西伯利亚史》,引用处见下文;图曼斯基,见下文注解。

俄国在缔订尼布楚条约时,所以肯对中国的坚决要求作出让步,原因之一就是期望建立正规的商务关系。1692年,在条约订立三年以后,俄国派遣了一位官方代表到北京去调查中国市场的经济情况(参阅下一章)。俄国认为对华贸易非常重要,因为俄国政府希望借着对华贸易给财政部、宫廷和私人消费者带来所需的货

物。通商贸易的权利得到外交上的承认以后，国家的任务就在于激励商业活动，组织商队和指导这项事业的总的进程。

自十七世纪末叶起，政府开始公布有关对华贸易的行政法规，不过那时政府对于它准备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不是一下子就有了明确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由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所公布的规章，看出一种政策逐渐定型的过程，即由初期纲领式的政策，逐步加以严格的规定，以致最后变成确定的和残酷无情的。1693年8月30日/9月9日发给各关税主管官员的一般训令，概括了若干早期法规，确定了俄中贸易的主要条件。在以后几年中，一些条例把以前的训令明确起来并加以补充。1698年11月12/22日曾发布一道详细的谕旨，规定了有关管理这项贸易关系的全部法规，这一法规除了几处很小的修改外，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还维持未变。因此，自1698年开始，每隔一段固定时期，就有带着政府文书的商队动身到中国去。中央政府很快就觉察出有某些越轨行为出现，而为了消灭这种行为，就要把法规规定得加倍严厉，或者采取另一种管理办法。1706年1月28日/2月9日的谕旨以及约略与其同时发布的对于各种违禁品的特种规章，标志着一种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这种政策由俄国开始与中国接触时草创，最后导致政府在二十五年中想要实施的专制主义制度。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冒险进入蒙古，甚或进入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商人，大概是瞒着中央政府，至少也是瞒着西伯利亚当局这样做的。可是政府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制订了监督的原则，这种监督原则就从未变更过。政府规定凡去中国均应呈报官府，理由是政府必须了解商人们的情况才能授与他们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证件，同时也必须知道他们所携带商品的详细清单，以便恰如其份地征收关税。因此，1693年8月30日/9月9日发给各主管税关的官吏的训令强调两点：即护照和什一税¹。如果没有皇帝诏令和西伯利

亚部的“信件”，任何人不得前往中国。什一税应在下列两地征收：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进入西伯利亚的维尔浩土尔城和由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尼布楚城。毛皮和毛棉织物等用实物按整十抽一交纳，其他货品则交纳现金，护照上应附有货品清单和已付关税的收据，并盖有帝国印章。在旅程中的每一驿站都要查验护照，若查出有护照上清单以外的货物则立即充公，而且第二次再犯就严予鞭打，同时还要拷问他的亲属和奴仆，要他们供出有无其他欺诈的行为。无论是那一等级的政府官员，行政长官，秘书官（diacre），秘书，税务督办及他们的近亲，都没有权利从事对华贸易；只有兵士可以在50卢布（2252法郎50生丁）限度内从事这种贸易。

1698年11月12/22日发布的谕旨曾对这些严格的规定稍加放松，确定或更改了某些附加条文²。自1694年起商队似乎每年去中国一次³，以后则是每两年才派遣一次。贵族杜马在1695年9月21日/10月1日作出决定，规定维尔浩土尔为由俄国欧洲部分进入西伯利亚的唯一合法路线⁴，同时，由于尼布楚是商队进入中国的起点，因此，规定这两地税务主管人员应检验出口和入口货物，并以他们的特定印章在护照和证件上盖印。此后货物便只在维尔浩土尔或尼布楚城两地检验。这两地中的一处税务机关把货物清单送一份给另一地的税务机关，后者只要核对一下清单就行了。什一税还是照旧征收，但是只征收一次；这样：所有在西伯利亚买入的货物，只交纳二十分之一的税款，如果货物准备出口只需再次交纳二十分之一的税款。由中国回国的商人，因为已在尼布楚城纳过什一税，其货物在西伯利亚销售时就不用再纳二十分之一的税了，而是由买主付这笔税。以后，也可允许私商加入葛斯奇，成为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的成员⁵，他们与葛斯奇及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受命于国家，以负责人或“专员”以及宣誓评价员（*priseurs-jurés*）的名义指挥和管理商队。不过，非俄籍人，不论是

亚洲人或欧洲人，都只有在得到西伯利亚部特许之后，才能加入上述组织。俄国人每人交纳一个卢布(45法郎)，并且在西伯利亚停留一年以后，即可不需护照。在他们停留期间，货物应存放在国营仓库内，若存于木板仓库，每人每星期交纳五个戈比(约2法郎25生丁)的费用，若存于石筑仓库，则每人每星期交纳十个戈比⁶。帝国邮政局在夏季每月为他们服务三次，由莫斯科到尼布楚每公分重的邮件收费4.22法郎。对于欺诈行为的惩罚是减轻了，但是伪报帐目或涂改旧的关税收据，则要被剥夺从事对华贸易的权利。

这样，俄国政府起初打算只让持有护照的商人进入中国，接着又设法使自己从事这宗有利的贸易，但允许国家商队中有私商存在。不久以后，政府就感到私商竞争很激烈，为了排除他们，便用违者处死的办法来取消他们与中国人贸易的一切权利(1706年1月28日/2月8日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谕旨)⁷。沙皇的专有垄断权是半个世纪来俄国整个关税政策的终极之点。先是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接着又是政府直接插手，使得中央政权处境很困难。为了确保前述垄断权，就绝对必须切实管制贸易的商品，对商人进行严格和不断的监督，国家能否成功地担任这一角色呢？应对哪些商品和哪些竞争者执行严格的规章呢？

有关违禁商品处理的历史，也和一般地组织商队的历史一样，表明了俄国政府的做法的演变过程。政府一旦知道有哪一种商品利润高，便将起初让给私商的特权收归己有，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迫使政府把业务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论是总的方面还是细节方面，中央政权的禁止制度都归结为由政府官吏行使的垄断政策。

禁止贩运的商品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收归己有的，如军火和中国的黄金；另一类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如贵重毛皮、烟草和大黄。为了公共安全，禁止向喀尔木克人出口弹药和武器。因为以这类商品供给象厄鲁特人那样好战的游

牧民族，就说不定是加强了潜在的敌人。因此，在这一点上，沙皇的所有谕旨都是一致的：不论对于喀尔木克人和代表他们的不花刺人给与多少优惠待遇，但决不允许他们带走武器和弹药。1693年8月30日/9月9日向各总税务司发布的训令，规定对于违犯第15条者加以最严厉的惩罚。该条规定，俄国人不得售与不花刺人枪炮、弹药和铅，并不得付给他们金、银或金质货币。1698年11月12/22日公布的新条文不只一处取代了1693年8月30日/9月9日的旧条文，但关于武器军火的出口方面未作改动(第12条)。甚至在经常有可怕的路劫案发生的蒙古境内时，每人也仅仅允许带一支枪防身，对于哪怕只出售一支火绳枪的人，也要科以30卢布(1351法郎50生丁)的罚金⁸。

严禁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是因为政府认为硬币外流是经济衰退的一个原因。但这种措施仍不足以满足国库所需的硬币。因此政府还要设法在遥远的中国获得贵重金属。十七世纪末政府在给尼果赖和柯罗文的训令中，要他们邀请中国外交代表或商人携带金银锭到莫斯科来，并且说俄罗斯帝国财政部保证会收买这些金银。鉴于这种邀请不起作用，于是政府命令官方商队前往北京就地购买黄金。此外，政府还决定由从中国归国的私商处取得黄金，或者通过购买，或者更愿采取的办法是叫他们用黄金来交关税。从1693年起，安德烈·维尼阿斯的关税章程确定了政府收买黄金的价格⁹。从1697年12月5/15日起，由中国归国的商人不再用实物，而是用金银交纳什一税了¹⁰。1698年11月12/22日的法令确定了这一办法并规定了金银的官方价格。贱价收购或依法扣留，都是有利于政府而有损于私商的。

因此国家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掌握了黄金的垄断权：它不阻止私商买卖黄金，但是它以后可以从私商手中将黄金夺回。在对华贸易中，关于贵重毛皮贸易，政府更进一步严禁一切私人与之竞

争。1692年7月11/21日发给维尔浩土尔总税务司的训令中已经要求代财政部收购貂皮、黑色或褐色狐皮、白色或蓝色的北极狐皮及海狸皮¹¹；1693年8月30日/9月9日给各关税主管官员的一般训令中禁止向中国出口价值超过40卢布的貂皮、黑狐皮、黑褐色及褐色狐皮。最后1697年建立了沙皇的特别专利权。一系列的谕旨加以规定：1697年3月11/21日给尼布楚行政长官的公函告诉他，从今以后貂皮和黑狐皮贸易权归财政部所有¹²。1697年3月22日/4月1日西伯利亚部给财政部的备忘录中详细列举了受禁商品：全貂，貂的腹部、尾巴、皮和黑狐皮¹³。1697年9月11日把帝国垄断权通知维尔浩土尔的总税务司和托波斯克的新任行政长官¹⁴。1698年11月12/22日的新条文禁止非财政部提供的貂皮及黑狐皮出口。最后1699年7月11/21日¹⁵和1700年6月18/29日¹⁶的谕旨，1701年1月5/16日给尼布楚行政长官列有条文的训令¹⁷，都证实了前述规定。各方面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自1697年以后，珍贵的貂皮和狐皮的贸易，被财政部垄断了。

如果说，自十七世纪末叶起，政府把贵重皮货贸易抓在自己手上，那是因为这宗贸易利润巨大而可靠。大黄、烟草等作物的贸易似乎不那么有利，因为开始时是让与私商的。1691年8月的一封信通知西伯利亚的官吏：一个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的成员，名叫伊萨也夫的商人，取得在西伯利亚经营大黄贸易的五年专利权；他保证不再从事其他贸易，每年进口大黄也不超过50普特（819公斤），这些大黄可以免交关税，一切竞争者将处以死刑¹⁸。当伊萨也夫的专利权于1695年5月17/27日到期的时候，一道谕旨发给维尔浩土尔的行政长官，将另一个五年的专利权，给予汉堡商人马蒂厄·保别，洛朗的儿子¹⁹。在保别的专利期满的时候，政府似乎准备自己掌握这项贸易²⁰。1704年2月7/18日政府派遣“司宾”西宁雅文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购买大黄，每年300普特（4914公

斤)²¹。西宁雅文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有没有损害财政部的利益？政府是否认为在这种条件下这样做获利甚微？总之，1706年4月16/21日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公函通知他说：从同年2月12/23日起暂停执行上述命令，同时严禁任何人购销这项商品——不论是俄国人还是外国人²²。

西伯利亚或者中亚细亚的大黄与来自中国的最著名的大黄相竞争²³，可是这两种大黄都只能供西药应用。至于俄罗斯人、西伯利亚人、奥斯弟雅克人和蒙古人同样起劲地寻找的另一种消费品：烟草，情况就不相同了²⁴。十八世纪初期在西伯利亚购卖烟草的历史是尤其有趣的，因为这段历史显示了西方产品和远东产品之间的竞争，而且以一个生动的事例揭露了官方贸易和秘密贸易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条件。

1697年，即国家把貂皮贸易的垄断权收为已有的那一年，在西伯利亚建立了烟草贸易承包制度。马丁·波格丹诺夫拥有由1696年12月1日至1697年12月1日经营这项贸易的专利权，对于侵犯他的专利权的人处以死刑。波格丹诺夫不用付关税金，但须负责设立品尝和出售烟草的商店²⁵。1697年6月23日/7月3日他的专利权得到了认可，条件是他不得离开城市，不得把烟草带到乡间，售与那些游牧民族，他还要建造烟馆²⁶。也许是他不履行建立商店的义务，也许政治的必要性已经有了变化，1698年4月16/26日，勒福尔和柯罗文在伦敦与被封为卡尔马森侯爵的奥斯本勋爵签订了一个商约²⁷，规定奥斯本有全权把“尼古丁草”输入西伯利亚：到1699年9月1/11日为止，他大概曾输入烟草三千吨，次年五千吨，从第三年起六千吨，甚至更多。据说，在第一次输入烟草时，他付给俄国政府12,000英镑，并且每年供应俄国宫廷一千磅上好烟叶。他由此获得经营承包烟草贸易的专利权，凡是侵犯他的专利权的人财产都要充公，一半归他所有，一半归沙皇政府²⁸。1698

年7月11/21日和20/30日的谕旨宣布自1698年9月1/11日起，把专利权给予这个英国人²⁹。1699年2月13/23日叶尼塞斯克的行政长官报告沙皇，他已逮捕波格丹诺夫的代理人莱依林，这个人承认自己犯了没有建立烟草商店的罪³⁰。这时候，这件事看来不过是以一个专利商接替另一个专利商而已，并不具有尖锐竞争的性质，但不久以后它就将具有这种性质。卡马尔森，或者更确切点说，他的代理人英国驻莫斯科的领事查理·古德菲洛³¹及其在西伯利亚的雇员们，不久就发现尼古丁草的零售事业受到普遍流行的“中国丸”（即中国烟草作成的丸³²）的严重威胁。因此卡马尔森申请出售中国烟草的独占权。1700年9月30日/10月11日给图林斯克和叶尼塞斯克的行政长官的公函，命令他们就地调查这件事³³。这些调查显示出西伯利亚臣民过于嗜好烟草，为了防止财政部的收入有化为阵阵烟云的危险，他们决定坚决反对英国方面的申请³⁴。政府却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它延长了卡尔马森贩运西方烟草的专利权³⁵，同时严禁贩运中国烟草进入西伯利亚，违者处以罚款及充公（1701年4月18/29日，1702年3月24日/4月4日，又8月31日/9月11日³⁶），对于官吏违反者甚至处以死刑（1704年5月4/15日³⁷）。过了不久，俄国政府自己收回了烟草贸易承包权。1705年6月12/23日中止了古德菲罗享有的特权³⁸。1706年12月18/29日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一封公函命令他追查一切秘密的烟草贸易³⁹。中国使臣图理琛于1712—1714年出使伏尔加河下游的土扈特人时，就注意到俄罗斯帝国境内是禁止私人贩卖烟草的⁴⁰。1715年至1719年在俄国朝廷工作的德国人韦伯也列举了一些细节，证实了这种说法⁴¹。英国政府及其臣民由于向俄国进口烟草及贩卖烟草而中断了与俄国的一切商务关系⁴²。

中央政权越是规定专利权、特权和各种性质的限制条款，暗中进行贸易的事情便越多。太多的人和任职太偏僻的人对于这种有

损财政部而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事情感到兴趣，而难以拒绝这种诱惑。违法的人有好几种，不过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行政长官及其下属，商人，不花刺人。

西伯利亚的行政长官，觉得自己差不多可以免受那种碍手碍脚的监视，认为自己差不多就是自己统治地区的专制君主，只肯在规章合乎自己利益时才遵守规章。他们贩卖毛皮，特别是上等毛皮，以获厚利；或者高兴时将上等毛皮留给自己、妻子或近亲穿戴。他们把貂皮、黑狐皮，总之，那些最希罕的毛皮留给自己，而把其余的留给国家，这不过是对帝国财政部的最小损害。他们还有更坏的做法。住在北京等地的中国北方人，需要毛皮来抵御近乎西伯利亚的那种气候，满洲山区和蒙古平原出产毛皮兽不如西伯利亚森林区多，毛皮质量也不如那里的好，因此，中国人不得不成为俄国的主顾⁴³。俄国朝廷企图独占这项有利的贸易，并想利用政府商队来进行这项毛皮贸易。可是俄国朝廷忽视了行政长官们的贪婪成性。他们擅自派遣商人和商队到北京去。中国人对于一切持有证件的信使，都认为是官方派来的，都同样欢迎，因而俄国财政部就失去了行政长官所获得的利润。这种持续不断的违法贸易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不仅是由莫斯科来的商队不能将他们的商品在一个货物充斥的市场上脱手，而且生产过剩更使价格跌得很惨。中国人虽然不怕受到外国的侵略，但对外国人一向是猜疑的，他们即使不是要求完全禁止这项有益的贸易，也要求加以最大的限制⁴⁴。俄国政府为了取缔这些将会毁灭整个毛皮贸易的弊端，一直继续不断地严词谴责。1697年3月11/21日的谕旨确定了对貂皮和黑狐皮的垄断权⁴⁵，理由就是西伯利亚的行政长官在以往几年的皮货贸易中发财致富而损害国家利益。1697年3月22日/4月1日由沙皇签署发给财政部的谕旨重复了上述内容，并谴责说向中国出口的数量太多了⁴⁶。同年10月28日/11月7日发给叶尼塞斯

克的行政长官一份带有威胁性的公函，确认西伯利亚的贵族及其妻子、儿女穿着丝绸和镶金的衣服，穿着貂皮和黑狐皮，这一切都严重损害了皇家的财政⁴⁷。1698年11月12/22日的条文特别重申绝对禁止官吏及其下属人员、亲戚朋友、甚至仆人进行皮货贸易；1699年1月1/11日杜马的秘书官及其助手们作出一个决定，命令在维尔浩土尔城逮捕一切与行政长官有共犯嫌疑的人，并立即没收其所有皮货⁴⁸。1695年12月24日/1696年1月3日贵族们决议：对犯有失职或贪污受贿之关卡主管处以革职处分，对违法走私者处以死刑⁴⁹。1695年12月26日/1696年1月3日由沙皇签署的一项法令列举了行政长官们平常的为非作歹⁵⁰：敲诈勒索如此厉害，以致属民逃往中国或沙漠地带；秘密派人到中国；选择最好的皮货留给自己，把质量最差的交给国库。仅仅规章条文的众多，就足以证明违法行为为害之广，以及惩治办法的无济于事。

然而这些恶行不是总不受到惩罚的。1649年2月2/22日给尼布楚总税务司库迪阿科夫的一份备忘录，指控他对中国货物估价过高，并威胁要革他的职和处以更严厉的惩罚⁵¹。1701年1月5/16日给尼布楚新行政长官贝必科夫的一份条文式训令，提醒他关于他的前任尼科勒夫的错误，以及库迪阿科夫的贪污渎职⁵²。1696年1月23日/2月2日的一道谕旨，命令对1691—1692年以来噶喇林家族所有成员的行为进行调查，对伊凡·彼得洛维奇，对伊尔库次克的行政长官马蒂厄·彼得洛维奇，对雅库次克的行政长官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等等，尤其要调查派商队到中国和中国货物的贩卖情况⁵³。这个家族的最显赫的代表人物马蒂厄·彼得洛维奇·噶喇林，于1711年成为西伯利亚总督，几年以后由于他的营私舞弊和骇人听闻的获利而先则被革职(1719年)，继则丢了脑袋(1721年)⁵⁴。

行政长官并不亲自到中国去，只派自己的手下人和朋友们去。无论是替行政长官效劳的商人、官商、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乐于盗

窃国库。他们有很多花招来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没有得到中央政权的准许就溜进蒙古或北京，或者携带护照上并未登记的货物。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只要有行政长官的印信，甚至假的印信就够了。欺骗海关易如反掌。人们可以避开维尔浩土尔城的法定关卡，上溯至鄂毕河口，那里过去曾设置过一个关卡，后来取消了，由维尔浩土尔城代替；又或者从官方准许的通道以外的其他地方越过乌拉尔山，而由外贝加尔区和蒙古至尼布楚和色楞格斯克有无数通道，由于区域辽阔，不为人所知和看守不严而更易通过。即使商人同意让出入口关卡检查，他也有无数方法躲避政府的捐税。官方的详细规定足以充分说明走私者的狡猾：“严格搜查雪橇、车辆、匣子、包裹、箱子、篮子、衣服、枕头、床、桶、粮食、卧具、雪橇的车箱、车轭和颈圈、士兵的妻子等；同样搜查行政长官、秘书长、海关税务司、他们的子女、男性和女性的亲戚和手下人、所有商人、跑单帮的、兵士等等，目的是绝对防止他们把皮货藏在身上、裤子和衬里中。”（1692年7月11/21日给维尔浩土尔海关税务司的训令）⁵⁵。1698年11月12/22日条文中第11项提醒维尔浩土尔海关，不要被旧的收据所欺骗，其上的数字和日期可能经过涂改。由于这些防范措施不能解决问题，中央政府自己也予承认（见1698年4月18/28日给维尔浩土尔行政长官的公函⁵⁶），又由于在尼布楚设置一个地牢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⁵⁷，因此政府有时下令调查过去走私的情况，以便至少能证实犯罪行为的存在。1690—1691年间商人们没有具备到中国去所必需的谕旨和公函就到中国去了⁵⁸，因此1697—1698年政府下令对1692—1693年间到中国去过的批发商及其雇员进行调查，调查他们运到中国去的商品，并答应不予处罚⁵⁹。1711年4月13/24日枢密院成立不久，就提出要一份详细名单，列举从最初到1705年所有到过中国的商人和运到中国去的商品⁶⁰。等到1726年，俄国大使萨瓦·务拉的恩拉维赤

向北京询问俄国商队到过中国的数字时，他非常吃惊地知悉：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数字超过五十，而他自己和俄国政府只知道极少数目的官方商队⁶¹。

国家贸易的竞争者——官吏和商人——虽然人数众多而且舞弊的花样百出，造成很大的危害，然而最可怕的竞争似乎还是来自其它方面。无论是宫廷的售货员、总督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商人，都不得经过长途而艰苦的跋涉，才能够同远东人接触，而这些远东人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大不相同。恰恰相反，就在亚洲，有许多从各方面看来更灵活的亚洲人，他们同别的亚洲人比同俄罗斯人更近似，他们表现出非常善于做买卖。不花刺人习惯于经常到好战的游牧民族中间去，也常常到和平的定居民族中间去，受到经常旅行的锻炼，不顾各种危险、困阻和厄运而以商队来进行贸易；他们在几个国家中确立了地位，彼此经常接触，因而形成了一种互助团体或一种无形的共济会⁶²。他们是喀尔木克人公认的代理人，由于他们的主子喀尔木克人很有势力，因而他们也有了新的重要地位，使毗邻的中、俄两个帝国既怕他们又不得不拉拢他们。不花刺人既是传送外交口信和公文的使者，又是应客气对待的有用的商人，通过他们自己或把他们当作引见人就可以与喀尔木克人接近。不花刺人的这两种身分有时在行动上很难加以区分，也可能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某种打算，而有意使两者混淆不清。虽然中国与喀尔木克人之间有纠纷，中国还是鼓励不花刺人到北京经商⁶³；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些纠纷，中国希望用和平方法争取他们；或者必须把他们打败并且摧毁他们的时候，却存在着一个物质建设与经济繁荣的因素。不过不花刺人是突厥斯坦的居民，降服于喀尔木克人，而喀尔木克人的中心似乎是伊犁盆地，因此不花刺人和西伯利亚及俄国人接触更多一些。由于支配和欺骗新来的西方人比欺骗中国人容易得多——中国人是公认的经商能手，同时由于邻近的西

伯利亚有为数众多的民族，有俄国的殖民地，有各种资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所以不花刺人无意轻视这个市场。俄国则有意争取喀尔木克人，因为在俄中两国抗衡中，他们可以起辅助的作用，因此俄国不断鼓励他们的代表不花刺人。俄国政府的规章制度中有不少是笼络不花刺人的。1693年8月30日/9月9日给各关卡主管的训令承认与不花刺人贸易的重要性，并将他们的出入口贸易放在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上⁶⁴。1698年11月12/22日新的条文只征收不花刺人以二十分之一的税款，而俄国人则要付什一税，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公然鼓励他们的贸易⁶⁵。总而言之，俄国政府对他们总是照顾和优待。不花刺人却不断地对此加以利用：他们通过定居在西伯利亚西部各城市的同族兄弟，通过各种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加无视皇家的禁令。违禁商品、皇家独占的产品，由于其价格高昂，就成了诱饵和奖金。他们毫不费力地可以弄到手，而且可以加倍获利。1706年9月6/17日给维尔浩土尔行政长官的一封公函里面说：沙皇得知不花刺人的一个商队，满载违禁品，于1704年前往中国，同官方商队的商人竞争，因此沙皇禁止与这些可怕的竞争者发生可疑的联系，违者处以死刑⁶⁶。这些措施当然是徒劳的。宫廷与行政长官的利益并不一致，不花刺人在喀尔木克人方面有坚强的外交地位，在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中国有重要的经济地位，怎么能够设想宫廷和行政长官能够制止这些商人们的狡猾的交易呢？

由十七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前半叶为止，俄国在对华关系中所实行的关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政府厉行皇家垄断制度。政府期望从而可以把最初允许存在的私商清除出去。但是，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那些西伯利亚的官吏和政府特许到北京的商人，发现有计划地进行欺骗太有利可图而不肯放弃这种可靠的利润。因此，政府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虽然在每一页法规里都有判处死刑

的规定，虽然进行了惩戒性的刑罚，最后仍然不得不自认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彼得大帝死后，俄国政府承认官方贸易是失败了。那么，必须采取哪些措施，进行了哪些改革，这就是这本经济史要在下面谈到的(参阅第十章)。

注 释

1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章、第1474号、第160—167页。

2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章、第1654号、第491—517页。

3 这是1699年4月30日/5月10日给尼布楚长官一封公函内所重中的，它说沙皇于(7)203年即1694—1695年亲自签署的谕旨内规定每年派官商到中国去，以增加国库收入。见尼布楚城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87号、第519—520页。可是这道203年的谕旨在《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中不见登载。

4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章、第1518号、第206—207页。

据菲舍尔说，十六世纪从欧洲到西伯利亚，或者取道伯朝拉河和鄂毕河至别列佐夫，或者经由卡马河和维尔浩土尔城。十七世纪初叶，维尔浩土尔是唯一准许的道路。1656年人们发现从丘索瓦雅河走更好，可是这条路于1659年被堵塞，以避免货物绕过维尔浩土尔城。菲舍尔：《西伯利亚史》，第1卷、第1分册、第4章、第11节、第299页；第2分册、第1章、第24节、第336页；第3分册、第1章、第15节、第438页；第2卷、第4分册、第1章、第5节、第541—542页。

可是在1698年11月12/22日由沙皇签署的谕旨上第9项规定：从中国归来的商人如果想取道鄂毕河和维切格达河返回欧洲的话，只要在尼布楚声明一下就可以了。《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章、第1654号、第506—507页。

5 葛斯奇，即为国家效劳的大商人。他们的助手形成一特别的阶级，称为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逐字译是葛斯奇百人团)。即在今日，俄国城市的市集或商队住所，特别是在圣彼得堡城里的，仍称为葛斯奇内依·德窝尔=葛斯奇之家或院子。参阅科托奇欣：《阿历克西斯·米哈依洛维奇统治下之俄国》(俄文本)，第10章。

6 命令建筑石头市场(葛斯奇内依·德窝尔)的谕旨，于1690年4月30

日/5月10日发给尼布楚(尼布楚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87号、第519—520页);发给维尔浩土尔、托波尔斯克、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和尼布楚的,日期是1700年6月18/28日(《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00号、第39—60页);发给伊尔库次克的是1700年6月28日/7月8日(《伊尔库次克“州”行政档案》,载《史料补遗》,第10卷、第75号、VIII、第320—321页)。

7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2089号、第336页;《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卷、第54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68号、第278—279页,或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4章、第133页、第409号,或者没有说明来源,见图曼斯基:《各种备忘录及作品汇编……》,圣彼得堡、1787年、8开本、5卷,第1卷、第2部、第296—298页。

8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54号、第5节及第12节,第501—502页,第508—509页。

9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在俄国的中国金价,参阅加恩:《1727—1728年在北京俄国商队的帐册》,巴黎、1911年、8开本。

维尼阿斯的决定曾在1723年12月20/31日枢密院的一道命令中提起过,见《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4397号、第189页;也许在1723(1724?)年1月11/22日商业部给西伯利亚总督的命令中也提到过,见《图兰斯克札记》,第3章、第785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95号、第416—417页。

荷兰人安德烈·维尼阿斯在1626—1627年间来俄为沙皇服务。他的儿子安德烈是批发商人,后来在使节部任荷兰文译员(1664—1677),充任奔走于英、法、西班牙等国间的“信使”(1672—1674),担任药物部的秘书官(1677—1682),后来又到处使节部任职(1684—1686),又回到药物部(1686—1690)。从1697年至1703年由他负责西伯利亚部。在1702年他被任命为杜马的秘书官,同年他到西伯利亚作过一次旅行,以视察行政长官的工作,以及研究对华贸易的条件,研究对华贸易才是他所关心的目标。参阅穆勒《月报》,1764年、6月号、第526—528页,《文集》第1章、第302页及注解;比耶洛库罗夫:《使节部论》,第127—128页;《Der allerneueste Staat von Casan……》(最新的喀山州),纽伦堡、1725年、8开本、第38—39页。

10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06号、第410—411页。这道命令适用于带回超过一千卢布(45,050法郎)商品的商人。

11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443号、第130—141页。

12 《厄布楚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60号、II、第471—472页。

13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578号、第282—284页。

14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594号、第335—375页；第1595号、第376—402页。

15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92号、第638—639页；同时参阅给秋门长官的条文式训令（1699年1月16/26日）同上书，第3卷、第1670号、第541页、第2条。

16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00号、第59—60页。

17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22号、第13节。

18 《维尔浩土尔札记》，第3章、第144页，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4章、第133页、第311号，或参阅图曼斯基前引著作，第71—75页，未注明出处。

19 《维尔浩土尔县法院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42号、第444—445页。

20 也许在特权期满以前就这样做了：1697年9月1/11日给托波尔斯基的新行政长官的训令规定：凡贩卖大黄者处以死刑。《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594号、第31项。

21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967号、第246—247页。

22 《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56页，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份、第4章、第133页、第410号。

据波塔南从1657年起，据菲舍尔则从1658年起（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注明出处），大黄的专卖权就归政府所有，违者处以死刑。波塔南：《十八世纪同准噶尔不花刺进行的商队贸易》，载《莫斯科大学俄国历史与古代史学会阅读材料》1868年、第2分册，单行本，莫斯科，8开本、93页，第33—35页；菲舍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4分册、第1章、第12节第548页。

23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迪·荷尔德《概述》，1736年、第3卷、第610页；《根据囚禁在西伯利亚的瑞典俘虏的原始回忆录编写的蒙古情况》，阿姆斯特丹，1737年12开本第84—85页；贝尔：《从圣彼得堡至……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2卷，4开本第一分册，313—314页；克拉普罗特：《关于亚洲的回忆》，巴黎，1824—1828年、8开本、3卷，第1卷、第72页注解；布雷特施奈德，

J. Ch.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 N. S., 第 15 卷、第 19 页; 尤勒:《马可波罗的书》, 第 3 版, 伦敦, 1903 年, 8 开本, 2 卷, 第 1 卷、第 217 页、注 3, 第 279 页、注 4, 第 2 卷、第 183 页、注 3。

24 斯特吕斯:《斯特吕斯在俄国的旅行……》, 阿姆斯特丹, 1720 年, 3 卷、12 开本, 第 1 卷、第 244 页; 布兰德:《伊兹勃兰德……出使……日记》, 伦敦, 1698 年, 8 开本、第 40 及 46 页; 迪·荷尔德:《概述》, 1736 年, 第 4 卷、第 140、144、456、503 页。

25 1697 年 4 月 15/25 日沙皇给沃洛格达行政长官的信。《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 第 3 卷、第 1580 号、第 301—303 页; 1697 年 4 月 26 日/5 月 6 日及 5 月 13/23 日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信。《叶尼塞斯克札记》第 4 章、第 231 及 232 号, 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 4 章、第 133 页、第 327 及 330 号, 或图曼斯基未注明出处, 前引著作, 第 1 卷、第 2 部、第 92 页以下; 1697 年 12 月 5/15 日沙皇签署的命令,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 第 3 卷、第 1607 号、第 411—412 页。

26 沙皇签署给西伯利亚部的谕旨,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 第 3 卷、第 1590 号、第 329 页; 1697 年 9 月 1/11 日给托波尔斯克行政长官切尔卡斯基亲王的训令、第 14 项,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 第 3 卷、第 1594 号、第 335 页以下。

27 托马斯·奥斯本勋爵(1631—1712)自 1673 年至 1678 年任英国首相, 主持英国政治。1674 年任丹比伯爵, 1689 年任卡尔马森侯爵, 1694 年任利兹公爵, 于 1698 年在温布尔顿接待彼得大帝的是他。《本国人名辞典》, 伦敦, 1895 年、4 开本, 第 42 卷。

28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 第 3 卷、第 1628 号、第 447—450 页。参阅佩里:《大俄罗斯之现状》, 译自英文。海牙, 1717 年, 12 开、第 160 页。

29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 第 3 卷、第 1637 号、第 457 页; 《叶尼塞斯克札记》, 第 4 章、第 243 号, 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 4 章、第 133 号、第 336 页。

30 《叶尼塞斯克札记》, 第 4 章、第 237 号, 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 4 章、第 133 号第 339 页。

31 英国上尉佩里于 1698 至 1710 年被俄国任命为工程师, 曾经在他的书《大俄罗斯之现状》里屡次谈起“查理·古德菲罗先生, 他曾任数年领事及已故女皇的总事务官”, 见上引著作, 第 55 页, 同时参阅(1706 年)第 15 页,

(1710年)第21—22、27页。在前引的俄国文件中，古德菲罗按照拼音写成“Goutfel”。

32 “中国丸”，一系列的文件都证明这个词儿的确定意义：《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22号、第116页、第1条；《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5110号、第10项；穆勒《月报》，1755年12月号、第532页；1756年5月号、第400页；施特拉伦堡：《欧亚两洲东北部概述》，斯德哥尔摩、1730年、4开本、第13章、第341页。

33 《叶尼塞斯克札记》，第4章、第261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18号、第88—89页；《图林斯克札记》，第3章、第596号，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4章、第133页、第353号。1701年4月18/29日给叶尼塞斯克长官的信(参阅下一注解)，还引用1701年2月9/20日/3月5/16日托波尔斯科、维尔浩土尔、秋门和佩林(Pélym)的答复。

34 1701年4月18/20日沙皇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信。《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21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30号、第120至128页，或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4章、第133页、第360号。在穆勒材料袋、第358号中还有一封给图林斯克长官的相同的信。《图林斯克札记》，第3章、第602号。

在被征求意见的人当中，有西奥多尔·莱伊林，他以前是波格达诺夫的伙计，在卡尔马森侯爵以前也承包过烟草贸易。他的意见能够说是无私的吗？

35 1701年4月18/29日的信(见前面注解)引用了一道内容相同的1701年3月14/25日的谕旨。

36 1702年3月24日/4月4日沙皇给图林斯克行政长官的信。《图林斯克札记》，第3章、第609号，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4章、第133页、第369号；1702年8月31日/9月11日沙皇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信，《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131号，同前，第370号。

37 沙皇给图林斯克行政长官的信。《图林斯克札记》，第3章、第622号，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4章、第133页、第377号。

38 沙皇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信，被图曼斯基转载于前引著作、第2卷、第2部、第278—281页，未注明出处。

自1705年4月4/15日起，政府自己保留烟草专卖权。《俄罗斯帝国法律

汇编》，第4卷、第2045号；比较同上书，第2001号。

39 《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64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73号、第303页。

40 图理琛是在喀山说这句话的。他的书的英文译本，见后第5章。

41 照他说，是英国烟草被禁，不是土耳其烟草，也不是俄国烟草。可是德国商人仍然继续秘密贩卖英国烟草给达官显贵们，达官显贵根本不理睬官方的变质了的烟草。（韦伯）：《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4开本、第53页。

42 关于英国烟草在西伯利亚的历史，参阅米柳科夫：《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的国家组织》，第2版，圣彼得堡、1905年、8开本、第163—164页。

43 参阅勒·孔特：《新回忆录……》，第2版，巴黎、1697年、12开本、2卷，第1卷、第5号信、第243—245页；迪·荷尔德：《概述》，1736年、第4卷、第34页、36页。

44 参阅下文第4章。

45 参阅上文第44页。

46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578号、第282—284页。

47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598号、第402—403页，图曼斯基前引著作，第2卷、第2部、第98页。“10月27日”，见斯洛夫齐索夫：《西伯利亚简史》，莫斯科、1838、1844年、8开本、2卷，第1卷、第266—267、329页。

48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65号、第530页。

49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520号、第212页，以及1696年1月2/12日的相同决定，同上引、1530号、第216页。

50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526号、第213—214页。

51 《厄布楚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84号、第517页。

52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22号、第95页以下。尼科勒夫由于渎职被撤消职务的命令，是1701年2月25日/3月8日签署的，见前引、第1836号第154—155页。

53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535号、第219页。

54 安德烈维奇：《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889年、8开本、2卷，第1卷、第114—115页；第2卷、第56及427页。

55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92号、第638—639页。

56 《维尔浩土尔县法院档案》，载《史料补遗》，第12卷、第89号、第394—395页。

57 1699年1月16/26日给秋门行政长官的条文式训令，载《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70号、第541页、第2条。

58 在1766年1月28日/2月8日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一封信中重新提到过。《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54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68号、第278—279页。

59 在1699年1月21/31日给叶尼塞斯克税务督办的一份备忘录中重新提到过。《叶尼塞斯克札记》，第4章、第208号、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4章、第133页、第340号。

60 枢密院的命令。《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2349号、第662—666页。

枢密院是根据1711年3月2/13日的谕旨组成的。《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2328—2331号、第634—636页。

61 参阅《原始文件》中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给外交部的报告。

62 关于不花刺人在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性，特别要参阅上面引用过的波塔南的著作：《关于商队贸易……》；穆勒《月报》，1756年、5月号、第409—410以及415—421页；法尔克：《俄罗斯帝国地形知识文稿》，圣彼得堡、1783年、8开本、3卷、第3卷、第496—516页。

伊兹勃兰德(关于这个人，参阅第3章)和他的伙伴们曾经提起他们在托波尔斯克和托木斯克进行中国商品贸易。勒·勃伦：《高乃依·勒·勃伦在俄国的旅行……》，阿姆斯特丹、1718年、对开本、2卷、第1卷、第138—139页，或《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1727年、12开本、第8卷、第193页；布兰德：《出使日记……》，伦敦、1698年、8开本、第130—132页。

63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迪·荷尔德：《概述》，1736年、第4卷、第51、64页；郎克：《郎克使节日记……》，莱顿，1726年、8开本、第72—77页。

64 尤其参阅第13至第20项，《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474号、第160—166页。

65 第2项，同上书，第3卷、第1654号、第508—509页。

66 《维尔浩土尔札记》，第3章、第205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70号、第284—289页。

第三章

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的俄中早期关系； 伊兹勃兰德·义杰斯(1692—1695)

材料来源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0章，第1206—1214页正面；中国事务，1726年第2号。

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226、233、241、287页；1736年，第4卷、第272、280、343页。

德·马依阿神父：《中国通史》，第11卷、第137—138页。

关于伊兹勃兰德·义杰斯的使命：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5章、使节公务日志；中国宫廷，第14章；散页，1692年1月29日、第1号，1692年11月1日、第2号，1694年11月23日。

伊兹勃兰德·义杰斯：《旅华三年》（荷文），阿姆斯特丹，1704年、4开本版；《从莫斯科出发旅行三年》（英文），伦敦1706年、4开本版；《旅华三年》德文，法兰克福，1707年、8开本版；勒·勃伦：《勒·勃伦经俄国的旅行》，阿姆斯特丹，1718年、对开本、2卷，第1卷、第17章至第30章，第100—143页；《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1727年、8开本、第8卷，第1—217页。

门采尔：《中国大事简记》，柏林，1696年、4开本，第141—145页。

莱布尼兹：《中国近况》，1697年、8开本、第163页以下。

布兰德：《中国旅行记》，汉堡、1698年、8开本版；《出使日记》，伦敦、1698年、8开本；《经过长途陆路前往中国……》，提埃尔，1699年，《埃弗特·伊兹勃兰德旅行述异》，阿姆斯特丹、1699年、8开本。

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的几年间，其特点是俄国派遣人员到中国来，这些人员既是商人，又是外交代表。就是俄国的中央政府和这些代表本人，也并不是总能分清这两种职务的性质和作用的：携带政府文书的使者从事贸易，或者由商人作伴一同前来；而给与商务代理人的使命也常与他们的正业无关。

1689年10月12/22日柯罗文写了一封信，交由尼布楚的大贵族格里高瑞·兰赤查科夫递交给“可汗的手下人”，信中通知，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俄国人应由额尔古纳河南岸迁至北岸的事情，要等到次年春天才能进行¹。这就是耶稣会教士张诚所说的，有“一队莫斯科人，人数约八、九十名”，于1690年5月25日到达北京。据说，中国皇帝曾对张诚说：“由他们的外表就能断定他们纯是为经商而来，他们带来了六十大车兽皮。”²

因此，当时流传在北京的某些传闻只能看成是些无稽的谣言。1690年2月21日，有一队喀尔木克人和不花刺人的商队来到北京，据张诚说，其中有两名俄国人和一名立陶宛人；这个立陶宛人对张诚说，俄国使团中有一名使臣和他的随从人员在蒙古被杀害了³；这也许是关于格里高瑞·兰赤查科夫使团的一个传奇式的传闻。同样地，1690年年中，中国皇帝由间接的报告得知喀尔木克人曾向俄国乞援，希望得到援助，因而曾对“那时正为商务而停留在北京的鄂罗斯人吉里古里和伊法尼齐”⁴表示惊异。这也许就是关于噶尔丹在1690年2月曾向柯罗文及俄国人接洽的一种模糊的谣传⁵。但是从这个俄国“商人”的名字看来，可以证实当时格里高

瑞·兰赤查科夫在北京。

1690年11月20日张诚提及索额图要求他把一封给尼布楚城长官的满文信件译成拉丁文。信中通知俄国人说中国已战胜了厄鲁特人，并且根据那时流传在北京的谣言，要求俄国人对喀尔木克人的恳求置诸不理⁶。

如果说，从这些消息中去伪存真比较容易，并且由于俄国的文件和张诚神父的叙述相一致从而确认1690年间确有俄国使臣和商人在北京也不难，但是关于张诚神父涉及次年的另一个论断，考证起来就比较困难复杂。但是肯定某些一致之处，也不能算是过分大胆。张诚说：“1691年8月22日，皇帝亲自告诉我们，在中国的藩属鞑靼边境到了一名莫斯科的使者，他有大约40名随从人员，还有90个左右莫斯科商人陪同，以便进行通常的贸易⁷……”皇帝下令好好地接待他们全体，代付大使及其随从人员的费用，但不包括商人们在内，以免造成一个麻烦的先例。康熙30年11月4日即1691年12月22日，索额图写给尼布楚行政长官西奥多尔·伊萨凯维奇·斯克瑞皮琴的一封信⁸，似乎很能证实上述材料⁹。斯克瑞皮琴曾向索额图要求，准许沙皇派遣来中国贸易的一些重要商人前往北京，并在北京给他们以房舍居住和贸易自由，并在他们归国时给以适当的保卫和护送；这些人员从尼布楚城起由阿法纳西·索福罗诺夫护送，商队共有七十七名人员。中国皇帝批准了这项请求，并且一反中国的常例，款待他们并代付他们的费用，但是，这样的优待以后就再也没有重现。

索额图于同日写给斯克瑞皮琴的另一封信，通知斯克瑞皮琴说，他的信使“阿格皮特·波罗尼科夫”（他的真名字是阿格皮特·拉里诺夫·波罗特尼科夫）已经把斯克瑞皮琴于康熙30年8月29日即1691年10月20日写的信交给了索额图¹⁰；另一封写于康熙32年5月28日即1693年7月1日的信，提及一个名叫“埃尔热

普”的使臣于康熙 30 年(1691 年)时到过北京¹¹。但是没有任何证明可以补充以上陈述，并足以说明波罗特尼科夫曾在索福罗诺夫的商队中。

1692 年曾有一位俄国使臣到北京来过，证据则比较充分。伊尔库次克的行政长官伊凡·彼得洛维奇·噶噶林亲王在 200 年(1691—1692) 间曾就引渡逃亡的蒙古人问题，写过两封信给索额图。传送这两封信的使者之一是尼布楚的大贵族小西蒙，他携带着中国的复信回到尼布楚时就病倒了；送信的另一位使者是色楞格斯克的大贵族莱奥比姆·欧瓦罗夫¹²。而索额图于康熙 32 年 5 月 28 日即 1693 年 7 月 1 日发出的信件中，有一封是写给噶噶林的，信中通知噶噶林亲王，他已于同年(32 年) 4 月 12 日即 1693 年 5 月 16 日收到了噶噶林派使者西蒙送来的信¹³。这些日期是彼此吻合的。因此小西蒙是于 200 年(1692 年)上半年从伊尔库次克出发，1693 年 5 月 16 日到达北京的；他带来一封噶噶林给索额图的信¹⁴。

但是在另一方面，确认下述事情就很困难：一个拥有一百五十名俄国人的商队，曾在 1693 年 8 月 28 日由中国归国时，在满洲遇见了俄国宫廷的使臣伊兹勃兰德·义杰斯。义杰斯的同伴亚当·布兰德曾把这件事的经过记述下来，他说，这个商队是头一年的冬天，即 1692—1693 年的冬天，由尼布楚启程到中国去的¹⁵。我们可以引证这件事发生以后约二十年的一份官方文件为证，这件文件是沙皇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一封公函，上面提及在 199 年(1799=1690—1691 年)年间曾有许多俄国和西伯利亚的商人没有官方准许就到中国去了，但讲得不够详尽¹⁶。1692 年 12 月 15/25 日给叶尼塞斯克行政长官的另一封公函，虽然讲得比较清楚，但也不能令人满意。这份文件叙述巴西尔·切巴耶夫斯基、狄米特立·沃罗别夫、彼得·奥斯考尔考夫三名商人，曾于 1692 年 11 月

26日/12月6日,向莫斯科呈递一份申请书,书上说他们在200年(1691—1692年)间曾到中国的某些城市购买绸缎和锦缎,于201年(1692—1693年)间已带回莫斯科¹⁷。这样,这个商队是于1691或1692年来到中国并于1692年年底到达莫斯科的,那么这个商队就不可能于1693年8月28日在外贝加尔区遇见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另一方面,1691年的索福罗诺夫商队又不会在北京一直呆到1693年。因此,这个问题的澄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¹⁸。

在大约同一时期,关于由俄国宫廷派往北京的直接使团,即伊兹勃兰德·义杰斯使团,中央档案中恰巧有很详尽的文件。虽然这些材料中,有些是不很确切可靠的,并且有遗漏的地方,但是关于这次使团的正式报告以及一些附属文件,仍足以纠正或补充这个使团的负责人或他的同伴归国后在西方所发表的出使记。

沙皇于1692年1月29日/2月8日对伊利萨尔呈递的如下申请书作了答复¹⁹。伊利萨尔是伊利萨尔·伊兹勃兰德²⁰的儿子,是出生在丹麦的一个商人²¹,自1626—1677年起就经由海路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从事贸易²²,尽管遇到与法国人的各次战争和可怕的风暴,仍能够付给俄国政府六千卢布以上的税金,现在请求沙皇允许他带着价值三千卢布的银子和财政部的价值三千卢布的毛皮,假道西伯利亚到中国去进行最初为期5至6个月的贸易,并由俄国人或其他国人陪同前去。沙皇准许了这个要求,并且负责筹办这次长途贸易。大约一个月以后,在3月上旬,沙皇从使节部给这个“使臣”调来一个秘书,名叫西蒙·波利耶兹柯依,还增派了两名少尉和一个医官²³。3月7/17日沙皇写信给托波尔斯科的行政长官,命令他在伊兹勃兰德经过的时候,给后者配备蒙文翻译斯皮瑞东·别兹瑞阿道夫,还给他一个秘书和四、五十名兵士,并向这支商队征收通常的税款²⁴。政府签发护照的日期是3月8/18日²⁵,与护照一道还发给了致呼图克图和蒙古王公阿洽赉僧汗的介绍

信²⁶。沙皇签署的证明文书日期是1692年3月9/19日²⁷。

发给伊兹勃兰德的训令²⁸可以分为不均等的两部分：主要部分是关于商业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外交的。在第一部分中，可以发现以前发给柯罗文的，甚至更早以前发给尼果赖的训令内容，这些内容似乎已经成为发布给派往中国的使臣惯用的“陈词滥调”了：内容是有关要求中国商人携带银锭、宝石、香料、花布²⁹以及其他土产品前往莫斯科。更为特殊的内容是让使团在北京尽量争取一切机会研究市场情况，各种资源、产品及其价格，关税负担，并研究哪些俄国产品适合于输往北京，以及哪些中国商品最有利于俄国财政部³⁰。在外交方面，“伊兹勃兰德”应遵从中国的习俗，送礼物和馈赠³¹，以便设法探悉中国皇帝对和平和两国未决边境问题持何态度。他还应要求引渡上次兰赤查科夫来中国时未能引渡的逃亡者和囚犯，同时请求中国允许在北京给与一块地基，由沙皇出资建立一个正教教堂。这样看来，这次沙皇派往中国的与其说是外交代表，毋宁说是商业代表，目的是在于获得有关俄中贸易条件的情报。

商队³²于1692年3月14/27日从莫斯科动身³³。走的是例行的水路³⁴。伊兹勃兰德·义杰斯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才到达伊尔库次克（1693年2月11/21日—3月7/17日），又费了半年以上时间才经由尼布楚与满洲于1693年11月3/13日到达北京³⁵。他按照常例同他的随从一起被关在“四夷馆”³⁶，直到他所携带的国书交给中国皇帝的大臣以后，才于11月14/24日获得觐见皇帝³⁷。第二天，中国又把沙皇的信和礼物退还给他，借口是信中把中国皇帝的称号写得低于沙皇的名字了；中国方面甚至说，今后同类信件将在齐齐哈尔予以启封³⁸。其他各次觐见不过是官场仪式而已，丝毫没有讨论任何事务³⁹。值得提起的一次觐见只是11月17/27日的那次，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在回答充任译员的耶稣会教士的

一个问题时，宣称他自己只懂德语和一点意大利语⁴⁰。中国的一个大臣代表中国皇帝问他是否听到有关冈明我神父的消息，他是奉命由中国取道印度到欧洲去的。伊兹勃兰德只在莫斯科听说冈明我神父已经到了土麦那⁴¹。1693年12月27日/1694年1月6日，两名中国官员来取俄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清单；第二天，义杰斯按照沙皇给他的训令列出了五项条款，连同补充的第6条给他们送去了⁴²。1月14/24日严格禁止擅离“四夷馆”的禁令撤销了，俄国人获准在北京城内各处行走⁴³。一个月以后皇帝给予义杰斯最后一次觐见辞行的机会（2月16/26日）⁴⁴，2月19日/3月1日中国大臣对于俄文的六条要求逐条用拉丁文作了答复⁴⁵。

义杰斯就在这一天（1694年2月19日/3月1日）离开北京⁴⁶，按照他来华时的路线归国⁴⁷，于1695年2月1/11日回到莫斯科，这离开他出国时已将近三年了。根据一条完全象是近代加进去的注释里说，他带回来了一封拉丁文复信，但在呈报给沙皇的使节公务日志中没有发现这封信⁴⁸。不过，义杰斯于1695年4月4/14日交给使节部一张很长的中国纸，折成屏风状，盖有中国皇帝的用满文和中国古文刻的朱红大印，纸上写的是很拙劣的俄文，义杰斯宣称内容同拉丁文信件的内容一样⁴⁹。信上的日期是康熙33年2月5日即1694年2月28日。虽然原文和译文都很难阅读，但我们仍能分辨出，俄国的各种不同要求遭到了拒绝，例如关于建立教堂、引渡逃亡者和中国向俄国进行出口贸易等。

使团使臣的正式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读一下给义杰斯的每一条训令和义杰斯对之所作的回答，就象背诵祈祷经文一样，通篇都重复着同样的几句话：他什么也办不到；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是不让办的。不过，义杰斯总算获得了一点成果，取得了极少量的情报：关于中国皇帝的意图这一重要外交问题，一个法籍耶稣会教士只告诉他说，中国皇帝怀有和平意图，康熙会遵守尼布楚条

约的⁵⁰。别的耶稣会教士告诉他：中国皇帝曾下令在黑龙江畔，靠近结雅河，雅克萨的下流的地方建立一座要塞⁵¹。关于商业方面，这位商人的正式报告是以一份虽然简单但很明确的表作结束的，这份表载明哪些物品最适合于由俄国输往中国和由中国输入俄国。货单如下⁵²：

适于向中国出口，可望获致厚利的俄国商品：

头等、中等和次等的没有经过鞣制的貂皮。

头等和中等的貂鼠腹部毛皮。

鄂毕河区域、俄国欧洲部分和雅库次克出产的银鼠皮。

雅库次克和其他地方出产的松鼠皮。

雅库次克和尼布楚的山猫皮，按件计⁵³。

北极狐皮。

野兔的皮和腹部毛皮以及其他各种毛皮。

可输入俄国以供鉴赏的合算商品：

头等珍贵宝石。

上等和中等的锦缎。

南京棉布。

义杰斯还说，齐齐哈尔已经准备了大炮和军火，并且建立了商店，中俄贸易将全部集中到那里进行，因为中国人将不再允许俄国人进入中国本部了⁵⁴。

如果是粗略地或肤浅地来看待事物，人们就会说这次出使是失败了，并且说俄国人在尼布楚受到一次挫折以后，这次又遭到一次挫折。中国方面拒不接受俄国政府的国书和沙皇的礼物，同时俄国政府训令其使臣提出的要求差不多全部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是最好是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这次出使的结果，而且就其真正价值来加以判断。为此，我们必须想到伊兹勃兰德·义杰斯绝对不是俄国的全权外交代表，负有明确的外交任务，例如解决边境问

题或在北京设立领事馆等；义杰斯所担负的是次要角色，这一点从沙皇授与他的头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头衔是“使臣”，那就是说，仅比“信使”稍高一等，但离“大使”差得很远。我们已经知道，给予他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训令只是：他应设法获知中国皇帝的意图，要求引渡逃亡者，同时假如可能的话，要求给予建立一座教堂的地基；其中除了第一点只是一般性的，因而必然笼统以外，其他各点的重要性只是相对的。因此，义杰斯这个外国人，根本不是作为俄国授权的代表而在一次重要的外交谈判中失败了；他只不过是一个代理人，主要业务也不是国际政治。事实上，这个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从事沿海贸易的商人，向沙皇请求的只是普通的“库普期那”，即二等商人的头衔（不是葛斯奇，即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的成员，大包揽商）。在俄国宫廷看来，他至多是个精通本行的人，能够获知中国市场的情报而已。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大使、军人和商人的职务并没有象我们现在这样严格区分，因此柯罗文既是大使，又是一支军队的长官，那么，义杰斯这个商人，也可以兼任使者执行不太重要的外交训令了。在当时，允许商人们参加到政府的使团中去，是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例如1690年柯罗文的信使兰赤查科夫就是一例，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为什么俄国宫廷正式派往北京的商人，不应当担负某些政治任务呢？这不也是不花刺人的商队和他们的领袖所常用的方法吗？如果我们认为义杰斯的赴华，其性质主要是一个政府商队而不是一项外交义务，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单纯从商务观点来判断。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当时的帐目，因此不能断定此行在经济方面盈亏如何。不过，虽然没有帐目，却有各种报告，尽管非常有限，对于俄国财政部来说，仍然是宝贵的资料。我们可以这样说，使臣相对的失败，对增加俄国宫廷的见识方面仍然对俄国宫廷是有益的。俄国宫廷已通过尼果赖惨痛地了解到中国朝仪的重要性，并且由于有这次经验为指

导，所以发给义杰斯的训令是命令他遵从中国礼仪⁵⁵。这一次出使又发现了字斟句酌的必要性。这一教训俄国并没有忘却，我们将看到俄国宫廷后来向北京派遣新的代表时，它就不想再犯同一错误，以免给中国以再次吹毛求疵的口实。又由于义杰斯转交的中国政府用俄文书写的文件非常难懂，所以俄国便要求必须以拉丁文作为两国交往的官方语文⁵⁶。在尼布楚谈判时，用蒙文或满文作为通用语文的提议已经遭到了拒绝，而与北京在外交通信上用俄文又不可能，于是拉丁文便成为两国交往通信的唯一语文了；在北京只有耶稣会教士可以从事这种语文的翻译，因此，他们的重要性就大为增加。这样，俄国宫廷逐渐发现有关中国事务的一些新的重要情况：必须注意北京朝廷的规矩，包括朝仪方面和公文来往方面；此外，它的使臣和书信必须严格使用拉丁文。如果除了获知这些以外，俄国还从这次出使失败中得到有关俄中贸易的重要性的确切情报，这些情报是俄国宫廷极为关心的，那么我们还能说这次出使是徒劳的吗？

无论如何，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次出使不能算作失败。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在俄国是外国人，他的商队中也有其他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最着急的是向欧洲方面散布他们赴华旅行时所观察到的大部事实以及商队所得到的结果。阿夫瑞尔神父在他169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已经畅谈经由北方路线，特别是取道西伯利亚，是进入中国的捷径⁵⁷。就在这同一年，曾在俄国居住过一段时期的荷兰人尼古拉·韦特森发表了他的著作《蒙古北部和东部》⁵⁸。不过这两个人谈及西伯利亚和远东时都只能依据传闻，因为他们从未超越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相反地，1696年克利斯丁·门采尔在他的《中国大事简记》中由义杰斯的旅行报告中选录了一些片段⁵⁹；次年莱布尼兹在他的《中国近况》中也同样从中摘录了一些⁶⁰。1698年义杰斯的一个同行者德国人亚当·布兰于汉堡发

表了一部关于此行的更为全面的作品，这本书立刻有了英译本，接着又（在1669年）译成了荷兰文和法文⁶¹。义杰斯在与韦特森取得联系后，于1704年用荷兰文发表了他自己的游记，接着出版英文版（1706），德文版（1707），较迟才出版法文版（1718）⁶²。而韦特森于1705年又发表了他的著作的第二版，其中采用了他的朋友义杰斯所提供的资料。这样，幸而由于义杰斯的出使北京，欧洲有文化的公众在十七世纪的最后几年或十八世纪初年，才得以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它的习俗和商业情况，而直到那时为止，由于缺乏个人直接的观察与报告，欧洲对于这些还很不了解，或了解得很不全面。

注 释

1 中国宫廷，第10章，第1206页。柯罗文给兰赤查科夫的训令，同上书，第1206至1212页；俄国大使给中国人的信，同上书，第1212页至1214页正面。

2 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233页；1736年，第4卷，第280页。

信件其余内容是请求引渡蒙古逃亡者，似乎在俄国文件里和张诚神父的叙述里都有。

3 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226页；1736年，第4卷，第272页。

4 德·马伊阿：《中国通史》，巴黎，4开本，第11卷，1780年，第137—138页。

马齐，尼布楚会议的中国使臣之一，被喀尔丹俘虏后脱逃，回到中国营地以后带回来这些消息，也许是喀尔木克首领经过夸张和歪曲后故意散播的。阿尔尼，尼布楚会议的另一个中国使臣，于康熙29年5月即1690年6月7日至7月6日，把马齐根据在喀尔木克人阵营里流传着的谣言而编造的报告传送到北京。因此，只是通过两个中间人，中国皇帝才知道这一敌人有意骗人的谣言。

中国把俄国人称作鄂罗斯。

吉里古里很可能是中国人对俄文格里高瑞的译音，这个名字被用来指兰赤查科夫；可是也应该承认这个名字可能指的是在北京的某个俄国商人，而且肯定吉里古里就是兰赤查科夫的名字，理由也不够充分。不过在那时候住在北京最重要的官方人物，就是兰赤查科夫，如果说，他由大批商人追随着于5月25日抵达，那么，也可以假定他在那里一直住到阴历五月即阳历六月。——伊法尼齐很容易使人想到原来的俄国人名字伊凡或伊凡尼奇。会不会这是兰赤查科夫的父名，而指的是兰赤查科夫呢？俄国文件中没有写出兰赤查科夫的父名，译成法文的中国文件中明指是两个人。参阅伊兹勃兰德带回来的信，载《证明文件》。

5 1690年2月22日/3月4日在伊尔库次克；1690年在尼布楚；参阅第1章。

6 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241页；1736年，第4卷、第289—290页。

7 前引著作，第287页；1736年、第4卷、第343页。

8 1690年2月7/17日，柯罗文根据他的全权代表的职权，命令他的一个团长斯克瑞皮琴，取代尼布楚长官伊凡·维拉索幅的地位。中国宫廷、第10章、第1219页正面。

9 1692年10月26日/11月5日，伊凡和马蒂厄·噶噶林两位亲王，伊尔库次克的长官，送到莫斯科西伯利亚部几封信，这几封信是他们于200年（1691—1692年）从尼布楚长官斯克瑞皮琴那里收到的。这些信一共有九封，三封用拉丁文写，三封用汉文或蒙古文，三封用俄文。从西伯利亚部转送到使节部，这些信件在那里被译成俄文而且抄录下来。我们在中国宫廷第14章第136页背面至第145页所发现的，就是这些译文和抄本。汉文信因为在莫斯科找不到翻译，无人懂得。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1692年11月1日最后一页。蒙文信件在中国宫廷第14章第141页背面上也谈到了；如果里面的提法是正确的，那么就是有十二封信，而不是九封信；而伊尔库次克长官说的是九封信，其中三封是汉文的（而不是蒙文的）。是不是使节部负责蒙文翻译的保尔·库尔万斯夸把汉文和蒙文弄错了呢？可是这两种文字的写法是完全两样的呀！不过无论如何，看来他对自己的工作不甚熟悉，因为他说：这些信件是用蒙文字母写成的古汉语和古满语！事实上，当伊兹勃兰德动身到中国去的时候，不是由这位保尔·库尔万斯夸伴随，而是由托波尔斯克的一个蒙文译员斯皮瑞东·别兹瑞阿道夫伴随（1692年）。也许那三封汉文信

件里面有蒙文译文在同一页纸上，这样就能解释9封信中有3封是有汉一蒙文的。译成俄文的一封拉丁文信件上面有一个日期：30年1月12日，这是不可能的；相应的俄文信上记载的日期是30年12月1日，这就能解释错误的原因，而且这个日期相当于1692年1月17日。这三封信（其他不同语种的信件内容只是重复而已）只谈到叛逃者的问题。

10 波罗特尼科夫是组长。他带来一封斯克瑞皮琴的信，信中保证说，虽然喀尔木克人一再央求，但是俄国人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军事援助。这也许是对索额图关于这个问题的信的答复，这封信是张诚神父于1690年11月20日翻译的。第3封从拉丁文译成俄文的信，第一封是俄文信，中国宫廷、第14章、第140—141页正面，第142及143页；比较《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号、XXXI、第281页、第1条。

11 1694(203)年11月23日/12月3日，七封用中国纸写的拉丁文信从西伯利亚部送到使节部来翻译。原信和译文都被送回西伯利亚部；抄本在中国宫廷、第14章、第146至158页正面。

其中两封信是索额图给斯克瑞皮琴的；两封是索额图给“额尔古尼”长官伊凡·彼得洛维奇·噶噶林的（他是伊尔库次克的长官，不是额尔古纳的长官，也许这个词儿翻译成拉丁文音，后来又由拉丁文音译成俄文时被歪曲了）。除了一封信的日期误为5月18日外，所有这些信的日期都是康熙32年5月28日，即1693年7月1日，内容都是有关叛逃者问题。就是30年的第2封信谈到“埃尔热普”(Ergep)的。

1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2号，在托波尔斯克交给务拉的思拉维赤的文件清单；他只拿了这两份文件的抄件。

13 第3封信(参阅注2)载中国宫廷、第14章、第151至155页背面。

14 关于叛逃者问题，同上引，小西蒙大概是7200/1692年4月6/16日动身到中国去的，因此很可能带回来一封日期是32年5月28日即1693年7月1日的信。见费非洛夫关于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叛逃者的报告，这报告于1725年11月3/14日在托波尔斯克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2号。

15 布兰德：《中国概述……》，汉堡、1698年、12开本、第103页；《出使日记……》，伦敦、1698年、8开本、第65页。

16 《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54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68号、第278—279页。

17 《叶尼塞斯克礼记》，第4章、第94号，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第10章、第133页、第332号；图曼斯基：前引著作，第1卷、第2部、第77—81页，未注明出处。这些商人在西伯利亚曾付过每卢布两戈比半的税金，莫斯科的总税务督办还要他们为西伯利亚购买的東西付1/20（即每卢布5戈比）的税，他们拒绝了。

18 这是不是葛斯奇费拉切夫他们的商队呢？费拉切夫的伙计洛巴诺夫于202（1693—1694）年回到托波尔斯克。参阅1695年6月6/16日托波尔斯克大主教的公函，载梅莱蒂伊（修道院长），《旧宗教信件集》（俄文），喀山、1875年、8开本、第66—71页。

19 中国宫廷，第14章、第1—2页，第17页背面至第20页。

20 在俄国的档案里他的名字总是这样拼法，参阅使臣本人于“1693年9月13日”回答中国皇帝的一个大臣的信：“伊兹勃兰德”，见布兰德：《出使日记……》，伦敦1698年8开本第68页。

在他的著作的西方版本里，使臣的名字叫做埃（Everard；德文：Eberhard）·伊兹勃兰德·义杰斯（Isbrants Ide）。改写为*i*和*y*的荷兰音介于*i*和*é(ei)*之间，这就可以说明改写为字母*i*或*y*的原因。伊兹勃兰德这个词看来起码代表这个人的姓，因为无论西方或者俄国人都在这个姓前头加上名字“埃弗拉尔德”或“埃里扎尔”。俄国人忽视姓氏中的第二个字：义杰斯，荷兰人比较熟悉家族的习惯，就用全姓：伊兹勃兰德·义杰斯。看来埃里扎尔或埃弗拉尔德是名字，伊兹勃兰德·义杰斯是姓的全称。但是拉策尔在：《德国人传记集》第13卷，来比锡1831年8开本内，把义杰斯视为姓，伊兹勃兰德则是名字。

21 如果这个人的姓名值得讨论，他的国籍就更有争论的余地。最经常的情况是人们把他视为德国人，可是唯一的根据只是他的伙伴的叙述：亚当·布兰德说他“是德国人，生于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的格吕克施塔特”（参阅布兰德前著德文版第2页），他的说法十分值得怀疑。另一方面，根据拉策尔前引著作，他的父母可能是荷兰人，他自己在荷兰也有亲属，尤其是同阿姆斯特丹的市长韦特森关系密切，他的旅行记最初是用荷兰文出版的（阿姆斯特丹1704年版，见下文）。最后，他向沙皇递送的正式呈文也说自己生于丹麦。这种明显的矛盾可以用下述方法解决：只要承认这个商人的家庭是荷兰人，他自己出生在荷尔斯泰因，而荷尔斯泰因是丹麦的日德兰半岛的一部分就得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断定他到底是荷兰人、德国人，或者严格点说，

是丹麦人。

22 参阅《证明文件》里他的申请书。他说，在185年（1676—1677年）时他还年轻。如果象拉策尔所说的那样，他出生于1660年，那么上述说法还是正确的。7196/1688年3月7/17日沙皇的一道谕旨命令付给他的各种商品74卢布50戈比，这些商品是：有翎毛的帽子，玳瑁架的镜子，记事册，玳瑁镶银小箱子，玳瑁制的小修道院，法国火镰，打猎铁锤，银颈瓶儿，水晶瓶儿，象牙烛台，珠篮子，镶金的皮火药囊，有响铃的银挂钟，银钮子，扇子，等等。在这个文件中，他被称为汉堡商人；可是任何参考资料或证明文件都未提到这个文件。莫斯科大学俄国历史及古代史学会《会刊》1887年、第1期、《杂录》，第176—177页。他自己却承认他是一个新教徒，在莫斯科有一所房子和一大块地产。中国宫廷第14章、第66页背面，67页正面。

23 中国宫廷、第15章、第1、2、3页正面；中国宫廷、第14章、第21—23、24页背面、36页正面、41页正面、53页。

那位药剂师兼医师是克利斯多夫·卡尔斯坦斯。选中他是要他去“……在这些国度里找寻可以入药的根茎、草和种子……”中国宫廷、第15章、第1页。

24 中国宫廷、第14章、96页背面，97页。《托波尔斯克札记》、第3章、第70、71、72号，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第4章、第133页、第318—320号。收到谕旨的日期是1692年7月1/11日。

别的同样内容的命令也送到了维尔浩土尔。《维尔浩土尔札记》，第3章、第147号，载穆勒材料袋、第4章、第133页、第315号，也许还发给别的西伯利亚城市。

斯皮瑞东·别兹瑞阿道夫被称为蒙文译员，见中国宫廷、第15章、第2页背面至第3页正面；在托波尔斯克上述文件中则被称为中文和蒙文译员；又在这些档案的不同抄件中，被称为喀尔木克文及蒙文译员，见《史料补遗》、第80号XI，第4号、第374页。按照后一文件的说法，他一直留在外贝加尔区，在1696年没有回到托波尔斯克。

托波尔斯克的秘书名叫伊凡·苏莫罗茨基。如果他也通晓蒙文，那么在中国宫廷第15章第41页正面所说的两个译员，就解释得通了。同时参阅：中国宫廷第14章第132页背面。

25 通行证，《维尔浩土尔札记》，第3章，第146号，载穆勒材料袋、第4章、第133页、第314号。

26 仁谕,中国宫廷、第14章、第78页及79页背面,81页背面至84页背面。

27 中国宫廷、第14章、第77页正面;里面附有3份抄本,一份是拉丁文的,由使节部的译员斯帕塔尔、格罗、拉弗尔斯基三人翻译;另一份是俄文,最后一份是德文。同上引第77页背面,78页正面。拉丁文和德文的抄件在《散页》第1号。拉丁文本上使臣被称为:“Eliazar Eliazarii filius Izebrandus。”

28 训令无日期,但应在1692年1月29日/2月8日与3月14/24日之间,3月14/24日是从莫斯科动身的日期。中国宫廷、第15章、第35页、背面至37页正面;50—52页;中国宫廷、第14章、56页背面,58页正面,59页背面,61页背面,62页背面,63至74页正面;《散页》,第1号,参阅《证明文件》。

29 逐字译是:有图案的商品。

30 参阅《证明文件》。

31 除了他的六千卢布,使臣还收到五百卢布献给中国皇帝,四百卢布的貂皮送给中国的大臣,二百卢布貂皮供出售,一百卢布献给蒙古的呼图克图和阿洽贵僧汗,总数六千卢布,相当于270,300法郎,一千二百卢布相当于51,410旧法郎。中国宫廷、第14章、29—30页背面,54页正面。

他还带了一些礼物:水晶烛架,两个大烛台,两个小烛台,一个小瓶,一只酒杯,一只琥珀小箱,琥珀框架的镜子。中国宫廷、第14章、第1页背面,第2页正面;第14章53页背面。他于1695年3月19/29日把这些礼物完整地带回财政部。中国宫廷、第14章、第160页背面。

关于薪给,如果加上秘书的115卢布,医生的340卢布,每个军官72卢布,总数就到达几百卢布。中国宫廷、第14章第37、43页背面、45页背面、50、52页正面。柯罗文使团花了上百万法郎;其中差别是由于两次出使的不同。

32 “我们的整个商队共有四百人……”,布兰德,英文版第61—62页。

33 中国宫廷、第15章、第2页正面;《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8开本、第8卷、1727年、第3页。勒·勃伦;《勒·勃伦至莫斯科公国、波斯及东印度旅行记》,阿姆斯特丹,1718年、对开本、2卷,第1卷第100页。奇怪的是,伊兹勃兰德在写书的时候,没有将俄历译成公历,也没有用注解告诉读者。

34 凯格罗得,索里嘉木斯克,秋门,托波尔斯克。

35 托波尔斯克7月1/11日至21/31日。中国宫廷、第15章、第2页

背面,第3页正面;第14章、第142页正面;动身是7日,托波尔斯科长官给沙皇的报告。《托波尔斯科札记》,第3章、第71及72号,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第4章、第133页、第319及320号;动身是在7月22日/8月1日。《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27页;——苏尔古特,8月6/16—9/19日;——那里穆柏兴,8月23日/9月2日至8月24日/9月3日;——叶尼塞斯克,10月13/23日至12月21/31日;——伊犁斯克,1693年1月23日/2月2日;——(伊尔库次克1693年2月11/21日至3月7/17日,《伊尔库次克州首府编年史》,第3页正面);——尼布楚5月22日/6月1日至7月19/29日;——齐齐哈尔9月12/22日至9月28日/10月8日;——张家口10月27日/11月6日;——北京1693年11月3/13日。中国宫廷、第15章、第2页正面及第6页正面。

下面是西方版本相应的对照表:

托波尔或托波尔斯科7月1至22日,勒·勃伦前引著作,第106页;《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21及27页;——叶尼塞斯克10月12日,勒·勃伦前引著作第116页;10月21日至1693年1月,《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51及53页;——伊尔库次克2月11日至3月1日,勒·勃伦第121—122页;《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67及69页;——尼布楚5月20日,勒·勃伦,第126页;《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80页;动身,7月18日,《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87页;——齐齐哈尔8月12—28日,《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99页以下;——北京11月3日,前引著作,第128页以下。

莫斯科1692年3月13日;——托波尔斯科7月1日至22日;——叶尼塞斯克10月12日;——伊尔库次克1693年2月11日至3月9日;——尼布楚5月20日至7月18日;——齐齐哈尔8月末至9月;——张家口10月27日;——北京1693年11月3日。布兰德:《中国概述》,汉堡、1698年、12开本、第7—132页;同上作者:《出使日记……》,伦敦,1698年、8开本、第3—83页。布兰德记的也是俄历而没有加以说明。

36 大使院。

37 中国宫廷、第15章、第6至15页;《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128—132页;布兰德,德文版、第132—137页;英文版、第816—884页。

38 中国宫廷,第15章、第19至23页背面。

39 下面是观见的日期:11月14/24日;11月15/25日;11月17/27日;1693年12月12/22日;1694年2月16/26日。中国宫廷、第15章、第24—30

页背面；31—46页正面。

40 经过耶稣会神父问他是否会德语、拉丁文、意大利语或葡萄牙语。“我回答说，我只会说俄语、德语和弗拉芒语，稍微听懂意大利语。”《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134—135页。耶稣会神父是张诚和安东尼·托马(徐日升?)，同上书。觐见日期是11月16日，同上书；11月17日，布兰德，德文版，第140—147页；英文版，第87—88页。

41 这件事只有西方的著作提到，例如伊兹勃兰德和布兰德的著作；官方报告没有提到这一点。《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132—137页；布兰德，德文版，第145—146页。还要指出的是，各种叙述并不相符；照大使的说法，人家是问他关于冈明我神父的事；据布兰德的说法，是关于三年前有几个耶稣会教士(阿夫瑞尔神父和薄贤士神父)试图从莫斯科和俄国到中国来的事(见下文第8章)。

42 中国宫廷、第15章、第31页至35页。

43 同上书，第38页。

44 同上书、第39页背面至46页正面；1694年正月，《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147—148页。2月16日，布兰德，德文版、第160页以下；2月18日，英文版，第100页。

45 中国宫廷、第15章、第46页背面及47页正面。

46 同上书；《北方游记集》，第8章、第155页；布兰德，德文版、第173页；英文版，第106页。

47 张家口1694年2月底；——齐齐哈尔3月28日/4月7日—4月9/19日，中国宫廷，第15章、第47页背面，第48页正面；——额尔古纳5月19/29—20/30日，同上书第57页；——尼布楚6月4/14日—7月26日/8月5日；——伊尔库次克8月1/11—4/14日；——叶尼塞斯克8月26日/9月5日；——那里穆柏兴9月26—27日/10月6—7日；——苏尔古特10月4/14—6/16日；——托波尔斯克11月19/29日—12月16/26日；——莫斯科1695年2月1/11日，中国宫廷、第15章、第57至59页。

齐齐哈尔3月22日，《北方游记集》，第8卷、第155页；——额尔古纳5月27日；——尼布楚5月31日—8月5日；——伊尔库次克8月12—17日；叶尼塞斯克8月26日；——托波尔斯克10月29日；——莫斯科1695年1月1日，同上书，第155—170页。

齐齐哈尔3月30日—4月14日，布兰德，德文版。第175页；英文版，

第 107—108 页 3 月误为 5 月；——尼布楚 6 月 2 日—7 月 3 日，德文版、第 181 页，英文版、第 111 页；——伊尔库次克 8 月 1—5 日，德文版 185 页，英文版、113 页；——叶尼塞斯克 8 月 25 日—9 月 1 日，德文版、第 187 页；——托波尔斯克 11 月 24 日，德文版、第 189 页；11 月 20 日—12 月 17 日，英文版、第 116 页；——莫斯科 1695 年 2 月 1 日，德文版、第 191—192 页；英文版、第 117 页。

48 博克达汗的大臣们交给伊兹勃兰德的拉丁文条款以答复伊兹勃兰德所呈递的条款，并未记载在大使的公务日志中，亦无（俄文）译文记载在公务日志中，呈报殿下的公务日志摘要中亦无记载；作为报告呈递的公务日志摘要中明白宣称，伊兹勃兰德并未从中国人处获得任何对于条款及条约（尼布楚条约？）的书面承认，亦无中国可汗对殿下来函的答复……殿下来函已经启封，连同礼物被可汗之大臣们退回，因为在这封信中，殿下的头衔写在可汗的头衔前面。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

49 参阅《证明文件》。这是一条俄文附注，写在信封上和中国信纸的下面，其中注明送交使节部的日期，并说这封俄文信同找不到的那封拉丁文信件内容相同。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1692 年 1 月 29 日。

50 一个法国耶稣会教士对伊兹勃兰德说，博克达汗非常乐意接受和平，他具有同殿下们保持和平的强烈愿望，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考虑任何有害于沙皇陛下的城市的行动……中国宫廷、第 15 章、第 50 至 52 页背面。

51 中国宫廷、第 15 章、第 55 页正面。

52 参阅《证明文件》里的正文。

53 关于技术词儿“В костках”，“Тюмовая, Одонпортищная китай-ка”，参阅加恩，《……帐册》，巴黎、1911 年、8 开本、第 44 及 47 页。

54 中国宫廷、第 15 章、第 56 及 57 页正面。

55 按照（中国）习惯行一系列礼节。训令，中国宫廷、第 14 章、第 56 页背面（这种礼节就是叩头或三跪九叩，逐字译是用额头叩地；但俄语 *tchélo-bitié* 指的是同一动作，意思却是请愿而不是匍伏在地。）

56 参阅第 8 章注解。

57 阿夫瑞尔神父：《为探访前往中国的新路旅行欧亚各国游记……》，巴黎、1692 年、4 开本。参阅《参考书目》及科尔迪埃《辞典》，第 2 版、第 2088—2089 条。

尤其要参阅下列各书：(1693年版)第3分册、第167—169页；第2分册、第136页；第3分册、第141—145页，等等。

58 《蒙古北部和东部》，阿姆斯特丹，1692年、对开本，第2版、1705年。关于韦特森、他的书和他的地图，参阅上引著作，第2版、第3卷、第1945条，以及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载《科学使团的新档案》，新丛书、第1分册。巴黎，1910年、8开本、第58—61页。

59 《中国编年简史或历代中国皇帝年表，附1693/94至98年间莫斯科公国使节伊兹勃兰德从莫斯科陆路前往中国旅行简记，引言为神父、医学博士克里斯蒂亚纳·门泽利奥所写》，(原为德文)柏林，1696年、8开本。

从第141页到145页上写着：附录：从莫斯科陆路前往中国简记，或莫斯科使臣伊兹勃兰德如何取道前往中国，以及他在公元1693/94和95年来回途中在若干民族面前的遭遇。(原文为德文)

参阅梅若夫：《西伯利亚书库》，第2卷、第12452条；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卷、第559—560条。

60 《中国近况》，莱布尼兹编辑，1697年8开本；第2版1699年8开本。在第163—170页有：1693、94、95年莫斯科使臣中国之行简述(伊兹勃兰德使团)。(原文为拉丁文)。

参阅贝克曼：《旧旅行记文献》，哥廷根，8开本、2卷，第1卷、1807年，第2卷、1810年。第2卷、第446—471页内有伊兹勃兰德和布兰德的详细传记。

61 布兰德是吕贝克人。他曾在德国和丹麦旅行，后来定居于故乡，在那里发家致富。见贝克曼前引著作，第2卷、第463—464页。

《中国旅行概述……亚当·布兰德的亲身见闻》，汉堡，1698年、12开本；《莫斯科公国约翰及彼得·阿历赛维奇皇帝陛下派遣大使由陆路至中国之出使日记》，由亚当·布兰德撰写……译自标准德语原文，1698年、印于汉堡……1698年、伦敦、8开本；《俄国沙皇陛下的政府代表使节通过长途陆路和水路从莫斯科到中国》(原文为荷兰文)，提埃尔，1699年8开本；《俄国女皇陛下于1692、93及94年派遣至中国皇帝处之使臣伊兹勃兰德旅行记》，阿姆斯特丹，1699年、8开本。

参阅梅若夫前引著作，第2卷、第12456—12460号；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3章、第2092条；第4章、第2466—2470条。

62 《伊兹勃兰德自莫斯科由陆路至中国三年旅行记》(原文为荷兰文)，

阿姆斯特丹、1704年、4开本，地图；《由陆路从莫斯科至中国三年旅行记……由莫斯科国沙皇派至中国皇帝处之大使伊兹勃兰德·义杰斯阁下撰写……荷兰文印刷，由前驻英大使、市长韦特森监印；现忠实地译成英文……》，伦敦、1706年、4开本，地图；同上书德文版、法兰克福、1707年、8开本，地图；《高乃依·勒·勃伦经由莫斯科国前往波斯及东印度群岛旅行记……附有莫斯科公国大使伊兹勃兰德经俄国及蒙古至中国的旅程……》（第1卷，第17章至第30章、第100至143页）。阿姆斯特丹、1718年、对开本、2卷，地图。参阅梅若夫前引著作，第2卷、第12448、12450、12451、12455、12461、12462号；科尔迪埃前引著作，第4章、第2467—2470条。

除了这些著作和前引贝克曼的著作以外，还可对伊兹勃兰德的生平和著作参阅下述一书：科尔特，《俄国地图测绘史料》，由基辅古代文献研究委员会编辑，第1分册、基辅、1899年；第2系、第2分册、基辅、1906年、对开本；第2系、第2分册、第26—28页。

伊兹勃兰德从中国回来以后，曾为俄国舰队造船。1697年6月9/19日、1698年3月22日/4月1日、1699年3月1/11日、1700年3月26日/4月6日有计算书。他大约死于1709年以前，因为1709年9月24日韦特森给居伊佩的一封信上谈到他时，把他当作已故的人。见科尔特前引著作。



第四章

十八世纪最初二十年间 在中国的俄国商队

史料来源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4章、第158页正面至162页背面；散页，1697年、6月14/24日，1697年1月13/23日；信件1704—1711，1704—1717；中国事务、1717年10月10/21日；1718—1719；1725年、第4号；《伊尔库次克州首府编年史》。

《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第5卷；《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号；《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历史记载》，第1—2卷，散见各处；《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及第4卷，散见各处。

韦伯：《改变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版，4开本；同上作者：《关于大俄罗斯现状的新回忆录》，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同时出版，1725年、2卷、12开；克里格尔：《最初一百年的俄中外交》，柏林、1904年、8开本。

我们知道（见前第二章）自尼布楚条约订立时起，至1698年11月俄国改组官方对华贸易时止，每年俄国都有商队前往北京。这一时期派遣的头几次商队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评述过了。从十八世纪起，虽然我们对国家商队所经营的商业还有许多重要的

细节不明确或者不知道，但是这些商队每两年总要正规地进行登记；关于领队的姓名，他们旅行的起止日期（虽然不一定知道他们在北京停留的日子），他们所取道路的片段记载，以及若干商业情报，可以使我们勾划出他们的历史轮廓，并看出少数特征来。

十七世纪末，在俄国有定期的商队来华以前，俄国和中国的官方之间已经有了来往。不过使者的身分令人难以分辨：商人担任外交谈判工作，外交人员也由商人伴同前来。直到1698年为止，外交档案提到的似乎只是普通的信使；从1698至1718年，根据档案可以确定有十次国家商队到过北京：1698年郎古索夫和萨瓦齐耶甫商队；1700年博科夫和奥斯考尔考夫商队；1704年萨瓦齐耶甫商队；1706年奥斯考尔考夫商队；1708年库迪阿科夫商队；1710年萨瓦齐耶甫商队；1712年库迪阿科夫商队；1714年奥斯考尔考夫商队；1716—1717年古谢特尼科夫商队；最后在1718年是伊芬商队。

伊兹勃兰德·义杰斯还没有离开北京（1694年2月19/3月1日），索额图和理藩院就于康熙33年2月5日即1694年2月28日分别致书尼布楚新任长官彼得洛维奇·噶噶林亲王，谈到关于逃亡者和俄国日后派使者前往北京的问题¹：从今以后中国不允许随同大使级使臣前来的人员超过200人，商人不算在内；而由尼布楚或其他地方来的使臣，随带人员不得超过50人²。这些信件中有一封³提到一个名叫“依夫多金”的人返回西伯利亚，信件由他带走；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人是噶噶林的仆人还是义杰斯随员里的一个商人。

1694年下半年噶噶林派遣一个事务官前往中国，由于他发表了有关这次出使的一篇记述，比较为人所知⁴。1694年7月5/15日沙皇下了一道谕旨，由尼布楚长官的训令给予补充，使尼布楚的大贵族阿格皮特·拉里诺夫·波罗特尼科夫携带一封信（清单）

到北京去⁵。波罗特尼科夫取道满洲和张家口于1694年10月31日/11月10日到达北京，他在北京一直停留到1695年1月24日/2月3日⁶；然后由原路于1695年5月4/14日回到尼布楚。他去的目的是索取逃亡者；中国皇帝的大臣对他说，这件事已经口头同“埃莱阿查尔·伊兹勃兰德”谈过，也写信通知过尼布楚的长官（见上）；中国的大臣就此事交给他一封信，让他转交噶噶林。

大约在这段时期里，曾有两次远征，一次似乎是外交性质的，另一次是商业性质的，但这两次远征的确切日期均无法得知。1701年2月1/11日曾向尼布楚新任长官贝必科夫发出了特别训令，命令他设法结束伊尔库次克大贵族伊西多尔·切斯塔科夫的事件，这个大贵族带着一封信（清单）于203年（1694—1695年）前往中国，归途被哥萨克人杀害⁷。切斯塔科夫是伴同波罗特尼科夫前往中国的，还是应把他看成是那个于1694年经过伊尔库次克的商队中的一员？我们无法确定。“葛斯奇”巴西尔和阿列克西斯·费拉切夫大概是当时整个西伯利亚的重要批发商人，因为在十七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在西伯利亚的各处地方，都曾提到他们的雇员⁸；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在索里嘉木斯克经营盐业时，也曾经是“阿列克西·阿斯塔费（意即幽斯塔斯的儿子）·费拉托夫”的座上客⁹；他们的人员有的甚至和喀尔木克人来往并到中国去¹⁰。1693年3月16/26日给伊尔库次克长官的一道谕旨，命令他让一队二十人的商队通过，这个商队从莫斯科来，是属于葛斯奇阿列克西斯·费拉切夫的。一个雇员把这道命令于1694年9月28/10月8日带到伊尔库次克¹¹。由于义杰斯从伊尔库次克到北京在路上曾用了6个月以上的时间（从1693年3月7/17日至11月3/13日），因此我们有理由断定在1694年初冬时经过伊尔库次克的商队，不太可能在1695年的头几个月到达北京¹²，因此切斯塔科夫大概是能够在203年（1694—1695年）加入到这个商队的。

从郎古索夫和萨瓦齐耶甫商队起(这个商队于1698年年底至1699年年初在北京),开始有一系列的政府商队定期到中国去,关于这些商队,中央档案提供了一些资料。1696年6月14/24日沙皇命令使节部的部长、杜马的秘书官乌柯兰斯索夫¹³打发“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的商人斯皮瑞东·郎古索夫带着财政部的貂皮和其他毛皮到中国去¹⁴。但是直到1697年2月才有几个关于这个商队的官方文件,例如,发给郎古索夫及其伙伴切洛瓦尔尼克(即宣誓评价员¹⁵)格鲁基克和聂恰耶夫斯基的通过西伯利亚的许可证(谕旨的日期是1697年1月13/23日,完成日期是1697年1月25/2月4日)¹⁶;进入蒙古的护照日期是1697年2月4/14日;致呼图克图的介绍信是1697年2月6/16日¹⁷。就他们此行而给伊尔库次克长官和尼布楚税务督办的命令也是在1697年2月间发布的;这些命令中有关于这个商队的非常有趣的资料。发给伊尔库次克长官的命令(1697年2月8/18日、15/25日和3月23日/4月3日)¹⁸列出了交给官方商人发售的商品种类,指定他们应走的道路:商品是俄国宫廷由贡品及什一税征课而来的毛皮;道路则经由尼布楚和满洲,因为色楞格斯克和蒙古的路线由于中国和喀尔木克人之间战争而堵塞了。1697年2月16/26日发给尼布楚税务督办的备忘录明确了上述命令¹⁹;这貂皮和黑狐皮应全部交给郎古索夫带到中国,以换取中国的金、银、锦缎和南京棉布,带回的物品在进入西伯利亚时,应交付通常的关税²⁰。

这个商队包括二百八十九名伙伴、秘书、雇员、仆役,一百八十九名商人和工人,总数近五百人(四百七十八人)²¹。商队估计最迟于1697年年底由莫斯科出发。1698年4月8/18日郎古索夫在伊尔库次克转交了给当地长官的公函²²,并于1698年7月15/25日在尼布楚交出了1697年2月16/26日的备忘录²³。如按照伊兹勃兰德·义杰斯所用的时间计算(他于1693年7月19/29日由尼

布楚启程，于11月3/13日到达北京），郎古索夫大约于1698年10月或11月到达北京。他回到尼布楚时是1699年7月24，所以他离开北京时一定是在4、5月间。

回到尼布楚以后，郎古索夫的一个助手伊凡·萨瓦齐耶甫交给尼布楚行政长官一份关于在北京的贸易情况的简短而精确的报告²⁵。报告中写明毛皮，如松鼠皮、银鼠皮、狐皮、山猫皮和俄国皮革的出售价格；以及中国主要织物，如丝绸（锦缎）和棉布的买价。报告中也谈及中国银子中掺了铜，而且没有纯度检验印，黄金稀少而且价格昂贵，这两种物品在俄中商业交易中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交换。报告又说中国人甚至抱怨说通常的俄国商品积压过多，俄国商队来得太频繁，每两年或三年来一次就很够了。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俄国进行的贸易并未征收任何赋税，商务进行迟滞曾引起物议，但似乎并未阻挠俄国商务的进行。

从一个非常奇特的间接报道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上结论。一些“希腊人”和俄国人，“葛斯奇”巴西尔和阿列克西斯·费拉切夫的经纪人，他们是否这个商队的组成人员呢？他们曾经通过中亚细亚、准噶尔和喀尔木克人的领土而在喀尔木克人那里定居下来吗？总之他们中的一个希腊人保尔·伊凡诺夫于1699年从中国回来时，宣称他在中国可以很自由地进行贸易。另一个希腊人伊凡·安德烈夫以及俄国人伊凡·图尔卡、巴西尔·普罗科贝夫和彼埃尔·维尼狄克多夫也象保尔·伊凡诺夫一样，在喀尔木克人的首邑定居下来²⁶；他们虽然没有按照保尔·伊凡诺夫的榜样，改宗伊斯兰教，而且改换名字（保尔·伊凡诺夫改名摩拉德），但他们至少是与不信正教的妇女结了婚，而且除了贸易获利以外，对一切都置之不顾。可是他们的老板葛斯奇商人，对于他们这样成家立业（或许是损害老板的利益而致富的）感到不满，上书沙皇要求将他们召回来，沙皇也担心他们的信仰，批准了这一请求（1701年9月6/17

日)27。

关于郎古索夫商队的最后一个反响可见于以后几年的政府档案，即那不断重复的对政府欺骗、作伪和盗窃的控告。1699年1月22日/2月1日给尼布楚长官的一道谕旨，命令他向商人执行207年(1698年11月12/22日)的关税税率，即征收什一税²⁸。应该相信命令并未很好执行，因为在1701年1月5/16日给尼布楚长官的分成条文的训令中，曾列举其下属各种渎职和违法行为²⁹，郎古索夫的伙伴们曾带回中国烟草和其他各种当地产品，尼布楚的税务督办彼埃尔·库迪阿科夫容许这些货物通过而未征税；有一些人用假名离开那里；还有一些人不顾谕旨三令五申，没有等待随后到达的官方商队。

随后到达的商队就是格利高瑞·提莫菲爱夫·博科夫商队。博科夫是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的商人；这个商队的人员还有格利高瑞·阿法那瑟夫·奥斯考尔考夫以及两个宣誓评价员：卡达切夫的米契尔·古谢特尼科夫和奥索列的格利高瑞·皮沃瓦罗夫。发给他们护照的谕旨签署的日期是1699年1月27日/2月6日³⁰。伊尔库次克城的《编年史》记载博科夫及其商队于1699年10月经过该地，1700年动身，1701年从中国回来³¹。

几年后，奥斯考尔考夫曾提供了有关这个商队的有趣的资料，否则我们只能满足于前述简单的情况了。在1706年，有人在北京问他来华的路线，他说他同博科夫是经由尼布楚、齐齐哈尔和满洲走的，这样绕道走，由尼布楚到北京要用150天，即五个月或更多一点³²。而走蒙古一线，即经色楞格斯克、库伦、戈壁、张家口到北京，较为直接的路线，只要七十天；因此，尽快地采用这一路线合乎俄国人的利益。

因此博科夫的后继者赶快就采取这一路线。他的后继者是曾与郎古索夫一同来中国的萨瓦齐耶甫。伊尔库次克的《编年史》上

记载,他于1702年(年底)至1703年曾停留在该城,1704年8月由中国回来³³;他大概于1705年回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他于1704年5月16日和6月13日在北京;因为理藩院给安德烈·维尼阿斯的信件上签署的是这两个日期³⁴,信中说带信的人是萨瓦齐耶甫³⁵。其中一封信是关于逃亡者的问题;第二封是回答维尼阿斯的信,维尼阿斯曾写信给索额图,请求允许萨瓦齐耶甫商队取道齐齐哈尔前往中国,并请求给以护送³⁶;同时函中还谈到理藩院希望今后官方书信都投送理藩院,这事早已通知尼布楚的长官³⁷,后者没有通知俄国宫廷,这是远离中央政府的官吏的许多过错之一。第三封信签署的日期也是康熙43年4月13日即1704年5月16日,信中说应伊凡·萨瓦齐耶甫的请求,把他由长城的张家口遣送回国,并取得蒙古首领土谢图汗的领土鄂尔浑河和土拉河;以后,商队经由蒙古走时,必须在土谢图汗处停留,他要查问商队的人数以禀告中国皇帝,因为商队的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³⁸。最后一封信写于康熙43年5月12日即1704年6月13日,信中又强调了关于名额的限制,并且说是由于上次商队人多,秩序紊乱,才提出这种限制的³⁹。

政府虽然对萨瓦齐耶甫商队没有发出多少命令⁴⁰,但对于下一次的商队却并不如此。1704年1月11/22日,沙皇的一道谕旨命令当时的使节部首长柯罗文为下列诸人准备护照:埃朗特夏的商人格利高瑞·阿法那瑟夫·奥斯考尔考夫、卡达舍夫的米契尔·古谢特尼科夫,以及宣誓评价员两人;乌斯蒂尤的伊利亚·基林和埃朗特夏的艾披凡尼·裘基特切夫⁴¹。他们奉命携带财政部的貂皮和毛皮(保存在西伯利亚部)到中国去交换中国商品。他们的俄国和蒙古护照的签发日期是1704年1月28、30和31日(2月8、10、11日)⁴²。奥斯考尔考夫也许于1704年10月12/23日在伊尔库次克会见了萨瓦齐耶甫,后者告诉他进入中国应走的最好

的道路⁴³。虽然由于商队超出了中国限定的二百人的名额⁴⁴，奥斯考尔考夫的一部分同伴被截留在边境上，但被允许的二百人却得以通过蒙古抵达了北京。1706年4月28日/5月4日，理藩院交给奥斯考尔考夫几封致西伯利亚部的首长西奥多尔·乔治维奇·罗曼纳多夫斯基的信件⁴⁵。在康熙45年3月16日（1706年4月28日）的信中，理藩院通知俄国，奥斯考尔考夫声明他愿意走经由蒙古的路线，不愿走经由满洲的路线，既然如此，今后俄国商队就只能走鄂尔浑河—土拉河这条唯一的政府准许的通路了。但是尼布楚的长官由于通过从尼布楚到齐齐哈尔的商队取得的私利被剥夺，因此曾出面抗议并要求理藩院仍旧维持传统的商队路线。奥斯考尔考夫坚决不肯走旧路，提出沙皇的命令叫他走最短的路，并引用萨瓦齐耶甫口头传达给他的情报作理由。理藩院处在两个互相矛盾的主张中左右为难，于是就请俄国政府裁决⁴⁶。

在奥斯考尔考夫归国以前，俄国宫廷又任命了商人米契尔·葛林为售货者。伊尔库次克的《编年史》记载他于1704年10月16/27日到达该地，1706年离开伊尔库次克。的确，1706年3月17/28日发给科罗文的一道谕旨命令他为葛林及其同伴准备护照，但是同年5月18/29日的另一道谕旨说明葛林被指定为雅木柴夫集市的税务官，他的工作由彼埃尔·罗丁诺夫·库迪阿科夫接替⁴⁷。

库迪阿科夫进入蒙古的护照签署日期是1706年5月27日/6月7日⁴⁸。伊尔库次克的《编年史》记载他于1707年离开该城，同尼布楚的大贵族卢加西·科察马罗夫一同赴华，并于1708年返回⁴⁹。他回到伊尔库次克一定是在1708年的年底了，因为1708年6月13日他还在北京，理藩院交给他四封转交给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的公函。1707年2月噶噶林曾给理藩院写信，要求进入北京的人数比200名增加一些⁵⁰，康熙47年4月25日（1708年6月13

日)理藩院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防止秩序混乱。但从康熙43年3月份(1704年4月4日至5月4日)起,中国皇帝的一道圣旨规定了准许俄国人取道蒙古进入中国的条件,理藩院正式获悉尼布楚长官曾因竭力反对采取经过蒙古到中国的路线而受到严词斥责,于是批准了一切官方商队来华和归国时都可以走比较近的路线⁵¹。

库迪阿科夫的后继者是“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商人伊凡·萨瓦齐耶甫,他已经两度到过中国⁵²。他的护照的日期是1708年3月18/29日和3月28日/4月8日⁵³;他于1710年经伊尔库次克去中国,1711年由中国回来⁵⁴。康熙49年4月25日即1710年5月23日,理藩院给噶噶林的一封信上曾提到过他到达北京⁵⁵。

接替萨瓦齐耶甫的又是一个熟悉中国的惯客和商队的老伙计:库迪阿科夫。决定派遣他去的谕旨(1710年6月14/25日)任命他为“商务专员”,这即是说,他是政府委派的商队的首长,又是初审法庭的法官⁵⁶。他于1711年4月9/20日通过伊尔库次克⁵⁷;人们追随他来到中国,理藩院于1712年6月9日交给他一封长信,叫他转交给噶噶林亲王,信中中国人注意到“专员”的头衔以及沙皇授与他解决俄中两国商人间的纠纷的代表权;理藩院同意专员的请求,批准商队可以在经由蒙古走一条比较近的路线,并同意必要时每一商队的名额可以稍微增加(由二百人增至二百二十人);理藩院也同意为了防止滥用证件和进行抢劫,只允许带有政府证件的商人进入蒙古。前一商队曾在北京住满八十天,接着又获准延长在北京的居留期⁵⁸。库迪阿科夫的商队受到的待遇不会更差些。他的商队于1713年再度经过伊尔库次克⁵⁹。

在这一商队以后,奥斯考尔考夫奉命再度来华(1711年2月28日3月11日的谕旨)。他的护照的日期是1711年6月4/15日⁶⁰;1711年8月20/31日枢密院于莫斯科发表公告,招人参加官方商

队⁶¹。当1712年3月16/27日沙皇传令枢密院考查乌斯蒂尤的尼基塔·潘克拉切夫所说的他知道有一条新路线通往中国是否属实时⁶²，奥斯考尔考夫可能还没有启程，因为伊尔库次克的《编年史》只于1713年提到他⁶³。他应于这一年的年初启程，因为中国派往土尔扈特的使臣图理琛（参见下一章），曾于1713年2月10日以前在色楞格斯克遇见过他⁶⁴。不管怎样，他于1714年秋季一定是在北京，因为理藩院交给他几封信件，日期是康熙53年8月8日即1714年9月16日，和康熙53年9月2日即1714年10月9日。这些为数众多的信件（第一个日期的就有6封）不只谈到私逃者的问题，而且也谈到与商队本身相关的问题。虽然奥斯考尔考夫努力企图使中国批准每一商队可以有四百人进入北京，但是中国坚决不允许超过二百二十人。信件还揭露了尼布楚长官所玩弄的新骗局，他用他的上司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的名义向中国要求并获得批准让一个商队通过满洲到中国来；这一要求正与噶噶林亲王的训令相反，他以前曾向中国要求只应接纳持有盖着伊尔库次克或色楞格斯卡的印章证件的商人。今后，理藩院在每次商人回到中国时，都要求新的证件，而且要附有蒙文译文⁶⁵。商队于1715年返回伊尔库次克，但是奥斯考尔考夫没有回来，他在归途中死亡⁶⁶。商队于同年年底抵达莫斯科⁶⁷。

据现在已知的情况，很难确切断定这些商队在北京到底停留了多久，但是可以肯定1716年的商队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大超过了1710年萨瓦齐耶甫商队的两三个月时间。这次商队的领队是米契尔·雅克夫列夫·古谢特尼科夫，1714年2月8/19日的谕旨任命他为“商务专员”。在这一谕旨中又包括一项新的规定：商务专员不再支取固定薪金，但可以携带免交三千五百卢布以下关税的进出口货物，宣誓评价员则可免税至一千卢布⁶⁸。商队于1715年9月1/12日到达伊尔库次克⁶⁹。1716年的夏季，它大约还没有

离开色楞格斯克，因为这时俄国宫廷又正式委派了两个外国人到北京去，8月14日这两个外国人在这里同商队会合；他们是英国医生托马斯·卡尔文(哈尔文?)和瑞典人劳伦特·郎克⁷⁰。郎克肯定商队于1716年11月11日进入北京；他的佐证可由理藩院康熙56年7月20日即1717年8月26日的信中得到证实，信中说古谢特尼科夫于上一年10月(即1716年11月14日/12月14日)到达。他肯定在北京逗留到1717年8月26日，因为理藩院给噶噶林的信是由他转交的⁷¹，而且伊尔库次克的《编年史》到1718年才记载他已回来⁷²。理藩院这些信件使人可以知道俄国在北京经商情况的概要，令人很感兴趣。以前俄国人和名叫监督的中国官员打交道，这些监督使他们与买主取得联系。货物成交采用延期付款的办法。遇有纠纷或到期不付款，由监督裁决⁷³。“上一年”，即1716年，俄国人由于不能收回中国商人的债款，曾把这事提交监督，监督将此事禀陈中国皇帝。康熙皇帝把中国商人关起来，决定从内库拨款偿付他们的债务⁷⁴。但是为了避免同样不愉快事件的重演，理藩院决定以后除了现款交易外，别种交易方式概不批准，而且今后监督再也不担任负责的中间人。理藩院甚至想对未售出的俄国商品征收税金，但由于古谢特尼科夫的抗议并未实行。古谢特尼科夫还留下一张俄国商品及其价格的表格，很幸运，这张表格的一分抄本仍然保存在莫斯科外交部的档案中⁷⁵。拿这张表格与1695年义杰斯⁷⁶及1699年萨瓦齐耶甫⁷⁷的简要报告，以及以后的帐目⁷⁸对照来看，这张表格一方面显示出俄国对有关中国金银价格的资料的精确性日益增加⁷⁹，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看出北京市场上商品种类及其价格的变化。虽然在精确的估价和折换等等方面存在着困难⁸⁰，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由1699年至1716年的二十年当中，俄国商品的价格跌落5%至60%，而中国商品仍大体维持原来的价格⁸¹。市场需要的主要商品仍然不变；俄国人总是

带来按千张计算的松鼠皮，按百张计算的黄鼠狼皮，各种狐皮（北极狐、草原狐、红狐）论张计算，貂皮和山猫皮也论张计算；他们换取中国人的锦缎和南京棉布；可是在1716年的表格上记载了每一类商品的细目（勒拿河的红狐，西伯利亚红狐，褐狐；黄鼠狼及被称为“lastotchki”的小黄鼠狼），新的商品也出现了：海马牙（鱼骨）、大茴香子和茶叶。1699年和1716年一样，中国的金银在交易中起重要作用：这是由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彼得大帝政府感到迫切需要贵金属和硬币。

中国政府除了对俄国商人行为不端特别感到不满以外，还对其他较为一般性的关于商业的事情不满：北京的毛皮太多了；它们同其他欧洲商品一道由北方、蒙古及满洲运来，又由外国船只从南方、广州或福建运来。为了避免进货拥挤和产品过剩，中国提出两种措施：把抵达北京的官方商队的间隔期拉长一些，只准许持有西伯利亚总督签署的合法证件的大商人；其他商人只容许在远离帝国心脏的北方边境上的贸易中心进行交易，如满洲的齐齐哈尔或色楞格斯克等处⁸²。因此理藩院于康熙56年9月6日即1717年10月10日的信中，最后一次准许以巴西尔·伊芬为首的商队进入中国，噶噶林为这一商队入境而提出请求的信件，北京于1717年8月31日（康熙56年7月25日）收到⁸³。新的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于1718年7月29日/8月9日为西奥多尔·伊斯多甫尼科夫所率领的商队提出入境请求⁸⁴，但遭到了拒绝。因而这个商队被阻，停留在边境上好几个月。除了经济原因以外，中国还提出了严重的政治动机：对厄鲁特人的战争以及其所有各种后果。因而这一商队的历史比较其它商队更与中俄两个帝国的外交史有密切的联系，本书将予以说明（请参阅第七章）。

自从1698年重新组织对华商务到1718年这二十年间，有十次政府委派的商队相继定期到中国来，虽然现在已知的有关这些

商队的资料非常简略，但我们仍能从中发现它们的某些特征：有关它们的组成，所走的道路以及它们的一般情况等。

商队总是在一个为政府服务的大包揽商率领之下，这些包揽商或是葛斯奇，或是葛斯那亚·索特尼亚的成员⁸⁵，他们从1710年起，获得了“专员”的头衔，就是说，既是商人的代表又是初级法庭推事。他们以宣誓评价员或领队助手的职务度过见习期，然后他们第二次来华时自己就可以成为专员了。下列诸人都是如此：萨瓦齐耶甫，1698—1699年是郎古索夫的同僚，1704年和1710年是领队；奥斯考尔考夫，1700—1701年是博科夫的伙伴，1706年和1714年任专员；库迪阿科夫，先是尼布楚的税务督办，1708年和1712年担任专员；古谢特尼科夫，1700—1701年是博科夫商队的宣誓评价员，1707年是奥斯考尔考夫的助手，1716—1717年担任专员⁸⁶。如果商队至少须由四人（专员和他的一名助手、两名宣誓评价员）来管理，其原因就是不允许它有人数众多的随从人员。开始时它的名额几乎有五百人，包括商人，以及他们所雇用的工人、雇员、家仆等等。由1704年起，中国不准许每一个商队的人员超过二百或二百二十人。可是人数最少的由一个葛斯奇组织而由国家赞助的商队，或者由西伯利亚行政长官派去中国的人数最少的一支商队，也还包括二十至五十人。如果我们想到，利润的诱惑会使这种私人投机日见增加，而同时中国又似乎负担着这些人的食住费用，包括他们的牲口和马匹⁸⁷，又得派人护送他们来去，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俄国人急于要利用这种状况，而中国人努力想减少或废止这种不间断的开支了。

不过到1718年为止，中国并未反对合法的商队入境，甚至还给他们以方便。从额尔齐斯河走的路线被喀尔木克人封锁了，因此只剩下满洲和蒙古两条进入中国的路线。满洲路线是一条安全的路线，沿途有贸易中心如墨尔根和齐齐哈尔等处，商队很容易补

充给养和进行贸易；不过这条路线经由尼布楚和东部，要走一大段弯路，因此需要5个月的行程。因此自十八世纪初期，萨瓦齐耶甫于1704年归国时，奥斯考尔考夫于1705年往中国时，都选取了蒙古路线，这条路线明显地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尼布楚提出了若干抗议，但是从今以后尼布楚已被放到一边，色楞格斯克就成为商队进入中国的旅程起点了。这一改变的后果不久就显现出来：尼布楚的关税将失去经济方面的重要性，而蒙古则将成为俄、中两国经济竞争的场所。

各种经济因素，在十八世纪初期，不论在俄中两国的商务关系上起了何种作用，它们都是绝不足以解释两国在这一时期为什么建立这种正规交往，也不足以解释在这个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间他们为什么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会突然停止这种信任。我们必须从政治形势方面去追寻这种变化的原因。俄国官方商队的命运全部掌握在北京政府的手里，因为它完全依赖中国的好意照顾。由于中国全神贯注于它在中亚细亚的政治地位，因而它一心想谋求那些介于它和俄国之间的各个部族的中立态度或企图在政治上控制它们。所以，我们应该依次研究中国在这些民族间所作的努力，俄国人是如何对待这些部族中最为强大有力的喀尔木克人的，以及所有这些努力在俄中关系上产生了何种影响。

注 释：

1 203年(1695年)1月20/30日从西伯利亚部转送四封蒙文信、三封拉丁文信给使节部翻译。信件的原文是用中国纸写的，已经交还西伯利亚部。译文在中国宫廷、第14章、第158页背面至162页。

这三封信中只有一封的日期是：“康熙33年11月5日”，另外两封是“5月2日”。这后一种形式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三封信全都有公历日期，即1694年2月28日与前注日期相当；这个公历日期大概是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写上去

的。

2 (原俄文略),中国宫廷,第14章,第162页。

3 第2封,中国宫廷,第14章,第161及162页正面。

4 手稿内有尼布楚档案抄本,属帝国科学院所有,载《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号、XXXI、第276至283页。

5 同200年(1691—1692年)到北京的是同一个人,参阅第3章。

6 下面是他的详细的路途:额尔古纳1694年7月16/26日;——卡马里克(尼尤尔河或尼奥尔河)17/27日;——哈尔古盖7月22日/8月1日;——德尔布尔(特尔布尔)7月24日/8月3日;——冈河(额尔古纳河右边的支流)7月28日/8月7日;——尼奥曼分水岭(努曼—达巴坎)及尼曼河(努曼比拉)(诺曼河,诺尼河右边的支流)8月3/13日及6/16日;——齐齐哈尔8月18/28日—9月25日/10月5日;——托尔(托洛或塔奥尔,见1903年拉法伊洛夫—博尔谢夫的俄国地图;——托洛或塔奥尔,见1900年马图索夫斯基—布雷奈德的俄国地图;——托洛乌苏,见维达尔·拉布拉什地图第122C图)10月1/11日;——喀喇科通边城(多隆诺尔?)10月23日/11月2日;——张家口10月24日/11月3日;——北京1694年10月31日/11月10日。

归途:北京1695年1月24日/2月3日;——张家口1月30日/2月9日;——齐齐哈尔3月7/17日—14/24日;——额尔古纳河4月21日/5月1日;——尼布楚5月4/14日。

《史料补遗》,第4卷、第67XXXI号、第276—283页。

7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35号、第5节、第143页。

切斯塔科夫大概于7203/1695年4月20/30日从伊尔库次克动身。见费菲洛夫关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逃亡者问题的一个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1725年11月3/14日于托波尔斯克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2号。

8 1687年5月9/19日柯罗文大使遇见费拉切夫的一个雇员伊多姆斯克依,后者刚从雅克萨回来。中国宫廷、第10章、第170至172页背面;参阅第3章注解。

9 布兰德、德文版、第20—30页。

10 参阅上文第88、89页。

11 《伊尔库次克州行政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章、第217号、第

372—373页。

12 梅莱蒂伊主教在他的著作《十七及十八世纪的东正教及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及中国的教会事务组织》，梁赞，1901年，8开本，第53页中，肯定这个商队于1696年在北京，可惜他没有标明出处、发文的官府及参考资料。

13 乌柯兰斯索夫起先是使节部的秘书（1674—1689年），后来是这个部的大臣，兼杜马的秘书官，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臣”（1699），1707年任驻卢布林（波兰）公使，1708年9月12/23日死于匈牙利。参阅比耶洛库罗夫：《使节部论》（俄文），莫斯科，1906年，8开本，第114—115页。

14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1696年6月14/24日。

关于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参阅上面第2章注解。

15 俄文宣誓有拥抱或接吻之意，因为宣誓时要亲吻十字架。宣誓商之职起初设于十五世纪末，职务是课税和发售国库专卖商品，他们兼管财务和警务。在十八世纪时，他们以商品评价员（priseur）和宣誓商（vendeur-juré）的名义伴同商队领队人前往中国。参阅科托奇欣：《阿历克西斯·米哈伊洛维奇统治下之俄国》，（俄文）第1版、圣彼得堡、1840年，4开本，第7章，第76—78页。

16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1697年1月13/23日。

17 同上。

18 《伊尔库次克州行政档案》，载《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XXXIII号，第285—286页。

19 《尼布楚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60号、第470页。

20 关税应按照203年（1693年8月30/9月9日；参阅第2章）的条款办理，同前引。

另一份1697年6月17/27日发给同一人的备忘录，请他完备而精确地开列一份从中国带回来的金锭清单，并送一份副本到莫斯科；严禁从金锭里提取哪怕是最小的金块，应将全部金锭送到莫斯科；如果商人私有金子，将予以收买；如果他们藏匿不报，则将金子充公。《尼布楚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68号、第491页。参阅上面第2章。

21 尼布楚长官尼科勒夫给哥萨克马队十人队长库兹涅佐夫的备忘录，命令他去通知墨尔根（即嫩江）的中国长官，商队即将到来（1698年7月25/8月4日）。《尼布楚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补遗》，第12卷、第92号、第

397—398页。

22 《史料补遗》，第67XXXIII号、第285—286页；《伊尔库次克州首府编年史》，第5页正面。

23 《史料汇编》，第5卷、第260号、第470页。

24 1699年12月25日/1700年1月4日尼布楚长官尼科勒夫给沙皇的报告。《尼布楚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95号、第537—538页；第296号、第538页；手稿内有尼布楚文件的抄本，载《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XXXV号、第293—294页。

25 《史料汇编》，第5卷、第295号、第537—538页；《史料补遗》，第10章，第67XXXV号、第293—294页。参阅《证明文件》。

26 “乌尔加(urga),”在那个时代的俄国档案中,用作普通名词,指游牧民族首领的首都。参阅穆勒《文集》，第4卷、第194页：“瑯台吉的或喀尔木克的王府,人们统称为urga。”

27 这件事的有关文件如下：由秘书官格拉西莫夫副署、属于枢密官伊凡诺夫的本子,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88号、第530页、第1条；《托波尔斯克札记》，第3章、第129—134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13号、第68—75页；《克拉斯诺雅斯克札记》，第81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40号、第191至194页。

不幸的是,这些文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审核：那本历史文件的“本子”不明确地谈到1699年6月“长官们的训令”；托波尔斯克的札记里的日期是根据穆勒材料袋而来,看来有错误(1701年误为1700年?),但不知从何处才能找到这些材料袋来核对。

28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72号、第596—597页。

1699年4月30日/5月10日另外一个文件(给尼布楚长官一封公函的摘要)令人遗憾地证实：郎古索夫回来以后,中国货物应存放在木房子里。《尼布楚市政管理档案》，载《史料汇编》，第5卷、第287号、第519—520页。参阅前文第2章。

29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22号、第7、36、37节第95、115—116页。

3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1699年1月27日/2月6日。

31 《伊尔库次克州首府编年史》，第5页背面、第6页正面。

32 见下文第102页注46。

33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6页。

34 关于理藩院，参阅上文《绪论》。关于维尼阿斯，参阅上文第2章注解。

3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72号、1704a；第78号，1704年6；第69号，1704年r。这些信件，连同本章所要谈到的信件，都是用拉丁文在中国纸上写的，盖有中国皇帝的朱红色大印。参阅《参考书目》。

36 这封信指出萨瓦齐耶甫不是第一次到中国来：“你在上书中说你们的察罕汗（蒙文“白汗”）的商人伊凡·萨瓦齐耶甫等带着察罕汗的货物又被派往中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76号、1704年6。

37 曾多次通知(multoties)。

38 ……因为那条经由鄂尔浑土拉的路程远比经由乌拉的路程为短……〔萨瓦齐耶甫在其上理藩院的申请书中说〕他被任命为长官，以使俄国人的头目——商人伊凡通过上述的张家口到达喀尔喀人的汗土谢图汗地区，并使他们经由到达鄂尔浑土拉的道路回去……此后，当你们俄国人要通过鄂尔浑土拉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土谢图汗的地方后，土谢图汗将命令他们留下，并把他们统计好的人数报告给我们的皇帝：不许他们超过二百人到这儿来……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副大臣维尼乌斯的信。康熙43年阴历4月13日（原文为拉丁文），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书信1704—1717，n°69，1704r。

乌拉，诺尼乌拉即诺尼河（乌拉是满洲语）。张家口位于北京西北部，可通蒙古。参阅图理琛约于1723年所绘的地图，载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科学使命的新档案》，新系、第1分册）巴黎、1910年、8开本、图1—3，第136页。

39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无号数1704年C。

40 在印刷文件中找不到这些命令，在外交部的档案里也找不到，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还应该指出，1704年1月11/22日的谕旨中命令给奥斯考尔考夫一张护照，同时说要交给他一封用俄文、拉丁文和蒙文写的通行信，“如同于去年1702年交给商人萨瓦齐耶甫的一样。”

41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1年。

关于奥斯考尔考夫的情况，可在下述著作中找到：梅莱蒂伊（主教）前引著作；阿多拉斯基：《东正教会在中国》，喀山、1887年、8开本。关于这些作品的可靠性，参阅《参考书目》。

梅莱蒂伊(前引著作,第78—81页)肯定说,奥斯考尔考夫从1699年到1709年在伊尔库次克尽心和花钱照顾大使馆的修道院;可是作者未说明出处,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说明作者在别处(《伊尔库次克教区新闻》1872年,第13号)所谈到的修道院的档案是这消息的来源。阿多拉斯基(前引著作,第60—61页注解)说奥斯考尔考夫曾编过一本拉丁文—斯拉夫文—荷兰文字典,因为在北京的东正教会图书馆有一本8开本123页的书,封面上写着:“三种语言简明小辞典,奥斯考尔考夫专员赠,由他亲笔签名,1713年4月17日”。可是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这是奥斯考尔考夫的作品呢?会不会只是他送给中国耶稣会教士的礼物呢?

4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1年。

43 1704年5月15/26日西伯利亚大主教菲洛泰曾经有一封信,派遣教士同大贵族格拉多夫斯基以及科兹曼伴随奥斯考尔考夫到中国去,这封信于1704年10月12/23日送到伊尔库次克。(梅莱蒂伊:《旧宗教书翰》,喀山,1875年,8开本,第136—138页,又同上作者:《东正教会……》,俄文版,第69—70页,可是未注明出处。)

另一方面,根据理藩院1706年4月28日给罗曼纳多夫斯基的信(见上文),奥斯考尔考夫可能于1706年在北京宣称,他曾在“西伯利亚”会见过萨瓦齐耶甫;可是我们已经说过,萨瓦齐耶甫已于1704年8月回到伊尔库次克。

44 这是噶噶林于1707年给理藩院的一封信中所宣称的(见下文)。

45 罗曼纳多夫斯基于1704年和1705年主持西伯利亚部。他继承维尼阿斯的位置,本人则于1706年为马蒂厄·彼得洛维奇·噶噶林亲王所接替。1711年噶噶林亲王任西伯利亚总督时,仍兼管西伯利亚部,直到1718年他失宠为止。根据穆勒《月报》,1764年,第526—528页,穆勒之后,还有安德烈维奇:《西伯利亚史》(俄文),圣彼得堡,1889年,8开本,2卷,第1卷,第114—115页。

46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75号,1706年,第76号,1706年,缺号1706年,三封理藩院绝密信(第三封是亲拆信),致俄国可汗西奥多尔·乔治维奇(即罗曼纳多夫斯基),北京,康熙45年3月16日。参阅:《证明文件》。

47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1年。

我们在上面第2章已经知道,十七世纪末叶库迪阿科夫是尼布楚的税务

督办,因此对于对华贸易非常熟悉。前面所说的几道命令就是为他而发的:一道是1697年3月16/26日,《史料汇编》,第5卷、第261号、第473—474页;另一道是1699年2月12/22日,《史料汇编》,第5卷、第284号、第517页。1701年1月5/16日给尼布楚长官的训令中有好几条也是针对他的:第32条谴责他没有没收商人未列入清单的商品;第33、34条谴责他用太贵的价钱收买黄金而没有收取黄金以代税款;第36条指责他被郎左索夫商队里的小商人所收买;《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22号、第115—116页。1701年2月1/12日给尼布楚长官的特别训令第8条,命令审讯两个想杀害库迪阿科夫的暴徒,《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35号、第140—143页。1701年2月25日/3月8日的谕旨暂停尼布楚长官尼科勒夫的职务,命令他将财政部的商品转交给库迪阿科夫。《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36号、第154—155页。

48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1年。

49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7页。

5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1年、第65号。

51 同上书第(7)2?号1708年,第73号1708年,第74号1708年,缺号1708年,第77号、1708年。

“所以此次来的彼得·库迪阿科夫和其他被派回鄂尔浑土拉的人,以及以后你们的所有经由此路往返鄂尔浑土拉的商人”(原文为拉丁文),74号、1708年。

52 见上文第96页。

5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1年。

54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8页。

5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1年,无发文号信件,日期是1710年,内容是关于逃亡者问题。

56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1年。这道谕旨提到“过去的1709年”的另一道同样内容的谕旨,并称库迪阿科夫为“商务专员”。根据1710年7月27日/8月5日和1710年12月30日/1711年1月11日的谕旨,宣誓商人们可能带给他武器和镶着钻石的挂表,这是《出使中国的著作摘要》里面的记载,被莫斯科大学俄国历史与古代史学会《会刊》1851年、第9分册、第63、64页所引用,但并未注明其他详尽出处。

57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8页背面。

58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51号。

59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8页背面。

6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1年。

61 枢密院档案。《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2417号、第729页。

62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2504号、第820页。

63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9页背面。

64 图理琛从康熙51年7月23日到52年1月16日(1712年8月24日到1713年2月10日)逗留在色楞格斯克。参阅下一章。

6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39、42、43、44、46、50号以及一封无号码的信。

66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9页正面。

67 郎克(参阅下文)于1715年8月18/21日自圣彼得堡动身，于1715年12月26日及1716年1月2日遇见从中国归来的商队。韦伯：《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4开本，第72—73页；韦伯：《关于大俄罗斯或莫斯科公国的现状的新回忆录》，阿姆斯特丹和巴黎，8开本、2卷，巴黎版、第2卷第90—91页。韦伯自己说(《变化了的俄国》第164—167页)，1716年3月去中国的商队回到莫斯科已经四个月了，那就是1715年12月回来的，这同郎克的叙述吻合(同他共进晚餐的那个“专员”，也许是奥斯考尔考夫的助手，如果奥斯考尔考夫已经在西伯利亚死亡的话)。韦伯叙述的某些细节值得注意：商队在北京逗留了约4个月(1714年8—12月?)、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尤其是镶着珠宝的挂表卖得高价，关于这一点，参阅上文第85页注4。

68 手稿内有伊尔库次克、伊兰斯克、巴尔古森斯克和韦尔霍郎斯克的档案材料的副件，第83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0号、第34—35页。文内称古谢特尼科夫为“商人的专员”；比较上文第85页注4称库迪阿科夫为“商务专员”。

69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9页背面；商队于1716年又离开该地，见同上书。

70 韦伯：《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4开本；《新回忆录》，巴黎、1725年、12开本、2卷，第2卷、第89—144页。

德国人韦伯于1715年8月同俄国宫廷人士一起在圣彼得堡；1716年2月在莫斯科，1717年同彼得大帝在德国，同年10月又回到圣彼得堡；他在俄

国一直住到 1719 年年底。他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获得相当多的情报，尤其记载宫廷生活琐事甚多，只可惜有点离题。郎克回来以后，可能将自己的手稿交给他，他只将手稿的第一部分（赴华部分）刊载在上述两部作品里。郎克的全部手稿，包括回来的旅程，收藏在柏林的国家秘密档案中，标题是：《劳伦特·郎克中国之行及他所记叙的中国》。以上材料根据克里格尔的《最初一百年的俄中外交》，柏林，1904年，8开本。

图理琛（参阅第五章）约在 1713 年 8 月底在托波尔斯克告诉噶噶林说康熙皇帝希望有一个欧洲医生。据韦伯的记载，俄国人于 1715 年 8 月才满足这个要求。一个圣彼得堡医院的英国外科医生自愿前往。他的姓名在韦伯用法文出版的郎克日记中写作“卡尔文”（《新回忆录》第 2 卷第 122 页；在德文版的《变化了的俄国》中没有这样记载，第 83 页）；在伊尔库次克编年史中写作“蒂耶玛斯·柯尔文”（在列昂捷夫给噶噶林摘录的理藩院的一封信中作“汤玛斯·哈尔芬”，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书信 1704—1717 年）。“劳伦特·郎克”工程师奉命送医生前往，并负责带回来一些物品，其中有中国磁器火炉一只（关于郎克，参阅第八章）。

根据韦伯编辑的郎克日记，郎克所经过的地方和日期如下：圣彼得堡，1715 年 8 月 18 日（《改变了的俄国》，第 72 页；《新回忆录》，第 2 卷，第 89 页）；托波尔斯克，1716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8 日（同上书，第 74 页；同上书，第 102 页）；托木斯克，3 月 9 至 11 日（同上书，第 76 页；同上书，第 107—108 页）；叶尼塞斯克，3 月 22 至 5 月 24 日（同上书，第 77—78 页；同上书，第 108、111 页）；伊尔库次克，7 月 18 日（同上书，第 79 页；同上书，第 114 页）；色楞格斯克，8 月 14 至 10 月 7 日（同上书，第 80—81 页；同上书，第 116—118 页）。可是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些日期是俄历还是公历（我们已经知道义杰斯用的是俄历）；其次，在可以对证的一点上，证明文件有分歧：伊尔库次克编年史上记载医生和郎克到达的日期是 4 月 27/5 月 8 日，他们离开的日期是 5 月（《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 9 页背面）。

在北京郎克同纪里安神父及巴多明神父来往（参阅第八章）；郎克受皇帝委托制造一个磁器火炉的木模型，火炉本身则将在“制造磁器的省分”（江苏？）制造。《变化了的俄国》第 86 页；《新回忆录》，第 2 卷，第 129—132 页。医生则发觉皇帝身体十分健康。

郎克按照康熙于 1716 年 11 月 15 日表达的意愿（同上书第 87 页；同上书第 132 页），可能将五个中国大使和三个“大臣”带到俄国，他们可能于 1718

年“正月25日”到达莫斯科。这是根据克里格爾上引书，第36页，记载郎克在柏林的秘密档案中的手稿内“有关中国大使进入莫斯科的记述”，奇怪的是俄国外交部官方档案并无类似记载，最低限度在中国事务部分找不到一点痕迹。

知道郎克返回的日期也很重要。如果他是随同古谢特尼科夫商队一起前往并归来的，那么这个商队在1717年8月26日还在中国。另外上面提到的理藩院信件摘要中，有一封康熙56年5月18日即1717年6月26日写给噶噶林的信，提到医生和郎克的回俄问题，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7年信件。按照韦伯的记载，郎克于1718年回到俄国以后，才将手稿交给他的。那么郎克的回程应该在1717年年中至1718年1月25日之间。

71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1717年信件，第79、80、82号，三封理藩院给噶噶林的信，日期是：康熙56年阴历7月20日即1717年8月23日（根据黄伯禄神父的《中国历书……》，徐家汇，1885年，8开本，第25页，56年7月20日并不是1717年8月23日，而是26日）。

理藩院于1717年10月10日给噶噶林的信（见下文）也说：

“今年来的专员在这儿耽延甚久，不多几天前才离此而去。”（原文为拉丁文）

72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从1717年就记载该城长官拉基丁奉噶噶林之命前往外贝加尔区，去夺取古谢特尼科夫带回来的黄金和其他商品，这件事以后成为噶噶林致死的原因。1718年3月近卫军中尉伊凡·内弗尔斯夸从圣彼得堡来迎接商队，同月离开，于1718年6月又同商队及古谢特尼科夫回来。《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1页。

73 监督，参阅迈耶斯：《中国政府》，第1版，伦敦，1878年8开本，第324号、第40页，又第360—361号，第46页。

74 比较韦伯在《新回忆录》第2卷，第141页记载郎克的话：皇帝仅仅豁免中国商品的赋税，这种说法既含糊又不象是真的。

7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5年，第4号；转载在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年至1792年中俄外交文献汇编》中，喀山，1882年，8开本（俄文版）第512页，但没有注明出处，并且遗漏一个重要句子，即“官府”的金银的比价。参阅《原始文件》。

76 参阅第三章。

77 参阅《原始文件》。

78 参阅加恩：《1727—1728年在北京俄国商队的帐册》，巴黎，1911年，8开本。

79 尤其请参阅萨瓦齐耶甫、古谢特尼科夫及1712—1728年帐册中的中国两与卢布价值的比较。

80 关于这些问题，参阅加恩前引著作，第112页、118页。

81 1699年松鼠皮每千张55两，1717年39至40卢布；黄鼠狼皮每百张1699年10至16两，1717年15至17卢布；北极狐皮每张1699年60戈比，1717年44戈比；草原狐皮每张1699年40至50戈比，1717年15戈比（每百张15卢布）；山猫皮1699年4至5卢布，1717年2卢布；锦缎1699年5至7两（每匹？），1717年3至5卢布；南京棉布1699年每匹3两，1717年3卢布。卢布同两的比价约为0.70，就是说每两值1卢布40戈比；要换成卢布，必须在两数上加三分之一以上。参阅加恩前引书，第122页。

82 “……来做小生意的人，可以打发他们象自古以来那样取道尼布楚到达齐齐哈尔，并在那儿做生意……1717年10/21日理藩院致噶噶林的信，……如果你们的商人中有愿(оптем, 原文如此)做生意的，可留在色楞格斯克地方，在那儿进行交易。因为留在离我们的边界不远的喀尔喀人、厄鲁特人、毛拉人、中国人都得到通知，要他们收起自己的货物，到土谢图去，同你们进行贸易”。(原文为拉丁文)康熙58年4月16日即1719年6月3日理藩院给噶噶林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8及1719年。

8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7年10月10日(1717年10月10/21日)。《伊尔库次克编年史》在1717年记载：“商人巴西尔·伊凡诺夫与财政部人员同时到达，同年他赴蒙古、库伦经商，但他未至中国。”《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0页正面。这里所说的是不是指巴西尔·伊芬呢？

84 切尔卡斯基亲王于1720年正月将副本送到圣彼得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8—1719年。

85 关于这个名称，参阅第二章第56页注5。

86 1715年2月17/28日一道谕旨和西伯利亚总督的一道命令，向叶尼塞斯克长官要一份噶噶林亲王时期(1711—1718年任西伯利亚总督)赴华商人的清单，名单如下：奥斯考尔考夫，1703年离莫斯科，1706年归来；库迪阿科夫于1706年动身；萨瓦齐耶夫于1708年；库迪阿科夫于1709年；奥斯考尔考夫于1712年；古谢特尼科夫于1714年。《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卷、第84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21号、第65—66页。但应注意，

上面没有提到 1702—1705 年萨瓦齐耶甫的第一次商队，而且关于库迪阿科夫第二次商队的第一道谕旨，只回溯到 1710 年 6 月 14/25 日，因此参考这个文件时必须小心谨慎。

87 这起码是中国人提出来要俄国商队把来京间隔时间拉长理由之一。参阅第七章。比较上文第 87 页注 2 韦伯的报道，说商队的一切费用完全由中国负担。

第五章

图理琛的出使下伏尔加的土尔扈特

材料来源

1. 俄文资料: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37、48、81号。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6年、第2号，1729年、第8号，1730年、第7号，1731年、第9号。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喀尔木克事务、1707年2—9月10/21日，第153—154页，第164页。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19页。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阔留赤甫的使节公务日志第82页。

《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116号以及第2卷，第19号。

同时参阅波兹尼叶夫的文章：《准噶尔的喀尔木克人简史》，第1章、第33页；《百科小辞典》，圣彼得堡、1838年、8开本，第3卷“阿玉气”条；《百科词书》，圣彼得堡、1862年、8开本，第5卷“阿玉气”条。

2. 中文资料:

《异域录》，图理琛著，法译本译者戈比尔神父，俄译本译者有罗索金和列昂捷夫，英译本译者司当东（见下文第122页注27）

喀尔木克人在中国的对俄政策上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也许他们在中国对北方的土尔扈特人的关系上，也起了某些作用。土尔扈特人已从准噶尔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中国被迫违反千百年来的惯例，第一次决定派遣正式的外交使团，跨过亚细亚的边境，到土尔扈特首领那里去，一定是出于强有力的政治动机或受到急迫的利害关系的影响。由于缺乏中国方面对这次出使所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必须了解决定出使的缘由，并且找出产生这一新的行动的真正动机。

第一个解释似乎是中国人对厄鲁特人的战争¹。噶尔丹琿台吉于1697年战败被杀，他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继承了他的地位。噶尔丹在世时，策妄阿喇布坦势弱，暗中得到中国的支持，一旦当了首领，他就立刻想重新实现喀尔木克人称霸中亚细亚的计划。约在1708—1709年间，他用阴谋手段取得了西藏，就马上转过来对付中国²。这时，一些与喀尔木克人有血统关系的民族，土尔扈特人与和硕特人³，在十七世纪初期已经由准噶尔迁移到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下游一带的盆地来了⁴。共同的血缘联系使他们一直与喀尔木克人密切联合⁵，可是自从两大首领崛起超越群雄以后，他们又在彼此竞争着。这两大首领就是喀尔木克人的琿台吉先是噶尔丹，接着是策妄阿喇布坦（1697—1727年），和土尔扈特人的阿玉气⁶。中国难道不准备利用这两者间的殊死斗争使自己得利吗？

阿玉气的历史从各个方面都不清楚，他的祖先大概是青海王公⁷。在十七世纪开始时，他的曾祖和鄂尔勒克曾迁移到西伯利亚并与喀尔木克人和鞑靼诸该人作战。他死于1644年，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继续与各敌对的游牧民族作战。书库尔岱青的儿子棚楚克台吉大约死于1670年或1674年。他的儿子阿玉气约生于1639年或1640年，继承了父位⁸。他与噶尔丹的父亲巴图尔琿台吉似乎

有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多尔济拉布坦嫁给和硕特的首领车臣汗，因此得与和硕特联盟⁹；最后，阿玉气的一个女儿嫁给琿台吉本人策妄阿喇布坦。这种亲属关系险些儿使他们大动干戈：阿玉气有八个儿子，其中有个名叫三济扎布的，在和他的父亲争吵一场以后，逃到他的姐夫琿台吉那里去。策妄阿喇布坦由于他带来了好几千个土扈特人，所以给他以优渥的待遇；后来由于阿玉气的请求，他把儿子交还，可是留下了他的部属¹⁰。在这两个劲敌之间，除了这第一次摩擦以外，很快又增添了一些不同程度的公开敌对事件。这两个敌手在俄国和中国之间所处的地位差不多相同，因此不能不与中俄两国发生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俄国人总是在妙巧地对待喀尔木克人和他们的代理人¹¹，同时它也企图拉拢土尔扈特人。因为土尔扈特若是入侵，就能够损害阿斯特拉罕和喀山；俄国若是能争取到土尔扈特人的联盟或中立，则在与顿河区、伏尔加河中游以及乌拉尔区的各游牧民族进行斗争时，就可以利用他们作为助手。不过，想使游牧民族尊重外交协定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因此，在1673至1710年间，俄国不得不与变幻无常的阿玉气连续订立了六个条约¹²。无论如何，俄国自以为总算能够把阿玉气拉进他的部曲行列中来，虽然经常发生背信弃义和掠劫事件，它仍然用商业上的优惠尽力把阿玉气引诱到自己一边来¹³。在阿玉气方面，他和琿台吉一样，也是佛教徒，也和琿台吉一样保持与西藏的联系，由西藏供给他僧侣和医师。而中国也是佛教国家，并且已经利用喇嘛教僧侣控制了蒙古，在它和喀尔木克人的冲突中也求助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们的干预¹⁴，那么中国会不会利用宗教来争取土尔扈特人呢？

恰好这时有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干预机会。阿玉气的一个侄子阿拉布珠儿，在1698或1703年间曾长途跋涉到西藏去¹⁵。当他想回家时，喀尔木克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战争使他无法横越中亚细亚。

他于是到北京去¹⁶。中国皇帝因为可以把他当成人质，所以欣然接待了他。皇帝赐给他土地和恩俸，就是不肯送他回家¹⁷。不过，最后阿玉气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他派遣一名官员经由西伯利亚到北京来，索回那个差不多成了囚犯的王子。1709年沙皇的一道谕旨允许土尔扈特的王公萨穆坦库里尤科夫和他的二十名伙伴自由过境，并以一名少尉、一名伍长及两名龙骑兵护送他们到西伯利亚¹⁸。他们于1710年¹⁹到达西伯利亚，大约在1711年或最迟在1712年的头几个月到达北京。中国皇帝马上决定利用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

这时(1712年)，库迪阿科夫的俄国商队正在北京²⁰。引用尼布楚条约，要求俄国允许中国特别派赴土尔扈特的使团过境，而以厚待今后来北京的俄国商人为交换条件，这是一个极为巧妙的策略，不能不为中国人所注意到。因此，康熙51年5月13日即1712年6月16日，理藩院发出一封信给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要求俄国允许使团过境，这个使团带有中国皇帝就阿拉布珠儿问题写给阿玉气的信件。这个使团包括五个使臣：太子侍读学士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史官图理琛以及两名官吏雅图及苏该。此外还有三个骑士和二十二个奴仆，另外加上阿拉布珠儿的四名人员²¹。噶噶林于1712年8月30日/9月10日，接着又于10月8/19日写信通知使节部的首长葛洛甫金，告诉他库迪阿科夫已把中国方面请求使团过境的事通知了他。噶噶林说他虽然不能确切知道这个使团的目的是什么，但他认为这次出使一定是为了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国一向是不习惯于派遣使团到国外去的。噶噶林认为出使的目的可能是想煽动阿玉气起来反对琿台吉，因为中国不能单独打败这个对手。不过，若是策妄阿喇布坦被击败了，中国就会来到西伯利亚的大门口，这一点是噶噶林所害怕的²²。1712年11月18/29日噶噶林收到西伯利亚“州”的一个“高等法官”(Landrichter)切别列夫的报告，证实了噶噶林的想法²³。1712年11月26

日/12月7日俄国枢密院决定同意这个使团过境，但训令喀山总督设法查明这个使团的目的，并劝阻阿玉气不要与中国缔结任何与策妄阿喇布坦为敌的攻守同盟²⁴。1712年11月28日/12月9日沙皇的一道谕旨，给噶噶林以同样意思的训令²⁵，噶噶林于12月8/19日把这些训令转达给他的下属叶尼塞斯克的“司令官”²⁶。

中国方面当然不是无所作为的。康熙51年4月22日即1712年5月26日给使臣们的训令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阿玉气和喀尔木克人的，另一部分是关于俄国的。中国皇帝感谢阿玉气派萨穆坦给他送来的礼品，通知阿玉气中国已询问过俄国专员（库迪阿科夫）并且探问过策妄阿喇布坦关于送还阿拉布珠儿的意见，但喀尔木克人的答复尚未到达。这是变相的拒绝；中国方面还没有决定交出这个人质。如果阿玉气方面提议成立与喀尔木克人为敌的攻守同盟，使团应拒绝这个建议，这点在训令中是清楚明白的。训令中还有几项表示对俄国的善意；中国皇帝只希望和平，沙皇可以把西伯利亚边境的卫戍军调到西边，以便更好地对付俄国在欧洲的敌人。倘若沙皇邀请使团去见他，这是很可能的，使团应接受这个邀请，并且遵守俄国的礼仪，不要象尼果赖在中国那样失礼。最后并训令使团仔细研究俄国的地理形势。使团的一个团员，史官图理琛承担了这个任务，回国以后写了一本十分有价值的书，记述他这次旅行和沿途的见闻。以下所述细节都是图理琛所提供的²⁷。

使团携带着中国皇帝给阿玉气的信件²⁸，于康熙51年5月20日即1712年6月23日离开北京²⁹。它经由蒙古于康熙51年7月23日即1712年8月24日到达色楞格斯克，在该地停留到康熙52年1月16日即1713年2月10日。在该地他们遇见了奥斯考尔考夫商队，这个商队正在前往北京接替库迪阿科夫³⁰。使团由水路于康熙52年7月4日即1713年8月24日到达托波尔斯克，在这个

城市只停留了八天³¹。这就有足够的时间使使团与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接谈。噶噶林告诉使团，那时正在打仗的沙皇并不急于约请使团相见，除非使团负有特别使命要见他，于是中国人也不坚持求见沙皇。他们说出发时已得到商队专员允在俄国可以得到很好的接待。库迪阿科夫要求派一个教士到北京去，中国皇帝则要求一个医生，使团表示愿意把他们带回去。噶噶林回答说教士已经找好了（参阅第十一章），医生不久也可以找到（参阅前章）。然后使团抵达喀山³²，顺伏尔加河而下，越过萨拉托夫³³，在马奴托海³⁴于康熙 53 年 6 月 1 日即 1714 年 7 月 12 日与阿玉气相见³⁵。使团于阴历同月 14 日即 7 月 25 日离开该地³⁶，它和土尔扈特首领相处全部时间不足半个月。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使团只被阿玉气亲自接见过两次（6 月 2 日和 10 日即 1714 年 7 月 13 日与 21 日）³⁷。第一次觐见时，使团呈递了中国皇帝的信件，然后谈到阿拉布珠儿的问题。中国使团对于阿玉气派遣萨穆坦送给他们的主子的礼品表示谢意，并且说送阿拉布珠儿归国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使团强调把阿拉布珠儿经由与土尔扈特人不和的喀尔木克人的领土送回是会有危险的，并且询问假道西伯利亚是否最安全和最稳当。阿玉气答应把这事和阿拉布珠儿的父亲和哥哥商议后再作答复。第二次觐见时，阿玉气作了答复。这个答复也和中国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微妙和富于外交手腕。阿玉气请中国皇帝裁夺应由何路遣返阿拉布珠儿。他说，南方的道路已经断绝了，如果使团不便向沙皇请求假道西伯利亚，他就请求。可是如果北方的路线是土尔扈特和中国之间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又完全有赖于俄方的善意，俄国假如由于多次请求感到麻烦而拒绝假道，那么土尔扈特与中国之间的交通便断绝了。使团归国后应该把这件事奏闻皇上，请求他注意。中国和土尔扈特人比较容易达成谅解，因为土尔扈特人和

满洲人有许多共同点：种族、宗教、语言、甚至服饰也相同，而土尔扈特人与俄国人却毫无相似之处³⁸。

这次访问的其他时间则用于参加阿玉气家属举行的宴会，阿玉气的王妃达尔马巴拉、他的妹妹多尔济拉布坦（车臣汗的妻子）、他的儿子沙克度尔扎布都曾举行宴会。喇嘛们也按照阿玉气的意愿参加招待中国使臣。中国使臣和阿玉气的亲属彼此交换了礼物³⁹。使团于是辞别，由来时走过的路线归国。

使团于康熙 33 年 11 月 7 日即 1714 年 12 月 13 日回到托波尔斯克，同年 12 月 22 日即 1715 年 1 月 27 日才再动身⁴⁰。就是在托波尔斯克逗留期间，使团向俄国建议撤除西伯利亚边境的卫戍军。噶噶林没有接受这项建议。中国人动身那天他命令“少校”（司令官）伊番萨费翊护送使团越过西伯利亚一直到色楞格斯克⁴¹。他们于康熙 54 年 5 月 27 日即 1715 年 6 月 28 日回到北京⁴²。

图理琛说皇帝对他们此行感到满意⁴³。康熙 55 年正月 11 日即 1716 年 2 月 13 日允许史官图理琛刊行他的游记⁴⁴。同年 3 月 27 日即 1716 年 4 月 19 日理藩院给噶噶林一封信，通知他中国收到了噶噶林给中国宫廷的函件，函件中说他已经好好接待了中国的使团，在使团归国时，有一个使臣急于先行，已派人护送他直到色楞格斯克。理藩院代表中国皇帝表示感谢，皇帝为了回报，还下令特别优待俄国来京官员⁴⁵。理藩院于康熙 56 年 7 月 20 日即 1717 年 8 月 26 日自北京给噶噶林的另一封信，内容与上一封信相同⁴⁶。由于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国皇帝曾用自己的钱代自己的商人偿还债务⁴⁷，说明皇帝的心情很好，所以图理琛的论断是可信的。

中国方面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官方的训令中并未计划成立中国和土尔扈特的联盟，恰恰相反。也可能发布过更改意图的秘密训令，但按照图理琛的叙述，在两次觐见中除

阿拉布珠儿的归程问题外，并未讨论其他事项，同时他又断言阿拉布珠儿问题是这次出使的首要目的。而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中国皇帝在他的公文中以及阿玉气在他的答复中，都没有明确地承担义务。中国方面对这样消极的结果能明显地感到满意吗？看来不大可能。同时也不能仅仅由于俄国方面厚待中国使团就使得中国皇帝这样高兴。再说，象中国这样不大愿意派遣重要外交使团出国的国家，这次打破了种种惯例，冒着遭受俄国拒绝或不甚热情接待的危险，仅仅为了获知土尔扈特首领对一个小小王子的归程的意见吗？毫无疑问，有必要探讨更深层的缘由。

这种更深的缘由，可以从这个史官的陈述中窥见；同时与其它文件和后来的事实印证来看，这些缘由就更显得清楚了。按照图理琛的说法（图理琛由于他的官方地位显然要奉承皇帝），阿玉气曾主动建议土尔扈特人和满洲人亲近。他觉得置身俄国不习惯，远离了他的人民的故乡准噶尔，甚至远离信佛教的中国，他自己和他的人民是信奉佛教的，与中国有近亲关系。满洲使臣受中国皇帝的派遣，至少捎来了美好的言词，在他们面前，阿玉气自然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但是会不会是由于中国使团人员的暗示而引起的呢？这个假设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国务秘书伊凡·格拉儒诺甫负责伴送于1730年往见新沙皇的中国使臣，从中国使臣处得知上次派往阿玉气处的使团，其目的在于劝诱土尔扈特人回到准噶尔去，同时向土尔扈特人保证他们这样作，就可以得到中国的保护⁴⁸。中国人在1730年有什么必要违反他们的心愿，编造出这种说法来呢，如果这种说法并非真实的话？再说，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时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说法：“先皇（康熙），为了想知道使阿玉气流落外国的真正原因，曾派遣官员图理琛和其他人到阿玉气处，向他保证，如果他愿意回到他以前住过的地方，他会受到保护。”见《关于土尔扈特人的迁徙》，载《关于中国历史的回忆录》，巴黎、

1776年、4开本，第1卷，第407页。最后，后来事件的发展也提供了证明：中国浪子土尔扈特人的归来一事，最初提出于1714年，后来由于中国对厄鲁特人的征伐而拖延下来，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厄鲁特人被乾隆灭亡后才能真正实现，而这时距离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已有六十年了。我们设想一下，土尔扈特人若不是由于中国甘言许诺因而长久以来怀有重归故土的想法，怎么可能在1775年突然决定离开他们已经生活了一个世纪的国土，同时又冒着旅途上的种种危险，而且前途未卜，就回到故土去呢？如果事情确是这样，康熙的满意就很容易理解了。他的使团一开始并没有将逃亡的人带回，由于这并不是中国皇帝当时的意图，因为那时正值中国与喀尔木克人作战的前夕，因而也不是出使的目的。可是阿玉气，他的家族，他的僧侣似乎都对满人有好感，随时准备与满人作更方便、更经常的联系。对于第一次的考验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⁴⁹：它证明土地是肥沃的，土尔扈特人对中国的劝告也毫无反感。剩下要作的仅仅是消除困难，克服中间的阻碍，不要招致俄国的恶感，尤其要制服喀尔木克人。因此，中国在外交和权力方面所尽的努力一定是集中于这些方面：半个世纪来中俄关系中的中国政治活动，其枢纽即在于此。

注 释：

1 至少这是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马上产生的想法；参阅下文（第121页注22）噶噶林给西伯利亚部的信。

2 策妄阿喇布坦是僧格的儿子，巴图尔理台吉（和多和亲）的第六子。僧格于1671年被他的哥哥车臣汗和卓特巴巴图尔杀死。噶尔丹是理台吉的第七子，于1680年杀死车臣汗。噶尔丹成为理台吉以后，从大约1678年至1697年统治喀尔木克人。他于1688至1697年在蒙古打仗时（参阅第一章），他的侄儿策妄阿喇布坦于1671至1681年在准噶尔与中国人勾结，参阅下一章。

3 《关于中国……历史的回忆录》，巴黎，4开本，第1卷，1776年版，第406页；迈耶斯：《中国政府》，上海及伦敦，第2版，1886年，8开本，第84、85页。

4 喀尔木克人和中亚其他土耳其民族(和硕特人，杜尔贝特人，等等)的历史，由于缺乏原始资料，不能同中国与俄国资料作直接的对比研究，所以尚未写成。在现有知识的情况下，只能提出一些临时性的解释。

埃里斯托夫亲王曾经在《百科小辞典》(圣彼得堡，第3卷，1838年，8开本，第524—527页)里写过一条关于阿玉气和土尔扈特人的十分准确而详尽的条目，利特坎也在《百科词书》(圣彼得堡，第5卷，1862年，8开本，第734页以下)写过一条不大可靠的条目，可是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注明了出处。根据这两位作者的说法，土尔扈特人和和硕特人从十六世纪时已出现在西伯利亚，在十七世纪初已到达乌拉尔河。根据波兹尼叶夫先生的说法(见《考古学会东方组札记》，1886年，第1卷，第137页)，伏尔加的喀尔木克人于1628年迁离准噶尔，可惜他没有说出他的根据何在。韦赛洛夫斯基先生(同上书，1888年，第3卷，第365—370页；《喀尔木克人是通向伏尔加道路上的先锋》)认为在1630—1632年以前，喀尔木克人已经在伏尔加。比较拉米札，《亚洲杂录》，巴黎，1825—1826年，8开本，2卷，第1册，第413页：“在十七世纪中叶，他们(土尔扈特人)已前进到扬姆巴(Yemba)和热克(Jaick)河两岸”，又同上作者：《亚洲新杂录》，巴黎，1829年，8开本，第2卷，第102页。

5 我们不清楚阿玉气和两个理台吉巴图尔和噶尔丹之间的亲戚关系。据埃里斯托夫亲王前引著作所述，巴图尔是阿玉气的舅舅。而据穆勒《文集》，第4卷，第284—286页注，阿玉气的祖父书库尔岱青是厄鲁特人的头人“粗库尔”(巴图尔?)的女婿。

6 这个名字中文音译为：阿玉气；罗索金在下文引用的译文(第122页注27)里，从满文译成俄文，是 Ayouki。另一个俄文译者列昂捷夫和波兹尼叶夫先生写成：Ayouka。

7 这是根据穆勒前引著作而来，穆勒说他是根据西伯利亚档案的，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同时参阅非舍尔：《西伯利亚史》，第1卷，第3册，第2章，第5节，第11号，第144页，以及第2卷，第4册，第2章，第11—12节，第576—576页；埃里斯托夫和利特坎前引著作。

8 穆勒前引著作。他可能死于1723或1724年，时83岁或84岁。

9 车臣汗于1676年被噶尔丹杀死。他的老婆是阿玉气的姐妹，在阿玉

气那里隐避。1714年7月16日她在家里接待中国使团。这件谋杀案也是阿玉气反对喀尔木克人的原因之一。

车臣汗同多尔济拉布坦所生的女儿中的一个，阿娜，嫁给喀尔木克的琿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另一个名叫扎冈三穆扎克杜尔扎布的，嫁给阿玉气的一个儿子，据利特坎前引著作的记载。

10 阿玉气嫁给策妄阿喇布坦琿台吉的女儿名叫色代尔扎布。要确定三济扎布逃走的日期是困难的；温阔甫斯基说是1700年，波兹尼叶夫说是1701或1702年，帕拉斯说是1704年。他逃走时可能带走一万户(帐幕)土尔扈特人。

参阅：《炮兵上尉伊凡·温阔甫斯基出使准噶尔琿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朝廷，以及他的1722—1724年的途中日记》，载《地理学会人种分组札记》，第10卷、第2分册，以及单行本，圣彼得堡、1887年、8开本、第21—24以及第197页；波兹尼叶夫：《准噶尔的喀尔木克人史论》，出处同上、第247—257页；帕拉斯：《历史述闻集》，圣彼得堡、1776—1801年，4开本2卷，第1卷、第68—69页。

11 参阅第三章。

12 1673年2月27/3月9日；1677年1月15/25日；1683年1月24/2月3日；1697年7月17/27日；1708年9月30/10月11日；1710年9月3/14日；埃里斯托夫，引证处；《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2、3、4卷上述日期处。

13 1719年2月26/3月9日。豁免关税至三千卢布数额。《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5卷、第3314条，第670页。比较《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3622条、第226页。

14 参阅第一章。

15 阿拉布珠儿是阿玉气的弟弟那扎儿马穆的儿子(这是图理琛在托波尔斯克告诉噶噶林亲王的)，母亲是那斯里马米德(参阅下文第128页注45，理藩院于1716年4月19日给噶噶林的信)；中国皇帝雍正正在1729年(雍正7年5月=1729年5月28日至6月26日)给土尔扈特可汗的信的俄文译本中称他为“那扎儿马穆托夫(即马穆的儿子)·阿拉布珠儿”，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1年、第9号。穆勒在其《文集》第4卷、第307号注解中称他为“那扎儿马穆特，那莫塞朗的儿子”。

1713年图理琛对噶噶林说，阿拉布珠儿十年前已到西藏去。1714年7月

18日(康熙53年6月7日)阿玉气的喇嘛对中国使团说,黄海狸年,即康熙37年(1698年),他动身出外旅行;根据埃里斯托夫和利特坎前引著作上说,是1698年,他们把他的名字写成“拉布珠儿”;根据苏西埃神父的《对中国古籍内数学、天文、地理、年代学及物理等问题的研究……》(参阅第122页注27)第148页上说,是1703年,王子的名字变成“卡拉布珠儿”;根据拉米扎,《亚洲杂录……》,第1卷、第413页,是1703年。

也许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如果我们认为阿拉布珠儿于1698年离开伏尔加流域到西藏去,而他于1703年到达达赖喇嘛那里的话。

16 这至少是图理琛的正式说法。

17 在嘉峪关(陕西西部的一个山隘)附近的东舍儿亭(苏西埃神父前引著作,第148—149页)。皇帝封他为四品官(贝子)。

根据穆勒前引著作原处,那扎尔马穆特死于1714年,留下四个儿子:多尔济,贡布,阿拉布珠儿,乌巴沙。阿拉布珠儿可能有两个孩子在中国。

18 谕旨的副本于1720年10月送交外交部,根据的是圣彼得堡枢密院档案里的正本。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9年、第8号。1709年阿帕拉克辛伯爵报告的副本,内容是关于发给阿玉气的使者萨穆坦库里尤科夫及其伙伴自喀山到中国去的通行证。在托波尔斯克交给阔留赤甫各种文件的清单,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82页;在托波尔斯克交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各种文件清单,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2号(使者的名字拼作萨伊坦尼)。萨穆坦经过西伯利亚,这是1714年7月18日(康熙53年6月7日)阿玉气的喇嘛们告诉中国使团的。

19 噶噶林于1712年8月30/9月10日写信告诉柯罗文(参阅下文第121页注22)说,1710年间,喀山总督阿帕拉克辛曾经瞒着我通知西伯利亚的地方行政长官们,叫他们让阿玉气的手下人通过,他们是到达赖喇嘛处朝圣的(事实上1709年阿帕拉克辛的报告副本上是这么说的。那么到底谁在欺骗谁呢?是阿玉气利用一个借口,还是阿帕拉克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样说?)噶噶林说,他会象以前好几次那样,拒绝假道,他所提出的理由值得记住:“大人,让他们假道过境很不合适,因为我们把同中国贸易的权利保留给不花刺人,他们会给替沙皇陛下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们造成很大的妨碍,他们以前曾经好几次提出同样要求,都被我躲过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9年、第8号。

比较阿玉气对中国使团说的话,西伯利亚道路诸多不便。

事实上阿帕拉克辛被谴责了。参阅 1713 年 2 月 13/24 日柯罗文给阿帕拉克辛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同上引。

关于俄国宫廷里流传着的关于这次旅行的谣言，参阅韦伯，《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 年，4 开本，第 9—10 页。

20 参阅上一章。

21 理藩院致莫斯科驻西伯利亚总督马修·费要多罗·噶噶林的信

阿玉气住在土尔扈特地方，为策妄阿喇布坦所包围，已有多年不能来中国，我圣主询问俄国商队头目兼专员是否可以让他自祖、父以来即久已任长官的阿拉布珠儿过境回去，专员答称可以。于是我圣主选取阿拉布珠儿的有关人员，并派他们和你们俄国人一道前往。因为我圣主愿意阿玉气取道俄国派出自己的使节，你们要接待带着我们圣主谕旨派往阿玉气处的人员，即侍读学士殷札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史官图理琛，武官雅图，武官苏该，以及三个骑兵，连同他们的仆从二十二人，另加阿拉布珠儿的四人。你们要好自引导他们过境，勿得留难，使他们到达阿玉气处（原文为拉丁文）。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 年，第 37 号。这封信是用中国纸书写并盖有皇帝大印的。

中国大使的头衔的拉丁文译文在萨尔蒂科夫（喀山总督？）于 1713 年 12 月 15/26 日给沙皇的一份报告中，被译成俄文；他在报告里说：1713 年 11 月 26/12 月 7 日，从托波尔斯克到喀山来了四位同级的中国使臣，第一位是太子的师傅，第二位是中国枢密院的院长（*Pésident du sénat*），第三位是（*Préfet antigraf*），第四位是五品官。他们由四人陪伴，带有二十二个仆役，四个喀尔木克人。圣彼得堡枢密院档案副本，于 1729 年 10 月 19/30 日移交（莫斯科）外交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9 年，第 8 号。

这个报告里所说的四个同等职位的使臣就是理藩院信里所说的头三个使臣和苏该，他们的四个伙伴就是三个骑兵和同一封信里提到的雅图。

22 1712 年 8 月 30 日于托波尔斯克。

噶噶林给使节部大臣柯罗文的信。

“大人，如果他们（中国人）搞垮了这位王公（琿台吉），中国人就会十分妨碍我们……中华帝国将同无数邻近的西伯利亚城市接壤……大人，我们必须注意不使中国人打败这位喀尔木克王公即琿台吉，也不要让他被逐出其领土；可是如果没有阿玉气的帮助，中国人决不能同他进行战争。”

这是副本，由伊凡·阿布拉莫夫签名，于1729年10月19/30日由圣彼得堡枢密院档案送交莫斯科外交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9年、第8号。1712年10月8/19日内容相同的一封信，见同上引。

23 这份报告于1712年11月18/29日送交枢密院的办公室。报告内载有下述俄文按语：“由高等法官伊凡·切别列夫签署的原始报告。经西蒙·基里叶夫修改。在此报告上有秘书西蒙·伊凡诺夫如下的注：1712年11月19日。编写一份与中华帝国订立的条约的摘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0年、第8号。

24 枢密院训令。

“喀山总督应尽一切可能探知这次派遣使节到阿玉气处的目的，确切查明是否前往煽动阿玉气向喀尔木克人的领袖琿台吉开战，并告知阿玉气切勿与琿台吉开战，因为琿台吉与沙皇陛下和睦相处。”

这是副本。在正本上有枢密院委员的签名：多尔葛卢科夫亲王，伊凡·穆森—普希金伯爵，格里高瑞·普莱默亚尼科夫，沃尔孔斯夸亲王，萨马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9年、第8号。

25 这道谕旨提到1712年11月19日切别列夫的报告和1712年11月26日枢密院的训令；并命令噶噶林马上报告他所知道的有关阿玉气的一切。这件副本于1729年11月28日/12月9日从圣彼得堡收到。（上面记载的日期是10月28日，标题上的日期也改为10月28日。这只能是一个错误。标题上的日期应该是11月28日，因为文内提到1712年11月的一份报告和一道训令；相反，莫斯科的收到日期倒应由10月28日改为11月28日，否则11月28日在圣彼得堡发出的谕旨，同一天就能在莫斯科收到副本，就是很奇特的事。如果10月的日期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在下述三个文件上把11月改为10月：切别列夫的报告，枢密院的训令和给噶噶林的谕旨。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10月下半月发出的文件是可能过了一个月之后才到达莫斯科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9年、第8号。

26 噶噶林给叶尼塞斯克司令官科尔托夫的命令：兹派陆军中尉普罗科珀·斯图潘从托波尔斯克前往迎接中国大使。必须向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人力和粮食，以及国家仓库的葡萄酒和啤酒。事关国家利益，违令者一律处以死刑。《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78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116号、第494—495页。

27 图理琛(最后一个字的读音，据库弗雷神父所编的《中法词典》，河间

府、1890年、4开本、第782页上说，有“tch'enn”“chenn”两个读音；据贾尔斯所编的《中英词典》伦敦1892年4开本第616号，只有“ch'en”一个音）撰写《异域录》，意即《一个使节在外国的日记》。准许印行的日期是康熙55年1月11日即1716年2月3日。最后一个序言写于雍正元年11月即1723年11月28至12月27日。

可以肯定，图理琛的述闻是用两种文字撰写的，一种是满文，另一种是汉文（他自己是满人，是写给满洲皇帝看的）。大概满文版本在俄国可以找到（在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亚洲博物馆，或者在大学的东方语言系？）；汉文版本有两部印刷本，藏在莫斯科的卢米昂佐夫博物馆（斯卡奇科夫收藏品，1299号），有一部手抄本，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手稿部，中国、高丽、日本等国书目，巴黎、1900—1910年、8开本、7分册、第3分册、1902年、第1889号、第116页）。莫斯科所藏版本内各有一张图理琛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这是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手抄本内所没有的（参阅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的地图》，载《科学使团的新档案》，新丛书、第1分册，巴黎、1910年、8开本）。

图理琛这部书有四种欧洲文字译本：一种是法文，两种俄文，一种英文；法文和英文译本是根据汉文本译出的，俄文本是根据满文本译出的。它们是：

1.《中国人从北京至托波尔，从托波尔至土尔扈特国土的旅行记述》，戈比尔神父译，于1726年送给耶稣会的苏西埃神父，刊载在苏西埃神父的《对中国古籍内数学、天文、地理、年代学及物理等问题的研究，或最近在印度及中国所进行之研究》，由耶稣会神父合著，由同会神父苏西埃编辑及印行。巴黎、1729—1732年、4开本、2卷、第1卷、第148—175页。

这个法文译文曾转译成德文，载于穆勒的《文集》、第1卷、第327—348页。

2.罗索金：《1714年出使伏尔加河喀尔木克汗阿玉气宫廷之中国使臣在俄国旅行概述》，载穆勒：《关于科学问题的著作与消息月报》，圣彼得堡科学院、1764年、8开本（7月号、第3—48页；8月号、第99—150页；9月号、第195—234页；10月号、第291—353页；11月号、第387—413页）。

罗索金的翻译手稿收藏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第349号，第2卷、第12号内。它大概早在1741年就献给科学院了。穆勒：《月报》，1764年、第4—5页。

3.《中国使臣出使喀尔木克的阿玉气汗记，附有关于俄国领土与风俗习惯的描述》，列昂捷夫自满文译成俄文。圣彼得堡科学院、1782年、8开本、166页。

4.司当东爵士译：《1712年至1715年间中国使臣出使土尔扈特汗国记，由中国大使著述，中国皇帝特准于北京出版，司当东爵士根据汉文本译出》，伦敦、1821年、8开本，60页+330页+地图一张；参阅科迪埃《辞典》，第2版、第1卷、第637条。

这四种译本的价值不一。第一种译本，戈比尔神父的法文译文，只是图理琛原作的摘译，不过比较准确。罗索金的译本是按照满文原本翻译的，似乎译得极好（罗索金生于1707年，约死于1770年，起初于1726年在北京东正教会内学习汉文和满文，于1745年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汉文和满文教师，为穆勒翻译过若干满文著作；参阅第11章）。尤其可贵的是，一些地理名词和人名等等译成汉语时往往被歪曲得难以辨认，在此书中都音译成俄文。而且这个译本拥有司当东译本所缺少或未译出的部分，例如图理琛从托波尔斯克归来时同噶噶林亲王谈话的那一段，序言和准许印行的御旨等。相反，它却欠缺构成司当东译本第13章的那份报告，也没有复制地图。列昂捷夫的译本也是根据满文，可是它毫无科学价值：它将一些地理资料按系统排列，将一些谈话改成人物对话，数字往往弄错，困难的段落漏而不译，而且没有全译本所具有的序言和跋。司当东（1792—1794年间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一员）的英译本近似罗索金的译本。但由于根据汉文译出，经过汉文的歪曲，往往难以辨认相应的俄语；而且这个译本没有复制图理琛绘制的饶有兴味的地图，却根据帕拉斯的地图复制了一份。关于这一点参阅拉米扎：《亚洲杂录》，巴黎、1825—1826年，8开本、2卷、第1卷、第427页。

图理琛自述于1667年生于热河（见司当东前引书第1章）。他成为史官和官方译员。他曾在好几个部门任过公职（礼部牛羊群总管等），一直升任到内阁中书。他一度失宠，遭到黜免，于是想借着请求随同出使土尔扈特以恢复他的地位，他的请求被批准了。我们可以从理藩院于1712年6月16日给噶噶林的信中看到（见上文第99页注1），图理琛不是唯一的使臣，甚至也不是使臣的首脑，可是只有他一个人著书，记述了这次出使，同时他在书中又没有提及他的同伴，因此很容易使评论家们产生误解。参阅拉米扎前引著作，第1章、第414页，苏西埃前引著作，第148页。

奇怪的是，戈比尔神父（苏西埃前引著作第150页）竟然相信阿拉布珠儿

随同使团出发。上述信件，罗索金同司当东的译本，都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28 参阅司当东第2章。

29 同前引；苏西埃，第150页。在他的报告中，图理琛说是5月22日，即6月25日。见司当东第13章。

30 司当东第2章；苏西埃第151页。

从北京经蒙古到色楞格斯克经过的地点如下。可惜这些蒙古名字都用满文译出，就好象耶稣会当维尔所绘制的地图一样；这些地图载：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或当维尔：《中国全图……》巴黎无出版日期，对开本。

北京——沙河——张家口——欣冈山——察哈尔汉库，7月5日——贝让布拉克，7月15日——西拉布里杜（当维尔作：西拉布里图），7月17日——阿尔加兰图基布尔，7月19日——朱尔库耶，7月20日——坎南布拉克21日——那拉齐鲁24日——达布苏台27日——奥西坎布里杜——赫阿兰山及土拉河，1712年8月6日——卡鲁布拉山与苏布克图山（以上地名均为音译——译者），8月16及17日。见罗索金前引著作。

这些被满洲音歪曲了的译名，在拉法伊洛夫、博尔谢夫、瓦西里叶夫编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上，一处也找不见。（《俄国亚洲部分南部边界地图》第14库伦，第15北京。圣彼得堡，1888—1903年）。

31 这儿是西伯利亚各站的详细日期：色楞格斯克，52年元月16日即1713年2月10日动身（在正式报告上说是15日，即2月9日）；乌丁斯克2月12日；贝尔加15日；伊尔库次克2月19日至5月27日；叶尼塞斯克6月15—21日；马科夫斯科依6月24日；那里穆柏兴7月8日；苏尔古特16日；萨马洛夫斯科依21日；托波尔斯克8月24日至9月1日。司当东第2章至第7章；苏西埃第150—156页。戈比尔神父说（载苏西埃前引著作第152页），到达伊尔库次克的日期是康熙52年元月19日；这是同相应的公历日期搞混了：52年元月25日=1713年2月19日；在第156页上又说使团从托波尔斯克再动身的日期是52年8月12日即1713年10月1日，应该是7月12日，因为使团到达的日期是7月4日，八天之后离开。中国人在伊尔库次克见到了斯多宾中尉，这位中尉是从托波尔斯克到来迎接他们和伴送他们的。图理琛在他的正式报告中把这件事写成是在52年2月22日即1713年3月18至20日。司当东第3章及第13章《伊尔库次克编年史》上记载使臣到达的日期是1713年3月13/24日。《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8页背面。

32 据图理琛记载，使团在那里从康熙52年10月21日逗留到30日，

即1713年12月8日至17日。但是1713年12月18/29日斯多宾中尉的一份报告中说,使团于11月26日/12月7日到达,于12月3/14日离开。也许中尉是负责提供给养的,比使团早一日到达,比使团早三日离开,这样这两种说法便不矛盾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9年、第8号抄本;在正本上有大地主切别列夫的附加语。

33 司当东第8章;苏西埃第159页。从托波尔斯科到萨拉托夫,使团于1713年9月12/24日经秋明;21至24日埃潘钦;9月30日至10月30日维尔浩土尔,“这里开始是俄国的欧洲部分”;10月14日至11月19日索利嘉木斯克;12月3日卡伊戈罗、赫利诺夫;8至17日喀山;20至26日辛比尔斯克;1714年元月20日萨拉托夫。

34 “我们的地图上没有这个湖泊。我想大概可以念作‘马奴托海’,意即‘马奴的草牧场’。‘托海’是蒙古文,可以用来做许多地理名词的词尾”。见拉米扎前引著作,第425页注。

事实上这四个中国字“马奴托海”中第四个字的意思是指大海,但是也可能仅仅是译音而已。从满文译过来的两个俄文译本译作马奴托海伊。“芒托舒瓦,位于察里津与切诺亚尔之间,在伏尔加河右岸。”见穆勒《文集》,第1卷、第327—348页。

35 司当东第10章;苏西埃第160页。后者称这地名为马农托埃。

36 司当东第11章;苏西埃第162页。

37 同前引用处;同前引用处。

38 图理琛的《异域录》中关于第二次觐见的谈话是这样记载的:“初十日阿玉气汗又请,于是前往。言及阿拉布珠儿之事,阿玉气汗曰,将阿拉布珠儿作何遣回之处,大皇帝自有睿裁。南路断不能来。如从鄂罗斯国行走,必假道于察罕汗(即沙皇——译者)方可。若差人往察罕汗处去,必需时日,天使必至久待,今请天使先回,随后差往察罕汗去,如允我遣使时,再行奏闻。阿玉气汗又问曰,达赖喇嘛可遣使往来否。我等答曰,达赖喇嘛不时遣使,我等来时,途中又遇达赖喇嘛使者。阿玉气汗又曰,今道路不通,我国人不能达至西藏,凡一切药物甚是难得,我于大皇帝恳求一切药物,烦天使留意转为奏闻……我虽系外夷,然衣帽服式略与中国同,其鄂罗斯国乃衣冠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天使返旆时,察看鄂罗斯国情形,凡目击视见者,须留意奏知。大皇帝作何区处,悉听大皇帝睿鉴。至遣使往来人数若多,恐烦悻悻,断绝道途,我遂无路请安朝觐进贡矣!此等情由,烦天使留意奏闻,我恭请至圣大皇

帝万安。我系绝域远夷，蒙大皇帝隆恩，感戴不尽，但愿至圣大皇帝万万岁，将我此言，亦烦奏闻。”——图理琛：《异域录》，清雍正元年刻本，第61—63页。——译者。

39 康熙53年6月4日即1714年7月15日，在达尔马巴拉处饮宴，第二天在多尔济拉希坦处，第三天在沙克度尔扎布处；7月18日喇嘛招待，22至23日交换礼物。见司当东第11章。

车臣汗和多尔济拉布坦的女儿名叫扎冈，她提醒使团，她和她的父母作为一方，同中国皇帝作为另一方，互相通信。

40 司当东第12章；苏西埃第162页。

41 1715年1月23日/2月3日及2月4/15日，西伯利亚总督下令给西伯利亚各司令官命令他们好好接待归国的使团。

1715年1月27日/2月7日噶噶林下令给瑟尼茨基，命令他不仅伴送使团直到边境，而且要阻止龙骑兵们在路上偷喝国家送给中国人的酒。《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85—88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19号、第59—62页。

图理琛后来可能给噶噶林一封信，告诉他伴送他们回国的军官伊凡·萨维奇在北京受到很好的接待。见司当东第14章。到底是伊凡（萨维奇）·瑟尼茨基，还是另外一个军官伴送其中一位大使先回北京呢？参阅下文注45。理藩院于1716年4月19日给噶噶林的信。

42 这是根据司当东的说法，见第13章。两本俄译本和戈比尔神父（苏西埃第165页）则说日期是54年3月27日即1715年4月30日。这个日期是不可能的，因为图理琛于54年元月12日即1715年2月15日离开塔拉，15日（2月18日）离开托木斯克，2月2日即3月7日离开叶尼塞斯克，18日（1715年3月23日）离开伊兰斯克。伊尔库次克的编年史上记载使团于1715年3月26/4月6日经过该地。见《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9页正面。去的时候通过蒙古要足足两个月时间，归途无论如何匆促，这方向相反的旅程，总不能将两个月缩为几天。相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中国人从伊尔库次克（3月底4月初）步行了三个月才到达北京（6月底）。

43 司当东第13章。

44 穆勒《月报》，1764年7月号、第10—11页。这本书直到1723年年底才出版，其中一篇序言的日期是雍正元年11月即1723年11月28日/12月27日。

45 “康熙55年3月27日，公元1716年4月18日（实际是55年3月27日=1716年4月19日）。

我们把一切情况都报告给我们的圣主，圣主欣然倾听，并凛然命令以不同寻常的敬意接待你们此次派出的官员，且予以赏赐。（原文为拉丁文）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48号、1716年。信是用中国纸书写，折成屏风状，盖有皇帝朱红大印。

信内所指俄国“首长”（*prafectus*）可能使人想到是否就是在北京的商队领队，可是1716年时，古谢特尼科夫还没有到达北京（参阅上一章），而且在这些拉丁文信件中 *prafectus* 一词往往指中国官吏，因此很可能这里是指一个俄国军官，也许就是图理琛所说的那个，参阅上文注41。

噶噶林通知理藩院说，使团带去的四个喀尔木克人没有回来。理藩院回答说：他们已经留在阿玉气那里了。

46 康熙56年7月20日即1717年8月23日（实际上是8月26日；比较前面提到的一封信，4月19日写成4月18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81号。

47 在1716年或1717年，参阅前一章。

48 “关于前次出使至喀尔木克汗阿玉气处一事，我从随同这个使团的人员处得知，当时使臣曾带同他的侄儿的喀尔木克游牧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一同前往……利用他们……以推动已故阿玉气从阿斯特拉罕迁回他们以前的草原，现在草原上有理台吉在游荡，中国人答应给阿玉气以武力援助及皇帝的资助，以帮助他打诃台吉。”

格拉儒诺甫1730年8月12/23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0年，第7号。

参阅下文第7章。

除这个鼓舞人心的结果以外，还有一个更实在的结果：中国人第一次直接认识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一般情况。历史家图理琛以中国人特有的精细和其他为克尽职责所必要的品质，并出于重新得宠的愿望，巧妙地完成了他所肩负的了解舆地概况的特殊使命。他所绘制的地图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亚于当时西欧的地图，有时在准确性方面甚至胜过西欧的地图，尽管地图的尺寸较小而且资料较为简略。参阅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第141页。中国皇帝将地图留下来仔细研究。见司当东第13章。

此外，在本书中可以找到极为宝贵的有关居民、驻军以及资源的补充资

料,凡是使团停留过的各个地区,都记有这种资料。这真是当时(1713—1715年)西伯利亚各城市的一幅真正的缩影。

最后,某些简要的历史或人种资料更增加了这本辉煌著作的价值,仍可供研究俄国通史之用(例如同噶噶林的谈话,噶噶林惋惜过去的好日子,在那些日子里只有和平、狩猎和买卖,不象现在在彼得大帝沙皇的治下,不断地要同瑞典人、土耳其人、土尔扈特人、喀尔木克人作战。噶噶林还说,应募的土尔扈特兵士去打瑞典人的时候,十个也抵挡不住一个敌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喀尔木克事务,1707年2月10/21日至9月,第153—154页。

49 图理琛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以后连续几年都负责同俄国交涉事宜。在这部历史书中我们还可以不止一处见到他。

早在1727年北京耶稣会神父已将图理琛的这部著作告知俄国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萨瓦带着假装的或真正的愤懑同图理琛本人谈起过这本书:“他回来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印刷出来,分布到全中国;他在书中写道,整个西伯利亚是荒凉的,没有任何象样的堡垒。”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对图理琛的谈话,1727年4月14/25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大使公务日志、第1卷、第419页正面。

如果说中国人对土尔扈特人表示满意,那么,相反,俄国人对他们的使臣要通过西伯利亚的请求则多方刁难。1717年命令要好好接待阿玉气的那一道谕旨,就拒绝让他的老婆达尔马巴拉的使者到达赖喇嘛那里去。《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5卷、第3062号、第485—487页。可是伊尔库次克编年史在1718年6月记载阿玉气派到达赖喇嘛去的使者归来,《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1页背面;还有外交部1720年的一道训令,取消了1718及1719年禁止阿玉气派使者到中国去的禁令。见交付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及阔留赤甫的文件抄本清单,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82页;中国事务、1726年、第2号。

第六章

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 和喀尔木克人的关系

史料来源

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5年,第4章,散见各处。

阿米奥神父:《厄鲁特王国的征服》,载《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报告汇编》,1776年,巴黎,4开本,第1卷。

波兹尼叶夫:《准噶尔的喀尔木克人简史》,载韦塞洛夫斯基:《炮兵队长伊凡·乌翁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的琿台吉策妄阿喇布坦的朝廷》(参阅第1章《史料来源》)。

毕楚林(修士伊亚森特):《奥伊拉特人或喀尔木克人自十五世纪至今日之历史概要》,圣彼得堡,1834年,8开本。

《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第5卷,第288号;《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XXVIII-XXX号,第80XI-XII号;第11卷,第87号。

《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122号,第2卷,第11、22、28、39、40、47、77、88号。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474、1542、1594、1626、1654、1670号。

穆勒:《文集》,第4章,第183—274页。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9章,第960—962页正

面；1694/7203 9 月；信件、1704—1717年、第44、49、51号；准噶尔事务、1716年12月18/29日；1719年6月28日/7月9日—1721年9月。

多亏北京的传教士们，我们才知道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与厄鲁特人或喀尔木克人斗争的一些情况¹。俄国与中国这些宿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中俄交往所起的影响，看来一直很少受人注意，这是需要加以阐明的。早在中国与厄鲁特人发生最初接触以前，厄鲁特人已趋向俄国了。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断地扩大和加强，但这主要不是俄国与历代琿台吉或厄鲁特首领之间有什么正式的同盟关系，而是由于通过不花刺人的居间斡旋，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联合。最低限度，俄国并未停止鼓励，甚至必要时还鼓动介于俄中两国间的邻近民族的接近，这样俄国就能够运用灵活的政策，使他们变成极好的助手来反对它的敌人。

第一个喀尔木克人的琿台吉和多和亲于1653年死后，他的十一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其中一个儿子在一些兄弟被消灭和流亡以后²，掌握了最高统治权，继承了他父亲的宏图大志。这个儿子就是噶尔丹或博索克图汗³。他于1671年由西藏回来后，首先置他的兄弟们的利益于不顾，自己却牢固地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伊犁地区建立政权；然后他转向东突厥斯坦，即“Boukharie”，征服了该地（1680—1685）⁴。自1688年起他率领军队攻打蒙古，直到1697年他死时为止，他从未放弃蒙古⁵。

他征服土耳其斯坦，从而取得了极为宝贵的商业上的主雇不花刺人，不花刺人是穆斯林，他们与西伯利亚的鞑靼穆斯林有联系，正如他们与中国西部的中国穆斯林有联系一样⁶。噶尔丹包围蒙古，这使他与中国人短兵相接，并使他与俄国人接近。如果我们

相信一份当代文件的话，珲台吉噶尔丹曾派遣使者到俄国去，下述几个年份都提到有他的使者在俄国：1676、1677、1678、1679、1681年⁷。1683年11月间有一个由七十名不花刺人组成的商队到达伊尔库次克，他们的首领是两个“布索克图”的代理人，他们带来了一封给沙皇的信。他们宣称他们的主子已经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摩擦的消息，特地派他们到莫斯科来⁸。几年以后，噶尔丹征服了喀尔喀人，并且毫无阻挡地一直进迫到克鲁伦，使蒙古人非常恐惧，只好在中国人的保护之下向南逃命，甚至也迫使前往色楞格斯克的中国使臣退回来⁹。与这同时，柯罗文前往西伯利亚，不得不与蒙古人及中国人作斗争。噶尔丹与俄国订立盟约，同抗公敌，看来正是良机，因此噶尔丹派遣使者带着他的建议，给当时正停留在伊尔库次克的柯罗文（1690年2月22日/3月4日）¹⁰，还送去尼布楚¹¹，也许还送去托波尔斯克（1690年8月14/24日）¹²，甚至远达莫斯科（1693—1694）¹³。不过这时俄国刚与中国签订和约，柯罗文则刚刚打垮蒙古人，因此他拒绝了 this 建议。俄国只是向噶尔丹表示明显的好意。如果俄国在1693年8月30日/9月9日给各税关督办的训令，叫他们对待不花刺人和俄国人应一视同仁，并严禁向喀尔木克人输出军火¹⁴，如果在1696年2月18/28日给尼布楚长官的条文式训令，命令他善待喀尔木克的使臣，但不要使他们长期逗留，以免加重国库负担¹⁵；另一方面，1697年9月1/11日给托波尔斯克新任长官的训令则更为明确：喀尔木克人不应受虐待，不要强迫其受洗礼，更不许私商贩卖他们为奴隶，买卖奴隶的权归国家专有¹⁶。这时候噶尔丹早已死亡。中国由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1689），摆脱了俄国，马上转过来对付厄鲁特人。1690年9月4日在乌兰布通初战，中国还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制服叛逆¹⁷；1691年康熙召开的一次会议只取得蒙古王公们臣服于中国，而噶尔丹仍然威胁着克鲁伦¹⁸。一次十分猛烈而且极其艰苦的战

役，(一直推进到蒙古南部)，才获得了预期的结果，1696年6月12日中国军队在土拉河上的昭莫多击溃了噶尔丹的部队，噶尔丹不久服毒自杀(康熙36年闰3月13日即1697年5月3日)¹⁹。

对于噶尔丹的继承者策妄阿喇布坦(1697—1727)，中国和俄国两方面都未变更它们的主要政策；只是俄国冒险采取了一种更直接的行动，几乎使它与噶尔木克人和中国都疏远了。

策妄阿喇布坦是前一个琿台吉的侄子，当噶尔丹在稳占准噶尔时(1671—1678)，他就在土耳其斯坦保持权势；当噶尔丹出征蒙古时(1688)，策妄就进入额尔齐斯河与叶密里河的上游地区，再也不出来了²⁰。他起初同中国合谋反对他的叔父，并且从中国方面得到了很有价值的鼓励²¹；同时他向俄国要求津贴(1694年9月)²²，这样他从两方面都得好处。俄国人小心翼翼地对待策妄阿喇布坦和他的代理人不花刺人。当然，如果他们要定居在西伯利亚，俄国就对他们抽一种捐税(1698年3月22日/4月7日)，但这种捐税并不比加诸俄国臣民身上的捐税为高²³。1698年11月12/22日的新税例中，不花刺人受到特别优待：他们不用交纳什一税，而代之以交纳二十分之一的交易税，而且如果他们以琿台吉的名义前来，可以完全豁免捐税²⁴。1699年1月16/26日给秋门行政长官的训令，重申免税的事，并责成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不花刺人²⁵。1699年6月地方当局指令派一个贵族与雅木柴夫河畔的喀尔木克人直接会谈，租用他们的人畜运盐，修建警备和据守两用的碉堡，并调整官方独占的奴隶买卖²⁶。

在十八世纪的头几年，由于缺乏这一时期的资料，我们似乎看不到喀尔木克人与俄中两国的关系。可是从1712或1713年起，他们就从各方面登场了。这时候，中国人和厄鲁特人又在哈密周围地区重启战端。在吃过一次败仗以后，中国人占领了哈密并把它作为进攻的通道。从1716至1720年间，策妄阿喇布坦又在西

藏搞阴谋：他杀死了西藏王噶尔丹丹珠，可是最后在中国外交和军队的压力下不能不放弃了²⁷。象这位珲台吉那样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必然要转向俄国。他同俄国的最初关系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只能假定阿布都拉是策妄阿喇布坦派往俄国的使者，后来这位使者同一些俄国人到北京去，并把俄国人留在北京。当商队的专员，如 1712 年的库迪阿科夫和 1714 年的奥斯考尔考夫，要求中国交还这些人时，中国只拒绝交还其中的穆斯林，其他俄国人并不拒绝交还。这就是当时理藩院给噶噶林的信件所述的全部内容²⁸。1714 年 10 月 9 日的另一封信说得更清楚一点。这封信上谈到，有一个俄国商人取道喀什噶尔来中国时，在策妄阿喇布坦的领土上被策妄阿喇布坦囚禁了一年，这个商人于 1714 年年中时到达西宁附近的甘肃。驻在西宁的理藩院郎中批准他同他的三十一个伙伴进入土坝(大坝，西宁的一个区)。由于他们申请另一条道路归国，不走突厥斯坦，理藩院把这事通知在北京的俄国商队专员奥斯考尔考夫。奥斯考尔考夫这时正准备动身归国，他不想等待他的同胞，就同中国人商妥，决定叫这些人假道蒙古回国，以躲避策妄阿喇布坦和他的伏兵²⁹。

这只是策妄阿喇布坦对俄国人的恶意或敌对行为的开端。1713 年 6 月 20 日/7 月 1 日，沙皇的一道谕旨和西伯利亚总督的一道命令，派遣塔拉的哥萨克伊凡·狄米特利也夫·车瑞多夫到这位珲台吉那里去。他负责交给策妄阿喇布坦一封信(清单)，信内列举俄国对策妄阿喇布坦的抱怨和要求。喀尔木克人抢劫巴拉巴和库兹涅次克的居民；他们毁坏了比雅和卡东之间的巴肯要塞，杀死和抢劫了商人马太·波柏的一个雇员³⁰。俄国要求喀尔木克人停止这种暴行，归还抢走的商品或予以赔偿。从 1713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7 日至 11 月 21 日/12 月 2 日，差不多一个月，车瑞多夫求见策妄阿喇布坦而不可得。最后终于在 1713 年 11 月 21 日/

12月2日获得觐见,于1714年2月29日/3月11日又获见一次。对于俄国的要求,策妄阿喇布坦提出自己的要求来抗衡:比雅和卡东之间的土地是他的领土,哥萨克人对喀尔木克人所犯的罪行也不少于喀尔木克人对俄国人所犯的罪行。他最多只想归还一部分抢来的商品,而且效法俄国人的榜样,赶紧要向这些商品课征什一税。1714年3月21日/4月1日车瑞多夫不得不带着这微小的结果回国。他于1714年10月4/15日回到塔拉,除了带回归还的商品以外,总算带回了一个不花刺人的商队和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到莫斯科送信的两名使者³¹。不花刺人似乎于1714年10月30日/11月10日抵达托波尔斯科,但两个使臣却未获准许进入俄国的欧洲部分³²。

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大帝正试图在中亚细亚进行一次军事远征和建立一些工矿企业³³。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自1712年就听说土耳其斯坦出产金砂;他甚至说曾经在托波尔斯科看见不花刺人那里有金粉。这些不花刺人声称他们是由大利雅的艾尔凯特获得这些金粉的³⁴。这些地名(Yarkand, Yarkand daria)既不明确,又不为人所知,因此需要了解更多一些情况。1713年噶噶林派遣托波尔斯科的大贵族格利哥瑞·楚迟尼考夫到“西宁和大坝”两个城市去,据说这两个城市座落在东南部,是金矿的中心(西宁和大坝在甘肃)³⁵。经过调查以后,他写信给沙皇说,由额尔齐斯河起,依靠一些碉堡作支援,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到达“艾尔凯特”³⁶。于是沙皇立刻于1714年5月22日/6月2日下了一道谕旨,命令中校巴赫尔慈按照噶噶林所提供的情报,由托波尔斯科带走一千五百人,包括原是瑞典战俘的工程和采矿专家,前往雅木柴夫建造一个据点。他就要在那里过冬,等到1715年的春天,他将前往“依尔凯特”或“艾尔凯特”找寻金矿³⁷。1715年2月17/28日噶噶林写了一封信给琿台吉,答复交由车瑞多夫带回来的信件,信中他

极力否认喀尔木克人在叶尼塞河上游的权利，并说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全部属于俄国，同时基于互惠的原则，他要求俄国人有关通商的自由权³⁸。噶噶林给琿台吉的另一封信通知他巴赫尔兹率领考察队前来，希望他对这个考察队的目的不要担心，并且向他许诺如果他不干扰这支考察队的军队，将来他可以得到帮助和支援。1716年2月一道谕旨命令塔拉的百人长B·B·车瑞多夫和托波尔斯克的大贵族艾谛格尔携带这封信到琿台吉那里去³⁹。而彼得大帝则于1716年8月7/18日在哥本哈根的“英格莫兰德”号船上向巴赫尔兹发布了一道命令⁴⁰，又于1716年12月18/29日从阿姆斯特丹向琿台吉发出一封介绍信⁴¹。

但是这封信还没有到达收信人手里，噶噶林就不得不在信中添了一些话，这是由于事件的发展而引起的。巴赫尔兹于1714年11月13/24日到达托波尔斯克⁴²，并于1715年7月率领三千人和一千五百匹马从该处动身沿额尔齐斯河上溯。当他于1715年10月1/12日到达雅木柴夫湖时，他立即动手建造一个要塞，到1716年4月28日/5月9日还没有完工。这时巴赫尔兹派往送信的一个中尉，加入从托波尔斯克回来的琿台吉的不花刺人商队⁴³，这个中尉落入哥萨克游牧民手中。而琿台吉的一个将军车尔润已于1716年2月21日/3月3日写了一封语含威胁的信给巴赫尔兹⁴⁴。这个威胁不久就真正实行了：喀尔木克人以优势兵力对俄国人进行猛烈的攻击，击溃了俄国人并使俄国人后退。1716年4月28日/5月9日他们自己毁坏了雅木柴夫要塞并沿额尔齐斯河后退；在第一个要塞的下游，他们又建筑了另一个，巴赫尔兹把这个要塞交给少校维利亚米诺夫—捷尔诺夫镇守（1716年12月22日/1717年1月2日）。这个新要塞就是鄂木斯克。1716年12月31日/1717年1月11日俄国考察队的残存人员回到托波尔斯克。巴赫尔兹则于1717年9月2/13日回到圣彼得堡为自己辩护⁴⁵。

不过，噶噶林仍想弥补这次不幸事件。1717年3月7/18日，他派遣托波尔斯科的贵族格利高瑞·维利扬诺夫送给琿台吉一封沙皇于1716年12月18/29日写的信，和一封他自己写的信，信中要求琿台吉对下述事件给予解释：车尔润杀死了许多俄国兵士，俘虏多人，抢劫了俄国财政部作军饷和经商用的钱财，还抢走要塞驻军的全部马匹。大贵族阿列克西·马瑞姆阿尼诺夫曾为此事带了一封信从托尔波斯克出发到琿台吉那里去，但是从此没有回来。策妄阿喇布坦怎样回答呢⁴⁶？据说，他的回答是把来使一直拘禁到1718年2月28日/3月11日和回复了一封充满威胁口气的信⁴⁷。但是，就在此时，中国攻打哈密和吐鲁番，把风暴又转移到另一方面去了。噶噶林本来还想派遣中校斯多宾于1717年夏天去雅木柴夫重建要塞，并以另一堡垒来支援⁴⁸。但这一计划终成泡影。因为沙皇非常愤怒，免去噶噶林的西伯利亚总督的职位，并将他召回圣彼得堡（1717年年底或1718年⁴⁹）。案情调查了一年多。对噶噶林和巴赫尔慈的审讯日期是1719年1月22日/2月2日和1月29日/2月8日⁵⁰。他们只供认他们对奇妙的黄金国缺乏正确的情报，以及上溯额尔齐斯河和远征南方荒僻地区所遇到的危险和困难。

为了查对噶噶林和巴赫尔慈的口供，彼得大帝指派了一个官员到现场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这位官员就是近卫军少校伊凡·米哈伊洛维奇·里哈列夫。关于此事的第一道谕旨是1719年1月18/29日发布的；第二道谕旨应里哈列夫本人的请求，准许他带两个医生、两个科学院的地理研究生，以及一些钱和烟草前往，这道谕旨是同年1月31日/2月11日发布的⁵¹。里哈列夫于1720年5月8/19日从托波尔斯科出发，同年10月13/24日回到该地。虽然他与喀尔木克人在8月1/12日有过一次交战，他还是能够使喀尔木克人交还从1716年就被囚禁的B. B. 车瑞多夫，并

且创建了奥斯特—卡缅诺格尔斯克城⁵²。

里哈列夫没有能够越过雅木柴夫。因此他派遣特使到琿台吉那里去：1719年6月28日/7月9日特使伊凡·狄米特利也夫·车瑞多夫动身再到喀尔木克的首府去⁵³。他携带一封信历数1714年以来俄国的所有不满，并要求终止这种继续不断的侵犯。车瑞多夫从托波尔斯克动身，假道额尔齐斯河到达叶密里盆地（1719年9月27日/10月8日）。11月20日/12月1日喀尔木克人拿走了他的信件，把他逮捕和放逐，一整年以后才能见到琿台吉（1720年11月20日/12月1日）。一个月以后，他辞别了策妄阿喇布坦（1721年1月9/20日）于4月26日/5月7日回到塔拉。他受到策妄阿喇布坦接见一事虽然并不很令人鼓舞，但还是说明喀尔木克人的态度有了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主要是由于中国人的胜利。琿台吉推说他从来没见过马瑞姆阿尼诺夫，并且交给维利扬诺夫一封回信。他非难俄国接待中国派赴阿玉气的使团，他认为这个使团是为了谈判一个针对他的中国—土尔扈特同盟才去的；他也害怕强迫改信宗教，象俄国人强迫阿玉气的属民土尔扈特人那样。对于俄国要求他臣服一事，他的回答似乎是含糊的：如果俄国人把蒙古人给他，象把芒古特人给阿玉气一样⁵⁴，他就不会拒绝。为了此事，他委派了两名使节波罗柯尔干和洛藏去见沙皇⁵⁵。

这时策妄阿喇布坦在哈密附近被中国击败，并被逐出西藏⁵⁶，一个中国使臣直接了当地要求他对中国皇帝称臣。他拒绝了，因为他发觉从俄国方面所得更多些⁵⁷。他的使臣波罗柯尔干于1721年9月6/17日抵达圣彼得堡，并将琿台吉的一封信交给沙皇。次日，当这个使臣在外交部被询问时，他以其主人的名义提出允许俄国探矿者自由过境，交换条件是订立反对中国的防御同盟⁵⁸。他在俄廷停留了两个月。当他离开时，沙皇派遣了一个受命劝导琿台吉正式臣服的特使与他同行，这个特使就是炮兵上尉伊凡·温

阔甫斯基⁵⁹。

派温阔甫斯基出使的谕旨是1721年11月5/16日签署的；沙皇给琿台吉的国书的日期是11月26日/12月7日；给温阔甫斯基的训令的日期是1721年12月31日/1722年1月10日⁶⁰。如果琿台吉肯签订臣服条约，温阔甫斯基可以答应他俄国会向中国作交涉，必要时，就作一次军事示威；阿玉气的例子，送给琿台吉的礼物，对他的部众的赏赐⁶¹，也许可以使他答应臣服。俄国也绝不忽视喀尔木克人的不完全建议，于是它派遣专家去找寻矿藏，并且叫温阔甫斯基向琿台吉指出发现矿藏会给他带来许多好处，一方面他自己可以分得一部分利润，另一方面他的臣民也会被俄国召募去作工人或矿工，这样他的整个国家就会富足起来。但是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温阔甫斯基将设法使策妄阿喇布坦让与领土，以便在这些领土上建筑堡垒要塞，修建一条连续不断的堡垒线会使西伯利亚与前哨站连接起来，并且可以保护所有的探矿活动。

1722年6月26日/7月7日，西伯利亚的新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写信给琿台吉说，俄国正在将喀尔木克和不花刺的俘虏遣送回国，并对使臣波罗柯尔干优加款待，因此他相信琿台吉将报与互惠，提议两国应就细小的分歧友好地协商解决⁶²。温阔甫斯基和波罗柯尔干于1722年2月25日/3月8日离开莫斯科，同年11月17/28日到达喀尔木克首都。温阔甫斯基只是在一年以后1723年11月18/29日才启程回国。他于1724年1月23日/2月3日到达托波尔斯克，于4月3/14日到达莫斯科⁶³。

虽然停留了很长时间，但这次出使的收获是不确定和微小的。俄国交涉的全部效果，只不过是交换俘虏，以及一方含混地答应臣服，另一方含混地答应给以保护而已。这种相对的失败是不难找寻其原因的。中国的康熙皇帝刚刚逝世(1722年)，中国的一个使团来到琿台吉那里以新登基的雍正皇帝的名义提出和议⁶⁴。中国

的改变政策,对于策妄阿喇布坦的意向当然不是没有影响的。从今以后,不再需要与俄国联盟了。策妄阿喇布坦今后唯一的目的是不要用无礼的拒绝来伤俄国的感情,借着各种诺言来使俄国高兴,同时利用这种关系,继续与俄国进行对不花刺人非常有利的贸易。

因此,温阔甫斯基出使的主要收获是通商。既然按照惯例,俄国商队伴同俄国代表前往,由于它的官方性质,得以免交喀尔木克人通常课征的捐税,并得同瑛台吉的不花刺人接触⁶⁵,这时一个喀尔木克人和不花刺人的商队到达托波尔斯克,也就去访问了欧洲俄罗斯。这是托波尔斯克官方于1723年2月19日/3月2日给温阔甫斯基的一个备忘录中宣布的;这个备忘录发出的日期是1722年11月15/26日。策妄阿喇布坦的代理人阿桑科雅曾经申请允许喀尔木克商人经由维尔浩土尔到俄国的欧洲部分去,这一请求得到批准,他们还得到充分的经商自由,而且免缴关税,甚至数目有限的关税⁶⁶。

温阔甫斯基出使的最后一个结果是策妄阿喇布坦派遣了一个名叫达尔加的使臣,携带着书信和礼物随同温阔甫斯基到莫斯科去⁶⁷。这封信似乎是不重要的,送去的礼物也价值不大。但是达尔加到达了莫斯科,于1724年4月2/13日完成了他的使命⁶⁸。事情就是这样拖下去了。彼得大帝不久逝世(1725年1月28日/2月8日),再过不久,两个游牧民族的伟大首领,土尔扈特人的阿玉气汗于1724年,喀尔木克人的策妄阿喇布坦瑛台吉于1727年,也相继逝世。

这样,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内,俄中两国对于喀尔木克人的政策都没有离开它们各自的主要原则。中国一直企图借着外交和劝说的办法,先把噶尔丹后把策妄阿喇布坦拉到它的藩属范围内,但是因为它先后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失败了,于是不得不使用

武力来抑制这两个大首领的野心：前者想控制蒙古，后者想控制西藏。而俄国方面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手法。它不只是对于不花刺商队多方免税、在商业上给以充分自由和特殊优待，任由商队把瑯台吉所属各地的产品、中亚的棉布、金粉、奴隶和各种违禁品如烟草、大黄等等运进西伯利亚，而且力求使策妄阿喇布坦（如果不是使噶尔丹）与自己建立更密切的同盟和臣属关系，并且示以策妄阿喇布坦的劲敌阿玉气的先例。俄国所受到的一次严重的军事挫折，非但没有招致俄国对胜利的喀尔木克人进行报复和决裂，反而使得两国更频繁地交换使臣、外交和商务使团，而且显然一点也没有使得俄国改变对它的强邻的一向的和解政策，因为这个强邻即使中立，也会带来严重后果。中国也感到这一点，并且正是因为中国深切地感到这一点，所以俄国与一直是中国世仇的、野心勃勃和好战、好乱的厄鲁特人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对俄政策不会不直接产生影响。中国不得不与喀尔木克人交战，以及谣传中的俄国和喀尔木克人的联合进军和订立同盟，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在十八世纪时对待俄国态度的变化。

注 释

1 张诚神父，载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5年，第4章，散见各处。对于张诚神父的叙述，要分清他亲眼目睹的事件和他道听途说的事件。在他道听途说的事件中，有关于喀尔木克王公们的世系和内部斗争的事，波兹尼叶夫先生用新资料来批评和否定的，正是这部分（参阅《……简史》，上文《史料来源》）。但这丝毫没有减少张诚神父关于1688至1697年期间的报道的价值。

阿米奥神父：《厄鲁特王国的征服》，载《关于中国历史……汇编》，巴黎，1776年，第1卷，4开本。

2 参阅第一章。“噶尔丹的父亲，和多和亲王取名为巴图尔瑯台吉……”，阿米奥前引著作，第331—332页注。比较毕楚林：《……喀尔木克人历史概要》，圣彼得堡，1834年，8开本、俄文版、第24—25页注。

据波兹尼叶夫先生前引著作，第240页以下，这位第一代的琿台吉共有十一个儿子：车臣汗，卓特巴巴图尔，邦达里，佐里克图和舒奇，翁琼，僧格，噶尔丹，布姆混名埃代纳台吉，多尔济扎布，普恩苏克达希，达尔马。长子车臣汗死于1676—1680年之间；后面三个定居青海；多尔济扎布被蒙古人土谢图汗于1687年杀死；翁琼起先同噶尔丹联合，约死于1682年。

3 噶尔丹—博索克图。波兹尼叶夫：《蒙古及蒙古人》圣彼得堡1896—1898年，8开本，2卷，俄文第1卷第467页；“噶尔丹即喀尔木克人的博索克图汗”，萨瓦·多拉的思拉维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大使公务日志、第1卷、第234页正面。

4 僧格既然不是长子，就为了继承问题不得不同琿台吉的两个大儿子车臣汗及卓特巴巴图尔斗争。这两个大儿子于1671年夏末或秋天杀死了他们的弟弟。噶尔丹原来在西藏学习喇嘛教义，这时立刻赶了回来。1671年冬有消息说他在额尔齐斯河上流。1676年他大败车臣汗。然后人们发现噶尔丹在伊犁(1677年)，在额尔齐斯河(1679年)，在叶尔羌河(1680)，在突厥斯坦的“赛里木”之围(1681, 1683—1684)，攻打安迪扎内人(1683, 1685)。波兹尼叶夫《简史》第247页以下；《……回忆录》，第1卷、第331—332页、注2。

5 参阅第1章。

6 参阅第2章。

7 蒙古人及喀尔木克人派往俄国的使者名单，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9卷、第960至962页正面。早在182年(1673—1674)已有这样的记载：“从莫斯科送回……西伯利亚喀尔木克台吉噶尔丹及阿拉布托尔的使者”；可是噶尔丹这个名字在喀尔木克人中间是常见的(有两个琿台吉用这个名字)，并不能证明指的就是琿台吉本人。相反，在183年(1674—1675)、185—188年(1676—1677至1679—1680)和190年(1681—1682)就可以发现有如下的记载：“(遣返)琿台吉噶尔丹之使者”，或者“送回博索克图汗的使者，喀尔木克台吉博索克图汗之使者……”。比较斯洛夫齐索夫：《西伯利亚简史》，圣彼得堡、1838—1844年，8开本，2卷、第1卷、第199—200页，可是没有参考资料。

8 琿台吉的信在伊尔库次克不能翻译，因为它“不是用蒙古文(喀尔木克文)写的，而是用西藏文(唐古特文)写的”。因此不得不依靠两个使者梅尔冈科西尤切伊和梅尔冈巴汉的口述。他们也带来了一些丝绸礼品，于1684年11月8/18日到达伊尔库次克。伊尔库次克长官基斯梁斯科伊给叶尼塞斯

克长官奇切巴托夫的报告。手稿题为：“科学院收藏的叶尼塞斯克档案抄本（第4部分第415页）”，载《考古学会搜集及编辑之史料补遗》，第11卷、第87号、第235—238页。

托木斯克的开销帐簿上记载有从193年（1684—1685）11月3/13日至12月1/11日为喀尔木克博索克图汗的使者付出的费用，似乎可以证实前述资料。伊尔库次克“州”行政管理档案，载前引《史料补遗》，第67XXX号、第275页。

9 参阅第1章。

10 参阅第1章。

11 伊尔库次克长官基斯梁斯科伊1691年1月9/19日给沙皇的报告。手稿题为：《科学院收藏的托波尔斯克档案抄本》，载《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XXVIII号、第268—269页。

1696年1月21/31日译员古里雅·乌拉索夫对伊尔库次克长官萨韦洛夫之供词。这个译员负责找出一条从色楞格斯克经蒙古到北京的通路，被琿台吉俘虏，琿台吉对他说曾经派过使者到伊尔库次克和尼布楚去。同前引手稿，载同前引，第10卷、第80XII号、第374—375页。

12 1690年11月24日/12月4日托波尔斯克长官索尔蒂科夫向沙皇报告，8月14/24日来了一位琿台吉的使者，名叫伊尔基达尔汉，他从托木斯克来，带来了一封信和一些礼品，长官请示沙皇，可否让他通过俄国欧洲部分。1月27/2月6日给他的回答是不能。同前手稿，载同前引，第10卷、第80XI号、第368—373页。

13 202年（1693—1694）使者阿勃杜尔埃基带了琿台吉的一封信到莫斯科来，信中宣告他战胜了蒙古人，并表达了他的友好的愿望。也带来了礼品（丝绸和宝石）和价值7,650卢布的商品。

203年（1695）3月22/4月1日使者阿勃杜尔埃基和达尔汉从西伯利亚带来（带到莫斯科？）琿台吉的一封信和一些礼物，礼物中有一大块青玉，俄国人和外国人（希腊人和荷兰人）估计值一千至三千卢布。同前手稿，载同前引，第10卷、第80XI号、第368—373页。

不幸得很，这些数字都不大可靠（例如荷兰人的估计是在202年5月10日，这只能是203年之误，除非203年3月22日是指202年3月22日），必须很仔细地对照手稿。

14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474号、第14—18节。

15 同前引,第3卷、第1542号、第31节。

官方使节是由国库出资招待的,无论是俄国使节到中国去(参阅第4章)或者外国使节到俄国来,都是如此,例如1712—1715年的中国使团,就是如此(参阅第5章)。

16 前引法律汇编,第3卷、第1594号、第18节。

17 参阅第1章。

18 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6年、第4卷、第59—63以及第314, 315页。

19 参阅第1章。迪·荷尔德前引著作,1736年、第4卷、第476页。

20 波兹尼叶夫《简史》第247—257页。作者根据一个中国人的叙述,这个中国人名叫博奇儒,于康熙41年(1702)被派到策妄阿喇布坦那里去。这段叙述可能是满文,可是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也没有说明出处。

21 韦塞洛夫斯基《炮兵队长……》,第186—189页。

22 博索克图汗的侄儿恰冈阿拉布坦的信,写于203年(7203=1694—1695)。在信中他宣称他不象以前那样从俄国人处得到补助,而且说他离阿玉气只有半个月骑马的路程。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694/7203年9月、第V/15柜、第2/b本。

23 向托波尔斯克的不花刺农户和商人征税,如同向俄国人征税一样。《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26号、第446—447页。

24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654号、第12节。

25 前引法律汇编、第3卷、第1670号、第541页、第2行。

26 地方行政长官训令。小册子,由秘书加拉西莫夫签署,归枢密大臣伊凡诺夫所有,载《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第5卷、第288号、第520—532页。

27 韦塞洛夫斯基:《炮兵队长……》,第189—193页;波兹尼叶夫前引著作第257—264页,《蒙古编年史》,第275页以下。波兹尼叶夫所说的“拉藏汗”很可能就是阿米奥所说的“拉藏”王(即西藏王)。《征服厄鲁特纪功碑》,载《关于中国历史……汇编》,第1卷、第335页注;迪·荷尔德:《概述》,1736年、第1卷、第481页。

28 伊凡同阿布都拉一起到北京来,在归途中死于保安。另外一个俄国人伊尔玛伊带着全家同时到来,住在厄鲁特王公多尔济塞布坦的领土内,也被俄国要求遣返。理藩院于康熙51年5月6日给噶噶林的信(即1712年6

月9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51号。

多尔济塞布坦将这家人家交还给奥斯考尔考夫。理藩院于康熙53年8月8日即1714年9月16日给噶噶林的信。同前引，第44号。

噶噶林要求归还六个俄国人，他们都是阿布都拉的伙伴，在归途中留在库库和托。康熙51年(1712)调查结果如下：一个穆斯林，穆拉德·贝，俄国人称他做帕伊帕尔的，同阿布都拉一起归来，留在策妄阿喇布坦的弟弟丹齐拉那里。穆拉德·贝同伊凡·贝这两个穆斯林(回子)都不能象伊凡或伊尔玛尔那样归还。理藩院于康熙53年9月26日即1714年11月2日给噶噶林的信。同前引，第49号。

这个穆拉德和伊凡会不会是第四章所说的改宗穆斯林的希腊人呢？

29 康熙55年9月2日即1714年10月9日理藩院给噶噶林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无号码。信上说，商人取道加斯(Gas)来。加斯这个名字在图理琛的地图上出现在突厥斯坦的西部。参阅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载《科学使命的新档案》，新丛书、第1分册、巴黎、1910年、8开本、第136页以下。

30 马太·波柏的雇员名叫蒂莫泰·加克巴克。这个马太(劳伦特的儿子)·波柏就是根据1695年5月17/27日发给维尔浩土尔城的谕旨，取得在西伯利亚经营大黄五年专利权的商人。参阅第二章。

31 车瑞多夫的公务日志。《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86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1卷、第122号、第515—527页。商品清单包括丝绸、棉布、兽皮、红茶。

32 “1714年我派了两个使者埃凯托苏尔加伊和冈杜克埃康到托波尔斯克和莫斯科去，人家不让他们通过。”琿台吉对车瑞多夫1721年1月4/15或7/18日的谈话。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准噶尔事务、1719年6月28/7月9日、第32号。

1714年10月30/11月10日，琿台吉的代理人不花刺人代康曼格里叶夫到达托波尔斯克。他在雅木柴夫湖畔离别了别的使者埃凯托尔索和雅和冈杜尔冈杜诺夫。他带来一封琿台吉的信和一些商品(毛皮、丝绸、棉布、茴香、绿茶和中国瓷器)。《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68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16号、第51—52页。

33 穆勒《文集》第4卷第183—274页对这件事给了一个完整而且似乎是正确的叙述，他可能于1734年在托波尔斯克的档案里读到这件事，而且得

到亲眼目睹者的佐证。《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参阅下文)里所刊载的档案文件在实际上证实了他的大部分断言。

34 噶噶林于1719年1月29/2月9日交给枢密院的几个要点的抄本,第9点。《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122、123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39号、第138页至144页。

35 据穆勒前引著作。楚迟尼考夫于1716年回来。穆勒叫他做费多尔·楚迟尼考夫。

36 同前引同处。

37 《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117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11号、第35—37页。据穆勒,伊凡·巴赫尔慈是前近卫军中尉。这个姓在俄国的文件里写成 Boukholtz (有时写成 Boukhaltz, Boukhalt, Boukholtz),这是一个德国姓的译音。

雅木柴夫湖是一个小小的咸水湖,位于额尔齐斯河右岸,在鄂木斯克与塞米巴拉金斯克之间,今雅木柴夫斯克要塞就座落该处。参阅温阔甫斯基的地图,载韦塞洛夫斯基的《炮兵队长……》。

38 于1715年7月7/18日交付。《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87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22号、第66—68页。这封信是写给琿台吉埃尔德·尤里哈塔的,这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又一个名字。

39 《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66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28号、第85—87页。

40 1715年12月26/1716年1月6日巴赫尔慈写信说,带着太少量的军队去冒险未免太危险。沙皇谕旨告诉他说,噶噶林已收到有关这件事的训令。《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115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39号、第126页。

41 在1715年噶噶林亲王奉令在额尔齐河上流以及斋桑湖一带找寻矿产,并在那里建造城市。如果琿台吉不反对这样做,俄国准备同他订立攻守同盟。《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120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40号、第151—152页。这个“仁谕”的草稿上载有,如果琿台吉拒绝的话,则由俄国人、阿玉气以及其他游牧民族联合向琿台吉发起总攻击。这一段后来在原本上删去了。1715年12月18/29日彼得大帝给琿台吉的公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准噶尔事务、第IV/92柜左边第1/a本。

42 下文中的事件是按照巴赫尔慈1719年1月22日/2月2日在圣彼

得堡的证言叙述。原始抄本由巴赫尔慈上尉签署。《托波尔斯科札记》，第4章、第122—123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39号、第144—149页。

43 这就是伴同车瑞多夫从西伯利亚回来(1714)的那个商队，于1714年10月30/11月10日到达托波尔斯科。参阅上文第145页注31。

44 “车尔润将军给上校先生”(再也没有别的字样)。《托波尔斯科札记》，第4章、第88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40号、第150—151页。

45 巴赫尔慈增加了一些关于从塔拉到艾尔凯特的距离的说明：从塔拉到雅木柴夫要一个月以上路程，沿着额尔斯河上溯，离该河的发源处越近，路变得越来越难走，从斋桑湖到艾尔凯特没有水路可走，陆路则无人知晓。塔拉的一个贵族说，要三个月和八至十天的骑马路程才能到达艾尔凯特附近的金沙矿。同上引同处。

鄂木斯克的建立由温阔甫斯基所证实。参阅：韦塞洛夫斯基的《炮兵队长……》、第15页。

46 《托波尔斯科札记》，第4章、第56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47号、第171至174页。

47 维利扬诺夫于1718年5月16/27日回到托波尔斯科。穆勒前引著作。

48 这个要塞名叫舍莱桑卡，在鄂木斯克和雅木柴夫斯克之间，到今天还存在。前引著作。

斯多宾就是负责从伊尔库次克伴送中国使团到阿玉气处的军官。参阅上一章。

49 据斯洛夫齐索夫《西伯利亚简史……》，第405页上说是1717年末，但未注明出处；据穆勒前引著作说是1718年；在穆勒之后，安德烈维奇也说是1718年。《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889年、8开本、2卷、第2卷、第56页（根据这本书的这一段，噶噶林是1711至1718年的西伯利亚总督，可是在第2卷第427页上又说是从1710至1719年）。

50 《托波尔斯科札记》，第4章、第122、123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39号、第138至144页以及144至149页。

这次不幸的远征在下述西方的著作中也多少有些正确的反映：韦伯，《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4开本、第155—159页；施特拉伦堡，《欧

亚两洲东北部……》，斯德哥尔摩，1730年，4开本、第6章、第236—238页及第252—256页；《根据俄国与瑞典战争中瑞典在西伯利亚的战俘的原始回忆录写成关于蒙古的叙述》，阿姆斯特丹，1737年，12开本、第272—276页；J·贝尔（安特蒙尼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1763年，格拉斯哥，4开本、2卷、第1卷、第192页以下。

51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5卷、第3284号、第616—617页，第3292号、第622—623页。

52 关于里哈列夫有一系列的谕旨。《托波尔斯克札记》，第4章、第133、136、137、138、141、143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53号第182至209页。比较斯洛夫齐索夫前引著作，第1卷、第406—410页，但未注明出处。

53 关于车瑞多夫的事件始末和他的公务日志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准噶尔事务、1719年6月28日/7月9日至1721年9月，第4柜、42左边、第1/9本。

54 “如果沙皇陛下象曾经将芒古特人赐给阿玉气一样，也将曾起来反对过我的蒙古人赐给我，那么我们会指出黄金的产地。”

在伏尔加下流的俄国各站（察里津，阿斯特拉罕）西南部，是一片高原，更往西一点，有库班人或芒古特人，土耳其人，他们时常劫掠俄国人和土尔扈特人。据图理琛的著作，司当东译本、第12章。

55 车瑞多夫的报告共56点，包括一些十分有趣的细节：车瑞多夫起先在叶密里盆地，后来作为俘虏被送到伊犁盆地（在特克斯的支流科诺哈一带）（甘肃？）。据伴送他的哥萨克人说，瑞典人勒纳被车尔润将军在雅木柴夫俘虏，现在留在琿台吉身边。他负责为策妄阿喇布坦铸造大炮。公务日志、第52节。

关于勒纳，参阅马克切耶夫：《准噶尔地图，由瑞典人勒纳在被喀尔木克人俘虏期间绘制（1716—1733）》，载《地理学会札记（一般地理）》、第11卷、1888年、第115页以下；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载《科学使团的新档案》，新丛书、第1分册，巴黎、1910年、8开本、第209页。

56 “庚子年（1720）宫廷得知如下令人愉快的消息：中国军队彻底打败了厄鲁特王策妄阿喇布坦，他曾占据喇嘛的国土，蹂躏该地达四年之久，这次胜仗以后，西藏保留在胜利了的我军手中。

“虽然这次征伐远离中国边境，仍然引起极大兴趣，因为皇帝念念不忘结

束这次战争。”迪·荷尔德：《概述》，1736年、第1卷、第481页。

57 (1720年)11月23日，琿台吉召见我们说：中国大使到阿玉气那里去是为什么？是为了观察该地还是为了怀着攻打我这个总的意图？你们知道而你们不告诉我。……这次出使以后，这些大使又到我这儿来，其中一个阿达加达，另一个是米斯。他们劝我同他们的沙皇结成同盟。可是我拒绝了，不愿当他们的奴仆，理由如下：我在他们帝国境内名为首领，我不能自由支配我的臣民；而且一有使臣为办事而来，他们就凭中国汗的谕旨，夺取妇女和姑娘去做他们臣民的妻妾，这是违反我们的法律的。

1720年11月23/12月4日琿台吉对车瑞多夫的谈话。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准噶尔事务，1719年6月28/7月9日、第23节。

58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准噶尔事务?)1721年7月22日、第9—13、23—25、29—39页；1721年11月26日、1722、1723年，据韦塞洛夫斯基：《炮兵队长……》，第VIII-XIX页及第XXIII页。

59 关于这次出使，外交部的档案文件曾被韦塞洛夫斯基所利用，而且部分在他著作里刊登出来(可惜没有注明号码)，他的著作在本书第一章《史料来源》里曾引用。

6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11月26日、1722、1723年，第13—15页第2号，33—34、86—92页，载韦塞洛夫斯基：《炮兵队长……》XX-XXVI，210-215，218—219。韦塞洛夫斯基先生引用的号码是CB(本)IV/42，这同本书引用其他文件的号码相反，IV/42应该指的是本子所在的柜子，本子本身有一个阿拉伯号码和一个小拉丁字CB.1/a或者CB.2……等等。参阅：《参考书目》。

61 送给琿台吉的是：红呢绒，德国丝绸，毛皮，狩猎鸟；送给部众的是五百卢布。韦塞洛夫斯基前引著作、第XXII-XXVI及215页。

6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11月26日、1722、1723? 第1号，载韦塞洛夫斯基《炮兵队长……》、第215—217页。

温阔甫斯基带回来一个使臣波罗柯尔干，一个喀尔木克的小王公巴伊戈洛克(关于他，参阅《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124、125、126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77号、第295至350页，又《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142号，同前引，第2卷、第88号、第396—399页)，八个不花刺商人，他们是琿台吉的属民，自1716年以来被留在托波尔斯克，七个不花刺人逃亡分子。韦塞洛夫斯基前引著作，第135页。

63 韦塞洛夫斯基第1、3、10、13、15—18、21、31、34页，归途第145—152、156、158—160、162页。

下列是沿途各站：托波尔斯克1722年4月11/22日至6月29/7月10日；鄂木斯克7月31/8月11日；雅木柴夫8月25—28/9月5—8日；塞米巴拉金斯克9月14/25日；斋桑湖10月17/28日；伊犁11月13/24日；喀尔木克首都1722年11月20/12月1日（第1页记载1722年11月17/28日；他们于17/28日到达离首都几公里的地方，11月20/12月1日隆重地进入首都，呈递国书及礼物）。

归途：喀尔木克首都1723年9月18/29日，伊犁9月21/10月2日；科尔戈斯（库恩热斯？）9月23/10月4日；博尔塔拉（博罗塔拉）9月30/10月11日；叶密里10月10/21日；塔城10月16/27日；阿古斯特河或爱古斯特河10月18/29日；额尔齐斯河10月28/11月8日；塞米巴拉金斯克10月30/11月10日；雅木柴夫11月23/12月4日；鄂木斯克12月20/31日；塔拉1723年12月31日/1724年1月11日；托波尔斯克1724年1月23/2月3日。

参阅韦塞洛夫斯基原著后面温阔甫斯基的地图。

64 温阔甫斯基向外交部的报告，1724年1月29/2月9日写于托波尔斯克，载韦塞洛夫斯基前引著作，第1—4页。

温阔甫斯基日记的详情，参阅同上引，第34—145页各处。

温阔甫斯基也搜集到琿台吉身边赞成和反对同俄国联盟的两派激烈争论的情况。琿台吉的妻子，阿玉气的女儿（参阅前章）赞成同俄联盟，可是策妄阿喇布坦的儿子，他的未来继承人噶尔丹车尔润，以及车尔润将军却坚决反对。1723年7月9/20日琿台吉的妻子达尔马巴拉死去。温阔甫斯基日记，载韦塞洛夫斯基前引，第105、107—109、119页。

65 韦塞洛夫斯基前引，第40、157页；第54—55、61—63、73、116—117页。

66 韦塞洛夫斯基前引，第77及155页。温阔甫斯基叙述，于1723年11月15/26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与雅木柴夫之间，遇见从托波尔斯克归来的阿桑雅商队。

67 中国姓名、蒙古姓名，尤其是喀尔木克人的姓名，如同一般的专有名词一样，按照文章不同而拼法不同，有时在同一段文章里拼法也不同。如达尔加，达尔吉，达尔茹；又如波罗柯尔贡（车瑞多夫的公务日志），波罗库尔干（温阔甫斯基的日记），等等，等等。

68 达尔加于1724年1月1/12日到达托波尔斯克。温阔甫斯基日记，载韦塞洛夫斯基前引，第159页；于4月2/13日到达莫斯科，同前引，第232—233页；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准噶尔事务、1724年、第1号、第8—9页。

第七章

伊兹玛依洛夫的出使

史料来源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8—1719年；1719年3月30日/4月10日；使节公务日志，1719—1722年；1720年；1720—1721年。

翁弗尔察格特：《从俄廷出使中国记……》，吕贝克，1725年，8开本。

郎克：《1721年及1722年大俄罗斯皇帝陛下派往中国朝廷的事务官郎克先生的使节公务日志》，莱顿，1726年8开本。同作者：《郎克先生日记，包括1721年及1722年在中国朝廷谈判内容》。注释载：《北方游记》，阿姆斯特丹，1727年，12开本，第8卷、第221—371页。

贝尔：《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旅行记》，1763年，格拉斯哥，4开本，2卷版。

自从尼布楚条约于1689年订立以后的三十年间，俄国和中国一直维持着和平。由于俄国接待中国出使土尔扈特的使团（1712—1715年，参阅第五章），两国外交关系变得更好了。商务关系也在发展，沙皇赞助这一事业，中国皇帝也是如此。不过在这一时期的末期，某些困难开始出现了。在政治方面，位于俄中两国之间的重要中间人，喀尔木克人的首领，同俄中两国先后发生了敌对行动。

俄国起初虽被击败，但仍然继续与他们保持交往，这种交往的反响使中国感到不安。中国于是开始对它的世仇展开一场毫不留情的斗争。在商业方面，中国透露出某种程度的冷淡，这种冷淡从俄国对喀尔木克人的政策足以说明，即使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一种借口，或者俄国商人在北京的放肆和骚扰行为也使得中国有理由这样做。从各面来说，利用康熙皇帝的良好心情，消除某些误会，进一步加强俄国总的说来是有利的地位，现在都是良机。商务上的非法行为，正好成为试行改组在华商务仲裁工作的动机。俄国宫廷认为现在正是与中国恢复直接关系的时候，它采取的方式是委派一个能够估计中国军事实力的官员使华，这个官员负有谈判商务使命，并由商务代理人及其专门的助手来协助他进行工作。

列昂·瓦西里也维奇·伊兹玛依洛夫生于1686年，最初奉彼得大帝之命在丹麦军队中服役，升为上尉（1707年）¹。回到俄国以后，他被任命为近卫军普雷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上尉军官，1710年4月又奉命到丹麦去担任一项外交使命。正因为他有军人和外交官双重身份才选派他到中国去。派他到“博克达汗”²那里去的国书的起草日期是1719年3月30日/4月10日。这次与往常一样，最后确定任命的日期更迟一些：1719年5月10/21日的谕旨委派他以“特使”资格出使北京³；伊兹玛依洛夫在他自己的官方出使报告中则把6月4/15日定为他奉委出使的日期⁴。

伊兹玛依洛夫的随从人员包括一等秘书劳伦特·郎克，他曾和英国医生哈尔文去过中国（参阅第四章）⁵；二等秘书伊凡·格拉儒诺甫，他曾是阿帕拉辛伯爵的随员之一⁶；近卫军的下级军官泽谢金亲王⁷；苏格兰医生安特蒙尼地方的约翰·贝尔⁸；科学院的两个测量员西奥多尔·巴尔聂夫和米契尔·伊格纳季耶⁹；一个私人秘书，一个译员¹⁰，两个贵族¹¹，以及兵士和仆役¹²。他还在伊尔库次克接纳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¹³，在色楞格

斯克接纳三个蒙文翻译¹⁴。商务部的代表尼古拉·克利斯谛齐受命伴同使团前往中国¹⁵。

事实上，商业显然是这次出使的主旨。在外交部给使团所发的训令之中，商务占据大部分地位，同时商务部也对伊兹玛依洛夫发出了特别的训令，而给郎克的训令也是同样详尽。外交部训令的签署日期是1719年6月4/15日¹⁶。内容可概述如下：在有关礼仪方面，伊兹玛依洛夫应坚持按照他的官阶受到接待，如同在欧洲宫廷里一样。如果经过耶稣会教士出面斡旋（他应许诺耶稣会教士经由西伯利亚通信，以取得他们的帮助），他仍被迫遵从中国朝仪时，那么他就让步¹⁷。为了不致造成额外的困难，交给伊兹玛依洛夫的国书中一一写出中国皇帝的各种头衔称号，称中国皇帝为“陛下”而不是“殿下”¹⁸，而称沙皇只称他洗礼时的教名¹⁹。关于军事方面，命令伊兹玛依洛夫注意观察中国的国土、资源和军备力量²⁰；并且应向中国宣布，俄国沿着额尔齐斯河修建的要塞（参阅第六章）只是对付喀尔木克人和哥萨克游牧民的据点²¹。他并要求中国在北京给予一块土地，以便由沙皇出资修建一座正教教堂²²。最主要的是，伊兹玛依洛夫应在商务方面尽一切努力：首先，他应设法得到切实的情报，了解那些对俄国财政部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如金、银、珠宝等，以及贸易的条件²³；然后与博克达汗的大臣们进行直接谈判，以增加交易的次数，并且要求每年都可派商队来华²⁴。如果中国方面嫌招待商队花费太大，伊兹玛依洛夫应向他们保证，今后俄商将自己负担这些费用，商队所要求于中国政府的只不过是供给他们运输工具和粮秣，由俄商自己付款。只是俄国的大使和其他官方使节仍由中国破费招待²⁵。这些训令甚至进一步不合时宜地提出一些即使在今日也难于实现的新条件。特使应向中国要求在互惠的条件下在中华帝国全境完全自由地进行贸易。他并应向中国指出这一协议对于国家和对于私人都会有

同样巨大的利益，这些训令甚至授权伊兹玛依洛夫与中国根据这些条件缔结条约。若是这样的话，特使应设法取得中国同意在中国派驻常任代表或领事一名，并以他的一个同僚在他回俄国时留下担任此项职务²⁶。

商务部于1719年5月14/25日签发的训令，使这些规定更加完备和明确²⁷。训令请求准许俄国人进入中国内河和沿海的各个口岸，人数不限，使俄商可以购买大宗货物，尤其是金、银、珠宝、织金锦缎等，并且免税输出；同样地，俄商也可以在中国出售或交换自己带来的商品，也免交一切捐税。应成立一个商事法庭以处理俄中商人间的纠纷和债务等。俄国可以指派一个总领事，处理行政事务和继承事项，这个总领事在北京有一间房子和一个堆栈，并得在各省指派事务官或副领事。这些特殊利益和特权对于中国人在俄国也同样适用。俄国政府当时心目中的领事是郎克，商务部对郎克发布了详尽而又细致的训令²⁸。这些训令可以构成一部简略的商务法典。总领事应向沙皇宣誓效忠，而副领事应向他的上级宣誓。总领事的门上应有一个带航海标帜的俄国国徽，他还备有一颗特殊的印章。总领事的职务是协助在华的俄商，对他们提出忠告及代他们提出申请，并使俄国宫廷得知在华的商业情况以及各种可能的改进办法和利益。他有权审判俄国臣民，受理审查各种信用保证书、遗嘱、护照，所有这些文书都应登记。若发生严重事件，他可以与商人们商谈，但商人们的意见只是谘询性质。俄国人如犯有改信宗教罪、大逆罪以及谋杀俄国人和盗窃罪时，应受他的审判。谋杀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的俄国人，则移交中国法庭审判。他的判决有法律效力，他有权遣送罪犯到俄国边境去服刑。但如判处死刑，可以向商务部提起上诉。俄国人应把他们的活动写成报告交给他，他将这些报告写进他的公务日志中，交来华商队转交给商务部。在广州的副领事也同样这样作。总领事和在广州

的副领事都不得向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借钱。如果总领事死亡，副领事受任为总领事，应由商队中两位长者整理他遗下的文件，列成清单，把清单交给他的继任者。这道训令的其余十九条是些次要的规定：机密事项应用密码；所有信使应持有护照；特使的译员应留在特使身边，以后再雇一名译员，由财政部支付薪金。有一条甚至建议特使把茶叶放在用铅皮衬里的匣子里，盖子密封，以防变质。

伊兹玛依洛夫带着这些训令，由一队经过慎重挑选的随从护送，还带了经费和贸易用的毛皮以及礼物²⁹，于1719年7月16/27日离开圣彼得堡³⁰。他经过莫斯科和喀山，到达托波尔斯克（1719年12月16/27日—1720年1月8/19日），然后又到达伊尔库次克（1720年3月30日/4月10日—5月15/26日）³¹。在离开伊尔库次克以前，他又接到重要的训令。理藩院在一封康熙58年4月16日即1719年6月3日签发的信件中，拒绝伊斯多甫尼科夫商队入境，并且谈及在一段时期中限制或取消中俄的商业来往³²。这封信到达俄国政府手里后，自然立刻引起骚动。伊兹玛依洛夫于1720年5月13/24日在伊尔库次克收到沙皇于同年1月7/18日写的信件，信中通知他当前的局势，并通知他政府已命令新任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对理藩院坚决要求，命令他也持同一态度写信给理藩院。如果中国执意拒绝，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伊兹玛依洛夫就独自进入北京，设法获得使商队入境的许可，以及在以前的训令中所提出的其他条件（如经商自由、建立领事馆等等）³³。伊兹玛依洛夫在同一天（1720年5月13/24日）接到切尔卡斯基亲王致理藩院的信，信中要求中国同意为数很少的一些安分守己的商人进入中国，他们愿意自己负担路费³⁴。于是他很快通过贝加尔湖，自5月28日/6月8日至9月16/27日在色楞格斯克逗留，穿过蒙古，取道张家口（11月5/16日至7/18日）直达北京，于1720年11

月 18/29 日举行隆重仪式入城³⁵。

依兹玛依洛夫旅程的第二部分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1720年 6 月 4/15 日依兹玛依洛夫把切尔卡斯基亲王的信件送交中国方面，还附上他本人的一封信³⁶。6 月 24 日/7 月 5 日中国于 1712 年至 1715 年出使土尔扈特的前使臣图理琛到达色楞格斯克。他宣称他此来的目的是率领中国军队远征，在哈密地区进攻喀尔木克的琿台吉策妄阿喇布坦。但是他向俄国大使问起雅木柴夫战役问题(参阅第六章)。伊兹玛依洛夫避而不作任何正面回答，所以当伊兹玛依洛夫向图理琛问到商队的问题时，图理琛也同样地托辞而不作答，并且过了几天就动身回去了³⁷。7 月 15/26 日蒙古首领土谢图汗送一封于 7 月 11/22 日签署的信到色楞格斯克，信中要求送回一些逃犯，限制在库伦的俄商人数，俄国应派一名官员来约束他们，同时要求所有的人备有证明文件。伊兹玛依洛夫答应将来到北京处理这些事³⁸。8 月 9/20 日图理琛派两名信使到色楞格斯克，带来了中国政府对于切尔卡斯基亲王及伊兹玛依洛夫的要求所作的答复。中国允许俄国特命大使进入北京，但不允许商队进入。伊兹玛依洛夫对中国方面派来护送他的官员抗议无效，于是决定不加理睬而继续前进³⁹。他向商队借了一万卢布作为在北京贸易之用，把伊斯多甫尼科夫留在边境，带着九十名护送人员出发了⁴⁰。同时，他把当时的情况(1720 年 9 月 23 日/10 月 4 日)通知外交部。这份“报告”于 1721 年 1 月 11/22 日到达托波尔斯克⁴¹，内附理藩院于康熙 59 年 6 月 27 日即 1720 年 7 月 31 日给切尔卡斯基亲王的信。理藩院的信说中国方面刚刚知道噶噶林亲王被黜的事，认为中国与此事无关⁴²。

这些小事并未阻碍伊兹玛依洛夫的行程，也没有改变俄国人对蒙古人和中国人的良好关系。在使团快到北京大门的时候，一个政治事件几乎破坏了整个出使事务。这大概是由于一个中国官

员的过分热心而引起的。中国方面刚刚打败了喀尔木克人，于11月7/10日把从琿台吉那里俘获的四名俄国俘虏送给伊兹玛依洛夫⁴³。可是这时候图理琛正在张家口接待厄鲁特的一个使臣。他希望伊兹玛依洛夫在他面前表示俄国在这次中国的胜利中所起的作用，这就使人认为俄国和中国共谋攻打喀尔木克人。由于伊兹玛依洛夫谢绝，图理琛勃然大怒，恫吓说要中止伊兹玛依洛夫的使命⁴⁴。恫吓持续了几天；11月15/26日中国皇帝听到伊兹玛依洛夫有些不舒服，从北京派去一个医生⁴⁵，11月17/28日又送去了自己的马匹⁴⁶，这就结束了这次事件，伊兹玛依洛夫不再受到其他阻碍而到达了北京。

他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月以上：由1720年11月18/29日到1721年3月2/13日。在他逗留期间，中国皇帝接见过他十几次，第一次是递交国书的隆重觐见，其余是个人非正式接见⁴⁷。中国皇帝一直未曾改变他的亲善态度。在礼仪上产生了若干困难，伊兹玛依洛夫请求耶稣会教士协助解决⁴⁸，然后正式觐见在1720年11月28日/12月9日举行⁴⁹。康熙亲手接过国书，因为他把沙皇看作与他自己身分相等的好邻居。皇帝建议——也许他在政治上别有用意——商队若是取道额尔齐斯河水路，三个月就可到达北京。伊兹玛依洛夫回答，草原强盗、哥萨克匪帮和喀尔木克人出没，使这条道路变得很危险。12月2/13日，在非正式觐见中，康熙表示，沙皇亲自出海担受风险，使他担忧，并且声明俄国和中国之间决不可能发生战争，因为两国的气候截然相反，两国人民都无法在对方的国家生存，同时也由于两国的君主同样强大⁵⁰。他又说蒙古边界始终未确定，中国方面曾给俄国写过许多信，都没有得到答复。伊兹玛依洛夫答应他回国后将忠实地把全部问题报告沙皇⁵¹。其余谈话都不带政治性质⁵²，只不过表现出康熙老皇帝的心胸开阔和敏于求知罢了⁵³。

康熙皇帝向大臣们⁵⁴传旨，命他们与伊兹玛依洛夫讨论细节⁵⁵。1721年1月4/15日准许特使及其随从可以自由地离开他所住的四夷馆，在北京城内各处走动⁵⁶。1721年1月11/22日，由于理藩院竭力要求，伊兹玛依洛夫决定通知切尔卡斯基亲王将中国要求遣返的七百名蒙古人交回来，他所得到的交换条件是允许伊斯多甫尼科夫商队入境。⁵⁷2月7/18日中国大臣通知伊兹玛依洛夫说，郎克可以留在首都⁵⁸，可是几天以后，2月11/22日，中国大臣送给伊兹玛依洛夫一张单子，上面开列十点要求和安排：他们抱怨蒙古边界依旧悬而未决，虽然已经向伊兹勃兰德·义杰斯提出过解决办法；同时他们就有关私逃者的问题所写的信件也没有得到答复。中国将与伊兹玛依洛夫交换一百张盖有印章的证书，今后商人除非持有这样的证书，否则不能入境；中国以后也不能再由国库开支来招待他们；而皇帝以后也不再替他的臣民向俄商还债。此外，中国现在既已击败喀尔木克人，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中俄两国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立一个共同贸易的场所⁵⁹。最后在1721年2月24日/3月7日，中国皇帝交给伊兹玛依洛夫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同一天，即康熙60年11月10日；用以回答他初次觐见时所呈递的国书，皇帝在信中象他的大臣们所曾说的那样，向沙皇指出有必要确定边界⁶⁰。

伊兹玛依洛夫和他的随从们，携带送给他们自己⁶¹和他们的君主的礼品⁶²，于1721年3月2/13日启程返国。他于4月8/19日到达色楞格斯克⁶³，4月20日/5月1日至7月2/13日经过伊尔库次克，然后经由叶尼塞斯克、那里穆柏兴、苏尔古特、于1721年10月6/17日至11月20日/12月1日到达托波尔斯克，最后于1722年1月13/24日到达莫斯科⁶⁴。早在1721年5月18/29日伊兹玛依洛夫就已递给沙皇一份报告，说明他谈判的成功：包括准许商队和郎克进入北京，建立印信制度以防私人商队入境，同意

让与一块地基来建筑教堂等等⁶⁵。伊兹玛依洛夫对于自己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看来并不急于把谈判详情报告给俄国宫廷⁶⁶。1723年2月2/13日外交部接到郎克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将中断中俄两国的交往,如果中国同伊兹玛依洛夫商妥的事务得不到解决的话,当时外交部还全然不知道中国与伊兹玛依洛夫商妥的全部内容,因此要求他赶快写报告来。伊兹玛依洛夫于2月26日/3月7日只送上一份报告和一些由他的使节公务日志中摘录出来的片段⁶⁷。稍晚一些时日,1725年8月3/14日他又傲慢地提醒政府注意他的功绩,他为国家所获得的特殊利益,抱怨他没有得到适当的酬劳⁶⁸。可是,他被任命为近卫军西米诺夫斯基联队的少校,于1730年升为中校,经过波兰和克里米亚战役之后获得勋章并被建议提升。他于1738年1月13/24日去世,时年52岁⁶⁹。

注 释

1 关于伊兹玛依洛夫的生平,参阅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名人辞典》(俄文),莫斯科及圣彼得堡,1836—1847年,8开本,8卷。

韦伯在他的《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4开本,第335页中,似乎将几件事混淆了,他写道:1719年2月初,伊兹玛依洛夫当时是近卫军少校,伊兹玛依洛夫的堂弟,于1701年被派参加普鲁士国王的加冕礼,从那里到丹麦宫廷,然后被派到中国去当“使臣”。关于伊兹玛依洛夫出使中国的最初文件似乎不会早于1719年3月30/4月10日(参阅下文)。在这时候伊兹玛依洛夫只是近卫军的上尉,他从中国回来以后才被任命为少校。根据班蒂什—卡缅斯基上引著作,是他自己被派到丹麦的。伊尔库次克的长官是他的侄儿,姓同一个姓。关于最后一点,参阅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第1卷,第558页背面。

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3月30日,第(2)页。在这份谕旨里,没有写沙皇的头衔,只写了中国皇帝的头衔。俄文与拉丁文抄本,同前引,第(72)页。

3 同前引,第(8)页;抄本第(195)页。

4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2页正面。

这些日期的不同，很容易解释：外交部在1719年5月10/21日起草沙皇的命令（文件上由柯罗夫金伯爵、彼得·夏菲洛夫男爵签署），6月4/15日才公布，伊兹玛依洛夫才收到。

5 关于郎克，参阅第八章。

6 伊兹玛依洛夫给外交部的报告，1719年6月9/20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3月30日第(59)页。

7 又名扎塞耶金，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5页背面；贝尔：《……各地区的旅行》，第1卷、第156页；翁弗尔察格特：《出使……》，第1—4页。

8 安特蒙尼地方的约翰·贝尔（1691—1780），医学博士，1714年7月来到圣彼得堡。由彼得大帝的御医阿利斯金医生的介绍，参加了俄国驻波斯使团（1715—1718），然后跟随伊兹玛依洛夫使团到中国去（1719—1722），后来又参加俄国向杰尔宾特的远征（1722）。到苏格兰作过一次旅行以后，他又回到俄国（1734），被派去君士坦丁堡（1737），就在那里挂牌私人行医。约在1746年他回到苏格兰的安特蒙尼地方永久定居。他遗留下一部叙述他到中国旅行的著作，题名为：《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的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2卷。参阅《本国人名词典》，编者西德尼·李，伦敦、1885年、8开本。

9 车尔尼舍夫的报告，1719年7月8/19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

10 伊凡·克雷梅聂夫斯基。他于1720年5月3/14日死于伊尔库次克。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5页背面。

11 两个贵族：尼古拉·巴夫洛夫，巴西尔·格鲁舍兹科伊。前一个人似乎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1720年1月2/18日的谕旨，伊兹玛依洛夫于同年5月13/24日在伊尔库次克收到，命令伊兹玛依洛夫单独同郎克以及尼古拉·巴夫洛夫前往北京。

12 三个普雷奥布拉拉斯基联队的兵士。有关全体人员参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5页背面。

13 同上引，第16页背面。

14 同上引，第22页背面。

15 1719年7月13/24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第CB./2

本。在《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127—131号，载《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82号、第374—386页内，开头这个代表的姓写作尼古拉·克利斯尼兹，到了结尾他的签字变成尼古拉·保尔·克利斯缔齐。（在贝尔的《旅行》，第1卷、第156页上是尼古洛·德·保里·克利斯齐兹；在郎克日记中，莱顿、1726年、8开本、第36页，写成尼古顿伊·克利斯蒂慈）。《伊尔库次克编年史》上还说，跟随伊兹玛依洛夫来往中国的，有商人西奥多尔·尤兰斯科伊或尤朗斯科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3页、背面，第14页背面。

贝尔（前引著作第1卷第156页）记两个贵族不是巴夫洛夫和格鲁舍兹科伊，而是吕基昂·尼斯特洛夫和阿历克西·迪沃夫。他还说另有大卫·格拉夫（郎克的私人秘书，参阅第八章），教士格里戈里，约60名随从、仆役等，以及25名龙骑兵。

比较翁弗尔察格特前引著作、第1—4页及第56页。

16 训令由首相加布里埃·伊凡诺维奇·柯罗夫金伯爵和枢密大臣彼埃尔·巴夫洛维奇·夏菲洛夫签署。内容包括十三条或段。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4页背面、第12页背面；班蒂什，第425—432页。

关于日期，参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3月30日、第(37)页背面。

17 换句话说，他准备行三跪九叩礼。

18 俄文是 Vélitchestvo 而不是 Vysotchestvo，这样，俄国宫廷就表示它以沙皇平等地位来对待中国皇帝，如果用 Vysotchestvo 字样就表示低一等。

19 “这样做法与欧洲最著名的君主法国国王的做法相同”，第6条。

20 秘密地进行，第3条及第11条。

21 在文中是：靠近雅木柴夫湖及斋桑湖的要塞，第13条。

22 教堂内应有教士，如同耶稣会神父一样，第12条。

23 为获得这些情报，他可以留在中国，他认为应逗留多长时间就逗留多长时间，第14条。

24 第8条。

25 第9条。

26 第9及10条。

27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2页背面至15

页背面；第104—107页；班蒂什，第432—433页。

这些训令共有十六条或段。由彼得·托尔斯泰和秘书基里叶夫签署，日期是1719年5月14/25日。参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3月30日，第(9)页与(44)页。

28 训令包括十九条。抄本上无日期，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班蒂什，第508—511页。

班蒂什的书中没有提到这个文件。在《原始文件》中，这个文件的日期是“1725年8月”；可是由于未注明出处，不可能知道是不是指别的本子，这个本子是1725年第4号，没有日期的抄本就在这个本子中。翁弗尔察格特前引著作第105—106页，谈到商务部交给郎克的几点训令（1719年），这些训令的第18条是关于“使臣”的，“使臣”指的是伊兹玛依洛夫，1725年的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虽然也是使臣，但总是称作“特命全权公使”或简称“全权公使”，从来没有称为“使臣”的。不过也可能——由于这个文件是在1725年的本子中——1719年的训令在1725年又重新使用，如同别的其他训令一样（参阅第九章）。

郎克可能被1719年5月8/19日的谕旨（在一份商务部给枢密院的报告中引用，枢密院于1722年6月25/7月6日给西伯利亚总督的命令中提到过）选为驻中国领事。《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144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87号、第394—395页。郎克的信任状的俄文草稿和拉丁文抄本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3月30日第(17)、(18)、(19)页。草稿上的日期是1719年6月1/12日，圣彼得堡。

29 1719年5月10/21日的谕旨任命伊兹玛依洛夫为出使中国的“特命使臣”，给他从使节部中领取二千卢布现金，三千卢布的西伯利亚貂皮，从外交部领取五百卢布的各种皮毛，五千卢布礼物，总数是二千加三千加五百加五千等于一万零五百卢布，等于现价250,425法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3月30日，第(8)页、抄本、第195页。

礼物包括金框镜子，水晶框镜子，两支玻璃烛台，一个英国自鸣挂钟，两只镶珠宝的怀表，一个罗盘针，四个数学仪器，四具望远镜，一幅沙皇自制的波尔塔瓦战争图，一具显微镜，两具晴雨计；此外，尚有价值五千余卢布，27阿尔腾(altynes土耳其金币)，4兼卡(deng'i)的皮毛，相当于现行120,000法郎整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90页；班蒂什，第94页注1有类似记载。比较翁弗尔察格特，第1—4页。

同样有意思的是知道一下使团人员的薪金,即使只是为着了解各人的级别也好:郎克是六百卢布和四百卢布的毛皮(1719年6月3/14日谕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3月30日,第(24)页;格拉儒诺甫、译员、秘书各三百卢布,同上引,第(24)及(69)页;贝尔,根据他的驻波斯使团的合同,要求三百卢布,结果只答应他二百卢布,同意就去不同意拉倒,同上引,第(22)、(24)页;测量员每人二百卢布(1719年6月8/19日谕旨),同上引,第(53)页;西伯利亚教士是一百五十或二百卢布,中文译员一百五十卢布,西伯利亚的二等译员和下级军官各一百卢布;兵士十卢布,同上引,第(53)页,(56)页;同时参阅第495页和500页。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些薪金是年俸或者是整个出使期间的。很可能是年俸。

3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6页正面。1719年7月14日,贝尔,第1卷、第158页;1719年7月15日,翁弗尔察格特,第5页。也许贝尔、郎克和翁弗尔察格特提早出发。

31 同上引第22页背面。伊尔库次克是1720年3月18日,贝尔,第1卷,第160页以下,185、225页;托波尔次克1719年12月24日—1720年1月15日;伊尔库次克,4月7日—5月8日,翁弗尔察格特,第5页以下。

3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8及1719年,1720年,第1号(抄本);比较第四章。

3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6页背面至21页;第39页背面至40页。

34 同上引第16页背面第21及22页。这封信的抄本是在圣彼得堡、1720年1月7/18日或5/16日(信封背面)收到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0年,第1号、第25页。

伊兹玛依洛夫于1720年3月30/4月10日在伊尔库次克带走了耶稣升天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参阅班蒂什,第90及99页,葛利可夫:《彼得大帝的业迹》。补遗,第13卷、第240—241页(俄文版,参阅《参考书目》)。

3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22页背面、23、42、54—56页;关于进入北京的日期,参阅伊兹玛依洛夫给切尔卡斯基亲王的信,日期是1721年2月4/15日,同上引,第152页背面,以及伊兹玛依洛夫给沙皇的报告,1721年5月18/29日,同上引,第180页以下。

这个日期(1720年11月18/29日)由耶稣会神父的信件所证实。凯格

莱神父 1720 年 12 月 2 日的信，见《劝善书简》，第 15 卷、1722 年、第 XXIII—XXVII 页。德·马依阿神父：《中国通史》，第 11 卷、1780 年，第 335—336 页所载亦同。迪·荷尔德在《概述》，1736 年、第 1 卷、第 481 页中所说的 1720 年 11 月 22 日只能是 11 月 29 日之误。

色楞格斯克 6 月 4 日至 9 月 18 日，贝尔，第 1 卷、第 287 页以下；6 月 5 日至 9 月 1 日；北京 11 月 24 日，翁弗尔察格特，第 5—69 页各处。

伊兹玛依洛夫按照给他的训令，小心地记下赴蒙古的道路，并记入他的旅途日记中，这份日记构成他的公务日志的秘密报告部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 188—198 页。参阅《原始文件》。

36 他把这些信件交给蒙古王公土谢图汗，请求他转交北京。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 年、第 24 页。比较贝尔，第 1 卷、第 287 页。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向来一丝不苟，居然未注明他的日期是俄历日期。义杰斯也有同样情况。

37 图理琛自称来告诉边境城市的俄国长官们关于中国征讨珲台吉的事。伊兹玛依洛夫认为图理琛实际上是想同他接触并且探知俄国是否回答中国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 年、第 25—29 页背面。伊兹玛依洛夫向外交部 1720 年 9 月 23/10 月 4 日的报告，同上引，第 40 页，以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1720 及 1721 年；比较贝尔，第 1 卷、第 209—291 页。

38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 年、第 20—23 页正面。

贝尔叙述这些事件时略有出入：7 月 20(31)日到来一位满洲官员，借同土谢图的一位蒙古使者，宣布不久即将有一位特殊人物前来引导俄国人；7 月 24(8 月 4 日)的确有一位理藩院的官员前来找伊兹玛依洛夫，同一天呼图克图派了两个喇嘛来向俄国的使者祝贺。贝尔，第 1 卷、第 299—301 页。后面一件事在下述书里也叙述过：《根据在西伯利亚的瑞典战俘的原始回忆录编写的蒙古史……》阿姆斯特丹、1737 年、8 开本、第 81 页。

39 8 月 9/20 日。图理琛的两个蒙古使者到达色楞格斯克，告诉伊兹玛依洛夫说奉上谕，只准他一个人进入中国，商队则不准。8 月 11/22 日。伊兹玛依洛夫提出抗议并且写信给北京。图理琛拒绝接收并将信退回。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 年 33—35 页背面。1720 年 9 月 23 日/10 月 4 日伊兹玛依洛夫向外交部及沙皇的报告，同上引，第 40 页背面以及外交部档案、1720 年及 1721 年。

8月24日/9月4日。理藩院派来的一个“泽古谢”、两个秘书和四个使者负责伴送伊兹玛依洛夫到北京。泽古谢宣称只许俄国商队在边境从事贸易。仅此而已。伊兹玛依洛夫提出质问时，他回答说这个措施是由于俄国不答复中国的信件所引起的，也因为俄国商人在北京纷扰滋事。他准许伊兹玛依洛夫带领随从人员九十人，但断然拒绝商队入境。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35页背面—38页背面。

贝尔的叙述不一样(见前注)，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日期混淆(贝尔是7月24日而公务日志上是8月24日)来解释吗？

4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38页背面。1720年9月23日/10月4日伊兹玛依洛夫给外交部的报告，同上引，第41页背面，又同日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0年及1721年。

41 伊兹玛依洛夫给外交部的报告，附蒙古旅途日记(见上文，第164页、注35)，他说，还有一张路线图。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42页正面。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1720年9月23日/10月4日，同理藩院的一封俄文和拉丁文信件于1721年1月11/22日到达托波尔斯克。报告上签名的是切尔卡斯基亲王、阿历山大·彼得·苏洛沃夫、科斯默·巴热诺夫，1721年1月12/23日从托波尔斯克发出，1721年2月8/19日交给外交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第1号、第35页。

4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第1号、拉丁文第36页；俄文译文第37页，译得十分准确，签署是安德烈·瓦西里叶夫，第38—40页上注明比在托波尔斯克译得好，在1721年2月25/3月8日外交部给枢密院的报告中，第41页。

4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44页正面。同样，1720年12月11/22日康熙交给当时在北京的伊兹玛依洛夫一个俄国俘虏，他是被瑯台吉俘获，在科布多(Kobdo?)附近被中国人夺回的，同上引，第98页正面。

44 据记载，图理琛于1720年11月4/15日到达张家口附近。他为了下属执行他的命令不力，曾经打过一个小城“热米吉”的长官的耳光，伊兹玛依洛夫向他提出谴责，“‘泽古谢’用粗暴的言词回答说，他是出使阿玉气汗的时候，从西伯利亚人那里学到这样做法的，然后泽古谢图理琛向使臣表示歉意……”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46页背面。

关于厄鲁特使臣“卡什加”的场面见下文，同上引，第 47、48 页正面。

图理琛毫不答理伊兹玛依洛夫介绍给他的郎克。11 月 12/23 日他用隆重的仪式欢送厄鲁特的大使，而任由伊兹玛依洛夫离开“热米吉”时却没有任何礼仪，同上引，第 48 页背面—50 页。

45 一个医生，同上引，第 51 页。

46 图理琛亲自来告诉他这个消息，而且说象这样的荣誉从来没有给过任何外国的使者，同上引，第 53、54 页背面。

47 根据伊兹玛依洛夫的正式报告，日期如下：1720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9 日呈递沙皇国书的隆重觐见；12 月 2/13 日私人接见；3/14 日同前；然后是 1720 年 12 月 9/20 日、15/26 日，12 月 29 日/1721 年 1 月 9 日，1 月 16/27 日，1 月 24 日/2 月 4 日，1 月 30、31 日/2 月 10、11 日；2 月 19 日/3 月 2 日正式觐见；2 月 23 日/3 月 6 日辞行觐见，总共是三次有排场的觐见，九次私人接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 年、第 81 至 174 页各处。

贝尔的日期稍有不同：11 月 28 日；1720 年 12 月 2、5、10、15 日，1721 年 1 月 2、15 日，2 月 2 及 23 日，见贝尔的旅行，第 2 卷、第 5 页以下，第 18、29、34、45、50、68、84 页。

48 关键是要知道俄国使臣在未递国书给皇帝以前，是否参加过一次宫廷的仪式。伊兹玛依洛夫拒绝这样做，可是当皇帝将仪式延期时，他只好让步了。他到了第二天，马上就同五个耶稣会的神父接触，这些神父陪伴着皇帝的各位大臣（1720 年 11 月 19/30 日）。他按照他所接到的训令，对神父们作了以上的声明（见上文）。“……耶稣会神父听了以后说，他们已准备好在一切事情上都为他服务……”同上引，第 60 页正面。果然，1720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2 日一个葡萄牙耶稣会神父来通知伊兹玛依诺夫说，仪式准备在 11 月 5 日即 11 月 23/12 月 4 日，而且要邀请他参加。神父又肯定说，皇帝对俄国极有好感。不久以后，又来了一个大臣和一个法国的和一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根据贝尔第 2 卷第 2 页，他们是巴多明神父和弗里德利神父。对伊兹玛依洛夫的异议，他们回答说，到中国来就应该遵从中国习惯，如同“葡萄牙国王的大臣们”同教皇的使者都曾这样做那样。在最后一刻，图理琛还想方设法提出礼节上的阻碍。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 年、第 56 页背面至 81 页。

49 同上引，第 81—87 页。

下面是详细情况：伊兹玛依洛夫跪着，把国书递给皇帝，皇帝从他的手中接过去，这是违反过去惯例的，“皇帝认为邻居俄罗斯皇帝是他的同级别的朋友”，第82页正面。

伊兹玛依洛夫叩头以后，进小食，康熙问俄国使臣，他看见耶稣会神父比他更接近皇帝本人，并且作为他们之间的居间人，他是否感到惊讶？皇帝说，耶稣会神父到中国来已经有两百年以上，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官吏，而是学者，他们教皇帝天文学和数学。伊兹玛依洛夫回答说，中国皇帝爱好科学一事已经由耶稣会神父传播到欧洲，而且他们还告诉他皇帝对他有好感。

于是康熙说了下面一段话：

“中国皇帝对使臣说，俄国商人从俄国来经商；由于对沙皇陛下的友谊，我让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可是由于路途遥远、道路艰难，他们在旅途中受到很大损失，死掉许多马匹和牲口；对我们的人也一样，由于要护送他们，不得不蒙受重大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商队留在色楞格斯克的原因。他们从水路回溯额尔齐斯河不更好吗？从那里他们可以免受重大损失而在三个月内到达北京。”

伊兹玛依洛夫这样回答：

“使臣回答说，这个路目前不通行，因为有草原的游牧民族、哥萨克匪帮和独立的喀尔木克人……”第85页背面。

俄国宫廷对中国皇帝这份建议的官方意见如下：

“至于在额尔齐斯河上建造要塞，当时（伊兹玛依洛夫时代）意在使两国商人今后都走这条路，也就是要引导俄国去同琿台吉发生冲突，中国人那时正在同琿台吉开战……”

这是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要求澄清给他的训令，这就是外交部给他的回答（1725年9月28日/10月9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5号。

伊兹玛依洛夫祝愿派往攻打琿台吉的中国军队获得胜利，觐见以邀请使臣欢渡中国新年而告结束。

参阅伊兹玛依洛夫于1721年5月18/29日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81页正面。

比较贝尔旅行，第2卷，第5页以下的叙述，这些叙述只谈到外部的情况。

50 康熙当时的话是：“朕谕汝两语，汝勿庸作答，只须谨奏闻于贵国之君。一者，汝君为如此伟大荣誉之君主，握有广大之领土，对于敌国常御驾亲

征，海洋广大莫测，狂涛常起，危险殊甚，彼兵良臣忠，不乏差遣之人，自应居于安全之境地。……且我两国无必争之理，俄国为严寒遥远之国家，朕如派兵前往，必致全军覆没，且纵有所获，于朕究有何益？俄国君主亦同。假如为对抗朕躬而调兵遣将于贵国人民所不习惯之炎热地带，岂仅使之无端而死耶？战争究于两国有何利益？两国皆有许多土地以图自存也。”见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年云南崇文印书馆出版，第51页。——译者

51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89页背面至第93页；班蒂什，第94—95页（用新拼法）。

52 除了1721年1月24/2月4日关于阿玉气的谈话。这场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康熙宣称他曾经对边境城市的俄国长官们宣布过他正在同瑯台吉作战，如果有厄鲁特人逃往俄国，他要求他们通知中国（参阅1717年4月23日的信）。后来他说：瑯台吉除了求助于他的亲戚阿玉气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伊兹玛依洛夫回答：他们之间没有联盟关系，因为瑯台吉夺去阿玉气的儿子和属民，只归还他的儿子（这就是三恰布的事件，参阅第五章和第六章）。康熙问：阿玉气为什么不报复？伊兹玛依洛夫：他未奉沙皇御旨什么事都不能做。康熙说：阿玉气不能回到他自己的国土去吗？伊兹玛依洛夫：有什么用？他在俄国有他所需要的一切。沙皇也不赶走他，他是一个忠实的属臣。

康熙又说他曾同阿玉气交换使臣和礼物；他获知阿玉气新派的使臣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参阅第五章）。伊兹玛依洛夫宣称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43、144页。

53 康熙对迫使伊兹玛依洛夫在正式仪式中遵照中国礼节一事表示歉意，在私人会见中他完全免除了这套礼仪。12月2/13日，同上引第89页背面。他向伊兹玛依洛夫询问关于欧洲国家的情况（1720年12月3/14日，同上引，第94页正面；班蒂什，第95页），关于教皇与沙皇间的关系（1720年12月15/26日，同上引，第93至100页），关于俄国政府（枢密院的职权）以及圣彼得堡胜过莫斯科之处（圣彼得堡有海。皇帝问，海冰冻吗？答：冰冻的，直冻到离岸30俄里之远，但不超过此数）。1720年12月9/20日，同上引，第99—100页。

在1720年12月29/1721年1月9日的觐见中，康熙将自己的大衣和貂皮帽子赐给伊兹玛依洛夫，同上引，第120页；1721年1月24/2月4日的接见中，他在别离时握了伊兹玛依洛夫的手，特命使臣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说，这在中国只有和皇帝同级的人才能享受这荣誉。同上引，第142页正面。

54 伊兹玛依洛夫提出了三个大臣，他们的满洲官衔是：阿莱戈达或宰相。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67页正面。（比较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在他的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阿莱戈达，即枢密侍卫内大臣”，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185页、正面；“阿莱戈达是博克达汗陛下以下的第一人，即宰相”，同上引；比较郎克的日记……莱顿、1726年8开本、第40页及100页；“阿莱戈达或首相”。其次是阿斯哈纳马或兵部尚书；（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解释这个官名：“阿斯哈纳马即国防部副部长；见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218页正面；郎克前引著作第97页写道：“阿斯基南马或副部长”）。最后是阿洛伊或礼部侍郎（郎克前引，第29页：“阿洛伊或礼部侍郎”。）

55 早在1720年11月22日/12月3日，宰相便抱怨说，商队里的执事们要他付出相当于六十戈比的库银购买品质低劣的北极狐皮，而他们却秘密地出售上等品质的北极狐皮，售价只要七十戈比的普通银子，甚至还肯赔帐。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67页正面。

12月16/27日他又宣称，皇帝不得不从他的私人金库里取出五千卢布，以偿还中国商人欠俄国人的债，同上引，第101页背面。

从12月18/29日起，伊兹玛依洛夫按照他接到的训令交付一个备忘录以后，双方的谈判便用书面进行。

对于商务条约，中国人表示反对，理由是俄国商品在北京毫无用处，而商队对蒙古人和张家口农民甚至国库都是一个过重的负担，国库要维持商队七个月到一年之久。伊兹玛依洛夫回答说，商人从今以后可以自费维持，而在西伯利亚购买马匹去打琿台吉，就是两个帝国都能得利的一个例子。1720年12月18/29日/1721年1月11/22日，同上引，第108—132页各处。

56 同上引第95页以下。

57 “我决定派遣一个近卫军兵士去通知切尔卡斯亲王关于私逃者的事，我同时命令这个兵士带去一道给伊斯多甫尼科夫的命令，要他同商队一起来，因此，我要求对方下令欢迎这个商队领队”。同上引，第132页背面。

“被留在色楞格斯的商队领队，已下令欢迎他……现在我们已接受商队入境。”1721年1月27日/2月7日理藩院的答复，同上引，第145页正面。

58 “(1721年)2月7/18日一个泽古谢到使臣那里去……大臣们要告诉使臣，准许郎克留在北京，处理使臣所拟定之各种事务……”同上引，第158

页背面。

“（1721年）2月10/21日……一个泽古谢到使臣那里去说……领事郎克居住在四夷馆，将由皇帝出资维持（逐字译是：将得到汗的饮食）”，同上引，第160页。

59 同上引，第162页正面至165页正面。

60 文字极难理解，也许是由于翻译的关系，这封信的内容同沙皇的信一样，只是些纯粹一般性的陈言套语。信是写给伊兹玛依洛夫的。同上引，第175页；班蒂什，第98页，但有改正的地方。贝尔（旅行第2卷第86页）说信是用汉文写的，附有蒙古文抄本。

61 给伊兹玛依洛夫：名马一匹及全副中国鞍鞴；三匹缎子，两段南京棉布，一件镶锦绣的羊皮外套，一对中国靴子；给两个秘书、贵族、医生、评价员的礼物大致相同。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69页。此外，还送九十匹马、九十四匹骆驼、七十二件缎料给伊兹玛依洛夫，十七件给郎克，十件给泽谢金亲王，五件给格拉儒诺甫和贵族巴夫洛夫。同上引，第185页背面。

62 给沙皇：珐琅器皿、日本漆器、瓷器或水晶器、丝绸。使团的一个随从人员翁弗尔察格特专门负责照管毡毯，伊兹玛依洛夫说，毡毯必须定制，价值库银三万两，可是康熙不愿收。1725年8月3/14日的报告。参阅下文第136页注1。1721年5月19/30日，这些毡毯被带回伊尔库次克。使节公务日志、第184页正面。参阅郎克前引第9页、29、30、35页；比较贝尔的旅行，第2卷、第42页及70—71页；翁弗尔察格特，第99—125页。

6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53—59页、178—180页。

贝尔旅行第2卷第118页也说，1721年3月2/13日是从北京动身的日子。

64 叶尼塞斯克1721年7月17/28日；那里穆柏兴8月26日/9月6日；苏尔古特9月5/6日；萨马洛夫斯科伊9月11/22日，当米扬斯科伊9月23日/10月4日，同上引，第184页正面至185页正面。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记载伊兹玛依洛夫于1721年3月回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4页背面。贝尔的记载是1721年4月19/30日。他大约于9月底10月初到达托波尔斯克，于1722年1月5/16日抵达莫斯科；也许他比伊兹玛依洛夫本人早到一点。

6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81页背面。同一天他从伊尔库次克送出两份报告，一份给外交部，于1721年8月28日/9月8日收到；另一份给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于1721年7月3/14日收到。同上引，第180页背面至184页；1721年、第1号、第48页、50页；1722年、第1号；1721年、第1号第1页；1722年、第2号、第16页。

66 参阅关于商业的情报，《原始文件》。其他还有关于中国军队、中国边界、各部衙门的满洲名字，等等。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200—205页。

67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1号。

68 在这份于1725年8月12/23日到达的报告里，伊兹玛依洛夫说明他收到五百卢布的皮毛作为礼物，而他自己却掏腰包花了一千五百卢布。他也夸耀自己在毡毯事件上的功劳。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原始签名：列夫·伊兹玛依洛夫。

69 这是根据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国名人辞典》(俄文)，贝尔说他死于1736年。旅行，1763年、第1卷、第158页。

第八章

从伊兹玛依洛夫到萨瓦·务拉的 思拉维赤；郎克(1721—1725)

史料来源

关于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及其与俄国的关系：

阿夫瑞尔神父：《欧亚各国旅行记》，巴黎、1692年、4开本；1693年、12开本，散见书内各处；勒·孔特神父：《中国现状新回忆录》，巴黎、1696年、12开本、2卷；1697年、12开本、2卷（第2版，1697年、第1卷、第58—92页；第2卷、第335—350页）；布韦神父：《中国皇帝的历史写照》，巴黎、1697年、12开本（第40页，第166页）；迪·荷尔德神父：《中国概述》，巴黎、1735年、对开本、4卷；海牙、1736年、4开本、4卷（第2版、1736年、第1卷、第478页以下；第2卷、第56—58页；第4卷、第182页以下，第245页）；贝尔：《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的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2卷（第2卷、第17、25、30、37、40、46、49、85页）；索马沃热：《耶稣会图书馆》，布鲁塞尔和巴黎、1890—1900年、4开本、9卷及附表，1909年；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对外关系一瞥》（俄文），莫斯科、1894—1902年、8开本、4卷（第4卷、第85页）；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巴黎、1904—1908年、8开本、4卷（第2卷《宗教》章）。

南怀仁神父给沙皇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

3章,第453—458页,刊印在阿尔塞纳夫:《关于尼果赖的新资料》(俄文),莫斯科,1900年,8开本,第45—48页;南怀仁给尼果赖的信,中国宫廷,第7章,第163页背面,第167页正面。同时参阅:中国宫廷,第9章,第832页背面至第835页;1717年6月25日/7月6日;1716年10月31日。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351、1388条;第5章,第3356条;第7章,第4429条。

关于郎克: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第1号;1721—1722年,第2号(郎克的原始报告);1722年,第1、2号;1723年,第1、2、3号(第3号内有郎克的原始报告);1723年,第1至3号(附注与1723年第3号同);1725年,第1至3号(同前);1726年,第1、2号。

《郎克先生的使节公务日志》,莱顿,1726年,8开本;《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1727年,12开本,第8章,第221—371页。

同时参阅:韦伯:《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4开本,第362—363页;同作者:《关于大俄罗斯现状的新回忆录》,阿姆斯特丹和巴黎,1725年,12开本,2卷(巴黎版,第2卷,第89页以下)。

伊兹玛依洛夫于1721年3月2/13日离开北京,俄国的“代表”或领事劳伦特·郎克则留下来等待伊斯多甫尼科夫商队的到来(参阅第七章)。对于这个自从1715年以后俄国对华交往中不断使用的人物,我们很想知道他的生平,可惜俄国的档案及书籍极少提供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我们只能等待根据瑞典文件作出的研究,这些瑞典文件也许比较明确。按照与他同时代的德国人韦伯的说法,郎克是一个瑞典工程师¹;根据历史学家穆勒未说明出处的简短的介绍,郎克曾在彼得大帝的赞助下²,在柏林研究语言和

科学。我们已经提到早在1715年沙皇曾派他陪伴一个英国医生到康熙皇帝那里去，并负责为俄国宫廷制造瓷器炉子。他与北京的主要耶稣会士有过接触，尤其是与巴多明神父³。由那时起，郎克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他的关于商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才干，越来越受赏识；他的关于中国人、关于耶稣会士、关于远东的风土人情的知识，越来越被俄国所利用；最后，他的外交才能和他的对俄国的忠诚，又使他不断得到最复杂和机密的使命。因此，当他刚由北京回国，立刻又与伊兹玛依洛夫使团一同动身，这次他身任助手，居于第二位，而在俄国特命全权大使回国以后，他就独自留在北京代表俄国的权益。

他从耶稣会教士方面寻求并找到了帮手。俄国长久以来就知道他们的重要性。俄国大使尼果赖不是曾于1676年由北京带回一封南怀仁神父致沙皇表示愿意充当翻译的信吗⁴？尼果赖不是与南怀仁神父保持良好关系，并利用“信使”韦尼乌科夫和法沃罗夫同他的朋友保持来往吗（1685—1686）⁵？但是在这时候，信正教的俄国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开始对耶稣会教士采取严格的措施。阿夫瑞尔神父和巴纳巴斯神父曾企图从俄国为耶稣会教士取得通过西伯利亚的权利，于1686年在莫斯科被拒绝⁶。一个由多尔葛卢科夫亲王领导的俄国使团，当时正在启程去朝见法王路易十四，因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就，阿夫瑞尔神父和薄贤士神父便在莫斯科进行新的请求，虽然有路易十四的介绍信（信的日期是1687年10月8日）和法国驻波兰大使贝休恩侯爵给葛利青亲王的信，也同样遭到失败（1689年1月16/26日）⁷。更糟糕的是，由于莫斯科大主教乔琪姆的请求，俄国政府于1689年10月2/12日发布命令，将居住在德国人住区的两名耶稣会教士驱逐出境⁸，接着政府又于1719/1690—1691年发布命令肯定前述命令⁹。不过耶稣会教士们并未停止他们对俄国的服务。虽然1689年俄国的柯罗文大使曾

经在他的使节公务日志中抱怨张诚神父和徐日升神父过份热心为中国服务，中国曾任命他们为尼布楚会议的官方译员¹⁰，但是他们的居间斡旋有利于条约的订立（1689年8月27日/9月6日），而俄国不管怎样，对于这个和平解决仍然是满意的。另外也是通过耶稣会教士的居间转达，俄国才能于1690年3月18/28日收到中国关于外贝加尔地区事件的一封信¹¹。虽然如此，俄国仍然不放松它对于耶稣会教士的严厉措施。闵我神父从中国返回欧洲以后，希望和1686年的阿夫瑞尔神父和巴纳巴斯神父以及1689年的阿夫瑞夫神父和薄贤士神父一样，能取道西伯利亚返回中国，但在1691年至1692年遭到了俄国的断然拒绝¹²。但是事情的发展不久就使得俄国对待耶稣会教士的态度有所转变。1693—1694年使臣伊兹勃兰德·义杰斯所以能够在北京获得那些微小的情报，是全亏了耶稣会教士¹³。这就足以使得俄国宫廷明白，他们可以就在当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助手，从此俄国宫廷再也没有忘记去寻找他们的帮助。中国的宗教政策的改变使俄国宫廷的任务容易得到解决。康熙皇帝起初对待欧洲传教士很好，把他们视为有利于自己的教育和他的帝国的学者，到了老皇帝的晚年，欧洲传教士开始感到迫害的重压，在康熙的继承人雍正（1722—1735）即位以后，迫害就越来越严重。于是耶稣会教士就想去接近俄国。1716年10月31日耶稣会教士向在广州的欧洲人发表正式声明，调查1706年离开的巴罗和薄贤士两神父以及1708年离开的普罗瓦纳和雷蒙·达尔克斯两神父的近状，声明中提到他们曾给俄国人一封信，托由在北京的俄国商队转交，并认为俄国应已收到这封信¹⁴。1717年6月25日，一位自称修道院院长的纪里安·斯顿甫神父从北京向沙皇发出了一封急信，以八十个传教士和二十万信徒的名义，请求沙皇为了基督教的缘故，把他所叙述的事件忠实地传达给维也纳的皇帝查理六世¹⁵；1717年5月中国发布了一道法令，使耶稣会

教士和中国信徒受到死亡的威胁，现在只有罗马可以援救他们。俄国绝不忽视这个对它的北京外交的主动支持。但它仍然继续迫害在俄国的耶稣会教士（1719年4月18/29日沙皇签发的谕旨¹⁶），对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则按照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们。沙皇于1719年6月4/15日发给伊兹玛依洛夫的训令，建议他利用耶稣会教士的影响来解决困难并收集情报¹⁷。事实上，伊兹玛依洛夫在北京逗留期间（1720年11月18/29日至1721年3月2/13日），确实与耶稣会教士相处得非常好，他的同僚郎克更和巴多明等神父¹⁸恢复了几年前在北京建立的友谊关系。因此伊兹玛依洛夫并不拒绝把喜大教神父于1721年6月24日由色楞格斯克写给俄国外交大臣葛洛甫金伯爵的一封信送去，信中以全体在北京的神父的名义，要求遵守伊兹玛依洛夫的诺言，用他们的服务来交换取道西伯利亚的权利¹⁹。当中国厚待耶稣会教士时，耶稣会教士就维护中国的利益；一旦中国开始迫害他们，他们也就毫不迟疑地出卖中国了。

俄国通过郎克送回的“报告”²⁰和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的报告²¹，一直能够得知远东事务发展的情况。就是切尔卡斯基亲王于1721年9月30日/10月11日把伊兹玛依洛夫1721年5月18/19日的信送回来的（参阅第七章）；1721年6月24日喜大教神父的信，以及理藩院康熙59年12月（即1721年1月）要求俄国归还七百名蒙古私逃者的信件，都是由切尔卡斯基亲王转呈俄国政府的。关于归还蒙古私逃者事件已由伊兹玛依洛夫处理（见前面第七章）；亲王本人也就这个问题向沙皇请示²²。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郎克又于1721年10月21日/11月1日寄给沙皇（实即外交部）一份关于中国政局的报告；这份报告被两份另外的报告所补充：一份给沙皇（即外交部），另一份给商务部；这两份报告都由郎克于1722年9月3/14日自色楞格斯克发出，后一份报告可以使

人明确地知道自从伊兹玛依洛夫离去后，俄国代表郎克逗留在北京时的处境(1721年3月2/13日至1722年7月16/27日)²³。郎克当时集中注意三类问题：俄国宫廷或俄国商人的私事、商队的贸易和外交事务。他曾接受了一张中国皇帝赠送的挂毯，这些挂毯是俄国宫廷定购的²⁴。他曾为贸易代表尼古拉·克利斯尼齐的归国作了安排，后者带回“一部分生丝”和宝贵的特别情报²⁵。他曾设法收回古谢特尼科夫“专员”和在北京的正教神父劳伦特的债权²⁶。但是随着俄国商务活动胃口的增长，困难也相应地产生和增多了。郎克对于中国经常派遣五十名卫兵围守着“四夷馆”，因而妨碍了贸易的进行，早已向中国官方抱怨²⁷。理藩院拒绝为伊斯多甫尼科夫向张家口关卡垫付二千两税金，郎克本人不得不送上这笔款项²⁸。伊斯多甫尼科夫商队于1721年9月29日/10月10日到达北京²⁹，于是困难和阻碍又增加了。首先是中国的大臣们，他们用低得出奇的价格(三两银子一对貂皮，据俄国专员估价，值二十两银子)为他们的君主购买货物，据郎克说，其实是他们自己购买³⁰。由于惧怕这些大臣，其他的买主都退避三舍了，于是郎克不得不出面干涉，于1721年11月22日/12月3日写信给理藩院提出要求³¹。五月份，四夷馆才得到开放，但形势仍很不妙³²。12月15/26日中国皇帝发布谕旨，宣布开始出售俄国财政部的貂皮。几天以内二万张貂皮就以低价售出了³³。中国官员站在“俄国馆”的门口，对每个商人征收一笔入门税，中国兵士赶走朝鲜雇主³⁴。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变得咄咄逼人了。1722年4月16/27日，郎克获悉俄国人已被逐出库伦，他们的信使被逮捕³⁵。五月间，(7/18日)郎克费了很大的劲才收到译员克卢丹聂夫1722年4月20日/5月1日从库伦送来的信，信中说，他自己，他寄给郎克、劳伦特教士和中国大臣们的包裹，都不准进入中国³⁶。最后，5月8/19日中国政府正式通知郎克，在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和私逃者问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以前，

中国皇帝将不允许有俄国人在中国³⁷。7月12/23日伊斯多甫尼科夫及其商队启程返国³⁸。郎克在热河向中国皇帝作了辞行觐见后³⁹，于7月28日/8月8日⁴⁰同商队会合，一起回国。他们全体于1722年8月26日/9月6日到达色楞格斯克⁴¹。

除了这些商务上的困难以外，又加上了使人烦恼的外交上的争论，这是仅仅由郎克给沙皇的报告所透露的。1721年8月18/29日中国方面命令郎克到热河去觐见皇帝。在那里，人们向郎克解释说，在安加拉河的支流“奥卡河”上，有一尊古代的佛像，帖木儿对这佛像十分崇敬，呼图克图也向皇帝赞扬过。因此，康熙皇帝想派四个官员去取这尊佛像，或者至少是把这佛像准确地临摹下来。按照伊兹玛依洛夫的许诺，沙皇将欢迎中国皇帝的使臣，郎克难道拒绝发给护照或者有关这次谈话的证明吗？郎克怀疑其中有诈，很想推托不管，可是没有推托成功，只好照办，中国官员马上由热河动身。1721年9月3/14日郎克回到北京以后，才从一个年老的耶稣会教士那里探知整个事情的秘密，这个老教士被中国官员邀请同去取佛像，他托辞年老谢绝了。中国当局的真正意图是去树立界碑，以便将来划界实现时，中国方面可以提出所谓古代界石的证据。郎克立即于1721年10月21日/11月1日把这个重要发现报告回国；根据中国皇帝宠信的一个耶稣会教士说，康熙执意要确定中俄全部疆界和解决私逃者问题。理藩院派赴色楞格斯克等待切尔卡斯基亲王对理藩院康熙59年12月去信的答复（见前第143页）的那个官员已经死了，郎克不得不发一张护照给他的继任者。郎克又报告说，中国对喀尔木克人的战争代价沉重，珲台吉要索取蒙古，中国人丧失了许多人命和牲口，主要是由于饥馑和瘟疫，而不是由于战争。中国本部发生饥荒，台湾刚刚起来叛变⁴²。

1722年9月3/14日写于色楞格斯克的下述报告，叙述了中国与厄鲁特人和俄国人之间关系的严重问题，以及中国内部的麻烦

问题。理藩院新派的官员到达色楞格斯克后，知道了沙皇和喀尔木克琿台吉互派使臣，便立即报告北京朝廷。中国当局立刻把郎克召去，质问他这件事，询问这件事是否合法，会产生何种后果，郎克借口说他自己只是一个贸易代表或领事，不肯作答。可是这种推托毫无用处！中国十分恼火，于1722年5月8/19日给他一纸公文，命令他离开北京，而且足有两个月拒绝接受他的国书，使他不得不把国书取回；最后于7月12/23日把他和整个商队驱逐出境。康熙老皇帝提醒郎克注意，他对伊兹玛依洛夫是友善的，他只要求和平。可是郎克预见到康熙死后就会发生混乱甚或政策也会变更。郎克回到色楞格斯克以后，找不到那位等俄国回信的官员，原来他因俄国迟迟不作答复，等不及已回北京去了。蒙古人由于中国人对喀尔木克人作战而对他们勒索不已，感到资财枯竭，只好到俄国乡村抢劫来取得补偿⁴³。

俄国宫廷得到这些消息以后，马上采取有力措施。俄国宫廷于1721年12月5/16日收到切尔卡斯基亲王于同年9月30日/10月11日所写的报告⁴⁴，还分别于1722年3月10/21日及6月2/13日收到他于1722年2月17/28日和4月13/24日所写的同一内容的两份报告⁴⁵。郎克1721年10月21日/11月1日的报告则于1722年7月11/22日到达俄廷手中。到了1722年年中，俄廷已能准确地判断整个情况并作出决策。它于1722年7月间发布的几道谕旨足以说明它的意向：7月4/15日的谕旨追述沙皇对于和平的愿望，这个愿望早在1722年4月12/23日表达出来，并命令遵照尼布楚条约，追查和归还私逃者⁴⁶。7月9/20日的谕旨命令西伯利亚总督，除非并不产生任何不便，否则不得容忍中国官员在西伯利亚逗留，并将他们遣回，但不要得罪他们⁴⁷。最后枢密院1722年7月31日/8月11日的一道命令严禁中国人进入西伯利亚，并命令对佛像一事进行调查⁴⁸。

这些命令于1722年9月4/15日和10月22日/11月2日送达在托波尔斯基的切卡尔斯基亲王手中。他在1722年6月21日/7月2日的前一报告中,已经转呈了一个中国官员送到色楞格斯克来的信件,这一官员的护照是由郎克签发的,信件日期是康熙60年8月29日即1721年10月19日,信中仅仅再一次提出要返还七百名蒙古私逃者的问题⁴⁹。这样看来,急需解决这个问题。切尔卡斯基于1722年12月11/21日签发一道命令,派遣托波尔斯克的一位贵族费菲洛夫到色楞格斯克去进行一次详尽的调查,并在第三天将他所采取的这一步骤报告沙皇⁵⁰。

等到费菲洛夫于1723年4月1/12日或2/13日见到郎克时⁵¹,情势即将变化或已经起了变化。送郎克到色楞格斯克来的图理琛⁵²,交给切尔卡斯基亲王一封理藩院于61年6月10日即1722年7月22日签发的信件,信中表现出不耐烦的口气⁵³;自从伊兹玛依洛夫回国以后,一年已经过去了,而俄国还没有把私逃者送回来!因此中国采取了报复措施:于1722年间将俄国人逐出蒙古⁵⁴。1723年3月29—30日/4月9—10日来自托波尔斯基的报告说得更为详尽,它报告俄国人已被赶出库伦,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主教正被留在边境上;蒙古人跑到俄国领土上树立界碑;最后为着私逃者事件被派到色楞格斯克来的中国官员,在61年9月19日即1722年10月28日写了一封抗议信后就动身走了⁵⁵。加上十四名喀尔木克人,因为逃避中国军队,到西伯利亚避难;一个中国官员于1723年2月到达伊尔库次克索还他们⁵⁶。这些拖延,这些意外零星事件,很容易激怒中国,因为它向来对于有关喀尔木克人及其与俄国的关系异常敏感。但是就在这时候,中国换了皇帝。康熙,这位中国的路易十四,于1722年12月20日逝世。郎克于1723年3月8/19日最先作了一个不十分肯定的报告⁵⁷,在6月13/24日证实了这一消息⁵⁸。俄国宫廷于1723年11月26日/12月7日

收到这份报告。1724年1月20/31日的一道谕旨立刻委派郎克负责解决边界和私逃者问题，由秘书格拉儒诺甫加以协助，中校巴赫尔慈带领一千骑兵和一千西伯利亚步兵给他们以支持。为了争取时间，叫他们直接和西伯利亚总督联系⁵⁹。如果俄国这时愿意谈判，表现出让步的意图，中国也透露出愿意和睦解决这些问题的热望。理藩院于雍正元年5月11日即1723年6月13日致切尔卡斯基亲王要求交还十四名喀尔木克逃亡者的信件，语气比预期的温和得多⁶⁰。郎克本人注意到这种缓和以及政策改变的明确信号。他于1723年11月18/29日从色楞格斯克写信说，11月1/12日有两个中国官员到达该城，他们是风闻委派费菲洛夫进行调查而赶来探听结果的。郎克坚持要他们交出委任状，因此他们又回国去取证件，同时答应不久就回来⁶¹。事实上，1724年2月22日/3月8日其中的一个官员带了一封理藩院于雍正元年12月21日即1724年1月16日写的信给郎克，信中要求郎克把调查的结果通知蒙古首领土谢图汗；中国人和俄国将开会商讨以求取得协议。郎克于1724年3月2/13日回答说费菲洛夫已完成了他的使命⁶²。1724年8月13/24日郎克在下一报告中告诉沙皇说，中国皇帝派来两位有谈判全权的大臣已经于7月16/27日到达色楞格斯克⁶³。这时郎克已接到费菲洛夫的报告⁶⁴，结论是俄国同意引渡八十四名私逃者；郎克同时接到1724年1月20/31日颁发派他代表俄国与中国商谈的谕旨⁶⁵。他把这些事情通知了中国的大臣，同时又告诉他们俄国正要派遣一位特殊人物担任正式使团的领导人。1725年8月11/22日沙皇颁布谕旨，任命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为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臣”⁶⁶。

注 释

1 仅在1720至1730年这一段时期，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拥有二十多封郎

克的德文原始信件,以及他与1727—1728年的商队在中国时的公务日志,也是用德文写的(1721—1722年第2号;两份给沙皇的报告;三份,1723年第3号;两份,1724年第3号;两份,1725年第3号;三份,1726年第3号;公务日志,1727年第6号;由他签署的证明文件,1727年第14号;给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1726年第6号及1727年第16号;一份给沙皇的报告,1728年第3号;另一份,1729年第6号;给外交部的报告,1730年第6号)。他用德文签名是劳伦兹·郎克(Lorenz Lang),有时似乎也签作Lorenz Lange;他的俄文签名是Лоренцъ Лангъ(注意在俄文字母中夹有拉丁文n字母)。无论写法是Lang或Lange,这个字肯定发音为郎克,因为俄文音译外国专有名词只顾到读音,要音译Lange(郎热,俄文Ланжъ)是很容易的。

在西方的著作里,这个名字的写法有各种变化:“Lorentz Langen”(韦伯:《俄国的变化……》,法兰克福1721年4开本第72页);“Laurence de Lange”(贝尔:《从圣彼得堡……的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2卷,第1卷,第156页;《“郎格”(Lange)先生使节公务日志》,莱顿,1726年,8开本);“Lorentz Lange”(翁弗尔察格特:《出使记……》,吕贝克,1725年,8开本,第1—4页)。

韦伯前引著作第72页上仅说郎克是工程师;翁弗尔察格特前引著作第1—4页说他出生于斯德哥尔摩;贝尔前引著作第158页说他是瑞典人。1728年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大使颁发一张护照给弗雷德里克·郎克,瑞典人,斯德哥尔摩居民,劳伦特·郎克的侄子,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

2 穆勒《文集》第8卷第511页载:“皇上曾派郎克去柏林学语言和科学。”

3 韦伯前引著作,第83—86页及164—167页;同作者:《关于大俄罗斯现状的新回忆录》,阿姆斯特丹及巴黎,1715年,12开本,2卷,第2卷,第121—132页,巴黎版。

“(1721年4月)19日,我去看望一位德国籍的耶稣会神父(伊格纳斯·卡格莱神父?),他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国家来的老相识和老朋友……”,郎克的《公务日志》,第42页。

4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3卷,第453—458页,转载于阿尔塞纳纳夫的《尼果赖1671—1708年在俄国所起作用的新资料》(俄文版),莫斯科,1900年,8开本,第45—48页。

5 参阅本书第一章。

6 阿夫瑞尔神父,《欧亚各国旅行记》,巴黎,1693年,12开本,第182—192页。

阿夫瑞尔神父于1654年7月21日生于昂古莱姆,1698年死于海难。他自1685年1月13日(登船日期)至1690年9月30日(回到马赛港日期)曾经在小亚细亚、波斯、俄罗斯和土耳其旅行过。

路易·巴纳巴斯神父在回到但泽途中(1687年11月),在鲁昂和汉堡之间溺死。

薄贤士神父1657年6月2日生于布莱耶(纪龙德),1699年来中国,1708年1月死于海上。

参阅索马沃热:《耶稣会图书馆》,布鲁塞尔和巴黎,1890—1900年,4开本,9卷,第10卷(目录),1909年;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2卷,第1054条。

7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对外关系一瞥》,莫斯科,1894—1902年,4开本,4卷,第4卷,第85页。

8 他们的名字叫做大卫和托比。他们用教皇的钱在德国人住区(又名外国人住区)买了一所住宅。他们要求一个宽限,以便进行清理,俄国当局只准许他们延期四十八小时。《保存在外交部的官方信件及正式条约汇编》,第4卷,第203号,第617—619页;《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351号;比较萨马林:《耶稣会神父及他们对待俄国的行为》,莫斯科,1866年,8开本,第235页。

9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1388号,第86—87页。

布兰德于1692—1695年同义杰斯途经俄国时,似乎也搜集到关于这些措施的反响:“……耶稣会神父也不能享受这种权利(在私人住宅里举行罗马天主教仪式的权利),违者驱逐出境,就象不到几年前一个耶稣会教士的遭遇一样。”布兰德:《出使日记……》,伦敦,1698年,8开本,第6页。

10 参阅第1章第31页。

11 参阅第1章第26页注2。

12 1691年9月6日。这个神父(冈明我神父)通知(皇帝)说……他决定由陆路回来,他想取道莫斯科……迪·荷尔德:《概述》,1736年,第4卷,第314页;1692年9月17日。傍晚时分……一个信使替一个派到广州去的官员……带回来信件……信中说冈明我神父……不能取道陆路回来,不得不从莫斯科回到欧洲,再从水路回来。同上引,第4卷,第371页。

13 参阅第3章。

14 应带去的信件似已送交莫斯科人。(原文为拉丁文)

科尔迪埃先生(《辞典》,第2版、第2卷、第917、918条)指出这个印成拉丁文、汉文及满文的信件有两个副本,一个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另一个在巴勒莫国立图书馆。鲁德内夫先生发现第三份在乌普萨拉大学(贝尔加日报,1903年、第9号)。我们可以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看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还藏有三份副本。

1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7年6月25日/7月6日、第IV/59柜左边第1/a本。

16 沙皇签署给卢米昂佐夫少校的谕旨:“半夜时分到莫斯科耶稣会的修道院里去,夺取他们的文件,把教士们送到边境;然后把他们留在莫雅伊斯克,等待检查他们通信的结果,如果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将他们驱逐出境就算了,否则就将他们逮捕。”《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5卷第3356号第694页。比较韦伯:《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4开本、第362—363页。这种程序称为“搜索”,目前还在俄国流行,尤其是对付青年大学生。

17 参阅第7章、第133页、注4。

18 贝尔列举了巴多明神父、凯格莱神父、弗里德里神父;对于后者,他说是“我们的朋友”,他于1721年1月9/20日同郎克去探望他;贝尔还谈起布韦神父和纪里安·斯顿甫神父。贝尔的《旅行》第2卷、第17、25、30、37、40—41、46、49、56、85页。

巴多明神父于1665年9月1日生于鲁塞(法国杜省),1714年9月29日死于北京(其出生年月据科尔迪埃先生说是1665年9月14日,见科尔迪埃,《中西印刷术在中国》,载远东现代语言学校出版物,第5章、第3卷、1901年版,及单行本1901年巴黎,8开本、第36页)。他从1698年到中国来。他懂得汉语和满语。在雍正迫害耶稣会的年代(1722—1730),他仍在北京坚持,后来由皇帝出资安葬。

布韦(1656—1730)自1687年到中国,死于北京。

在德国神父中,凯格莱神父于1680年5月11日生于兰茨贝格(巴伐利亚),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教授数学和东方语言,于1716年8月30日到达北京;他成为“数学院”的院长,1746年3月29日死于该城。

斯顿甫神父于1655年3月13日生于维尔茨堡,1694年来华,1720年

7月24日死于北京。

弗里德里神父于1673年3月11日生于林茨(奥地利),于1705年来华,于1743年6月4日死于北京。他曾协助审定耶稣会神父于1708—1718年间绘制的中国地图。

喜大教神父(见下文)1686年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阿韦尔萨,于1716年来华。1721年他动身到罗马去呈递给教皇一份关于礼节的备忘录。他并没有再度来华,于1759年4月14日死于那不勒斯。索马沃热前引著作。

19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第1号,1725年、第6号(这封信俄文译本的抄件);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3页背面(谈到这个文件)。

20 俄文是“Реляция”,法文是“relation”(报告)。彼得大帝时期的俄文充满了几乎没有俄文化的德文和法文单词。

21 根据1719年5月29日/6月9日的谕旨任命,以代替马蒂厄·彼得洛维奇·噶噶林亲王。《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5卷、第3378号、第700页。

2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第1号;交给阔留赤甫专员的文件清单,第84页正面;关于阔留赤甫这个人,参阅第9章。

2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1722年第2号,郎克的报告1723年、第3号。

这些由郎克亲笔书写和签名的原始文件,可以拿来同下述印成的著作作比较:《郎克先生的使节公务日志》,莱顿、1726年、8开本,转载于《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第8卷、1727年、十二开本、第221—371页,以及贝尔的《从圣彼得堡……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第2卷。

原本(德文)同法文本在主要事实上完全相符,而且法文著作在某些细节上比正式公文多些。可是这些正式公文同近代俄国的译文和公文比较,对于专有名词的译音又比较忠实(如“瓦西里日·蒂尔索夫”,《郎克先生的使节公务日志》,第159—169页。又巴西尔·菲尔索夫,等等),而且使人明确所用的是俄历,这一点在法文本上是没有明言的(同样的事实我们已对别的在俄国旅行过而且印行他们的旅行记的外国人指出过,如义杰斯、贝尔等等;参阅上文第4章及第7章)。最后,同贝尔的书一样,贝尔的书同伊兹玛伊洛夫的公务日志对比,只揭示了会议谈判的外表,《郎克先生的使节公务日志》也一样,对于一件十分重要的外交事件遗漏了,而郎克的报告中却叙述得十分详细。

参阅下文第 145—146 页。

24 《郎克先生的使节公务日志》，第 28—29 页；《北方游记集》，第 8 卷、第 239 页。

25 《郎克……公务日志》，第 23—28 页、36 页；《北方游记集》第 8 卷、第 236 页。关于这个人参阅上文第 7 章、126 页、注 13。

26 《郎克……公务日志》，第 15、34—35、51—55、62 页；《北方游记集》，第 8 卷、第 221 页以下。

27 1722 年 9 月 3/14 日郎克给商务部的报告；《郎克……公务日志》，第 12—13 页。

28 伊斯多甫尼科夫从土拉河发出日期为 1721 年 7 月 29 日 / 8 月 9 日的信，8 月 14/25 日在北京收到。“……他添上一句，说过去对奥斯考尔考夫专员也同样允准”，《郎克……公务日志》，第 96—98 页。9 月 7/18 日郎克叫译员送一千五百两银子到张家口。同上引，第 110 页。

29 1721 年 10 月 21 日 / 11 月 1 日郎克给沙皇的报告；1722 年 9 月 3/14 日郎克给商务部的报告；《郎克……公务日志》，第 111 页。

30 1722 年 9 月 3/14 日郎克给商务部的报告；同上引，第 113—117 页。

31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6 号，抄本。同时参阅 1723 年、第 3 号、第 30—31 页；1722 年 9 月 3/14 日郎克给商务部的报告；《郎克……公务日志》，第 118—136 页。

郎克起先向监督交涉，但是没有用（监督，见上文第 4 章）。《郎克……公务日志》，第 118 页。

32 1721 年 9 月 2/13 日。1722 年 9 月 3/14 日郎克给商务部的信；《郎克……公务日志》，第 136—138 页。

33 十二月十五日公布了圣谕；每一个人都可以廉价购买不同种类的貂皮；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商人和一些贵族家庭决定向我们购买，但由于害怕而没有来四夷馆购买，而是到别处去了。于是短短的一天内就卖了二万张貂皮，据我所知，最好的貂皮卖二两半，次的卖一两半，更坏的卖九钱一张。”（以上原为德文——译者）

郎克 1722 年 9 月 3/14 日给商务部的报告，比较《郎克……公务日志》，第 140 页。

34 “除此以外，还命令两个官员和一个书吏站在我们的门口附近，他们奉命注意不许用赊帐方式购买商品，而且要准确地记下所有进出的人的姓

名,记下他们向我们购买了些什么商品,价格如何,数量多少。”《郎克……公务日志》第112—113页。官吏们售出“30 乔司(Zschosres)或4分(fun)”再加上入门税。同上引第140—145、150—152页。关于中国货币,参阅加恩:《1727—1728年俄国商队在北京的帐册》,巴黎,1911年8开本、第120页以下。

35 1722年9月3/14日郎克给商务部的报告;《郎克……公务日志》,第157—159页。

36 菲尔索夫的信的抄本。他带来一封伊尔库次克总督波卢哈托夫(给土谢图汗)的信,信中要求通过蒙古,并且带来四只包裹,两个是给中国大臣的,一个是郎克的,一个是给圣尼古拉教堂的教士拉弗朗泰伊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3号、第32—33页;1725年第6号。

菲尔索夫的信是1722年4月20日/5月1日从库伦发出的;于5月4/15日或5/16日到达北京;郎克于5月7/18日才收到。郎克1722年9月3/14日给沙皇以及商务部的报告。《郎克……公务日志》,第159—172页。

37 1722年9月3/14日郎克给沙皇和商务部的报告;《郎克……公务日志》,第173页以下。

38 同上引;同上引,第222—223页。

39 他于7月15/26日黄昏时分到达,于17/28日被康熙接见。老皇帝提醒他皇帝曾给伊兹玛依洛夫以亲切的接待,但是自全权使臣回国以后,中国所要求引渡私逃者一事毫无任何消息!郎克于7月18/29日再度离开。见前引;同前引第223页。

40 在“红山”会合,同上引。

41 1722年8月26日/9月6日郎克回到色楞格斯克,同行者有图理琛,后者带着一封理藩院的信。根据色楞格斯克政府办公室职员伊凡·拜顿于1722年9月10/21日给伊尔库次克长官波卢哈托夫的报告,波卢哈托夫把这一切转报给托波尔斯克的切尔卡斯基亲王,亲王抄了一份理藩院的信,连同他自己的一份报告于1722年12月19/30日呈报沙皇,1723年2月2/13日莫斯科收到这份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2年、第2号;《郎克……公务日志》,第223页。

42 郎克于1721年10月21日发自北京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于1722年7月11/22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1722年、第2号;到达莫斯科的日期,参阅前引,1723年、第2号、第108页背面。

郎克没有写出那个告诉他中国的真正意图的耶稣会神父的名字，也没有写出那个将康熙的谈话告诉他的神父的名字。这个神父也许是郎克的朋友巴多明神父，这个神父一向亲俄而且当时得到康熙的信任，也许是他把宫廷的事情告诉郎克。可是郎克没有把名字写出来，一定是害怕他的报告被秘密地偷看后会采取报复措施。郎克只说他是一个老头子。

这尊佛像所在的地点郎克在报告里是这样写的：“在一个小地方，按蒙古语叫做 Tabun Mundurga。……按俄语叫做 Saissan Ramin。”关于这个地点，参阅第 148 页、注 3。郎克这份报告的节本在《原始文件》中可以找到。

43 郎克于 1722 年 9 月 3 日从色楞格斯克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于 1723 年 2 月 2/13 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1722 年、第 2 号。郎克又从一个生于北京而父母是俄国人的译员（撒文？参阅加恩：《1727—1728 年在北京俄国商队之帐册》，巴黎、1911 年、8 开本、第 58、70、72 页等）那里得知，琿台吉要求得到哈密和蒙古，否则不肯放下武器。

44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 年、第 1 号；外交部收到 1722 年 2 月 26 日/3 月 8 日切尔卡斯基亲王的报告后，给枢密院的报告，同上引，1722 年、第 1 号。

4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2 年、第 2 号。

46 1722 年 7 月 4/15 日谕旨，（外交部）于 7 月 5/16 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2 年、第 1 号；外交部 1722 年 7 月 20/31 日的决定，1722 年 9 月 4/15 日转达给托波尔斯科的切尔卡斯基亲王。这个文件内容非常明确，它提起切尔卡斯基亲王以前的报告（1721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1 日、1722 年 2 月 17/28 日以及 4 月 13/24 日），1722 年 2 月 26 日/3 月 8 日外交部给枢密院的报告，以及 1722 年 7 月 5/16 日收到的谕旨，在这道谕旨中，叙述沙皇于 1722 年 4 月 12/23 日亲临枢密院，决定遵照尼布楚条约第 4 条，规定只归还订约以后的私逃者。文件上签名的是：首相葛洛甫金伯爵，彼埃尔·夏菲洛夫男爵。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1722 年第 2 号。很可能外交部 1722 年 7 月 20/31 日的决定只在几天以后才具体地写在一道谕旨里，因为通常这个决定的日期总记作 1722 年 7 月 24 日/8 月 4 日（参阅的材料中，有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 28 页正面），1722 年 4 月 12/23 日还应该有一份外交部给切尔卡斯基亲王的命令，命令他调查尼布楚条约以后的私逃者。参阅外交部向枢密院报告的六条，1724 年 2 月 4/15 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 年、第 1 号。

47 托波尔斯克于1722年9月4/15日收到的谕旨；在科兹罗夫斯基亲王于1723年8月28日/9月8日给沙皇的报告中提起。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2号、第108页；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7页背面。

48 这个断然措施可以从收到郎克关于这件事的报告来解释；这份报告于1721年10月21日写于北京，1722年7月11/22日到达莫斯科；从7月31日/8月11日起，枢密院即决定拒绝中国人入境。它给切尔卡斯基亲王的命令于1722年10月22日/11月2日到达托波尔斯克；它还命令对佛像所在地点绘制一张地图，取得佛像的尺寸及图形。这道命令于1723年8月28日/9月8日在科兹罗夫斯基亲王（接替切尔卡斯基亲王）给沙皇的报告中提起。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2号、第109页；1726年、第1号。

关于寻找这尊佛像一事，一直拖延了四、五年，直到俄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和他的助手负责边境的阔留赤甫到达以后才停止。下面是这件事的梗概：1722年11月22日/12月3日切尔卡斯基亲王发出一道命令，四天以后被登记在托波尔斯克政府的办公室里；这道命令派遣库兹涅茨克的贵族布特基叶夫到伊尔库次克州去，据说这个贵族在噶喇林时代曾经在安加拉河的支流奥卡河上一座高山顶上（俄语称为石头山“Sazan Kamen”，蒙语称为“Taboun Mandouka”的山上）看见过一尊石像；“航海家”卢然随同前往。布特基叶夫婉言拒绝，说自己只是在1721年才到这个地方经商，因此他继续留在库兹涅茨克。测量员卢然在他的1725年5月7/18日的报告中，肯定在伊尔库次克州没有找到什么，只除了在乌拉河左岸的伊加河上发现一尊石头女像之外。一个布里亚特农民称这尊女像为“巴图尔博奇”，卢然临摹了这尊女像。托波尔斯克政府于1723年8月2/13日和12/23日下令以伪证罪处布特基叶夫以鞭笞刑，卢然也应带到托波尔斯克受罚。这是这件事的第一段落，可以在下述文件中找到记载：1723年8月28日/9月8日科兹罗夫斯基亲王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2号、第110页；1725年9月27日/10月8日多尔葛卢科夫亲王（切尔卡斯基的后任）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号，附有石像的图像；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82页背面；《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章、第148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98号、第418—420页；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公务日志，第1卷、第47页背面。

另一条线索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方面追寻下去。这条线索比较可靠。有两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居民，一个名叫夏洛夫，另外一个叫沃尔钦科夫，宣

称他们曾于 1716 年在恰库尔附近的萨扬山口一个山洞里看见过几尊雕像：一尊是一个男人，坐在两个佩剑站立的男人中间，他们周围有不认识的文字；1721 年，夏洛夫发现坐着那个雕像失踪了，他带回来两张小纸片，据他说，是在洞内发现的。1725 年 5 月 15/26 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长官派夏洛夫和别的五个人去绘制山洞的图形和临摹那些雕像；1726 年 7 月 17/28 日，他们在工作汇报中说，他们曾经被特斯的蒙古人扣留；只有其中一个人和一个鞑靼人能够偷偷地走进洞里去，他们在洞里看见以前所有的全部雕像，还增加了一些，由许多记有文字的纸张覆盖着。他们带回来一幅雕像图和山洞的尺寸。这一切都向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和阔留赤甫作了汇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长官舍内夫给阔留赤甫的信，1726 年 9 月 7/18 日。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 161、162 页；同上长官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1726 年 5 月 23 日/6 月 3 日以及 1726 年 7 月 18/29 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12 号，使节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239 页正面（一幅雕像图在 1726 年第 12 号的本子中）。

49 一个泽古谢(代表)带了三封信到色楞格斯克来，一封俄文，两封蒙文，是理藩院给切尔卡斯亲王关于私逃者的。第一封信盖有伊兹玛依洛夫遗留给中国人的印，三封都用信封装好，信封上写有俄文和蒙文。带信的官员的护照是由郎克签发的。这三封信到达托波尔斯克的日期是 1722 年 6 月 15/26 日；切尔卡斯亲王马上起草一件报告给沙皇，日期是 1722 年 6 月 21 日/7 月 2 日于托波尔斯克(1722 年 8 月 27 日/9 月 7 日莫斯科收到)，并且将两封蒙古文信件的信封和俄文信件的抄本送去，所有这些文件都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1722 年第 2 号内。参阅《参考书目》。

5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2 年、第 2 号、第 95、96 页；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 84 页正面。这份报告莫斯科于 1723 年 2 月 2/13 日收到。

51 费菲洛夫可能于 4 月 1/12 日到达，第二天将切尔卡斯亲王 1722 年 12 月 11/22 日的信交给郎克。郎克给沙皇的报告，1723 年 4 月 12/23 日及 1723 年 6 月 13/24 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1723 年第 3 号。

52 “(1722 年 6 月) 6 日，一个名叫图理琛的官员告诉我说，他收到中国皇帝的谕旨，要护送我一直到色楞格斯克……”。《郎克……公务日志》第 203 页。

53 这封信有一个抄本附在切尔克斯基给沙皇的报告里，1722 年 12 月 19/30 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2 年、第 2 号、第 98 页。

54 莫斯科的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成员埃弗雷伊诺夫的雇员纳莱丹 1723 年 5 月 21 日/6 月 1 日的报告,1724 年 10 月 23 日/11 月 3 日于圣彼得堡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 年、第 2 号;1726 年、第 6 号。其它抱怨的文件于 1723 年 2 月 12/23 日从色楞格斯克发出,于 173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7 日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 年、第 2 号、第 106—107 页;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 100 页背面。

55 这是外交部给枢密院 1723 年 6 月 8/19 日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解释这些事实。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1723 年第 1 号(俄文信及蒙文信原本),1723 年第 2 号;抄本在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 83 页正面。

56 这些喀尔木克人是琿台吉的属民,自称由一队有军队押送的囚犯队伍中逃出,囚犯队共有二千五百人,中国人把他们从额尔齐斯河押到特斯去。1723 年 2 月 8/19 日一个中国人到伊尔库次克来索还他们。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波卢哈托夫的报告,1723 年 2 月 20 日/3 月 3 日;圣彼得堡于 1723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7 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 年、第 2 号、第 103—105 页;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 100 页背面。

57 这是郎克从一个俄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消息,这个俄国商人从库伦来,于 1723 年 2 月 22 日/3 月 5 日到达色楞格斯克。说是康熙于 1722 年 12 月 10/21 日死于热河附近。郎克 1723 年 3 月 8/19 日自色楞格斯克给沙皇的报告,1723 年 8 月 15/26 日圣彼得堡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 年、第 3 号。

58 “1722 年 12 月 11/22 日康熙死了。库伦的呼图克图也于 1723 年 1 月 22 日/2 月 2 日死于中国。他们派遣了一个喇嘛去琿台吉那里讲和。”郎克给沙皇的报告,1723 年 6 月 13/24 日于色楞格斯克,圣彼得堡于 1723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7 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 年、第 3 号。

59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 7 卷、第 4429 号、第 208—209 页;这道谕旨的日期是 1724 年 1 月 22 日/2 月 2 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 年、第 1 号。

60 这封信是用拉丁文、蒙文和满文写的,连同切尔卡斯基亲王的一份报告,一起于 1723 年 12 月 11/22 日送给沙皇;这份报告的根据又是 1723 年 7 月 14/25 日从色楞格斯克给伊尔库次克的一份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 年、第 2 号,第 118 及 117 页;比较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 83 页背面。

61 郎克 1723 年 11 月 18/29 日于色楞格斯克给沙皇的报告,1724 年

2月27日/3月9日莫斯科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3号。

62 郎克给沙皇、商务部及切尔卡斯基亲王的报告，1724年3月13/24日于色楞格斯克，圣彼得堡于1724年10月6/17日收到。郎克要求指示，一封证明他任领事的新信任状，还有礼物，“没有礼物什么也不能办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1、2、3号。

63 这两位大臣是奥隆代和特古特，后者主管理藩院。郎克给沙皇的报告，1724年8月13/24日于色楞格斯克，1725年2月22日/3月5日圣彼得堡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3号。

在离开的时候，这两位人物给俄国枢密院写了一封汉文信，日期是雍正2年季夏月24日（雍正2年6月？24日相当于1724年8月12日，所谓6月是否指1724年7月20日至8月19日？）。没法译成俄文，枢密院将这封信退回托波尔斯克，转交给郎克（1725年3月3/14日的谕旨以及同日外交部给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的命令，1725年4月4/15日托波尔斯克收到）；这封信于1725年7月23日/8月3日交到郎克手中，他于1725年8月3/14日连同他的报告将信再度送出，于1726年2月12/23日到达圣彼得堡。因此，差不多需要两年时间——1724年8月至1726年2月——才能得知一封汉文信件的内容。为了避免同类情况，1725年3月3/14日一道谕旨命令郎克要求中国人凡是汉文信件都附一份拉丁文译文。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2号及第3号。比较本书第3章。

这封信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它提起中国对维尼阿斯、罗莫达诺夫斯基、噶噶林、穆森·普希金、卡扎诺夫、西迪叶尔尼科夫、奥斯考尔考夫专员、伊凡（萨瓦齐耶甫？）、义杰斯、伊兹玛依洛夫所提交的信件，始终得不到答复；可是郎克经过费菲洛夫的调查以后，宣布八十四个私逃者将予引渡，而且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人物将要到来，中国的大臣就表示满意，他们仅仅要求俄国的大使关于私逃者问题要有明确的训令。翻译这封信的人是阿列克西·特列季亚科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3号、第33—36页背面。

64 这份报告完成于1724年2月11/22日；郎克给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的信，1724年3月13/24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2号。

65 他称这份谕旨为1724年1月23日/2月3日谕旨；郎克1724年8月13/24日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3号。

66 参阅下一章。

第九章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出使

史料来源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14本册子（1725年第1册至1725年第14册）合成5本（3/a、3/b、3/c、3/d、3/f）；下述册子尤其重要：1725年第5册与1725年第6册，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大使的训令；1725年第7册，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原始报告；1725—1729年第11册，负责边境的专员埃蒂安内（斯捷潘）·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1725—1729年第12册，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公务日志，8开本、2卷，第1卷、第1至616页；第2卷、第617—1086页（页数仅编在正面，正反面合算则为：第1卷、第1至1233页，第2卷、第1234—2172页）。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23本册子（1726年第1册至1726年第23册）合成3本（4/a、4/b、4/c）；尤其参阅1726年第4册，内有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原始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29本册子（1727年第1册至1727年第29册）合成2本（5/a、5/b）；1727年第6册是劳伦特·郎克同商队在北京的公务日志；1727年第9册内有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原始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24本册子（1728年第1册至1728年第24册）合成2本（6/a、6/b）；1728年第10册内有萨瓦·

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原始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9年10本册子（第8册与本章无关）合成2本（7/a、7/b）；尤其参阅：1729年第4册（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原始报告）以及1729年第10册（大使对于他怎样执行训令的说明）。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5180、5189、5254、5268、5286号。

《俄国与中国1689—1881年条约集》，第27—83页。

班蒂什，第341—378页，第434—503页（训令和条约正本）。

帕拉斯：《新北方自然地理学、民族学、自然史及经济论文集》，圣彼得堡及来比锡，1781—1796年，8开本，7卷，第2卷、第7章、第83—159页（郎克的日记）。

从中俄开始建立关系直到今天，在两国所有的外交使节来往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使团最为盛大，也最为重要；经过两个世纪的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变迁，那时缔结的条约大部分条款仍然有效。这次出使对俄国的外交和商业获得了永久性的后果，对科学和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仅仅这次出使本身就构成一种对于以前一切相类似的企图来说，是综合性的总结，而且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提出领土要求的时代的开始，后一个时代到现在尚未终结。这次出使构成了从十八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开始的俄中两国关系史的基础。

这次出使是由尼布楚条约订立（1689年）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引起的，更由伊兹玛依洛夫的出使（1719—1722）以及郎克在外交方面的活动（1721—1725）作了准备，由有关两国各自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刺激——对俄国来说重要的是商业问题，对中国来说则是边界确定问题，而最后更由俄中两国就其共同的近邻喀

尔木克人或厄鲁特人的领袖琿台吉所作的政治考虑所促成。这次出使的特征，同以往俄中两国关系所呈现的特征相同：它涉及政治、外交和商务的各种事项。这次出使一方面力图确定亚洲两大帝国的边境，一方面也力图解决俄中与它们的强大邻居琿台吉之间的微妙关系；它实际也是对于俄国、中国及其近邻不花刺人和蒙古人的经济和商务关系彻底改组的工作；最后，它也是革新西伯利亚的行政制度，加强这一地区以及企图获得这一地区的科学知识的第一次真诚的努力。

在1725年左右，俄中两大国的一般情况，同任何特殊情况一样，足以说明为何两国都有互相接近以求得谅解的共同愿望。中国方面已对厄鲁特人苦战数年，花费浩大。它要保持它在哈密地区的位置和向西推进只有付出惨重的代价：向一个被大沙漠与中国本部隔开的遥远地区输送军队、战争物资和给养开支庞大，由于环境艰苦和疾病造成了人员和牲畜大量死亡，同时几年来蒙古人负担补充一批大军及其后续部队的给养以致财源枯竭。中国的康熙老皇帝未能完成这一巨大的工作，于1722年逝世了，遗留下防御北方边疆的任务给他的继任者去完成，北方边疆经常受到未开化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威胁。俄国本身虽然没有什么作战准备的迹象，也没有引起任何迫在眉睫的恐惧，但它仍然是中国忧心忡忡的原因；难道不害怕俄国与中俄两国的共同劲敌喀尔木克人之间结成同盟吗？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着。俄国不是已把土尔扈特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吗？而土尔扈特人是喀尔木克人的近亲。所有北方的“蛮子”：俄国人、土尔扈特人和喀尔木克人共同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总联盟，这对于中国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呀！因此有远见的康熙的外交，一直在设法防止这一威胁的出现。中国派了一个使团去土尔扈特人那里试探情况，播下一种在半个世纪后才会成熟和结果的思想种子，那就是，使这些离家的浪子重返他们的故土。

准噶尔。但是对厄鲁特人，康熙虽然有佛教僧侣的帮助，但他所作的全部外交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不得不诉诸武力。但是仍然没有用：一个琿台吉被打败和杀死，另一个马上又继续采取他的政策和野心勃勃的计划。康熙战胜了噶尔丹（1696—1697）；但继之而起的策妄阿喇布坦更为狡猾阴险，他先诱骗中国人，然后起来反抗中国人，康熙被他弄得精疲力尽，在企图征服他的过程中逝世了。事实上，平定喀尔木克人的任务太艰巨了，不能与别的与此有连系的事业同时并举，应该有先后地进行，而且按照政治的基本原则，必须分化敌人然后逐个击破。首先必须孤立喀尔木克人，为了作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与俄国的全部争端，消除俄国出面干涉的一切借口。除了划定边界，使来自北方的敌人尽可能远离中国本部，而且用庄严的条约来束缚敌人而保护自己，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从此着手，这项任务的剩下来的部分就容易进行，击溃喀尔木克人也就成为可能的事了。可惜成功地完成这一伟大计划的不是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他在位不过短短的十三年（1723—1735）。他只满足于消除俄国的疑惧为这一工作铺平道路。享有实现康熙的外交计划的荣誉者是雍正的儿子乾隆，他使土尔扈特人迁回故土，击溃了厄鲁特人¹。康熙在位时期占了十七世纪的半个世纪（1662—1722），而乾隆则几乎占满了十八世纪的其余部份（1736—1796）；介乎中国这两个伟大皇帝之间的是雍正，雍正与俄国订了一个重要条约，从而成为对中华帝国的利益最有用的过渡时期。

俄国没有它的亚洲劲敌那样有远见，只是关心自己的商业利益，它乐于通过与中 国进行一次关系的调整，以消除来自中国的有关私逃者问题的不断抱怨，因为俄国认为私逃者问题足以妨害两国的友好关系并因此会危害它的商业利益。无论法律也好，规章也好，都不能阻止诈欺行为，调整贸易关系和给国库带来好处，因此，在俄中贸易上进行一次改组，或至少是相当程度的改善，已是

很必要的事。划定两国边界，就等于间接给俄国政府的经济利益带来好处，而经济利益在俄国政府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事。

俄国在十八世纪头一个二十五年的末期，对于这种外交和商务上的双重任务，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彼得大帝不断地进行战争，不只是使得俄国有必要不断地征募人员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也使组成了一支正式的和秘密的外交人员队伍一事成为必要。商业本身就是一个实际熟习人和事的良好学校，而彼得大帝也毫不忽视那些既能在商业方面又能在政治方面代表俄国利益的商人们。1692年伊兹勃兰德·义杰斯表现出他作为商人所能作的贡献，他被派到中国去主要还是商务方面的而不是外交方面的使者。伊兹玛依洛夫接受了有关商务方面的许多详尽的训令，还更进一步得到一位特别的商务顾问、一个只处理商务的“代理人”或领事的协助。但是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俄国的代表不得不担负起政治任务。郎克在北京时，就同中国官方翻译耶稣会教士进行接触，后来在色楞格斯克又与理藩院及其官员有联系。因此，我们就不必为彼得大帝对于一位南方商人所给予的信任感到惊讶了；这个南方商人具有优于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和郎克的长处，就是他的聪明才智更高，而且由于长期的阅历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²。就是这个人要负担起这样重大的任务：划定俄中两国间一万公里的边界，重建两大帝国之间的外交和商务关系，改革俄中的全部商业，甚至改变整个西伯利亚。

萨瓦·卢其迟(意思是：“洛克之子”)·务拉的思拉维赤³似乎出生于1668年⁴，在波斯尼亚的一个高贵的家庭里⁵。他的父亲为了躲避土耳其人，逃到威尼斯去，后来又回到腊古札去，因此后来就得到了“腊古札的”这一别名。萨瓦自己是君士坦丁堡的商人，又担任俄国大使葛利青亲王和乌柯兰斯多夫的秘密代理人。他于十七世纪末或十八世纪初到俄国来⁶。1702年他在阿速夫城⁷。

1703年7月1/12日他申请在该城开设一间商号，要求在俄国欧洲部分自由贸易十年，只交纳与莫斯科的商人们同样的捐税，又申请出售西伯利亚部的勒拿狐皮。1703年7月6/17日的一封公函批准了他的请求，给予他出售西伯利亚狐皮的特权，但以三年为限⁸。他在莫斯科给俄国驻土耳其大使托尔斯泰办理了一项秘密事宜后⁹，又于1705年3月8/19日申请政府允准他的商品自由进入小俄罗斯和乌克兰。1705年4月2/13日一道新的命令迅速地满足了他的要求¹⁰。1705年彼得大帝赐给他一所莫斯科的房屋，1710年把小俄罗斯的地产赐给他；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跟随俄军出征普鲁特(1711年)；腊古札共和国封他为伯爵，俄国也任命他作内廷顾问官¹¹。自1716年至1722年，他为彼得大帝在腊古札、威尼斯及罗马各处参与各种谈判¹²。回到俄国以后¹³，他就有了枢密官的头衔，不久就被任命为“特派驻华全权大臣”。这时(1725年)，他已是年近60的人了，非常善于应付复杂微妙的商业谈判和外交事务。尤其重要的是，他做事异常有条理¹⁴，清楚、精确，不论是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最琐碎的细节方面都是如此。俄国在它的对华谈判中，从来没有找到过这样有才智，这样称职以及对俄国的利益这样忠诚的人物。

但是无论务拉的思拉维赤头脑多么敏锐和知识多么丰富，他对于中国事务却缺乏直接经验。他过去一直只是与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打交道。因此，俄国宫廷派了一个最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外交和商务程序最熟悉的官员作为他的助手。这个人就是劳伦特·郎克，他从1715年起就到中国，他又和伊兹玛依洛夫和伊斯多甫尼科夫商队一起留在北京将近两年(1720年11月18/29日至1722年7月)，以后他就留在西伯利亚负责俄中之间的交涉。对于使团其他人员的委派，俄国也很重视。派到使团来的有一位枢密院的审理官¹⁵斯捷潘·阔留赤甫，他刚刚担任过俄国与波兰及土耳其

边界的划界工作¹⁶，对于俄中边界的划界工作是一个多么好的准备呀！一支小小的部队对使团是必需的，作为卫队也好，作为支持力量也好。部队的长官就是十年前噶噶林亲王派去打喀尔木克人的伊凡·巴赫尔慈¹⁷，他起先由于失败而受怀疑，后来得宠被升为上校¹⁸。阔留赤甫在工作上需要富有经验的测量员，真有点迎合人意似的，俄国刚好成立了俄国科学院¹⁹，有一批研究数学的学生可以供应给他。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为了绘制一张西伯利亚全图，必须搜寻许多地理资料，刚好在这时候，白令探险队正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工作²⁰，正如萨瓦将在西伯利亚的东南部工作一样，因此萨瓦将尽力从中搜寻一些有用的资料²¹。最后，大使可以在伊尔库次克的蒙古神学校²²得到几个语言学学生，将来可以在北京的正教教会里工作。

中国方面是受政治动机的驱使来同俄国谈判的，俄国方面则是出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此会谈不会没有结果。不过，由于两国要讨论的重大问题很多，因此谈判延续了将近两年。谈判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有关实质问题，商谈地点在北京；第二部分确定具体条款，在边境进行。在俄国方面，谈判之前有一个准备时期，谈判之后又作了各种补充。

准备工作延续了一年以上。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参阅第八章），在1723年年底和1724年期间，中国曾几次表示愿意与俄国重新开始直接外交谈判，郎克立刻报告了俄国宫廷。1724年10月25日/11月5日俄国外交部呈交一份报告给枢密院，表达它认为当时似乎是派遣使团到中国去的适当时机。借口不必找寻，自己就出现了：中国皇帝康熙死于1722年12月20日，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死于1725年1月28日/2月8日，派遣一位高级官员使华，首先是去庆贺中国新皇帝登基，其次是宣布女沙皇喀德邻一世即位。这就是一道给郎克的命令的内容，这道命令签署的日期是1725年3

月3/14日(发出是7/18日)²³；命令还说这位大使有全权与中国皇帝的大臣们谈判。郎克于1725年8月3/14日从色楞格斯克回答复说他于7月23日/8月3日收到命令，他将尽速通知中国当局²⁴。但是俄国看来是直到1725年年中才最后决定大使的人选和任命的，1725年6月23日/7月4日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呈递给外交部一份报告，依据6月18/29日任命他出使中国的谕旨，要求给他各种助理人员和文件，要求一个医生，一个植物学家，一个地理学家，两个数学家²⁵，等等。可是政府的正式文件稍迟一点：1725年8月10/21日给郎克一道新的命令，叫他通知中国，俄国一名“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即将访华²⁶；1725年8月10/21日外交部给西伯利亚总督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的一封信，证实了前述消息²⁷；而萨瓦本人则在他的公务日志中，把他的受命日期写成为1725年8月11/22日²⁸。

使团的人员是由1725年8月至9月间发布的一系列命令决定的，但差不多直到1726年8月使团即将进入中国的时候，人选才最后更改和补充完备。郎克和巴赫尔慈上校负担了特别的职务²⁹。军队的人数和编制也明确规定了：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³⁰。伴同大使前往的还有一名“专员”，专门负责边界问题，他就是斯捷潘·阔留赤甫(内廷大臣³¹)；一名副专员彼得·伊凡诺维奇·维拉索幅；他不久就死掉了³²，继承他的位子的是前司法部顾问米契尔·克瑞尼琴，后者于1727年5月23日/6月3日被任命³³，但不久也死了(1727年9月27日/10月8日³⁴)，所以只剩下阔留赤甫一人负责整个边界的测量工作。使团的四名主要人物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阔留赤甫、郎克和巴赫尔慈，有秘书³⁵、地形学家、教士和其他官员³⁶伴同前往中国。在地形学家中有一名测量员和两名俄国科学院研究测地学的学生³⁷。后来，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对这两个“有文凭”的测量员感到不满，另外又在西

伯利亚选择了几名³⁸。枢密院于1725年8月26日/9月6日发布了一道命令,让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主教(1721年即准备派他到中国去)仍为使团宗教事务的负责人³⁹。除他以外,还委派了一名圣职神父,一名普通神父,两名莫斯科神学院的学生,他们以后的任务是在北京学习汉文⁴⁰。但是萨瓦到达莫斯科以后,在他的最初几份报告中的一份,日期是1725年12月25日/1726年1月4日的那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两个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也许年纪太大不适于这么长时期的学习,于是他把其中一个学生交给阔留赤甫作为拉丁文翻译,并用一个较年青的人代替他⁴¹。这样使团的人员增加到120人⁴²,由1500名兵士护送。使团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和职务都有明确规定:负责外交的是全权大使及其秘书和事务官;负责商务的是郎克和特列季亚科夫所领导的商队(参阅第十章);担任绘制边界地图的是阔留赤甫和几个测量员;负责宗教事务的有一位主教和几个教士;担任未来翻译工作的是几个研究外国语的青年学生,目前有一个蒙古文翻译阿列克西·特列季亚科夫⁴³,和几个拉丁文翻译;最后,由巴赫尔慈和军队负责总的安

全。不过无论当时形势看来多么有利,无论外交家们看来多么干练,物质的帮助对于促进一件复杂微妙的事情,总不会是多余的。因此,使团除了领有两年的特殊薪金外⁴⁴,又得到一万卢布作为置办赠送中国皇帝的礼物,三千卢布作为置办赠送各位大臣以及那些表现友善态度的人的礼物⁴⁵。这些礼物主要是实物⁴⁶:欧洲制的表和挂钟,大面积的镜子和普通镜子,这些镜子尤其得到好评⁴⁷,以及价值昂贵的毛皮(貂皮和黑狐皮)。到了1725年年底,一个信使又传达命令,要在托波尔斯克准备二万八千卢布,后来半数以货币,半数以毛皮⁴⁸支付。按照俄国的惯例,大使及其随从可以携带些特殊商品,务拉的思拉维赤向中国的大臣们宣布,“这批商品总数不超过二万卢布”⁴⁹。由于使团延续三年(1725—1728),如果我

们把薪金、礼品、运输费以及其他各种附加的费用计算起来，则整个使团的费用是十万卢布，相当于今天我们的货币两百万法郎以上⁵⁰。

为了使大使能够彻底通晓以前历次俄中谈判和交往的全部详情细节，没有遗漏任何一桩应作的事。仅仅是给他参阅的文件或者抄件的目录，就占据了她的公务日志整整十页⁵¹。这些文件不只包括他的前任柯罗文、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和伊兹玛依洛夫等人的公务日志的副本，不只包括 1722、1723 和 1724 年间的全部报告、文件和来往函件，甚至还有有关宗教事务和俄国在蒙古的商业状况的摘录⁵²。为了这次出使，政府发给他四份官方文件：一封沙皇致“博克达汗”的信，签署日期是 1725 年 8 月 30 日/9 月 10 日；一道谕旨授与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全权大使职权；第三封是国书，日期同前；第四封是护照⁵³。他还得到一份代码字母表⁵⁴，外交部发给他的四十五点训令⁵⁵，商务部发给他的二十点训令⁵⁶，以及一些“秘密条款”⁵⁷。

给大使的训令虽然如此繁多详尽，但可总括为四点。首先，大使应与中国缔结商约，或者至少也应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关系⁵⁸。为了做到这点，他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和一切人，尤其是耶稣会教士，可以许诺他们经过西伯利亚旅行及通信的自由⁵⁹。大使应尽力获得商队入境的许可，以及获得在北京设立事务官或领事，后一职务应由郎克担任⁶⁰。如果中国方面坚持要先解决边界问题，大使应为了最重要的商业利益而在这一点上向中国让步⁶¹。第二，他应尽早绘制一张地图，以便与中国划分疆界时作为依据，外交部对于划界的范围丝毫没有资料⁶²。这一工作应由俄中专员配合进行⁶³。俄国不能放弃外贝加尔区、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尼布楚等要塞；在东部，尼布楚条约已把额尔古纳河定为国界⁶⁴；在西部，中国人曾向伊兹玛依洛夫谈及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筑一个城市，但额尔齐斯

河属于俄国，这样做是不可能的⁶⁵。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还应注意不要把矿区、有价值的领土和战略要地等让给中国⁶⁶。第三，至于私逃者问题，大使应提出1722年7月22日/8月2日彼得大帝的谕旨，这一谕旨已经命令送回这些私逃者，费非洛夫的调查已经决定引渡八十四名私逃者，郎克应于1724年8月16/26日已将他们送回⁶⁷。第四，大使应设法使卡尔齐特斯基主教秘密进入中国，然后再设法为他获取在北京居住以及到各省进行宗教职务上的巡视的权利。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他有权把主教留在国境上。不过最低限度，大使应设法使中国同意给与一小块土地以便修建教堂，费用由俄国女皇负担⁶⁸。两点秘密训令是，要求他尽可能准确地探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资源⁶⁹。这样看来，这些训令仅仅在划定边界和引渡逃犯方面与发给伊兹玛依洛夫的训令有所不同；而政府始终命令应避免诉诸武力，可以说两次出使的精神是一致的：为商业的利益取得和平解决⁷⁰。因此商务部只限于毫无变更地把1719年的训令重复一遍，但另外加上几点很有意思的补充：大使应设法获知西伯利亚的各种运输方式以及是否有较好的改善办法⁷¹。他应设法细致地获得有关在蒙古贸易的情报⁷²。他还应注意欧洲国家如荷兰、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等与中国贸易的情况。他应研究广州市场上的商品及其价格，以及由广州到北京的水路运费，还应一般地调查中国现在所使用的度量衡及货币制度⁷³。同样地，他应调查与日本商业，因为荷兰人认为对日贸易最有利，俄国若取道黑龙江与日本贸易是否也同样有利呢⁷⁴？在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要求外交部和商务部作的补充说明中⁷⁵，商务部所要求的仅仅是，若是不能在华设立领事馆，则应成立一个中国商务仲裁法庭⁷⁶；若中国坚持征收关税，所收关税应比较低而且两国能自由贸易⁷⁷。外交部方面则授权他可以给予耶稣会教士以通过西伯利亚的书面证明，在他回来时也可以带几名耶稣会教士同行⁷⁸。拒

绝中国人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立任何据点，这已经肯定⁷⁹；但总的思想则是应该取得和平解决，并建议他为了避免任何有损于俄中商务关系的建立，可以对中国让步。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带着这些丰富的资财和如此详尽完备的训令⁸⁰，于1725年10月12/23日离开圣彼得堡⁸¹。他于1726年10月21日/11月1日到达北京⁸²。

在这一年的旅程中，发生了一些事。大使关心的第一件事是命令绘制一张临时地图，使他在讨论边界问题时对这一问题有所了解。早在1725年10月4/15日，西伯利亚总督多尔葛卢科夫亲王告诉女皇，他已把这一任务交给伊尔库次克的测量员彼得·斯考贝尔琴和他的三个助手，将来绘出后把一份地图送给郎克，另一份送到托波尔斯克去⁸³。1726年3月27日/4月4日郎克由色楞格斯克写信给女皇，报告斯考贝尔琴的地图已于1726年3月22日/4月2日完成，一共绘制了四份，一份给外交部，一份给务拉的思拉维赤，一份给多尔葛卢科夫亲王，最后一份留给郎克自己⁸⁴。郎克亲自到伊尔库次克迎接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6年4月11/22日把斯考贝尔琴绘制的地图交给了他。大使认为地图还不够完善，继续派斯考贝尔琴和他的三个伙伴去完成它⁸⁵。1726年4月30日/5月11日，他把测量员分成两组，给他们作了详尽的指示⁸⁶。斯考贝尔琴和巴斯卡科夫去探查伊尔库特、科赛郭勒、赛阳山脉、叶尼塞河上游以及阿巴干；他们应绘制一张有度数的地图，随同地图附上一本册子，里面有关于这些地区的天然地理、人种志以及该地区各纳贡民族对俄国应尽的纳税义务的情报；他们还得在叶尼塞河及其支流额连固萨河之间寻找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重要佛像（参阅前章）。他们应在两个月之内设法完成委托给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如果可能的话，应在七月份把他们所得到的全部资料送到色楞格斯克，再把补充材料送给专员阔留赤甫。

另外两个测量员巴西尔·恰提洛夫和伊凡·斯维思图诺夫也接受了同样的指示，启程出发到由格尔必齐河至乌第河以达于海的山区去。在工作进度方面，要求他们应比他们的同僚要快些，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病倒了，那么他的同伴不应因此受影响而停顿下来，应单独进行工作。

1725年10月3/14日，郎克接到通知，叫他以同僚身份加入大使的随员行列⁸⁷。1725年11月30日/12月10日郎克接到1725年8月10/21日任命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为大使的谕旨⁸⁸。1726年2月22日/3月4日他派秘书大卫·格拉夫把这一消息送到北京去⁸⁹。6月间(1/12日和11/22日)郎克写信给务拉的思拉维赤说，他的秘书已经回来，带来了理藩院于雍正4年3月27日即1726年4月28日签发的回信，说中国将派两名高级官员来迎接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⁹⁰。以后大使就同中国大臣们直接通信，1726年4月22日/5月3日他从伊尔库次克城通知他们说，他不久即将和他的一百二十名随员到达边界。因此他要求立即允许已在边界等候数年之久的商队和“宗教人员”进入中国。他又要求中国方面也派遣几名地理学者，会同将于1726年正月离开莫斯科的两名俄国测地专员，一同勘测边界⁹¹。他又发了一封意大利文的密信给巴多明神父，请求他在情报方面予以协助⁹²。

最后，当使团尚未进入中国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商队的领队本来是斯捷潘·特列季亚科夫，郎克刚要离开务拉的思拉维赤想回到色楞格斯克，就在1726年5月14/25日收到全体“宣誓商”于5月3/14日写的一封信，通知他特列季亚科夫已于前一日去世。郎克立刻把这一消息通知务拉的思拉维赤⁹³，他的回答(5月19/30日)是任命第一名“宣誓商”莫洛柯夫暂时负责商队的领导工作⁹⁴，同时他把这事通知了外交部和枢密院(1726年5月26日/6月6日)⁹⁵。大使要越过边境时，于1726年8月31日/9月

11日写了一份长篇的报告给外交部⁹⁶，在报告中，他放弃携带地位如主教这样显贵的人物进入中国的打算，因为主教的头衔会使中国人震惊。他所能作的最多只是替一个修道院院长弄一张护照，而如果必要的话，宗教会议可以秘密地授与这个修道院长以主教的圣职。他认为伊尔库次克城的耶稣升天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担任这一职务很合适，因为他曾经伴同伊兹玛洛夫到北京去过，并且又在伊尔库次克城主持一所蒙古文学校，他的学生们可以充任司祭来帮助他工作，同时也很适于以后学习汉文和蒙文。大使将特别坚持要求商队进入中国，因为事实上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势看来是颇有希望的：喀尔木克人仍然全副武装，蒙古人已被大大削弱，而中国人也已疲于战斗了⁹⁷。中国人派来迎接他的两位大臣，其中一个是中国国舅，将留在边疆。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还在报告中说，中国还在继续迫害耶稣会教士；他还请求为了俄国对北京贸易的利益，绝对禁止俄国与蒙古的一切贸易往来⁹⁸。

大使对当前情势作了这样明确的概括以后，就进入了中国。他将从1726年10月21日/11月1日至1727年4月23日/5月4日停留在北京，时间整整六个月，这即是说，除了郎克以外，他比任何其他俄国使臣在北京的逗留期都要长久⁹⁹。他要在北京讨论基本问题而且达成临时协定。他要对付中国的大臣们¹⁰⁰，他们指责俄国人不断侵占中国土地并逐渐向东推进。图理琛参加了他们一伙，给会谈带来了一种严厉的气氛¹⁰¹。但是这一次中国大臣们所遇到的是一个装备优越的对手。务拉的思拉维赤除了他的外交才干、他的智慧和他的经验以外，还携带着丰富的礼品，他个人的财产又使他能把礼品筹办得更丰富些。在离开圣彼得堡以前，他把他的房子租给法国大使康普里顿，因而得到一封给法国耶稣会教士的介绍信，这些教士以巴多明神父为首¹⁰²。大使因此找到了

巴多明神父，经由巴多明，大使获得了极可宝贵的合作；也是经由巴多明，大使才得与中国朝廷一个叫做马齐的大官接触，马齐把中国大臣们的态度和意见全部告诉了萨瓦¹⁰³。虽然如此，谈判还是拖延时日而又困难的。中国方面采取固执的态度，敷衍搪塞，甚至进行恫吓。可是实际上它却力主和平，因而也就导致了协议。我们如果追述中俄双方长达六个月的讨论的详情细节，那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至少应写出谈判的结果来¹⁰⁴。

到了1727年3月21日/4月1日，差不多全部达成了协议¹⁰⁵，这一协议是建立在下列基础上的：边界方面，由乌第河至东部的石兴安岭，由于缺乏对于这些地区的地理知识，仍如尼布楚条约所决定的那样留待将来划定，但其他地方则由俄中两国专员会同决定。今后两国逃犯应互相引渡。中国允许俄国商队每隔三年自费来北京贸易一次，商队人数为二百人。在两国边界地方，将来设立两个贸易中心，以进行经常的正规的贸易。有官方印信的护照仍然继续需要；大使、外交代表和信使仍然继续自由接待。1727年4月19/31日务拉的思拉维赤获准向中国皇帝辞行，皇帝重申他对两国应公平对待与和平相处的建议¹⁰⁶；大使于1727年4月23日/5月4日离开北京¹⁰⁷。

大使刚到达蒙古¹⁰⁸，就接到了外交部于1727年1月22日/2月2日签发的两封“信件”。外交部通知他已收到他于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送呈的报告，对于其中每一部分都表示同意并予以批准；任命莫洛柯夫为商队领队，以代替特列季亚科夫；东正教会则以布拉阔甫斯基为首，以代替卡尔齐特斯基；对蒙贸易，不顾当时主要趋势（参阅第十章），给予严格禁止¹⁰⁹。萨瓦为了回答外交部，又于1727年5月10/21日“非常偶然地”送上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¹¹⁰。在报告中，他叙述在北京逗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并且在某几点上加上细节说明。他说他曾与三位大臣“察毕

纳、塔古特和图理琛”进行过三十次以上的会谈，由于他不肯接受中国方面对俄国不利的建议，因此中国只供给他们苦水，这使得有一半以上的部属都生病了¹¹¹。虽然如此，他并没有让步，最后条约的签订将在边界与赋有全权的中国大臣们举行。他又说，事情看来很顺利，中国皇帝宣称他渴望和平。“中国远不如人们相信的那样强大，并且由于对喀尔木克人作战而进一步削弱，因此中国要求和平，而喀尔木克人的支援对于俄国可能是很宝贵的。康熙时代的老臣已被没有才能的青年人所代替。巴多明神父的代码通信说，巴多明曾对中国的朝臣马齐施加压力，并且通过马齐取得了若干让步；可是耶稣会教士仍在受迫害，他们在目前并不受到信任。北京的毛皮非常多，因此使团只能售出它带去的一部分商品。条约一经签订，商队就可以允许入境；郎克可以伴同商队前往，但不能作为领事而留在北京。三个教士可以允许入境，并同意由大臣们出资在“四夷馆”修建一所教堂¹¹²。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6月14/25日到达色楞格斯克附近的波尔河¹¹³；还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缔结一个全面的条约，一年以后才能最后批准。现在的问题是对两国边界作详细的划分。就这一工作而言，俄国人有胜过中国人的长处：俄国人掌握关于地形学的严格的知识。虽然俄国第一批测量员不够称职，第二批只获得部分的成功¹¹⁴，工作中还存在错误和遗漏，但他们总算绘制出了一张全图，不仅划出了全部的边界，而且包括整个西伯利亚¹¹⁵。西伯利亚却是耶稣会教士未能勘察的地区，他们也不能在1708年至1718年绘制的中华帝国地图上完全精确地绘画出来¹¹⁶。阔留赤甫专员集中收集到的资料，他从1727年1月8/19日起就在色楞格斯克等待大使归来¹¹⁷。中国对于这些精确的资料只能以它的代表们的顽固和傲慢来回答，逗留在库伦的国舅隆科多，被授命为首席大使。他似乎自从萨瓦来到中国边境以后，没

有作过任何事情¹¹⁸。第二位大使图理琛似乎在嫉忌他，不信任他，因为只要隆科多呈上一份恶意的奏折，皇帝稍有不满意，就会使图理琛丢官丧命。他觉得隆科多碍手碍脚¹¹⁹。隆科多的助手、蒙古头目额駙策零¹²⁰对于边界没有什么科学的概念，甚至于对他自己的蒙古领土的东方或西方的国家也一无所知。因此，聪明如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面对着如此缺乏资料的对手，只需离间中国方面的人，然后一个一个地击败他们就行；何况确定的只是主要原则，实际上在划边界时最容易不过的就是划定完全有利于俄国的边界。在第二部分比较简单的工作中，萨瓦还得到了一个名叫噶尔丹的蒙古奸细的协助，这人是他用一点小钱收买过来的，是一个对中国言听计从的老王公，噶尔丹使他得知中国人方面的议论¹²¹。

会议于1727年6月23日/7月4日开始¹²²。萨瓦由润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协助¹²³。起初隆科多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肯让步¹²⁴；他的顽强固执几乎使全部谈判陷于停顿¹²⁵。对于俄国来说幸运的是，大约在8月8/19日或10/21日¹²⁶，隆科多被召回了，于是数日后双方终于得以签订了一个名叫“布连斯奇条约”（“波尔河条约”）的草约（1727年8月20/31日）¹²⁷。萨瓦赶快把这一成功报告了外交部，并且提出成功的理由如下：隆科多的被召回，巴多明和马齐所提供的情报（萨瓦给他们都送去了礼品），噶尔丹的服务，而最后则是中国方面害怕事情不得解决的恐惧，以及巴赫尔慈手下兵士和俄国所修建的第一批堡垒所造成的良好效果。他要求派一个工程师来完成堡垒的修筑工作，借以保护边界。在他与中国所进行的四十八会谈中，他曾利用这种情势突出指明俄国在欧洲的战争已告结束，现在可以转过来注意另一方面的边界了。商队带着三个学生动身，一个学生沃依科夫学汉文，另一个普赫霍尔特学满文，第三个特列季亚科夫学蒙文。布拉阔甫斯基修道院长同卡尔齐特斯基主教发生争吵，后来同另外三个学生会合在一起

了。阔留赤甫和格拉儒诺甫被派出去工作，一个派往东部，一个派往西部，与中国方面的代表会同划分边界（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的报告）¹²⁸。

事实上布连斯奇条约的补充条款没有经过很久就得到了解决：10月12/23日格拉儒诺甫与他的中国同僚交换了划界信件¹²⁹，阔留赤甫也于10月27日/11月7日和他的中国同僚交换了信件¹³⁰。但是11月13/24日从北京发来的一份拉丁文条约草案，内容与原来议定的条款并不完全相符¹³¹。萨瓦拒绝接受并立刻写信到北京去。他继续在恰克图修筑要塞，加强边界线的武装力量，因此当他接到女皇喀德邻一世逝世的消息时¹³²，他能够毫无恐惧地向中国方面宣称，在俄国沙皇可能更换，但政治原则不会改变。最后，1728年6月14/25日中国送回来了一份经过批准的条约，条约日期是1727年10月21日/11月1日，内容与草约相符。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接受了这份条约，加以签署封固，并与中国交换了约本，这就是恰克图条约¹³³。

恰克图条约有关悬而未决的问题共分十一条，这些条款自然地分成三、四组：有关边界和私逃者的条款；有关商务的条款；有关外交关系和宗教事务的条款。除了格尔必齐河以东的地区以外，两国的全部边界都已划定，格尔必齐河以东地区保留未确定状态，因为对这部分地区缺乏地理知识。但俄国必须研究这一点，提出解决办法，否则难保将来不发生冲突。在两国订约时，原已在对方国土上的逃犯仍可留在原处不必遣回¹³⁴，但今后之逃犯应该引渡并加以惩办。商队二百人可以每三年来北京一次。平时则以色楞格斯克附近的恰克图和邻近尼布楚的粗鲁海图作为常设的贸易中心。大使、信使及信件应由大驿车收受并转送，任何稽延或拒绝都会造成商务关系破裂¹³⁵。允许俄国在北京建立一所教堂，并允许一个教士和三个辅祭司留在北京，还可以派五个学习汉文的学生

和他们在一起。

1728年6月30日/7月11日萨瓦结束了他的工作，对下列诸人发布了一系列详细的训令：巴赫尔慈上校，克尼阿金肯大尉和阿列克西·特列季亚科夫；后者应在恰克图地方负责监视工作；什卡德尔大尉则应对粗鲁海图负同样责任；而格里高瑞·费尔索夫和安尼西姆·米哈列夫则被任命为边界巡查官¹³⁶。巴赫尔慈上校在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和西伯利亚总督的监督下，对俄国边界负总的守卫责任。他应负责完成两座新的要塞的修建工作，并使一营步兵常驻在齐科依，其他地方派出前哨站。他应禁止牲畜输入蒙古，免其为中国用来供养它用以攻打喀尔木克拜台吉的军队。在外交事务上，巴赫尔慈应与郎克保持联系，在任何理由下他都不可以对中国宣战或采取攻势¹³⁷。专员应当听从巴赫尔慈的命令。他们的职务是负责警政和司法事务，并在他们各自的管区内监督通商事宜¹³⁸。费尔索夫每年夏天由恰克图往额尔古纳河巡查，而米哈列夫则沿着边界向西巡行，目的是视察界碑并防止私逃者入境和走私。他们应阻止喇嘛迁移到俄国领土上来¹³⁹，在必要时可以派遣俄国臣民到蒙古去，在那些忠于俄国人的蒙古人中担任圣职。在1728年7月13/24日对伊尔库次克城长官米舍尔·彼得洛维奇·伊兹玛依洛夫发布的训令，补充了许多细节¹⁴⁰：主要是关于财政和行政管理问题，如按期给兵士发饷，对于渎职、虚报军饷等情况加以惩罚，以及核定新建筑的经费等。伊兹玛依洛夫应尽力搜集有关乌第河及其邻近地区的资料。布利亚特人的唯一财源是贩卖马匹和家畜，为了不使他们破产，应该允许他们到恰克图来贸易；但是为了防止出口，对于这种交易应课以重税，这样就可以使得中国军队补充军需困难¹⁴¹。最后，1728年8月6/17日，萨瓦把这些安排全部向外交部作了汇报¹⁴²。给中国人的恰克图条约的文本是俄文和拉丁文的，给俄国的文本则是俄文、拉丁文和满文的。

公文信件以后应用新的印章，他已经答应给中国人送去俄国外交部和西伯利亚总督的印章图样，这样就有了派遣信使到北京去的一个绝好机会。巴赫尔慈上校手下的士兵们，由于增加了补助薪俸，已在修筑恰克图的要塞，且已经建成一部分，在10月间可以竣工，同时粗鲁海图的要塞在次年的夏天也可以完工。只要在边境来一次没收，就可以花很少费用而给每个人以补偿¹⁴³。这时外交部给萨瓦送来了印章的图样，他立刻派信使舒米诺夫把这图样送到北京去；外交部给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是1728年9月10/21日¹⁴⁴，后者给外交部的报告是1728年12月6/17日¹⁴⁵。

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8年7月3/14日离开色楞格斯克¹⁴⁶，并于1728年12月18/29日到达莫斯科¹⁴⁷。1728年12月22日/1729年1月2日觐见了沙皇彼得二世¹⁴⁸，1729年2月2/13日呈上中国的礼物¹⁴⁹，1729年3月8/19日交上了条约的正本、地图和其它文件¹⁵⁰。过了不久，他又向政府建议把郎克召回以便让他安排1731年的商队（1729年5月）¹⁵¹。1730年他向沙皇呈交一份非常奇妙而有趣的“机密文件”，在文件中提出了全部或部分征服中国的可能性¹⁵²。尤其是黑龙江流域。这位前任大使建议政府应当慎重和深思熟虑。不过，只要欧洲处于全面和平的状态中，只要俄国肯在这一事业上花费几百万卢布，把边界的各个要塞装备好，花十年功夫在外贝加尔区栽培作物，配备五十团正规军和二十团非正规军，他预见到这一事业能够成功，他这种信念是基于两个理由：中国汉人虽然人数众多而且很活跃，但却不愿意服兵役；统治中国的满洲人只占中国人口的五十分之一，他们是受到猜疑的异族人。如果发生战争，特别是如果满洲人败北，中国汉人就会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而满人不仅要对付国内的敌人，还要对付蒙古人（抢劫的机会会引导他们起来叛变），对付势不两立的喀尔木克人，以及欧洲的军队。这样四分五裂而且不得不分散兵力的满洲人，一

定会被打败，征服中国是垂手可得的事。在这份报告中再加上：对西伯利亚和对中国的几乎所有大人物和所有问题的意见，关于总督、行政官吏、俄国、蒙古和中国的首要人物的意见；关于各地设防状况、商务、兑换条件的意见，等等¹⁵³，你就可以想象得出这次出使多么重要。外交部在1728年9月10/21日的信中宣称对出使结果完全满意¹⁵⁴。俄国政府任命萨瓦为枢密院顾问并授与他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骑士勋章¹⁵⁵。政府非常重视他所提出的意见，并且立刻加以采纳，制订成为法律和规章¹⁵⁶。1738年6月17/28日他在圣彼得堡逝世¹⁵⁷。

他所签订的恰克图条约，订约双方都感到满意，这似乎可以由下列事实获得令人信服的明证：这个条约一直执行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什么更改，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条约也不是给予修改，而是加以补充。实际上，中国首先寻求的，是摆脱它的一个对手，把这个对手置于它的国境和首都之外，而边界的划分以及远离北京的市场的建立，就足以使它感到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商队对中国来说显然没有什么好处，中国倾向于取缔商队，时间和环境将帮助它实现这一意图。俄国也很乐于接受给它的商务这种新的方便条件，因为它认为这种商务关系接近西伯利亚，比较容易监督，并且比较不容易遭受非法走私的竞争的竞争的危害。边界的划分又在人和领土上给俄国以巨大利益。最后它又获得允准在北京建立一个永久性教会，而这个教会训练出来的译员以后就可以代替耶稣会教士的地位，使得俄国今后可以不再需要中间人而与中国保持直接的通信交往。

这一事实就使得北京的俄国正教会带有一种外交性质，而这种外交性质直到最近也尚未消失。这次重大出使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所处理的问题如此众多纷繁，不仅关系到政治和外交，不仅关系到俄国和中国，而且也涉及到科学和文化。俄国在中国本土所

设立的东方语言学校，得到的结果是培养了一批通晓满文、蒙文和汉文的译员和学者，例如在十八世纪与史学家穆勒合作的罗索金，和十九世纪的毕楚林等人，就是明证¹⁵⁸。再者，为了明确划定几千公里的中俄边界，就需要有精确的地理知识，因此有必要进行细致的调查测量，需要有关西伯利亚的地质结构（矿藏、土地的价值等等）、地形学和人种志的详尽纪录。务拉的思拉维赤为此与白令进行联系，白令的第一次探险正与他出使中国同时；他必需叫人绘制一张西伯利亚全图，这张全图对于以后的工作很有贡献。因此，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和地理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创人之一。虽然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符合他的时代的总精神和趋势，虽然这一切不是由他首先发明的，不过他的聪明才智以及他的辛勤努力，对于巩固和平、发展商业、对于科学和人类进步，还是作出了贡献的。

注 释

1 乾隆于1759年战胜厄鲁特人；土尔扈特人的迁回故土是在1771年。

2 他胜过德国人或丹麦人义杰斯和瑞典人郎克的地方，是他是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个东正教徒。

3 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里，大使的原始报告几乎全都是用拉丁字母签名；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有时受俄文影响字母稍为改变或有加减）。这个姓名译成俄文是 Савва Владиславичъ，这是当时在文件上常用的形式。到了今天，这个名字要拼成 Савва，译成法文是 Sabbas（参阅博耶与斯佩朗斯基：《俄语学习手册》，巴黎1905年，8开本，第261页）。本书所采用的仍是旧俄文的写法，而不采用新法或译成法语姓名。

外交部的档案里只用他的名字萨瓦和他的家姓务拉的思拉维赤，这同俄语的习惯相反，俄语习惯是用本名和父名而不用家族的姓氏的。可是负责边境的专员阔留赤甫和一两个下属仍然称他为“萨瓦·卢其迟”，意思是“萨瓦，洛克儿子”（维拉索幅，1725年12月9/20日给阔留赤甫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53页正面；阔留赤甫1725年12月21日/1726

年1月1日给萨瓦的信,同上引,第55页正面;阔留赤甫1725年12月31日/1726年1月11日给维拉索幅的信,同上引第73页正面;阔留赤甫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1726年3月25日/4月5日,同上引,第101页背面,等等)。

至于形容词“腊古扎斯基”,意思是“属腊古扎的”只在1725—1730年间篇幅繁多的通信的次要文件里出现过一次。1703年和1705年的两封公函里称他为“伊利里的贵族”。

4 1727年1月14/25日,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宣称第二天他就满了59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317页背面,因此他出生于1668年1月16/26日。

5 关于这个人的传记参阅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名人辞典》(俄文版),莫斯科、1836年、8开本5卷及《补遗》,圣彼得堡、1847年、8开本、3卷。这条传记是根据班蒂什—卡缅斯基的父亲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著作编写的。

在《北方的蜜蜂》杂志里,有一篇作者署名为A. B.的文章(《北方的蜜蜂》,1835年、第30期、第118—120页),记述了一些补充的细节。可惜文章没有注明出处,而且有明显的错误:例如古德费洛被说成是“荷兰领事”等。

6 如果相信《北方的蜜蜂》上的文章,他于1699年动身,1700年3月抵达莫斯科,开始同阿帕拉克辛海军上将接触。

7 从事棉布贸易。班蒂什前引著作。

8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936号、第222—223页。这个特权是准许他在西伯利亚部取得所谓勒拿狐皮的权利,由于准许他在西伯利亚出售,就等于在西伯利亚享有狐皮的专卖权。文件上说,给他享有这个特权是酬谢他忠心耿耿的服务。

9 班蒂什前引著作。

10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2044号、第301—302页。他每年还享有325卢布的津贴。班蒂什前引著作。

11 他是在1710年被任命为内廷顾问官。班蒂什前引著作。参阅米柳科夫:《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国家机构》(俄文),第2版、圣彼得堡、1905年、8开本、第388页。

1712年,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同古德费洛一起经商,又在圣彼得堡经营造船。根据《北方的蜜蜂》,比较米柳科夫前引著作。

12 其中一项是为圣彼得堡的“夏园”购买雕像。他曾经向教皇商购一座维纳斯像。参阅班蒂什和《北方的蜜蜂》。

13 据《北方的蜜蜂》所载文章，这是在1719年末或1720年初；据班蒂什，那是在1722年。

14 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办事有条理，我们在他的报告、信件和其他来往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他不仅是把事实、理由和细节分清楚，而且还非常仔细地加以编号。

15 阔留赤甫给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外交部成员)的一封信，1726年4月7/18日发自托波尔斯克，由他本人签名，信中抱怨人们没有用审理官的衔头称呼他。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9号。参阅同上发信人给同上收信人的另一封信，1726年12月31/1727年1月11日于伊尔库次克，出处同上。

16 任命他的御旨是1725年8月17/28日(据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2页背面，是19/30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10号；1727年1月31/2月11日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对中国大臣们的声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350页背面。

17 俄语读音和他自己的签名，都是巴赫尔慈；比较上文第6章。

18 1714—1717年远征雅木柴夫时，他还是中校，1724年1月20/31日的谕旨派他去与郎克、格拉儒诺甫共事时(参阅第8章)，他还是中校。1725年7月26日/8月6日外交部给枢密院的一份报告中，还说他是中校；从7月7/18日起，枢密院提议升他做外贝尔加区部队的指挥官，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50—51页正面；大约是从1725年9月或10月，他才肯定获得了上校头衔，指挥使团的部队。参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

19 第一次隆重会议是在1725年12月27日/1726年1月7日。但成立日期可能延至1724年1月22日/2月2日，而第一次实际会议是在1725年11月12/23日。

20 他于1725年2月5/16日从圣彼得堡出发，1730年3月1/12日回到圣彼得堡。参阅穆勒《文集》，第3卷、第1—304页。

21 关于这点，参阅下文232页注114。

22 参阅下文第11章。

23 1725年7月23日/8月3日收到。谕旨同时命令郎克通知大臣们

说他们的汉文信件还未译好，因此答复要拖延；今后耶稣会神父对每一封汉文信件应附拉丁文副本。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3号，参阅上文第8章。

24 1726年2月12/23日收到于圣彼得堡。郎克同时送出汉文信件的俄文译本。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3号。

2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

26 1725年11月30日/12月11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3号；抄本，同上引，1725年、第4号；收到日期，同上引，1726年、第3号。

27 1725年11月30日/12月11日于托波尔斯克收到。多尔葛卢科夫应尽力搜罗自维尼阿斯以来(他是1697—1703年西伯利亚部的部长)同中国关系的有关情报，而且把它们交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他也负责绘制地图工作。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2号；抄本，同上引，第4号；比较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122至127页背面；同时参阅1726年、第2号。

多尔葛卢科夫亲王被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是由1724年1月16/27日准备的谕旨所决定(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1号)，于1724年3月2/13日公布。《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108号、第447页。

28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1页。

29 关于巴赫尔慈及其任命为上校的日期，参阅上文第217页注18。郎克被派与萨瓦和负责边界的专员共事，是根据1725年10月3/14日的谕旨，这道谕旨连同给郎克的新的信任书在第二天就交给萨瓦。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3号。1725年4月11/21日郎克到伊尔库次克同萨瓦相会的时候，萨瓦立即把谕旨交给郎克。同上引，1725年、第4号。

30 1330名步兵，108名龙骑兵。名册由“约翰·布吕康森少校”签署，1726年1月26日/2月6日交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9号；1334名步兵，名册是1727年6月6/17日，同上引，1727年、第20号；总数是1333人，连同军官、下级军官及兵士。名册附在巴赫尔慈1727年8月14/25日给萨瓦的信里，同上引。

31 任命专员的谕旨颁发日期是1725年8月17/28日，第三天在外交部登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10号，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2页背面；赋予他们全权的命令是由外交部成员签署的，日期是1725年9月18/29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10号(原本)，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11页背面至12页；公务日志(萨瓦的)，第1卷、第50—51页正面。

阔留赤甫的全名是斯捷潘·安德烈维奇·阔留赤甫。他的签名是斯捷

潘·阔留赤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9号。

32 毫无疑问，他是伊凡·维拉索幅的儿子，就是1686—1689年随柯罗文出使的那个维拉索幅，参阅第1章。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在1725年12月25日/1726年1月5日从莫斯科发出的一份报告里，指出他已濒于死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他好象于1726年1月13/24日死于莫斯科，同上引、1726年、第1号；参阅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2页背面；第46、47页正面、50页背面、51、58页正面、63页正面。

33 外交部给阔留赤甫的命令，发出是1727年6月16/27日，收到是1728年1月10/21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2号，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793页；1727年8月21日/9月1日部里给阔留赤甫的信，到达日期1727年11月29日/12月10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4号(草稿)；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719—720页正面；1728年第13号(抄本)；阔留赤甫1728年1月25日/2月5日给部里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4号。

34 近卫军普雷奥布拉让斯基联队工兵中尉伊凡·安德烈也夫·托尔斯泰是阔留赤甫的副手，他同克瑞尼琴一起去会见阔留赤甫，克瑞尼琴于1727年9月27日/10月8日死去，被埋葬在奥廖尔。托尔斯泰1727年10月7/18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于12月4/15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2号(签名原本)；1728年、第5号(抄本)；同上人给阔留赤甫的报告，后者给萨瓦的报告，1728年1月23日/2月3日，两天以后给部里的报告。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794页背面，795、501背面；1728年、第4号。

35 必须分清作为重要官员的使团秘书和大使的私人秘书。格拉儒诺甫是伊兹玛依洛夫和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使团的秘书。从中国回来后他被任为专职顾问，负责接待到莫斯科来的中国使臣(1729—1731)。参阅外交部1729年11月8/19日的训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9年、第8号。

除了使团秘书以外，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有一个私人秘书康斯坦丁·阿康和两个录事(十八世纪秘书的任务发展后，他们的作用逐渐消失)索洛夫叶夫和安德烈·格里雅泽夫，后者不久为皮萨勒夫所代替。公务日志、第1卷、第50—51页正面，186页背面，282页背面。

他还任用了一个拉丁文秘书克鲁夏利神父，见公务日志、第1卷、第50—51页正面；同上引，第338页背面；《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7页正面，这个秘书在北京担任萨瓦和巴多明神父之间的中间人。参阅《原始文件》。

36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有时向中国大臣们诉说自己年老多病，这或者是外交词令，或者是真话；他于1725年6月23日/7月4日向外交部要求派一个医生。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8月4/15日，由于没有别的医生，他满足于一个外国医生，出处同上。从1727年2月15/26日至2月27日/3月11日，他在北京患病，谈判为之中断，皇帝派两个“医生”给他看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370页以下。

37 阿列克西·库夏勒夫，米舍尔·齐诺夫叶夫和伊凡·瓦卢厄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50—51页正面。

38 同上出处。他们拥有法尔瓦尔松院士发给的文凭，被任命为测量员，这是他们于1727年5月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自己说的，这份报告于8月22日/9月2日收到，上头只有瓦卢厄夫一个人的签名。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4号。

“这几个测量员，除了在我身边的阿列克西·库夏勒夫稍懂业务之外，别的全不懂得，”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9月26(28)日/10月7(9)日写信给外交部却如此说。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2卷、第663页正面，阔留赤甫也强调：“测量员，由于缺乏业务知识，正如阁下知道的那样……”，1728年3月24日/4月4日阔留赤甫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3号(原本)；阔留赤甫公务日志、832页背面，833页(抄本)。

39 最初年俸定为一千五百卢布。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1号、第105页。卡尔齐特斯基于1725年8月4/15日被最高宗教会议任命。《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5卷、第1627号、第157—158页；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

40 1725年11月10/21日，修道院长兼莫斯科斯拉夫文、希腊文及拉丁文专科学校校长热代翁·维什纳夫斯基写信给使团办公室说，根据1725年10月20/31日的命令，吕卡斯·沃伊科夫(据前述萨瓦的报告上说是救世主修道院学校的学生)和伊凡·谢斯托帕洛夫·雅布隆特瑟夫听从萨瓦安排他们学习汉文。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8号(抄本)；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56页背面至57页。这后一页手稿上有一个附注，记载雅布隆特瑟夫从中国回来以后，于1727年12月24日/1728年1月4日死于色楞格斯克。

41 派沃伊科夫当阔留赤甫的翻译，由一个有天赋的希腊文学生皮萨勒

夫代替他。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给女沙皇的报告(实即给外交部),日期是1725年12月25日/1726年1月5日于莫斯科。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原本),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58页(抄本);1726年第18号(抄本);1726年第1号(附注)。

42 1726年4月22日/5月3日萨瓦给中国大臣们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67页正面;1726年、第18号。

4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351页背面。

44 下面是薪俸数字,可以表示使团人员各人的身分:萨瓦作为大使,年薪6,000卢布;阔留赤甫经过争取以后,1,500卢布;主教也是1,500卢布,可是他不同使团出发;巴赫尔慈600卢布;秘书(格拉儒诺甫、克鲁夏利、基里叶夫)各500卢布;学习汉文的学生,各300卢布(大使自己还给他们每人100卢布的津贴);医生200卢布(同贝尔一样;参阅第7章);测量员库夏勒夫,120卢布;兵士,各10卢布。由于西伯利亚和中国生活程度极高,有关人员不断埋怨,说明这些薪俸或者是支付得不准时,或者是数量太少,不够用。1727年8月22日/9月3日,萨瓦从北京回来以后,向阔留赤甫商借一千卢布,而且给他写道:“我的所有已在我居住北京期间和回到这里以后,全数用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1731年、第20号、第69—70页(签字原本)。1720年3月,阔留赤甫同他的秘书基里叶夫呈递一封请愿书,书内叙述,按照1727年9月16/27日的命令(1727年12月14/25日收到),应付给前者1,500卢布的薪俸,但这道命令从来没有完全执行,使得他们忍受饥寒和疲劳,快要饿死了。签字斯捷潘·阔留赤甫,西蒙·基里叶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9年、第7号。1729年,巴赫尔慈说,每年300卢布他活不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9号。1727年10月10/21日,他向萨瓦索取他的兵士的薪饷。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20号。学生测量员则宣称他们每年的收入是120卢布,而不是72卢布。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4号,等等,等等。

45 在西伯利亚支取一万卢布,加上三千卢布礼物,加上三千卢布交通运输费。外交部1725年8月10/21日给枢密院的报告,1725年8月12/23日枢密院的命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1725年9月18/29日国库的决定。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51页。

46 下面是详细清单,一只镶宝石的金表,内有女沙皇的琅琅质像,英国制造,值1,600卢布;另一只土耳其式金表,700卢布;一只英国挂钟,能鸣钟

报时,能奏十二支曲子,上有彼得大帝像,钟上面有一只水晶球,700卢布;一只法国制镀金铜挂钟,400卢布;两具大面积镜子,黑漆框子镶有花饰和贝壳,800卢布;四具尺寸稍小一点的,700及300卢布;一具望远镜,有贝壳盒子,50卢布;五卷四十张的稀有貂皮,4210卢布;七张黑狐皮,535卢布;总数是一万卢布,约250,000旧法郎(实数是238,500旧法郎)。

还应该加上大使的私人礼物,总数达1390卢布;银器,长枪和手枪,土耳其鞍鞴,四条猎狗。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280—281页;1730年、第7号。

还要加上阔留赤甫的礼物和运输费。1726年5月12/23日他在托波尔斯克支取了2,500卢布,其中1,500卢布是货币,其余是毛皮。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9号(原本有签名);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142页;1726年、第21号;阔留赤甫给萨瓦的报告,1728年11月4/15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3号;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931页背面及932页。他似乎支取了双倍于这个数目的钱(5,193卢布5戈比)。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9年、第7号。

47 第四十条解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9年、第10号, CB.7/B, 班蒂什, 第501页。

48 1725年11月3/14日萨瓦给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抄本),又1725年12月13/24日的信,1726年第18号(抄本);公务日志、第1卷、第53页正面。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签名的信件原本,1725年12月3/14日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1726年1月13/24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1726年、第18号(抄本)。后一封信所提供的详细情况非常有价值。由于商人们在秋季收购货物,冬季货价上涨。泰莱乌特的松鼠皮每千张值到50卢布;灰鼠每千张100卢布;北极狐皮每千张400卢布。运输费每匹马要17卢布60戈比,从托波尔斯克到中国边境共有4,002俄里(4,270公里)。伊兹玛依洛夫花财政部的钱太多;最好是取道水路。萨瓦主张越过巴拉巴草原抄捷径。1726年1月15/26日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8号(抄本)。1726年1月26日/2月6日他在托波尔斯克收到价值13,999卢布93戈比的毛皮,14,000卢布7戈比银子。1726年1月31日/2月11日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签发的命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7号;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收据,1726年、第9号(抄本)。

49 1727年3月19/30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

— 387 页背面。

50 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俄文著作：《俄国卢布……》（参阅《参考书目》）计算，对所有款数都乘以九。

51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41—50 页；由他亲笔签名的抄本和收据，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5 号；仅有抄本，1725 年、第 6 号。

52 此外，还有一份 7205/1696—1697 年以来西伯利亚捐税纪录的抄本，和西伯利亚地图（是不是雷米佐夫 1710 年的地图集？），包括对城镇、领土、矿藏的描述。1725 年 12 月 14/25 日枢密院给外交部的命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1 号。还有在托波尔斯克、伊尔库次克和色楞格斯克的地图和报告。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55 页背面至 56 页正面；59 页背面至 64 页；84 页背面；122 页；1726 年、第 4 号。

5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41 页；1725 年、第 5 号（有签名的抄本）；1725 年、第 4 号（草稿）。萨瓦同时负责保管郎克的信任书。

54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41—42 页。

55 签发日期是 1725 年 9 月 14/25 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1 页背面至 29 页背面；班蒂什，第 434—456 页。班蒂什所引用的文件中，字母拼法全部按照新法。关于这一点参阅《参考书目》。

56 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4 号中，没有注明日期，但必然早于 1725 年 8 月 22 日/9 月 2 日，因为萨瓦在这个日期有一份亲笔签名的报告给外交部，要求对这二十条加以解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4 号（原本）；班蒂什，第 469—483 页（其中有一两处缺字或重要改正；参阅《原始文件》）。

57 副本上签名的是葛洛甫金、托尔斯泰、奥斯泰曼、斯捷潘诺夫、尤里叶夫、普罗托波波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4 号、1725 年、第 5 号、1725 年、第 6 号。这些秘密条款是外交部交付的，从外交部成员的签字上可以看出来。

班蒂什，第 456 页。

58 第 18、19、25、33、36、37 条。班蒂什，第 442—448、450—451 页。参阅《原始文件》内的译文。

59 第 38 条。班蒂什，第 451—452 页。

60 第 6、9、10、12、20、41 条。班蒂什，第 436—438、443—444、452—

453 页。

61 第 21 条。班蒂什,第 444 页。

62 第 26、27 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应尽量拖延谈判,以便外交部能掌握材料作出判断。第 27 条。班蒂什,第 446—447 页。

63 第 28、29 条。班蒂什,第 447—448 页。

64 第 34 条。班蒂什,第 450—451 页。

65 第 35 条。班蒂什,第 451 页。比较第 7 章。

66 第 31 条。班蒂什,第 449 页。

67 第 23、24 条。班蒂什,第 445—446 页。

68 第 43、44 条。班蒂什,第 453—455 页。

69 1725 年 9 月 14/25 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4 号、1725 年、第 5 号、1725 年、第 6 号。班蒂什,第 456 页。

70 这四十五条训令的先后顺序,似乎是按照事件发生日期以及问题的重要性如何而安排的:首先是形势的估计,属员和助手的名单,第 1—8 条;在未进入中国以前行动的准则(通知中国人,取得商队入境的许可),第 9—12 条;呈递国书及觐见仪式的规则,第 13—17 条;商业:商队,领事,第 18—21 条;私逃者,第 22—25 条;边境,第 26—36 条;关于商业、耶稣会神父、礼物、代码字母等次要事件,第 37—42 条;关于主教的问题,第 43—44 条;1724 年 1 月 13/24 日谕旨关于要保守的国家机密,第 45 条。好几条里叮嘱要为商业的利益而让步。

71 第 15 以及 19 条。

72 第 16 条。

73 第 17 条。

74 第 18 条。这四条,参阅《原始文件》。

75 1725 年 8 月 22 日/9 月 2 日。萨瓦给外交部的报告,要求将他请解释二十条的报告转交商务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4 号。商务部的答复(没有日期),由秘书巴尔比叶科夫、办公室书记巴西尔·格里雅诺夫签名。1725 年第 4 号、1725 年第 5 号(抄件);班蒂什,第 469—483 页;1725 年 9 月 25 日/10 月 6 日,萨瓦请求外交部对他的训令给予补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 年、第 5 号(由他签字的原本);外交部于 1725 年 9 月 28 日/10 月 9 日作了答复,出处同上;班蒂什,第 457—468 页。

76 第 7 条。班蒂什,第 473 页。

77 第10条。班蒂什,第475页。

78 第4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33页背面;班蒂什,第460页。

79 第11条。班蒂什、第465—466页。

80 给萨瓦的训令为外交部给巴赫尔慈和专员们的训令所补充。给巴赫尔慈的训令日期是1725年9月12/23日;内容只要求他听从萨瓦和专员们的命令,把他的步兵联队和龙骑兵中队用在维持秩序和仅仅保卫边境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6号、1725年、第9号。给阔留赤甫和维拉索幅的训令日期是1725年9月17/28日或18/29日;内容是叮嘱他们赶快绘制地图、避免战争、分送三千卢布的礼物。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6号;1725年、第10号;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3—11页、第60页正面(在公务日志中记载的日期是1725年9月28/10月2日,也许这只是一时笔误,28=18)。

81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53页正面。

82 下面是旅途各站:1725年12月27日/1726年1月7日从莫斯科出发。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59页正面;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55页背面;外交部莫斯科分部官员库尔巴托夫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1726年1月24日/2月4日至1726年2月12/23日,托波尔斯克;萨瓦的两份报告:1726年(第3号)2月11/22日以及1726年(第4号)5月6/17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公务日志、第1卷、第59页背面,63页正面;多尔葛卢科夫亲王1726年3月31日/4月11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2号;——1726年4月5/16日至7月17/28日伊尔库次克;萨瓦1726年5月16/27日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公务日志、第1卷、第63页背面、120页正面;1726年10月24日/11月4日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给外交部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2号;1726年3月至1726年7月。《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7页正面。这些编年史还在1726年10月记述了阔留赤甫和基里叶夫经过这里(第17页背面);——1726年8月2/13日至8月21日/9月1日,色楞格斯克;萨瓦1726年(第6号)8月31日/9月11日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公务日志、第1卷第121页背面132页背面;——隆重进入张家口,1726年10月11/22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165页背面;——1726年10月21日/11月1日北

京,同上引,第170页正面。

83 由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签名的报告,1725年12月20/31日发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2号。报告里没有记下姓名的三个“专家”是:德米特里·巴斯卡科夫、巴西尔·夏蒂洛夫、伊凡·斯维夫图诺夫,《伊尔库次克编年史》曾经记载他们在1725年到托波尔斯克。《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6页背面。

84 郎克的报告,1726年3月27日/4月7日发自色楞格斯克,1726年8月18/29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3号,1726年、第6号。

85 郎克给女沙皇的报告,1726年5月6/17日于伊尔库次克,1726年8月18/29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3号。

86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70页背面至80页;1726年第18号。训令有些是16条,有些是17条。

87 参阅上文第218页注29。

88 参阅上文第201页。

89 在同一封信里,他宣告彼得大帝的死亡和喀德邻一世的继位;他根据1725年3月3/14日的谕旨,要求从今以后汉文信件必须附以拉丁文副本(参阅第8章),并要求准许商队入境。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3号、第6号。

格拉夫(Grave或Graf),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第77页正面,137页背面、139页正面;大卫·格拉夫(Grave)。贝尔《从圣彼得堡到……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两卷、第1卷、第156页;可是其它记载都作Graf。

90 郎克给萨瓦的报告,1726年6月1/12日于色楞格斯克,1726年6月7/18日伊尔库次克收到。大卫·格拉夫于1726年5月25日/6月5日回到色楞格斯克。他汇报说,中国对厄鲁特人的战争在继续;耶稣会神父已经不再得宠;毛皮充斥北京,俄国商人都濒于破产。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6号;1726年、第18号(抄件)。

理藩院的一封俄文和拉丁文信附在郎克1726年6月11/22日的报告里。中国指定来迎接大使的人员在拉丁文信中被称为隆科多和四格(Séké)。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6号、第4号、第18号(抄本);公务日志、第1卷、第102—103页正面。

大卫·格拉夫大约曾于1726年6月7/18日到伊尔库次克将郎克1726

年6月1/12日的信交给萨瓦。见萨瓦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140页正面。

91 萨瓦给女沙皇的报告（实则是给外交部），1726年5月6/17日，1726年8月18/29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第18号（抄件）；公务日志、第1卷、第65页背面至68页背面，86页正面。

92 “我秘密地用意大利文写了第四封信给耶稣会神父巴多明院长，请他在中国宫廷获取有关陛下的事务的有用情报；作为交换，只要他们宣称要什么帮助，我可以有效地帮助该会。”萨瓦给女沙皇的报告（实则是给外交部），1726年5月16/27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公务日志、第1卷、第86页背面。

其余三封信一封给大臣们，一封给首相（关于首相的译法，参阅第7章），另一封给土谢图汗，请求他准许萨瓦的一个信使带信给中国大臣。萨瓦向大臣们请求派给他另一住所，不要住在四夷馆，因为四夷馆已毁败不堪，对他这种年龄的人很危险；他想得到一个愉快的地方居住，考虑到他的性格和他的官衔，他是应该得到这样照顾的。为着使他的信更有说服力，他在信内附了一只金质的打簧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第18号（抄件）。公务日志、第1卷、第64页背面至65页；68页背面至70页背面，86页正面。

93 郎克于1726年5月15/26日给萨瓦的信，附有宣誓商们（莫洛柯夫、郎古索夫、伊科尼科夫、什梅勒夫代替波布罗夫、苏哈诺夫代替聂佩安）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6号、第18号（抄本）；公务日志、第1卷第89页背面及90页。

94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第18号（抄本）；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91—94页。

95 他建议，如果中国人拒绝商队入境，就每年送商品到库伦储存，到五万卢布为止。他以同一内容写信给商务部和多尔葛卢科夫亲王。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第18号（抄件）；1726年、第2号；公务日志、第1卷、第94—100页。

96 1726年12月3/14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1726年、第18号（抄件）；公务日志、第1卷、第155—163页。

97 “照我看来，中国人想同俄罗斯帝国和睦相处，可是由于中国人同理台吉打仗，他们不敢得罪蒙古人……他们的言论使我想他们愿意和陛下的幸福帝国和睦相处，只要没有人到任何地方去，也没有通信来往就可以了。”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163页正面。

98 在越过边境以前，萨瓦于1726年8月18/29日留下一封信给阔留赤甫。他责备他的无可原谅的延迟，责令他将所有情报送到北京给他，主要是乌第河至大海之间的情报，测量员既不能越过山顶（雅布洛诺夫山），可以从雅库茨克绕道去测绘。如果交通断绝而中国人倾向于谈判的话，他有权单独确定边界，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应对库兹涅次克与克拉斯诺雅斯克地区作丝毫的让步，他应尽力设法将边界向南移，移到高波尔河和色楞格斯克之南步行几天或最低限度几小时的距离；他要在东面保留额尔古纳河、达赖湖作边界，让更东一些地区作为未定界。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1726年、第18号（抄本）；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123页背面至第132页背面，以及（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的报告）第146—150页正面；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165页正面、208页背面至216页背面，以及（1726年12月31日/1727年1月11日给外交部的报告）第246—247页；1726年第19号。

阔留赤甫于1726年1月11/22日从莫斯科出发，3月21日/4月1日至5月11/22日经托波尔斯克，8月21日/9月1日至8月27日/9月7日经叶尼塞斯克，然后经由克拉斯诺雅斯克、乌丁斯克及巴拉冈斯克，于1726年10月14/25日抵达伊尔库次克；再从伊尔库次克于1726年12月31日/1727年1月11日出发，于1727年1月8/19日或9/20日才到达色楞格斯克，比萨瓦迟到了六个月（萨瓦于1726年8月2/13日到达色楞格斯克）。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76页背面、77、79—80、110正面、142正面、143、149正面、153正面、154正面、164背面、165背面、244正面、257正面、262正面、340背面；1726年第7号（阔留赤甫1726年3月25日/4月3日给萨瓦的信）；1726年第1号（外交部莫斯科分部1726年1月14/25日库尔巴托夫的报告）；1726年第19号（阔留赤甫给外交部1726年4月7/18日的报告）；1726年第18号（阔留赤甫1726年5月12/23日给萨瓦的信）；1726年第2号（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给外交部的两份报告，一份是1726年3月31日/4月11日，一份是1726年6月13/24日，报告上说阔留赤甫于1726年3月22日/4月2日到达托波尔斯克，1726年5月10/21日再度动身；亲王于1726年7月7/18日写信给萨瓦说，他是“5月10/21日”到达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9号；1726年、第18号；1726年、第19号（根据阔留赤甫于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以及1726年12月31日/1727年1月11日

给外交部的报告，他于1726年8月21日/9月1日到达叶尼塞斯克；根据阔留赤甫公务日志，则是“8月22日/9月2日”；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149页正面；1727年1月8/19日，色楞格斯克，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262页正面；阔留赤甫于1727年3月28日/4月8日给萨瓦的信，1727年5月24日/6月4日给外交部的报告，同上引，第341页背面及479页背面。

99 巴伊阔夫约在北京从1656年3月3/13日住到9月4/14日，比萨瓦多一天(186天比185天)；可是这报道可靠吗？尼果赖从1676年5月15/25日住到9月11日(110天)；义杰斯从1693年11月3/13日住到1694年2月19日/3月1日(119天)；伊兹玛依洛夫从1720年11月18/29日住到1721年3月2/13日(105天)；郎克从1720年11月18/29日住到1722年7月12/23日，将近二十个月。

100 其中一个礼部大臣，名叫察毕纳（在条约的拉丁文本上叫夏毕纳，在萨瓦的公务日志上叫恰毕纳）。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293页背面、322页背面、358页正面、390页正面；另一个是理藩院尚书塔古特（拉丁文本上是塔古特，俄文本和前引公务日志上是泰古特、泰库特、特库特）。

101 1726年11月25日/12月6日两位大臣由图理琛伴同回来，据他们说，图理琛是奉旨参加他们一伙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218页以下。

图理琛是中国出使阿玉气和土尔扈特人的使臣之一，他于1712年6月23日从北京出发，1715年4月30日或6月28日回到北京。以后他继续过问中俄交涉事务。就是他于康熙55年或1716年6月从色楞格斯克写一封信给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谈到关于中国对喀尔木克人的战役一事；就是他吧理藩院于康熙58年4月16日即1719年6月3日给噶噶林的信带到色楞格斯克（参阅第7章）；就是他于1720—1721年同伊兹玛依洛夫交涉（参阅第7章）；也是他于1722或1723年带了郎克发给的护照，到边境来找寻佛像而遭到拒绝（参阅第8章）。

伊兹玛依洛夫的报告和萨瓦的报告都一致把他描绘为一个粗暴易怒的人：在第7章里，我们已经读到过关于他当着伊兹玛依洛夫发火的叙述，萨瓦于1726年11月25日/12月6日在他的公务日志中写道：“图理琛大怒地回答：尽管他们是俄国的臣民，他们现在是在中国，中国的大臣们不能把他们交还……。特命全权使臣（萨瓦）惊讶图理琛说话这样粗暴无礼，这对于一

个贤明的大臣是不合适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220页背面及221页正面。

102 萨瓦1725年10月9/20日签发给圣彼得堡警察总局的报告。这是一所石头房子，座落在海军部岛。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

103 参阅《原始文件》。

104 大使住在北京期间，发生了几件值得一提的小事：1726年11月4/15日萨瓦觐见时不得不行三跪九叩礼；但是他亲手将国书交给皇帝，这是违反习惯的特殊恩典。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184—191页背面；比较马依阿：《中国通史》第11卷、第449页。1727年1月7/18日萨瓦同巴多明神父作了一次长谈，并将康普里顿的介绍信交给他。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298页背面至301页。然后他到耶稣会神父所在的各个中学里去会见他们（他算出有六个神父在法国中学，四个在葡萄牙中学，九个在意大利中学），同他们谈论建造教堂和他们的教堂的建造费，谈论中国的武器（他们说，大炮的口径只能发射半公斤重的炮弹；可以把两尊大炮放在一只骆驼背上；打了几炮以后就不能用了；那些攻城炮只是用来作装饰品而已），谈论中国皇帝对俄国的情绪（据巴多明神父说，皇帝倾向于和平），最后，还谈论到中国总的局势，当时耶稣会神父正在受迫害，他们把中国局势说成是很可怕的。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301—304页。1726年12月26日/1727年1月6日，俄国人隆重地献上礼物以后，被允准走出四夷馆，萨瓦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去同耶稣会神父接触，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的一样。

105 只有两点大臣们尚有争论，是关于边界的两点。萨瓦宣称，乌第河附近地区边界尚未划定；大臣们说，这地区似乎属中国所有。蒙古边境的边界已经划定，是目前的样子；中国人驳斥说，自从尼布楚条约以来，俄国人已经蚕食了色楞格斯克以南好几天行程的土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412页背面。

106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425—432页背面。

107 同图理琛一起。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434页正面。

自3月25日/4月5日起，萨瓦及其从人再也不由皇帝出资维持，大使向大臣们申诉，并没有用。同上引，第424页、436页正面。

此外，1727年4月1/12日交给他转交女沙皇的礼物是非薄的，给他自

己的礼物简直是嘲弄性质的：这些礼物一共只值四十卢布！大臣们对他说，如果他表现得更通融一点，他的种种愿望就可以得到满足。献给女沙皇的礼物是五彩绣金丝绸、日本红黑漆器、瓷器、杯盆碗碟等。同上引第410—411页；1727年第9号(抄本)。

北京谈判总的情况报道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171页背面至第436页正面。

108 1727年5月8/19日在库伊顿(Kouitoun)。这个地名同古尔邦图尔戈接近，而两天以后大使从古尔邦图尔戈答复外交部，足证萨瓦同伊兹玛依洛夫一样，取道库伦到北京，走的是东面经萨伊尔乌苏最短的路途。可是在拉法伊洛夫、博尔谢夫、瓦西里叶夫所绘制的地图上，戈尔邦图尔加是在库伊顿山和井的东南，那么就应假定或者日期上有错误(5月10/21日到古尔邦图尔戈；18/29日到库伊顿?)，或者在张家口和古尔邦图尔戈之间另有一个库伊顿。

109 1726年12月14/25日最高枢密院的一封公函，宣称女沙皇对萨瓦的报告甚为满意(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的报告)，她批准了他的所有建议。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号。

外交部的第二封信是要一些书籍，书名见《原始资料》，这些书是俄国科学院要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8号；公务日志、第1卷、第437—440页。

除了这两封信外，萨瓦还收到陆军部的一封公函，日期是1726年12月23日/1727年1月3日，答应他可以使用苦役囚犯和流放犯人来建造新的要塞(比较给陆军部的1726年12月30日/1727年1月10日谕旨，命令使用巴赫尔慈的兵士来重建色楞格斯克，并任命一名工程师，一名炮兵军官来代替“监督”葛利青。《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4994号第724—725页)。最后，同一信使给他带来了多尔葛卢科夫亲王、伊兹玛依洛夫(伊尔库次克的长官)、阔留赤甫(当时在叶尼塞斯克)等人的信件。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441页正面。

110 1727年8月22日/9月2日发自古尔邦图尔戈。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原件)；公务日志、第1卷、第441页背面及446页背面。

111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公务日志、第1卷、第441页背面。大使的公务日志叙述他居留在北京时的生活没有提到这件事；这是不是萨瓦和他的手下人不满意的真正原因呢？

112 萨瓦又说：如果他不带回复信，那是因为这样做真正违反中国人的习惯。

中国人很不想打仗。他设法获得了关于海陆军的情报，这些情报可以证明中国的衰弱（这几点构成秘密报告的内容。参阅下文）。

雍正正是中国的尼禄，他害死了几千个人，只在他的二十三个兄弟中留下三个，宠爱有加，此外，他还乱花国库的钱（这是耶稣会神父提供的情报）。

为巴多明神父当中间人的是郎克和克鲁夏利神父。被俄国人收买的中国人马齐，得到俄国人答应给他二千卢布的酬劳。

113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55页正面；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第581页。

114 第一批测量员就是萨瓦带去的测量员：阿列克西·库夏勒夫，米舍尔·齐诺夫叶夫，伊凡·瓦卢叶夫；第二批是多尔葛卢科夫亲王指派的：斯考贝尔琴，巴斯卡科夫，恰提洛夫，斯维思图诺夫。我们记得，1726年3月22日/4月2日斯考贝尔琴交出的第一张地图被认为不够好，萨瓦于1726年4月30日/5月11日将四个测量员分成两组，派他们去再绘制一幅。恰提洛夫和斯维思图诺夫负责东部，由于不能够越过在北方隔断黑龙江流域和勒拿河流域的高山，只好由雅库次克绕道过去（萨瓦于1726年8月18/29日给阔留赤甫的信）。萨瓦于1726年3月30日/4月10日从伊兰斯克写信给白令，送给他一张从堪察加到黑龙江的地图。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8号（抄件）；白令于1726年5月8/19日从勒拿河的乌斯特-库斯克回信给他，送给他一张德国（或外国）地图的副本，出处同上。1726年7月17/26日萨瓦从伊尔库次克动身到色楞格斯克，回信向白令致谢，并将恰提洛夫和斯维思图诺夫介绍给他，同上出处。一份“备忘录”，由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米舍尔·伊兹玛依洛夫签发，日期是1726年9月3/14日，将白令的信转交给萨瓦。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0号。由于当时大使已越过边境，而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没有收到过信件，在1727年6月他回来的时候才得到白令的信件。1727年6月21日/7月2日阔留赤甫转交给他一份在雅库次克收到的白令寄来的地图。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588页正面。1727年8月2/13日萨瓦从波尔河写信给白令，感谢他的地图，虽然地图还不够完备；同时请他在今冬或明春及时将该地区的情报送给萨瓦，这个地区就处于“石兴安岭”和流入堪察加海的乌弟河之间；斯维思图诺夫到达了乌弟河，可是，由于无知、不在意或者当地条件困难，他不能够带回任何准确的数据。萨瓦尤其

需要绘制一幅海岸地图，从雅库次克到乌第河，到黑龙江，到高丽和辽东，其距离相当于乌第河至黑龙江。同时，他告诉白令不要相信中国人，中国人善于骗人而且不喜欢俄国人，他还送给白令关于中国船只的琐碎的情报（这些船只吃水5.6尺，不能顶风行驶，只有罗盘针，没有别的设备，载有八尊小炮，每尊一公斤半，还有火绳枪，弓箭等等，各有三十名水手，三十名兵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抄本）。1727年9月26日/10月7日，萨瓦把派到东面去的测量员的失败，以及他向白令提出的要求等情况告知外交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62页背面及663页正面。

115 这就是存放在莫斯科外交部的手绘地图，编号是“伊尔库次克州地图第14号”。旁边有附记：西伯利亚省地图，由专员阔留亦甫先生连同报告第9号一并送来，日期是1727年5月24日/6月4日于色楞格斯克，圣彼得堡1727年8月22日/9月2日收到。要知更详细情况，请参阅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载：《科学使命的新档案》，新丛刊第1分册，巴黎、1910年、8开本、第158页以下。

116 由当维尔于1735年从汉文译成法文，缩小尺寸并出版，载迪·荷尔德：《中国概述》，1735年，以及《地图》，无出版日期，巴黎、德佐什、对开本，参阅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卷、第45—52条。

117 参阅上文第171页注4。

118 “隆科多，国舅，边境谈判的首席全权大臣”，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472页背面。

阿斯哈尼雅玛（即图理琛，“阿斯哈尼雅玛”意即兵部侍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1卷、第218页正面）说，别的人全都是派来……作见证的……实际上皇帝陛下只派国舅隆科多负责边境谈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505页正面；萨瓦给中国皇帝的信，1727年7月13/24日，同上引，第536页正面。

关于隆科多这个人，下面是郎克和萨瓦的评论：

“这位隆科多先生，当我在逗留期间，是北京的总督，兵部和理藩院尚书；我很少看见他善意待人，总是无端作对……”郎克给萨瓦的信，1726年6月1/12日于色楞格斯克，1726年7月7/18日在伊尔库次克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6号（原本）；1726年、第18号（抄本）。

萨瓦斥之为“蠢才”，“废物”。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547页以下。

119 “阿斯哈尼雅玛说……在他的信里他完全把怨恨放在隆科多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坏人，在这次出使以前，他曾两次在博克达汗的朝廷里想使他图理琛丧命，可是没有成功。”图理琛对郎克的谈话，1727年7月13/24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532页正面。

1728年3月17/28日图理琛被召回，出使别的地方；奸细噶尔丹使人报告说，他实际上是失宠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784页背面以下。

120 他是皇帝的驸马。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74页背面；第2卷、第791页。事实上非常可能，因为中国总是设法用婚姻关系笼络蒙古王公。

“额驸策零回答说他不是中国人，因为对于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他总是信守不渝，而中国人惯常是——秘书格拉儒诺甫本人也知道得很清楚——说得多，写得多，象这样长篇大论，很难很快就解决问题。”额驸策零对格拉儒诺甫的谈话，1728年3月23日/4月3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801页背面。

“额驸策零……回答说全权使臣(萨瓦·务拉的恩拉维赤)从中国手里夺取了很多东西，可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就只好如此。”额驸策零对萨瓦的谈话，1728年3月20/31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794页背面。

121 参阅《原始文件》。

12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52页背面；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581页至589页。关于这次出使的后半部分和边境谈判，我们有萨瓦和阔留赤甫的双重证明文件，可以互相印证和互相补充。可惜阔留赤甫只记下了一些人名和日期。

123 还有阔留赤甫的秘书基里叶夫和少尉巴夫洛夫作为次要人员参加会议。中国方面，除了隆科多、额驸策零和图理琛，还有一个官员色克躲在幕后。

124 隆科多似乎想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流域，或者最低限度收回被俄国蚕食的土地，把边境划定在色楞格斯克与波尔河之间。萨瓦说，这样一来，就是割让了二千俄里土地连同尼布楚的银矿场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78页背面至493页背面；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588页背面及591页正面。

125 6月29日/7月10日萨瓦写信给巴赫尔慈，命令他增派援兵来，而且准备应付一切事变。

7月11/22日图理琛答应郎克，把隆科多的固执已见报告朝廷。7月13/24日，他接受了萨瓦写给皇帝的一封信，内容也是对隆科多不满，他要求给他一份蒙文抄本，以备不时之需。郎克只愿意同图理琛一个人讨论。

早在7月4/15日，额驸策零已经将隆科多要收回的地方承认是俄国人的了。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493页背面至547页；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593页背面，603页背面，616页。

126 8月8/19日，图理琛宣布隆科多于10/21日被召回，他是亲自向郎克宣布的。事实上，从此以后隆科多再也不出现在会谈里面。

以后的日子就在双方装腔作势中度过，这是两国的方式的特点：俄国人运用威吓手段，增加他们的岗哨；图理琛自称快要死了，说准备回到库伦或北京去，可是他在需要的时刻又复活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547—611页；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630页。

127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611—616页；《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5143号、第840页及841页；《1689—1881年俄中两国条约汇编》，俄文及拉丁文本、第11—14页；满洲文本、第15—18页，蒙古文本、第19—22页；交给中国人的蒙文译文，第23—26页。

128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公务日志、第2卷、第650—673页正面；同日、给枢密院的报告，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82页至688页正面。

正本日期是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抄本日期是1727年9月26日/10月7日；报告于1727年9月15/26日收到。

萨瓦报告俄廷说，他通过商队，转给了马齐一千卢布、巴多明神父一百卢布。他自己的私财很久以来已经用罄。兵士们和军官们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自己有好几夜睡不着觉。但是他终于能够高兴地宣布他已获得真正的成功：“我能祝贺陛下已经建立商务关系，边界的划分十分有利于俄罗斯帝国……说真的，我自己从来没有希冀过划界会获得如此有利而且公正的成功，而不必贪婪地压迫那些纳贡民族，根据这个条约，不仅边界上有利的地方没有让与给中国人，而且有些以前俄国不占有的地区也由俄国获得了。”

129 在交换信件上签名的是：格拉儒诺甫、库比图、纳扬泰。《俄罗斯帝

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5180号第876—882页；《1689—1881年俄中两国条约汇编》，俄文本、第27—32页；蒙文本、第33—40页；班蒂什、第347—358页（专有姓名错误甚多）。

130 签名：阔留赤甫，伯四格，普富，阿拉布坦。《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5189号、第887—890页；《1689—1881年俄中两国条约汇编》，俄文本、第41—43页；满文本、第44—46页；蒙文本、第47—49页；班蒂什、第358—364页（附注同前）。

还应加上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额尔古纳矿山专员布尔特索夫、译员特列季亚科夫和库比图三人之间订立的，内容是确定粗鲁海图作为边界要塞。《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8卷、第5268号、第36页；班蒂什第364页。

131 修改的地方明显地表示出中国的意愿：不准许俄国商队来北京，乌第河仍属中国所有。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0号；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712—733页背面。

132 死于1727年5月6/17日。

133 1728年1月1/12日以及1728年1月4/15日，最高枢密院及外交部收到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萨瓦的报告以后（1727年12月15/26日收到），就决定接受这条约，并且奖赏大使。正本上签名的一方是：阿帕拉辛伯爵、海军上将葛利青亲王、奥斯泰曼、斯捷潘诺夫、尤勒夫，另一方是：葛洛甫金伯爵，办公室主任奥斯泰曼。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9号。

俄方条约文本是俄文和拉丁文，中国方面是满文、汉文和拉丁文。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855页背面至873页；《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8卷、第5286号、第49—53页；《1689—1881年俄中两国条约汇编》，俄文及拉丁文本、第50—60页；满文本、第61—73页；中国人交来之俄文及拉丁文文本，第74—83页；班蒂什，第365—373页（内容正确，但专有名词有错误，字母拼法用新法）。

法文译文载克拉普罗特：《亚洲回忆录》，巴黎、8开本、第1卷、1824年、第28—54页；边境界石清单，第14—27页；评论，第54页以下。比较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472条；别的法文译文载：马尔唐：《穆拉德条约汇编之新补遗》，哥廷根、1839年、8开本、第711—719页。

134 在边界和私逃者问题上，决定维持会议开始时的现状不动，是有利于俄国的，因为俄方蚕食边境已为中国人以及俄国人自己证实，这样俄国人可以将私逃者留在自己领土内，其中就有向伊兹玛依洛夫要求引渡的七百人

私逃者在內。萨瓦对训令第 23 条的阐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29 年 CB.7/B; 班蒂什, 第 494 页。

135 无数先例可以使中国人只要愿意, 就可找到类似事实作为借口, 断绝商务关系。

136 给巴赫尔慈的训令内容有三十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933 页背面至 949 页; 1728 年、第 12 号(抄本); 1728 年、第 6 号(摘要); 给克尼阿金肯和特列季亚科夫的训令内容有二十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910—921 页; 1728 年第 12 号(抄本); 给什卡德尔大尉的训令, 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921 页背面以下; 1728 年、第 12 号(抄本); 给费尔索夫以及译员科贝伊的训令, 给米哈列夫及译员伏尔加里的训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888 页背面至 899 页正面, 又 899 页正面至 910 页背面; 1728 年第 6 号; 1728 年、第 12 号(抄本)。

还应加上: 萨瓦给色楞格斯克专员切切普欣的信, 给尼布楚专员伊巴特也夫的信, 给额尔古纳专员布尔特索夫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949—959 页; 921 页背面至 933 页背面; 1728 年第 12 号(抄本)。

137 巴赫尔慈遇有秘密事项则与郎克用代码字母通信; 一般日常事务则与库伦的土谢图汗通信。他继续与奸细噶尔丹秘密通信, 每年并付给他大使答应给他的酬劳。

训令的第 19 条值得注意: 巴赫尔慈每年夏天应派遣兵士到布里索图附近离斯切尔卡 80 俄里的优良牧场上去割草, 以便在将来造成占有者的权利。

138 关于建筑物的指示是非常仔细的: 恰克图市场应是一个正方形的市场, 每边各长二百公尺, 市场的四角各筑一个城楼; 在内部分设三十二个货摊, 每个货摊都应安置一个火炉。货摊的大小可分成两种, 一种是长宽各五公尺的正方形货摊, 一种是长六公尺宽三公尺的长方形货摊。还应修建一个商品陈列所, 长三十二公尺, 宽六公尺。底层修建三十四所商店, 商店的上面一层是仓库, 每个商店还应有一个象圣彼得堡的商店一样有屋顶的走廊。市场的外面应筑有围墙, 以防草原上的野火。此外还应建筑一个教堂, 这是大使奉献给三位一体神以及塞尔维亚的圣沙巴斯的。大使将送些钟给这个教堂。这些商店租给私商使用, 使国库获最大的利益, 每一辆经过该地的货车应付一两个戈比的通行税, 这种收益的百分之五交给克尼阿金肯作为小项开

支(供养中国人,办公费,等等)。

关于粗鲁海图地方所作的指示与此类似,只不过不如关于恰克图的指示详尽,同时市场的面积也较恰克图的为小。尼布楚的伊巴特也夫、额尔古纳的布尔特索夫应提供物料和工具。

139 因为在喇嘛中间有些是抢劫纳贡民族的巫师。俄国属民与中国人之间的婚姻也予禁止。捕获物四分之三归国库,四分之一归首告者。

14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962页背面至第978页正面;1728年、第12号(抄件)。

141 一匹马或一头牛,50戈比;一头羊5戈比。违反条约的行为一律处以死刑。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964页正面。

142 从叶尼塞斯克发出的报告,1727年10月3/14日收到。正本上有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签名。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994至1015页。

143 费用总数达793卢布72戈比;另一座要塞则需费几百卢布。

一个小分队由一位伍长率领,负责边境要塞的警务工作;五个兵士伴随巡官巡行视察。

利用库伦商人贡献的丝绸,他叫人制造了二十面旗子给归顺的布利亚特游牧民族。

144 1728年10月22日/11月2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9号(正本,由外交部成员签名);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1038页背面以及1045页正面。

145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正本,由萨瓦签名);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1057页背面至1061页正面。

1728年3月29日/4月9日,枢密院的一道命令,按照萨瓦的建议,要在贝加尔湖上建造船筏,供商人使用,以改善托波尔斯克与伊尔库次克间的交通。《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8卷、第5254号、第22—23页。1728年4月6/17日的另一道命令,根据萨瓦的要求,派给他一个工程师(西蒙·巴巴里金)。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2号。萨瓦于1728年8月16/27日接见了巴巴里金。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1008页背面至第1015页;1728年、第10号;他于1728年9月26日/10月7日回答枢密院:在伊尔库次克没有人能够好好地建造一条船,最好还是等待白令回来。关于改造马科夫斯基的森林和沼泽,萨瓦会同多尔葛卢科夫亲王商议。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

第 1028 页背面至 1035 页。同一天，他又写信给沙皇，宣告他丧失了四个人（一个医生，一个学生，一个音乐家，一个掷弹兵）。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 年、第 10 号（正本，由萨瓦签名）；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1023 页背面至 1028 页。

146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961 页背面。

147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1063 页背面。

148 同上，第 2 卷、第 1064 页正面。

149 同上，第 2 卷、第 1064 页背面。

15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9 年、第 4 号（清单正本，由萨瓦签字）；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1065 页至 1069 页。

151 莫斯科，1729 年 5 月 29 日 / 6 月 9 日，6 月 4 / 15 日交出。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9 年、第 4 号；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1083—1085 页。

152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0 年、第 5 号、第 22—27 章、第 77 页背面至 80 页；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349，第 2 章、第 10 号；班蒂什，第 373—375 页（摘要）。

153 参阅《原始文件》。

154 参阅上文第 180 页注 2。

155 1728 年 1 月 1 / 12 日及 4 / 15 日的命令，参阅 177 页注 6。

156 参阅下一章。

157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名人辞典》。

158 教会执事伊雅森特·毕楚林（1777—1853），起先是伊尔库次克耶稣升天修道院的院长，1807 年被任命为北京东正教会主持，一直做到 1822 年。1826 年他成为外交部的官方汉文译员。

他遗留下许多关于中国和蒙古的俄文著作：《西藏概述》，圣彼得堡、1828 年、8 开本；《蒙古回忆录》，同上、1828 年、8 开本；《北京概述》，同上、1820 年、8 开本；《准噶尔概述》，同上、1829 年、8 开本；《清王朝头四个汗的历史》，同上、1829 年、8 开本；《西藏史》，同上、1833 年、8 开本；《奥伊拉特人简史》（参阅《参考书目》），同上、1834 年、8 开本；《汉语语法》，同上、1838 年、对开本；《中国》，同上、1840 年、8 开本，等等。

第十章

1727—1728年的商队； 彼得大帝逝世时边关的改组

史料来源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1至3号（第3号内有郎克的原始报告）；1725年第1、2、4号；1726年1至4号（第3号内有郎克的原始报告）以及第6、9、16、18号；1727年第6号（郎克在中国的公务日志）以及第9、16、22号；1728年第3号（郎克的原始信件）以及第10号；1729年第3、4号；1730年第5、6号。

同时参阅《一个大使的公务日志》，第1卷、第89页背面至第94页；第2卷、第640页背面至第648页正面，第685页正面，第730页以后，第815页以后，第855页；《伊尔库次克州首府编年史》，第16页正面。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3636、4116条；第7卷、第4994、5110、5163—5164、5666条；《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80、86、95号；《俄国历史协会文集》，圣彼得堡、1884年出版、8开本，第40卷、第447—448页；梅莱蒂伊（主教）：《东正教》（俄文），梁赞1901年出版，8开本，第32至39页。

施特拉伦堡：《欧亚两洲东北部历史……》，斯德哥尔摩、1730年、4开本，第242、292—293、340—341页；贝尔：《从圣彼得堡到……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2卷，第1卷、第301—

303 页；帕拉斯：《新北方自然地理学……》，圣彼得堡及来比锡、1781—1796 年、8 开本、7 卷，第 2 卷、第 83—159 页（郎克的日记）。

1722 年 3 月 7/18 日，一个名叫斯捷潘·特列季亚科夫的商人提出一个申请，不仅要求任命他作北京商队的“专员”，由十个宣誓评价员协助他，而且要求能为他自己的利益出卖商品——这是一件新鲜事。3 月 20/31 日枢密院批准了他的要求，4 月 8/19 日一道谕旨通知外交部这项任命，而且明确了这种私人贸易的条件：允许特列季亚科夫携带三千卢布的自己的商品，他的宣誓评价员们也准许携带三千卢布的商品，总数一共六千卢布；西伯利亚总督对这些商品应征收一般关税。在北京，特列季亚科夫应先出售官方的商品，然后出售自己的商品¹。自从 1719 年 4 月 30 日/5 月 11 日发布一道谕旨以后，商队赴华均应由一个下级军官伴送，由他负责治安和司法²；这次这名军官是伊凡·诺芝聂夫³。

特列季亚科夫的出国护照签发日期是 1722 年 7 月 20/31 日⁴。但是直到 1724 年 2 月 21 日/3 月 2 日文件记载上才提到他到达伊尔库次克⁵，同年年中（1724 年 6 月）才提到他到达色楞格斯克⁶。这种拖延对他没有什么用处：1724 年 7 月到色楞格斯克来同俄国代表谈判的中国大臣们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就回国了；他们曾于 7 月 19/30 日遇见特列季亚科夫，并在归国时取走了他的护照⁷。可是务拉的思拉维赤大使即将赴华的消息一经宣布，交涉便暂时停止；在大使到达北京以前，特列季亚科夫突然于 1726 年 5 月 2/13 日逝世⁸，遗下的妻子欠着财政部的债⁹。

当郎克把这事通知务拉的思拉维赤时，他立即任命首席宣誓商狄米特立·莫洛柯夫接替特列季亚科夫的位置；这个临时的任命以后得到政府的批准（1726 年 5 月 19/30 日至 1727 年 4 月 20

日/5月1日)¹⁰。北京艰巨的谈判(1726年10月21日/11月1日至1727年4月23日/5月4日)以及布连斯奇临时条约的签订(1727年8月20/31日),最后使商队获得入境的许可,商队在边境已经等待三年多了(1724年年中至1727年9月)。大使立刻显示了他的惯常的精力,着手草拟无数详尽的训令。商队的负责人如专员、宣誓商及下级军官都请求不必允许他们进行私人贸易,而代之以付给他们固定的钱银作薪金¹¹。萨瓦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确定莫洛柯夫每年的薪金为现金六百卢布,卫队的中士伊凡·诺芝聂夫的薪金是一百卢布,两个译员各为五十卢布;宣誓商们保留取得属于商队的二百卢布商品的权利,但应缴纳关税¹²。1727年9月5/16日给“事务官”或最高负责人郎克及莫洛柯夫的训令,谈及政治、商业、日常事务以及许多细小事务¹³。那位“好朋友”(是马齐呢还是巴多明神父?)应得到大使答应他的那笔款项,并应在暗中监视他¹⁴。应该和萨瓦以及外交部保持通信来往(信件用俄文或法文写,秘密事项则用密码),萨瓦想他会被阻滞在边界直到1728年夏天。库伦的俄国商人监察员米契尔·康达科夫则作为居间的传递人¹⁵。关于货物的出售以及金银的购入,1719年6月12/23日切尔卡斯基亲王给特列季亚科夫的训令依然有效¹⁶。货物应在北京出售,剩余的货物则在边境或西伯利亚出售;应制作一种两联的货物清单,一联交西伯利亚总督,另一联交商务部。在北京饲养马匹的费用十分昂贵,商队可将马匹留在张家口附近的草原上,归途再把它们带走。如果中国人不允许这样作,商队在到达北京时就把马匹卖掉,等到回国时再租马匹使用¹⁷。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还没有到来,如果他在北京同商队会合,他会带来特别训令;如果他不来,郎克就应当替他交一百至二百卢布给圣尼古拉教堂的神父劳伦特¹⁸。研究语言的学生中,懂拉丁文的每年领取二百卢布,其余的领取一百三十卢布,并预付他们一年。商

队在离开北京时，应该给他们留下两年的津贴（从1728年9月5/16日起草），这样他们可以等待下一次商队的到来，商队也应该介绍他们给理藩院¹⁹。最后，萨瓦还交给郎克一件俄国科学院托办的事，请他代购各种书籍，因他接到委托太迟，已来不及替他们购买²⁰。萨瓦还托郎克替他购买一顶华贵的帐篷，这是他准备奉献给沙皇的²¹。

商队包括郎克、专员莫洛柯夫、八个宣誓商²²、中士及其兵士、雇员和仆从等，一共二百零五人²³。商队需要1650匹马、637辆大车和565头牲畜²⁴。它所携带的商品价值将近一千万法郎，其中主要是各种毛皮²⁵。商队分成两组由恰克图附近的边界出发，一组于1727年9月5/16日动身，另一组于9月13/24日启程²⁶，似乎是沿着伊兹玛依洛夫所走过的道路越过蒙古²⁷，备尝艰难困苦，于1726年12月26日/1728年1月6日到达北京²⁸。

中国皇帝于商队到达的次日发布了一道谕旨，允许商队开始贸易²⁹，但是派了七百五十人的卫队日夜守着俄国人所居住的“四夷馆”³⁰。一个办公室设在“四夷馆”的大门口，对每一个买主严加盘问，然后发给入馆证³¹。因此中国人只是来馆出售他们的丝绸，而且数量少得可怜³²。商队的款项将尽了，不得不求助于一个中间人，他要求任何交易都给他百分之五的佣金，最后总算接受了百分之三。这个中间人名叫哲费姆·顾索夫，生于北京，父母是俄国人³³。两天以后，1728年1月17/28日，顾索夫带来一个以前曾与务拉的思拉维赤做过生意的有钱的中国人，这人用期货交易买去了堪察加的海獭皮和北极狐皮，付款期的2月5/16日，付给银两和锦缎³⁴。另一个中间人是一个居住在北京的俄国人雅各伯·撒文，也替商队接洽了几笔生意，佣金也是百分之三³⁵。但是总的说来，商队的业务情况是很惨淡的。中国的大臣和中国皇帝本人把商队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当时市场的一般情况，以及俄国货物充斥

于北京市场³⁶。这个在蒙古时已备受折磨的商队，在北京又受困于热病，郎克于1728年5月的最初几天也卧病在床³⁷；有几个人病死了，牲畜死掉了几百头³⁸。郎克向沙皇所描述的俄国人逗留在北京时的情景是悲惨而令人沮丧的。

不过，商队虽然这样的不走运，最后总算是把全部货物都脱手了，它所进行的交易总额将近一千万法郎。商队卖出了一百多万张松鼠皮，二十万张银鼠皮，十五万张狐皮，十万张貂皮和其它货物，它买入了一百万公尺丝绸和棉皮，大约三万磅茶叶，还有金银和其它物品³⁹。它还带回来重要的外交情报。1728年1月19/30日，郎克曾与巴多明神父交谈过，当他在1月21日/2月1日得到离开“四夷馆”的官方许可后，立刻又去访问葡萄牙籍的耶稣会教士。他由他们处得知中国对基督教的迫害，得知葡萄牙的使臣以极大的代价来换取对宗教的容忍，以及某些俄国特别感兴趣的细节。巴多明神父和多名我会的波希米亚神父沃夫冈本来被指定要到边界去同务拉的思拉维赤谈判，后来设法摆脱了，他们恐怕稍一得罪当局，就会影响整个教会⁴⁰。又是巴多明神父告诉郎克在签订恰克图条约以后，隆科多就失宠了⁴¹；巴多明神父认为俄国商队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萨瓦把第一次送给他签字的条约文本退回北京，引起中国恼怒之故⁴²；最后，他还告诉郎克中国人的某些做生意的手法⁴³。除了纯粹属于俄中关系的问题以外，郎克也获得了有关居住于俄中两大帝国之间各个民族的重要情报。1728年1月25日/2月5日，三个喀尔木克人来见郎克，带来了阿玉气的侄子阿拉布珠儿的一封秘密信件，这时阿拉布珠儿已在北京作了二十年的囚犯了。阿拉布珠儿想回到祖国，到阿玉气的身边，可是中国人不许。希望郎克至少为他们的主人传达他的问候⁴⁴。在北京，在张家口，在蒙古，整个中国都轰传着中国人正在准备对喀尔木克人作战，政府征用或购买许多骆驼和马匹，蒙古兵士收到随时准备出发

的通知。郎克甚至要求批准他到俄国边境购买粮食⁴⁵。在北京，1728年1月12/23日开始建造的教堂⁴⁶，看来并未受到任何阻碍，几个学习语言的学生也得到了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各种便利⁴⁷。

1728年7月7/18日郎克在辞行觐见中国皇帝时，雍正皇帝宣称他赐与一个商业代表以非同寻常的恩典是由于郎克和康熙的老关系。在北京与萨瓦谈判过的两个大臣“察毕纳”和“塔古特”向郎克保证他们对于俄国教堂和俄国学生的友善态度⁴⁸。商队于1728年7月13/24日离开北京，沿着来时的道路回国，于1728年9月30日/10月11日到达恰克图⁴⁹。郎克在1728年12月31日/1729年1月11日由色楞格斯克给沙皇的报告上说，1728年12月28日/1729年1月6日一个信使从北京来找寻修道院院长。郎克已经从商队的款项中取了二千六百卢布交给布拉阔甫斯基，作为东正教会的领导、他手下的教士以及学习语言的学生们两年的薪俸⁵⁰。俄国宫廷于1729年3月21日/4月1日接到郎克这份详尽的报告以后，它就决定遵从萨瓦的建议，召回郎克，带回帐目一览表，以便他为下一次1731年的商队作好准备工作⁵¹。郎克很受萨瓦器重，也受俄国政府重视，后来他被任命为伊尔库次克的副总督，在为俄国服务的任上死去⁵²。

就这样，俄国官方商队在北京往往得到同样的结果。不论是由伊斯多甫尼科夫领导的商队（它构成伊兹玛依洛夫使团的一部分，在北京从1721年9月29日/10月10日至1723年7月12/23日，停留了九个半月），还是由萨瓦介绍到中国由特列季亚科夫-莫洛柯夫领导的商队（它由1727年12月26日/1728年1月6日至1728年7月13/24日，在北京停留了六个半月），郎克都曾就近观察它们，总是得到同样的结论：中国方面多方阻挠和恶意相待，北京市场上毛皮充斥，蒙古库伦方面的贸易上的毁灭性竞争，以及各

式各样的诈欺行为，总而言之，很少或不能给国库增加什么利润收入。应该采取补救的办法，改组是必要的。政府尝试采取一种办法，它在远东的代表萨瓦建议的是另一种政策。从过去的商务情况，从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一般趋势以及从一些试验性的行动或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两者都是可以解释和持之有据的。

也许是对彼得大帝专制主义的反动，也许是彼得大帝革新带来的新精神⁵³，俄国政府在十八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间的末期，不得不倾向于某种程度的自由贸易。严密苛刻的垄断逐步趋于放宽。当然，在十八世纪初期的一个专制国家里是谈不上什么完全的商业自由权的。但是大约从1719年开始逐步废除某些经济特权，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征象。这一年4月8/19日和5月11/22日发布的谕旨，宣布在西伯利亚内部，除了沥青和钾碱，貂皮和毛皮以外，一切商品都可以自由贸易⁵⁴。不过当时关于这一问题的想法还不是很确定，那些决议案也不是很坚决的。枢密院在接到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的建议后，于1720年9月1/12日决定从今以后对所有由欧俄部分到西伯利亚经商去的商人每人课以一卢布的税金⁵⁵。商务部于1721年10月24日/11月4日向西伯利亚关税检查官发布训令，提出禁止对蒙古通商的问题，并令他注意改善西伯利亚的道路⁵⁶。1722年间发布的几道谕旨（尤其是1722年5月27日/6月7日的谕旨；同年9月7/18日在伊尔库次克收到的也许是同一谕旨）似乎解决了这一问题⁵⁷。因为对华贸易继续在维尔浩土尔城和色楞格斯克关税卡的严格监视之下；至于对蒙古的贸易，则限于不适合对华贸易的商品。这些防范手段丝毫没有用处。诈欺行为仍然继续发生，俄国和外国商人都一致加以证明⁵⁸。于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自由本来已是既成事实，由官方认可以后，这个自由化运动就更加发展。1723年12月20/31日枢密院根据商务部和矿业部两个部门的建议，修改了有关收购中国黄金的条例。

到目前为止,由中国带回的金锭都已用来交付关税(什一税),而且是按照尼布楚的价格计算的:上等金1卢布15戈比,中等金1卢布5戈比。从此以后,黄金不是专门用来付什一税,一切商人可以自由地带回黄金。但是他们只能把黄金卖给国家造币局,如果把黄金在别处出售或是将黄金出口,则处以死刑⁵⁹。约在1725年间,大黄也缺货了,或者至少是以前的大黄专卖使它变成罕见之物和供不应求了。一个商人提议,如果政府肯豁免关税,他可以在西伯利亚和中国边境上收购大黄。人们提醒他说今后可以自由贩卖大黄了⁶⁰。还有,1727年又废除了另外几种重要的特权。最高枢密院于6月26日/7月7日决定废止在西伯利亚境内对貂皮贸易的一切限制⁶¹,只禁止向蒙古和中国出口⁶²。大黄的自由贸易也由政府正式宣布⁶³。金和银的入口仍然继续不收关税,以鼓励金银由中国输入俄国⁶⁴。1727年9月26日/10月7日最高枢密院完成了它的工作⁶⁵;它准许在西伯利亚开发矿藏和宝石矿;如果说它仍然拒绝让贵重金属出口,那么对于烟草贸易则给予充分和完全的自由,烟草可以输入西伯利亚,也可以向喀尔木克人和蒙古人输出。貂皮、大黄和烟草的贸易,以前是由财政部垄断和由政府包给专利商专卖的,违者处以死刑,这时也可以自由买卖了;对金银锭的入口也给与了部分的自由,这些新的措施还不是新的时代和新的理论占优势的征兆吗?

但是,这些新理论应用于俄中商业关系时,却遇到了困难,使得那些有亲身经历的俄国代表们,就在边界上或当他们由北京归国时,提出了其它补救办法。郎克和克利斯谛齐在1722年就曾提出在库伦进行的私商贸易损害了官方商队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派往北京的商队是过于频繁了,他们也提及可能加速西伯利亚境内的运输速度以及假道黑龙江及其支流甚至海路等新商道的可能性⁶⁶。但是,由于他们不过是商业代理人,因而他们的意见就不如

以前是国家批发商后来是出使中国的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意见受到注意。萨瓦的意见没多久就得到政府的考虑并制订为法律。因此,我们必须详细了解他的想法,不管这些想法与当时流行的主要想法是否一致,以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的情况。这些想法是在两份报告中提出的,一份是在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他刚进入中国时写的,另一份是在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他从北京归国时写的。他在1730年的秘密报告中又加以补充,使其完备⁶⁷。1727年和1731年沙皇的谕旨把他的建议制订成组织整个十八世纪俄国对华商务的规章。

务拉的思拉维赤认为应采取的对华经济政策的想法,也并不算什么独创。在他以前,郎克和中国政府也都提议过十分类似的措施⁶⁸。这一方案之所以鲜明突出是由于下面这一事实,即这些计划是由一个有着高度才智的人全面地提出来的,而他能把这些想法加以敏锐的观察,然后又用清楚明确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尽管当时流行的想法是混淆杂乱的。他所根据的出发点是,西伯利亚是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前途无限;中国又是一个人口稠密而防御很差的富饶国家。因此,俄国在远东经济方面和领土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俄国既然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怎么会在它的对华关系中只得到如此微不足道的利益呢?过失几乎可以说完全在于俄国本身,或者不如说完全在它的西伯利亚代表们身上,如总督、商人等,他们都在竞相欺骗财政部。长官们剋扣军饷,使得西伯利亚的各个要塞处于荒废状态,而这些也不能不引起中国派往土尔扈特的使臣途经西伯利亚时的注意。他们还瞒着财政部派了许多使者和商人到北京去,损害了财政部的利益。他们还私自用人并且利用财政手段,颁布上千种苛捐杂税。一些商人们,为了替他们的长官谋利,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顾设在库伦的官方监督⁶⁹,把大量毛皮非法运往北京,使得毛皮贸易

在几年之内无利可图。何况在外国领土上，有什么检查能够严格而且有效地执行呢？甚至连在西伯利亚境内的军队和要塞都不是处于正常状态，又怎能相信这种检查呢？对于事情的这种悲惨状态，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补救措施，以死刑的惩罚来绝对禁止与中国本部进行的一切私人贸易。为了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不应在俄国势力所难于达到的库伦和齐齐哈尔，而应在边界上，在靠近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的地方建立贸易中心。只有商队才可以到北京去，而且只是每隔三年才去一次。商队的官员都领取固定薪金，他们一定要保证良好的秩序并且应制作精确详尽的帐目。但是，即便市场是置于俄国的直接监督之下，难道不应害怕对于官方在北京的贸易有害的竞争吗？不会的，只要懂得分配任务而且能很好地分配每个人的工作就行了。应该在北京出售财政部的毛皮，而在边界则与西伯利亚人和蒙古人进行力所能及的小额贸易。西伯利亚应逐步布置据点，驻军应得到很好的给养，在西伯利亚地区内部如果有人尽其责，那么经济生活不久就会出现一种惊人的繁荣：河道改善了，运输加速了，由白令建造一支舰队，这样，通往东方的道路就打开了，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就可以为俄国提供丰富的利润。对于打进东方和同东方进行经济交往这一任务，俄国比西方国家更处于有利地位，因为西方国家很遥远，被大海隔绝，又被嫉忌和猜疑。荷兰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不能够永久立足，俄国难道不能取而代之吗？

对于这些坚决的建议，俄国政府于1726年12月30日/1727年1月10日用第一道严禁在中国进行私人毛皮贸易的谕旨来回答⁷⁰。1731年1月3/14日另一道谕旨补充了前述法令并提出将来改组对华贸易的详细措施⁷¹。从今以后商队每隔两年或三年到中国一次。商队由一个事务官和西伯利亚部的一个官员来领导，配备两名专员、四个宣誓商、两个记帐员、两个录事和两个译员。

任何人都不能自己做买卖，所有的人都有固定的薪金⁷²。由一队兵士来负责商队的秩序⁷³。一个事务官伴随商队到北京去，另一个事务官则留在西伯利亚为下一次商队准备给养。商队应每日记帐，所有的货包都应当登记和加蜡封。伊尔库次克，托波尔斯克，维尔浩土尔城和莫斯科的西伯利亚部负责检查和防止一切诈欺行为的发生⁷⁴。科学院的四个数学研究生应随商队前去，根据地形学去绘制商道图。其余年青人在北京学习语言并负责了解当地商业情况⁷⁵。

这样，由于俄中两国之间的妥协，以及国家与私商之间的妥协，俄国对华经济的新条件就这样固定下来了。在彼得大帝统治的末期，俄国政府倾向于废除各种专卖权，曾颁布法令准许在西伯利亚内部有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可是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相反地，它采取的却是与它的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建议相反的方案，即紧紧抓住国家特权不放。它以为，借着在中国边界上建立商业中心，就可以对它所容许的私商贸易实行严格的监督。中国人则对于能使俄国人离开北京感到非常高兴，满意地接受了在远离帝国中心的边界上建立商业中心的计划。俄国政府认为，私商贸易已受到严格限制，官方商队又相隔一定期间才去一次北京，皇家的商业一定会振兴和繁荣起来；而中国人也乐于接受一种可以减少甚至将来可以取缔俄国人到达北京的安排。但是哪一个将占上风呢，是私商还是政府，是俄国还是中国？只有将来才知道：在1727至1731年重新调整俄中商务规章所引起的这些问题，要由十八世纪来解决。

注 释

1 1722年4月8/19日的谕旨回顾过去时说，1722年3月7/18日，内阁秘书阿列克西·玛卡洛夫曾交给枢密院一份外交部关于特列季亚科夫

的报告，并说枢密院已于1722年3月20/31日批准了他的请求。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2年4月8日第3号。这份谕旨于1726年11月21日/12月2日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给萨瓦的信中提到过。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9号。

班蒂什、第105页写上的是一个错误的日期：把枢密院批准特列季亚科夫的要求误定为1722年3月7/18日，而且班蒂什引用的是一份有几个重要句子被删除的文件，删除后还丝毫不露出痕迹来。

2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5卷、第3360号、第696页。

3 他的名字在谕旨里未提到，可是在《伊尔库次克编年史》和商队的帐册里都提到他的名字。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0年、第6号。

4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2年4月8日、第3号。萨瓦在1727年9月5/16日交给莫洛柯夫的护照中，把特列季亚科夫的护照日期记载为1722年7月10/21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公务日志、第2卷、第648页正面。

5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于1724年10月记载特列季亚科夫同近卫军曹伊凡·诺芝聂夫从托波尔斯科克到达。《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6页正面。这个记载被郎克的正式报告所否定：郎克于1724年3月13/24日从色楞格斯克给商务部的报告中（这份报告于1721年10月6/17日圣彼得堡收到），说特列季亚科夫1724年2月21日/3月2日从伊尔库次克写信给他，说特列季亚科夫同整个商队刚到达。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1号。由于《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的记载不止一次与事实相矛盾，因此郎克的记载，既被到达色楞格斯克的日期所证明，应该比较可靠。

6 伊尔库次克总督波卢哈托夫给托波尔斯科克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日期是1724年9月21日/10月2日，宣称1724年6月专员特列季亚科夫从色楞格斯克写信到伊尔库次克来，内容是关于写信给土谢图汗和给中国大臣们，这些信件被蒙古人将信退回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2号；1724年12月11/22日外交部给枢密院的一份报告，根据1724年9月23日/10月4日西伯利亚总督的报告，传达了这个消息。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1号。

7 郎克给沙皇的报告，1724年8月13/24日于色楞格斯克，圣彼得堡于1725年2月22日/3月5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第3号（原本）。

8 特列季亚科夫死于这一天的前夕，没有留下任何命令。全体宣誓评

价员 1726 年 5 月 3/14 日签名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6 号(原本);1726 年第 8 号(抄本);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90 页背面。

1726 年 5 月 15/26 日郎克将这消息告诉萨瓦,并请求给予指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6 号(原本);1726 年第 18 号(抄本);使节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89 页背面、90 页背面。

9 要确定他的遗孀的私人帐目并非易事。下述几件事可以帮助了解,1726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2 日西伯利亚总督多尔葛卢科夫亲王写信给萨瓦说,从 1719 年至 1726 年,特列季亚科夫的妻弟可能收集了 271,474 卢布 6 戈比的官方货物。特列季亚科夫的外甥内夏叶夫斯基被任命为宣誓商,正当寡妇玛丽·伊尼亚特埃娃带着孩子们回到托波尔斯科的时候,他难道不可能应特列季亚科夫的妻弟之请,将特列季亚科夫个人那份三千卢布商品在中国卖掉吗?亲王认为完全可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9 号(正本,由亲王签名)。7 月 24 日/8 月 4 日发给特列季亚科夫的寡妇一份到托波尔斯科为止的护照,她欠商队的款项已还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 年、第 16 号。

10 收到郎克 1726 年 5 月 15/26 日的信(18/29 日收到,参阅上文)以后,萨瓦于 1726 年 5 月 19/30 日答复,并命令对特列季亚科夫的帐作总检查,必要时任命莫洛柯夫代替他。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4 号(原本);1726 年第 18 号(抄本);使节公务日志、第 1 卷、第 91—94 页。

他同时通知外交部和西伯利亚总督,通知外交部的是 1726 年 5 月 26 日/6 月 6 日的报告,于 8 月底或 9 月初到达外交部(郎克 5 月 6/17 日的信于 8 月 18/29 日到达。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3 号);通知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的是同日一封信,于 7 月 3/14 日到达托波尔斯科。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4 号(正本);1726 年、第 2 号(抄本);1726 年第 18 号(抄本)。1726 年 9 月 15/26 日,枢密院的一个决定批准了莫洛柯夫的任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1 号;由女沙皇签署的一道枢密院的命令(1726 年 12 月 30 日/1727 年 1 月 10 日)追认了这个人选。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 年、第 1 号;这道命令由托波尔斯科于 1727 年 4 月 20 或 21 日/5 月 1 或 2 日转发。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 年、第 22 号,莫洛柯夫自己在一份 1727 年 9 月 5/16 日的请愿书中,确认自己的被任命日期为 1727 年 4 月 20 日/5 月 1 日这一天。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 年、第 16 号(抄本)。

11 1727 年 8 月 29 日/9 月 9 日郎克从色楞格斯克写信给萨瓦,向他

转达商队领队们的苦衷，宣誓评价员们宣称已经把他们有权自己处置的三百卢布商品花光了。郎克为自己以及他的下属要求预付两年薪俸。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6号(原本)。

1727年9月5/16日莫洛柯夫同宣誓评价员们呈递一份请愿书给萨瓦。莫洛柯夫要求用现金支付薪金，宣誓评价员们要求增加俸给。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6号(抄本)。

12 这是除了先前答应给他们的三百卢布之外，另外增加二百卢布。这些钱数都以一年为期。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6号；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85页正面。

13 给郎克和莫洛柯夫的训令共有12条；然后是“驻华大使旅途临时办公室”的训令，有些是关于学语言的学生们的，另一些是关于修道院院长的；这些训令都是给郎克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41页背面至655页背面；645页背面至646页；647页背面至648页正面；1727年第9号(抄件)；1727年第16号(抄件)。

14 第10条。

15 第8条及第9条。

16 这些训令已经适用到未来的特列季亚科夫赴华商队吗？可是我们从上文看到特列季亚科夫只是在1722年才被正式任命。而宣誓评价员们在他们1727年9月5/16日的请愿书中，却说他们是在1719年被任命的。此外，在1719年特列季亚科夫已经被选入伊斯多甫尼科的商队中作为宣誓评价员，也不是不可能的。

17 第1—5条。

18 给郎克的特别训令；参阅上文注13。

19 卢卡斯·沃依科、伊凡·朴考特懂拉丁文；年青的西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夫(十六岁)做他们的助手。给郎克的特别训令。这个特列季亚科夫是伊兹玛依洛夫和萨瓦的蒙语译员阿列克西·特列季亚科夫的儿子，他在建立粗鲁海图的文件(1728年5月17/28日)上签了字(参阅第9章)。

20 第11条。在1729年9月28日/10月9日给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萨瓦宣称收到买书的训令已经太晚了。

21 第8条。

22 最初指定的宣誓评价员共有10人(每人可有三百卢布的私人商品，总数就是三千卢布，见1722年4月8/19日的谕旨)；大概有两人没有动身

或已死于途中。1726年5月3/14日写给郎克宣告特列季亚科夫死亡的信中，签名的只有莫洛柯夫、郎古索夫、伊科尼科夫、什梅勒夫(代替博布罗夫)、苏哈诺夫(代替内佩安)，总数只有五至七个宣誓评价员。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6号(原本)；1726年、第18号(抄本)。可是郎克却算出八个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第2页背面及第3页正面；帕拉斯：《新北方自然地理学……》，圣彼得堡及米比锡，1781—1796年8开本7卷，第2卷、第85—86页；第八个应该是伊凡·皮沃瓦洛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0年、第6号。

23 还应加上一个教士同三个学语言的学生。下面是确切的详情：领事及其随员，九人；专员及其随员，六人；军曹(le Sergent)及其传令兵，五人；教士及其仆从；三个办公室职员；八个宣誓商，各带一个仆从；三个学生及其仆从；两个伍长，十八个兵士；一百四十个工人；总数是二百〇五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第2页背面及第3页正面；帕拉斯前引著作，第2卷、第85—86页。

24 同前引；同前引。

25 关于商队的帐册，参阅加恩：《1727—1728年在北京俄国商队之帐册》，巴黎、1911年、8开本。

26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40页背面至641页正面；萨瓦1727年9月8/19日给阔留赤甫的信。阔留赤甫公务日志、第663页。

27 站名古恩德然德藏(1888—1903年拉法伊洛夫—博尔谢夫—瓦西里叶夫地图)。象伊兹玛伊洛夫那次行程一样，只有几个站的名称是可以认出来的。帕拉斯在原本上改正了几个地名(切洛特，帕拉斯；谢洛斯；居尔班蒂吕，帕拉斯；居尔邦；肖多托，帕拉斯；肖多特；蒂热里克切索蒂，帕拉斯；托切洛泰；扎布兹希尔，帕拉斯；谢布谢热；卡沙蒂，帕拉斯；卡尔加蒂，等等，等等)。参阅《原始文件》。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第3—50页背面；1727年第16号(郎克给萨瓦的信)；帕拉斯前引著作、第86—124页。

28 郎克于1728年3月11/22日写信告诉萨瓦：在戈壁沙漠中苦不堪言，能够逃出鬼门关，实在令我惊异；缺水或者水中混有沙子，北风及冰冻非常厉害。从色楞格斯克到张家口，商队死掉489匹马，258头牛。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815页以下；阔留赤甫

公务日志、第 891 页。比较张诚神父于 1688 年描绘的从北京到蒙古的道路：“这条取道沙漠的行程，十分崎岖难走，以致张诚说他从法国到北京一路上所遇到过的任何困难，这时在他看来都成了有趣和好玩的了。（原文为拉丁文）”（莱布尼兹：《中国近况……》，第 2 版、1699 年、12 开本、第 172—175 页（根据张诚神父写给他法国朋友的信，尤其是写给拉·谢兹神父的信）。

29 1727 年 12 月 7 日/1728 年 1 月 7 日张贴在北京，理藩院也派两个官员向郎克证实。郎克于 1728 年 12 月 31 日/1729 年 1 月 11 日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 年、第 3 号、第 1 页以下。

30 五百个环绕四夷馆，二百五十个在门口追随那些出来的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 年、第 6 号、第 50 页以下；帕拉斯前引著作、第 124 页以下。

31 “在俄国公使邸宅旁边，建立了一个审问处，在那里每天都有三个满洲官员和其他职员坐着，他们的职责是，凡是来找我们的，都要最严格地检查，与众不同的甚至要脱掉衣服搜查，以防止中国人与我们密通消息。经过这样的检查以后，那个办公室才发给这些人以通行证，他们如欲通过警卫队的将校身旁走进大门，就得出示这种证件，在公使邸宅周围和大门两旁站岗警卫的除了官兵以外，日夜不下七百五十人。”（此段原文为德文。）郎克于 1728 年 12 月 31 日/1729 年 1 月 11 日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 年、第 3 号、第 4—5 页正面。

32 “……没有富裕的中国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原文为德文）同上引。

“不幸得很，我们每天都看见他们带相当多的中国商品来供我们用现金购买，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商品只收受为维持我们的人和马所必需的现金，没有一个大商人带商品来交换。”郎克于 1728 年 3 月 11/22 日给萨瓦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 年、第 10 号（原本）；使节公务日志、第 2 卷、第 819 页；在他给沙皇的报告中，郎克把几个可怜的中国人所带来的商品称为“无聊的东西”。

生意就这样在 1728 年 1 月 5/16 日开始做起来。郎克给萨瓦的信；这样延续了两个星期（1 月 15/26 日）；中国官员们说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窃贼。郎克给沙皇的报告。

33 这个“经纪人”俄语和汉语都说得相当好。郎克于 1728 年 12 月 31 日/1729 年 1 月 11 日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 1728 年第 3 号，1727 年第 6 号；帕拉斯前引著作、第 124 页以下。

34 同上引；同上引；同上引。

35 加恩：《帐册……》，散见各处。

36 在1728年7月7/18日的辞行觐见中（参阅下文），塔古特大臣宣称：“……没有人要我们的东西，因此，在北京多待些日子就没有必要了，”由于郎克坚持：“于是他冷冰冰地回答，您自己看到，什么也卖不掉，并随即离开四夷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3号、第11页；1727年、第6号；帕拉斯同上引著作、第148页以下。

37 1728年5月1/12日，6/18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帕拉斯前引著作、第146—148页。

38 郎克于1728年3月11/22日给萨瓦的信中，谈到虽然皇帝派了医生来，仍有病人和死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815—820页背面。

在郎克的公务日志中，可以摘录：3月2/13日、4月5/16日、4月9/20日各死了一个俄国工人。3月4/15日商队里的所有人都得了热病。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帕拉斯同上引著作，第138页以下。

39 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加恩：《1727—1728年在北京俄国商队的帐册》，巴黎、1911年、8开本。

40 郎克的公务日志，1728年1月19/30日至1月23日/2月3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帕拉斯前引著作，第130页以下。

41 2月9/20日，他甚至宣称隆科多已经死掉；可是6月24日/7月5日隆科多的一个信使表明他只是失宠而已。同上引；同上引。

42 1月19/30日的谈话。就是在1727年11月13/24日一份1727年8月20/31日条约的不准确的样本交到萨瓦手里。12月17/28日，他严正地向中国大臣们抗议；1728年1月9/20日，他秘密地告诉郎克，而且送一份拉丁文的备忘录给雍正。公务日志、第2卷、第730页以下。

5月1/12日巴多明神父宣称一份条约草案已经从边境送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帕拉斯前引著作。

43 一个中国商会可能在等待俄国人落到无可奈何的地步时，任由他们摆布。中间人顾索夫已经断定说，中国人在等待夏季皮毛易坏的时节，任意杀价购买。1728年1月15/26日及19/30日，同上引；同上引。

44 1728年1月25日/2月5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帕拉斯，前引著作。

45 郎克于1728年12月31日/1729年1月11日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3号。一个中国商人到蒙古去为国家购买四万匹骆驼，每匹价四十两，二万四千匹马，每匹八两。（关于两的价值，参阅加恩前引著作，第120—123页）。

46 郎克于1728年3月11/22日给萨瓦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815—820页背面。

47 郎克给萨瓦的信；郎克给沙皇的报告；6月29日/7月10日郎克的日记。

48 郎克于1728年12月31日/1729年1月11日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3号；同日郎克的日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帕拉斯前引著作。

49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第160—174页；帕拉斯前引著作；1729年第3号（1729年1月22日/2月2日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的报告，内称他收到1728年9月19/30日郎克的一封信，信内说郎克将要到达西伯利亚）。商队带来一封理藩院给萨瓦的信，日期是雍正6年6月15日即1728年7月21日。信的内容只是说明收到萨瓦介绍郎克的信，信的结尾有这几句话：

我们允许公平合理的交易。有很多人多次出售许多东西，也剩下许多东西，因为东西不好，在这儿找不到买主（原为拉丁文）。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第154页；1728年、第3号。

5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3号、第1—18页。

51 萨瓦的意见提出于1729年5、6月。他认为如果粮食不能备足，最好还是派出一支人数甚少的商队，比马上中断商队为好；马上中断商队会被中国人作为借口，拒绝将来别的商队。至于利润，他希望靠他的措施和郎克的廉洁，可以带回利润。参阅《原始文件》。

1729年6月4/15日最高枢密院通知外交部应召回郎克。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9年、第3号（抄本）；1729年、第4号（草稿）。外交部的命令日期是1729年6月26日/7月7日，6月29日/7月10日送出，同上引1729年第3号。巴赫尔慈于1729年10月15/26日写信给萨瓦，说郎克收到回莫斯科的通知；巴赫尔慈羡慕他。同上引，1729年第4号。

52 从1732年3月22日/4月2日到9月8/19日，他伴随一个新的俄国商队到北京，1736年11月10/21日到1737年5月10/21日又伴随另一商

队到北京；他于1735年1月2/13日被任为“内阁顾问”，1738年被任命为伊尔库次克的西伯利亚副总督。班蒂什第196、198页第1号、218页第2号、226页、234页。安德烈维奇：《西伯利亚史》（俄文），圣彼得堡，1889年，8开本、2卷，第2卷、第427—428页。

53 1711年3月2/13日的谕旨确定枢密院的职权。《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2326—2331号、第634—636页；1719年3月3/14日商务部规章或组织条例。《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5卷、第3318号、第671—676页。根据1719年5月29日/6月9日谕旨，西伯利亚被划分三个“行省”（《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5卷、第3378号），后为1724年11月26日/12月7日枢密院的命令所确定：托波尔斯克省，叶尼塞斯克省，伊尔库次克省。《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606号、第380页。

54 1725年11月22日12月3日在发给商人米哈伊洛夫的护照中提起。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

55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6卷、第3636号、第234—235页。

56 第16条：能不能利用流入蒙古海或日本海的几条河流到中国去？第19条：通过托木斯克和巴肯，有没有到中国去的更短的道路？第18条：是否需要改善叶尼塞斯克周围的通路？第17条：好不好“清理”安加拉河以避免陆上运输商品？好不好建造两条平底船，一条放在伊尔库次克，另一条放在贝加尔湖？《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6卷、第4116号、第785页。

这些问题在给萨瓦的训令中又再度提出，萨瓦几乎每题必答。参阅第9章及《原始文件》。

57 1726年10月24日/11月4日西伯利亚总督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给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提起这份谕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2号。

1722年5月29日/6月9日托波尔斯克省行政当局给叶尼塞斯克省行政长官韦尔代勒夫斯基的命令（叶尼塞斯克于1722年7月17/28日收到）。手稿包括克拉斯诺雅斯克的档案文件抄本、第144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80号、第367—369页；《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卷、第136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86号、第393—394页。

在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波卢哈托夫的一份报告中引用了1722年9月7/18日的谕旨，这份报告于1723年5月24日/6月4日于圣彼得堡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2号。

58 在外国人中，值得单独提出的是法国驻瑞典大使康普里顿，他在

1721年好几次到圣彼得堡来。1725年10月9/20日萨瓦将自己在圣彼得堡的住宅租给他，从他那里取得了一封给中国耶稣会教士的介绍信（参阅第9章）。康普里顿撰写了《论沙皇在所辖各个国境内的收入》，由俄国历史协会印行。《历史协会文集》，第40卷，圣彼得堡、1884年、8开本，第447—448页。

康普里顿指出在买卖中国黄金、烟草、皮毛中的弊端。他估计西伯利亚以及同中国进行官方贸易的总收入大约是二十万卢布（而烟草专卖可收入三十万卢布，关税收入四十万卢布）。西伯利亚的毛皮和中国商品多数运到莫斯科，由阿斯特拉罕、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阿尔汉格尔斯克转运到欧洲。

伴随伊兹玛依洛夫（1719—1722）的贝尔估计一队商队到中国去，商品值四至五千卢布，利润加倍。《从圣彼得堡……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2卷，第1卷、第301—303页。

施特拉伦堡曾经在西伯利亚当囚徒（1709—1723），在他于1730年出版的书中，曾经谈到同远东贸易总额为二千万，其中四百万（卢布？）是专卖和官方贸易的收入。他描述了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组织机构，指出有无数弊端。北方（Das Nord）指欧洲的东部和亚洲……，斯德哥尔摩、1730年、4开本、第10章、第292—293页；第13章、第340—341页；第6章、第242页。

59 黄金的价格已在1698年11月12/22日的谕旨内第7条确定，这条条文被称为“7207/1698—1699年安德烈·维尼阿斯海关条例”，载于商务部于1724年1月11/22日给西伯利亚总督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的一道命令中，这道命令1724年2月28日/3月10日于托波尔斯克收到。《图兰斯克札记》，第3卷第785号，载于《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95号、第416—417页。（在前引《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中，命令的日期1723年1月1/22日，这只能是1724年的笔误，因为第一，一道1723年1月份的命令，不可能经过十三个月才到达托波尔斯克；第二，这道命令同枢密院1723年12月20/31日的命令相符。《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4397号、第189页。

60 1725年11月11/22日一道谕旨的抄本，以及1725年11月22日/12月3日发给商人伊凡·米哈伊洛夫的护照。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

61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5110号、第819—821页。最高枢密院是1726年喀德邻一世所创，用来分担枢密院的某些事务的，1731年由

安娜·伊奥诺夫娜撤消。

62 第5条。

63 第9条。

64 第11条。中国烟草仍然禁止，第10条。

65 用同一日期的两道训令来完成，一道是关于珠宝和贵金属的，另一道是关于烟草的。《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5163号、第863—865页，以及第5164号第865—868页。

66 克利斯缔齐也许在1722年就提出，有必要创办一个俄国商业公司，郎克在1730年又重新提出这个想法（枢密院创立之初就有这类建议向它提出，参阅1711年4月13/24日枢密院的训令，载《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2349号、第662—666页）。《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卷、第127—131号，载《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第2卷、第82号、第374—386页，参阅《原始资料》。

67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1727年、第9号；1730年、第5号。参阅《原始文件》。

68 尤其是郎克在他1722年的报告中提出。至于中国人，可参阅第3章，比较第7章理藩院于康熙58年4月16日即1719年6月3日给前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的信。

不久以后，康熙皇帝及其大臣们满意地同伊兹玛依洛夫（自1720年11月18/29日至1721年3月2/13日逗留在北京）谈及供贸易用的边境要塞，终于能够在被打败了的喀尔木克人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参阅第7章。

69 从托波尔斯克发出一道训令给伊尔库次克，日期是1723年2月15/26日，命令派遣一个贵族到库伦去监督商人。伊尔库次克的贵族尼塞福尔·伊古姆诺夫于1723年动身，1724年死亡，没有另外派人代他。伊尔库次克给托波尔斯克的摘要，1725年7月9/20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2号第23—24页。

继伊古姆诺夫之后，被派到库伦的是两个专员：米契尔·康达科夫和马蒂厄·米哈列夫，给他们的训令日期是1725年3月23日/4月3日。虽然经过多次尝试（8月，10月10/21日），他们在1725年11月7/18日以前仍然不能获准进入蒙古。康达科夫还在库伦的时候，萨瓦就命令商队前往北京（参阅上文给郎克和给莫洛柯夫的训令，1727年9月5/16日）。色楞格斯克行政办公室档案，载梅莱蒂伊（主教）：《东正教会……》，梁赞，1901年、8开

本、第32—39页(训令的原文是引用了,但字母和拼写都改用新法;参考出处不够准确)。

1725年11月16/27日外交部给枢密院的一份报告,根据西伯利亚总督的报告摘要,指出商人们经过库伦时由于没有护照而秩序紊乱。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1号。

70 枢密院的训令,由女沙皇签署。训令的依据是萨瓦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的报告,训令部分引用了这报告(1726年12月3/14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号。同日另一给国防部的训令,按照萨瓦在报告中所表达的愿望,命令立即派遣一个工程师和一个炮兵军官去帮助巴赫尔慈的兵士,加强色楞格斯的守卫。《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4994号、第724—725页;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号;这道训令于1727年1月22日/2月2日于托波尔斯克收到,多尔葛卢科夫亲王1727年8月3/14日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22号。

71 枢密院训令十八条。《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8卷、第5666号、第354—358页。

72 事务官二千卢布,他的同僚一千五百卢布,专员一千卢布,宣誓评价员三百卢布,书记至少二百卢布,译员一百卢布,录事五十卢布,都是年薪。

73 一个伊尔库次克的“五十人队长”和一百兵士,第6条。

74 事务官和他的同僚管理商队事务,他们缺席时由专员代替。宣誓评价员应知悉商队事务,以便发生死亡时,首席宣誓评价员能立刻代替商队领队,第8条。

75 熟悉“几何和三角”的科学院的年青学生,负责管理商队的帐目。必要时他们可代替学语言的学生。他们中一两人,将以学习为掩护,留在北京以便熟悉中国的商业。第17条。

第十一章

中俄宗教关系: 东正教会在北京

史料来源

手稿——《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第3号；1723年、第1、2号；1726年第1、4、6号；1727年第9、11、15号（布拉阔甫斯基修道院长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16号；1728年第7、10、16号；1731年第4号（在北京的学生和教士给同上人的信），第8号（布拉阔甫斯基给同上人的信），第15号；1732年、第3号（布拉阔甫斯基给外交部的报告），第7号；《一个大使的公务日志》，第1卷、第50至51页正面，第2卷，第818页背面，第819页正面，第837页背面，第838页正面，第908页背面，第909页正面，第986至988页正面；准噶尔事务，1719年6月28日/7月9日至1721年9月，第24款。

印刷品——（甲）俄文 《保存在最高宗教会议档案中之文件与事件概述》，第1、2、3卷，尤其是第5卷；《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4卷至第8卷；《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7卷，第4492号；《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之史料》，第5卷、第455号；《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之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号；梅莱蒂伊（修道院长）：《旧时代的宗教信件》，喀山、1875年版，8开本；同上作者（升为主教）：《东正教会……》，梁赞、1901年、8开本；昂布鲁瓦兹（教士）：《俄国圣秩制度史》，莫斯科、1807—1815年8开本，共分6部

分,第2卷第442—451页;《基辅宗教学院报告书》,1860年、第4卷;班蒂什,散见各处;阿多拉斯基(教士),《东正教会在中国》,喀山、1887年版、8开本。

(乙)俄文以外之其他国文字 《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第8卷、1727年、第216页;迪·荷尔德《概述》,1725年、第4卷、第252页;贝尔《从圣彼得堡……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2卷,第2卷、第19—20页;司当东译,《异域录》,伦敦、1821年、8开本、第6章。

自十七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的上半叶,俄中两国帝国在宗教事务关系上,只限于很少的几件不完全了解的事实:一些游牧民族的皈依正教;在北京的几个俄国俘虏建立了一座教堂,并有一个教士;有一个宗教传道团体去过中国一个短时期,还有宗教关系的中断,如此而已。在宗教领域方面,也和其它许多方面一样,有待于萨瓦的积极而开明的干预,才能打下一种长期和持久工作的基础。然而我们得承认,就是他也不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不象他在外交和商务政策方面那样胜任愉快。他对人员的选择也不总是很恰当的,正教会在北京建立之初,又遇到很多麻烦,并且有一种不顺利的预兆。不过,最后总算克服了这些困难,如果说俄中两国的宗教关系在十八世纪的第一阶段没有达到建立一种和平稳定的组织,至少它也能标志出向这方面进行的第一次努力,并为将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十七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军队与俄国军队在黑龙江及其支流作战时,以及在雅克萨和其他要塞的历次围攻中,曾经俘虏过俄国人并把他们带回北京。这件事本来是很可能发生的,同时也得到好些人的证实¹。可是一旦人们着手寻求这些事件的详细情节时,这种确凿性又好象消失不见了。这些俄国兵士何时被俘?人

数多少？谁是他们的主要首领、军事上和宗教上的负责人呢？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怎样定居在北京的？以下是我们得到几点不充分的细节。雅克萨城至少遭受过中国人的三次围攻。根据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著作，在1684年7月7/17日的第一次围攻中，有三十一一个俄国人被俘并被带到北京，他们在北京大约住了两年。可是这事实远未得到证实而且引起不止一点困难²。1685年7月中国人攻下了雅克萨，可是由于中国允许俄国驻军携带武器辎重撤退，看来俄军不大会有任何人员留下被俘。1685年年底雅克萨重建，1686年7月中国又围攻该城；俄军将领托尔布新被杀，由拜顿接替他的职务，拜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守到1687年5月的部分解围和8/9月的全部解围。因此，由1686年年中至1687年年中这一段时期中，中国人是可能俘虏到俄国人的。一个唯一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从该时起有俄国人在北京出现，中国皇帝可能赐给他们一座塔，他们把这座塔改建成一座教堂，称作圣尼古拉教堂或圣三一教堂³。他们当中有一个教士叫做马克辛姆·列昂捷夫，他曾告知于1698—1699年间来华的郎古索夫商队成员伊凡·萨瓦齐耶甫说，他既衰老又双目失明，只能靠他的年轻的儿子帮他的忙。那时掌管教堂的是一个名叫狄米特立的人，是格里高瑞的儿子，他不识字⁴。这个狄米特立可能和雅克萨的一名老兵狄米特立·聂斯切洛夫是同一个人，他曾于1731年1月19/30日请人替他写信给务拉的思拉维赤，说他在中国已经四十八年了，他请求发给大使许诺给他的一笔养老金⁵。但是假如托波尔斯克的大主教兼西伯利亚总主教伊格纳思·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⁶于1695年6月6/16日发给色楞格斯克城的圣三一修道院院长米萨尔的命令能够执行的话，列昂捷夫是会得到一些帮助的。这一命令大意是要修道院长招待派往中国去的一个名叫劳伦特·伊凡诺夫的教会执事⁷，和他在一起还有维尔浩土尔城的神父格利高瑞·纳维茨基⁸，

此外,还有一封伊格纳思写给列昂捷夫的信,命他把他的儿子送到托波尔斯克去接受教会执事的圣职。1696年2月5/16日劳伦特大概已经到达色楞格斯科的修道院并与商队一道启程往中国来。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很难知道劳伦特所伴随的是哪一个商队,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费拉切夫的助手由北京回来时执行了伊格纳思的委托,因为他们曾在1693/1694年间,把北京的情势告知伊格纳思⁹。

关于赫拉尼翁来华的历史,虽然记载上有很大的空白和不确切之处,我们还是有一点了解¹⁰。1712年库迪阿科夫商队正在北京,因为商队的专员要求派一个教士来代替年老的列昂捷夫,这时恰逢康熙派赴土扈特的使团正要出发¹¹,康熙乃命令使团,如果得到俄国人的很好接待,使团回国时可带这名教士回来。图理琛在他途经托波尔斯克的时候向噶噶林说明了这一点¹²。1715年6月28日使团回到北京,带来了赫拉尼翁¹³修道院长¹⁴和他的教士们:劳伦特,教士¹⁵;菲里蒙,教会执事,和七个其他的人。修道院长没有能够长期担任东正教会的领导,看来他在1719年就逝世了。1719年噶噶林接到理藩院的一封信,宣称赫拉尼翁已于“今年”逝世,并询问俄国要不要派人接替他¹⁶。当伊兹玛依洛夫于1720年11月18/29日到达北京时,赫拉尼翁已经去世了,于是使团的神父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便把他的珍贵遗物和圣器用品带回到托波尔斯克¹⁷。

俄国政府一接获这消息¹⁸,立即任命卡尔齐特斯基为在华正教会的领导人,并授与他伯瑞亚斯拉夫主教之职(1721年3月5/16日)¹⁹。给他的训令是3月15/26日签发的²⁰。派给他的随员是两名神父,两个教堂执事和三名仆从²⁰;由于沙皇在里加,没有给他国书,只给他一份枢密院于1721年4月21日/5月2日给理藩院的证明信²⁰。1722年3月他经过伊尔库次克²¹,年中到达色楞格斯克²²。可是康熙61年秋月19日(1722年9月29日?)一封蒙古文信

件于1722年9月24日/10月5日到达色楞格斯克，信中说在有关中俄两国的私逃者和边界等悬案没有得到解决以前，不允许主教进入北京²³。卡尔齐特斯基于1723年6月22日/7月3日发出一封信给宗教会议，把这些事情通知它并请求指示。宗教会议于8月5/16日回信命令他在色楞格斯克等待。8月21日/9月1日宗教会议向枢密院请示办法，12月18/29日枢密院命令主教留在伊尔库次克，宗教会议于1724年5月27日/6月7日将这决定转达给主教²⁴。主教于是在伊尔库次克一直停留到他于1731年死亡²⁵。

萨瓦·勃拉的思拉维亦在伊尔库次克见到了他；住得离他很近的就是主升天修道院院长布拉阔甫斯基。布拉阔甫斯基曾伴随伊兹玛依洛夫到北京去，于1721年3月2/13日离开北京回到伊尔库次克，到达的日期是4月20日/5月1日²⁶。伊兹玛依洛夫因深感俄国需要蒙文译员²⁷，曾建议布拉阔甫斯基在伊尔库次克开办一所蒙文学校。布拉阔甫斯基看来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或有自私心的阴谋家，立刻向宗教会议提出这一建议，并要求用外贝加尔区的主易圣容修道院的经费来维持这所学校(1724年7月24日/8月4日)²⁸。10月2/13日宗教会议同意了这一建议，10月23日/11月3日把这事通知西伯利亚总主教和西伯利亚总督。布拉阔甫斯基受到这种鼓励后，于1725年1月22日/2月2日申请再取得勒拿河畔的基连斯克修道院的收入，3月14/25日提出学校的孤儿十分贫困²⁹。可是西伯利亚新的总主教安东尼·斯特拉阔甫斯基和旧总主教莱齐香斯基以及多尔葛卢科夫亲王先后把相反的情况报告给宗教会议，宗教会议分别于1725年5月20/31日、6月30日/7月10日、7月26日/8月6日收到他们的报告³⁰，得知贝加尔区的主易圣容修道院或使节修道院并非“一片荒野”；二十八个修道士及其仆从从事捕鱼业，供应赴华商队膳宿，拥有五百名农民，每年收入超过三千卢布。因此宗教会议于1725年8月11/22日决定只把使节修道院的

收益给予伊尔库次克主升天修道院的学校，不再给予其他补助；并于1726年5月12/23日决定该校的构成和学生的待遇，十个学生将由色楞格斯科的圣三一修道院送来，八名由基连斯克修道院送来，七名由使节修道院送来。这二十五名孩子每人每月领取三十戈比（约相当于七法郎），两普特（约合32公斤76）黑麦，五磅燕麦片和二磅盐。学校就在这基础上维持了大约三年。1728年卡尔齐特斯基主教³¹宣称该校经费不足，成绩也不能令人满意³²。可是学校仍然继续维持了两三年，直到在北京的俄国正教会改组后才关闭³³。

成立这个正教会也是萨瓦的功劳，虽然这一点也和其他方面一样，不是由他创议的，在他以前，北京的东正教会已经存在。外交部深感需要有俄国的译员，曾经指派学生到北京学习语言，约在1725年已在伊尔库次克开办了一所蒙文学校³⁴。不过，排除困难和在中国之得以建立一个正规教会，仍应归功于萨瓦。他不仅在与中国人交涉时，而且在调处俄国人内部争端时，都同样显示出他的外交手腕和善于调解。1725年8月4/15日俄国政府再派卡尔齐特斯基主教到中国去，他不在时，由修道院长布拉阔甫斯基代理职务³⁵。在莫斯科，萨瓦又带走了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宗教学院的学生卢卡斯·沃依科夫、伊凡·雅布朗捷夫和斯捷潘·毕萨列夫（原来是切斯托波罗夫，后来换了）³⁶。萨瓦于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在边界上给政府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他无法携带职位太高的教士进入中国，在他看来，修道院长布拉阔甫斯基比较勤快，对于中国来说，似乎比一个主教合适得多³⁷。1726年12月30日/1727年1月10日宗教会议接到这份报告以后³⁸，沙皇就正式任命布拉阔甫斯基到中国去³⁹，以后于1727年1月9/20日和18/29日宗教会议又登录了这份沙皇的谕旨⁴⁰。萨瓦由北京回到边界以后⁴¹，立即把布拉阔甫斯基召来。8月4/15日修道院长经过色楞格斯克⁴²；8月13/24日他通知使团的办公室说，他的八名学生

中有四名适宜于到北京直接学习语言。他请求用中国银两来付给他固定薪金，以免象赫拉尼翁一样，沦落到仰仗中国皇帝布施的地步⁴³。1727年8月22日/9月2日萨瓦决定布拉阔甫斯基的薪金是550卢布，他的辅祭司、教会执事和三个学生是130卢布，而且派遣他尽快到伊尔库次克去取这笔钱，因为按照1727年8月20/31日订立的条约，商队和布拉阔甫斯基及其学生应该毫不耽搁立即启程出发⁴⁴。可是9月14/25日伊尔库次克的主教卡尔齐特斯基写信给萨瓦向他告发布拉阔甫斯基院长盗用公款⁴⁵。而布拉阔甫斯基则抱怨主教拒绝把款项给他（1727年9月7/18日，10月24日/11月4日，1728年1月4/15日的信件）⁴⁶。这时商队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不能再等了。郎克催促快点⁴⁷，可是毫无用处。于是郎克一个人先动身了，萨瓦向中国人托辞说布拉阔甫斯基在贝加尔湖乘船失事，要稍晚一些时候才能加入商队⁴⁸。萨瓦不得不于1728年7月8/19日至16/27日回到伊尔库次克进行干预，使这两个宗教上的大人物和解⁴⁹。最后，布拉阔甫斯基能够进入中国了，是由他的三个学生吉拉西姆·楚尔金、米契尔·波诺马列夫和赫拉尼翁·罗索金陪同前往的，同行的还有一个不行修道誓约的俗僧伊凡·费力蒙诺夫、一个名叫约瑟夫的执事以及几个仆从。他们于1729年6月16/27日到达北京⁵⁰。

现在，教会的人员齐备了。它一共包括三个教士：修道院长布拉阔甫斯基、执事约瑟夫和俗僧费力蒙诺夫，还有六个学语言的学生：卢卡斯·沃依科夫、伊凡·朴考特（他原是萨瓦的仆从，因为伊凡·雅布郎捷夫受伤⁵¹，代替了后者）、西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夫（这三个人是与郎克及商队于1727年9月一同回到北京去的）⁵²，以及随同布拉阔甫斯基一道于1729年6月16/27日到达北京的吉拉西姆·楚尔金、米契尔·波诺马列夫和赫拉尼翁·罗索金⁵³。这些人都住在“四夷馆”，等待按照恰克图条约建筑的新教堂建成，

教堂也建成了⁵⁴。在北京城东北角上的是前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教堂⁵⁵，这时住有从1715年就住在北京的教士劳伦特（见前第205页），圣器看管人约瑟夫·狄阿科诺夫和尼卡诺·克林索夫，敲钟手彼得·雅库多夫，以及年老的狄米特立·聂斯切洛夫，他是雅克萨的战俘，现在和他当年的战友及其子孙们在一起⁵⁶。这些人之间完全谈不上和谐一致。新教堂的院长布拉阔甫斯基简直无法使圣尼古拉教堂的教士服从他的命令⁵⁷。他的仆从行为也非常不检：费力蒙诺夫喝醉酒后企图杀害劳伦特，执事约瑟夫也喝醉了，竟到中国皇宫谈论这件丑事。他白天就同学语言的学生下棋、玩牌和掷骰子，晚上喝得大醉⁵⁸。学生们什么也没有学到。在北京的一个俄国人雅各伯·撒文本来是他们的教师，可是他从来没有到过一次。别的人偷他们的东西。最后，由1730年9月19/30日到1730年10月15/26日北京发生了非常可怕的大地震，毁坏了圣尼古拉教堂并使几千个中国人丧命⁵⁹。这就是俄国派往北京送新印章的信使索洛维夫得到的悲惨消息，他由1730年12月17/28日或1731年12月24日/1月4日至1731年1月21日/2月1日逗留在北京。当他于1731年6月17/28日回到莫斯科时，他对于俄国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况作了补充报告，他说中国的大臣们对于修道院长和他的无耻生活提出了抱怨和不满。学生们都不服从他⁶⁰。布拉阔甫斯基于1731年7月25日/8月5日写信报告说，伊凡·费力蒙诺夫在醉醺醺的状态下扑向学语言的学生们，而当布拉阔甫斯基设法干涉时，费力蒙诺夫就唾他的脸，掷砖头打他，用刀割破他的手⁶¹。于是中国人不得不把他关起来（1731年6月22日/7月3日）⁶²。事实上，西伯利亚副总督卓罗伯夫在1731年12月5/16日的报告上说，费力蒙诺夫（费力波夫）已被送到边境来了⁶³。学生们也并不好多少：卢卡斯·沃依科夫和吉拉西姆·楚尔金酒喝得很凶。郎克与商队由1732年3月22日/4月2日至

1732年9月8/19日正在北京，他用马镫皮带抽打了楚尔金一顿，同时恫吓沃依科夫，可是郎克离开北京以后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呢？布拉阔甫斯基于1732年5月24日/6月4日写信给外交部提出这个问题⁶⁴。大约就在此时，信使索洛维夫又到北京去了一次，他在北京逗留的日期是1732年2月14/25日至4月6/17日，同年10月14/25日回到圣彼得堡，带来了郎克于1732年4月5/16日写的一封信和他口述的情况。中国大臣们对于俄国正教会的紊乱状态非常气愤，其中一位大臣宣称他们将非常乐于看到俄国召回布拉阔甫斯基⁶⁵。新教堂已经建成，可以于1732年4月9/20日举行圣礼，旧的教堂也被北京的俄罗斯人重建了⁶⁶。1732年10月31日/11月11日外交部把这些情况告诉枢密院⁶⁷；11月2/13日枢密院的回答是召回布拉阔甫斯基，宗教会议于1732年12月4/15日决定指派新的教士到北京的正教会中任职⁶⁸，又命令开除约瑟夫执事和跟随1732年商队来到北京的教士希拉瑞·朱索夫的职位⁶⁹。不过外交部力主必须慎重周密行事（1733年1月29日/2月9日的备忘录），因为现在已经来不及通知郎克，只有委托新教士们把这些命令带去⁷⁰。萨瓦于1733年10月3/14日建议这样做：不必正式通知中国当局，最好是交给经验丰富的郎克办理较为妥当⁷¹。按照修道院长的报告，正教会的紊乱状态仍然存在⁷²；根据郎克于1733年6月29日/7月10日的报告，连朱索夫也被捕了⁷³。可是朱索夫回到圣彼得堡以后，向当局为他自己辩解得非常好，所以又于1734年9月10/21日被委派为北京修道院院长，接替布拉阔甫斯基⁷⁴。直到1734年年底和1735年年初，宗教会议向朱索夫发出了一系列训令及补充的指示和说明，通知他应起何种作用，应担负何种工作和职责⁷⁵。郎克所领导的由1736年11月10/21日至1737年5月10/21日去到北京的商队，带回了布拉阔甫斯基，1731年1月24日/2月4日向他进行审讯，最后定了

罪⁷⁶。他的后继者朱索夫的行为看来也不比他更好，假如他不是于1741年4月21日/5月2日在北京去世的话，无疑也会被召回国的⁷⁷。在学生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郎克于1732年9月8/19日离开北京时，以伊凡·布科夫和阿列克西·伏拉迪金代替了伊凡·朴考特和奥多西斯·特列季亚科夫⁷⁸。卢卡斯·沃依科夫于1734年1月7/18日去世，吉拉西姆·楚尔金也于1735年2月28日/3月11日去世⁷⁹。当郎克与1736至1737年的商队回到北京后，他指定伊凡·启基列夫接替这两个人⁸⁰。第一届学语言的学生中最出色的是赫拉尼翁·罗索金，他于1741年回到圣彼得堡，政府任命他为汉文和满文译员以及东方语言教授。他所翻译的几种满文著作，有一部分未发表过。就是他把图理琛的出使记的译本交给历史学家穆勒，发表在1764年的《每月著作》上；他死于1761年或1770年⁸¹。无疑地，罗索金是在北京的俄国正教会在科学上的荣誉成就之一，从最初起，他的工作显然就在外交上和科学上不是没有用处的。

实际上，俄国想要正教会在外交上发挥作用。中俄两国都痛感到需要有忠实的译者，因此它们一致认为要在北京设立一所培养翻译人材的学校。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北京的俄国正教会还被公开称为“传教会和使团”⁸²，它的政治方面的特点使它不同于其他在华的宗教团体。看来，它虽然没有节制自己不去作宗教宣传活动⁸³，但它在这方面的活动是非常有限的。它在人数方面、人才方面以及教士的声誉方面都不如它的劲敌们，因此它不能靠这些方面维持它的威信，不过它也因此不会遭到中国方面的敌视和迫害。而且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俄国正教会主要想促进俄中关系，它只限于为俄国人和极少数的几个中国皈依者作宗教礼拜，因此除了它的某些成员的不象样的行为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事引起中国的不满了。俄中两国都承认这个机构是有用的。

俄中两个帝国对于住在它们边境上的各个缓冲民族所施行的特殊政策，都不是很成功的，它们本来都曾企图把它们拉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在十七世纪末叶曾经为根忒木耳酋长施过洗礼，这就是使中国人对俄国人产生敌意的原因之一。可是中国所要回的，主要是一个逃亡的酋长，而不是对他的皈依正教有什么不满⁸⁴。至于北京皈依正教的人，只要看看中国以何等轻视的态度看待这些善于欺骗西方人（不论是耶稣会教士或是正教会教士）的伪君子就够了⁸⁵。但是对于喀尔木克人和布利亚特蒙古人的改宗正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俄国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扈特人施以洗礼，以致于俄国的近邻喀尔木克人的珙台吉所以反对俄国—喀尔木克联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害怕改宗正教⁸⁶。彼得大帝不是曾经力促教士们学习喀尔木克语，以便争取喀尔木克人改宗吗⁸⁷？萨瓦不是曾经力图阻止俄国的布利亚特蒙古人接待来自蒙古和中国的僧侣吗⁸⁸？俄国之所以在外贝加尔区和西伯利亚中部建立一些修道院，不是期望能使异教徒皈依正教和开采这一地区的财富吗？这些努力曾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成就，但有一个结果是相同的，那就是激起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起来反对改宗正教⁸⁹。相反，中国本身信佛教，一直非常注意以佛教僧侣来感化蒙古人，并使蒙古人倾向亲华。中国对于喀尔木克人也企图推行同一政策⁹⁰，不过，或是由于厄鲁特人所信奉的西藏喇嘛教和中国的佛教之间的竞争，或是由于无法调解的政治原因，中国在这方面是失败了，因此不论中国愿意不愿意，还是被迫使用了武力。最后，中国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三支的土尔扈特人，也并未把宗教工具放置一旁而不用。阿玉气和1714年出使土尔扈特的全体中国大使共同宣称他们信仰同一宗教和反对俄国正教的⁹¹。半个世纪以后，伏尔加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一部分就是由于宗教上的考虑，才决定回到他们的故土准噶尔⁹²；准噶尔是佛教之乡，是伟大的佛教

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包括他们的宗教中心西藏以及与他们信奉同一宗教的强大的中国皇帝的国家。

在宗教事务上，俄国在对华关系方面似乎得到了胜利。它获得了在北京建立永久性教会的权利，这个教会是得到中国认可甚至得到它的鼓励的。可是中国能够撇开中间人耶稣会教士，实际上是不是中国人所获更多呢？耶稣会教士受中国迫害，最后出卖了中国。在亚洲的宗教领域方面，中国所处的地位难道不是比它的劲敌更占优势，使它得以用佛教来羁绊蒙古人和土尔扈特人吗？我们在中俄两个国家的宗教关系方面，难道没有看出它们各自的政策中富有特征的区别吗？俄国利用宗教来达到外交上的目的，这即是说，最后为了达到通商的目的；中国则以宗教为手段在它周围建立了一圈缓冲民族或缓冲国，这即是说，最终为了使它自己与世隔绝。

注 释

1 “他命令……他的一个夏(Hia)……当俄国人的队长，这些俄国人听他指挥……这个夏懂得点俄语……”张诚神父在1691年的第三次旅行，载迪·荷尔德：《概述》，1735年，第4卷、第252页。

“俄国人在北京也有一座教堂和教士，他们邀请了好几个有身份的中国人皈依希腊正教”。《从莫斯科到中国的旅行》，义杰斯(1692—1695)著，载：《北方游记》，第8卷、1727年、第216页；1695年6月6/16日伊格纳斯·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信(参阅下文)；贝尔《从圣彼得堡……旅行》，格拉斯哥、1763年、4开本、2卷，第2卷、第19—20页；布拉阔甫斯基、学生们、聂斯切洛夫夫给萨瓦的信，日期是1731年1月16/27、19/30、20/31日(参阅下文)。

2 班蒂什、第38页、注1、引用作为参考资料的是：中国宫廷、第10卷、第26—33页和第7卷。第7卷超过300页(167页仅在正面编号，等于正反两面共334页)，包括三个不同部分，如果不指出页数，很难找到要找的段落。至于第10卷第26—32页背面，在这页内有柯罗文给维拉索幅的一封信，信内提醒他关于以前的事件。那么，这就是一项间接证明。最后班蒂什所说的“大

约两年的囚禁”到底指的是什么期限？在1686年柯罗文还没有同中国大使接触，更没有谈到赎回俘虏。难道俘虏们是被中国皇帝释放的吗？为什么要释放？根据什么条件释放？在1686年年底信使魏牛高和法俄罗瓦在北京相会，他们似乎对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提起。如果这些俘虏被带到边境，尼布楚的长官和别的要塞的长官不立刻将这件事告诉柯罗文，这是可能的吗？此外，班蒂什的这句话也可能仅仅意味着：在两年中，俘虏们在北京受到监视：“中国人带回来三十一个俄国人，他们在北京受到严密监视，可是没有受到刑罚，大约有两年时间……”

比较波兹尼叶夫：《蒙古及蒙古人》（俄文），圣彼得堡，1896—1898年，8开本，2卷，第2卷“引言”第23—24页。第一批到北京的俄国人是在1686年，他们的神父是死于1700年的狄米特兰；可是波兹尼叶夫先生没有说出他的根据。

3 “我从到中国来会见你的可敬的商人那里探悉，博克达汗殿下给了你信仰基督正教的自由，而且给了你一座佛教庙宇作为圣三一神的居所，已将所有佛教偶像都清除，扔到门外。”伊格纳思·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给在中国的教士马克辛姆·列昂捷夫的信，日期是7203/1695年6月6/16日，载梅莱蒂伊：《旧时代的宗教信件……》，喀山，1875年，8开本第66页以下。梅莱蒂伊肯定这封信是在北京被索弗龙·格里博夫斯基修道院长在遼迥修道院发现的，在他于1809年回到圣彼得堡时，他将这封信献给最高宗教会议。

北京的东正教堂，在上面提到的信里说是圣三一教堂。可是本章所分析研究的最高宗教会议的所有文件，都称之为圣尼古拉教堂。（按这个教堂即北馆，后来在俄罗斯馆旁边建立的教堂称南馆——译者注）。

4 根据一份手稿记载（这份手稿是尼布楚档案抄本，载于《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XXXV号，第292—293页），1699年7月萨瓦齐耶甫受司宾、尼布楚长官尼科勒夫质询时，曾经说北京俄国教堂离四夷馆约2俄里（2.134公里），除了圣像外没有别的装饰；约有三十个俄国正教徒在北京，包括男女老幼在内。

5 “教士让·菲里波夫应囚犯狄米特立·聂斯切洛夫的请求代替他签名”，文件上这样写着，这样就证实萨瓦齐耶甫所说的聂斯切洛夫是文盲，是正确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1年，第4号（抄本）。

6 十七世纪末叶及十八世纪上半期西伯利亚的宗教领袖是：保尔，1678—1692年；伊格纳思·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1692—1701年；菲洛

泰·莱齐香斯基, 1702—1711; 让·马克西莫维奇 1711—1715 年; 菲洛泰(西奥多尔)。莱齐香斯基, 1715—1721 年; 安东尼·斯特拉阔甫斯基, 1721—1740 年, 西伯利亚总主教。参阅安德烈维奇:《西伯利亚史》, 圣彼得堡, 1889 年, 8 开本, 2 卷、第 2 卷、第 323—324 页。

7 米萨尔有可能交付十卢布(450.50 旧法郎)给劳伦特·伊凡诺夫, 后者是带着商品为教堂行祝圣礼到中国去的。色楞格斯克圣三一修道院档案, 载《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第 5 卷、第 455 号、第 243 页。这份文件被转载于梅莱蒂伊前引著作、第 51—52 页, 未注明出处。他还加上一句: 米萨尔注, 执事劳伦特·伊凡诺夫于 7204/1696 年 2 月 4/14 日交出这封信。7204/1696 年 2 月 5/15 日执事劳伦特·伊凡诺夫(属托波尔斯克圣苏菲亚大教堂)交付十卢布的收据给米萨尔。同上引、第 71 页注解。

梅莱蒂伊也根据色楞格斯克圣三一修道院的档案, 断定说劳伦特·伊凡诺夫曾于 1696 年随同费拉切夫商队到中国去。

8 根据梅莱蒂伊:《十七、十八世纪在多里(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及中国之东正教会……》, 梁赞, 1901 年, 8 开本、第 53 页。

9 7202/1693—1694 年巴西尔·洛巴诺夫, 葛斯奇巴西尔和费拉切夫的职员, 随同一起从中国回来的伙伴, 曾经向托波尔斯克总主教索取某些宗教用品(一块做弥撒用的桌巾、一些奉献过的丝绸或亚麻布、圣油等等), 供北京教堂之用, 教堂即将举行祝圣礼。7203/1694—1695 年西伯利亚总主教伊格纳思可能派遣维尔浩士尔城的教士纳维茨基去给列昂捷夫, 还派伊凡诺夫带去一些书籍和宗教用品。他嘱咐他们为博克达汗祈祷, 并且将祈祷文译成中文以便公众都懂。马克西姆·列昂捷夫将举行宗教仪式, 这样一来, 他的被俘就可能帮助了基督的事业。如果他有一个儿子, 叫他的儿子到托波尔斯克来, 以便派他当一名教会执事。梅莱蒂伊:《旧时代的宗教信件……》, 第 66—71 页。

这封信的日期是 7203/1695 年 6 月 6/16 日于托波尔斯克, 如同给色楞格斯克圣三一修道院的主持那封一样。但在别的地方(《东正教会……》第 54 页注)梅莱蒂伊却把日期写成 6 月 5/15 日。

10 在 1696 年的费拉切夫商队同 1712 年的库迪阿科夫商队之间, 有过几次商队, 都带有教士。可惜关于这几次长途旅行都缺乏详细资料, 而梅莱蒂伊提供的资料几乎不可用, 因为出处从来不指出来。下面只提出几项来备考:

1702年6月。总主教菲洛泰给叶尼塞斯克、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圣职人员的信。要帮助教士塞热，色楞格斯克圣三一修道院的主持泰奥托齐和歌唱队员哈沃夫，他们于1702年3月5/16日跟随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商人萨瓦齐耶甫到中国去。

总主教菲洛泰于1702年6月9/20日给色楞格斯克圣三一修道院主持米萨尔的信，内容同上，由教士塞热于1702年3月5/16日转交。《旧时代的宗教信件》，第119—120页。

1704年5月15/26日总主教菲洛泰给西伯利亚全体圣职人员的信。供给粮食和马匹给拉飞尔教士，他是巴泰勒采教区圣苏菲亚教会的财务人员，他将随同商人奥斯考尔考夫到中国去。

总主教还有两封信，一封是同一天的，内容相同，是给伊尔库次克主升天修道院院长米萨尔的，另一封日期是1704年5月17/28日，命令给这些教士二十个卢布的，两封信都由拉飞尔于1704年10月12/23日转交。1704年5月15/26日的那封给米萨尔的，还叫他派教士特里菲尔跟拉飞尔去学蒙古语。梅莱蒂伊，前引著作，第136—138页。1704年10月20/31日拉飞尔可能收到了那二十卢布，一张交付他的物品清单，日期是1705年2月28日/3月11日，说明他在那时还在伊尔库次克。1706年7月26日/8月6日拉飞尔在伊尔库次克所出具的一张收据，说明他那时已经从中国回来而且要回到托波尔斯克去。梅莱蒂伊，《东正教会……》，第69—73页。

教士特里菲尔·冈蒂穆洛夫可能是冈蒂穆洛夫亲王的一个子孙，于1684年受洗礼。同上引，第71页。

祭司和教士都属于“黑色”或正规的圣职人员。

11 康熙51年(1712年)，俄国在华专员申请而且获得批准派一个修道院长来华。土谢图汗给色楞格斯克总督的信，日期是康熙61年仲秋月19日(1722年9月?30日)，带到色楞格斯克的日期是1722年9月24日/10月5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2号；1726年、第6号；1727年、第11号。

库迪阿科夫那时大概还在北京，理藩院写了一封长信给噶噶林亲王，内容是关于商队及其专员的，也许就是库迪阿科夫将这封信带回来的，日期是51年5月6日即1712年6月9日。中国出使土耳其人的使团离开北京是1712年6月23日(康熙51年5月20日)。

12 参阅司当东，《异域录》，伦敦、1821年、8开本、第6章。

专员说，在北京的俄国教士只有狄米特立一个人，他十分老了，如果他死去，没有人能为他主持临终仪式。罗索金译图理琛的满文著作《穆勒《文集》1764年》上说，狄米特立是一个在雅克萨被俘的哥萨克。

如果图理琛准确地传达库迪阿科夫的话，那么1712年马克西姆·列昂捷夫已经死了。比较阿多拉斯基：《东正教会在中国……》（俄文），喀山，1887年，8开本，第38及47—64页。

图理琛还要求派一个医生随同教士来。就是在这时机于1715年派哈尔文和郎克到北京来。参阅第4章。

13 使团于康熙54年5月27日（1715年6月28日）回到北京。图理琛并没有说有俄国教士伴随使团回来，只有萨瓦在后来才提出来（1730年的秘密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0年、第5号），还有其他好几个来源可以得出同样事实。首先，康熙可能授命他的代表们，如果他们对俄国满意的话，在归途可以带一个教士回来；而大使们同皇帝肯定对俄国人的接待非常满意。再者《伊尔库次克编年史》，虽然使用非常含糊的词句，却在1715年记载派遣赫拉尼翁修道院长到中国来。《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9页背面。最后，理藩院于康熙56年3月13日即1717年4月24日（信上写23日）给噶噶林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信件、1704—1717年、第47号信），也谈到最近修道院长赫拉尼翁偕同殷米亚纳到达北京。去土尔扈特人的大使中有一个叫做殷札纳，是否就是信上的那个殷米亚纳呢？

14 总主教菲洛泰给色楞格斯克圣三一修道院院长米萨的信，日期是1707年5月22日/6月2日，内容是请他接待派到中国去的神职人员赫拉尼翁和助祭哈沃夫。梅莱蒂伊：《旧时代的宗教信件》，第147页；1707年10月28日/11月8日赫拉尼翁可能签了一张收据给修道院。梅莱蒂伊：《东正教会……》，第76页。

根据阿多拉斯基前引著作，第62—65页，出生在小俄罗斯切尔尼戈夫地方的赫拉尼翁，以神职人员身分伴送总主教菲洛泰·莱齐香斯基于1702年到达托波尔斯克。他于1707年随同库迪阿科夫的第一次商队到中国来。1710年8月20/31日的一封信任命他为雅库次克救世主修道院院长。梅莱蒂伊：《旧时代的宗教信件》第154—155页。阿多拉斯基把这事说成是1709年发生的。他于1715年1月16/27日离开托波尔斯克（梅莱蒂伊：《东正教会……》第96页），于同年冬季到达北京（同前引，第98页）。

穆勒的后继者（《文集》，第10卷、第277页以下），或者说穆勒的启发者

昂布鲁瓦兹，在他的《俄国圣秩制度史》，莫斯科，1807—1815年，8开本，6卷（俄文），第2卷各处，肯定说赫拉尼翁和他的使团于1715年4月20日/5月1日到达北京，他本人死于1719年；但未注明出处。

15 也许同1695年6月6/16日总主教伊格纳思的信中所说的司祭是一个人。参阅阿多拉斯基同上引。

16 “去年1719年收到……致西伯利亚总督的一份证书，证明赫拉尼翁已经死亡，”枢密院1721年4月21日/5月2日给理藩院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3月10/21日、第5页。

“修道院长赫拉尼翁、一个教士、一个司祭、七个辅祭受到殷札纳的接待。皇上封修道院长为五品官，教士与司祭为七品官，赐给辅祭们现金，使得他们能够结婚。今年赫拉尼翁病死。你们有人代替他吗？”理藩院给噶噶林亲王的信，1721年3月15/26日交到外交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3月10/21日、第5页；班蒂什，第84—85页（新法拼写）；昂布鲁瓦兹前引著作，第2卷、第442—451页。

17 《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档案内之文件与事件概述》第1卷第267/172，1727年3月14/25日至5月14/25日，第279—280条；布拉阔甫斯基给萨瓦大使办公室的信，1727年8月13/24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5号。

18 据梅莱蒂伊记载，赫拉尼翁死于1718年，司祭非里蒙于1719年3月将这消息带到伊尔库次克，4月带到叶尼塞斯克。总主教西奥多尔有信通知当时在圣彼得堡的噶噶林亲王（1719年4月4/15日），同时通知伊尔库次克的主升天修道院长（1719年4月5/16日）。梅莱蒂伊：《东正教会……》，第107—108页、115页；《旧时代的宗教信件》，第180—181页。出处没有说明，核对根本不可能，这个断定根据不足，除非有新的事实可资证明。枢密院于1721年4月21日/5月2日给理藩院的信中（参阅本页注16），说理藩院给噶噶林的信于1719年收到；但是理藩院的信的抄本没有注明日期，使得人们没法知道原本是在1718年写的还是在1719年写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3月10日、第5页。抄本是由枢密院交来，于1721年3月15/26日到达外交部。据《基辅宗教学院文集》，1880年、第4分册记载，赫拉尼翁死于1718年4月26日/5月7日。

19 1721年3月10/21日一道谕旨发给外交大臣葛洛甫金及副大臣夏菲洛夫男爵，内称：根据3月5/16日由沙皇签署的谕旨，任命圣阿历山大·

聂夫斯基修道院的教士为驻中国的伯瑞亚斯拉夫主教。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3月10日，比较梅莱蒂伊：《东正教会……》，第115页。

可是正式任命可能是1721年3月5/16日或3月15/26日，非正式的人选可能知道得更早，因为“被任命派到中国代替已故的赫拉尼翁”的卡尔齐特斯基，早于1721年2月25日/3月8日已打报告给最高宗教会议，要求派遣助手和发给各种圣职用具。《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档案内之文件与事件概述》，第1卷、第120/334号、第92—95条（分析），以及《补遗》，第12号、第CXIV-CXV页（正文）。宗教会议的答复，同上引，第13号、第CXVI-CXVII页（正文）。

20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1年3月10日。

21 《伊尔库次克编年史》，第15页正面。

卡尔齐特斯基向宗教会议告发总主教西奥多尔，说他从自中国归来回到伊尔库次克的唱诗班人员手中取走赫拉尼翁的薪金。总主教解释说，他取了这笔钱是因为赫拉尼翁欠他一笔债务，这笔钱是用来还债（事实上1718年10月28日/11月8日总主教曾经派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联队的一个龙骑兵，从托木斯克到伊尔库次克以及中国，追讨这笔债务。梅莱蒂伊：《旧时代的宗教信件》，第179—180页；《东正教会……》，第105—106页）。可是宗教会议仍认为自己有理由攻击总主教。1722年4月26日/5月7日。《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2卷、第305/552号，1722年3月2/13日/6月7/18日，第442条。

22 1722年9月3/14日卡尔齐特斯基从色楞格斯克写信给宗教会议，说蒙古人不让他过境，他问如何办好。《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2卷、第2部、第951/秘密号、第198条，以及《补遗》第5号第XII-XV条（正文）。

23 蒙古来信日期是康熙61年仲秋月19日。如果这个仲秋月是61年8月（9月11日至10月10日）的话，19日就相当于1722年9月29日；如果是7月的话，19日就是8月30日，这不象是代表秋季了；此外，也不可能是9月，因为那样19日就相当于10月28日，而这封信是9月24日/10月5日到达色楞格斯克的。因此，似乎是61年8月19日即1722年9月29日。

这封信的俄文译本抄件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2号；1726年、第6号；1727年、第11号内。

色楞格斯克于1722年9月24日/10月5日收到这封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2号；该信连同托波尔斯基的报告于1723年3月29—30

日/4月9—10日呈交外交部，外交部于1723年6月8/19日报转枢密院。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1号。

24 1723年11月18/29日卡尔齐特斯基，在他给宗教会议的一份报告中(1724年5月16/26日收到)，宣称已收到叫他等在色楞格斯克和跟随郎克的1723年8月5/16日的谕旨。可是郎克停留在色楞格斯克——他于1722年8月26日/9月6日随同伊斯多甫尼科夫商队回到这里——而且伊尔库次克长官拒绝付给主教薪俸。怎么办？卡尔齐特斯基于1724年3月13/24日给宗教会议的报告，宣称已于1723年11月27日/12月8日收到同样的谕旨，而且抱怨说他缺少钱财。1724年10月7/18日宗教会议决定把他视同作战军官而给以高薪俸。《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4卷、第1275号、第118—120页，又第1385号、第236页。

25 在下述著作中可以找到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的一生完整的传记：莫德斯特：《伊尔库次克的第一任主教以及创造奇迹人英诺森的一生》，彼尔姆，1878年、8开本、52页。比较《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卷、第120/334号，第92—95条，以及班蒂什、第533—534页。

卡尔齐特斯基约于1680—1682年生于小俄罗斯。先是基辅宗教学院的学生，然后任莫斯科宗教学院的教授和学监(1710—1719年；这个学院在教世主修道院内，既是学院，就讲授斯拉夫文、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们记得这个学院曾经于1725年提供两个语言学生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然后在圣彼得堡任圣三一和圣阿历山大·聂夫斯基修道院的教士(1719年)，他可能于1720年7月4/15日被任命来代替赫拉尼翁——这是根据莫德斯特的记载，但他没有说明出处。1721年3月5/16日他被升为伯瑞亚斯拉夫主教，带着1721年4月21日/5月2日枢密院给理藩院的信动身，信内要求准许他进入中国境内，到凡是有俄国人的地方去。一封劝告的信劝他为了怕耶稣会神父阻挠，隐藏了他的主教头衔。《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2卷、第2部，《补遗》第5卷、第14条。这封信无疑是认为耶稣会神父煽动的结果，中国才不准主教入境。可是我们知道那时候耶稣会神父在中国宫廷并没有什么权力，我们也知道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国才采取这种措施的。1724年6月6/17日宗教会议又命令卡尔齐特斯基回到伊尔库次克。经过萨瓦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的报告以后(12月3/14日收到)，卡尔齐特斯基发觉人们宁愿要他的敌手布拉阔甫斯基出使北京。他被任命为伊尔库次克主教，任命日期是1727年1月16/27日(莫德斯特说是1727年8月26日/9月6日)，在布拉阔甫斯基

赴华以后，负责管理由布拉阔甫斯基创办的蒙文学校（参阅下文）；他死于1734年11月27日/12月8日（弗洛兰斯基说是11月26日/12月7日，见班蒂什第534页）。1764年他被封为圣人，他的遗物据说能行圣迹。

26 参阅第7章。

27 1721年伊兹玛依洛夫想翻译一封蒙文信件，只能找到一个不可靠的皈依正教的蒙古人。于是他请布拉阔甫斯基学习北京耶稣会神父的样子，学习汉语和满洲语。《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4卷、第422/213号，1735年9月9/20—5月12/23日，第428—434条；《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规汇编》，第4卷、第1381号、第227—229页。

28 他称之为“荒凉的外贝加尔区主易圣容修道院”，同上引；同上引。

29 他称这所修道院为“基连斯克的小修道院”。他问哪里有钱来为孩子们购置长袍和鞋子呢？同上引；同上引。

30 1725年5月20/31日宗教会议收到总主教安东尼（斯特拉阔甫斯基）以及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的报告。《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前引处；1725年6月30日/7月10日及7月26日/8月6日西奥多尔的报告在1725年8月11/22日的法令里提起（这些不同的报告在最高宗教会议的档案里都找不到）。《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1631号、第161—163页。

31 他于1727年1月16/27日被任命为伊尔库次克主教，载于《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卷、第120/334号，1729年2月25日/3月8日—1月5/16日，第92—95条。参阅上文第207页、注4。

32 根据1726年5月12/23日宗教会议的决议，西伯利亚总主教以1726年10月16/27日发布的训令，将伊尔库次克学校交由基连斯克和色楞格斯科的圣三一修道院以及使团修道院或贝加尔区的主易圣容修道院负责。《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7卷，《补遗》第8卷、第CLX条。等到卡尔齐特斯基成为伊尔库次克的主教以后，基连斯克修道院属他管辖，总主教就不再要求修道院补助学校。稍后一点，大概是在1731年卡尔齐特斯基死亡以后，色楞格斯科的圣三一修道院也停止了津贴。《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4卷、第422/213号、第433—434条。

33 对1728年卡尔齐特斯基的报告，宗教会议没有答复。在1728年和1731年，学校的经费似乎部分断绝了来源（参阅前条注解）。可是1730年和1731年的报告一份说有三十八个学生，另一份说有三十个学生（二十个俄语，十个蒙古语）。《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4卷、第422/213号、第

433—434条。但由布拉阔甫斯基亲笔签字给大使（萨瓦）办公室的一封信（1727年8月13/24日）却只说有八个学语言的学生。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5号；西伯利亚总主教给宗教会议的一份报告（1730年？）只说有三个学生和十个学斯拉夫文的学生。《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2—43条。

34 这所学校可能于“1714年”已经成立，这是按照《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7卷，《补遗》，第8卷、第CXL条的记载。1714年也许是1724年之误，如果最初伊兹玛依洛夫的想法是在1721年才有的话。

35 《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5卷、第1627号、第157—158页；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

36 参阅第9章。

37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

38 1726年12月3/14日。

39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1号。

40 《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5卷、第1884号、第468—470页。在布拉阔甫斯基1727年8月13/24日给大使办公室的信里，他宣称已于1727年7月28日/8月8日收到宗教会议1月18/29日任命他的训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5号。

41 1727年6月14/25日。参阅第9章。

42 “修道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昨天从这里动身去同你相会。”郎克给萨瓦的信，1727年8月5/16日于色楞格斯克。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6号。

43 “在我居住北京期间，我得知修道院长和别的神职人员，由于汗给他们的津贴太少，曾经同他们的教区教徒一起登记为汗服务，这是十分可耻的行为。”

布拉阔甫斯基要求派一个军官执行大使派下的命令，因为“主教（卡尔齐特斯基）以及（伊尔库次克的）主升天修道院的教士们都不听我的话，而且一文不拔。”信末签名：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修道院长。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5号。

关于赫拉尼翁的情况，在布拉阔甫斯基1728年10月31日/11月11日给沙皇的信中，也用同样语言叙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7号。

44 $550 \text{ 卢布} + (130 \times 5) = 1,200 \text{ 卢布}$ ，再加50卢布赏金，总数是1,250

卢布。萨瓦同时通知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主教和伊尔库次克的长官伊兹玛依洛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1号。

45 布拉阔甫斯基把这个修道院弄得破产了，修道院只有四百卢布现金，其中三百就交给了布拉阔甫斯基。信末签名是：伊尔库次克主教英诺森。

一张圣礼用具清单附在信内，说明伊斯多甫尼科夫曾经赠送实物给修道院。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1号。同时参阅《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3条。

46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5号。

47 郎克1727年9月22日/10月3日以及9月26日/10月7日给萨瓦的信；第3封信是1727年10月8/19日在土拉河写的，信内说10月4/15日图理琛从库伦写信告诉他说，已经收到萨瓦的信，知悉修道院长在贝加尔湖上行船失事，图理琛催促郎克单独动身。事实上，时间紧了。郎克惋惜卡尔齐特斯基与布拉阔甫斯基之间的不和，他们俩都是郎克的朋友。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6号。

48 萨瓦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给外交部的报告，1727年10月6/17日给沙皇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

49 1728年8月6/17日萨瓦给外交部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大使有点偏向布拉阔甫斯基（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的报告）。1728年4月7/18日伊尔库次克的长官伊兹玛依洛夫写信给萨瓦，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会对自己的下属怀有恶意。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6号。

50 1728年7月15/26日，萨瓦命令三个教士和三个学生从伊尔库次克动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986—988页正面，这个日期也是布拉阔甫斯基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日期，这份日记被司祭约瑟夫偷去，于1732年8月31日/9月11日交给郎克。《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补遗》，第2卷、第831—836条。可是在他于1728年10月24日/11月4日给宗教会的报告，以及1728年10月31日/11月11日给沙皇的报告中，布拉阔甫斯基宣称是1728年7月13/24日离开伊尔库次克的。《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38—41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7号。

在上述报告中，他宣称于8月9/20日到达色楞格斯克；在一封1729年10月10/12日给萨瓦的信中却说是8月8/19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

年、第15号(亲笔信);在他的日记中却写为8月12/23日。巴赫尔慈派人向蒙古为他申请假道;1729年2月20日/3月3日他才离开色楞格斯克(据日记记载),于1729年6月3/14日到达北京(据日记记载)。可是后一个日期为好几个证明文件所否定;布拉阔甫斯基自己,在他从北京于1729年10月10/21日写给萨瓦的信中,说是1729年6月16/27日,在他1729年10月11/22日给宗教会议的报告中也是这个日期。《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1—42条;学生们于1731年1月20/31日给萨瓦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8号(原本),1731年、第4号(抄本)。

51 朴考特被选中是因为他懂得拉丁文。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萨瓦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只谈到雅布郎捷夫的伤势。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大使的公务日志里的一个注解记载伊凡·谢斯托帕洛夫·雅布郎捷夫死于1727年12月24日/1728年1月4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50—51页正面。

52 年青的特别季亚科夫只有十六岁(生于1711年),他不属于使团的一员,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去。参阅他要求到中国去的1727年9月5/16日申请书。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16号(抄本);比较上文第10章。

53 萨瓦的公务日志、第2卷、第986—988页正面;布拉阔甫斯基于1728年10月31日/11月11日给沙皇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7号;学生们于1731年1月20/31日给萨瓦的信。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8号;1731年、第4号。

54 1728年1月12/23日教堂已动工;砌墙工程可在两个月内完成;据说教堂与法国耶稣会的教堂相似,见郎克1728年3月11/22日从北京写给萨瓦的信(1728年4月12/23日于色楞格斯克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原本);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818页背面至819页正面。

55 离四夷馆和新教堂二俄里(2.134公里)。信使索洛维夫的证言。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15号;离开五俄里(5.455公里),希拉瑞·朱索夫向宗教会议的报告,1734年9月30日/10月11日。《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56—57条。

56 1731年1月20/31日他们递给萨瓦一份申请书,书内说他们有妻子儿女,地震(1730年9月19/30日)毁坏了他们的家,而他们的薪俸发放得非常不按时。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8号(原本);1731年、第4号(抄

本)。

很难确定其中一个教士的名字：费力蒙诺夫，菲里波夫。（不要把他同菲里蒙混为一人，菲里蒙是同劳伦特于1715年动身的司祭，而且据布拉阔甫斯基于1729年10月11/22日给宗教会议的报告，菲里蒙同唱诗班的安德烈·波波夫和科莱斯尼科夫一同回来。《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1—42条）。萨瓦（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986—988页正面）和布拉阔甫斯基（1728年10月31日/11月11日给沙皇的请愿书。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7号；1729年10月11/22日给宗教会议的报告。《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1—42条）称他为伊凡·费力蒙诺夫。可是他自己的签名是：让·菲里波夫，1731年1月20/31日他给萨瓦的信中就是这样签名。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8号（原本）；1731年第4号（抄本）。外交部1732年、8月31日/9月11日给宗教会议的报告中，宣布他的引渡时叫他做菲里波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2年、第3号，《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6—47条。宗教会议给外交部1732年12月4/15日通知派人代替他的报告中，也是这样叫法。《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7—48条；《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7卷、第2633号、第589—590页。

57 他拒绝从旧尼古拉教堂搬到四夷馆的新教堂里去。见布拉阔甫斯基给萨瓦的信，1729年10月10/21日于北京。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1729年、第15号。

58 费力蒙诺夫和约瑟夫曾四次谋杀修道院长。见布拉阔甫斯基于1731年1月14/25日给宗教会议的报告，1731年7月6/17日收到（通过信使索洛维夫）。《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4—45条。

59 布拉阔甫斯基给外交部的报告，1731年1月16/27日于北京，1731年6月17/28日收到（通过索洛维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8号（亲笔信，亲自签名）。同上人同日期给巴西尔·斯捷潘诺夫（外交部官员）及萨瓦的信。同上引。沃依科夫、朴考特、特列季亚科夫于1731年1月20/31日写信给萨瓦，信由索洛维夫带回来，信内说得更清楚，而且详细叙述他们通过一本辞典和千字文来学习汉语的情况，还谈到在北京的俄国人和中国人偷他们的东西。就象修道院长叙述他自己的情况一样，他们也不得不自己照管家务，这是违反郎克的命令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8号（原本）；

1731年、第4号(抄本)。1731年6月17/28日回到莫斯科的索洛维夫说他们很不服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15号。

60 这个证明是由外交部的伍长彼埃尔·索波勒夫代替托波尔斯克驻军的兵士索洛维夫签字的。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15号。

61 外交部于1732年11月13/24日收到的报告(通过索洛维夫?他于1732年2月14/25日至1732年4月6/17日回到北京,1732年10月14/25日返回圣彼得堡,见班蒂什,第194—195页)。

“俗僧伊凡……无耻地喝醉了酒……用唾沫吐我这个修道院长的脸,而且向我扔一块砖头……打中我的肩胛,使我痛苦地受了伤……在晚餐的时候,他在四夷馆用刀几乎把我砍死,割破了我的左手……使我终身残废……这个俗僧伊凡追赶我……如果他不是跌了一跤,他就可能将我剁成几块,把我,修道院长,和我的五脏六腑,都切成块,把我杀死……”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2年、第3号。亲笔写及签名的信。

62 同上引。

63 他的报告被外交部于1732年8月31日/9月11日给宗教会议的一份报告中引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2年第3号。《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6—47条。

64 1732年11月27日/12月8日收到的报告。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2年、第3号。亲笔写及签名的信。

“对华商务督办”(郎克?)给学生们的训示,日期是1732年10月11/22日,训令内劝谕他们用功读书,不要花天酒地,象他们现在所做那样,而且禁止他们进城吃饭。沃依科夫负责将巴多明神父的拉丁文—汉文辞典译成俄文。违法者将处以笞刑。《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补遗》,第2卷、第836—837条(正文)。

65 “他(塔古特,理藩院郎中)对我说……他甚至谈起这件事(关于布拉阔甫斯基的行为)都觉得害羞;因此我很容易就懂得了,如果我们找另外一个人替换这位修道院长,中国宫廷会感到非常高兴……”

郎克给女沙皇的信,1732年4月5/16日于北京,由索洛维夫于1732年10月14/25日送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2年、第7号。

66 在北京的俄罗斯人被称为“俄罗斯百人”。他们是雅克萨战俘的后代。

67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2年、第3号。

68 《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7—48条；《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7卷、第2633号、第589—590页；同时参阅1732年12月16/27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2年、第3号。

69 朱索夫1734年8月28日/9月6日向宗教会议呈交的一份申请书，宣称他于1725年5月由托波尔斯克被派到白令船长那里去，他在这次探险中几乎冻僵。1731年1月商队在托波尔斯克带走了他，他同商队从1732年3月22日/4月2日留在北京。《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54条。

70 同上引、第49—50条。

71 同上引、第50—53条。

72 1732年8月31日/9月11日，司祭约瑟夫清郎克接受布拉阔甫斯基的“日记”，这本日记是学生特列季亚科夫同罗索金作为伪善的证据交给约瑟夫的。同上引，补遗II、第831条。

布拉阔甫斯基给宗教会议的一份报告，于1732年12月3/14日收到，宣称1732年5月25日/6月5日在一次宗教游行中，教会执事劳伦特侮辱了修道院长，司祭约瑟夫喝醉了酒。同上引，第48—49条。

1733年1月16/27日的另一报告抱怨说，劳伦特虽然在中国住了十六年以上(1715+18=1733)，却不识一个中国字而且行为不检。约瑟夫偷了布拉阔甫斯基的日记本(即前述的日记)，而且想用猎棍打他。费力蒙诺夫被中国人关押了三个月，最后被驱逐出境。沃依科夫的行为使人不满。同上引第50条。

73 这件事在外交部给宗教会议的一份报告内提起，日期是1734年2月19日/3月2日。学生们不遵守纪律又酗酒，院长既不为俄国人所喜欢，又为中国人所讨厌，这是根据郎克所说。同上引，第53—54条。

74 同上引第50条。他被任命为使节修道院院长。《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8卷、第2825号、第268—269页。兼任诺夫哥罗德大主教。《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68号、第54条。

75 1734年9月16/27日以及18/29日的决定。《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55条；1734年10月1/12日的谕旨，同上引，补遗II，第838—839条(原文)；1734年11月6/17日宗教会议的决议，同上引第57至60条；《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8卷、第2839号、第299—316页。

最后一份文件范围甚广而且十分重要。它开头回顾过去，自1731年至

今,结尾以三十三条明确的训令结束。朱索夫和他的下属们应该是戒酒的模范。他们应尽力争取新教徒,对人实现信仰自由而且不要同耶稣会神父发生争执。旧帐应该清理,悬案由郎克处决。应带布拉阔甫斯基和劳伦特回国,约瑟夫如果答应不喝烈性酒可以留在北京。新教堂祝圣为遇主教堂(Rencontre du Seigneur)。遇有大节日全体都到那里去。教堂包括朱索夫修道院长,一个教士,一个司祭,两个辅祭;旧尼古拉教堂仍然保持一个教士和两个旧辅祭。院长每年薪金六百卢布,教士和司祭各二百,辅祭六十(关于最后一条,参阅《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61条)。

76 《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61条以下。

77 根据班蒂什、第242—243页。

78 布拉阔甫斯基给宗教会议的报告,1732年12月3/14日收到。他抱怨郎克滥用职权。《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8—49条。比较班蒂什,第198页。

79 根据班蒂什,第210页、注3及注4。

80 同上引,第234页。

81 参阅班蒂什(与弗洛兰斯基),第555页;梅莱蒂伊:《东正教会……》,第125页;安德烈维奇:《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413页。布罗克豪斯—埃弗龙辞典里的一条,根据佩卡尔斯基的:《帝国科学院史》(俄文),圣彼得堡,1870—1873年,4开本,2卷,以及内乌斯托洛夫:《当代俄文版本索引》(俄文),圣彼得堡,1898年,8开本写成,认为出生日期是1717年,死亡日期约在1770年。所谓1717年肯定是错误,因为1729年罗索金到达北京时,他已经不止十二岁(1717=1707?)。他的全名是赫拉瑞·卡里诺维奇·罗索金。

82 直到1861年为止。参阅阿多拉斯基前引著作,第15页。

83 同马尔唐的见解相反;参阅马尔唐著《中俄两国的冲突》,布鲁塞尔,1880年、第44页,以及阿多拉斯基前引著作、第12—14页。事实上可参阅布拉阔甫斯基的报告,他在报告内详细叙述他每月所施行的洗礼:1731年6月30日/7月11日报告,1732年11月23日/12月4日收到。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2年、第3号;给宗教会议的报告,1732年12月3/14日收到。《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10卷、第23/186号、第48—49条;同时参阅宗教会议1734年11月6/17日的决议:给新修道院长赫拉瑞·朱索夫的训令。同上引第57—60条;《俄罗斯帝国法令汇编》,第8卷、第2839号、第299—

316 页。比较以下注解。

84 在十七世纪末，西伯利亚中部和外贝加尔区建立了一些修道院，目的明确宣称是为了开发这个地区以及使非基督教徒改宗。因此 1681 年建立了色楞格河畔的圣三一修道院和使节修道院——这个名称的来由是因为一个俄国信使扎博洛特斯基被派到蒙古去，在这地方被杀死；同时派了一个十二个教士的传教团到外贝加尔区去；据梅莱蒂伊：《旧时代的宗教信件……》，《前记》，第 1—30 页；同上作者：《东正教会……》，第 7—8 页，以及《伊尔库次克教区新闻》，1874 年，第 38—41 号。

这些做法同俄中关系史只有间接关系，因此在本书内不予记述。也许这些做法比别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的事件更能引起我们对于资料来源作细心的研究与批评。

85 参阅《原始文件》。比较总主教西奥多尔的一个报告，内容说西伯利亚的异教徒改宗正教，只是希望可以不必纳贡。这一点在枢密院 1726 年 3 月 26 日/4 月 6 日的训令里再度提到。《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 7 卷、第 4860 号、第 595—596 页。

86 “我听说有些穷苦的人从阿玉气汗那里逃到沙皇俄国的城市里，而且接受了洗礼；我，我害怕这件事；甚至应该为这件事派去一位使节”。

瑯台吉亲自对车瑞多夫 1720 年 11 月 24 日/12 月 5 日的谈话。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准噶尔事务、1719 年 6 月 28 日/7 月 9 日第 24 条。同时参阅第 25 条。

87 1724 年 4 月 19/30 日沙皇亲自签署的谕旨。《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 7 卷、第 4492 号、第 278 页；1724 年 6 月 15/26 日由宗教会议传达到小俄罗斯和西伯利亚。《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 4 章、第 1321 号、第 149—150 页。比较梅莱蒂伊在《伊尔库次克教区新闻》之著作，1874 年、第 39 号、第 519 页。

教会执事尼科代姆·兰凯维奇谈他到阿斯特拉罕感化喀尔木克人改宗正教的业绩。参阅 1729 年 4 月 25 日/5 月 6 日于《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法令汇编》，第 6 卷、第 2214 号、第 313—314 页；1732 年于《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第 10 卷、第 347/185 号、第 582—584 条，以及卷末所附改宗正教人名一览表。

1700 年 6 月 18/29 日彼得大帝给基辅总主教的一道谕旨，命令他找寻两三个年青僧人学习汉语和蒙语，以便将来能够感化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改宗

正教。《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1800条、第60页。

88 1728年6月30日/7月11日。给边境巡视员的训令。

“向忠诚的(纳贡)外国人宣告……不要接待边界那边的外国喇嘛，也不要让他们从帐篷旁边经过，只接待那些经过划界后仍留在俄国境内的喇嘛。”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897页背面，898页正面，908页背面，909页正面。

89 尤其是在1686年的基兰·布迟尔的议会上。参阅波兹尼叶夫：《蒙古与蒙古人》(俄文)，圣彼得堡1896—1898年、8开本、2卷，第1卷、第498—499页；同上作者：《题为额尔德尼·额尔罕的蒙古编年史》，(俄文)，圣彼得堡、1883年、8开本、第54—74页，第275—366页。

90 同上引，同上引。

91 司当东：《异域录》，伦敦、1821年、8开本，第10章各处。

92 参阅阿米奥：《土尔扈特人迁移史料》，载：《关于……中国历史的回忆录》，第1卷，巴黎1776年、4开本、第401—418页。

结 论

中国和俄国在十七世纪末叶的竞争表现为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流血斗争。在十八世纪开始时，两个帝国互相和解，缔结了一个基础非常好因而延续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和约。它们之间以何种妥协解决了使它们不和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宗教方面的各种问题呢？它们之间哪一个利益最多呢？这种利益是真正的和牢固的吗？

如果说俄国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增加了它与中国的接触，这主要是需要取得经济上的谅解而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俄国的远东计划上，它始终把商业利益放在重要地位。俄国1689年在尼布楚所以肯让步就是为了商业的缘故，1728年俄国大使受命签订恰克图条约也是为了商业上的变动；在这期间，商人伊兹勃兰德·义杰斯被派到中国来调查北京的市场情况（1692—1695）；1719年伊兹玛依洛夫的任务则是签订一个商约和请求在北京设置一个商业事务官。柯罗文·费要多罗和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两个大使的出使、许多使臣的使华以及俄国全部外交上的努力，都以商业为目标。商业关系是俄国与中国交往的基础和理由。

俄国政府既然认为对华贸易是主要的，这一商业并没有多久便被政府垄断。由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是由国家正式承担组织赴华的商队，同时它宣称只有它可以独揽这种权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把最有利可图的商品都留归自己经营，它的劲敌即私商们，如进行非法贸易，则予以严酷的惩罚，就是地位最高的官员们也免不了。这一体制实行了二十五年之后，彼得大帝死了，各

方面的资料都一致证明政府贸易已经完全失败。非法的竞争毁灭了政府的商队，在蒙古库伦的秘密贸易则致俄国在北京的贸易于死命。国家受到欺骗，遭到盗窃，感到无能为力，只得被迫让步；它允许了某种程度的商业自由，但在完全放弃它的垄断以前，想借着减少到北京去的商队的次数和把市场由库伦移到恰克图来作最后的挣扎。这也没有用。恰克图象库伦一样，最后压倒了北京。政府又派了几次商队以后，承认失败，放弃了官方商队，从这场斗争中撤退出来。

俄国派遣商队间隔越来越久，以及在中俄边界上建立贸易市场，都是替中国作了它想作的事，因为中国总是想使蛮夷离开它的首都和领土。可是在中国的心目中，这只是次要的事。它在中亚细亚的政治影响，才是最主要的事。在1730年之际，它已经战胜了，或即将战胜它所有的敌手。在十七世纪末叶它在北方和西方有四个敌手，其中两个是强大的，两个是弱小的：强大的是俄国人和厄鲁特人；弱小的是蒙古人和土扈特人。中国对于厄鲁特人最感到麻烦，实际上他们是最可怕的敌手。厄鲁特人和中国人一样，是佛教徒，勇敢好战，精于政治权术，他们对中国的威胁不仅在于支持中国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劲敌，以破坏政治上的均势，而且还在于在中亚细亚各民族如不花刺人、西藏人、土尔扈特人和蒙古人之间展开权力争夺战时，甚至可能取中国的地位而代之。如果厄鲁特人与俄国联盟，对于中国的安全就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对于中国来说，用外交手段或武力解决关系到帝国的完整。佛教僧侣过去所作的各种和解的尝试远远没有获得成功，有反过来不利于中国的危险，因为喀尔木克人自命为喇嘛教的保护者了。最后中国不得不诉诸武力。开头中国获得了胜利，但不久它就看出在一个新的喀尔木克首领的领导下又开始成立一个反对中国的新的总联盟。必须用一切代价来破坏这一联盟。这时西藏人已经被臣服，

哈密地区的各民族也接受了中国的援助，为了制服厄鲁特人，就必须获得俄国的帮助。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肯对俄国表示和解，最后终于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的原因。那个条约从领土观点来看，显然对中国不利。但一旦凭借和约取得了俄国的中立以后，中国就不再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它集中全力来对付那个永远采取攻势的厄鲁特人了。中国在1730年还没有来得及消灭厄鲁特人，但它的政策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至于土尔扈特人和蒙古人则是中国设法控制的两个民族，蒙古人在十七世纪末叶自己接受了中国的统治。中国只须借着佛教僧侣的强有力的影响，借着以中国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办法，借着从经济上奴役蒙古人的方法，就可收到巧妙的同化的效果。但是土尔扈特人已经由准噶尔迁徙到伏尔加河口，离中国太远，不可能用同样方式去驯服他们。因此，首先要诱导他们回到故土来。中国当然不会不这样做，而且它非常满意地获知条件是有利于它推行这一政策的。中国于1712至1715年间派往土尔扈特人那里去的使团，虽然没有得到直接的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却为1771年土尔扈特人的大迁徙铺平了道路。

在1730年时，喀尔木克人陷于孤立，土尔扈特人对中国怀有好感，蒙古人已是臣服了，中国可以说是控制了介于它和俄国之间的所有民族。同时，借助于尼布楚条约，它已经遏止俄国进逼黑龙江流域；借助于恰克图条约，它又使俄国人远离北京，并且用条约阻止俄国进展，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也战胜了俄国。只有厄鲁特人能危及中国在中亚细亚的霸权，而厄鲁特人也即将接受中国宗主权的重负。总之，中国的政策是完全成功了。

这只是表面上的情况，还应该仔细研究事实。固然，在1730年时，看来是中国似乎从政治局势中得到了全部好处。可是俄国也并不是没有得到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虽然不太显著和不太直接，

但可能更有深远意义和更加持久。

首先，虽然俄国政府未能与中国建立官方贸易，但与它竞争的私商却是比较幸运的。国家失败了，私商却胜利了。正是由于私商的活动，才使政府派商队到北京成为无益之举；也正是为了私商，恰克图条约才规定在两国边界上建立市场。其中一个市场，即靠近尼布楚和满洲的粗鲁海图，后来却没有多少人前去；可是另一个市场恰克图，却是重要的蒙古通路的起点，它很快就变得非常重要，以致经历了两个世纪和西伯利亚最近的变化，也没有受到影响。俄国的官方商人虽然未能在北京出售他们的货物，也许政府因此而受到损失；可是私商们，也就是人民大众，却的确是获得了利益。

俄国完全取得了有关它的劲敌中国的直接知识。中国方面除了在1712至1715年间越过西伯利亚访问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人的图理琛使臣作过深入观察以外，可以说中国在与俄国不断接触的四十年间，对于俄国什么也不知道。俄国则相反，从个人的经验中取得了关于中国地理、商业和政治各方面的宝贵情报。远在1676年尼果赖就指出取道西伯利亚有三条道路可以进入中国，一条是经由额尔齐斯河，一条是经蒙古，一条是经满洲。俄国由它历次赴华商队的经验得知第三条路线太长，因而放弃；对于第一条，虽然中国一再怂恿采取，由于容易受到喀尔木克人的袭击，俄国人也拒不采用；俄国人很快就选中了那条由库伦到北京的最直接的路线。尽管中国设下重重障碍，俄国赴华的十二次商队，它的各个商务官和四次外交使团，总能不断地带回有关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精确情报。1727年至1728年间俄国派赴中国的才智卓越的外交代表务拉的思拉维赤，甚至在那个时候就看出了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各种弱点，看出这个国家很愿意通商而不愿意战争，它受着异族王朝统治，并且由于使用陈旧过时的武器而防御力量很

差。这些情报并不是没有用处的：十八世纪没有利用，十九世纪就利用它们了。

这些情报对于俄国虽然非常有用，但是它们得来的过程是缓慢而间接的。一部分情报是由耶稣会教士供给他们的俄国朋友的。俄国若能直接询问中国人自己，或是通过中国的出版物来取得它在外交和政治上所需要的资料，不是更好些吗？如果这样是可能的话，俄国就同时还能避免耶稣会教士的居间服务，因为他们的好意和势力有改变的可能。因此俄国首先在西伯利亚开办了一间蒙文学校，然后在北京借着建立永久性正教教会的机会，开办了一所真正的东方语言神学院。这所神学院要用来取代耶稣会教士和拉丁文，所以带有外交的性质，这种性质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它因此成为满文、蒙文和汉文译员的培养所，这些译员不仅能很好为俄国服务，并且对于东方学和一般科学都有贡献。

这样，在1730年间，俄国与中国交往以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俄国对华商务仍是半官方和半私商性的；官方商队仍然保持，可是允许私商在恰克图进行贸易；政府还保留几项专利权，不过大多数是取消了。可是国家商业被私商竞争威胁得那么厉害，以致不久就消灭了。中国吞并了蒙古，争取了土尔扈特人；剩下来就是要消灭喀尔木克人，这事不到三十年就实现了。不过土尔扈特人还没有回到中华帝国里来，还要四十年才能实现。所有这些变化是由渐变的过程来的，这个渐变自十七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四十、五十年代曾经使俄国官方商业破产，中国政策得到胜利。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和俄国的各种计划都未能实现，但这一历史时期使得一种很重要的变动成为可能：这就是两国之间的中间媒介完全消灭。从商业方面看，政府希望代替私商的地位，可是失败了，俄中两国商人得以直接接触。从外交方面看，拉丁文

被搁置一边，东方的语言被使用，耶稣会教士也完全丧失了他们过去作为必备的译员和中间人的重要地位。最后从政治方面看，成为俄中两国之间的中隔屏障的几个民族，都被中国吸收过去，使得这两个帝国面对面地相遇了。十九世纪将决定两个帝国中哪一个可以得到领土扩张的胜利，二十世纪将显示出谁占经济优势。俄国方面的商务观点，中国方面的政治观点，最终将混合而溶化在一起；有了经济的联系才能保证中亚细亚的征服。经过1689年尼布楚条约至1728年恰克图条约这四十年间的工作，才消除了中俄两国在商业上、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中间媒介，把问题简单化，为着将来的进展作了准备。

原始文件*

注：这里转载的原始文件中的标题是摘要发表的。

致柯罗文·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的训令

训令……1686年……

……应以黑龙江为界……。因为黑龙江源远流长，且一向被用为沙皇陛下和至尊的可汗的疆界。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9章，第62页正面、259—260正面页。

若因都统(中国可汗军队的长官)认为，由于黑龙江流经清帝国的城市和领土，而且流入清帝国的领海，不能以黑龙江为国界……最后的让步……应将国界定在流入黑龙江的比斯特拉河或结雅河。

同上书，第87页正面、265页背面、361页正面、673页正面。

若再不能获得此项结果，最后的定约即以雅克萨为界，但须包括黑龙江及上述比斯特拉河与结雅河沿岸全部渔猎场在内。

同上书，第87页背面、361页背面、673页正面。

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关于作战的行动)。

同上书，第88页。

……上述根忒木耳自请归顺，并改信东正教，现已去世。其子及其他亲属，亦多接受洗礼，信仰东正教。既有同教之谊，在沙皇陛下也不拟将其遣送

* 《原始文件》是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编者

回去。

同上书，第 64 页背面、261—262 页。

……至尊的博克达汗……遣使觐见沙皇陛下，其所携赠礼，不宜来自域外，应系可汗帝国境内所产。

沙皇陛下帝国所珍视的礼物为宝石、银子、丝绒制品、中国缎和香料等。

沙皇陛下得悉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银子，商人熔炼银子，而且炼出没有杂质的纯银。沙皇陛下希望至尊的可汗命令其治下商人向沙皇陛下的帝国输出一千、二千、三千或更多普特的银子……，可由商人随同可汗使节携来，或不须随同使节而由商人自行运来一直送至伟大的京城莫斯科。在莫斯科，即由沙皇陛下的财政部以市价收购，沙皇的臣僚亦将以自由商定的价格购买银子，或以商品进行交换。

同上书，第 79—80 页。

使节……须了解，清帝国是否出产白绸和黄绸，如果中国每年出产很多普特……使节应向中国可汗的军事长官都统要求，中国人每年向俄罗斯帝国大量输出此种绸缎，并且同俄国商品进行交换。在沙皇陛下的伟大京城莫斯科，此种生丝绸的市价是每“烈日耶”(lájéi)普特为三十五卢布，每“阿尔达什”(ardach)普特为三十卢布。

同上书，第 82 页。

……应查明由清帝国经鄂毕河、叶尼塞河、色楞格河或额尔齐斯河等河流到达沙皇陛下辖境各城市的便利航道；并于查明后即于公务日志中列载地名及地图。

同上书，第 81 页。

所有商人，无论从沙皇陛下的帝国至至尊的博克达汗的帝国及其京城汗八里^①；或由至尊的博克达汗的帝国至沙皇陛下的帝国，至西伯利亚和大俄罗斯，及其京城莫斯科，均可自由通行。双方免除捐税，并可自由租用运输工具。另由两大帝国规定，互免关税；但商人等不得携带烟草或其他违禁商品。

① 释义为可汗之城，亦即帝都，此处系指北京。见《元史》。——译者

同上书,第 114 页背面、115 正面页。

致柯罗文·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的训令

谕旨。

杜马主席西奥多尔·列昂捷维奇·沙克洛维奇签字的各项文件。1687 年 6 月 14 日。

3

从今以后,必须撤除雅克萨地方的设防要塞,并撤退其居民。无论是沙皇陛下方面,或是至尊的可汗方面,双方都不应驻扎军队,应拆毁现有的防御工事,撤出军队……。但是,属于沙皇陛下方面的应缴纳毛皮税的商人和臣民,应在雅克萨及其附近地区各安所业。

4

倘因迫于当时情况,不能达到此项目的,应即设法行文促使对方同意将此事延至另一适当时机,即沙皇陛下和至尊的可汗双方同意互派使节会谈时,再图取得协议。

在此期间,直至正式条约签订之前,双方臣民均可仍在上述地区,各安所业。

5

若对方尚无显著的敌对行动和突然的攻击,切勿引起战争或发生流血事件。

7

上开机密文件应自行保管,切勿泄露,并不得使任何人知其内情。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 10 章,第 246 正面—252 页正面。

1689 年耶稣会教士在尼布楚的作用

……在此次谈判中,沙皇陛下的使团见到耶稣会教士煽起各种对抗的意见,并阻止中国使臣表示接受永久和约的意愿,因而命令安德列·贝洛波茨基与耶稣会教士进行秘密谈判,并允许给以沙皇陛下的恩典和赏赐,但必须

以他们支持沙皇陛下使团的和平意愿为条件。耶稣会教士们答称：他们理解到沙皇陛下的恩典，希望沙皇陛下在这方面一切顺利；但是他们不可能因此派人向沙皇陛下使节面陈一切。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0章，第999页。

8月15日。

安德列·贝洛波茨基奉大使命……密告耶稣会教士：由于他们的忠诚，耶稣会教士们将一定能得到沙皇陛下的恩典。

……当沙皇陛下的全权使团同耶稣会教士进行谈判时，耶稣会教士们对划定国境线一事极表反对。并且他们一直不让扎鲁厄赤^①及其他委员通过蒙古翻译与全权使团谈话；而且扎鲁厄赤对各项问题表示歉意避不作答，他借口奉命只许谈耶稣会教士所谈过的事情，并不敢用蒙古语在他们面前谈话。

……在派遣安德列·贝洛波茨基及录事^②西梅翁·瓦西里科夫前往时一并发出的交换函件中告知耶稣会教士：信中已经写有在雅克萨不得有至尊的博克达汗方面的任何防御工事；并请耶稣会教士们根据这些指示在他们的交换函件中就这样写上，不必通知使团，因为，谁也不会知道他们在这函件中用拉丁文写些什么。

耶稣会教士们说他们决不能照此行事，而且他们在这件事上不愿辜负中国可汗所寄予的信任。

1689年8月27日(公元9月6日)。

耶稣会教士秘密地交给安德列·贝洛波茨基一封函件……。信上写道：……让使团给他们送去礼物……，西伯利亚黑貂皮……白鼬皮……玄狐皮、帽子和上等酒。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0章，第1108页。

^① 审判官，边防官。“他们有秘书官或审判官的级别”。《莫斯科外交部档案》，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公务日志，第1卷第150页正面，第2卷第917页正面；满洲都统、仲裁人。克拉普罗特(J.)著，《亚洲回忆录》，巴黎版，第1卷，1824年，8开本，第67页。——原注

此处扎鲁厄赤当指参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都统佟国纲。——译者

^② 十六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国家中管理机要的低级官吏，在秘书的指挥下工作。——译者

第二章 对中国进行贸易的一般规定

1698年11月12日。

沙皇签字的谕旨。

凡未经取得护照的商人……，应按规定向其征收一卢布的验印税。在一年后，甚至并无此种护照，让他们同商队一起也可予以放行……。同样，当他们将全部中国商品售出后，仍须按照规定在尼布楚向其征收什一税，以后即允其携带商品横跨西伯利亚，经过俄罗斯（欧洲部分）各城市，无须再纳关税……。

第一条 征收……什一税，其不足十数定额时亦按十征税……，按照价格征收现金什一税……。

维尔浩土尔城关税当局须将签证连同盖有维尔浩土尔城印记的文件节本交给商人；并应注意此项签证文件须与帐簿所载内容相符，包括年月日、商人姓名、商品和征税额。

为便于具报，每届春季当商队离开维尔浩土尔城后，该城关税当局应将每个商人携往西伯利亚各城市和中国商品、现金和货物数量按详细清单载入登记簿并予签字，再将清单邮寄尼布楚……。

维尔浩土尔、托波尔斯克和尼布楚的关税当局应按年两次或三次及时将所经驿站、运往目的地、数量、购货人姓名、征税额各项向莫斯科提出报告。

第三条 商人若将其在西伯利亚所购商品就地携往中国……，应在其以现金购买商品并按每卢布征税十“兼卡”^①后，发给一份正式验单副本；在尼布楚，再按每卢布征收过境税十“兼卡”，以便同其他商人一样不再缴纳什一税……。

凡未持有西伯利亚部所发通行证件而携带商品到达维尔浩土尔和尼布楚的商人，应按人征收一卢布人头税作为验印费并掣给收据后……，即予放行……因西伯利亚和沿海城市的居民（指欧洲俄罗斯东北部各政区所辖）若只为申请通行证而远来莫斯科，路程确属遥远，且所费不资……。不过，莫斯科居民及其邻近城市的“葛斯奇”和“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的会员、各种商人，他们和过去一样，都应有西伯利亚部的通行证……。

^① 半戈比钱币名，十四至十八世纪俄国的辅币，从十七世纪起，除银币外，还铸造半戈比的铜币。——译者

第四条 应比照商品价格征收什一税，对上等商品征收上等的什一税，对中等和下等的商品征收中等和下等的什一税；但不得对上等商品征收下等的什一税，也不得对下等商品征收上等的什一税……。

若关税当局报明并未以证明书发给某商人，或其所发证明书与商人呈验的证件不符，应候商人从中国回来后加以审问。若显系……为逃税而伪造证件，应即将该犯商品和所有财产没收缴归财政部，并按照违法情节给予适当的处罚……。若日后该奸商又来西伯利亚各城市，不得听其再去中国经商，并须将其逐出西伯利亚……。对于此等商品，因为舞弊情事，应科以每卢布征收二“格利弗尼克”^①（百分之二十）的罚金，然后允其运往中国销售……。

关税当局应宣布，若在维尔浩土尔和尼布楚发现帐簿和证明文件有不符之处，企图逃避关税、磨损或涂改证件或其他作伪行为，罪犯须受鞭笞的刑罚，其财产没收缴归财政部，并将罪犯流充苦役。

第五条 不许任何人向中国出口玄狐皮和金“爱芬姆基”（éfimki，即albertusthaler，金质货币）。

……在旅途中可携带枪支，以便对草原各部落加以防范，但不得作为商品出售。

第六条 不得经年不断听任商队前往中国……，以免在中国的俄国商品数量激增，贬低价格……。每两年一次，从莫斯科和尼布楚派遣商人与财政部人员……同中国进行贸易，使仍有利于陛下的财政和全俄罗斯人民。

第七条 当陛下的商人与财政部人员随同商队出发，或当未随有陛下的商人的商队从中国来尼布楚时……，应向其征收足十数中的什一税，对于不足十数的按每卢布课以三“阿尔腾”^②二“兼卡”的税率征收现金税款……，并给以一份记载详细明确的收据，不得照旧笼统开列……。

如果有人愿意至西伯利亚出售或交换中国商品……，对以现金购货的商人按每卢布征税十“兼卡”，对不以现金购货的，应征收三“阿尔腾”又二“兼卡”……，并于纳税后发给明确的收据……。在其他地方，当交验收据时，应予以登记，并换发本城收据……。

在尼布楚，如发现随身私藏黄金时，应将其没收缴归财政部，作为什一税及其他关税的收入；若尚有余数，即按尼布楚的商品价格支付上等品质的

① 俄国十戈比银质辅币，彼得一世时初次发行。——译者

② 阿尔腾，古罗斯金质货币，从蒙古语释义为金，价值为三戈比。——译者

纯金，上等纯金每左洛特尼克^①值一卢布五阿尔腾，中等的值一卢布十“兼卡”……。将黄金交给鉴定人，以防黄金掺入锡、铜、银，或在其中溶有杂质。

第八条 若有长官^②或文官到达维尔浩土尔……，若携有少量中国商品，应征收什一税，然后听其前往俄罗斯（欧洲）诸城市。

……若有商人和士兵将从色楞格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库兹涅次克和塔拉去中国，或到蒙古和喀尔木克的营地，应对所携俄国商品征收什一税；同样，如系从上述各地前来，则对所携外国商品征收什一税。

若将中国烟砖携至尼布楚，应即报税；先征什一税；其余由财政部按低价收为关税商品，即按照中国和尼布楚的价格付款，每斤为二“阿尔腾”或二“阿尔腾”又二“兼卡”……。商人不得将烟砖转售他人，只能售给财政部……；若将烟砖私售或隐藏，应即科以罚金，并宣告没收。即按照以前谕旨将中国烟砖存入国库供外国人使用，并用以交换貂皮、骆驼和马匹……。

第十条 所有西伯利亚、俄罗斯或外国商人……携有黑貂皮及其他兽皮和商品，均须依照命令将黑貂——貂腹皮、貂尾、反面用的、夹里用的——珍贵的玄狐、大黄和中国烟砖等物交给长官和关税当局；作为交换，应按官价付款或给以财政部所有的商品……，以免隐藏此种违禁商品。若有人秘密出售此种商品，应即将其没收，缴归财政部；并对经纪人和此等商人科以罚金，罚款额应相当于违禁商品的购价或售价的卢布数额，以便制止此类活动。

第十二条 凡系喀尔木克和蒙古地区各台吉派来的使节，且按以前惯例，如有不花刺人同来，自称系台吉所派或系台吉治下喀尔木克人和蒙古人，并携有各种商品……，应在各城市予以接待，将所携函件译出，并转送托波尔斯克……，应认真细致地检查其商品，征收什一税，并发给收据……。

当不花刺人在西伯利亚各城市出售所携商品并购买俄国商品时，应根据正确估价，对后一商品征收现金什一税；若无现金，则按每卢布征收十“兼卡”的税，并将商品放行，免与帝国所施恩惠相抵触，也不致使此等喀尔木克人和不花刺人的各台吉心怀不满。

上述使节若系阿尔塔布坦的喀尔木克人的拜台吉所属若干著名台吉等所派遣，而且他们效忠陛下，卓著功勋……，因而，直至颁布新命以前，对这些

① 俄国旧重量单位，等于1/90俄斤，又等于4.266克。——译者

② 斯拉夫的军队将领。另为十六世纪俄罗斯国家所设市长官职，兼管城市的军事与民政，直至1775年废止。——译者

不花刺人不应征税……。

除非有从莫斯科发出的正式命令许可某人通过外，绝不准以任何借口从西伯利亚携走黄金、银子、火药、铅、炮、炮弹、火绳、滑膛枪和轻火枪，并不准携走在军事行动中所用的任何武器。

如果发现不花刺人携有大黄时，应以每普特不超过四、五、六卢布的价格收购，并缴归财政部；此等大黄并不得私自出售，应按照税关的规定价格向其收购。

若经检查发现彼等携有中国烟砖时，不应无偿加以没收，必须给以较低价格，每斤二“阿尔腾”或二“阿尔腾”又二“兼卡”……。如果他们私自出售大黄或中国烟砖，一经查觉，应予以没收，缴归财政部，因此类商品一向是被禁止的；……。

在价格较高的地方，得将积存财政部的中国烟砖的一小部以有利的价格交由专人出卖或交换。

第二十一条 陛下命令在托波尔斯克、维尔浩土尔和尼布楚各市场用石材建筑仓库……。特别在维尔浩土尔，人们就地聚居过冬，以待来春航行；又在尼布楚，中国的出口给财政部运来了大批商品；在用石砌的建筑物中……，这些商品可以保存完整无损。

第二十二条 凡从西伯利亚往返中国经商和住居在西伯利亚各城市经商的人，都非常需要写信回家将各种情形和需要告知家属。遵照陛下的命令，为了陛下迫切要务，从莫斯科至西伯利亚各城市，直至雅库次克和尼布楚，并由原程返回莫斯科，原建有一个特别驿站系统，在夏季各月份转递三次……，在上述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商人得以自由通过以上驿站和家中通信，给店东去信，店东照样可以来信。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491—517页，第1654条。

关于对中国进行私人贸易的规定

大帝、沙皇兼大公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全俄罗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君主，晓谕西伯利亚叶尼塞斯克的司宾^①和长官波格丹·丹尼洛维奇·格鲁埃波夫和录事伊凡·波利索夫。

^① 司宾，十三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宫廷官名，最初的职务是服侍君主就餐——上菜、斟酒（因此又称为“斟酒人”）。通常是贵族后裔获得司宾的称号。在十六世纪，司宾与大贵族一起参加贵族社马。——译者

前于199年(公元1690—1691年)获悉俄罗斯(欧洲)及西伯利亚诸城市各色人等及大批商品,未经朕命与西伯利亚部发给证明即进入中国,实有碍于对中国进行贸易,并酿成许多纠纷;经于同年由朕决定发给信件,业经令行西伯利亚各城市,旨在取缔此种非法活动。兹下令:无论为何种事务,一概禁止同中国发生纠葛,禁止从叶尼塞斯克派遣或听任携带任何商品之各色商人及过路人出境,不准发给任何通行证件。务将此令在叶尼塞斯克市政府存案,俾其他长官和文职官员日后有所遵循,并颁行各要塞、自由村和冬居地各代表,务使各有一份符合此令内容之备忘录,以便在公布此令后,不再有人在未经获得朕所发给之证明文件时为任何私人事务擅自携带商品前往中国。嗣后不论何人,若仍携带任何商品前往中国,则应毫不姑息,处以死刑。在接获此令时,其各凛遵毋违。若系朕授命派往中国,亦必须有正式谕旨,不得以任何国务为借口而贸然派遣。仰即将办理情形随时上奏,并向西伯利亚部,向玛特维·彼得洛维奇·噶噶林亲王及其助理人员具报。

莫斯科,1706年1月28日。

命令原件由秘书阿法纳西·格拉西莫夫逐页签字为证,并由雅可夫·谢特尼可夫校讫。

图曼斯基:《文集》,第1卷,第2部,第296—298页。

关于英国烟草的命令

1698年7月11日。

由沙皇签字的谕旨。

从1698年9月1日至1699年9月1日,在莫斯科,在诸城市和各县^①,对于烟草征收现金税款一事,确未实施。除在契尔克斯克以外,在莫斯科,在诸城市及各县,英王陛下臣僚贝雷格林纳,即侯爵冯·卡马尔森(·奥斯本(托马斯爵士),卡马尔森侯爵,贝雷格林纳似系其子教名),及其代理人或经纪人,将贩卖烟草,并供应吸用此种烟草的德国烟斗、烟盒及其他适于吸用此种烟草的零星物件。此外,任何人不得贩卖烟草,不得将烟草和烟斗交与任何人。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衙门”^②即将此项命令颁发所有各城市。

^① 语源出自古突厥,原义为帐幕聚落或部落。古罗斯亦用作行政区划的通称(Уезд),相当于县,为行政、司法和财政的单位。——译者

^② “衙门”(Prikaz)是十八世纪的“院”和十九世纪的“部”的前身。“普列奥布拉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3卷，第457页，第1637号。

大帝、沙皇陛下兼大公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全俄罗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君主晓谕西伯利亚叶尼塞斯克的司宾和长官波格丹·丹尼诺维奇·格鲁埃波夫和录事阿列克西·普斯托波罗多夫。

前在1697—1698年，经由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衙门致西伯利亚部的谕旨规定：依照我沙皇陛下全权使团的协议，英王臣子冯卡尔·马尔顿（冯·卡马尔森，卡马尔森侯爵）的经纪人将在莫斯科及其他地方——我沙皇陛下辖境——贩卖烟草，但不得在契尔克斯克诸城市出售。此等外侨现要求在西伯利亚诸城市对前来经商的不花刺人及其他外国人交易；并向陛下的藩属及其他人等交换皮货。除被称作“内戈西安”（尼古丁烟）的德国烟草外，并以中国烟砖进行交换。向西伯利亚部询问诸城市士兵及曾游历西伯利亚诸城市的烟草商人费多尔·莱伊林，据告称：在西伯利亚诸城市，若准许以黑貂及其他皮货向外国商人交换中国烟砖，则此诸朝贡臣民将全因吸烟（中国烟砖）而倾家荡产，势必稽延缴纳毛皮税款。因为他们将会售出黑貂及其他一切毛皮来吸用中国烟砖，并将借口不再经营貂皮及其他毛皮，甚至推托无兽可捕，以逃避缴纳毛皮税款。仰于令到以后，着叶尼塞斯克市政府向叶尼塞斯克贵族子弟、士兵及了解情况的其他各色人等正式询问：在西伯利亚诸城市，若听任上述外侨（英国人）向前来西伯利亚诸城市的外国人（不花刺人及其他人等）购买中国烟砖，又向此诸朝贡臣民交换黑貂及其他毛皮，或以中国烟砖换取现金，则于朕所有的毛皮税的征收事宜是否有损失、稽延或其他各种混乱情事？并应向被任用为毛皮税征收者的叶尼塞斯克辖境各地士兵询问有关情况，并将其亲笔签字的呈文寄来莫斯科，向朕奏明；同时抄送西伯利亚部，交与杜马秘书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阿斯及其助理人员。

仁斯基衙门”（逐字译是，“主易圣容衙门”），出于以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命名的一个村庄和一个团。此事出现于十七世纪末叶，将近1694年的时代。该衙门最初负责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的管理工作，后来，负责管理烟税，从十八世纪初叶起，该衙门处理政治犯的事务。该衙门的首脑是费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亲王（彼得一世的亲信之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秘密警察机关）的主持者。——译者）。1729年，罗莫达诺夫斯基退休后，该衙门就并入圣彼得堡的政治警察机关。

参阅朱留可夫：《十八世纪前二十五年俄罗斯国家组织及彼得大帝的改革》，圣彼得堡版，1905年，第8节，第105—106页。——原注

莫斯科,1700年9月30日。

命令原件由秘书伊凡·车培列夫签署,由彼特罗施科(彼罗特)副署为证。

《叶尼塞斯克札记》,第4卷,第261条,载于《西伯利亚历史记载》,第1卷,第18节,第88—89页。

沙皇陛下兼大公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全俄罗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君主晓谕西伯利亚叶尼塞斯克的司宾和长官波格丹·丹尼诺维奇·格鲁埃波夫和录事普斯托波罗多夫。

前在1697—1698年,经由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衙门致西伯利亚部的谕旨规定:依照沙皇陛下全权使团的协议,明文规定……(同英国签订的条约的摘要,1698年4月26日)。

在1698—1699年,根据朕的谕旨,西伯利亚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用二千四百六十卢布二十一“阿尔腾”二“兼卡”向侯爵(卡马尔森爵士)的经纪人英国人查理·古德菲罗购买四十桶“内戈西安”烟草(尼古丁)合重四百四十七普特十六斤(七千三百二十八公斤四百零四克)。业将此种烟草令发西伯利亚诸城市低利售与爱好者,并预行禁止将此种烟草运往朝贡臣民所居各乡。在叶尼塞斯克尚余有此种烟草三桶。1700年7月某日,在武备殿①(莫斯科武备殿)致西伯利亚部的直接命令中写道:“据英国领事查理·古德菲罗致武备殿的来函称:从4月16日(1698年)以来,共输出三千桶烟草,每桶五百斤。这批烟草前曾缴纳六万卢布现金作为关税。其中二万八千八百卢布已在伦敦支付,尚欠三万一千二百卢布,因所售烟草甚至不足此数,无力支付。在条约中虽有此规定,但任何商人均不准去西伯利亚诸城市销售烟草,以致烟草贸易受到巨大损失。他要求派人在西伯利亚诸城市贩卖烟草。他曾听说:西伯利亚诸城市居民吸②(用水烟袋吸烟)中国出口的烟砖,英国烟草的零售势将微不足道。他要求象买卖英国烟草那样买卖此种烟砖,并请免除购买烟砖

① 建于十六世纪初叶,当时是武器库,其性质近似元代之武备院。武备殿中附设有沙皇绘画室、铸造室、珐琅制作室、刺绣室等等。它们是俄国装饰艺术的中心和培养人才的场所。1720年和1727年,沙皇命令将武备殿与克里姆林宫中沙皇的其他保管室合并,自此以后,武备殿就成为历史和艺术纪念品的统一保管室。——译者

② 原文用的是“喝”字。——译者

的关税。”

朕通过签发的谕旨，曾谕知查理·古德菲罗派人至西伯利亚诸城市出售英国烟草，并以英国烟草换取商品，但此类商品中不包括为我们陛下所需而收购的黑貂、玄狐和头等黑褐色狐皮。

1700年12月30日，朕经由武备殿致西伯利亚部的谕旨中写道：“据查理·古德菲罗在11月8日致武备殿函称：通过派往乌法及其他城市贩卖烟草的外国人得知，在托波尔斯克各县及西伯利亚其他诸城市中，在乌法县的边境、伊尔比特（自由村）、萨拉里姆斯克、巴格拉特斯克、科尔切丹、卡泰斯克和楚姆里亚克，人们从西伯利亚携来大批烟砖，且在乌法等县及其他诸城市中以每斤以下为一个‘银角’^①（二十戈比）作价公开出售，从而使英国烟草的出售大受妨碍。他要求我们陛下准许其经纪人在西伯利亚诸城市的县和各自由村中，如伊尔比特、萨拉里姆斯克、巴格拉特斯克、科尔切丹、卡泰斯克及楚姆里亚克等地，自由贩卖英国烟草，并要求取缔出售烟砖；一经发现烟砖，应即予以没收；若当地居民不买英国烟草，应听任英国人自由交换商品和买卖此种烟砖，并以诸城市作为代理财政部进行没收的单位。另应为他们派遣必要数量的士兵，以便及时通过并运抵各处。”

……在1701年1月29日，朕曾谕知……英王领事查理·古德菲罗及其经纪人……，在西伯利亚诸城市，在各个要塞、自由村和朝贡臣民的帐幕聚落（乌鲁斯^②），贩卖称为“内戈西安”的烟草，听其及时转运西伯利亚诸城市出售〔此种烟草〕……。他可以自由出售英国烟草，并用以交换各种商品，但其中不包括貂皮、玄狐皮、黑褐色狐皮和大黄。在西伯利亚，任何人不得用中国烟砖妨碍查理出售烟草。若其经纪人得知其人存有烟砖，即可予以没收，并将其半数缴归我们主上，其余一半则归查理；原缴归我们主上的一半也将交给查理，并按当地当日价格向其收取现金，缴归财政部。查理亦可在各城市、自由村和县向俄国人自由出售这些烟砖，并在朝贡臣民帐幕聚落向外国人（朝贡臣民）出售烟砖……。在西伯利亚境外，他和所派经纪人及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向中国或其他地方购买此种烟砖，不得储存从该处运来的烟砖；并不得派人或其他任何人去进行购买。对于存有此种烟砖而遭没收的人，将由长官根据主上的命令科罚；罚金应连同案卷副本一并呈送武备殿，并将此案经

^① 原文为 гривенник，十戈比金币，1699年发行。——译者

^② 乌鲁斯——古代蒙古部落的联盟或联合，占有一定的土地，受汗或台吉等的统治。——译者

过呈报西伯利亚部……。

关于在西伯利亚出售此种烟草(英国烟草或“内戈西安”烟草)和烟砖,将不征收关税,因为根据使团的协议,关税已收讫,并将缴归武备殿……。

2月9日和3月5日,宗室和长官米契尔·雅可夫列维奇·切尔卡斯基亲王和彼得·米哈依洛维奇·切尔卡斯基亲王和司宾从西伯利亚和托波尔斯克上书陛下;还有司宾和长官维尔浩土尔的科兹马·科兹罗夫、图曼的窝西伯·图哈契夫斯科依、斐林的马蒂窝·里加契夫和图林斯克的雅可布·契尔努切夫,他们也从西伯利亚以报告附同请愿书一并呈奏。请愿书经亲笔签字,签字的还有士兵、各业商人、各邮站信差、耕地农户、朝贡的藩属臣民,总共有三百二十二。书中写道:“在托波尔斯克和其辖境诸城市,如果有人出售德国烟或其他种烟和中国烟砖,并将此类烟运往朝贡臣民的地区向这些藩属(朝贡臣民)换取貂皮及其他毛皮,又以烟草换取现金,这些朝贡臣民将因吸烟而倾家荡产(吸此种烟),且出售此种烟和烟砖,必将使每年向财政部缴纳之毛皮税大见减少且稍延缴付;其他多数朝贡臣民,并将借口不再经营貂皮及其他任何毛皮,推托已无野兽可以猎取。因为经营貂皮和其他毛皮的人都将倾其所有吸用中国烟砖,或将一切都用于〔西方的〕烟草,甚至逃避纳税,这些人被中国烟砖和〔西方的〕烟草所引诱,成为〔将烟放在水烟筒里吸的〕烟迷。许多藩属(朝贡臣民)和他们的后裔出售一切皮货来吸烟,而且……出卖皮外套、锅和斧来交换中国烟砖或〔西方的〕烟草。若长此下去,必将使各地朝贡臣民完全陷入贫困之境,他们将不再关心毛皮税和其他事情,甚至衣不蔽体,惨遭死亡。”

3月14日,沙皇陛下听取上述报告后,即依照与使团在英国签订的条约,通过陛下签字的谕旨,转向英国领事查理·古德菲罗谕知,在西伯利亚地方诸城市出售“内戈西安”烟草;并供应运输工具,以便运送此种烟草;但禁其用烟草交换貂皮、玄狐皮、黑褐色狐皮和大黄;对于从某处没收来的……烟砖,将作同样规定。关于出售烟草,根据我们以前的直接命令,将不征收关税……。——接到我们主上的命令后,当查理·古德菲罗的外国经纪人携带英国烟草去西伯利亚时,应听其在叶尼塞斯克贩卖此种烟草和没收来的烟砖,但禁用此种烟草交换貂皮、玄狐皮、黑褐色狐皮和大黄。关于为英国烟草供给运输工具,没收烟砖,保护查理的经纪人不受侮辱,以及对所购商品征收关税和对所余烟草开列清册,均须遵照由我们主上签字的上项命令办事;所有办理情形,应向陛下奏明。关卡税征收的商品清册和烟草清册,应一并

转送莫斯科，并应将报件附同商品清单送交西伯利亚部和杜马秘书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阿斯及其助理人员。

莫斯科，1701年4月18日。

命令原件逐页由秘书伊凡·车培林签署，并由雅库什科(雅戈布)·契尔仁泽夫副署。

《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卷，第21条，载于《西伯利亚历史记载》，第1卷，第30节，第120—128页。

1702年3月24日。

沙皇致图林斯克的司宾和长官芮菲德·彼特罗维奇·杜尔诺夫的命令。

商人托罗芬·扎姆施科夫给他(古德菲罗)写道，不花刺的经纪人、不花刺人和俄国商人向西伯利亚诸城市大量运来中国烟砖。他们贩卖烟砖，并将烟砖密藏家中。

在收到沙皇陛下此项命令时，即将直接命令通告在图林斯克城的商人、俄国人和各色外国人，以便使他们不再向西伯利亚诸城市运入中国烟砖，并不卖给任何人。

《图兰斯克札记》，第3卷，第609号，载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穆勒材料袋，《中国部分》，第4卷，第133页，第369号。

1702年8月31日。

沙皇谕叶尼塞斯克的司宾和长官波格丹·丹尼洛维奇·格鲁埃波夫。

在托波尔斯克，不花刺经纪人那里有大量的烟砖……，而且由其亲自秘密出售。

《叶尼塞斯克札记》，第5卷，第131号；同上书，第370号。

伊兹勃兰德·义杰斯的申请书

我出生于丹麦境内，出身于商人家庭。前在1676年，我乘船到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年少经商，颇能如愿获利，直至已往的1689年，那年，正同法国进行战争，大海的惊涛骇浪吞没我的财物，使我遭到严重的破产……。

然而，在我经商期间，已向陛下财政部缴纳过六千多卢布作为我的商品的关税……。

我恭具申请书，敬求以下各点：

1

请准许通过西伯利亚前往中国……。

2

请准许在陛下财政部预支三千卢布现金和价值相等的貂皮及其他兽皮……。

3

请赐予商人(库普期那)的身分，并请准许我到这个国家(中国)居住五个月或六个月，以便出售商品并购买当地商品，并乞陛下赐给一份致中国可汗的正式证件。

4

请准许携同五六个外国人及若干俄国人和我作伴……。

1692年1月29日，陛下……接受丹麦籍外国商人伊利萨尔——伊利萨尔·伊兹勃兰德之子——此项申请以后，……经派其以使臣资格为陛下的事务前往觐见中国可汗，并将陛下致中国博克达汗的国书交伊利萨尔携往……，允许伊利萨尔预支三千卢布现金……，再从西伯利亚部拨给价值三千卢布的貂皮及其他皮货。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4卷，1和2；第17页、18页；《报告：三千卢布》，第28背面页。

致伊兹勃兰德·义杰斯的训令

1

应将住居鄂嫩河畔的叛民交还，他们是沙皇陛下的人，绝大部分是翁可特人和布里亚特人……。

愿释放沙皇陛下被俘的臣民，并希望将他们从中华帝国放还交与陛下的帝国。

希望可汗给予一处地产，以便在中华帝国设一教堂；关于该教堂的修建费用，将由沙皇陛下财政部拨付，并将款项寄往。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5卷，第35页背面—37页正面。

伊利萨尔受命探询博克达汗是否乐于遵守和约……。

伊利萨尔应对大臣们说明……，关于领土的划分、国境线和条约的批准问题，尚未奉训令，不能同〔至尊的〕可汗陛下大臣们作出任何结论。他只奉训令向大臣们询明至尊的可汗对于边境未定界区的意旨，以及是否批准通过使节对边界问题所作的结论，或是否互派使节或代表协商此项问题……。

……应密探……。〔即使须有巨额开支，陛下亦已下令从财政部拨付价值二百卢布的貂皮。〕伊利萨尔将此项训令作为极机密文件亲自保存，除本人和同行的使节、西伯利亚部秘书外，任何人均不得获悉训令内容。

如果对方拟通过条约规定国境线问题，应该探明对方拟将国境线划在何处。探明俄国人去中国和中国人来俄国，现在是否通过这条线……。

同上书，中国宫廷，第14卷，第61页背面、62页背面、63页正面、68—69页。

伊利萨尔应十分确切探明中华帝国所产花布；探明寻找宝石的地方，或采运宝石所经水（海）陆通途和各邦远近；并探明由莫斯科公国向他们购入或输出的最有利的商品项目。

上述贸易今后是否有利？他们是否希望通过此种贸易获利？

同上书，中国宫廷，第14卷，第68页正面。

应该请求由博克达汗下令准其在城市通途上自由行走，以便调查货物，进行采购……。希望不至受到尼果赖和信使魏牛高的那样待遇，此二人都曾被监禁。

希望至尊的可汗下令准许伊利萨尔及其同伴能够自由通行各城市，并采购所需商品。

同上书，第69页背面、70页。

伊利萨尔获得准许后，应即探明：各城市每种商品的确实行情；中国人自己的买价和售价；应探明有无德国（荷兰？）商人及其他远方国家商人来到中华帝国？携有何种商品？取道何处？通过陆路或水路？到这些地点或地区有多少俄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每普特（重量）或每驮载货单位（数量）应付运输费若干？莫斯科商品在中华帝国的消费情况如何？输入商品的关税如何？是否系实物税？伊利萨尔应探明上列情况……，并将所有情况载入正式记录中。

同上书，第70背面—71页正面。

1695年伊兹勃兰德·义杰斯从北京带回的理藩院函件

原注：如此费解的〔俄文〕原稿，译述很难十分严谨。现竭力就作者的原意加以阐明，但不拘泥于原文。

博克达（神圣）汗的议政王大臣和内大臣索额图的函件（即指清朝皇帝的议政王大臣索额图的照会）。

沙皇所派使臣伊利萨尔之子伊利萨尔·伊兹勃兰德已将沙皇旨意送达，并经转呈博克达汗。

所提第一项：“划定国界后（1689年，在尼布楚）当地的翁可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相率叛离我俄罗斯帝国而迁入至尊的博克达汗版图。请查明下落，并将其送回。”〔伊兹勃兰德所提第一项。〕

〔答复〕：前经本人和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柯罗文）双方会商同意，并划定一部分国界，但尚未会商并划定蒙古方面的国界，决定（以后）另行勘察。在划定国界后，贵方曾提出不再收容逃亡的蒙古人，并将其遣返。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柯罗文）曾称：“奉沙皇命令，协议并划定东部国界；但对协议蒙古方面国界，并未奉有任何命令。”又称：“对此别无所知。因沙皇毫未提及此事……，在该处（蒙古方面）的国界未经划定，现既有意商定，将奏明沙皇，准备会商并划定该处的国界。”经我方多次努力并行文照会，但蒙古方面的〔国界〕问题仍未解决。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再未转递沙皇的函件，亦无人命其划定该处国界，彼原非为划定该处国界而来，此事不妨容后再议。该处蒙古人往日原不属于贵方治下，该方国界既未经协议，亦未经划定，所谓属于贵方治下的蒙古人一项，亦不妨容后再议。——〔贵方表示〕有大批属民在早经划定的地方越界，但从未闻悉划定蒙古方面国界之事，如何能将贵

方越界的蒙古人称作“我方的”？〔我皇帝〕有意划定蒙古方面的国界。甚至在使团来到之前就致书贵方（沙皇？）。但尚未收到任何复示。现在贵方〔伊兹勃兰德〕请求沙皇迅即来函定期择地会商划定蒙古方面的国界。一旦划定此项界线后，就再无此种逃亡人口的问题。〔在蒙古方面国界未划定之前〕，暂且如下行事：既未与此等蒙古人协议划定国界，故不能遣返〔尼布楚条约〕以后进入我境的布里亚特人及翁可特人。

康熙 29 年 5 月（公元 1690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6 日）贵方使节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柯罗文）的代表格里高瑞·伊凡诺维奇（兰赤查科夫），同年 4 月（指 1690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7 日）尼布楚当局的代表西蒙及其同行人员，又携来关于蒙古翁可特人和布里亚特人问题即色楞塔布奈及其同伴的照会，本人（索额图）关于此项问题亦写过复照，事情就到此为止。所以，谈到查明并送回翁可特人及布里亚特人等，并无必要。

……〔伊兹勃兰德提出的〕另一项：“至尊的博克达汗和俄罗斯帝国的可汗曾签订友好条约，彼此和睦。现下中国俘有俄罗斯人，如果我俄罗斯帝国被俘的志愿队员愿意回来，即请释放来见，并将其送还俄罗斯境内。”

〔答复〕：本人前曾与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商议，双方协议并划定国界。既能阻止俄罗斯臣民进入我清帝国边境，又能阻止我清帝国臣民进入俄罗斯帝国边境，两无不便。双方协议划界，亦即为此。且划界之事有明文为证。如此重要事项一经决定，岂能任意更改？若自坏边防，必多困难。至于俄罗斯帝国的被俘的志愿队员愿意返国的，业经遣送回去，别无可言。

〔伊兹勃兰德提出的〕又一项：“至尊博克达汗与俄罗斯的可汗都曾同意巨商为沙皇输入头等纯银，此外还有我国人尚未见过的头等宝石，以及各种珍贵物品和各种药材（大黄？）。请派人前来通商。巨商抵达我国莫斯科，由我方交付各种商品换取银子和商品，自可听任选择。”

〔答复〕：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事应无庸议。

又一项是：“侨居的俄罗斯商人要求在中国建造一所教堂，请求指拨一处地基，并由我俄罗斯沙皇从财政部拨给建筑费。”

〔答复〕：西洋（法文本作拉丁）各国来我国久居的侨民共有一所教堂。若远近各国都在我国领用地基建造成教堂，此事碍难照准，亦请无庸置议。

另具一函，务希确切转达。

康熙 33 年 2 月 5 日（1694 年 3 月 1 日）。

今年,1695年4月4日,伊利萨尔·伊兹勃兰德代表将上列函件转递外交部,据称此项照会系理藩院在答复其要求时所授与,并与所交另一份拉丁文照会的内容相同。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第1号,1692年1月29日(公元2月8日)。

第四章

斯皮瑞东·郎古索夫商队队员伊凡·萨瓦齐耶甫陈述

(1699年7月)

在中国出售的俄罗斯商品:松鼠皮(每一千张),价五十五两;白鼬皮(每一百张),价十至十六两;北极狐皮,每张二十阿尔腾(六十戈比);草狐皮,每张十六阿尔腾四兼卡(五十戈比)和每张十三阿尔腾二兼卡(四十戈比);红狐皮,〔每张〕一卢布五十戈比;山猫皮,每张五或四卢布;野兔皮,每张三卢布;红革皮,每张三卢布;熟羊皮革,每张二卢布……。

采购的中国商品:每匹五卢布的次缎,每匹七卢布的头等缎,每匹三两的南京棉绸,中国的银子搀有铜质且无任何纯度证明印记……。不可能用俄罗斯的商品在中国换取大量的金银,因为中国的金子很贵,也难于〔取得〕,实际上很少有人带金子到那里。

……扎鲁扈亦对出入口货都不征税……。

与过去相较,商品贸易显见衰退……。但是他们(俄罗斯商人)在交谈中听中国商人说:商队来得太勤,俄罗斯商品充斥,价格跌落。他们又说:如果每隔两三年来一次商队,俄罗斯商品的价格就将上涨,并且他们(俄罗斯商人)就更易将商品出售给中国商人。

他们(俄罗斯人)并无通商的任何自由,因为作买卖的中国人都是平民,又不能任意买卖;商务中的走私和障碍仍然存在。

《尼布楚档案手抄本(附副本)》,载《史料补遗》,第10卷,第67章,第35节,第293—294页。

俄罗斯商务在北京的状况

“公元1717年8月23日。康熙56年7月20日。

理藩院致西伯利亚总督马特维·彼得洛维奇·噶噶林亲王书。

“贵商务委员米契尔·古谢特尼科夫等曾向本院呈递申请书,内开:

去年阴历10月，我等携带我沙皇的商品来到贵国京城，当货物尚未售完时，贵国主管官厅便下令严禁将货物赊给贵国商人，并限期收账，只许以现金交易。但现下任何商人都无力用现金购货，往日先行交货，以后再收回布匹、绸缎、银两、黄金；现下将届夏天和生虫季节，若毛皮虫蛀，货物徒遭损失，归国以后，必将受沙皇陛下处罚。恳求怜惜众多生灵，奏明皇上，准照往日仍将货物赊售，在赊出后，将自行向债户索账，决不烦及贵国主管官厅或监督，以上申请属实。

查我国京城商贾云集，毛皮堆积如山，作坊充斥，毛皮实属滞销……，安能迫令我国商人购买尔等之毛皮货物？再者，府库亦无需购换之物。若照尔等所请，准许赊出货物，到期不能清偿，则又来本院或监督处控诉。即或照尔等所请，我国商人在将买自尔等之货物出售后再付尔等货价，此亦需要时日。

既因毛皮滞销，尔等今后每隔数年前来一次，则尔等货物必然有人接买。但若尔等来货频仍，我国商人既不能将已有之货售出，又如何能购买尔等之货物？

……贵委员获悉后，答复如下：……请求监督规定限期，期满后不再行收账……。

本院又告知贵委员：去岁尔等商人漫不经心，将货物赊售我国商人，因到期未能交款，尔等商人即向监督处控诉，监督转呈本院，本院又上奏皇帝圣裁，遵旨拿获我国商人将其长期监禁，最后因我圣主怜恤尔等洋人，敕令府库开支银两偿付尔等。若目前尔等仍将货赊卖，到期不能收账，不得再向监督处控诉，监督亦将不受理此案，尔等应自选殷实可靠之熟识商人，再交付尔等货物……。

此辈俄罗斯人又称：我等在此间经商并无熟识之人，往日均由监督登记领取货物的人名，现在我等请求照旧办理，并对尚未出售的货物暂勿征税，上述请求倘经准许，若贵国商人不能到期偿付债务，我等自行交涉，决不再向监督处控诉。

因此……暂免征税，监督亦不再登记商人姓名，听任清晨开市，入晚收市，以便自由交易，贵委员可自选熟人出售货物并索取债务。

本件交费委员携回①。”

上述函件系用宣纸缮写，盖有朱红色大印，印信上有满文和篆体字，背面

① 此函原文为拉丁文。——译者

有小红长圆戳记，戳记为楷体字，难以辨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至1717年信件，1717年，第80号。

关于十八世纪俄罗斯商队的商道

“理藩院致俄罗斯察汗汗①的内务大臣西奥多尔·沙克洛维奇书。

康熙45年3月16日，于北京。

……前经询问途经鄂尔浑河、土拉河等地至此间的俄罗斯商人头目格里高瑞·奥斯考尔考夫以何处路线较近与彼等将取道何处返国。据称：前次随商人大头目包贡在色楞格②城装货，道经尼布楚来北京，沿途费时共达一百五十多天。此次由我大皇帝恩准，由色楞格城取捷径来京，为时仅七十日，即抵此间。又称：若取道鄂尔浑河、土拉河，不仅路程较近，且易于行走。彼曾将疲乏马匹和驼只暂留张家口，随后来京，彼仍愿偕其同伴由鄂尔浑河、土拉河返国……。”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年至1717年信件，1706年第75号。

“理藩院致俄罗斯察汗汗的内务大臣西奥多尔·沙克洛维奇书。

康熙45年3月16日。

……贵国尼布楚市长官来函：竖请我国命令贵国商人今后必须取道尼布楚；若取道他处来往，请我国下令将此等商人拿捕解送尼布楚。而贵国商人头目格里高瑞·奥斯考尔考夫及其同伴则称：在动身之前，曾由贵国察汗汗下令取道较便捷之商道。途中遇到伊凡·萨瓦齐耶甫及其同伴，得知路经鄂尔浑河、土拉河较便捷，遂由此来京。又据称：决不能违犯贵国察汗汗旨意而取道尼布楚。双方各执一辞，互相矛盾；可见贵方属下显系任意行事，并未遵照贵国察汗汗之命……。今日贵方两代表既由两地派来（即由莫斯科及尼布楚）而所言又相矛盾，意见甚为分歧，该函所称各节，实难置信。兹决定在此期间，对贵方一切来文，均暂作无效。直至贵国正式函件明确通知后，再行核夺。本函交由格里高瑞·奥斯考尔考夫携回。”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年至1717年信件，1706年，无号数。

商队人数

康熙51年5月6日。

① 蒙古语，即指沙皇。——译者

② 即上文色楞格斯克。——译者

北京理藩院致莫斯科沙皇派驻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书。

……同一委员声称：……我们货物很多，需雇多人赶运。请准许嗣后在二百人以外再增二十至三十人。本院答称：我方通知土谢图汗，若俄罗斯人货物较多时，随货人员可增添二十人；否则，照旧只准二百人前来。

……委员在到达以前曾来函称：奉沙皇谕旨，从莫斯科京城送去许多货物，当前往贵国时，我得悉途经汗青坝①较近，并且沿途水草丰足。委员请求准许取道此路。

本院答称：经考察后，知汗青坝(隘道)即所谓隘岔路，并准如委员所请由此路来京，即以此路为今后与莫斯科之贸易通道。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年至1717年函件，第51号。

北京理藩院致莫斯科沙皇派驻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书。

公元1714年，即康熙53年8月8日。

……上述头目又称：……因……只准二百人入境，我等货多人少，颇受损失。我总督噶噶林派人送信给我，命我详细报告贵院大人，并请转奏皇帝，准许今后可有四百人入境。

兹答复如下：莫斯科商人名额若不加限制，来者皆准入境，则难免良莠不齐，混淆不清。是以仍照头目和委员原请办理：若货物较多，可在二百人外再增二十名，若货物不多，仍从原规定，入境者不得超过二百人。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04年至1717年信件，第39号。

米契尔·古谢特尼科夫的货物价格说明书副本

(原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作，第512页。)

1

在中国，“两”(lana)是一种银币，相当于俄罗斯的卢布。一锭金元宝有十两或不足十两；一两金子值十两银子，一两银子值一个俄罗斯卢布……。

① 1888—1903年，拉法伊洛夫-博勒舍夫-瓦西里耶夫所绘比例尺为 $\frac{1}{20000}$ 的俄罗斯地图《亚细亚俄罗斯边疆地图》；总参谋部军事地形测绘出版社出版，XIV库伦，XV北京》，表示由库伦到张家口有三条路：靠东的一条是达汗站道，中间一条是车尔润道，靠西一条为昆召道，最为直捷，也许汗青坝即指此线。——原注

人都认为“官府”金、银比“市用”金、银好，但都不知道差别究竟在哪里。

2

从中国来的货物如下：南京棉绸；中国缎；金和银；丝绸；茶叶；茴香；韩帐；竹帘；各种家庭用具。

3

去年，即 1717 年，在中国的俄罗斯商品买卖价格如下：

财政部松鼠皮，每千张十三匹南京棉绸；商人自己的松鼠皮，每千张卖四十〔卢布？〕。

4

财政部白鼬皮，每百张十七个俄罗斯银〔卢布〕；商人自己的白鼠皮，每百张卖十五个〔卢布〕。

5

收购中国缎，因质量不同，每匹三至五〔卢布〕。

6

一匹南京棉绸，按照货品不同，三〔卢布〕或不足三〔卢布〕。

7

北极狐皮，〔每百张〕四十〔卢布〕或较多。若换缎子和南京棉绸，按上列价格折算。

8

贡品北极狐皮，每张十四阿尔腾四兼卡〔四十四戈比〕。

9

堪察加海狸皮换四匹南京棉绸。

10

勒拿河红狐皮每张按现款二〔卢布〕或按商品折合一个半〔卢布〕。

11

其他西伯利亚红狐皮每张一至四卢布。

12

褐色狐皮每张五到二十〔卢布〕。

13

貂皮每张一个半〔卢布〕上下。

14

山猫皮每张二〔卢布〕。

15

海象牙(照字译是鱼骨),每件一匹或不足一匹。

16

草狐,每张十五〔卢布〕。

17

小白鼬皮(鳍脚目)每千张二十〔卢布〕。

18

脊皮和腋皮白毛皮,二〔卢布〕上下。

19

中国无人需要黑貂皮,一文不值。

商务部给劳伦特·郎克的训令

原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作，第508—511页。

给劳伦特·郎克领事的训令副本，郎克应遵照本训令在清帝国北京办事。

1

领事本人应遵照本训令所示宣誓，副领事亦向其主管领事宣誓……。

3

领事或其副领事应立即处理俄罗斯人彼此间的一切纠纷，无论系商业纠纷，抑或系非商业性纠纷。

4

领事处理重大事件时，应召集当时驻在北京的俄罗斯籍最高级为首人物征求意见，并根据多数意见决定。但任何当事人，即或领事本人，均不得出席裁判或参加表决，只能取具书面意见。

5

根据上项决定，除死刑外，领事有执行裁决的全权。此项裁决将永远有法律效力。如有人欲将案件提呈最高法院，只能向圣彼得堡商务部申请上诉。

6

领事有权将所属俄罗斯罪犯逐出中国境外，并押返俄罗斯帝国，以便依法量刑。但仅在下列情况下有效：一、如查明某人有意违反其宗教信仰；二、如有人对我皇帝不尽忠职守；三、如杀死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由中国法庭处理。但如……受害者系我沙皇陛下臣民，领事即应将其拘捕并送返俄罗斯帝国境内……。

此外，领事应注意所属俄罗斯人，不论商人或其他臣民，不得有任何违法行为，必须举止有度。

7

领事应在所有证件、遗嘱及其他订立文书上签字盖印，并在簿籍上登记。必要时护照亦须……。

8

每年在商队启程时，领事应将其工作日志抄录副本一份存查，并将原件寄来……。领事亦应督促副领事从广州将公务日志和情报一并寄来。在此等情报中，不仅包括有关商情，并应包括国家各项机要事务。为便于此等重要商务活动，兹检附密码表以供领事及副领事之用……。

10

任何俄罗斯臣民至中国后，应将其行程及沿途经历情况缮具书面报告；领事应搜集此等报告列入工作日志中寄送商务部。

13

领事之主要职责为给予〔俄罗斯〕所属臣民以各种援助，包括口头及行动在内……。

14

俄罗斯人携带货物至中国后，领事应注意不使其被中国可汗的奴仆逮捕，以便索取或收购俄罗斯人的货物以供可汗之用。

15

领事应注意将茶叶(烟草)装入铅皮箱内，每箱重量约为一百斤，加盖并从上方焊好，以免香味散失。

页边签字：伊凡·巴勒比耶可夫；页底：监印巴西利·格里亚兹诺夫校讫。

**1721年5月18日(公元5月29日)伊兹玛依洛夫
从伊尔库次克寄发上奏沙皇的奏章**

……根据中国人要求(禀告西伯利亚总督)，经于2月12日由北京派去

一名士兵，随身携带公函一件；派去之士兵，可由劳伦特·郎克事务官留用〔在北京〕。应使原被阻留在〔色楞格斯克〕的商队获准进入中国境内，并使商队今后不再受阻……。又收到理藩院一份照会内开：约有博克达汗陛下所属七百名蒙古人逃入陛下国境。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至1722年使节公务日志，第181页。

伊兹玛依洛夫关于中国的商业情报

关于锦缎和南京棉绸，均可按需要数量运来。

人们不难找到黄金。以前禁止白银出口，违者处死……。

每两值一俄罗斯卢布，含纯银重八又二分之一俄钱①（三十六点二五克）。

〔欧洲人〕运来大批白银换取中国人的黄金。

我们亲见其市场中毛皮充斥。当我们在草原上行走时，并见有大批载着毛皮的骆驼和车辆从库伦前往北京。若不能很好地监督库伦的贸易，就不能阻止擅自买卖已被禁运的毛皮，北京方面的贸易也难以好转。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19年至1721年使节公务日志，第205—206页。

蒙古行程日记

伊兹玛依洛夫取道蒙古的行程

1720年9月16日（公元9月27日），色楞格斯克，色楞格河，奇科依，森林。19日，在伊斯托布尼科夫露营。（20或21日），色楞格河支流布里亚河。23日，鄂尔浑河。山林，牧地。24日，鄂尔浑河支流依罗河。山岳，牧地。25日，鄂尔浑（依罗河）河支流沙拉河。青草地。26至28日，鄂尔浑河支流卡拉河。牧地和山岳。29日至30日，卡拉河支流博洛河（博罗河）。10月1日（12日），库伊河支流博尔哥塔河。2日，库伊河，岩石高山（图诺盖图，库伊河发源于此，并使库伦与北部河流分隔）。3日，土拉河，该河流经山林中。4日，图洛图洛盖，小咸水湖。野草繁茂。5日，草原或站（Steppe ou station）与上同名，草滩多砾石，水在地下六尺，味咸。6日，苏拉河。小咸水湖。井。7日，夏顺，情形同上。咸水。8日，鄂尔奔土尤（译音）。两个小咸水湖。有井。甜水。

① 俄钱即前面所说的“左洛特尼克”，等于4.266克。——译者

9日,鄂克图尔。小咸水湖。井。甜水。10日,喀什·喀什图,水。11日,呼图图。多沙石草原。井。甜水。12日,伊林盖,情形同上。地多斜坡。13日,布哈里克,情形同上。14日,布都鲁伊,情形同上。15日,卡丹卡楚,情形同上。16日,察齐尔。右边(西边)有山,井,咸水。17日,察汗德格里克。水咸而少。19日,乌德。井。甜水。20日,乌兰哈达(红山),情形同上。多石。21日,车兰德格里克,情形同上。22日,乌兰达布,咸水湖。23日,呼拉特。井,甜水。有小高地。24日,蒙干布,情形同上。牧地。在两站中途有蒙古寺院。25日,呼图托伊沙音黑沙图泉。沙石。牧地。井,甜水。26日,库巴金。小咸水湖。27日,苏集,情形同上。28日黑沙图。井,甜水。29日,十八台。山岳。牧地。井,甜水。30日,札明乌苏,情形同上。31日,克列米亚,情形同上。11月1日(12日),图尔杂图。草地。2日,那林呼鲁苏。在两站中途有一土城。3日到4日图洛伊苏迈。中国式小房子。高大石山。札夕兹。山中小路险阻,崎岖不平。5日至6日,张家口。砖筑方形城,有两个门。环城周围有两俄里(二千一百三十四米),部分城垣坍塌。河上有一石桥。城外有房屋。7日,从张家口到宣化府,每隔二俄里就有驿站。宣化府象张家口一样,砖筑方形城,有两个城门。城内是土木房屋。部分城垣坍塌。9日至12日,鸡鸣驿;石筑方形城,城因地震已毁一半。从宣化府至此凡十一站。12日,土木堡。山岳,小树林和村庄。13日到14日,榆林。桥、城楼、雉堞系砖^①筑,城墙则系土筑。遭过地震。15日,长城的大门居庸关。砖筑方形城,有旅舍。16日,昌平州,树林,村庄,砖筑方形城,城门有三,城墙部分已坍塌。17日,沙河,村庄甚多,四下耕地。18日,北京。环城十六俄里(十七公里又零点七二米),城高二俄丈半(十六米),厚八俄丈(十七点七二米)。城为方形,三面各有两个城门,南垣有三个城门。城垣旁有方形城楼。有一条运河及一条水渠在城中汇合。

从色楞格斯克到土拉河,沿河有青草地,以后是山地。从土拉河到张家口是草原,河水、树木、青草甚少;某些地方有游牧的蒙古人。从张家口到北京,地方富庶,人烟稠密。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机密报告。1719年至1722年使节公务日志,第188—198页。

① 原文为石。——译者

注 意

在拉法伊洛夫-博勒舍夫-瓦西里耶夫的俄罗斯地图上,虽不难找到从色楞格斯克到库伦和从张家口到北京的各站名称,但对蒙古境内的各站则颇有出入。

该地图上所绘的三条路线中,在从库伦到张家口、北京,取道赛尔乌苏的通常路线以东,找到伊兹玛依洛夫所提的许多地名,这就可以推定他走的是昆召(译音)道路,也就是最直捷的一条路线。呼图图,地图上作:呼图图浩特。察汗德格里克,地图上作:察汗楚库鲁克。塞什克,地图上作:桑吉。乌德,地图上作:乌德。札明乌苏,地图上作:札明乌苏。在这张地图上所绘的四五条蒙古道路上都找不到这些地名。

蒙古行程日记

俄罗斯离队的通道, 1727年9月13日(公元9月24日)自恰克图出发, 1727年12月26日,即1728年1月6日到北京。

1727年9月13日即公元24日,从奇科依河上的圣彼得·圣保罗堡动身;15日即公元26日,苏布克图;16日即公元27日,恰克图;17日(28日),布拉;18日(29日),察姆(帕拉斯作:萨姆)河,系鄂尔浑河支流;依罗河发源于东南方的肯特山;9月22日(10月3日),沙拉河;9月23日(10月4日),卡拉河,系沙拉河支流,亦从东方流来;9月25日(10月6日),必蒂格河,系卡拉河支流;9月26日(10月7日),萨图尔(帕拉斯作:萨图拉)河系必蒂格河支流;9月27日(10月8日),博罗河,系卡拉河支流;9月28日(10月9日),博罗诺尔,环湖约一俄里,湖中有鱼、天鹅及水鸟;9月29日(10月10日),布古尔套河(帕拉斯作:布古尔台);10月1日(12日),库耶(科伊)河,系卡拉汗河支流;10月2日(13日),土拉河,和神山(即汗山,主山,因呼图克图卓锡于此,故名)(今博克达山,圣山),山上长着柏树,林中繁殖可猎取的野畜(野猪,鹿),但禁止捕捉。

从色楞格斯克到库伦,有松、柏林和枫林等可供采伐;有野猪、鹿、黄羊等可供狩猎;有鱼;有牧场。蒙古人全是畜牧者和游牧者,吃乳品,除牲畜被宰或饿死外,他们是不吃肉的。冬季吃干肉片和奶饼;夏季豪饮烈酒。他们并饮奶子茶。他们穿羊皮衣,并用羊毛作包幕的夹包套,冬季十分温暖,夏季十分凉爽,太阳晒不透毡子。他们也有驼毛衣料。

10月8日(19日),土尔真河,发源于神山;9日(20日),布库姆(帕拉斯作:布昆)河(拉法伊洛夫-博勒舍夫-瓦西里耶夫1888至1903年地图作布古克河);10日(21日),多伦图洛盖,即七座山;11日(22日),齐洛特楚都克站(帕拉斯作:锡洛斯);12日至13日(23日至24日),萨金阿克图萨音乌苏(同上图作:察克楚尔湖);14日(25日),萨都克图伊林乌苏(同上图作:库卓图井?);15日(26日),郭尔奔(帕拉斯作:郭尔奔)土鲁泉;16日(27日),察布齐尔(帕拉斯作:察布吉尔)(同上图作:札明乌兰浩特?);17日(28日),乌兰图洛盖即红山(同上图作:乌兰图洛盖,但方向较为靠南;鄂洛盖山);18日(29日),布伦(帕拉斯作:布伦那)(同上图作:夏顺布伦浩特);19日至20日(30日至31日),卓图都(同上图作:呼图图浩特);10月21日(11月1日),伊克贡哥伦伊力琴那(帕拉斯作:叶克忽哥隆伊力琴那,即大天鹅湖);10月22日(11月2日),阿尔塔盖那,设站,水不好,且缺少;10月23日(11月3日),布盖林泉站(帕拉斯作:泉);10月24日(11月4日),召屯和硕站,已被喀尔木克人毁坏;10月25日至26日(11月5日至6日),乌兰萨尔察(帕拉斯作:萨尔查);10月28日(11月8日),察汗德格里克站(帕拉斯作:德格里克)(同上图作:察汗楚库鲁克,但方位稍偏东);10月29日(11月9日),萨拉;10月30日(11月10日),乌德(帕拉斯作:乌德)及塞尔登(帕拉斯作:塞尔腾)(同上图作:乌德得列口,桑吉多伦山);10月31日(11月11日),乌兰哈达夏顺(同上图作:夏顺);11月1日(12日),布尔萨卡(帕拉斯作:布尔索克即屋顶或住所);2日(13日),德格里克卓索图(帕拉斯作:陶卓索台)(同上图作:察鲁克-图古里克);3日(14日),库都拉(同上图作:库都尔);4日(15日),伊伦达布苏(同上图作:伊伦达布苏),周围约三俄里的小咸水湖,无草;5日(16日),阿隆井(同上图作:察汗井(白井)?);6日至7日(17日至18日),博罗苏井(同上图作:博罗吉);有美丽的彩色石,但系无水草的沙漠;8日(19日),明根诺(帕拉斯作:明根)(同上图作:孟根);10日(21日),乌布林井(帕拉斯作:楚布隆楚都克)(同上图作:沙罗-浩特?);12日(23日),乌兰图洛盖山(同上图作:乌兰图洛盖);14日(25日),科布卢(帕拉斯作:库尔巴)(同上图作:库布尔);16日(27日),苏集(同上图作:苏珠);18日(29日),察布齐尔(帕拉斯作:察布吉尔)(同上图作:车臣);19日(30日),黑沙图(帕拉斯作:卡尔盖图)(同上图作:库楚特);11月20日(12月1日),吉罗翁古楚(帕拉斯作:吉罗翁古卓)(同上图作:昭莫奥尔古苏);11月21日(12月2日),十八台即那定井(同上图作:章达? 乌兰井(红井)?);11月25

日(12月6日),札萨图(帕拉斯作:札萨图);26日(7日),卡拉鄂博及札明沙音乌苏井(同上图作:察汗鄂博和札明乌苏);27日(8日),毛基林(在归途中作:莫基林)(同上图作:毛古伦切列)及土城子;28日(9日),科布卢(帕拉斯作:科布拉)(同上图作:库伦吐尔盖?);(归途中)麻尼图(同上图作:曼德);29日(10日),察汗博勒格苏即(归途中的)博勒格苏(白城),废墟很多〔参阅博兹尼耶夫(A.)著《蒙古及蒙古人》,圣彼得堡,1895—1898年,二卷,八开本,第1卷,第639—640页〕;12月1日(12日),阿隆十八台(帕拉斯作:阿隆十八台)(同上图作:十八台);2日(13日),图洛苏台(帕拉斯作:察汗图洛盖达坂,意即白头岭)(同上图作:达坂);5日(16日),张家口;16日(27日),宣化府;1727年12月26日,即1728年1月6日,北京。

商队领队劳伦特·郎克的行程记录。《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6号,第350页背面;帕拉斯,《新北方自然地理学、民族学、自然史及经济论文集》,第2卷,第86—124页。

第八章

劳伦特·郎克于1721年10月21日即11月1日

自北京上沙皇奏章^①

沙皇陛下:

我皇陛下之国书,经臣奔走,将可为此间宫廷所接受,此乃伊兹玛依洛夫公使阁下离任后之一大事,缘臣曾为此事一再向满清大臣交涉而迄今未著成效者也。

但理藩院大臣奉满清皇帝旨向臣宣示:兹有四位满清官员将启程前往色楞格斯克,并由该地经贝加尔湖转往奥卡河上游流入安加拉河处一带,蒙古语称该地为塔布·蒙杜尔;臣拟发给该四名官员护照一份。

……据清廷官员告云:

离奥卡不远地方,有一悬崖(俄语称为 Зайсан камень,蒙古语称为 Tabun Mündurga),其上凿有巨大佛像一尊,帖木儿曾对此佛像甚为崇敬,并曾祭祀;呼图克图曾向满清天子赞扬佛像之精美及其发生之奇迹。清皇陛下意欲派遣四名官员前往该地,或将佛像设法运回北京,或精绘佛像图形以

^① 此项奏章及下列各项函件皆系用哥特文(德文)写成。——原注

归。

……臣自热河返抵北京后，9月3日从一位耶稣会教士处获悉，满清官员此行，非为佛像，别具意图，其目的乃欲在该地竖立若干界标，俾在日后判定两国疆界时，若辈可坚持以此界标为据，仿佛此界标自古以来即已立于该地。总之，两国疆界协定，若辈甚望按照于己有利之条款而签订。满清大臣曾劝说该耶稣会教士随同该四名官员前往，但伊以年迈为词，尤以此行不会有何结果，婉言辞却。

……清国人对琿台吉之战，困难殊多，其军队人数，据臣探知，约有二十万人，由于长夏疫病流行，兵员人数已是大减，尤以气候不良，粮秣耗竭，士卒已必须以倒毙之驼、马等畜充饥……

清皇认为琿台吉启此争端，应向清廷乞求宽恕，但琿台吉不但不为此项要求所动，而在去年彼曾遣使告知此间宫廷，设使清皇同意宣布蒙古草原为自由独立之国，伊愿和平解决。

蒙古人对于此种独立似不感兴趣，……因若辈不能从琿台吉方面获得永久安宁之保证。

西奥多尔·斯捷潘诺夫·伊斯多甫尼科夫专员所率商队，已于9月29日到达此间，并将遵守历来所定规章，庶几不予清廷日后提出种种刁难之口实。

……以上所陈各节中的一部，臣早欲派人报闻，无奈此间宫廷猜疑心重，必须确切询明派遣信使之缘由，因此臣困难殊多，今始有此机会，爰将所见所闻，缕缕报请圣察。

北京，1721年10月21日^①

劳伦特·郎……[]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0及1721年，第2号。

^① 据由彼得·沃尔科夫签署的俄译文以及在信背面的一份俄文记述中所载，系7月11日(公元7月22日)在莫斯科收到的，并参考1723年8月28日(公元9月8日)科兹罗夫斯基亲王的报告文件。《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3年，第2号，108页背面。——原注

理藩院于雍正元年12月21日，即1724年
1月16日致劳伦特·郎克的函件，并于1724年
10月6日即公元17日附劳伦特·郎克1724年3月
13日即公元24日的报告书呈递圣彼得堡。

公元1724年(1月)16日。雍正元年12月21日(俄文函件上有 Лаского
прямо владѣние въ агу въ вјмесцу въ ка числе 等字样)。

理藩院致书于俄罗斯办理逃民事宜使臣劳伦特·郎克：

……嗣据尔等称：有关案卷尚未审核完毕。我方人员又无本院凭证文
书。因此一事未办，毫无成议。

今准如所请派员携同外交文书前往，又因其他借口未有成议；我国人员
岂能枉劳跋涉，徒受其害耶？

事既至此，希即明确具复：案卷何时审核完毕？何月何日会商？并将函
件交由土谢图汗转呈本院，以便转奏皇上，以后将照所定日期由我方派员至
色楞格斯克会商逃民事宜，以期确切结案。一旦议妥，必将有利两国安宁，边
境辑宁，善莫大焉……。

……希即见复……。

本件系用宣纸缮写，并盖有朱红色国玺。《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4年，
第3号。

第九章

外交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训令

原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1页背面—29
页背面；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中俄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434—
445页。

1725年9月14日即25日。

9月14日外交部给现任枢密官，特派使节，全权大臣①的训令。内计四
十五项……(在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作中，上开原稿题目略有改变)。

兹因国境发生若干纠纷，中国不仅同俄罗斯帝国断绝贸易关系，不让俄

① 使节的职衔在原稿中每次都要重复，译文中将其略去。——原注

罗斯商队照例入境，且在两年以前将驻在北京朝廷的领事劳伦特·郎克和所有俄罗斯商人一律驱逐出境。

3

中国人所行措施（劳伦特·郎克 1724 年 8 月 13 日即公元 24 日的报告书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温和妥协的态度，该项报告书追记在第二节中）似在显示新博克达汗^①有意维持和平并恢复贸易关系。女皇陛下亦命令现任枢密官以特派使节全权大臣衔出使中国，觐见博克达汗，以便直接向清廷交涉，并运用外交手腕恢复和巩固旧日邦交及自由贸易关系。全权大臣随带女皇陛下致可汗的国书，此项国书的俄文及拉丁文副本见下文第四项。

4

……女皇陛下以全权授予特派使节……。

商 业

9

……中国大臣虽曾给与劳伦特·郎克领事希望，但万一商队仍未获准入境，全权大臣应竭力使商队随同进入中国境内。

10

若中国人坚决拒绝商队入境，特派全权大臣虽不能率同商队前往，其本人仍应入觐博克达汗，在逗留期间并须继续努力取得商队入境的许可。

18

全权大臣首要任务为筹划及竭力恢复贸易关系，并使其继续发展……。

37

上述第十九项（与给伊兹玛依洛夫的训令相似，即商人应自费维持）的内容明白指示全权大臣应在何项基础上努力同清廷缔结通商条约；此外并抄附商务部发给前此出使中国的伊兹玛依洛夫及其他现任使节的各项指示。全权

^① 系指新登位的清朝雍正皇帝。——译者

大臣自可体会此种精神以求缔结商约。恢复并巩固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既为全权大臣主要任务之一，必须尽心尽力为女皇陛下效忠，尽其所能，迅赴事功，以期为国宣劳。

41

在中国办理女皇陛下的事务时，应以曾用领事名义派驻中国而现留色楞格斯科的劳伦特·郎克为助理。一待中国准许续派代办或领事留驻该国办理俄罗斯所属商民事务时，全权大臣应即将劳伦特·郎克留在中国。为此，并给劳伦特·郎克寄去经女皇陛下亲笔签署的国书一份，以备中国准其留驻时应用。

边 界

8

全权大臣在途经西伯利亚和在当地逗留期间，无论在任何地段，应竭力搜集各种有关情报，尤其关于中国边境部分。因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柯罗文伯爵前此与中国人会商时，并未划定此段国界，而中国人现又拟将此等地区据为己有；全权大臣应了解此等地区对俄罗斯帝国有何利益？何以迄今尚未划定国界？应详尽呈报，并绘制地图一幅……。

26

有关划界事宜……，全权大臣在路经西伯利亚时，应竭力搜集此等地区详尽可靠的情报，尤须注意下列几点：（一）何处确曾划定边界，何处尚未划定？（二）在尚未划界地区，俄罗斯的势力达到边境何处？中国的势力又达到边境何处？（三）尤其中国人在何等地区向前推进？现下提出何种要求？此等地区以前由谁管辖？（四）在未定界地区，应明确指出一切必须归于俄罗斯的地区。关于上述所有地区，亦应尽早绘制一幅简明地图并附以对此等地区的精确说明；应寄呈外交部一份，全权大臣本人携带一份，作为与清廷交涉的依据和必要的参考。

27

到清廷后，当开始谈到划界问题并要求着手解决此项问题时，全权大臣应运用一切有效方法，力求延迟划定国界。拖延愈久愈好，尽可能赢得时间，

以便女皇陛下的朝廷可以接到上述有关详细说明及地图，并可作出划界的最后决定。因无此等报告，目前无法决定。

28

……清廷谅必亦无关于此等地区的精确情报，希望其能指派委员前往边境勘划国界；中国委员亦可商由俄罗斯委员协助进行测绘，并向博克达汗陛下寄呈一份翔实的报告及地图……。

30

若中国人不同意如此进行，并在划界之前不愿作其他磋商……，女皇陛下愿先由双方委员磋商此次划界的预备工作……，并特派全权使节，随时与中国人会商并缔结书面协定，以便双方委员能顺利进行划界事宜，贯彻……。

31

若中国人对此亦不表赞同，并坚持指名会同特派使节本人履勘划界，只要其具有诚意，并与特派使节的任务不相违背……，在不得已时，特级使节可予同意……，并决定原已划定界线的地区照旧不动；至于其他地区，则依据此间业已获悉的及我方为准备其前往西伯利亚而搜集的情报，随机应变，为女皇陛下的利益努力并力求妥善地去划定国界。但必须注意切勿将对俄罗斯十分重要而又十分有利的城市和要塞地段出让……，特派使节可相机在若干不关紧要的地区对中国让步，并诱导中国人对女皇陛下的其他愿望让步，以便我方保留较好的地区……。

33

若中国人对俄罗斯绝对需要的地方坚持不让，特派使节对此切勿稍加迁就，并即将中国人此等坚决要求通知边境委员和其他边境长官，以便其遵照命令严加戒备。然而，特派使节仍应设法完成其他任务，并建立贸易关系……。

逃 民

22

早在沙皇陛下(彼得大帝)时代，就曾特别指派贵族费非洛夫前往调查逃

民。根据其调查，在缔结条约之后，尚有八十四名从中国迁入俄罗斯境内，沙皇陛下曾于1722年7月24日命令西伯利亚总督……，立即将其交还中国……。

23

据劳伦特·郎克报称……，曾与前来色楞格斯克的中国使节等商定于1724年8月15日在国境线上将逃民移交给中国官吏。特派使节应据以向中国使节声明。倘事与愿违，此等逃民尚未移交，或未全数移交，特派使节可将此等尚未移交的逃民和根据条约应行移交的人一并移交过去……。特派使节应遵照友好条约和上述1722年7月24日沙皇陛下给西伯利亚总督的命令行事……。

24

关于缔约后偶尔从女皇陛下辖境进入中国的逃民，尚无确切情报；女皇陛下业已对西伯利亚总督下令，命其据情具报，此项命令即由特派使节过境时转交。若在其报告中发现尚有据约应属女皇陛下辖境的逃民留居中国，亦应根据上项条约要求对方循例移交。

宗教事务

43

几年前，在清帝国北京曾有过一个东正教会。由主教赫拉里翁主持当地宗教仪式，并有一个本堂神父，一个助祭教士和七个仆役。主教及其同伴因博克达汗陛下之命颇受礼遇，甚感满意。1719年，此间曾接中国理藩院致西伯利亚总督的函件，称该主教已在北京逝世，博克达汗陛下准许俄罗斯帝国另派主教至中国接任。沙皇陛下(彼得大帝)……有意发展东正教会，宣扬基督教义，曾于1724年派遣彼列(雅)斯拉夫主教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前往，同去的还有学识不同的(或身份不同的；原稿作 *разнаго знанія*，班蒂什作 *разнаго званія*)僧俗人员十二人。当时对主教及将在教会服务的同人和仆役规定：在彼等居留中国期间，每年由西伯利亚总督府的收入中支给一千五百卢布的薪俸。同时并由俄罗斯枢密院致书中国理藩院说明根据前函的要求已派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在函中并未称为主教，只称为“教会人员”)及其同行教士、助祭教士及其他仆役等前往北京，请求博克达汗陛下准其自由

住居北京，并按基督教徒的习俗举行宗教仪式等……。可是卡尔齐特斯基主教到达中国边境时，因令文开头所指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纠纷而未获准前往北京，一直逗留在边境附近的色楞格斯克。因此，在〔特使〕到达边境时，应尽力设法携同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主教及其随行教士和仆役等前往北京，但切勿声明其系主教和有意留住北京。若在边境或中国境内有人查询卡尔齐特斯基的身份时，就说是教士，为随同举行宗教仪式而去的。在到达北京后居留期间，应相机接近清廷，竭力请求博克达汗陛下准许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及其教士和仆役等不仅能自由居住北京，按着东正教会的礼俗在教堂中举行宗教仪式，并且能到博克达汗陛下辖境的其他地方探望自己的教徒。

此外，并相机尽力向清廷疏通，以便使博克达汗陛下为在北京居住的女皇陛下所属的俄罗斯商人建筑一座东正教会教堂；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及所属教徒即可象博克达汗陛下准许罗马教会的耶稣会教士们一样在那里举行宗教仪式；须请博克达汗陛下赐给必要地基建筑教堂，建筑经费将由女皇陛下财政部支付。博克达汗若由于某些原因而坚决拒绝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留居北京，如特使对此亦觉无望，可在特使离开北京时，在考虑采取其他步骤前，暂先将卡尔齐特斯基带回俄罗斯境内。

44

行抵中国边境时，若因携同卡尔齐特斯基主教进入中国而受到中国边境官吏留难，或特使感到卡尔齐特斯基主教随行将引起中国人怀疑（原文作 *отъ Ызды... китайцы воспримуть въ какое подозрѣніе, 班蒂什作 отъ Ызды... китайцы воспримутьвъ какое...*），以致稽延并有碍特使本人获准进入中国，在此种情况下，就可将卡尔齐特斯基先生留在边境，不必携同前往……。

耶稣会教士

38

为向清廷疏通（缔结商约，见第 37 项），须运用一切有利于此项目的的各种方法。若见到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有某种势力，即应多方设法使其对我方有利。若其愿意协助特使顺利完成使命，可许其人员和信件自由通过女皇陛下下的领土往返中国，以便取得其全力协助，完成特使使命。

……若耶稣会教士真能作出有利于女皇陛下的事，特使于必要时可给以一件具有上项性质的由特使本人签署的保证书，并在此种情况下，特使在返

国时亦可携其同行。(对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请示第四点的答复。)

商务部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训令

(原载:《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5年第4号;班蒂什著作,第477—483页。)

14

调查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城市运往西伯利亚的各种货物,不论是本国货或外国货,以及此类货物和销售最多的货物的正确名称。

15

各种应用船只、雪橇和车辆,无论由陆路或水路运输货物,有无公平的运输费?此等船只是否坚固,有无一切必要的设备,通常有多长,在险滩水道上运输有无障碍?应详细调查。

16

应考察在蒙古可以经营何种商业。除毛皮外,能否从蒙古输入其他货物?能向蒙古出口何等货物(отгуды въ привозе бывають;班蒂什作:туда въ привозѣ бывають)?我们的货物在当地以何种价格出售,他们以何种价格转售?在蒙古使用何种货币?用何种度量衡单位?贸易最繁盛的是哪个城市(гдѣ болше торгъ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班蒂什作:большой...)?有无其他类似地点?

17

在蒙古和中国的贸易上,不仅要查明我们有何等土货可向别国出口,并应查明我们能利用何等欧洲货物运销当地而可以取利。不仅要查明运销俄罗斯有利的货物,并应多方观察能从俄罗斯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货物。

并应尽先正确调查上述货物在北京方面的品种和价格。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运到中国海港的有何等货物,他们又运出何等货物?亦应调查广州城,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它尤其是俄罗斯最便于进行贸易的一个城市,希望我们常能通过水路从北京到广州,并从广州到北京。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调查这条水路的运费价格;为此,应精确了解当地流通的货币

准确的价格，不论是黄金或白银，因为每年要由中国运入一定数量的金银。在中国，他们是否不常改变此等货币及其他度量衡的单位？注意中国的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是否划一；如果是〔种类〕繁多的，并应了解其中的差异和在各地所有的货币和度量衡单位。

18

既然中国人经常同日本人通商，即应尽力调查与日本通商的情况。且当女皇陛下准许在黑龙江经营航行事业时，俄罗斯的任何贸易必然都不比此项贸易更为有利，主要由于费用低、损失小，并且对俄罗斯人出入口运输都稳妥安全。至于荷兰人，他们在日本的各种贸易是最重要的。

19

应将莫斯科到托波尔斯克和从托波尔斯克到北京之间，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不论水路和陆路在全年中每普特的运费制出一份特殊的价目表；并须力求精确。

在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任使节 时耶稣会教士所起的作用

这期间当时的任何重大事件和有效的磋商都不能避开他们。这些人不仅实在聪明，各方面都很能干，并且生活得非常有条理；他们的庭院十分清洁，装饰得象意大利人的住宅。他们对俄罗斯朝廷都表示好感。他们说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都是同一教会的子女，东正教徒也是基督徒；而中国人则崇拜偶像，既虐待天主教徒，又虐待东正教徒。〔他们说〕如何能不喜欢俄罗斯人？难道能背叛上帝，忘掉天主教的信仰？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1月8日（公元19日）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公务日志，第1卷，第303—304页。

当我逗留在北京期间，我同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们有书信来往，我得到许多情报。他们很热忱，但对我实惠不大，因为现下政府亦在抑制他们。

1727年5月10日（公元21日），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寄呈女皇（外交部）的报告书，该件于1727年8月22日（公元9月2日）到达。《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49页正面。

巴多明神父的作用

巴鲁尼(巴多明神父)是个非常干练的人,很熟悉中国事务,颇能为沙皇陛下利益效劳。此外,虽在当今可汗(雍正皇帝)面前不象在前代可汗(康熙皇帝)面前那样受宠任,但他的能力和渊博的学识受到器重。凡用拉丁文书写的信件,都由他翻译。

特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曾同巴多明神父密谈,并嘱托巴多明神父在他进行谈判时给以协助,请其在谈判中对中国大臣相机进言,并秘密探悉他们的特别意图。并希望巴多明神父本着基督教的慈悲精神秘密用书面给以善意的建议,因为彼此因避嫌而不能进行口头联络。特使答应对他本人及其整个耶稣会付给一定的代价,作为对此项服务的酬劳。

巴鲁尼(巴多明)神父起誓作答:他愿在可能范围内效劳,并表示他要照顾特使,(逐字译是:预告特使)并苛刻地说,他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到(俄国的)利益;不过,他不敢留笔迹,他将对使馆的仆人雅可布·尼可拉耶维奇口述,特使便经常派雅可布·尼可拉耶维奇去罗马天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并借口为使节领取雀麦白面包作掩护,以避嫌疑。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公务日志,1727年,1月7日(公元18日),第1卷,第299页。

巴多明神父的作用

……在我离开北京以前,我同叫做“巴多明神父”(巴鲁尼神父)的法籍耶稣会教士建立一项密码联系。他受到已故可汗(康熙皇帝)很大的宠任,虽然他在当今可汗(雍正皇帝)的面前不很被信任,但仍被多次召到议政王大臣衙门。这个神父设法使我同可汗的机密顾问进行密切联系,这位大学士叫马齐,他是首席大臣,通过这种方法,我可以预作防备。经这位神父介绍后,马齐殷勤地答应在决定派遣三位使节前往国境时,一定为陛下效劳,因为那三位使节是由他派遣的。我答应从边境上给他送去二千卢布的礼物。

……上述的巴鲁尼(巴多明)神父通过其旧友劳伦特·郎克的介绍同我作友好往来。我们利用克鲁沙里修道院长进行联系,克鲁沙里每逢节日就到罗马天主教堂,并同这位耶稣会教士就女皇陛下的事务进行秘密通信。这位耶稣会教士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他答应在可能的范围内为女皇陛下效

劳。他并曾同伊兹玛依洛夫认识。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5月10日(公元21日)呈女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7年8月22日(公元9月2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450页。

……

〔1727年〕9月5日(公元16日)……在商队出发之前,在斯切尔卡的驻中国使馆的边境事务处收到二千卢布的皮货……,此项系从商队财库拨出。从其中已取出一千卢布,由领事劳伦特·郎克带去,送给我的秘密通讯者——当权的机密顾问马齐。并给转交的中间人——那位耶稣会教士一百卢布。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41页。

当我在北京逗留期间,通过耶稣会的神父们,并利用礼物,找到一些善意的人。他们虽很难协助我,但他们通过秘密通讯却向我暴露中国大臣们的许多阴谋诡计和各种策划。在这些人中,现任秘密顾问马齐——即在我以前的报告中所指的那人——他给我很大援助,并答应今后继续协助我。我通过商队给他送去一千卢布的皮货作为礼物,并给中间人巴鲁尼(巴多明)神父一百卢布。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9月28日(公元10月9日)呈女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7年12月15日(公元26日)。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54页。

蒙古人噶尔丹在萨瓦·务拉的 思拉维赤使团中的作用

噶尔丹是一个年老的王太子,被称为“台吉”,相当于团长级的官员①。因年纪关系,在蒙古人中很受尊敬……。他是已故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柯罗文〕时期宣誓〔为俄国〕尽忠效劳的七个“台吉”之一;后来〔1689年〕,他们叛离了。

① 应指蒙古各旗军事指挥官梅伦。——译者

在一天清晨四点钟时，他悄悄来找我，并哭泣着宣誓……：他要秘密为俄罗斯帝国效忠，并向我泄露中国大臣们所有的计划。我起初虽对他不很信任，但他已把一切都告诉我，并将中国大臣们的阴谋和行动都告诉我。中国大臣们和他一起在白天所决定的事情，他在晚上就通过他的家属都通知我。在国界问题上我们所获得的利益……，实际上我只看作多半出于他的热心，并非其他原因，我答应秘密给他每年二十卢布，直到他死为止……。不过，他已不能活很久……，因为他已有七十岁。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9月28日(公元10月9日)呈女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7年12月14日(公元25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56页。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对于劳伦特·郎克的判断

直至目前为止，就我和劳伦特·郎克谈话所得的印象，他似乎是个善良的人，他在自己所能作到的范围内热诚地维护陛下的利益。

萨瓦·务拉的斯拉维赤于1726年5月6日(公元17日)呈女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6年8月18日(公元29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81页。

……领事劳伦特·郎克……，看来是个善良的人，在实际上，凡付托他的有关陛下利益的事情，他都是很关心的。这一带边境的人民对于他所采取的妥善措施感到非常满意。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8年4月22日(公元5月3日)呈沙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8年7月13日(公元24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8年第10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837页。

他(劳伦特·郎克)不仅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而且对国家事务非常用心，他和中国人来往和对边境的事务都有丰富的经验，因为他生活在边境上已有十多年。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8年6月30日(公元7月11日)致巴赫尔

慈上校的训令。《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945页。

西伯利亚的价值 根据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所见

根据我的责任，我亦应报告：西伯利亚——就我所见和了解到的——不是一个“政区”（一个省），而是一个具有各种地利和丰富资源的帝国，它有四十多条大于多瑙河和一百多条大于涅瓦河的河流……，这里对于种植小麦、捕鱼、猎取野兽、开采各种矿物和各种大理石都很适宜；它有繁茂的森林。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如此异常美好的地方①。

但因许多理由，特别由于地区辽阔、人烟稀少、从前行政官吏的昏庸和边境的紊乱情况，西伯利亚却变得非常荒凉。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6年8月31日（公元9月11日）呈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6年12月3日（公元14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151页背面；1726年第18号（抄件）。

西伯利亚一些地方的情况——需要建立要塞

国境线上所有要塞——尼布楚、伊尔库次克、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的处境极形孤单，全部用木料筑成，而且都已朽腐不堪。要塞附近的住房尚无围墙。应该加强这些地方的防卫设施，不妨先修建一些木栅……，至少可以防备蒙古人的进攻。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6年5月6日（公元17日）呈女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6年8月18日（公元29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87页正面、88页背面。

色楞格斯克实际上既不是城市，也不是村庄，更不是一个小村落。色楞格

① 人们可以把夸耀程度不下于此的贝尔的意见与之相比，见贝尔：《由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的旅行》，格拉斯哥出版，1763年，四开本2卷，第1卷，第207—208页。——原注

斯克总共只有二百五十间破坏不堪的住房和两座木料建筑的教堂。如果——但愿上帝保佑！——敌人来攻打，在两小时内就可以烧光。

……边境城市尼布楚，据说情况更坏，不仅要塞是木料建成的……，而且地处山麓……，向那里投射火箭，半小时内就会化为灰烬。

……至于在色楞格斯克附近修建新要塞……，一旦动工……，陛下财政部只拨给少量经费即可，只要给巴赫尔慈下令建筑要塞并派去一个能干的工程师就行，并应命其立即动工修建……，中国朝廷不会表示反对，因为中国朝廷在不久以前曾在边境上修建诺文城①（齐齐哈尔）……，在边境上增加沙皇陛下的兵力将会增加中国人的恐惧，希望用威胁或其他手段，使其为沙皇陛下的最高利益服务。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6年8月31日（公元9月11日）呈女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6年12月15日（公元26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6年第4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164页正面。

在色楞格斯克附近设立一座要塞实属必要，因为整个西伯利亚尚无一座正式的要塞，甚至尚无非正式的要塞……，只不过有些用木料筑成的劣质要塞，此种要塞可以立时被焚。在北京和在边境上，中国大臣们曾尽情嘲笑地说，“俄罗斯帝国没有一座要塞能在我们的兵方面前支持八天。”……再说，在北京的一个大臣，军务部次长（兵部侍郎）图勒成（图理琛），在过去的1712年曾被派为驻阿玉气可汗那里的使节，他返国后著有一书，据耶稣会教士称：此书对于俄罗斯帝国的最高荣誉并无益处。书中写道：在整个西伯利亚，并无一座要塞，炮手只要在一小时内就可将那些劣等木料要塞烧光；如果有二万名勇士长驱直入西伯利亚，他们就能荡平所有的城市。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关于在国境建筑两座要塞的意见书（1729年）。《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1卷，第1071页背面—1072页正面。

在新确定的边界上，中国人几乎十倍于俄国人……。

如果俄罗斯帝国希望将来把中国人从黑龙江上扫除干净，以便自由通往拉马海——即堪察加海……，或是企图顺着石勒喀河直到黑龙江，并顺着黑

① 蒙古语，释义为绿。语源出于诺文木仑，盖即绿色之江，汉译为嫩江。该城临近此江，故名。——译者

龙江一直出海，绕过朝鲜，向中国内地航行……。

同上书，第1072页背面、1076页。

西伯利亚总督的行为

上述一切紊乱现象，都出于边境上从前官吏的治理不善，当我在北京驻留期间，对于许多事情和许多不正常现象都可以作证……。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北京的档案已载有从俄国来的五十多个使节和特派代表。国家的外交当局很清楚，到中国来的正式使节团并未超过四个，〔即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哈尔文和劳伦特·郎克、伊兹玛依洛夫和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以上所指来北京的其他一切代表，都是以前的军官和行政官，只为经商谋利和个人兴趣从西伯利亚派出的。在他们所携带的函件中，这些人都以“特派代表”和“代表”的身份出现；可汗（博克达汗，即中国皇帝）的朝廷以真正使节的待遇给以食物、交通工具和其他方面的优待。以后看到此种紊乱现象，中国朝廷乃立即禁止任何人前往北京；以致贸易中断并停止正式商队的来往（表面上是在其他一些借口下提出的）。在我所发出的文件中，也提醒不要任意派遣一两个人携带函件出国，不要给任何人以“特派代表”或“代表”的名义。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9月28日（公元10月9日）呈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7年12月15日（公元26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原件），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59页。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关于俄国商队 在北京（1729年6月）的前途问题的意见书

……如果不能以皇帝（沙皇）陛下的名义派遣商队，那就不妨派遣个别的、甚至是小规模商队，以便不中断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关系。中国人向来缺乏持久性，只要偶尔未加派遣，在将来就可能完全拒绝接纳商队。目下商队虽无利可图，但是，当商队只属于一个重要人物而毫无其他掣肘时，无论是国家的贸易或在北京的私人贸易，将来都会有起色的。

原件签字者：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日期：1729年5月29日（公元6月9日），于莫斯科；1729年6月4日（公元15日）发出。《莫斯科外交部档

案》，1729年第4号，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1083—1085页。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关于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和关于中国商业的秘密报告第7章和第8章的分析和译述。

第七 章

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道路有六条：

1. 由色楞格斯克和由恰克图经过布拉河、鄂尔浑河、土拉河和戈壁。必须走四十天左右的路程（从恰克图到张家口）。

2. 从克鲁伦河出发的一条捷径，可以近一半，但为中国所封锁。

3. 由尼布楚经过诺文城（齐齐哈尔）到北京。从尼布楚到诺文城为二十五天，从诺文城到北京为四至五周。这是萨瓦齐耶甫所走过的道路。齐齐哈尔被一个用砖砌的四方形城墙所包围，并有三千到四千名驻军。沿途所经，到处都可以发现富源。

4. 一条未经探察的通过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水路，然后经过陆路到中国的盛京①（辽东）省。

5. 〔由尼布楚〕顺石勒喀河而下，直到黑龙江；通过黑龙江，总可以自由到达吉普索（译音）〔热索（译音）〕海或堪察加海，该海环绕朝鲜岛的尖端仅约七百俄里（746.9公里）。看来有一条海道——不必怀疑——，可以进入中国的著名海港天津；从天津到北京只有七十俄里（70.69公里）②。通过此路难免发生战争。因此需要一支坚强的舰队。这是属白令③主管的事情。

6. 通过拉马河，此河注入吉普索或堪察加海。需要一支小舰队。

第八 章

中国境内设有厘金捐局（河道及其他处），捐局发给收据，一次的收据对所有捐局都有效。

中国同日本的贸易非常活跃。大部分的贵重金属、精致的瓷器和优美的装饰用品，都是从日本来的。日本货比中国货价值高三倍；人们将这些日本

① 当时应称盛京或奉天，原文出处不详，待考。——译者

② 原著文中北京天津之间的距离里程有误。——译者

③ 白令·维斯图（1681—1741年），俄国海军军官。原籍丹麦，以卓越的远航探险著名。——译者

货称为暹罗货。

中国人以丝绸和烟、茶交换蒙古人赶到北京来的马匹和牛羊。

同俄国人的贸易很有限。其中主要贸易商品包括俄国皮货和中国人所不愿付出的金子与银子。金子是从印度和日本来的。宝石的出口是被禁止的。金子在中国虽不昂贵，而且向俄国输出金子也非常有利，但中国人不愿用金子交换俄国商品，他们只为了换取银子才卖掉金子。

过去，在十七世纪末叶，俄国和中国贸易曾经非常活跃，对俄国人非常有利。那时俄国人控制黑龙江流域，而满洲人却忙于战争，顾不得去打猎。尼布楚条约和满洲人的入主中国就改变了此种情况。此外，康熙皇帝优待欧洲人；大臣们喜爱华丽的服装。雍正皇帝却禁用貂皮和白鼬皮制衣。在澳门和广州，他将进口税从10%提高到16%。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运来呢子、玻璃器等，还有大宗银币。他们用来交换丝绸、茶叶和其他物品。然后，他们就去印度将这些商品换取金沙、银器和香料。他们必须先卸下炮火，在他们上船离境时再还给他们。法国人曾试图在广州设一领事。他也费了很大的劲才重上了船。

中国人把白铜当作银子来交换，把黄铜当作金子来交换。雍正禁止输出黄铜，因为这些黄铜是用来制造“giek 或 djok”（小钱）的，人们把这些小钱成百或成千地串在一起。金和银都贮藏在国库中。称为“库平”金银，比“商用”金银要纯五至六倍。有黄底金字招牌的店铺是皇帝的各种银号，这些银号以1%的月利（若是可汗银则加倍）典押出借，六个月以后就有权将抵押品没收。中国人曾问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沙皇为何经商？他就用这些银号的例子作答。

货币是以两（中国银两）计算的，用剪刀来剪断金片和银片，每人总是随身携带戥子和剪刀。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秘密情报，1730年第5号，第60—69页背面。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关于 俄国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意见书

在以前的商队中，允许专员、宣誓商和其他人携带私人商品进行贸易，使政府三分之一的商品须经几个人的手才卖出去；头等商品都归私人所有，中等及下等商品就留给商队；每人都有马车、雇工、马匹、给养以及留归财政部

的其他东西。这些人得到不正当的巨额利润，却使国家利益受到巨大损失。今后应根据下列准则派遣商队：

1

在北京和中国可汗帝国的其他地方，不论任何级别和名义的人，都不例外，不得以任何借口或目的买卖除商队所携官方皮货以外的其他皮货，亦不得将此种皮货暗地或公开地运往外国。如有违犯，不仅没收商品，并须予以严惩。

2

每隔三年往北京派遣〔官方的〕商队……。

3

商队的领队、事务官、专员、宣誓商、雇工及其他人，在北京或在清帝国其他任何地方，不仅不得买卖皮货，亦不得买卖其他任何商品，绝不许私人贸易损害官方贸易……。

4

为此，应规定此等人员须以现金支付年俸，不得以商品支付，即：给事务官二千卢布……；给终身任职的、或任职十年为期的专员以一千卢布以上……；给十二名任职十年为期的宣誓商每人每年二百卢布以上……；维持一个书记官、两个录事……，书记官一百卢布、录事五十卢布……。

5

从驻托波尔斯基的卫戍团中或从新兵中编成一支五十到一百人的小队，配属商队……。他们将作商队的各种工作，他们将听从事务官或专员的决定出发或返回。

7

……从中国出境后，一经查出私人商品，不论多寡，应一律秉公没收归陛下财政部所有。

编制商队组织一览表,以便在派遣前往北京的商队出发后,在斯切爾卡留駐三分之一的宣誓商和其他人員,为財政部收稅并为下次商队准备出发而采购商品……。将这些商品集中在斯切爾卡,即集中在奇科依要塞,并将商品妥存官方仓库……。

在采购商品并准备遣送商队的工作就绪后,就有赖于事务官和专员相机行事了。在逗留北京期间,便于经常了解各种情况,为遣送下次商队作准备……。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9月28日(公元10月9日)呈沙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时间为1727年12月15日(公元26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73—675页。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 关于私人贸易的意见书

西伯利亚各阶层居民,尤其是士兵,直到目前,大都依靠贸易而不是依靠别的来维持生活。他们都有骏马快枪,甚至在不需要他们的地方出现,可是,他们一向没有〔商业〕技能,根本没见过正规的商业。近年〔沙皇〕陛下已经下令禁止士兵经商,商业完全落入小商人①手里。这些小商人无形中发了财。他们在边境不作任何防卫准备,一切防御全靠士兵……。如今,不让士兵经商,他们极感困苦,濒于破产。尤其是他们已难保有马匹和准备使用的枪枝……。他们领着微薄的薪饷……,他们不敢经商,所有的商业都已交给商人。尤其是那些最富的巨商——大俄罗斯的居民,直到现在,他们还派出雇员,每人都带着几万卢布,每年要作二三十万卢布的买卖;他们大都不交付关税,并妨碍西伯利亚的居民。库伦商务繁荣,商人和边界上的人造成各种混乱,因此,近日从库伦来色楞格斯科的专员米契尔·康达科夫说道,库伦现有

① 此字的原意:посада, слобода,即做买卖的地方,系指进行贸易的郊区。参阅И. 科斯托马罗夫:《十六—十七世纪莫斯科公国贸易简况》(俄文本)圣彼得堡,第2版,1889年,8开本,第144、162、172页。——原注

二十多万卢布的皮货待售。三个最大的俄罗斯商人是：马蒂沃·埃弗洛伊诺夫、米克里亚耶夫和维依亚特卡的波布罗夫。

章 程

1

〔根据恰克图条约〕在俄国边境建立的两个地点或商埠(自由村),已与中国朝廷商定在该处自由进行贸易,除牲畜和皮货外,边境居民得买卖一切商品。禁售皮货的目的在于不使官方商队遭受损失;禁售牲畜和食物则在于不使一切人挨饿和不使边境的居民破产。对于其他一切商品,所有西伯利亚居民,不论职位品级,在其交纳通常关税后,均可自由进行贸易……。目前应由皇帝(沙皇)陛下下令;士兵、小商人及各色人等,各自量力,委由经纪人在上述两地交付通常关税后,即可进行贸易,以便商人(直接地)和士兵(通过代理人)能够自给自足。

2

除官方商队的成员和西伯利亚当地居民外,禁止任何人至中国边境贸易。

3

大俄罗斯商人及来自俄罗斯的其他人,除去中国边境外,可听任前往西伯利亚各地经商,得购买皮货和未经禁止的其他商品,得将此等商品运销俄罗斯,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圣彼得堡,并得运销波兰、土耳其、波斯等国,以及其他适宜地方;但中国边境必须全由西伯利亚人去经商,因为西伯利亚人并无其他途径,亦无其他商业。

4

……约有三分之一的皮货缴纳关税;许多商人多方逃税,甚至不缴纳任何关税,由于地区辽阔,难于缉获(以前虽无任何缉捕的命令,商品常在并无关卡证件副本的情况下就被运走,分头逐利,各找出路)……。

……边境兵员原已编配足额……,除雅库次克外,都领有薪饷。他们有一千多名,但因需要被召服役时,正如我目前所见,甚至不可能凑集百人之数……。此种不正常的现象……实由于……边界上的专员及其他行政官

吏……。

兹提出……以下建议：

按例留驻三分之一士兵……为财政部征收毛皮税……，将其他三分之二士兵交由巴赫尔慈上校指挥，以便使其能加管束，倘有违犯军纪情事，即应依法议处；并利用其修建要塞……。

此种措施除用以约束边境不尽职责和非法活动的专员以外，对其他任何人均无妨碍。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1727年9月28日(公元10月9日)呈沙皇(外交部)的报告书，收到日期为1727年12月15日(公元26日)；《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9号(原件)，使节公务日志，第2卷，第677—679页背面。

西伯利亚总督多尔葛卢科夫亲王 对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建议书意见

对于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意见……。

第一项，除官方皮货贸易外，如果完全禁止此种贸易，则关税的征收较诸往年就将有所亏损，在皮货贸易方面，关税的征收额相当可观。

第二项，最好由枢密院为此种商队确定两个专员，其一配合现有商队，同宣誓商一起前往清帝国。从中国归来后，携同由该处出口的商品回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当这个专员去中国时，另一个专员就收取财政部毛皮税并征收二次商队预定要交给财政部的实物税和其他税款。

……在商队中，专员难免有营私舞弊或造成损失等情事发生……。由于路途遥远，不可能迅速地在专员和宣誓商之间查明此项损失，在他们之中若有一人死亡，此项损失就成为既成事实而不可能进行调查……。

第三项，如果准许他们(事务官、专员、宣誓商)携带皮货和其他商品，即使数量很少，也应考虑到……事务官、专员、宣誓商和工人，他们为了本身利益而给自己选择质量最好的皮货和其他商品，而此种优等商品在商队中却很少有；并且当他们到达北京时，在进行官方贸易之前，他们将都为本身利益暗中忙于尽早出售此等商品，以便争取个人所需的上等货物，甚至不惜贱价出售其所携商品；当北京人士见到优等商品价格不高，他们对于收买各种官方皮货就将坚持较低的价格。此种非正规的贸易虽属有限，也将使官方商队大

受损失……。

第四项，俄罗斯帝国的货币不能在北京流通；如果向事务官、专员、宣誓商、书记官、录事等发给现金薪俸，他们到北京时必将缺乏必需的物品。如果按照伯爵的建议将他们三年的薪俸提前发给，这就是一万三千二百卢布的费用，还不包括雇工薪给在内，此项预支将成为很大的浪费。

我们认为应该依照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建议发给正式薪俸；伊尔库次克省的长官按照定额以本商队的皮货和其他商品作价支付，不得挑选；这些皮货和商品将随同商队运往中国，商品都盖上皇帝（沙皇）陛下的伊尔库次克印玺；当他们到达清帝国时，在尚未出售和交换官方商品之前，他们绝对不得将指作薪俸的商品出售和交换；在他们出发时，伊尔库次克的长官应使他们在保证书上签字，若有违犯，即科以严重罚金……。伊尔库次克的长官绝对不容许他们有任何其他皮货或商品……。

第八项，被派随同商队前往中国的专员和宣誓商，应按例在西伯利亚“政区”诸城市自行收集并以货币购买为此次商队出发所需的皮货和其他商品，以便使他们在将来不能借口从西伯利亚“政区”诸城市所携皮货和其他商品不适用或估价及购价太高而发生争执。

……应规定商队专员及宣誓商本人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出售陛下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时，不得乘机牟利，陛下财政部就定可获利。此时，专员和宣誓商将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誓言为陛下寻求利润，并为其自身寻求恩赐或荣誉，他们将同商人一样以最公平的价格出售中国商品。但如按例听任那些原有的估价人在莫斯科对此等商品估价，而这些估价人将中国商品以蒙古商品作价，并使商人等以最低价格自行出售，势必不仅无利可图，且因各种开支终将亏本。例如，在市场上愿以二十卢布购进的商品，即将被估为十卢布或稍低价格，就将使商队专员和宣誓商借口未经参加审定的价格使他们感到非常困难。

……在西伯利亚“政区”，并无“葛斯奇”。……当禁止俄罗斯“葛斯奇”在中国边境进行贸易时……，他们就只好在他们的城市守候运来西伯利亚的商品，而在遥远城市的西伯利亚商人，因资本有限，也不会将商品从〔中国〕边境一直运送〔欧洲〕俄罗斯诸城市，这就将使关税蒙受亏损。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27年第3号。

劳伦特·郎克对于“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 的建议”和“多尔葛卢科夫亲王对俄国 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说明”的意见

有关通过官方商队和北京进行贸易以及在中国边境的私人贸易方面，为国家的最大利益和普遍利益设想，领事劳伦特·郎克向枢密院当局陈述如下：

要将在北京的贸易恢复到同往年那样繁荣，看来很困难。如果还想从此种贸易中期待某些成果，实非易事。然而，倘能设法补救，至少需要十年至十二年才可能达到目的，因为：（一）必须让中国人有时间来消费历年公私贸易运去的大批商品和皮货；他们将会用尽已有的俄国商品，那时就不得不以高价向商队购买；（二）于是（依照枢密院大臣伊里利的伯爵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和西伯利亚总督及其助理人员的建议），应该密切注意不使中国人以任何借口接受任何地方的皮货而只接受每三年一度的向来携货不多的官方商队的皮货。这些商队将经历数年后再去中国，其任务在于履行和约，而不只为了图利，在于不让中国人认为两帝国内的贸易关系已经中断，此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俄国商品在北京的价格提高到与从前一样时为止；那时，为了俄罗斯国家的利益，就应该按照合理的原则和妥善的步骤恢复从前那样大宗的、有利可图的贸易。

据此原则，应作如下的改进：

（一）应让陛下财政部的大部分皮货在西伯利亚诸城市长期存放，不求任何利润。

（二）今后应停止在中国边境为陛下财政部征收关税——西伯利亚总督在其意见书的第一点中也表示此种意见。

（三）西伯利亚的臣民，尤其是边境的人，长期以来依靠与蒙古人经商为生；若禁止贸易，实无异杜绝其赖以维生的途径；所以他们也必然请求恢复从前的贸易。对于前两项的改进，我认为应该准许那些愿意经过俄罗斯帝国各重要城市输出皮货的人如此去作；也准许他们在波兰、普鲁士、瑞典、丹麦及其他各国照样去作；对于此种贸易将可以象从前那样为皇帝陛下财政部征收关税；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关税将是从小别城市征收，而不是从以前那些城市征收。对于上列第三项改进意见中所提到的西伯利亚遥远地方的臣民，此种方法只能使他们得到非常有限的满足与生活资料……，虽则他们都善于经

商，但也无济于事，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离家远行。一旦禁止在边界上贸易，他们定将不缴纳必要的税款，并通过所有偏僻小道和被禁止通行的道路（此种情况已迭有发生），而在暗中把商品运送到蒙古人那里去。富裕的人们看到有利可图，甚至照样来作此种贸易，无须远离他们的家庭；而蒙古人或中国人从他们手里收到这些商品，总要转运到北京出售。因此，就很难希望今后商队能获得巨大利益。在边境上的监督人员可以——也是有困难的——通过周密而经常的监督与注意来引导这些地方的居民和“葛斯奇”到别的地方去经商；让贫苦百姓满足于耕作、作各种手工劳动、贩卖牲畜及其他类似职业；但这些监督人员却得不到任何薪俸（在西伯利亚，除哥萨克人和当地某些显要人士外，均无薪俸），其他官吏则不得不依靠自力营生，一旦有利可图，决不放过机会。

最近与商队一起逗留北京期间，我有机会看到在监管商人方面的极大缺点：在中国边境，直至商队从北京返国时止，严禁任何皮货输出库伦，以便不致妨碍商队的贸易；在各个不同的时期，蒙古人曾不断地将此种价格极低的商品大量运到北京，致使中国人感到不很需要商队。当我为着边境事务逗留色楞格斯克期间；据蒙古人的要求，我曾多次派专人到库伦领回一些俄国人，约二十多名或更多些，他们都无护照，非法进入库伦经商；此外，他们生活放荡、酗酒、行为不法，他们如此任性，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向我请求保护，以免遭受这些人的危害。当这些人根据我的命令从库伦被拘送本地地方法院扣押候审准备接受公正的处罚时，别人却把他们放走了。我从未见到也未听说他们由于此种罪行而受到任何处罚。此等事实足以说明在这些本应需要缜密注意和认真监督的地方，却显然存在着缺点。

同中国的贸易对国家弊多利少，我认为最好将此种商业有条件地让给“葛斯奇”的公司去办理，“葛斯奇”为他们的利益设想，他们自己会组织必要的监督制度以便防止其他商人混进他们的贸易中去。此外，他们还可给边境的贫苦百姓借以维持生活的工作。可是，如果把同中国的贸易让给这种公司，我认为最好的措施似应首先准确了解前往中国的商队在最初几年和以后几年和最后几年中的盈亏；也应了解在库伦建立的蒙古贸易对于商队的贸易一向具有如此悲惨的影响，以致商队的贸易几乎完全破产；应该明了在对蒙古贸易中所征收的关税能否补偿给商队造成的损失以及边界上的关税征收机关每年所收的款额若干。

关于首批各商队和以后各商队的利润，我从未得到任何报告，鉴于往日

那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不认为在西伯利亚可以收集到若干详细的情报。但是，通过私商，不论是俄国的或中国的，我听说在最初几年中，在西伯利亚的皮货收购价格和在中国的出售价格如下：

西伯利亚	北京
貂皮：每张四十、五十和七十戈比	一两，一两半，三两〔银两〕
上等白鼬皮：每百张为五到七卢布	四十两，五十两
松鼠皮：每千张为八到十二卢布	六十两，七十两，九十两。
红狐皮：每张为六十、八十、一百戈比	二两，三两，三两半
野狐皮和黑褐色狐皮：每张为五、七、十二卢布	二十两，三十两，五十两

携至中国的其他商品出售时，都能获得很大利润；鉴于中国商品在俄国也可望获得巨额利润，因此，凡是有办法的人，就无需很多资金，即可发财致富。

此种贸易，在西伯利亚以至在俄国都引起巨大的竞争。可是，由于除了商队以外，任何人都无权到北京经商，所以有些富商时常冒称宣誓评价员，以相当数量的商品参加商队。此外，同邻近蒙古人的贸易亦已开始（过去只同他们交换牲畜或马匹），此种贸易是当时的驻军长官和其他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许可的，此等官员可能由于无知而认为此种新型的贸易有利可图；然而，他们此种贸易的借口为只是同蒙古人交往，这对于同中国进行的贸易并无妨害，而且在边境上的关卡还可以从此种贸易中为国家的财政部征收巨额税款。

后来商队的贸易却逐年衰落，每况愈下，在西伯利亚以一两个和三个卢布出卖的貂皮，在北京只卖七、八十分，一百分到一百二十分，最好的才卖一百八十分，一百分相当于一两。白鼬皮在西伯利亚每百张卖十至十四卢布，或更多些，在北京则卖八两，最好的卖到十二两；松鼠皮在西伯利亚每千张卖三十到四十卢布，在北京为二十八两或三十二两，特别出色的有时可卖到四十五两；红狐皮在西伯利亚每张卖八、九十至一百戈比，或一百五十、二百五十戈比不等，或更多些，在北京最好的卖八、九十分或一百一十分；黑褐色狐皮和野狐皮在西伯利亚每张为二、三十至五十卢布，在北京为六至八两，最高至二十两；价格并不固定，还总是用商品进行交换，只有一小部分折合银子或金子。由此可见，此种贸易从前是如何有利可图。甚至目前只要能妥善监督，还算差强人意。但是，专员所表现的无所谓的工作态度，已使西伯利亚的商品在北京的价格比在西伯利亚的价格要便宜得多，我很怀疑征收关税能否补

偿商队的损失，因为我从未听说过在边境上的此种税额特别有所提高；如果能提高税额，那末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损失，很难还有别种看法。因为在边境的贸易从未受到监督，且如上述，商队已因此而大受其害。

以上说明无论是在最初几年或以后几年中，在商队的损失和关税的收入之间，都得出准确计算的差额；但这一切都使人们看到目前在北京的贸易全是不利的，而且即使近在边境上的贸易也不能获得很大的利益。最好的补救办法可能是：对关税的收入及对商品的出售情况进行十分确切的登记；允许在边境上自由贸易，并征收关税；将此种贸易的行政管理委托给一个忠诚可靠和对此种行业具有经验的人，他并应是个不需依靠受贿和舞弊来维持生活的人；当地一切行政管理人员、商人和一切与贸易有关的人都受其管辖，使其能及时预防一切紊乱状态和处罚违反皇帝陛下利益的行为。

在此种管理下，我希望在几年后不难研究过去和现在的差别（只要根据有关材料），并进而采取必要措施，考虑以何种条件将此种贸易让给一个公司去经营较为适当。根据和约的最后条款，边境的人可以在以下两处进行贸易，即在色楞格斯克那边的恰克图和在西布楚那边的粗鲁海图，两地相距约一千俄里，要是并无胜任此种职务的人手协助，就很难独力管理得非常妥善。如果按照上述计划对那监督边境全部贸易的人或人们实施此种规定，他们就必须置于至尊的皇帝陛下的庇护之下，并由政府的一个部来管理。因为距离如此遥远，如果有人按照自己的宣誓很公正地执行任务，那就不免使事情对某些人发生障碍。

我认为最好建立边境贸易。正如在我呈外交部的工作报告中所讲述的，在上述两处，两大帝国的商人可以完全自由经商。但在北京却不能如此自由，在不久期间，私商就可能因此破产。

在此种情况下，为不使对中国的贸易及对中国人的一切关系中断，应命令商人和各阶层俄国人自行商定合理价格并以现款交易的方式出售在边境贸易中所需的一切纳税皮货和财政部收存的皮货；除从财政部购买的皮货外，禁止任何人贩卖并输出其他皮货。从俄国携来的其他一切商品，甚至是条例所禁止的，除皮货外，经再次征收关税后，得准其出售。出售皮货所得价款可用以换取“阿尔贝尔突斯塔勒”（“爱芬姆基”，金币），组成的商队用此种金币并携同三、四万或五万卢布的必需商品和皮货去北京换取黄金、宝石和其他珍贵物品，此种物品的出售和迅速交换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此项运价不会很高，人、马匹、车辆、等等……，此种运价过去所费很多，现在已可

减少。

我认为此项计划对于皇帝陛下的利益并非毫无用处，因为财政部的一切皮货都将顺利出售，换取现金获利；征收关税也可获得利益；私商们在上述商队顺利归来时，可在边境贸易上交换商品，从而获得利益和生活资料。

1730年6月30日(公元7月11日)。

领事：劳伦特(朗特)·郎克。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0年第6号。

俄国科学院第一部征集的中国典籍

1727年1月22日(公元2月2日)

中国人有两部著名的汉文辞典，一部是《大词汇》①，另一部是《海编》②。

耶稣会神父也在中国编著了若干种……。

(一)郭居静神父③，意大利人，以西洋字母音序编著《汉字四声字典》。

(二)金尼各神父④，曾编《西汉字典》，在北京出版。

(三)鲁德照神父⑤，1658年他在澳门所著的两卷辞典刚出版即逝世。

(四)恩理格神父⑥于1676年亦曾出版一部辞典。

外交部于1727年1月22日(公元2月2日)致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函的原件和俄译本，收到日期为1727年5月8日(公元19日)。《莫斯科外

① 恐系指《康熙字典》。——译者

② 疑指王应麟编《玉海》。——译者

③ 郭居静神父(1560年诞生于萨尔札纳，从1594年起即同利玛窦神父一起在中国，1640年1月卒于杭州。)曾著有：《性灵指主》。——原注

郭居静，意大利人。明万历25年至中国。——译者

④ 金尼各神父(1577年3月3日诞生于杜爱，从1610年起就在中国，1628年11月14日卒于杭州。)曾著有：《西儒耳目资》，依照欧洲字拼音为“Si jou eul mou tsen”。书共三卷，四开本。——原注

⑤ 鲁德照神父(1585年诞生于尼札，1613年来中国，1658年5月6日卒于澳门)，编写《汉葡字典》即《字考》，直至逝世。——原注

⑥ 恩理格神父(1635年6月25日诞生于格拉茨，1656年出发至中国，1684年6月卒于赣州府)，曾著有：《文字考》，即《汉文—拉丁文字典》。

参阅索马沃热：《耶稣会图书馆》，布鲁塞尔及巴黎版，第10卷，1890—1909年；哥尔杰：《中西印字馆》，巴黎版，1901年，八开本。——原注

交部档案》，1727年，第8号。

第十一章 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

那些人(这是中国大臣们说的)不接受东正教的信仰，只不过是欺骗俄国神父；有些人伪装信仰东正教，只为接受某些礼物和一个〔银质的〕十字架，但在赠品到手后，他们仍是中国人。就情理说，儿子怎能脱离父母并抛弃诞生时就已接受的信仰而另去接受别种信仰？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骗局。在中国，首先在北京，只有几十个中国人受过俄国教士的洗礼。大部分是挑水夫，他们是奉命给特使住宅挑水的。在俄国人逗留期间，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谁看见或听见有人带着十字架？确无一人，这只是骗局。

应该承认中国大臣们说的是实话，凡在特使住宅挑水的和在住宅工作的人，一向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没有一人带着十字架。特使有时也问过新入教的教徒何以不带上十字架。有人说将十字架送去镀金，并有人说十字架丢了……。

另外还有个例子，那些大臣们说：一百五十多年以来，耶稣会教士们努力在中国传布罗马的天主教信仰，确有许多中国骗子为接受礼物曾在一小时内接受罗马天主教信仰，但后来他们实际上仍是生活在原有的〔中国佛教的〕信仰中，并欺骗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教士们写信给他们的上级(总会长或教皇)说：他们已为很多中国人洗礼，并希望为更多的中国人洗礼。只需要给他们寄钱来，以便网罗入教并协助传教。欧洲很多国王将此事看作神圣事业，给耶稣会教士汇款。耶稣会教士写信说他们已为罗马天主教信仰劝说二十余万中国人入教；实际上，他们很可能作过这样多的次数的洗礼，但是目前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在全中国不到二千人。耶稣会教士想欺骗我们的人民；他们公开地欺骗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王，因为给耶稣会教士们的钱，在中国仍是留在他们(在中国的神父们)手中。中国人仍然依旧保留原有的信仰。

中国大臣们于1726年12月15日(公元26日)在会谈中对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公使的声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公务日志，第1卷，第272、273页正面。

参 考 书 目

说 明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包括好几种与本书有关的手稿：

1. 在十七世纪时，手稿有“散页”，是一张张长而狭的纸张，只在正面写字，背面用来记载改错、日期和签名。它们是装订起来的，没有装订的那部分往往损坏得很厉害。为了补救这个缺点，彼得大帝于1700年12月11/21日下令：从今以后使用本子，两面都写字（《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四卷，第1817号，第86页）。

2. 因此，自十八世纪以后，文件都汇总成册；自1722年起，每一本本子代表一类文件（如外交部与枢密院的信件来往——与最高宗教会议的信件来往——与西伯利亚总督的信件来往——与各省总督的信件来往等），各有一个号码：如1725年第1号，1725年第2号，等等……

这些本子每年合订成一至三册，每册有一个小小的拉丁字母编号，以资区别，例如：CB. 3/a, CB. 3/b, CB. 3/c等。这个编号大概是十八世纪末叶班蒂什·卡缅斯基的创作；不幸的是，最初的分类和编号到后来就混乱而无次序了。例如开始的时候，1714年至1719年的文件是编入CB. 1/a册的，1719年至1720年的编入CB. 1/b册，而1721年至1725年的则编入CB. 2册。后来CB. 1/b册改成CB. 2册，但又保留同一编号CB. 2给1721年至1725年的文件，以致CB. 2的编号同时适用于1719—1720年的文件（原来编号是CB. 1/b）和1721—1725年的文件。

3. 除了十七世纪的“散页”和十八世纪的本子以外，档案里还有8开本的大卷宗，在十八世纪装订成册，用红羊皮做封面。这些文件是有关官方使团的文件，为了防止散失和损坏，所以搜集起来。在封面上印有《中国宫廷》字样，还有一个编号，以及出使年份。每一个使团有好几卷文件，必须细心将它们区别开。凡是每页旁边的空白上有大使或其最接近的助手的姓名的简写的，就是大使的《公务日志》，其余的只是草稿、副本或者补遗而已。

这一大叠卷宗（柯罗文的报告就有1261页，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有

1086 页)只在每页的正面编有页数,因此必须将引用页数加倍才能得出每卷的总页数(例如只在正面编号 1261 页,实际上就是连正面和背面共 2522 页)。

页数的号码是按照特定的方法用希腊文和俄文字母排列的: a=1, B=2, Γ=3, Δ=4, ε=5, ζ=6, 3=7, Η=8, θ=9, i=10, αi=11, Bi=12, Γi=13……K=20, Λ=30, M=40, H=50, ξ=60, O=70, Π=80, Ψ=90, P=100, C=200, T=300, Y=400, φ=500, X=600, ψ=700, ω=800, Η=900, α=1000。书记们抄写正文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编号。

“散页”、“本子”和“卷宗”是国家的正式档案。除了这些官方文件以外,还有性质迥然不同的文件,为着一些奇怪的理由也保藏在同一所房子里。例如“穆勒材料袋”,是历史家格哈德·弗烈德里克·穆勒(1705—1783)借着自己的一次旅行以及和白令第二次探险队(1733—1743)一起在西伯利亚居留了十年,查阅了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档案,分别制成抄本所构成的。他的工作成果有印成文字的,如《实用及娱乐著作月报》,是俄文;《文集》,是德文;还有档案抄本,附有注释、草稿等等,合起来构成无数材料袋,大部分保存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室,一部分保藏在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院。它们的庞杂的内容往往与贴在封面上的总标题不相符合;有一部分档案抄本比较宝贵,因原本已几乎全部被毁于火灾(1629 年托波尔斯克办公室的火灾,参阅:菲舍尔:《俄国发现及征服西伯利亚的故事》,第 1 卷,第 3 部,第 1 章第 3 节第 425 页;1879 年伊尔库次克档案楼的火灾,参阅:波兹尼叶夫:《俄罗斯帝国考古学会东方组札记》,1888 年第 3 卷第 135 页,等等),抄本曾刊载于《史料》及其《补遗》或《西伯利亚史料》中(参阅下文)。

1. 手稿

中国宫廷第 7 号案卷,自 7194/1685 11 月 16/26 日至 1687 年 11 月。案卷为 8 开本,内有:(1)中国博克达汗有关各种问题给俄国的六封信(第 1 页);(2)给译员尼果赖的训令的节本,尼果赖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公务日志(第 59 页);(3)录事魏牛高及法俄罗瓦以信使身份到中国去,他们完成使命的报告以及中国复信的译文(第 107 页)。

8 开本 167 页,仅在正面编有页数。

中国宫廷第 8 号案卷,自 7194—7196 年,即 7194 年/1685 年 12 月 11/

12日至1686年7月17/27日。使节部录事魏牛高及法俄罗瓦在中国期间的公务日志。

8开本158页，仅在正面编有页数。

中国宫廷第9号案卷，自7194年至7201年（即7194/1685年12月12/22日至7201/1693年1月7/17日）。8开本，内有：派遣柯罗文与司宾维拉索幅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至中国边境，平息与中国人的争执，并与中国人缔结有关边境之友好条约。

摘要有38页，均编有号码，加上8开970页，仅在正面编号（第39页至第46页无页数，仅数过；第760、761页缺）。

这案卷包括草稿、抄本等等，以及编在下一案卷（中国宫廷第10号案卷）中的文件。由于它们不是每页都有大使或其助手的签名，所以它们不能成为正式报告。可是里面也有些文件是大使的公务日志里所未记载的，可以作为公务日志的补充（例如训令的原文）。

中国宫廷案卷第10号，自7194年至7199年（即7194/1686年1月20/30日至7199/1691年1月10/20日）。卷案为8开本，内有：全权大使柯罗文、司宾维拉索幅和秘书官库尔尼兹柯伊在中国边境与中国人商订关于边界的尼布楚条约时的公务日志原本，由秘书官库尔尼兹柯伊签署。

8开本1261页，仅在正面编有页数。第221、222、290页每页都有两张（因此应该是第221页、第221页 bis、第222页、第222页 bis、第290页、第290页 bis）。在第869页后面的一页编号是880页，以后又按顺序编号（869, 880, 881, 882……等等）。第1235页和1245页没有编号，但计算在内。

每页边上空白都有下列一个字的签署：司—祭—西—蒙—库—尔—尼—兹—柯—伊。

卷首有一个手写的附注，说明根据1725年9月23日/10月4日的命令（这道命令莫斯科收到的日期是10月18/29日），这份手稿原本曾经交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大使以便制作副本。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7194—7199年第11号。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7194年第12号。

有两份是第10号案卷的抄本（7206/1697年12月7/17日和7207/1698年11月11/21日沙皇彼得命令抄录柯罗文的报告，从使节部送到西伯利亚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7206/1697年12月7/17日，第2号，第IV 58号柜，左边第3卷。

7196/1687年9月16/26日至7198/1690年9月。案卷第13号（中国宫廷）。8开本，内有：（1）俄国大使柯罗文及其同伴与中国大使在中国边境开会及来往信件的日记；（2）中国及蒙古使节访问俄国大使的谈话纪要。由秘书官西蒙·库尔尼兹柯伊副署。

手稿包括第10号案卷内之文件，签署也相同，但不完全。

中国。散页第1卷第2号自7194/1685年12月12/22日至7198/1690年7月1/11日。派遣司宾和长官柯罗文及维拉索幅至中国边境与中国大使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平息双方争端及制止不法行为。——送公文给上述两人。——两人发自尼布楚的、关于在边境与中国大使会谈内容的报告。——两人返回莫斯科。

722页手稿编有页数，尚有无页数之手稿数目相仿。内容看来是中国宫廷第9号案卷的草稿。

中国邸抄的译文，内容是关于中俄战争，雅克萨城的被毁以及俄国大使柯罗文与中国官员郎坦在中国边境签订的条约，两个帝国的边境，等等。从“中国事务”档案中抽出。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左边第1本。

手稿本子共27页，正反两面均写字但无页数。第1页上记载：中国邸报的译文，关于中俄两国战争及在边境上与俄国大使柯罗文的商谈。最后一页上正面写着：“译员阿力克西·列昂捷夫译”；在背面另一个人的笔迹加上：“1762年1月20/31日由副主任阁下送呈(外交)部”。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宫廷第14册，7200—7203号，7200/1692年1月29日/2月8日至7203/1695年7月8/18日。

本册是8开本，内有：(1)派遣丹麦商人伊兹勃兰德以及使节部的秘书波利耶兹柯依带着一封表示友好的公函至中国；(2)在尼布楚翻译的三封中国信件，是由西伯利亚部于7201和7203年(1692—1693年；1694—1695年)送来的。

手稿，共165页，仅在正面用字母编页数。有8页概要未编号，出自另一人手笔。

中国宫廷第15号案卷，7200—7203年。7200/1691年3月至7203/1695年3月19/29日。半刀书案卷内有伊兹勃兰德带有国书出使中国的公务日志，由伊兹勃兰德签署。

手稿共52页仅在正面用阿刺伯号码编了页数。每页边上空白地位有“伊—兹—勃—兰—德”各一个字。在第1页未编页数上面写着：“7203/1695年3月19/29日使节伊兹勃兰德呈送(本公务日志)。用作报告同他带回的拉丁文信件及公文制成节本连同本公务日志一并送呈沙皇陛下。”

7200/1692年1月29日/2月8日。派遣外国人伊兹勃兰德以使节资格到中国去。——他在中国的公务日志。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第1号。

本子及散页均无页数。

7201/1692年11月1/11日。中国大臣索额图致御前大臣兼尼布楚城长官斯克瑞皮琴关于商人、勒拿河附近边界及喀尔木克人的函件的译文。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第2号，第IV/59号柜，左边第3本。

本子内有函件，与中国宫廷、第14卷、第135—142页及142—146页正面所载体者相同。

7203/1694年11月23日/12月3日。中国大臣索额图致尼布楚长官斯克瑞皮琴及额尔古纳长官噶噶林亲王函件的译文，函中抱怨俄国纳贡民族通过中国领土狩猎。（散页装订成的本子已全部霉烂）。

本子内载函件，与中国宫廷第14卷第146页正面至第163页所载体者相同，但不完全及破损不堪。

7204/1696年6月14/24日。根据西伯利亚部的备忘录，派遣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商人郎古索夫及其伙伴至中华帝国出售和交换貂皮及其他各种毛皮。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第IV/59柜左边第3本。

本子共有纸6张，用蓝铅笔在正面以阿剌伯数字编页数。

7205/1697年1月13/23日。派遣葛斯奇那亚·索特尼亚的商人郎古索夫至中国买卖各种商品。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第IV/59柜，左边第3本。

7207/1699年1月27日/2月6日。派遣商人博科夫至中国买卖和交换当地商品。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散页，第IV/59柜，左边第3本。

6张纸，正面用阿剌伯数字编页数；最后几页已损坏。

1704—1711年。派遣商人奥斯考尔考夫、葛林、库迪阿科夫和萨瓦齐耶甫至中国买卖和交换中国各种商品。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第1/a本。

这一本共有31张纸，没有页数。有些纸旁边空白上有“秘书官”字样，有一页甚至有“秘书官伊凡”字样；这是公文的本原。别的纸是草稿或抄件，有些是蒙文写的。在每页末端有一个与文件字迹不同的签名，在1704年有关奥斯考尔考夫的文件上，签名的是格拉西莫夫，校订的是彼得·斯库里琴，“根据沙皇陛下的命令行事”；在1706年有关葛林和库迪阿科夫的文件上，签名的是车培列夫，校订的是雅各伯·谢蒂宁；1710年的库迪阿科夫和1711年的奥斯考尔考夫签名的是雅各伯·谢蒂宁，校订的是米舍尔·谢蒂宁。

1704—1717年。中国理藩院给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的信，连同托波尔斯克的档案及1759年的一份报告一并送来。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第IV/59柜右边第1/a本。

上述报告是1759年4月4/15日西伯利亚总督西奥多尔·索莫诺夫给外交部的，内容是：根据应将所有有关巴图尔理台吉的文件上缴的谕旨，现将用满文写的中国信件上呈，这些信件是在托波尔斯克“州”的档案中找到的，由该州的办公室送来，内附从叶尼塞斯克送来的蒙古王公阿尔提汗的致敬书一份。

这本文件包括：

1. 前述报告的一份抄本，加上附记：“关于此事的谕旨于1759年7月13/24日送到托波尔斯克。”

2. 一份84页的清单，仅注明粘好或未粘好，有几张记有1705年至1717年份。天头上写着：“在托波尔斯克的档案中找到的中国信件及其他文件清单，应呈送外交部。”

3. 用蘸水笔写的33封拉丁文中国信件，大多数盖有朱红色国玺，有些折成奏折状。除了一封以外，其余全部在结尾处都有日期，写法照中国人习惯先写朝代年份，再写月日。这些信是理藩院给维尼阿斯、罗曼纳多夫斯基、噶噶林的。

在每封信的背面或下端都加上号码和用阿剌伯数字写的欧洲日期，号码似乎与上述第2条清单的号码相当。

除了这33封用中国纸写的信件外，还有一封是用硬纸写的拉丁文信件，是噶噶林给理藩院的。

4. 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张纸记载着一条附记：“在这卷文件里有十封(张)满洲文信件，三十五件拉丁文文件，一封蒙文信件。”

5. 列昂捷夫将理藩院的三十四封信件编成俄文摘要。每封信上都有日期，但只有几封与前述第三条中所列日期相符。开头和结尾都有附记：“三十四封(张)中国信件，由西伯利亚总督索莫诺夫送来。关于每封信的内容，叙述如下。所有这些信件都是院(理藩院)在康熙汗——目前在位的乾隆汗的伯父(uncle)——统治时期写的。译者列昂捷夫。”

6. 其中六封信(二封给维尼阿斯，一封给尼布楚总督，三封给噶噶林)由列昂捷夫译成俄文，第六封信与上述第三条所列者相符。看来这些信件象从满文译过来的，而不象是从汉文译过来的，因为从对康熙(Elkhé taifin)和其他官吏的官衔的译法就可以知道。开头和结尾都有附记：“中国管理域外省份的衙门(理藩院)所写旧信译文，由西伯利亚总督、枢密官索莫诺夫送来。译员列昂捷夫翻译。”

1716年10月31日/11月11日。中国给当时到达中国的所有欧洲人的公告，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写成。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689—1768年，第IV/59柜，左边第1/a本。

用中国纸石印三种文字，周围有龙作装饰，译成俄文。

1716年10月31日/11月11日。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用汉文、满文及拉丁文写的公开信……

同上书。

俄文译本，译得不完全(全部签名没有完全抄录)。

1716年。在中国编写的宣言，关于派赴俄国而渺无音信的人们。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V/2 柜，左边。

第三份无俄文译文。

1717年6月25日/7月6日，斯顿甫神父给沙皇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左边第 1/a 本。

1717年10月10/21日。理藩院给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的信件译文，交由(?)商人巴西尔·伊芬带来，内容系：今后不要过于经常地派俄国商人带着商品到北京来，并指定几个边境城市作为贸易中心。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左边第 1/a 2 号本。

这卷公文内有理藩院给噶噶林亲王的一封拉丁文文件的俄译本和这封拉丁文文件的抄本(在天头和背面有 *Копія* 字样)。

1719年6月28日/7月9日至1721年9月。由近卫军少校里哈列夫自托波尔斯克派遣使者车瑞多夫(哥萨克头目)及波斯比叶洛夫(军曹)至瑯台吉处，目的是平息雅木柴夫湖事件及与瑯台吉的臣民恢复友好及通商关系，也打听一下关于“艾尔凯特”(原文如此)金沙的消息。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准噶尔(事务)，第 IV/42 柜，左边第 1/a 本。

这是一本45张无页数的本子；自第1张至第37张上空白地位有“伊凡·福民阔”字样，首页有：“派至瑯台吉处使臣车瑞多夫抄本”字样。

自39页至45页内有驻托波尔斯克联队哥萨克军曹波斯比叶洛夫、龙骑兵巴西尔·埃雷曼、托波尔斯克的译员波罗特尼科夫(他随同车瑞多夫前往)1721年9月的供词。这最后几页没有签名。

1718年及1719年。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给外交部的报告，外附给中国的信及中国方面的复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1/a 本。

这本本子内有一连串8张纸，编号1至8页，第1页上有标题：“西伯利亚‘省’给外交部的报告。本年即1719年收到中国关于通商的一封信。我特随报告附呈这封信的拉丁文及俄文译文的抄本。切卡斯基亲王，1719年12月20/31日。”第2页是拉丁文文件的抄本；第3页是信封的俄文译文，下有拉丁文附言是寄给噶噶林亲王的；第4至第8页是拉丁文文件的俄文译文。——除了以上八页外，在这卷文件中还有西伯利亚总督给理藩院要求准许伊斯多甫尼科夫商队入境的一封信的副本。

1719年3月30日/4月10日。派遣近卫军上尉伊兹玛洛夫以特使资格使华。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2 号本(旧的编号为：1/b 第 1 号)。

各种文件的汇集。卷首有一张表格说明有80页，事实上有77页是编了号的。(1)

(2)(3)等等,不过只在正面编号;有几页是次序颠倒的,如第52至55页,第72页等;有些内容无关的本子也夹杂在这些纸张中。除了这77页和这些本子以外,末尾还有一本不完全的本子,从489页编了页数至525页,只编在正面。

这本文件包括草稿、抄本和下一本文件的补遗。有些文件看来是伊兹玛依洛夫亲笔签署的。

1719—1722年。近卫军上尉伊兹玛依洛夫于1719年以特命大使资格使华的公务日志,回国以后他将公务日志呈交外交部。1722年4月28日/5月9日近卫军上尉、特命大使伊兹玛依洛夫先生之秘书伊凡·格拉儒诺甫(曾随同使华),将本公务日志交给外交部。由于发现其中有几点错误,又将该公务日志发还给伊兹玛依洛夫先生,以资改正。在1723年3月4/15日伊兹玛依洛夫改正后交由该秘书转交给外交部。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旧编号为1/b)第2号。

案卷共订成211页,用阿刺伯数字在正面编成页数,与本文出自同一人笔迹。第135页写成:135j 136;第176页写成176j 177;第211页系空白。

每页边旁空白均有签署字母或全名:“近一卫一军上一尉一列一昂一依一兹一玛一依一洛一夫一秘一书一伊一凡一格一拉一儒一诺一甫。”卷末(第210页背面)有两个签名:“伊兹玛依洛夫”,“秘书格拉儒诺甫”。

1720年。与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及枢密院的通信,内容有关中国宫廷事务。

莫斯科外交部档,第IV/59柜,右边第2本第1号。

这卷文件内有:(1)切尔卡斯基亲王给理藩院一封信的两份副本,一份副本是拉丁文,另一份是俄文;这封信伊兹玛依洛夫于1720年5月13/24日在伊尔库次克收到。两份副本与载于《一个大使的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21—22页内的信件内容相同;(2)一封理藩院给西伯利亚总督的信(康熙58年4月16日即1719年6月3日)的俄文副本,副本上未注明日期。

1720年和1721年。给使华使节伊兹玛依洛夫的命令以及使节的报告。

第IV/59柜,右边第2本第2号。

这本文件内有:(1)1720年1月7/18日命令的两份草稿,伊兹玛依洛夫于1720年5月13/24日在伊尔库次克收到这个命令;参阅《一个大使的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6页背面至第21页;(2)一份伊兹玛依洛夫给沙皇的报告,写于蒙古边境索拉钦,日期是1720年9月23日/10月4日;(3)另一份给沙皇的报告,写于伊尔库次克1721年5月18/29日,与转载于《一个大使的公务日志》1719—1722年、第181页背面的信相同。

1721年。(外交部)与枢密院及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关于中国宫廷事务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第1号。

1721年及1722年。俄国驻中国领事劳伦特·郎克自北京及自色楞格斯克送回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第2号。

这本本子内有两封德文信件，用中国纸写，呈给沙皇陛下。第一封末尾处有：“北京1721年10月21日”字样，签名为“劳伦特……郎(空白)”。信的边沿有点损坏，已补过。背后记载：“[这份报告于1722年5月30日/6月10日交付于下诺夫戈罗德]。由领事自中国送回……莫斯科于7月11/22日收到……”第二封信的签署和日期如下：“1722年9月3日于色楞格斯克。劳伦特·郎克。”背后记载：“领事劳伦特·郎克报告，1722年9月3/14日于色楞格斯克，莫斯科于1723年2月2/13日收到。”这两封信都有俄文译文(译者签名：克莱曼、波格达诺夫、沃尔科夫)。

1721年3月10/21日。派遣佩雷亚斯拉夫主教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主教到中国传教布道，代替在中国逝世的赫拉里翁修道院长。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第3号。

1722年第1号。与枢密院有关中国宫廷事务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

1722年第2号。(西伯利亚)托波尔斯克总督切尔卡斯基亲王给外交部的报告，附件有中国方面给他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第2本。

关于中国的信件，有一个信封装着两封用中国纸写的蒙文信件，盖有皇帝的古汉、满文朱红大印，另外一封理藩院给托波尔斯克总督的信的俄文译本，日期签署是康熙60年8月29日(1721年10月19日)；另有一封理藩院致托波尔斯克总督的信，日期是61年6月10日(1722年7月22日)。

1722年4月8/19日。根据枢密院的命令，由外交部发给派至中国通商的商人斯捷潘·特列季亚科夫及其随同人员以护照。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

1723年第1号。为中国与准噶尔边境事件与枢密院及商业部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

1723年第2号。托波尔斯克“州”给外交部的报告，附件有在托波尔斯克收到的中国皇帝的信件。另外有关于这一事件的命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二格。

这本文件包括三袋从托波尔斯克送至圣彼得堡的文件：第一袋收到日期是1723年5月24日/6月4日，第二袋是1723年11月26日/12月7日，最后一袋是1723年12月14/25日。第一袋里有一个信封，上面用蒙文和俄文写着：“送呈色楞格斯克总督，康熙61年9月19日(即1722年10月28日)。”还有两张中国纸，一张写蒙文，另一张写俄文，

俄文的那张签署日期与信封同。信封与信上都盖有中国皇帝的朱红大印，还有伊兹玛依洛夫的一颗俄文印章，内有：“第三颗印章”字样，也盖在旁边。——1723年12月14/25日收到三封中国纸写的信，盖印如前，第一封是蒙文，第二封是拉丁文，第三封是俄文，日期都是雍正元年5月11日（1723年6月13日）。

1723年第3号。驻中国领事官郎克从色楞格斯克发回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

在这本文件中有一份郎克给商务部报告的副本，用德文写，日期是1722年9月3/14日（这份副本的边沿空白上有签名：“秘书一约一翰一奥斯特一瓦尔德”，每页下端有“戈特弗里德·坎茨勒”字样，末尾还有两个人的签名），文件第3—11页；报告中所提到的文件都有副本附送，其中一份副本是1721年11月17/28日中国大臣们在北京向伊斯多甫尼科夫购买商品清单，文件第28—29页。除了郎克于1723年4月12/23日从色楞格斯克写给切尔卡斯基亲王的一封信外，还有三封郎克亲笔用德文写给沙皇的信，日期是1723年3月8/19日于色楞格斯克，文件第83页；另一封是1723年6月3/24日，第112—113页；最后一封是1723年11月18/29日，第22—25页。这三封信都附有俄文译文。

1724年第1号。与枢密院及商务部有关中国宫廷事务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

1724年第2号。托波尔斯克“州”给外交部的报告，有关报告所述事项的命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

1724年第3号。驻中国领事郎克的报告，附有理藩院给他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2本。

在这本文件里有两封郎克亲笔用德文写给沙皇的信，第一封是1724年3月13日写于色楞格斯克，第61—62页；第二封8月13日于色楞格斯克（7张纸边沿都补过）。

随同这两封信件的还有中国纸的信封和信件，盖有中国皇帝的朱红大印，一条俄文附注说有些信是1724年10月6/17日同郎克的第一份报告一起收到的；其余的同郎克1724年8月13/24日的报告一起到达，1725年2月22日/3月5日收到。

第一包（1724年3月13/24日从色楞格斯克发出，1724年10月6/17日圣彼得堡收到）内有一个信封和三封信，第一封是满文，第二封是拉丁文，第三封是俄文，有伊兹玛依洛夫的印章并注明（俄文）：“第五印章”。信封和信的日期如下：“雍正元年12月21日即1724年1月16日”，拉丁文的信的日期是：1724年1月15日。根据一条俄文附注，这些信是1724年2月27日/3月9日在色楞格斯克收到的。

第二包（1724年8月13/24日从色楞格斯克发出，1725年2月22日/3月5日圣彼得堡收到）内有一个信封和两封信，一封是满文，另一封是俄文；信封上除了满文以外，还有一行俄文：“理藩院致俄国人郎克及费非洛夫的信”，根据一条俄文附注，是1724年6月23日/7月4日在色楞格斯克收到。用俄文写的那封信的日期是：雍正2年闰4月4日即1724年5月26日。附有伊兹玛依洛夫的印章并注明（俄文）：“第六

印章”。

另一个信封的抄本的一边写着：“伟大而强盛的中国的位于御前大臣之上的大臣兼护军统领古翁·奥隆达伊 (Goun Olondai)，以及内大臣兼理藩院郎中塔古特致书于俄罗斯帝国沙皇之侍卫内大臣及国务大臣”字样，另一边写着：“雍正 2 年季夏月 24 日即 1724 年 8 月(?) 12 日”。信封内有一封用中国纸写的满文(蒙文?)信件，盖印如前，上面有一条俄文附注：“亚列克西·特列季亚科夫译，1726 年 2 月 12/23 日收到(日期有误，应为 1725 年 2 月 22 日/3 月 5 日)。

1725 年第 1 号。与最高宗教会议及枢密院有关中国宫廷事务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3/a 本。

1725 年第 2 号。托波尔斯克“州”给外交部有关中国及蒙古边境事务的报告。——外交部有关该事项的命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3/a 本。

1725 年 1 月至 12 月第 3 号。给前驻中国领事郎克的命令，郎克现在色楞格斯克。——郎克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3/a 本。

郎克的报告是两封给女沙皇(喀德邻一世)的德文信，日期都是 1725 年 8 月 3/14 日。

1725 年 6—12 月第 4 号。派遣枢密官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出使中国。他的旅途临时办公室商务来往帐目。

文件(副本、抄本)清单，按年月顺序排列。

1725 年 8 月 30 日/9 月 10 日及 9 月第 5 号。给大使的训令纪要，随同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送给中国皇帝的国书。——大使对训令要求解释，回答大使的要求。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3/a 本。

1725 年第 6 号。发给派赴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训令原本及其附件，外加秘密训令。——前几年与中国交涉文件亦一并交给大使。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3/b 本。

虽然本子的标题不一样，这本本子同前述本子一样，只包括一些抄本(1725 年 9 月 2/13 日 45 点训令的抄本；9 月 14/25 日的秘密训令，9 月 21 日/10 月 2 日的附加训令，都是由彼得·托尔斯太伯爵、安德烈·奥斯泰曼男爵、巴西尔·斯泰潘诺夫、伊凡·尤拉夫秘书长、普罗托波波夫秘书签署的；还有密码的副本……等等)；一份交付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文件清单(不全)，包括有 38 个号码。在这两本本子中，都有萨瓦在某些文件上的亲笔签名，并有“收到”等字样。

1725年第7号。派赴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答复他的皇帝诏书。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3/b本。

由萨瓦签署的报告是1725年11月15/26日从莫斯科呈给俄国女皇的。

1725—1729年第8号。萨瓦使华的公务日志的草稿,内容是有关签订一项边境条约问题。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3/c本。

1725年7月26日/8月6日第9号。派遣巴赫赫慈上校率领一支部队到中国边境,以保护西伯利亚的边境城市。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3/c本。

1725年8月17/28日第10号。派遣司宾斯捷潘·阔留赤甫和彼得·维拉索幅至西伯利亚会同中国人划定疆界。

1725—1729年第11号。这本本子内有司宾阔留赤甫的公务日志,阔留赤甫负责中俄两帝国的划定边界工作。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3/d本。

目录未编页数,正文947张在正面编了页数(总共1894页),每页旁边空白地方都有签名:“斯捷潘·安德烈耶夫·阔留赤甫,枢密官兼专员;西蒙·克里耶夫,秘书。”末尾有两个人的签署全名。8开本,有缺页;第358页后面是第383页。

枢密官、使华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驻中国的公务日志,第1卷(红羊皮封面,8开本,标题印在封面上)。第一页上有十八世纪手写的标题:“特命全权大使、枢密官兼骑士、依里利伯爵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公务日志,上下两册。”

第 1 册

内容包括1725年8月11/22日自圣彼得堡启程(所发生之事件),以及逗留中国期间,在中国边境,直至1727年8月20/31日签订边境条约为止。第2册包括后来交换总约,以及回到莫斯科,直到1929年出使结束为止。上交日期是1729年12月8/19日。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B第12号。

枢密官兼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使华公务日志上下两册。第2册第1页上写着:“特命全权大使、枢密官兼骑士、依里利伯爵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出使边境的公务日志,第2卷;自1727年8月20/31日缔订边

境条约至返回莫斯科及于 1729 年出使结束为止。1729 年 12 月 8/19 日呈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 Bb 第 12/b。

这两本 8 开本的卷宗第 1 卷自第 1 页至 616 页,全部在正面用阿剌伯数字编好页数;第 2 卷自 617 页至 1086 页(总计共 2172 页)。每页边沿空白上签有下列字样中的一个字:“伊凡·格拉儒诺甫,秘书;斯捷潘·毕萨列夫,办公室录事。”两卷卷末都有签名:“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伊凡·格拉儒诺甫,秘书。”(在第 2 卷末尾缺少“秘书”两字,仍然签成:“斯捷潘·毕萨列夫,办公室录事。”)

1725 年第 13 号。关于中国政府、满洲可汗(皇帝)、满洲军队的秘密配置以及首都北京的情势的简短情报——由领有海军中尉衔的拉里翁(赫拉瑞)·罗索金译成俄文。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3/f 本。

1725 年 9 月 18/29 日第 14 号。从近卫军少校伊兹玛依洛夫处取来有关出使中国之情报、摘要等等清单一份。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59 柜右边第 3/f 本。

1726 年第 1 号。与最高宗教会议、枢密院及其他部门有关中国宫廷事务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4/a 本。

1726 年第 2 号。托波尔斯克“州”给外交部有关中国与蒙古边境事务的报告。——外交部有关该事项之指示。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4/a 本。

1726 年第 3 号。劳伦特·郎克自北京返抵色楞格斯克给外交部关于中国事务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4/a 本。

这本本子有三封郎克给女沙皇的信,第一封于 1726 年 1 月 9/20 日写自色楞格斯克;第二封于 1726 年 3 月 27 日/4 月 7 日写自色楞格斯克;第三封于 1726 年 5 月 6/17 日写自伊尔库次克。收到日期第一封是 1726 年 6 月 14/25 日,后两封是 1726 年 8 月 18/29 日。

第一封有一个信封和两封信,一封是满文,另一封是俄文,都写在中国纸上,盖有中国皇帝的朱红大印,日期是:雍正 3 年 10 月 16 日即 1725 年 11 月 20 日(有关郎克的秘书大卫·格拉夫的护照问题);——第二封是用中国纸写的蒙文信件,折成奏折状,盖有橙黄色蒙古大印,1725 年 8 月 27 日/9 月 7 日在色楞格斯克收到;俄文译本注明日期:雍正 3 年孟秋月 20 日(3 年 7 月? 20 日)即 1725 年 8 月 27 日(土谢图汗给郎克的信,探讯关于新大使的情况);第三封也是蒙文,同前信一样,日期是:雍正 3 年孟冬月 30 日(3 年 10 月 30 日即 1725 年 12 月 4 日),1725 年 12 月 6/17 日于色楞格

斯克收到(关于大卫·格拉夫护照的事)。

1726年第4号。驻华大使萨瓦伯爵的报告。——枢密院的命令和答复。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a本。

这本本子共有四份原始报告,署名: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呈报女沙皇,第一份发出日期是1726年2月11/22日于托波尔斯克,1726年4月5/16日收到;第二份发出日期是1726年5月6/17日于伊尔库次克,1726年8月18/29日收到;第三份发出日期是1726年5月26日/6月6日,收到与前一份日期相同;第四份发出日期是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于波尔河,1726年12月3/14日收到。

随同报告附呈的有证明文件(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件、训令等等……),签名:伊凡·格拉儒诺甫(使团秘书)。

1726—1731年第5号。驻华大使萨瓦伯爵报告的摘要,枢密院给各地的命令,有关在中国边境建造要塞事宜。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a本。

1726年1—9月第6号。领事郎克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附件有西伯利亚边境要塞图;中国大臣和蒙古首领给他们俩的信件译文。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59柜右边第4/b本。

地图是由“彼得·斯考贝尔琴及其伙伴们”绘制的;蒙古文的信件写在中国纸上,盖有蒙古橙黄色大印,其中一封在俄文译文中记载发出日期是雍正4年孟夏月28日(即1726年5月?29日);另一封是中国大臣隆科多与塞基(Séki)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日期是雍正4年季夏月23日(1726年7月?22日);同一封一起送出的是一封土谢图汗给郎克的信,日期是4年季夏月4日(1726年7月?3日),内容是有关蒙古私逃者问题。——一个信封装着两张蒙文封件,没有盖章;另外两封信,一封是拉丁文,另一封是俄文,都用中国纸书写,都盖上中国皇帝的朱红大印,上面记载着:“理藩院致俄罗斯沙皇驻中国领事郎克的信,雍正4年3月27日即1726年4月27日”。俄文将这项记载重复一遍,每封信信内日期同信封上的日期一致。一条俄文附注记载着:“1726年5月25日/6月5日收到于色楞格斯克,1726年6月11/22日伊尔库次克大卫·格拉夫收”。

1726年第7号。负责边境专员、司宾阔留赤甫致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右边第二格第4/b本。

1726年第8号。蒙古首领致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b本。

两封用中国纸写的信,盖有蒙古橙黄色大印,日期是雍正4年仲秋月26日(1726年9月?21日),内容有关私逃者问题。

1726年第9号。托波尔斯克“州”办公室的备忘录与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b本。

1726年第10号。伊尔库次克“省”办公室的备忘录，连同附件及伊尔库次克长官米舍尔·伊兹玛依洛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旅途临时办公室的信。——连同有关复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b本。

1726年第12号。克拉斯诺雅斯克长官谢特聂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和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c本。

1726年第13号。尼布楚专员约瑟夫·伊巴特也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c本。

1726年第14号。色楞格斯克专员伊凡·拜顿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旅途临时办公室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c本。

1726年第15号。边境居民关于边境及逃亡者的证言和情报，交付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旅途临时办公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c本。

1726年第16号。西伯利亚各类居民为有关侵犯边境事件致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旅途临时办公室的请愿书，并附有关决议。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c本。

1726年第17号。特殊业务，驻华特命大使旅途临时办公室之来往帐目。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c本。

1726年第18号。帐册，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旅途临时办公室自1725年10月30日/11月10日至1726年8月31日/9月11日之来往帐目。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4/c本。

1726年第19号。司宾、派赴边界会同中国划定边疆专员斯捷潘·阔留赤甫给外交部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2格第4/c本。

1726—1731年第20号。派赴边界同中国人划定边界之司宾阔留赤甫有

关其付出金钱及毛皮的口述笔录。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2 格第 4/c 本。

1726—1731 年第 21 号。同中国划界专员署购买及付出金钱与毛皮帐本(根据司宾阔留赤甫之计算)。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2 格第 4/c 本。

1726—1731 年第 22 号。派赴边界与中国人划定国界之司宾斯捷潘·阔留赤甫买入与支出总帐册摘要。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2 格第 4/c 本。

1726 年第 23 号。率领一支部队赴中国边境以保护西伯利亚边境城市之巴赫尔慈上校给外交部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4/c 本。

1727 年 1—12 月第 1 号。笔录以及沙皇彼得二世给中国博格达汗(皇帝)之国书。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a 本。

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国书,由彼得二世及葛洛甫金伯爵签署(葛洛甫金是外交大臣),日期是 1727 年 5 月 19/30 日,附有拉丁文副本。

1727 年第 2 号。与最高宗教会议、枢密院及其他行政部门有关中国宫廷事务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a 本。

1727 年第 3 号。托波尔斯克“州”给外交部的报告。——关于中国和蒙古边境事件给该“州”的命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a 本。

1727 年 1—12 月第 4 号。以专员资格派赴中国边境之司宾阔留赤甫及测地员齐诺夫叶夫、瓦卢叶夫给外交部的报告。——笔录及发送命令给阔留赤甫。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2 格第 5/a 本。

1727 年第 5 号。驻中国领事郎克,要求发给欠薪的申请书。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a 本。

1727 年第 6 号。领事劳伦特·郎克在 1727—1730 年于赴北京之商队处逗留期间之公务日志。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a 本。

这本本子有 315 页在正面编了页数(总计共 630 页),第 1 至第 174 页是用德文写的,

开头第一句是：“随皇帝陛下之商队从色楞格斯克至北京A°1727，以及从北京至色楞格斯克A°1728的日志，旅途及在北京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均由皇帝陛下之使臣劳伦特·郎克尽可能翔实地逐日记载”；结尾是签名：劳伦特·郎克。（第16页是郎克于1727年10月21日/11月1日给理藩院的信的俄文副本；第156—157页是1728年6月13/24日另一封信的副本）。从第175页到结尾是公务日志的俄文译文。背面有一条俄文附注：“曾驻中国之劳伦特·郎克于1730年3月9/20日呈交本公务日志给外交部。”

1727年1—12月第7号。派赴中国边境建筑新要塞的巴赫尔慈上校给外交部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5/a本。

1727年1—12月第8号。沙皇批示的原本，笔录及其送交驻华特命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5/a本。

1727年1—12月第9号。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连同附件)。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5/a本。

根据卷首目录(有若干遗漏)这本本子有136页，仅在正面编号(因此共有272页)。1727年5月10/21日由萨瓦签名的报告(部分用密码，已译出)在第1—19页；另一份签名的报告日期是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在第30—42页；关于与中国用官方商队通商的意见，签名是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日期是1727年9月28日/10月9日，在第112—115页；另一份关于私商贸易的意见，签名同上，日期同上，在第125—129页。

1727年第10号。驻华特命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与其中国同僚会谈的报告。——两国间拟定的条约草案。——边境居民的互相控诉，等等。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5/a本。

1727年1—12月第11号。特命驻华全权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旅途临时办公室商务来往帐目。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5/b本。

1727年6月16/27日第12号。派前司法部顾问米契尔·克瑞尼琴前往中国边境，以代替已故专员维拉索幅。——掷弹兵中尉托尔斯泰关于克瑞尼琴死亡以及交给克瑞尼琴的远征队全部返回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5/b本。

1727年6月19/30日第13号。派近卫军掷弹兵中尉伊凡·托尔斯泰前往中国边境视察，以便同中国人会同划界的使命能够顺利进行。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5/b本。

1727年8月23日/9月3日第14号。领事郎克、大使馆的若干随员以及边境居民交给驻华特命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证言，证明根据1727年8月20/31日与中国签订条约以波尔河为界对俄罗斯帝国有极大利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印载在班蒂什的著作中，第 344—346 页。

1727、1728及1729年第15号。预定偕同其学生及神职人员派往北京之修道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给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年7—10月第16号。随同俄国商队赴华之事务官郎克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与该商队有关之业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商队的临时帐目，1727年9月13/24日在莫洛柯夫的领导下，根据“la Stryélka du Tchikoi”制作，由莫洛柯夫与三个宣誓评价员签名；郎克自1727年7月16/27日至10月8/19日给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信。

1727年第17号。司宾阔留赤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阔留赤甫被派为专员与中国人在波尔河右岸(西边)划界。——以及波里斯·祖迪叶的诉讼案。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2 格第 5/b 本。

1727年第18号。大使馆秘书伊凡·格拉儒诺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格拉儒诺甫被派到波尔河左岸(东面)直到额尔古纳河会同中国人划界。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年第19号。(阔留赤甫)的秘书基里叶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基里叶夫同测地员库夏勒夫和瓦卢叶夫共同写这封信，内容是关于他们沿着边境旅行，从波尔河左岸(东面)直至额尔古纳河为止的见闻。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年第20号。巴赫尔慈上校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巴赫尔慈上校被派到中国边境建筑要塞。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年第21号。率领一连士兵驻扎在靠近中国的恰克图的克尼阿琴金大尉，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 年第 22 号。托波尔斯克“州”办公室及托波尔斯克地方办公室的备忘录,以及托波尔斯克总督多尔葛卢科夫亲王关于中国事务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 年第 23 号。伊尔库次克省办公室的备忘录,以及伊尔库次克长官伊兹玛依洛夫关于中国边境事务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旅途临时办公室的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 年第 24 号。伊尔库次克贵族彼得·塔塔里诺夫、秘书尼谢塔斯·康达拉特耶夫以及若干测地员等,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内容是关于他们沿着波尔河右岸(西面)的边界旅行的见闻。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 年与 1728 年第 25 号。额尔古纳河铸银局专员布尔特索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

1727 年第 26 号。库兹涅斯克长官公署给驻华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旅途临时办公室的备忘录。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 年第 27 号。尼布楚专员伊巴特也夫和巴伊包罗廷关于中国边境事务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伯爵答复他们的指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7 年第 28 号。色楞格斯克地方专员伊凡·切切欣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旅途临时办公室的报告。

1727 年第 29 号。乌丁斯克专员西奥多尔·拜顿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5/b 本。

1728 年 1—12 月第 1 号。与最高宗教会议、枢密院、各部及各办公室有关中国宫廷事务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6/a 本。

1728 年第 2 号。托波尔斯克“州”给外交部的报告,以及答复这些报告的指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6/a 本。

1728年第3号。领事官郎克给外交部的报告，郎克同商队在中国，报告是关于北京在商务上给他造成的困难。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这份“报告”是劳伦特·郎克亲笔写给沙皇的一封信，1728年12月31日（1729年1月11日）写于色楞格斯克。附件是一个信封内装三封信：一封拉丁文，一封蒙文，一封俄文，都是写在中国纸上，盖有中国皇帝的朱红色大印；拉丁文的信上记载着：《涅藩院致俄罗斯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书》。信上日期是雍正11年6月15日（1728年7月21日）。一张目录在第38页上，目录上有几个文件在这本本子上没有找到。

1728年第4号。司宾斯捷潘·阔留赤甫，派赴中国边境负责为两帝国划界工作的专员，给外交部的报告。——答复他的指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1728年第5号。近卫军中尉伊凡·托尔斯泰给外交部的报告，托尔斯泰在西伯利亚阔留赤甫身边。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3格第6/a本。

1728年第6号。巴赫尔慈上校，边境总行政官，给外交部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1728年第7号。派遣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率领教士及学生前往中国。以后几年事件的继续。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1728年第8号。关于近卫军掷弹兵中尉伊凡·托尔斯泰留驻托波尔斯克直到有新的命令为止，而且禁止移驻别的城市。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1728年第9号。原始笔录以及批示，发给特命驻华大使、枢密官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另有枢密院给他的命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1728年第10号。枢密官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自色楞格斯克送回的报告，连同附件。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这些报告是从色楞格斯克于1728年4月14/25日送回的9号报告，第10号报告是关于修道院院长的，一条附注说这份报告没有送出；第11号报告写于1728年4月22日/5月3日于色楞格斯克；第12号报告写于1728年8月6/17日于叶尼塞斯克；第3/13号和第4/14号报告1728年9月26日/10月7日写于托波尔斯克；第5/15号和第6/16号报告1728年12月6/17日写于维雅特卡。附件有中俄两国各种外交文件的副本。

1728年第11号。中俄两国宫廷拟订的条约草案。——驻华特命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同中国大臣们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1728年第12号。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旅途临时办公室的商务进出帐目。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a本。

1728年第13号。司宾阔留赤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信,阔留赤甫是派去同中国人在波尔河右岸(西面)划界的专员。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b本。

1728年第14号。巴赫尔慈上校,中国边境总行政官,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旅途临时办公室的呈文、报告和信件。——答复巴赫尔慈的命令。

1728年第15号。托波尔斯克“州”办公室及托波尔斯克总督多尔葛卢科夫亲王给驻华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旅途临时办公室的备忘录,连同附件。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b本。

1728年第16号。伊尔库次克长官伊兹玛依洛夫给驻华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旅途临时办公室的备忘录和信件,连同附件。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b本。

1728年第17号。驻尼布楚专员尼谢塔斯·巴伊包罗廷和约瑟夫·伊巴特也夫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b本。

1728年第18号。雅库次克长官公署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备忘录。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b本。

1728年第19号。铸银局专员布尔特索夫从额尔古纳河给驻华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旅途临时办公室的报告和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b本。

1728年第20号。乌丁斯克专员西奥多尔·拜顿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左边第6/b本。

1728年第21号。西奥多尔·克尼阿琴金大尉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

拉维赤伯爵的报告，克尼阿琴金大尉在恰克图建筑“新一”要塞。——关于他们将商人的毛皮充公事件。——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给克尼阿琴金的指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6/b 本。

1728 年第 22 号。商人雅各伯·波博洛夫斯基及米契尔·康达科夫自库伦给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6/b 本。

1728 年第 23 号。西伯利亚边境居民和纳贡民族的各种请愿书的副本，呈交驻华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旅途临时办公室，以及答复他们的命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6/b 本。

1728 年 8 月 21 日/9 月 1 日第 24 号。外交部关于全权大使及枢密官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的秘密通告以至公开通告，萨瓦的报告中说中国与瑯台吉之间的战争尚未结束，而且人们怀疑已故阿玉气汗的儿子有背叛行为。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6/b 本。

1729 年第 1 号。理藩院给俄国枢密院的信及其复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7/a 本。

一个信封和三封信，一封是蒙古文，一封是俄文，第三封是拉丁文，写在中国纸上，盖有中国皇帝的朱红色大印，上面有拉丁文的一条记载：“雍正 7 年 5 月 6 日（1729 年 6 月 2 日）大清国理藩院给俄国枢密院的信”（这封信通知根据同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协议，收到了二十封信，并宣布中国要派使团到俄国去）。

1729 年 1—12 月第 2 号。与最高国务院、枢密院、各部及各办公室有关中国事务的通信。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7/a 本。

1729 年 1—12 月第 3 号。与西伯利亚“省”、伊尔库次克的长官、巴赫尔慈上校、领中尉衔的工程师巴巴里欣等的通信，他们都在中国边境上；通信内容是关于中国和蒙古的边境事件，以及授与三个蒙古台吉（王公）以特权证书。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7/a 本。

1—12 月第 4 号。特命全权驻华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与枢密院及各部的通信。伯爵关于中国事务的报告和各种建议；附件有他校订过的使华

公务日志。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7/a 本。

一份 1729 年 3 月 8/19 日的报告,建议的日期是 1729 年 5 月 29 日/6 月 9 日,都有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签名。

1729 年第 5 号。关于派赴中国任大使的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出使事务(复本)。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7/b 本。

1729 年 1—12 月第 6 号。发给劳伦特·郎克的命令,郎克现在在中国正同俄国商队一起呆在边境。——以及郎克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7/b 本。

一封用德文写的亲笔信,由劳伦特·郎克签名,发自色楞格斯克 1729 年 6 月 13/24 日,内容是关于中国即将派使团出使俄国问题。

1729 年第 7 号。派赴中国边界负责划界事务的专员阔留赤甫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 IV/60 柜左边第 7/b 本。

1729 年第 8 号全部关于中国赴俄使团问题,附有中国于 1712—1715 年派赴土耳其特使团的有关文件。

1729 年第 9 号。驻北京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公务日志的摘要;于 1729 年上交。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第 IV/60 柜左边第 7/b 本。

1729 年第 10 号。前驻华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关于根据外交部发给他的指示去执行委派他办的事务的说明,并逐项说明执行的方式方法。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第 IV/60 柜左边第 7/b 本。

印载在班蒂什的著作中,第 483—503 页。

以后几年与本书有关的本子是:

1730 年 1—12 月第 5 号。已回国之驻华特命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和建议,附件有他编辑的一本书,《关于中华帝国的形势和实力的秘密报告》(建议在北京建造一座教堂,1730 年派遣商队赴华)。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0 年,第 IV/60 柜右边第 8 本。

这本本子包括两部分,(1)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关于商队、贸易以及北京正教会待遇问题的建议的副本,帐目的副本;(2)关于中国的秘密报告(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的简要历史),由于不能及时呈送给彼得二世,而呈送给女皇安娜的,1730 年签发于莫斯科。背面写着(是否穆勒的手笔?):《中国与暹罗吉的历史资料》(原文为德文)。报告每页仅在正面编号,共 80 页(实为 160 页),分为 23 章;第一章,中国史;荷兰人、西班牙人在台湾的历史;满洲人与 1689 年(在正文上是 1698 年)至 1728 年俄国边界史;第二章,中

国的城市；第三章，北京；第四章，皇宫；第五章，中国的要塞；第六章，陆军；第七章，舰队；第八章，中国的臣民；蒙古人，达斡尔人，等等；第九章，俄国边境；第十章，俄国边疆的武装力量；第十一章，俄国边境的居民；第十二章，从俄国到中国的道路；第十三章，中国的商业；第十四章，中国不派大使到外国去；第十五章，中国人同外国人的关系；第十六章，外国驻华大使；第十七章，中国的尊严；第十八章，婚礼；第十九章，葬礼；第二十章，达赖喇嘛；第二十一章，呼图克图；第二十二章，俄国对中国作战毫无用处；第二十三章，关于中俄交战。

1730年1—12月第6号。从北京回国的领事郎克关于中国事务的报告。——西伯利亚的布利亚特人呈交郎克的请愿书；有关商队的其他事务及帐册。最后，郎克关于将来赴北京的官方商队贸易及中国边境的私人贸易的备忘录。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第IV/60柜右边第8本。

这本本子内有1730年5月16/27日由劳伦特·郎克签名的关于他自己的薪俸的报告(调查后附有外交部的决定；1730年付给他一千卢布)；1730年6月1/12日关于他在中国所购图书(见下)的报告；1730年10月12/23日关于私逃者的报告；——布利亚特人的请愿书；——商队的帐册，帐册边沿空白地位以及末尾上有“领事劳伦特·郎克”的签名，帐册在正面编号由第1—53页，合共106页。

1730年6月2/13日第9号。关于西伯利亚部送交外交部几本中国耶稣会教士编的辞典，再送交科学院一事；这些辞典是来自北京的。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0年、第IV/60柜右边第8本。

这些书就是1730年6月1/12日郎克的报告所提到的。

1730年8月14/25日第11号。发给在北京的神职人员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的命令，命令他监督同他在一起学习汉文和满文的俄国学生的学习。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0年、第IV/60柜右边第8本。

1730年8月14/25日一道命令的抄本。

1731年1—12月第4号。前驻华大使务拉的恩拉维赤伯爵与北京俄国留学生的通信，这些留学生同专任顾问格拉儒诺甫及别的人一起在北京。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1731年、第IV/60柜右边第9^a本。

这本本子内有学语言的学生和僧侣费力波夫给萨瓦·务拉的恩拉维赤的信的抄本，信是1731年1月19/30日和20/31日写于北京的；还有其他文件。

1731年1—12月第8号。前驻北京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的报告和信件；他的同伴写给各人的报告和信件；关于在北京的俄国教士的各种事件。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1年、第IV/60柜右边第9^a本。

1731年6月17/28日至8月20/31日第15号。从北京回国的兵士阿法纳西·索洛维夫的证词,他带回来理藩院给枢密院的回信。——重新派索洛维夫去北京,到商队领导人郎克那里去。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1年、第IV/60柜右边第9/c本。

这是索洛维夫1731年6月26日/7月7日在外交部的证词,连同第二次派他去的1731年8月20/31日有关文件的草稿和抄本(第二次他于1731年8月23日/9月3日从圣彼得堡出发)。

1732年第3号。关于在北京的俄国正教教堂及其神职人员事宜(外交部)与最高宗教会议的通信。——前驻北京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布拉阔甫斯基的报告,等等。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2年、第IV/60柜右边第10/a本。

这本本子内有外交部于1732年8月31日/9月11日及10月31日/11月11日给最高宗教会议的报告(原本、抄本和草稿);——布拉阔甫斯基1731年6月30日/7月11日,7月25日/8月5日,1732年5月24日/6月4日的亲笔写的报告;——最高宗教会议1732年12月16/27日给外交部关于召回布拉阔甫斯基的咨文。

1732年1—12月第7号。俄国商队领导人劳伦特·郎克发自北京的报告。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第IV/60柜右边第10/a本。

郎克的信,1732年4月5/16日于北京,签名:劳伦特·郎克。

1732年9月11/22日第12号。关于前驻华大使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的报告事,该报告是关于代外交部在北京购买辞典的问题。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2年、第IV/60柜右边第10/a本。

1732年10月15/26日第15号。军曹阿法纳西·索洛维夫的证词,这个军曹携带俄国枢密院给理藩院的信件赴北京,证词的内容是他对关于他所取的道路,他在北京的居留,关于蒙古人、在中国的俄国正教教堂及其神职人员等问题的答复。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1732年、第IV/60柜右边第10/c本。

伊尔库次克州首府1652—1781年年鉴。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巴斯南文集,柜?公文袋?60/11。

51页手稿,用阿拉伯数字在正面编页数(总共102页),在边沿空白上有标题及注解,是新近写上去的。

除了这些与《中国事务》有关的文件之外,外交部档案中还有与本书所述相同时期

的文件：(1)《蒙古事务》，已全部读过，没有突出的有兴趣的东西；(2)《准噶尔事务》，在1719年合订成一本本子；(3)《喀尔木克事务》，其目录由班蒂什-卡缅斯基于1806年编成，关于1616—1781时期共有603页。

在该档案中的穆勒材料袋中，在《中国部分》项下的第133IV号，133V号，349I号和349II号，都不存在。

最后，在普西约(见下“印刷品”中普西约项)的文件目录中有：《鞑靼事务》，《西伯利亚事务》，还有另一份“穆勒材料袋”和一份“尤尼文集”。

2. 印刷品

作品前有☆号者，是史料文集。

阿德隆：《至1700年为止、经过审定的、已知赴俄旅游者报道一览表》(德文)，圣彼得堡及来比锡，1846年版，8开本2卷，第1卷：XXIV+480；第2卷VIII+430。有年份及字母索引。

俄译本译者克拉瓦诺夫，莫斯科，1864年版，8开本2卷。

这是一份经过审核的书目。

阿多拉斯基(圣职人员尼古拉)：《东正教会在中国二百周年。第一分册：北京教会第一活动时期(1685—1745)史；第二分册：北京教会第二活动时期(1745—1808)史》，喀山，1887年版，8开本。

这是一本没有历史考证的著作。作者利用北京东正教会的档案，但没有将它们转载，也不明确注明出处；作者主要依靠的是第二手资料，在它们中也不作任何区别。

☆《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圣彼得堡，1841—1842年，4开本5卷，第1卷，1334—1598年；第2卷，1598—1613年；第3卷，1613—1645年；第4卷，1645—1676年；第5卷，1676—1700年。圣彼得堡，1842年版，2页未编号+111+539+3页未编号+4+17+5页未编号。

《史料索引》，圣彼得堡，1843年，4开本，2页未编号+218。

《最新国家喀山、阿斯特拉罕、格鲁吉亚……》，(德文)纽仑堡、出版商恩德斯1724，8开本。

随后，在同一卷内写有：

最新国家西伯利亚，一个以前不大为人所知的莫斯科在亚洲的省份，不仅揭示该地的今昔状况，如政治、地域、肥沃与贫瘠、山脉、动物、河川、城镇等，还叙述萨摩越人、沃古人、喀尔木克人、奥斯提阿克人、通古斯人、布利亚特人、蒙古人以及其他鞑靼民族的风俗习惯，附在该地被俘的瑞典人所叙述的重大事件、托波尔斯克学校、异教徒的改宗的奇异开端等史实，(原文为德

文)纽仑堡,出版商恩德斯1725年,8开本,8页未编号+246。

编辑得不甚精确的集子,选编的著作记载在《前记》中,其中有韦特森、伊兹勃德·又杰斯、布兰德、阿夫瑞尔神父等人的著作。

《俄国圣秩制度史》,莫斯科、1807—1815年版,8开本、6部分。

安德烈维奇:《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889年版,8开本2卷,第1卷,14章220页;第2卷,15章487页。

这是关于西伯利亚历史最完备的著作之一。它的资料来源是印刷的文件集和重要的第二手著作(如穆勒、菲舍尔、班蒂什、斯洛夫齐索夫、谢格洛夫等,参看下面)。可是几个严重的缺点降低了这本文集的价值:首先,它只依据印出来的文件,而印出来的文件只代表档案中的小部分。在附录1第206—214页里,有些转载的文件未注明出处。先前的历史学家如穆勒、菲舍尔被视为始终准确,因为他们依据的是档案文件(其实他们自己对于这些档案文件也未详细注明出处)。最后,除了在数字上的无数印刷错误以外,索引是逐页按字母先后编排的。

阿尔塞纳夫:《尼果赖1671—1708年在俄国所起作用的新资料》,莫斯科大学俄国古代历史学会编辑,莫斯科、1900年版,8开本、63页。

从第32页到63页转载了有关尼果赖的14份档案,其中有(第6号第45—48页)南怀仁神父用拉丁文写给沙皇一封信的俄译文,这封信没有日期,是尼果赖带回来的。见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国事务,第3号,第453—458页。

阿夫瑞尔神父:《欧亚各国旅行记》,旅行目的在于寻找一条通向中国的新路;包括若干有关自然、地理、水路和历史的有趣的见解;附有关蒙古及居住在这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描述。巴黎版……1692年。经国王特许(特许日期是1691年9月30日,登记日期是10月29日,出版日期是1691年12月29日),4开本,18页未编号+406+版权页+目录+一张地图。

第二版,书名同前,巴黎、1693年,12开本,24页未编号+342。没有地图。

参阅:阿德隆,第1卷、第26号;第2卷、第139号;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3章、第2088—2089条。

阿夫瑞尔神父(1651—1698)是耶稣会教士,他曾两次尝试为耶稣会开辟一条经西伯利亚到中国的道路,可是都失败了。在俄国(尤其是在阿斯特拉罕和莫斯科),他能向人们请教和从下述来源中去寻找:(1)中亚细亚的“鞑靼”或“尤斯贝克”商人,不花刺和土耳其商人;(2)莫斯科商人;(3)保存在使节部的报告的抄本;(4)基歇尔、库普莱神父、沃西于等人的著作。他把这些不同的资料互相对证,看来得到的知识十分丰富,是当时一个从未到过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外国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度。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名人辞典》,莫斯科、1836年版、8开本、5卷,圣彼得堡、1847年版,8开本3卷有补遗。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至1792年中俄外交文献汇编》，作于1792—1803年，根据保存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的文件写成，作者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者弗洛兰斯基，出版于征服西伯利亚三百周年纪念日，编者有增补。喀山，1882年，8开本，XII+565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53条。

这本书同穆勒的书一样，是有关本书研究内容的最重要的著作，因此值得加以解释。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1737—1814)，是基辅科学院1745—1754年的学生，1755年在莫斯科神学院，1755—1762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最后于1763—1814年任职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局，1800年起担任档案局局长，于1776年开始该书的研究写作工作，于1792年写成。当时他得不到出版的准许，即使他将本书献给沙皇阿历山大一世，到了1802年也还未获得准许。后来沙皇阿历山大一世于1821年下令由国家出资出版这本书以及作者的其它著作，可是命令没有得到执行。1874年弗洛兰斯基取得了这本书的手稿，在1882年出版了五百本，这已经是本书写成后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了。编者的《前言》在第V—VII页。

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这本书，在当时是一本惊人的著作，在今天对于认真整理外交部的档案来说，仍然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著作。但是本书也有不足和值得批判的地方。按照现在的版本，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年份编排的档案摘要，第1至329页；第二部分是转载各种档案原文，自第333至512页；第三部分是弗洛兰斯基加上去的补遗，自第513至544页，以及一份专有名词索引。

转载的档案原文(次序排列是非常武断的)并非全部都有同样的重要性：登载了尼布楚条约(1689)之后，接着是1727—1728年的几个条约和协议；沙皇于1654年交付巴伊阔夫转交给中国皇帝的一封信；给伊兹玛依洛夫、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和郎克的训令，都是官方原文；官商古谢特尼科夫的帐册；然后是历史学家穆勒的长篇大论。

正文文字——包括附录，以及本书所引用的文字——都采用新的拼法，专有名词往往写错，档案番号很少明确地注明。最后——这一点也许是本书最严重的缺点——所有文件都毫无差别地引用，丝毫没有审核，也不表示丝毫的怀疑。

不过无论如何，班蒂什的这本书仍然是一本不可少的著作，它不是系统的、批判性的著作，但构成从外交部官方档案提取出来的史料。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对外关系一瞥》，莫斯科1894—1902年版，8开本4卷。

巴拉诺夫：《枢密院档案》，圣彼得堡1872—1873年版，8开本3卷；第1卷，彼得大帝在位时期1704—1725年由沙皇签署之谕旨和勅令目录，1872年版，XXXI+167+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第2卷，1725—1740年圣彼得堡枢密院档案室保藏之十八世纪的谕旨和敕令目录，1875年版，XIV+1001+专有名词、资料及地理名词索引；第3卷，标题同上，但年份系1740—

1762年,1878年版,XXXI+304+同样索引。

这是对枢密院档案所作的分类目录。

贝克曼:《旧旅行记文献》(德文)。哥廷根,1807—1810年,8开本2卷,第1卷,XII+750页;第2卷,VI+756页。

贝尔:《由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的旅行》,1763年,格拉斯哥版,4开本、2卷。第1卷包括……1719、1720、1721年经西伯利亚到中国北京的旅行,附有作者绘制的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两条通路的地图;第2卷包括继续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旅行,外加郎克的日记的译文,郎克是1721、1722年俄国驻中国宫廷的事务官……

贝尔:《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的旅行》,由M……从英文译成法文,1766年、巴黎版,12开3卷。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3章、第2093—2094条;第4章、第2470—2471条。

贝尔是伊兹玛依洛夫使团的医生(1719—1722年),一般说来,他的论述是正确的。可是他所知道的只是他自己参加过的谈话和公开的会议;他未注明他所使用的日期是俄历,俄历在十八世纪时比公历晚十一天。

贝纳尔(J. Fr.),见《北方游记集》。

毕楚林(伊雅森特教会执事):《奥伊拉特人或喀尔木克人自十五世纪至今日的简史》,圣彼得堡,1834年版,8开本、2页未编号+253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761条。

作者对他的汉文译文未注明原文出处,并且说:“这对那些读书消遣的人是毫无用处的。”第4页。

布卢门塔尔,见“费拉雷特”。

布韦神父:《为国王描绘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巴黎,1697年版,12开本,264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章、第634条。

参阅下面:《莫斯科帝国之现状》。

布兰德:《1693—1695年俄国使臣伊兹勃兰德·义杰斯使华记》,此次旅行于1693,1694和1695年从莫斯科经过大乌斯蒂加、西伯利亚、达乌里亚和蒙古鞑靼地区进行;那时所发生的事情由布兰德根据经历来叙述。汉堡,出版商本雅明·席勒恩,书商在多姆。(德文)1698年12开本,215页+16页未编号。

布兰德:《出使日记,出使者埃韦拉德·伊兹勃兰德,莫斯科公国皇帝约翰及彼得·亚历赛维奇陛下于1693,1694,1695年派往中国之大使,赴华途

中经过乌斯蒂加、西伯利亚、达乌里亚等省及蒙古，到达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日记由大使馆秘书亚当·布兰德撰写。根据原本英译。1698年印于汉堡。由卢多尔夫加上关于俄国物产的有趣的见闻。1698年伦敦版，8开本134页。（以上为英文）

布兰德：《出使日记，出使者埃韦拉德·伊兹勃兰德，莫斯科皇帝约翰及彼得·亚历赛维奇陛下于1693、1694、1695年派往中国之大使，由陆路赴华，途经乌斯蒂加、西伯利亚、达乌里亚等省及蒙古，到达中华帝国之都北京；日记由大使馆秘书亚当·布兰德撰写。由高地德语原文译成英文。1698年印于汉堡……1698年印于伦敦。8开本134页（实际上有138页，因为第81、82、83、84页重复两次）。

布兰德：《埃韦尔·伊兹勃兰德先生，1692、1693、1694年由女沙皇陛下派赴中国的使臣，旅行记。亚当·布兰德先生撰写……》阿姆斯特丹，1699年让-路易·德·洛姆书店版，8开本，2页没有编号+249页+地图。

布兰德：《当今沙皇陛下之使团，在大使伊兹勃兰德先生领导下，自莫斯科由陆路及水路，途经大乌斯蒂加、西伯利亚、达乌里亚、蒙古……等处，到达中国之极为出色之旅行》（原文为荷兰文），蒂厄尔1699年版，8开本10页未编号+201+1页未编号。

关于布兰德著作的不同版本，参阅：阿德隆前引著作；梅若夫，第2卷、第12456—12460号；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3章、第2092条；第4章、第2466—2470条。

默伦多夫的《中国书志学手册》（1876年、上海版、8开本）还在第229页第3056条提起1697年的一个德文版本：《他赴华之行的记述，他于1692、1694年随布兰德经西伯利亚前往中国。汉堡，1697版》（原文为德文）。

比耶洛库罗夫：《论使节部》，莫斯科、1906年版、8开本、2页未编号+170页。

加恩：《1727—1728年在北京之俄国商队的帐册》，巴黎，1911年、8开本、XII+143页。

加恩：《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载：《科学使命新档案，新丛书，第1分册》，巴黎，1910年版、8开本、1—544页。

科尔迪埃：《有关中华帝国之著作书目词典》，第1版、巴黎、1878—1885年，补遗、1895年、8开本、3卷；远东现代语言学校出版物第X、第XI、第3条、第XV卷；第1卷、XIV页+2页未编号+868条+目录第869—873页；第2卷自第875—1396条+编后记第1399—1401页+目录第1402—1408页；第3卷（补遗）；第1409—2232条+编后记+目录第2233—2243页。——第2

版,巴黎,1904—1908年,8开本,4卷;第1卷自第XVI+764条;第2卷765—1576条;第3卷1577—2380条;第4卷2381—3236条+2页未编号+目录第3239—3252页。

第2版有明显的增补,但与第1版相同,既无目录也无索引。

科尔迪埃:《1890—1900(1902)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巴黎,1901—1902年版,8开本,3卷,第1卷570页;第2卷650页+1折页;第3卷598页。

尤其要参阅第1卷、第6章、第79—97页。

科尔迪埃:《中西印刷术在中国》,载远东现代语言学校出版物,第3卷,第5条,1901年,单行本,巴黎,1901年版,8开本、IX+73页+1页未编号+1折页。

科克斯:《俄国在亚洲与美洲之间的新发现始末。附西伯利亚的征服,以及中俄之间的贸易与商业史。威廉·科克斯撰写……》,伦敦,1780年,4开本、页数XXII+344页+索引及地图;同上书,1787年版,8开本,1804年版,8开本。

法译本,巴黎,1781年版,4开本;纳沙特尔,1781年版,8开本。

德译本,法兰克福与来比锡,1783年版,8开本。

参阅:梅若夫,第2卷、第14883—14889号;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47—2448条。

当维尔(布尔吉尼翁):《中国新地图,自中国蒙古至西藏……》,巴黎、对开本;海牙,1737年、对开本。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章、第47—48条。

《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之史料补遗》,圣彼得堡,1846—1872年,4开本,12卷;第1卷,十世纪末至1613年;第2卷,1613—1645年;第3卷,1645—1654年;第4卷,1655—1664年;第5卷,1665—1669年;第6卷,1670—1676年;第7卷,1676—1677年;第8卷,1678—1682年;第9卷,1676—1682年;第10卷,1682—1700年,圣彼得堡1867年版,页数VIII+504页;第11卷,1684—1696年,同前1869年版,页数VIII+8+312页;第12卷,1684—1700年,同前1872年版,页数VIII+14+423+24页。

《史料补遗头十卷索引》,圣彼得堡,1875年版,4页未编号+263页。

《史料》及其《补遗》似乎不象《西伯利亚史料》(见下)编辑得那样仔细。读者可以在里面找出明显的数字错误(参阅本书第6章第143页注13),材料来源也没有明确注明出处(例如:《尼布楚市政府文件》,未注明文件的号数,某某人写的文件,未注明地

点,等等……)。

达吉恩:《俄中两国宗教、政治及商务关系史纲要》,由约翰·达吉恩主要根据原始资料撰写,载:《中国记录》,第3卷,1870—1871年,第143—146,273—280,319—322,337—345页;第4卷,1871—1872年,第10—17,35—40,68—74,96—99,186—192,206—214,227—231页。北京,1872年,另印单行本8开本,页数IV+54+23页。(又译:德贞:《中俄政教志略》。——译者)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52条。

这是一本第三手材料的书,依据全是翻译和西方的资料。

迪·荷尔德:《中国概述》,对中华帝国和中国蒙古的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及自然状况作了叙述,附有这些地区的全图及专图,以及西藏、朝鲜的全图及专图,附有许多雕刻的大小图形。由耶稣会神父迪·荷尔德撰写。巴黎圣雅克街勒梅西埃印刷图书公司出版,归入《金宝丛书》,1735年印行。得到国王的批准,版权所有。对开本,4卷;第1卷页数VIII+LII+IV+592+地图;第2卷页数IV+725;第3卷页数IV+565;第4卷页数II+520。

海牙,亨利·斯赫尔莱尔出版社,1736年,4开本,4卷;第1卷页数LXXX+488+35页未编号;第2卷页数4页未编号+834页;第3卷页数4页未编号+652页;第4卷页数2页未编号+606+127页未编号。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章,第45—52条。

埃里斯托夫:“阿玉气”条,载:《百科全书辞典》,圣彼得堡,1835—1841年,8开本,17卷;第3卷,第524—527页。

法尔克:《俄罗斯帝国地形知识论文》,圣彼得堡1785—1786年8开本3卷;第一卷内有1768年至1773年他的旅行经过,以及有关自然和政治舆地描写的文章1785年,页数6页未编号+XII+402+两张地图;第二卷内有矿物及植物史的文章1786年,页数VI+282页;第三卷内有动物知识和民族志的文章(原文为德文)1786年,页数4页未编号+285—584+(注册)XXXV。

菲舍尔:《西伯利亚史》从西伯利亚的发现,写到俄军征服西伯利亚,在科学院中作过演讲,并得其允准而发表,著者约翰·艾伯哈德·菲舍尔,科学院院士,古代及历史学教授,哥廷根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圣彼得堡,在皇家科学院附印,1768年,8开本,2卷;第1卷页数14页未编号+536页;第2卷页数537—861+32页未编号(地理索引)+156页未编号(历史索引)+2张地图。

菲舍尔(1697—1771年)宣称曾经研究过穆勒所搜集的档案文件。象穆勒一样,他也引用《西伯利亚历史书》而不详细注明出处。可是他似乎比穆勒更进一步,他具有一点批判的精神。

费拉雷(大主教)见费拉雷特。

弗洛林斯基, 见班蒂什·卡缅斯基, 外交文件集……戈比尔神父:《中国人叙述的从北京到托波尔、从托波尔到土尔扈特国土的一条路线》, 由戈比尔神父译, 并于1726年送给耶稣会教士苏西埃神父(参看“苏西埃神父”条)。

葛利可夫:《俄国英明的改革家彼得大帝的业绩》, 莫斯科, 1788—1789年, 8开本, 12卷; 同书《补遗》, 1790—1797年, 8开本, 18卷。

古茨拉夫:《中国古代与现代史纲要, 包括外国与中国交往与贸易之回顾》, 1834年, 8开本, 2卷: 第1卷页数VIII+436页; 第2卷页数V+463+XI折页+地图; 参阅第2卷, 第417—445页; 俄国商品陈列所。

科尔迪埃辞典, 第2版, 第1章, 第589条。

亨宁:《1693—94年, 俄国使节在北京宫廷的谈判。俄中关系的一个插曲》(德文), 载《亚细亚》, 1904年, 第5号, 第68—71页。

《若干有学识的旅行家的新发现史》, 伯尔尼及海牙, 1779—1787年版, 8开本, 6卷, 参阅“帕拉施”条。

《旅行通史》, 参阅“普雷沃斯特”条。

黄神父:《中西历表》, 作者: 黄伯禄, 徐家汇, 1885年版, 8开本, 页数2+2页未编号+XXVI+III+6页未编号+59页。

科尔迪埃辞典, 第2版, 第1章, 第569条。

安博-于阿尔:《据中国著者所述关于哈密地区的概况和历史》, 载:《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会刊》, 地理分会, 1892年版, 1892年, 巴黎, 单行本, 8开本, 75页+地图。

《伊尔库次克十七、十八世纪历史资料》, 莫斯科, 1883年, 8开本, 页数1页未编号+92页。

这是抄本, 原本保存在莫斯科司法部档案室。内容多数是人口调查的清单。

凯达诺夫:《简论俄国宫廷的外交, 自罗曼诺夫家族统治全俄罗斯至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死亡为止》。第1部分: 1613—1762年; 第2部分: 1762—1825年, 圣彼得堡, 1833年版, 8开本。

凯达诺夫:《俄国对外商业部及商务关税部与外国政府来往文件, 按年份概述》, 圣彼得堡, 1890年, 8开本。

同上作者:《商务部文件系统目录》, 圣彼得堡, 1884年, 8开本。

同上作者:《保藏在关税部之西伯利亚部、莫斯科警察局及其他旧机构有

关工商业文件之系统目录》，圣彼得堡，1877年版，8开本；同上书《补遗》，1888年，4开本。

克拉普罗特：《1806年中俄边界旅行考查记》，载《亚洲文献历史及语言学汇编》（原文为德文），圣彼得堡，1810年，4开本224页，第159—224页。

同上作者：《俄中边界问题。1806年西伯利亚旅行札记》，载：《有关亚洲之研究论文》，巴黎，1824—1828年，8开本，3卷：第1卷，4页未编号+478页；第2卷，4页未编号+432页+2页未编号；第3卷4页未编号+520页+图及表；第1卷第1—80页。

同上作者：《俄国概述》，译自中文，同上书，第81—115页。

同上作者：《关于西伯利亚的几件古董》，同上书，第157—172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卷，第67—68条。

克柳切夫斯基：《十六至十八世纪之俄国卢布与目前卢布之关系》，载：《莫斯科大学俄国古代与历史学会读物》，1884年，第1本，《调查研究》，第172页。

科恩与安德烈：《西伯利亚与阿穆尔河地区》（德文），来比锡，1876年，8开本。

科尔特：《俄国地图制作法史料》，基辅研究古代文件委员会编。第一分册，基辅，1899年版；第2条、第2分册，基辅，1906年，对开本。

科尔萨克：《俄中商务关系历史及统计要览》，喀山，1857年，8开本，445页（无表格无索引）。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49条。

根据穆勒、菲舍尔、斯洛夫齐索夫、丘尔科夫等人的著作对各个商队进行简要而迅速的回顾。

科佐马洛夫：《十六、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商业概要》，圣彼得堡，1889年，第2版，8开本，359页。

引用了资料，但没有足够明确地注明出处，而且似乎欠缺历史批判精神（例如引用《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中的一个数字，可能表示条文号数或者页数；提到《考古学会搜集和编辑的史料》中的文件，又不注明它们的区别——是草稿、抄件、公文书或私文书，等等……这就是不根据它们的价值区别对待）。

科托奇欣：《在阿历克西斯·米哈依洛维奇统治下的俄罗斯》，格里高瑞·科托奇欣的当代著作。第1版（由考古学会编辑），书名上是：《在阿历克西雅……科希西娜（原文如此）……》。圣彼得堡，1840年，8开本；第2版书名同上，1859年，4开本；第3版，书名同上，1884年，8开本。

科托奇欣，起先在使节部担任秘书，曾经参加过卡迪斯条约(1661年)的谈判，后来又参加与波兰订约的会谈(1664年)，然后逃到瑞典去，在瑞典被雇在斯德哥尔摩档案处当雇员，1667年为谋杀案被斩首。他的俄文手稿于1838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图书馆发现。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1558—1899年的纪录和研究》，伦敦，1899年，8开本，页数XII+411+地图。

一本叙述明快的书，从政治着眼多于从历史着眼。虽然作者在《前记》中说自己曾参考过二百多种资料，但只引用了最主要的，就是伊兹勃兰德(1706年版)和雷文斯坦的著作。尼布楚条约的英译在附录B第330—331页。

克里格爾：《俄中政治的头一百年》，柏林，1904年，8开本，VIII+72页。

仅在本书开头注明参考资料，它们是：穆勒、布兰德、翁弗尔察格特、郎克和帕拉斯的著作，以及《旅行通史》。作者引用“一件存放于柏林国家机密档案处的手稿：《劳伦茨·郎格赴华之行及对该国的描写》(德文)”，比韦伯在《变化了的俄国》所引用的摘要更完整，而且包括归途的日记。克里格爾先生的研究工作是认真的，可惜缺乏批判精神，而且有若干错误(例如伊兹勃兰德的原始报告是在莫斯科的档案里，而不是在圣彼得堡；伴随柯罗文的是一千五百人，而不是五百人，等等……)。

郎克：《俄国驻华事务官郎克使华日记，1721—1722年》，莱登，在阿伯拉昂·克勒维埃处印刷，1726年版。作者自费出版，8开本，10页未编号+243页。

关于郎克，可再参阅：《1717年第一次旅行》。

韦伯：《变化了的俄国……》，法兰克福1721年版，4开本第72—116页。

韦伯：《关于大俄罗斯或莫斯科国现状的新论文》，阿姆斯特丹及巴黎版，1725年，12开本。巴黎版、第2卷、第89—144页。

《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第5卷、1731年、第371—410页。

普雷沃斯特：《旅行通史》，巴黎、第20卷(12开本)、1749年、第288—314页。

施瓦贝：《旅行通史》(德文)，柏林、第5卷、1749年、第526—535页。

《阿斯特利文集》，第3卷、第575—581页。

随同伊兹玛依洛夫使团的第二次旅行(1719—1722年)。

翁弗尔察格特：《大俄罗斯皇帝陛下派往中国皇帝处的使节……》(德文)，吕贝克，1725年，8开本。

《北方游记集》，阿姆斯特丹，1727年、第8卷、12开本、第221—371页。

贝尔：《从俄国圣彼得堡……》，格拉斯哥，1763年版，4开本，2卷，第2卷，散见各处。

第三次 1727 年偕同商队旅行。

帕拉斯：《新北方自然地理学……》，圣彼得堡及来比锡，1781—1796 年，8 开本，7 卷，第 2 卷，第 83—159 页。

参阅科尔迪埃辞典，第 2 版，第 4 章，第 2471—2472 条。默伦多夫所著下面引用书第 CLXIII 页记载（第 120 页第 1444 号）：《范比奇特伦（Bechteren）到东印度的旅行以及郎克到中国的旅行》，阿姆斯特丹，1705 年，12 开本。其中“比奇特伦”大概是“雷奇特伦”（Rechteren）的印刷错误；而 1725 年也印错成 1705 年。

勒·勃伦：《高乃依·勒·勃伦经莫斯科、波斯至东印度的旅行……附有莫斯科大使伊兹勃兰德先生经由俄罗斯、蒙古至中国所走过的道路……》，阿姆斯特丹，1718 年，对开本，2 卷，第 1 卷，6 页未编号 + 252 页；第 2 卷 253—469 页，外加图表及地图。伊兹勃兰德·义杰斯的叙述在第 1 卷，第 17—30 章，第 100—143 页。

同上作者，同上书名，英译本，伦敦，1737 年，对开本，2 卷。

勒·孔特神父：《中国现状之新论文》，耶稣会教士、王室数学家路易·勒·孔特神父著。巴黎王家印刷馆印，1696 年，版权所有，12 开 2 卷：第 1 卷 14 页未编号 + 508 页；第 2 卷 2 页未编号 + 536 页；第 2 版同上书名，1697 年 12 开本，第 1 卷 30 页未编号 + 410 页；第 2 卷 2 页未编号 + 435 页。

参阅科尔迪埃辞典，第 2 版，第 1 章，第 39—43 条。

[莱布尼兹(G)]《阐明当代历史的中国近况》其中有寄往欧洲论述关于天主教会现在第一次得到当局特许传教的报告，有论述关于对欧洲科学的热情，关于民族及其帝国的风尚，以及关于中俄战争与缔和迄未为人所知的许多事件。出版人：G.G. 莱布尼兹，开卷有索引，第二卷增补后编附录，无出版地点，公元 1599 年……（原文为拉丁文），1699 年，12 开本，26 页未编号 + 175 页 + 13 页未编号 + 128 页。

贝克曼：《Literatur……》，第 2 卷，第 465 页，曾引用上述书的第 1 版，1697 年，8 开本。

莱布尼兹这本书内所载文件与本书有关的是：阐明我神父 1693 年 12 月 6 日自果阿给莱布尼兹的一封信，载第 156—157 页，公元 1663、64、65 年完成的莫斯科使团的中国之行简述奉使随伊兹勃兰特从莫斯科到中国的布兰德著，163—170 页（此处为拉丁文），（这几页并未注明任何日期，而且几乎完全叙述沿途未开化民族的人种和宗教。路线途经托波尔，额尔齐斯河，奥比伊河，瓦哈河，克塔河，叶尼塞河，安加拉河，贝加尔湖，泽楞格河，乌第斯河和乌丁斯克，嫩齐斯克，奥尔居尼亚沙漠（要五个星期才能越过），扎里奥斯山（扎洛河的发源地），纳弗或斯锡冈，卡拉基塔或卡拉科塔，长城；摘自张诚神甫 1689 年 7 月 2 日和 3 日自靠近中华帝国边界的俄属东鞑靼尼布楚城致

法王神师方济和东方传道会会长安东尼·威攸西乌斯的信（此处为拉丁文），171—175页。

列昂捷夫：《中国使臣出使喀尔木克阿玉气汗记，附有关于俄国领土及风俗习惯的描述》。阿历克西斯·列昂捷夫译自满文。圣彼得堡、科学院、1782年、8开本，共166页。

同上作者：《关于中国人与准噶尔人1677至1689年战争的报道，摘自中国历史》，列昂捷夫译自满文。圣彼得堡、1777年、8开本。

《外方传教会撰写的有益和有趣的信件》，作者是几个耶稣会传教士。巴黎、1703—1776年版、12开本、34卷；第15集1722年版、第23—27页（关于伊兹玛洛夫）。

参阅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2章、第926—957条。

利特金：《奥伊拉特人史料》，载：《阿斯特拉罕州新闻》，1860年、第45、46号。

同上作者：《阿玉气》条，载《百科全书辞典》，圣彼得堡、1861—1863年、8开本、6卷，第5卷。

马伊科夫：《彼得大帝时期中俄关系史》，载：《考古学会新闻报》，第8卷、第5分册、第545—541页（原文如此——译者）。

马依阿：《中国通史，即中国编年史》，译自《通鉴纲目》，译者已故马依阿神父，耶稣会士，北京传教士；发行人修道院长格罗西埃，督印人勒·鲁·代·奥特西雷耶先生……经王上批准享有特权。巴黎、1777—1785年、4开本、13卷。

尤其应参阅1780年第11卷第110页以下；1783年第12卷第61—108页（俄国最初几次侵犯中国的历史小志……）。

科尔迪埃，第2版、第1章、第583—587条。

马克切耶夫：《准噶尔地图，由瑞典人勒纳于1716年至1733年被喀尔木克人囚禁时所作》，载：《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札记》，一般地理部分、第11卷、第105—145页。

马尔唐：《俄中两国冲突的起因、发展及其普遍影响》，载《国际法杂志》，第12卷、第5、6期；单行本、1880年、布鲁塞尔、8开本、75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53—2454条。

迈耶斯：《中国政府》，上海及伦敦1878年版，8开本、VI+158页；第2版、1886年、8开本、LXIV+158页。

《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关于西伯利亚之俄文书籍及文章以及外文书籍索

引》，圣彼得堡，1891—1892年，8开本，4卷，第1卷：西伯利亚的历史资料，1891年，XII+485页；第2卷：历史、传记、地理、旅行、统计、民族志和地图制作，1891年X+470页；第3卷：儿童教育、司法、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农业经济与农业、工艺、天文、测地学、机械、自然科学、医学、语言学、文学、艺术。补遗，1892年共X+303页。按字母顺序目录，1892年，8开本，188页。

梅莱蒂伊(修道院长)：《西伯利亚东部的旧宗教信件(1653—1726年)以及关于达乌里亚教会的报道》，喀山，1875年，8开本，XXXV+198页。

只有少数文件注明出处。

同上作者：《伊尔库次克及尼布楚主教韦尼亚曼阁下旅途纪实及回忆……》，载：《伊尔库次克教区新闻》，1874年，第34至41号，第443—536页。

同上作者(已升为主教)：《十七、十八世纪在达乌里亚(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及中国之东正教会以及教会事务之组织》，梁赞，1901年，8开本，III+219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58条。

这是一本缺乏科学精神的著作：参考资料不注明出处或注明得不够详细(例如引用书籍不注明出版地点、年份及页数，参阅第10、12、26、27、75……等页)；对喇嘛教的狭隘的憎恨表现在第6、7章里；严重的错误非常众多，例如第134页说忽必烈(Khoubilai)是明朝的一个皇帝；第93页说阿拉布珠儿是阿玉气的伯父，等等，等等。

《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报告汇编》，北京传教士编，巴黎，1776—1814年，4开本，16卷。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章，第54—56条。

参阅第1章，第325—400页，阿米奥神父著：《关于征服厄鲁特人的资料》，又第401—418页同上作者：《关于土尔扈特人自里海边沿迁至中华帝国的资料》。

门采尔：中国编年简史或历代中国皇帝纪年，从他们所说的开天辟地以至救世主基督降生后1696年的现代，按正确顺序逐年编排，附正确的中国字人名及说明，以及两个用中文说明其开天辟地算起的最高贵的历史的表，表引自中国的名为Siao Ul Hio或Lun的儿童课本。并附1693，94和95年莫斯科使节伊兹勃兰德从莫斯科前往中国的旅途记叙，……有门采尔神父和医学博士朱尔夫的介绍，约翰·米夏埃尔·吕迪格尔书店出版，1696年，8开本，15页未编号+145页+(索引)5页未编号。

为了证明中国皇帝康熙还活着，作者引用了伊兹勃兰德旅行记里的短短一段叙述，这段叙述是通过“从布兰登堡宫廷到莫斯科，前高贵的使臣，约翰·罗易尔先生”传送给他的，下面是这段的标题：

附录短文：从莫斯科经陆路前往中国/或莫斯科使臣伊兹勃兰德叙述他如何取陆路前往中国/他在各国所遇到的/来回沿途所发生的事情/1693, 94 和 95 年。为供后代人参考，将由前述的伊兹勃兰德更为详尽地出版。141—145 页。

参阅贝克曼著作，第 2 章、第 46 页以下；梅若夫、第 2 章、第 12452 号；科尔迪埃辞典，第 1 章、第 559—560 条。

米柳科夫：《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罗斯国家组织与彼得大帝之改革》，圣彼得堡、1892 年、8 开本；第 2 版、1905 年、8 开本，页数 XIV + 2 页未编号 + 678 页。

莫德斯特：《圣英诺森，伊尔库次克第一任主教与奇迹圣人的一生》，彼尔姆、1878 年、8 开本、共 52 页。

默伦多夫：《中国书志学手册——有关中国之书籍与文章目录》，上海、1876 年、8 开本、页数 VIII + 378 页。

蒙哥马利·马丁：《中国：政治、商业与社会各方面；与英国、俄国、法国、美国等等所订条约与交往》，伦敦、1846—1847 年、8 开本、4 卷；第 1 卷、IV + 192 页；第 2 卷、193 + 432 页；第 3 卷、1—262 页；第 4 卷、8 页未编号 + 263—502 页 + XVIII + 2 页未编号。

穆勒：建议逐件发表与帝国的状况和事情有关的消息，以改进俄国历史研究。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1732—1764 年、8 开本、9 卷、第 10 卷《补遗》，1816 年、8 开本。

第 1 卷、第 1 部分、1732 年；第 2 及第 3 部分、1733 年；第 4 及第 5 部分、1734 年；第 6 部分、1735 年 8 + 532 页。——东喀尔木克新历史，尤其是巴什图汗和额尔德尼·粗鲁图这两个最后的浑台吉的政府的历史，第 123 页；——高级陆军代表约翰·翁可夫斯基喀尔木克之行，有关传统典礼和风俗习惯的摘引，第 141 页；——关于雅克萨城，以及俄中因此而引起的争端，第 315—326 页；——中国人关于从北京取道西伯利亚前往阿斯特拉罕喀尔木克人处之旅途记述摘引，第 327—348 页。文字与苏西埃出版时相同；但注解则力求改善，必要时增加；俄中和平谈判于 1689 年 8 月 27 日在尼布楚举行。（德文）第 495—515 页。

第 2 卷，第 1 部分 1736 年；第 2 及第 3 部分 1737 年；第 4、5、6 部分 1758 年，448 页 + (索引) 48 页未编号；——俄国治理下的黑龙江地区史，第 293—448 页。

第 3 卷，俄国史文集。第 1、2 及 3 部分 1758 年；第 4 部分 1759 年；第 5 及 6 部分 1760 年，页数 612 页 + (索引) 42 页未编号；——西伯利亚行动

报道,第413—612页。

第4卷,同上标题,1760年,页数548+(索引)44页未编号;——在不花刺发现金沙,因而作此次旅行,以及在额尔齐斯河修造要塞:鄂木斯克、石勒申斯克、雅木柴夫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和石山口。第183—274页;——阿玉气喀尔木克人情况,译自瑞典文。第275—364页。

这是一本书的译本,这本书题为«Berättelse om Ajuckiniska Calmuckiet, etc., etc.»(瑞典文),斯德哥尔摩,1744年,8开本(作者是施尼策尔,他是1712—1714年伴随中国使团到土尔扈特人那里去的军官;附有另外一个瑞典军官勒纳的注解,他被喀尔木克人囚禁了十七年)。这是一本民族学的书,包括无数历史错误。

关于俄国人到中国的头几次旅行,第473—548页。

第5卷,第1、2部分1760年;第3、4部分1761年,页数584+(索引)46页未编号。

第6卷,1—2部分1761年;3—4部分1762年;566页+(索引)36页未编号;——西伯利亚史,第109—566页。

第7卷,1—2部分1762年;3—4部分1763年,564页+(索引)30页未编号。

第8卷,1763年;第6部分1764年,共592页;——西伯利亚史,1—458页,俄国对华行动纪录,第504—520页。

第9卷,1764年共568页。

第10卷,俄国史文集。有助于认识俄国及其历史的论文,古斯塔夫·冯·埃维尔斯和莫理茨·冯·恩格尔哈特编,多尔帕特(塔尔图),1816年,8开本,335页;俄国在华教会的遭遇,第277—296页,根据昂布鲁瓦兹(修道士):《俄国圣秩制度史》改写,莫斯科,1807—1815年,8开本,6卷,第2卷,1810年。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45—2446条。

同上作者:《西伯利亚帝国自开始以至今日,尤其是在被俄国征服以后,所有发生事件概述》,第1卷,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1750年版,4开本,14页,未编号+457页+(索引)31页未编号;第2版,1787年,4开本,10页未编号+363页+(目录)6页未编号。

穆勒与帕拉斯:《西伯利亚之征服以及从最早期开始的俄中两国间之贸易、战争、商务,等等》,译自俄文。伦敦,1842年,8开本,V+153页。

梅若夫,第2章,第10号;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46—2447条。

穆勒:《实用及娱乐著作月报》,圣彼得堡,1755—1757年8开本,6卷。——《关于俄国的最初远征与出使中国》,1755年7月号,第15—62

页；——《关于西伯利亚的贸易》，1755年9月号、第205—262页；——《关于西伯利亚的贸易续篇》，1755年12月号、第555—568页；1756年2月号、第180—191页；1756年3月号、第195—226页；1756年4月号、第339—360页；1756年5月号、第387—421页；——《关于政府、省分……等等名册续篇》，1757年2月号、第99—125页；——《关于1719年(1689年)俄中两国划定边界的疑点的解释》，1757年4月号、第305—321页；——《关于制造丝绸的情报，丝绸厂在中国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译自迪·荷尔德的〈中国概述〉，外加汉文译者赫拉瑞·罗索金少尉的科学性注解》，1757年5月号、第387—461页；——《黑龙江附近地区史》，1757年7月号、第3—39页；8月号、第99—130页；9月号、第195—227页；10月号、第291—328页。

穆勒：《实用及娱乐著作及译文》，圣彼得堡、1758—1762年、8开本、10卷。——《关于不花刺出产金沙的情报，为此事进行的远征以及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筑要塞事宜》，1760年正月号、第3—54页；2月号、第99—136页。

穆勒：《关于科学问题的著作与消息月报》，圣彼得堡、1763—1764年、8开本、4卷。——《西伯利亚简史》，1763年、第354—368页；——《西伯利亚史》，1764年1月号、第143页；2月号、第99—135页；3月号、第195—237页；4月号、第291—324页；5月号、第387—418页；6月号、第488—528页；——《罗索金：1714年出使伏尔加河喀尔木克汗阿玉气宫廷之中国使臣在俄国旅行概述》，1764年7月号、第3—48页；8月号、第99—150页；9月号、第195—234页；10月号、第291—353页；11月号、第387—413页。

穆勒(格拉尔德·弗烈德里克,1705—1783年),德国人,生于威斯特伐里亚,俄罗斯科学院成立(1725年)即担任历史、地理、拉丁文方面的助理,参加白令的第二次探险队,在西伯利亚居留了十年(1733—1743年)。他出版过无数关于俄罗斯欧洲部分及亚洲部分的历史、地理和民族志的著作。参阅:卢奇斯基:《历史杂志》,第2章第197页以下。如上所述,穆勒有关西伯利亚的著作包括三种文集:第一类是简称为《俄国历史文集》的;第二类是《著作月报》及其续编;第三类是《西伯利亚帝国概述》。最后一类没有写完,只有第一卷,所写年代不超过十七世纪初年。

头两类文集构成两套平行的、同时代的丛书。同一篇文章有用德文写的,也有用俄文写的。俄文文章比德文的有更大的优点,那就是俄文文章可以直接写俄国的地名、人名,不必用德文音译,德文音译非常不严格,往往有大的误差;另外一点是俄文文章比德文的早几个月出现。例如:《黑龙江地区史》,俄文的出现在《著作月报》1757年7—10月号;德文的出现在《俄国历史文集》1758年、第2章、第293—448页;——俄文《关于不花刺出产金沙的情报》载《月报》1760年1—2月号;德文的载《文集》1760年、第4章、第183—274页;——《关于俄人最初几次前往中国的旅行》俄文载《著作月报》1755年7月号,德文的载《文集》1760年、第4章第473—548页;《西伯利亚

史》俄文载《著作月报》1763年、第354—368页及1764年1—6月号，德文的载《文集》1761—1762年、第6章、第109—566页，以及1763年、第8章、第1—458页。

但是俄德文对照也是不完全的，例如《文集》只登载图理琛的中文著作的德文译文，是从法译本转译的（法译本由戈比尔神父翻译，刊登在苏西埃神父的《研究》中，参看下面“苏西埃”条）；《著作月报》则刊登罗索金直接从满文图理琛原著译成的俄文译文。

还可注意的是，从1755年至1764年每年2卷共20卷的《著作月报》，在这段期间刊名有点变化，起初是《实用及娱乐著作月报》，从1755年至1757年共4卷；然后是《实用及娱乐之著作及译文》，从1758年至1762年共10卷；最后是《关于科学问题的著作与消息月报》，自1763年至1764年共4卷。（1755—1757年应为6卷，始符合20卷之数，原文共为4卷，恐有误——译者）。在所有这些文集中，没有一处出现过作者和编者穆勒的名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集》第2卷开头和结尾的日期有突然的变化，从1736—1737年突然跳到1758年。因此这本文集的出版工作可分为两个时期，第1卷和第2卷的前半部是从1732年至1737年；其余部分，换句话说，就是第2卷的后半部和其余各卷直到最后，都包括在1758年和1764年中。

这个区别在穆勒的材料来源中表现得很清楚。对于那些在他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前的文章（他是1744年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他不得不翻译一些西方的著作（如韦特森、苏西埃神父等），或者满足于一些简短的直接材料。可是在他回来以后，他就能利用他在旅行中所抄录的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档案，以编写他的《西伯利亚帝国概述》（1750年）、他的《著作月报》（1755年及以后几年）、以及以后的《文集》（1758年及以后几年）。可惜的是，穆勒虽然很认真地整理这些材料，而且他的材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首先不得不承认他缺乏批判精神，对一切材料都平等地接受，而且他也忽略了注明材料的详细出处。

这后一个缺点可以用宝贵的穆勒材料袋来补救，这个材料袋里塞满了西伯利亚的档案，这些档案后来被圣彼得堡的科学院和莫斯科的外交部档案处分掉了。其中一部分由考古学会出版（《史料》和它的《补遗》、《西伯利亚史料》等），但多余的部分数量仍是巨大的。

纳维尔：《关于莫斯科公国的有趣和新的记述，包括这个帝国的现状；莫斯科公国1689年派商队至克里米亚；最近几次革命的原因；莫斯科人的习俗和宗教；斯巴塔罗斯由陆路至中国的旅行记。》，巴黎，1698年，12开本，页数10页未编号+231页+目录；海牙，1699年，12开本，页数10页未编号+231页+目录。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65条。

诺维可夫：《俄国古代文章》，圣彼得堡，1773—1775年，8开本，10卷；第2版，莫斯科，1788—1791年，8开本，20卷。

这本书包括：《奉沙皇和大公约翰·阿历赛叶维奇及彼得·阿历赛叶维奇陛下谕

旨,于1692年3月14日领使臣衔自莫斯科出使中国之伊兹勃兰德先生旅行记述),见第8卷(第2版)、第360—475页及第9卷、第287—461页。

奥格洛勃利:《格拉尔德·穆勒和他处理第一手材料的态度。关于史料编纂官穆勒的问题。》载:《书志学杂志》,1889年、第1—9号。

奥格洛勃利先生劝读者对穆勒采取极度不信任态度,参阅作者下述著作,第1卷、第10页。

同上作者:《西伯利亚部之“散页”和书籍概述》,莫斯科、1895—1901年、4开本、4卷:第1卷:《行政长官公署公文》,1895年、页数421页+VIII页;——第2卷:《海关管理局公文》,1897年、162页;——第3卷:《有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之公文》,1900年页数III+394页;——第4卷:《中央政府公文》,1901年、287页。

☆《保藏在最高宗教会议档案处之公文及事件概述》,圣彼得堡、1868—1901年、8开本、26卷。

本文集的各卷并不按照年份先后排列(第1卷、1868年;第2卷、1878—1879年;第3卷、1878年;第4卷、1880年;第5卷、1897年;第6卷、1883年;第7卷、1885年;第8卷、1891年……)。文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公文作详细的分析,另一部分是转载那些最具有重要性的公文。集内有一张按字母排列的索引,可是并没有按年月排列的目录。

与本书有关的各卷是:第1卷(1542—1721),1868年版,页数4页未编号+776+CCCLXXVI+75+5页;第2卷,第1部分(1722),1879年版,页数6页未编号+VII+1190+DC+133页;第3卷(1723),1878年版,页数4页未编号+668+CDLXII+86+4+IV页;第10卷(1730),1901年版,页数VIII+1378+90页。

帕拉斯:《新北方自然地理学、民族学、自然史及经济论文集》,圣彼得堡及来比锡,1781—1796年、8开本、7卷。

在第2卷、第7章、第83—159页内有:“1727年和1728年在使臣朗克率领下的经由Kjachta至北京的一次商队旅行的日记”(德文),附注“从俄文意译”。俄文原本事实上的确比较完整和比较详尽。

参阅第2卷第8章第160—207页,《1736年在参议朗克和粗鲁海图的委员费尔索夫的带领下,经由蒙古前往北京的一次商队旅行的日记》(德文)。

同上作者:《俄国各省旅行记》(德文),圣彼得堡,1771—1776,4开本、3卷。

俄文译本由图曼斯基与祖叶夫译,1773—1783年、4开本、3卷;第2版、1786—1809年。

法文译本由戈蒂埃·德·拉·佩罗尼译,巴黎、1788—1793年、4开本、5卷、附地图。

摘要刊登在：《若干有学识的旅行家的发现史》，伯尔尼与海牙，1779—1787年，8开本，6卷，第5、6卷。

同上作者：《有关蒙古民族之历史文集》（德文），圣彼得堡，1776—1801年，4开本，2卷。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472及2760条。

《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料》，圣彼得堡，1882—1885年，8开本，2卷：第1卷1700—1713年，页数XXXII+551+XXXIV页索引，一张是人名索引，一张是地理名称索引；第2卷，1713—1724年，页数XXIV+541+XLII（两张索引）+1页未编号。

由考古学会编辑，由学会通讯员佐斯特先生出资印行，由蒂莫费叶夫先生主持，这些《史料》实际上是穆勒所搜集的西伯利亚档案的抄本，这些档案放置在属于皇家科学院的穆勒材料袋中。

派克（即贝日高）：《康熙、雍正与乾隆的出征》，载《中国评论》1887—1888年，第16卷，第105—118页。

同上作者：《中国与俄国。罗曼诺夫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最早的关系》，载：《帝国亚洲评论季刊》1896年7月号，第12—22页。

同上作者：《中国，从最早期到现在的历史、外交与商业》，伦敦，1901年，页数XX+322+地图。

同上作者：《满洲与蒙古之关系》，载《中国评论》，1887年，第15卷，第319—328页。

同上作者：《满洲与俄国之关系》，载同上，1887—1888年，第16卷，第41—46页。

同上作者：《满洲与西藏之关系》，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21卷，N. S. 1886年，第289—304页。

同上作者：《俄国的势力范围，或满洲一千年》，载《帝国亚洲评论季刊》，第3集，第9卷，1900年4月，第287—313页。

同上作者：《俄国人与满洲》，载《中国评论》，第23卷，第3号，第143—153页。

参阅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章、第2745条。

波蒂埃：《关于外国派驻中国使团的中国官方文件》，译自中文。巴黎，1843年，8开本，24页。

第8—12页是有关俄国使团的文件。仅仅列出俄国使团的人名，不完全（没有提到尼果赖）。第16—24页上有一道皇帝御旨的译文。

佩里(约翰队长):《当今沙皇治下的俄国,他所完成的伟大业绩,他的海軍准备工作,他的陆軍正规化,他的民間改革,附有沙皇俄罗斯帝国的新地图,由约翰·佩里队长更正和校订,地理学者赫尔曼·莫尔著》,伦敦舰队街的图克(Tooke)版,1716年8开本。

同上作者:《大俄罗斯之现状。包括女沙皇陛下在国内所完成之伟业,以及俄国人、蒙古人和其他邻近民族的宗教、习俗的描述。》佩里队长著,译自英文。海牙亨利·杜绍泽特出版,1717年,12开本、8页未编号+271页+12页未编号+地图。

费拉雷特(大主教):《俄国教会史》,莫斯科与里加,1847年,8开本;莫斯科,1857—1859年,8开本,3卷。

德文译本译者布卢门塔尔:《俄国教会史》,法兰克福,1872年,8开本,2卷。

皮科:《尼果赖,沙皇阿历克西斯·米哈洛维奇派驻中国的大使》,载《东方杂录》,巴黎,1883年,8开本,第433—492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章,第2465—2466条。

波兹尼叶夫:《蒙古与蒙古人》,圣彼得堡,1896—1898年,8开本,2卷;第1卷,1896年XXX+696页;第2卷,1898年XXIX+517页。

1892年(第1卷)及1893年(第2卷)出使蒙古的日记。关于库伦的呼图克图,对每个人都有离题的冗长的历史叙述;正文里有无数未经注解的蒙古语。但这本书无论从地理观点或者历史观点来看,都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著作。

同上作者:《额尔德尼·额尔罕(Erdéniin Erikhé),蒙古编年史,原文附译文及解释,包括蒙古喀尔喀自1636—1736年的历史资料》,圣彼得堡,1883年,8开本,XXXVIII页+421页+全页插图。

波列伏依:《俄国图书馆或民族史、地理、统计以及俄国古文学材料汇编》,莫斯科,1833年,8开本,414页+XIII页。

在作者于1834年8月30日/9月11日在莫斯科所加“说明性注解”中,作者肯定说他所刊登的尼布楚档案片断是由该城一个居民交付给他的,该城藏有雅克萨城的残余文件,见第407—414页。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1集,1649年—1825年12月12/24日》,圣彼得堡,4开本,40卷,6卷目录。

与本书有关的各卷是:第3卷,1689—1699年;第4卷,1700—1712年;第5卷,1713—1719年;第6卷,1720—1722年;第7卷,1723—1727年;第8卷,1728—1732年。

☆《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律令汇编》，圣彼得堡，1872—1905年，4开本、9卷：第1卷、1721年，1879年版、448页；第2卷、1722年，1872年版、685+73页；第3卷、1723年，1875年版、260页；第4卷、1724—1725年1月28日/2月8日，1876年版、365页；第5卷、1725年1月28日/2月8日至1727年5月5/16日，1881年版、605页；第6卷、1727年5月8/19日至1730年1月16/27日，1889年版、442+14页；第7卷、1730年1月19/30日至1732年12月23日/1733年1月3日，1890年版、654+5+15+56页；第8卷、1733—1734年，1898年版、367+24页；第9卷、1735—1737年，1905年版、628页。

这本文集包括一张按年份排列的、有系统的图表，由楚沃洛夫编制，可惜里面没有专有名词索引。文集里一方面有对最高宗教会议文件的分析，另一方面附有最重要文件的正本。

波塔南：《西伯利亚历史资料》，载《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与古代史学会阅读材料》，1867年、第1—2分册、第1—324页。

同上作者：《十七世纪中叶托木斯克之进口与出口》，载《俄罗斯地理学会会刊》、第27卷、1859年、第12分册、第125—144页，以及单行本。

作者引用了1652和1653年该城关税帐目摘要。

同上作者：《十八世纪准噶尔之不花刺商队》，载《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与古代史学会读本》，1868年、第2分册，以及单行本、8开本、93页。

《莫斯科帝国的现状，到1699年为止。由两封信叙述：第1封发自一个与莫斯科帝国驻荷兰大使有交情的绅士；第2封发自一个在维也纳有地位的人士，内容是有关过去的莫斯科大使馆、现在的沙皇陛下；俄罗斯帝国与蒙古。附传教士布韦神父所写：中国当今皇帝的传》。由《莫斯科公国之过去与现在》的作者撰写。伦敦，……，1699年。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卷、第634—635条。

图曼斯基译成俄文(见后)。

普雷沃斯特(修道院长)：《旅行通史或到目前为止所有国家用各种语言发表之陆路及海路旅行记新编》，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1746—1779年、4开本、20卷；巴黎、1746—1779年、12开本、80卷；海牙、1747—1780年、4开本、25卷。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3卷、第1947—1948条。

与本书有关之各卷是(巴黎版、12开本、80卷)：第20卷、1749年，俄国驻华大使伊兹勃兰德旅行记，第245—288页；俄国驻华(1717年)使臣郎克旅行记，第228—314页；还有第25卷(蒙古)、第27、29卷转载荷尔德所写的张诚神父旅行记。

普西约：《莫斯科外交部主要档案馆内有关西伯利亚之文件及手稿索引》，莫斯科，1879年，8开本，III+123页。

同上作者(?)：《莫斯科外交部主要档案馆书库所藏地理图、地图、战争地图和战地形势图总目录，1816年编制，1828年订正，1877年增补》，载：《地理学会新闻》第13卷，1877年《补遗》，以及单行本，圣彼得堡，1877年，8开本，83页。

雷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黑龙江的发现、征服和殖民，包括对地区、居民、出产和通商可能性的概述，以及俄国旅行者的私人报道》，伦敦，1861年，8开本，页数XX+467+3张地图。

尤其要参阅第1部《历史》，第7—9章(与中国1683—1688年的战争；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以后直至1848年为止的黑龙江)。

书中引用的材料是(第431—434页)：穆勒的《月报》和《文集》，菲舍尔的《西伯利亚史》，波利伏依的《莫斯科的电信局和俄国图书馆》(俄文)，莫斯科，1833年版，引用的期刊是：斯帕斯基伊的《西伯利亚信使》，1824年；《祖国的儿子》，1840、1848年；《帝国军事学校学员日报》，1840—1849年，来源是伊尔库次克和尼布楚的档案；《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新闻》1853年，最后是《史料》；还有韦特森、荷尔德、伊兹勃兰德、布兰德、郎克、贝尔等人的古典著作。

参阅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450—2451条。

《北方游记集，包括各种对商业和航海十分有用的报告》，阿姆斯特丹，让·弗雷德里克·贝尔纳书店，1715—1738年，12开本，10卷。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3卷，第1946条。

与本书有关的各卷是：第5卷《郎克使华日记(1715—1717)》，第371—410页；第8卷1727年，《莫斯科大使伊兹勃兰德从莫斯科至中国旅行记，译自荷兰文》，第1—217页；《郎克先生日记，包括他于1721、1722年在中国宫廷谈判的经过，附有批注》，第221—371页。

《蒙古概述，根据俄国与瑞典战争中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瑞典战俘的原始报告编写》，阿姆斯特丹、让·弗雷德里克·贝尔纳书店，1737年版，12开本，301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715条。

拉米扎：《亚洲杂录或关于东方国家的宗教、科学、习俗、历史和地理的评述性文章和报告选录》，阿贝尔—拉米扎著。巴黎，1825—1826年，8开本，2卷；第1卷，1825年，页数VIII+456页；第2卷，1826年，页数III+428页。

参阅第1卷，第25章，第413—420页；《关于中国使团在蒙古》；转载自《学者杂志》，巴黎，1821年5月，4开本，第259—269页。

拉米扎：《亚洲杂录或关于东方国家的宗教、科学、习俗、历史和地理的

审评性文章和报告集》，阿贝尔—拉米扎著，巴黎，1829年，8开本，2卷：第1卷、IV+446页；第2卷、428页。

参阅第2卷，第21—44页；《圣祖(康熙)，清朝的皇帝》。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卷，第68—69条。

罗曼诺夫：《黑龙江归并俄罗斯》，载：《俄罗斯言论》1859年，第4、6—8期，第179—200页；第329—388页；第93—136页；第107—171页。

梅若夫，第2卷，第6932号。

罗索金，参阅穆勒《月报》1764年。

萨比尔：《黑龙江，它的历史、地理、民族》，巴黎1861年，4开本，页数VI+2页未编号+160页+1幅地图和16张全页插图。

虽然引用了一些俄文资料(如《史料》和《补遗》)，但书中所断言的东西全都需要加以严格的核对，而且这本书并不表现出有批判精神。

萨瓦齐耶甫：《一个东正教会主教出使中国的不幸遭遇》，载：《国家》，1873年，第3卷，第185—209页，单行本，圣彼得堡1874年8开本25页。

同上作者：《沙皇遗物概述：衣服、武器、甲冑、马具等，根据莫斯科武备殿档案手稿描述，附有解说索引》，圣彼得堡，1865年，8开本，转载在《考古学会札记》，新丛书，第9卷，1896年，第1、2分册。

萨马林：《耶稣会士及其与俄国之关系》，莫斯科，1866年，8开本；第3版，1870年，12开本，510页。

法译本由布图尔兰译，1867年8开本344页。

一本关于宗教争论的书。

《1689—1881年俄中条约汇编》，外交部印行；圣彼得堡，1889年，4开本，页数2页未编号+270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455条。

1689年8月27日/9月6日尼布楚条约，俄文及拉丁文本，第1—6页，满文本，第7—10页；1727年8月20/31日波尔条约，俄文及拉丁文本，第11—14页，满文本，第15—18页，蒙文本，第19—22页，交给中国人的蒙文译本，第23—26页；1727年10月12/23日交换信件或从恰克图至额尔古纳河之国境界碑表，俄文本，第27—32页，蒙文本，第33—40页；1727年10月27日/11月7日交换信件或从恰克图至珲台吉之帝国的国境界碑表，俄文本，第41—43页，满文本，第44—46页，蒙文本，第47—49页；1727年10月21日/11月1日恰克图条约，1728年6月14/25日交换，俄文与拉丁文本，第50—60页，满文本，第61—73页，由中国人交来的俄文与拉丁文本，第74—83页。

《关于西伯利亚与边境地区历史、统计资料集》，圣彼得堡，1875—1876

年,4开本,2卷。

谢勒:《俄国商业论证史》,让一贝努瓦·谢勒著。巴黎,1788年,8开本,2卷;第1卷,页数XII+293页;第2卷,页数VI+259页。

瑟迈诺夫:《自十七世纪中叶至1858年俄国外贸与工业史料之研究》,圣彼得堡,1859年,8开本,3卷。

同上作者:《写过关于俄国著作的外国人的丛书》,圣彼得堡,第1卷,1836年,8开本。

《西伯利亚各城市。尼布楚、色楞格斯克、雅库次克十七和十八世纪史料》,莫斯科,1886年,4开本。

斯卡齐科夫:《雅克萨俘虏在北京》,载《季马的艺术之页》,1859年第2号。

斯卡齐科夫(康斯坦丁),1821—1883年,1848年被派赴北京东正教会建筑一个天文台,在该地住了十年,1857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的译员,后于1858—1863年被派为驻丘古恰克的领事,重新回到部里当随员并在圣彼得堡大学任瓦西里叶夫教授的中文助手,1866年,1867年他任驻天津领事,1875年任驻上海总领事,于1876年离开北京。他将搜集的汉文和清文书籍赠给莫斯科鲁米扬佐夫博物馆,其中有两本极有价值的中文版图理琛的旅行记,各附有一幅地图(参阅加恩的《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地图》,载《科学使命的新档案,新丛书,第1分册》,巴黎,1910年,8开本)。

斯洛夫措夫:《西伯利亚简史》,莫斯科,1838—1844年,8开本,2卷;第1卷,1585—1742年,XXX+589+III页;第2卷1742—1823年。

这是一本认真而且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书,可惜材料来源没有指明。

☆《外交部保存之官方信件及条约汇编》,莫斯科,1813—1894年,4开本5卷。

苏西埃:《对中国古籍内数学、天文、地理、年代学及自然等问题的研究,或最近在印度及中国所进行研究》,由耶稣会神父合著,主编及出版者是耶稣会的苏西埃神父。国王批准,版权所有。巴黎,1729—1732年,4开本,2卷;第1卷,6页未编号+XXV+6页未编号+294+2页未编号;第2卷,XXIX+373页+3页全页插图。

参阅第1卷,第148—175页;《中国人的叙述,附从北京到托波尔、从托波尔到土尔惠特地区的一条路线》,由戈比尔神父译,并于1726年送给耶稣会教士苏西埃神父。

这是图理琛的著作的摘译,图理琛是1712—1715年中国派至下伏尔加土尔惠特汗阿玉气处的使臣之一。

斯帕斯基伊:《俄国与中国西部的商务关系》,莫斯科,1856年,8开本。

同上作者:《关于西伯利亚之历史、地形以及其他情报汇编》,圣彼得堡,1820—1822年,8开本,1卷。

同上作者主编:《西伯利亚信使》,圣彼得堡,1818—1825年,《亚洲信

使》，1825—1827年，8开本。

尼果赖：《尼果赖使团。中国人叙述尼果赖使团在中国。原文是满文，由伊凡诺夫斯基译成俄文，由瑟尔库写前记》。载：《考古学会东方组札记》第2卷，1887年，第81—124页；第3卷，1888年，第183—196页；单行本，1889年圣彼得堡，8开本。

同上作者：《俄国使臣尼果赖1675年从托波尔斯克经尼布楚至中国边境旅行记。尼果赖的途中日记，由阿尔塞纳夫作序并注》，载《地理学会民族组札记》第10卷，第1分册，圣彼得堡，1882年，8开本，页数214+2页未编号+地图。

司当东译：《异域录》，附有其他拉杂译文。伦敦，1821年，8开本，页数XL+330+1张地图。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卷，637条

施托伦韦克：《俄国征服西伯利亚时期，定居在西伯利亚及其附近地区的主要民族之历史研究》，译自俄文，译者施托伦韦克是为俄国人服务的旧火铳队军官。巴黎，拉郎印刷公司出版，8开本，XXIV+295页+2页。

施特拉伦堡：《欧亚两洲东北部历史、地理概述》，包括俄国、西伯利亚和蒙古在内；对新旧时代作历史地理的叙述，附许多未发表过的情况，并附有三十二个蒙古族方言的全新的多国语言对照表，以及喀尔木克语的词汇表，特附上述各国的精确大地图一幅和其他铜版画，涉及亚洲与东北欧的古代；由菲利浦·约翰·冯·施特伦堡在俄国被俘禁期间，被允准在俄国广泛旅行时亲自仔细访察和搜集、整理而成。（德文），施特拉伦堡著，斯德哥尔摩，1730年，4开本，24页未编号+438页+16页未编号+21页全页插图。

同上作者，同上书忠实英译本，伦敦，英尼斯出版，1738年4开本IX+463页。

《俄罗斯帝国历史概述》，译自德文施特拉伦堡男爵原著，译者巴尔博·德·拉·布吕耶尔。阿姆斯特丹，1757年，12开本，2卷；第1卷，XX+383页；第2卷，XI+406页。

参阅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713—2714条。

《俄罗斯帝国的特殊的和一般的新地理叙述。附喀尔木克人和蒙古人两主要民族的词汇和文法》（西班牙文），由唐·若斯译自法文，Vit Tomás y Català，瓦伦西亚，1780年4开本2卷。

梅若夫，第2卷第12473—12476号。

《欧亚两洲东北部历史、地理概述》，圣彼得堡，1797年，8开本。

瑞典人塔贝特，后来改名为冯·施特拉伦堡（1676—1747），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俘，被送至西伯利亚，在那里住了十三年，获得在西伯利亚到处走动的权利。他主要居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想编制一幅西伯利亚地图，要比1687年韦特森编制的更好。他的著作只用来解释他的地图，第一部分（导言，第1—156页）实际上就起这个作用。可是第二部分（第159—438页）却离题而包括一段真正的西伯利亚历史和地理，以及理论等等。第13章和最后一章是一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辞典；这部作品没有目录。

施特拉伦堡论述蒙古引用的材料是：《奥居斯—尚（？）蒙古史》；《小不花刺概述》（《中国、蒙古和西藏新地图》，当维勒著，海牙，1737年版，第5—12页中有一段《不花刺概述，由一个在这地区居住过一些日子的瑞典军官报道》，也许施特拉伦堡利用的就是这本小册子。在1737年阿姆斯特丹又出版了一本《蒙古概述，根据囚禁在西伯利亚的瑞典战俘的原始报告编写》，参阅上面）；——《土尔扈特区旅行报道》（毫无疑问这就是图理琛所写的书，这本书的摘要被戈比尔神父译出，1729年登载在苏西埃神父的《对中国……研究》一书内）；——《俄国远征（巴赫尔慈的）额尔齐斯河上游日记（参阅本书的第6章）》；——最后还有一本是俄罗斯欧洲及亚洲部分导游概述。

施特拉伦堡除了对于当地有直接知识外，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还有一种对字源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民族学的奇异的兴趣；他读过很多书，他的情报是详尽的，一般说来是正确的和有用的。

梅若夫在他的第2卷、第12471、12472号中还引用过他的《一本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王国的待付印著作的预告》（德文），斯德哥尔摩，1726年4开本、和《俄国旅行史》，来比锡，4开本。

斯特罗叶夫：《1698—1700年西伯利亚统计与财政图表》，载波列伏依主编之《莫斯科电信》1825—1826年、第21号、第45—57页、第22号、第139—150页。

斯帕斯基对这篇著作的批注，载《亚洲信使》1826年、第2分册、第126—132页。

梅若夫、第2卷、第15168—15169号。

斯特吕斯：《让·斯特吕斯在俄国、蒙古、波斯、印度及其他几个外国的旅行记》，阿姆斯特丹，1681年、4开本、10页未编号+360+14+80+全页插图及地图（从1676年起用荷兰文印行）。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3卷、第2083—2084号。

苏洛茨基：《托波尔斯克和西伯利亚的大主教非洛太伊·列辛斯基》，载《莫斯科俄国历史及古代史学会临时刊》，1854年、第20卷、第1—56页。

一篇好作品，很精确。

《祖国的儿子》，1812—1852年，8开本；参阅1847年，第7号（有关斯皮瑞东·郎古索夫）。

瑟切夫斯基：《关于中国边界的历史报告，1846年由瑟切夫斯基撰写》，载

于《莫斯科大学俄国历史及古代史学会会刊》，1875年，第2卷，1—292页+III页。

没有明确的参考资料；毫无批判精神，有严重错误。

《北方档案》，1822—1828年，8开本。

这个刊物从1820—1835年与《祖国的儿子》杂志合并。参阅1822年，第3部分，第329—356页，413—418页，以及第4部分，第28—46页，第85—114页，第191—199页，第265—282页，第344—364页（有关郎克），1826年，第19部分，第109—139页以及第221—251页（关于西伯利亚编年史）。

捷列辛科：《试论俄国曾经主持外交事务之高级官吏的生活》，圣彼得堡，1837年，8开本，1卷，页数IV+283+4页未编号+348+1页插图+221页。

季托夫：《十七世纪之西伯利亚》，主编人为尤金。莫斯科，1890年，8开本，1卷。

《基辅神学院工作报告》，1864—1895年，8开本（每年3至4卷）。

参阅1860年，第3卷，第112—172页以及第4卷，第265—366页，《基督教在中国之宣传史略》，尤其应参阅标题为《俄国教会在北京》那章（第4卷，第296—314页）。这本书标明的参考资料是：穆勒的《月报》1735（1755）和1764年，收藏在伊尔库次克主升天修道院的《伊尔库次克编年史》；昂布鲁瓦兹的著作，参阅前面；斯帕斯基的《西伯利亚信使》，1822年；费拉雷特的著作，参阅前面，无数印刷错误是本书的美中不足，例如第4卷，第304页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Владиславичь 等等。

《俄国在北京教会成员的工作》，圣彼得堡，1852—1866年，8开本，4卷。

特鲁谢维奇：《俄中到十九世纪为止之外交与商务关系》，莫斯科，1882年，8开本，304页+2页未编号。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454—2455条。

这篇文章是莫斯科法学院的学士毕业论文。虽然研究过莫斯科外交部的档案，以及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有关著作，但是这篇文章所肯定的事实和作出的结论都似乎过早了点；在有关商业部分，没有参考过收藏在莫斯科司法部的西伯利亚部的档案；对于外交部的档案则毫不批判地全部接受。关于外交部档案的引用是非常含糊的（没有指出号数、年份等等）。最后，商务关系与外交关系两者的联系，两者间的因果与互赖关系，本书似乎并未掌握。

图曼斯基：《可以用来对彼得大帝的一生和功业构成一份完整报告的各种备忘录和著作汇编》，由西奥多尔·图曼斯基编辑并出资印刷。圣彼得堡，1787—1788年，8开本，15卷。

材料正文似乎是正确的，可是材料来源均没有注明出处。作者在《前记》中说，他没有引用他参考过的几百本俄国和外国的书籍和手稿，因为这样做太冗长上；他也没有提请读者参阅这些资料，因为这样做太不方便了。

在第1卷、第1部分中,有布韦神父的一篇译文:《俄国的现状……》;在同卷、第2部分、第74页以下是关于伊兹勃兰德的报道。

温阔甫斯基:《炮兵上尉伊凡·温阔甫斯基出使至准噶尔汗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朝廷,以及他的1722—1724年的途中日记》。文件由韦塞洛夫斯基编辑、撰写前言及批注,载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人种分组札记》第10卷、第2分册、1887年版,单行本、圣彼得堡、1887年、8开本,页数2页未编号+XLVI+276+2页未编号+VII+地图。

默伦多夫的《中国书志学手册》第322页、第4367和4368号,把下述文章归入温阔甫斯基的著作:《喀尔木克的最近历史……》,载穆勒的《文集》第1卷、第123页以下(由吉尼厄译成法文:《匈奴史》第4卷、第102页以下);另一篇文章是《Berättelse om Ajuckiniska Calmuckiet……》,斯德哥尔摩、1744年版、8开本,由施尼策尔译成德文,载穆勒《文集》第4卷、第275—364页;《阿玉气喀尔木克人情况》(德文)。

翁弗尔察格特:《大俄罗斯皇帝陛下派往中国皇帝处的使节,1719年从圣彼得堡派往中国首都北京,在其叙述中提到了中国人、蒙古人和其他鞑靼民族的风俗习惯,并附几个铜版图。格奥尔格·约翰·翁弗尔察格特著,在吕贝克的约翰·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处出版》,1725年8开本,页数4页未编号+168页。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471条。

翁弗尔察格特随同伊兹玛依洛夫使团到北京。他成为郎克的随员之一,而且随同订购的毡毯回来(第126页和第132—133页)。

他的书材料来源甚少,往往不准确,除了专有名词不断变动外,还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例如第135页,10月14日应为11月14日;第142页,5月7日应为6月7日;第146页,7月2日应为7月20日,等等。

瓦西利叶夫:《宁古塔回忆录》,载《地理学会札记》,第12卷、1857年、第79—109页。

这是从一本十八世纪初期的中国著作翻译过来的,原书名没有写出来。

魏牛高:《俄中两国新旧条约概要》,圣彼得堡、1861年、8开本,57页+目录。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449条。

这是一本非常欠缺科学性的小册子;材料来源丝毫未注明,错误百出(例如第5页,阿勃龄误为阿布龄;第9页桑古特,多斯图姆克一康,伊朗图,误为驻尼布楚的大使;第11页说图理琛是蒙古人;第12页说伊兹玛依洛夫的使命非常成功,由于耶稣会教士的挑拨,才使得伊兹玛依洛夫离开……等等,等等)。

同上作者:《俄中两国之新旧条约》,圣彼得堡、1863年、8开本、1页未编号+95页。

科尔迪埃,同上引。

韦塞洛夫斯基:《十七与十八世纪中亚细亚驻俄国大使之接待与遣返》,载《教育部部刊》1884年、第7号、单行本、圣彼得堡、1884年、8开本。

同上作者:《悼念斯卡齐科夫》,载同上刊物(1883年)、第98—103页。

维诺格拉多夫:《俄罗斯帝国教会及外交使团成员在北京城的科学与中文图书馆。附有书目、图表及插图》。圣彼得堡、1889年、8开本。

《莫斯科大学俄国历史及古代史学会临时刊》第1—24卷。莫斯科、1849—1856年、8开本。

这个学会的《会刊》每卷都没有目录。

同一学会的《读书杂志》的每一卷都有根据不同内容而特别编制页数的目录,例如《新发现》,俄国、斯拉夫与外国史料,其他等等,都另外编页数。

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喀山王国的回忆录》,译自德文。伯尔尼、1700年、8开本254页。

瓦格纳是“为普鲁士国王服务的邮政局长”,在七年战争中当了俘虏,自1759至1763年被关在“芒加海”(Mangasea)。虽然他提供的情况数量不多,但是他的报道完全没有官方性质,有时是很宝贵的。

韦伯:《变化了的俄国》论及政府与教会、陆军和海军、俄国的财政实况;已开办的矿山、引入的科学院、艺术、制造业、已发布的条例,与亚洲邻国及附庸的事务,并附这些民族的最新情况。沙皇太子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俄国其他值得注意的事情,以及其他迄今未被人知晓的消息,介绍写至1720为止的日记(Journal)中,有一准确的地图和铜版图。法兰克福,尼古劳斯·福斯特出版社(以上为德文),1721年、4开本,10页未编号+490页+地图;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在福斯特父子出版社,1738年、4开本、2卷。

韦伯:《对于大俄罗斯或莫斯科国现状的新回忆录,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和教会;沙皇的陆军和海军;沙皇的财政及其管理方法;沙皇用来教化他的人民和扩大他的国家的各种方法;他与东方各国君王所订的条约;他的宫廷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自1714年至1720年与已故沙皇皇子有关的事件。由一个在这个宫廷居住过的德国人撰写。附有对彼得堡和卡龙斯洛(Cranslot)的描述。郎克的赴华日记。奥斯第雅克人的风俗和习惯。沙皇太子阿历西斯·彼得罗维奇刑事案的宣布。附有根据最近观测绘制的俄国大地图》(法文,阿姆斯特丹、1725年、12开本、2卷;第1卷,XXIV+338(438)页+1张地图;第2卷、426页。巴黎、1725年版,国王批准版权所有,12开本、2卷。郎克的日记,在巴黎版、第2卷第89—144页。

关于韦伯，参阅前面第4章注解。

威尔斯·威廉斯：《中国，关于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等等概况。附中华帝国的新地图》，纽约与伦敦，1848年，12开本，2卷。

参阅第21章：《外国与中国的交往》。

关于这本书的连续几个版本，参阅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1章、第85—86条。

韦特森：《蒙古北部和东部》，阿姆斯特丹，1692年、对开本，页数10页未编号+600页+表格+地图；第2版，1705年；第3版，1785年，4开本，2卷。

阿德隆，第1卷、第19号；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3卷、第1945条。

关于韦特森，参阅加恩著：《十八世纪之西伯利亚地图》，载《科学使命的新档案》新刊第1分册、巴黎，1910年版，8开本。

怀利：《从圣彼得堡到北京之陆路旅行》，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新刊第1号，1864年。

伊兹勃兰德：《由莫斯科陆路至中国的三年旅行……》（荷兰文），阿姆斯特丹、法郎索瓦·哈尔玛版，1704年，4开本，243页+地图；第2版，1710年，4开本。

同上作者：《由莫斯科陆路至中国的三年旅行，经过大乌斯蒂加、锡里安尼亚、彼尔姆、西伯利亚、达斡尔、蒙古等地到达北京。包括对这些国家的领土与国界以及其未开化居民之习俗的精确而特殊的描述；并联系到他们的宗教、政府、婚姻、日常工作、衣着、住宅、饮食、死亡、葬礼等等。由俄国驻华大使伊兹勃兰德·义杰斯阁下撰写。附有这些国家的一幅大地图，由大使在旅行途中所绘制，还有许多有趣的插图。附录有关于中国的精确描写……》，在前驻英大使现任市长维特增主持下用荷兰文印行，现忠实地译成英文。伦敦，由弗里曼·沃索尔、纽巴勒、尼科尔森及派克印行（英文），1706年，4开本、页数10页未编号+210页+地图。

同上作者：《由莫斯科陆路前往中国的三年旅行……》（德文），译自荷兰文，法兰克福，在托马斯·弗里申处出版，1707年，8开本，466页+17页未编号+地图。

科尔迪埃辞典，第2版、第4卷、第2467—2470条；梅若夫，第2章、第12450、12455、12461号。

伊兹勃兰德的著作又译成法文，参阅：勒·勃伦：《北方旅行集》，译成德文，根据的是勒·勃伦的译文，见：戈登（阿历山大）：《彼得大帝史》，来比锡，

1765年、8开本第2卷、第337—368页；译成俄文，载：《俄国古代文库》，圣彼得堡、1773—1775年、8开本、10卷；第2版、莫斯科、1788—1791年、8开本、20卷，在莫斯科版、1789年、第8卷、第360—475页；译成捷克文（从略），布拉格，1800年、8开本。

梅若夫，第2卷、第12463号。

再请参阅：莱布尼兹、门采尔等人的著作；关于伊兹勃兰德的书目，参阅：贝克曼的《较早旅游记述文献》，哥廷根，1807—1810年、8开本、2卷，第2卷、第446—471页。

尤勒（上校爵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所著关于东方国家和奇异物物的书，由上校亨利·尤勒爵士翻译、编辑并加注……》，第3版，根据亨利·科尔迪埃的新发现全部校订过。伦敦、1903年、8开本、2卷；第1卷，页数：CII+462页，图片与地图；第2卷：XXII+662页。

《莫斯科大学俄国历史与古代史学会阅读材料》，第1—179卷，莫斯科、1845—1846年，由比耶洛库罗夫编索引。

丘尔科夫：《俄国商业的历史概况，在所有港口及所有边境，从最古时起直到今日，以及彼得大帝与当今女皇喀德邻一世所颁布的有关商业的主要法律概述》，圣彼得堡科学院版、莫斯科、1781—1788年、4开本、7卷。

参阅第3卷，莫斯科1785年版，第739页有关对华贸易部分。

同上作者：《俄国商业简史》，莫斯科、1788年、4开本。

舒马赫尔：《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载《俄国档案》、1879年、第6号、第144—183页。

谢格洛夫：《创建叶尼塞斯克的那一年》，载《西伯利亚》，1879年、第2号。

同上作者：《1032—1882年西伯利亚历史最重要的资料编年表》，由地理学会西伯利亚东部分组编辑。伊尔库次克、1884年、8开本、778页。

只不过是一份按年编排的概要，其中大部分是十九世纪的。

休金：《十七世纪俄国在黑龙江的开拓》，载《祖国的儿子》，1848年、第5卷、第9分册、第1—52页。

同上作者：《黑龙江史》，载《圣彼得堡报道》，1856年、第19、21、26、30号。

尤泽福维奇：《俄国与东方之政治及商务条约》，圣彼得堡、1869年、8开本、XXII+294页。

尼布楚条约、第231及234页；波尔条约、第237页；恰克图条约、第239—247页。

一般说来，条约正文与《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所载者相同，只有几处经过改正。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本译文与班蒂什的译文不同。

雅德林采夫：《西伯利亚集》，圣彼得堡、1886年、8开本。

译名对照表

A

Abakan 阿巴干
 Abdula 阿布都拉
 Ablin, Setkoul 阿勃龄
 Adelong, Frédéric Von 阿德隆
 Adoratskii 阿多拉斯基
 Ah Erh-ni 阿尔尼
 Albasin 雅克萨(阿尔巴津)
 Altyn Khan 阿尔提汗
 Ambroise 昂布鲁瓦兹
 Amiot 阿米奥
 Andréff, Ivan (John Andrew)
 安德烈夫, 伊凡(约翰·安德鲁)
 Andriévitch 安德烈维奇
 Angara 安加拉河
 Apraxin 阿帕拉克辛伯爵
 Araptchur 阿拉布珠儿
 Archangel 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昌吉)
 Areskin 阿利斯金
 Argun 额尔古纳河
 Arsénev / 阿尔塞纳夫
 Asankhoja 阿桑科雅
 Astley 阿斯特利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Atcharoi 阿洽费僧汗
 Avril 阿夫瑞尔神父
 Ayuki 阿玉气(或阿玉奇)

B

Babarikin 巴巴里欣
 Baiborodin, Nicétas 巴伊包罗廷, 尼

谢塔斯

Baikoff 巴伊阔夫
 Bakan 巴肯
 Balneff, Théodore 巴尔聂夫, 西奥多尔
 Bantych-Kamenskii 班蒂什-卡姆斯基
 Barnabas 巴纳巴斯神父
 Baraba 巴拉巴人
 Baranov 巴拉诺夫
 Basil 巴西尔
 Baskakoff 巴斯卡科夫
 Basnin 巴斯南
 Batur 巴图尔珲台吉
 Beauvillier 薄贤士神父
 Beckmann 贝克曼
 Beiton 拜顿
 Bell, John 贝尔, 约翰
 Belobotskii, André 贝洛波茨基, 安德列
 Bering 白令
 Bezryadoff, Spiridon 别兹瑞阿道夫, 斯皮瑞东
 Bialobotskii 比亚洛波切基
 Bibikoff 贝比科夫
 Bistra 比斯特拉河(黑龙江支流)
 Bitchurin 毕楚林
 Biya 比雅
 Blumenthal 布卢门塔尔
 Bobrovskii 波博洛夫斯基
 Bogdanoff, Martin 波格丹诺夫, 马丁
 Bogdy Khan 博克达汗(俄国对中国皇

帝的称呼)

Bokoff, Gregory Timothy 博科夫,
· 格利高瑞· 提莫西
Borisov, Ivan 波利索夫, 伊凡
Borokurgan 波罗柯尔干
Boutourlin 布图尔兰
Bourtsov 布尔特索夫
Bouvet 布韦神父
Boyer 博耶
Brand, Adam 布兰德, 亚当
Bretchneider 布雷特施奈德
Briansk 布里昂斯克
Brockhaus-Efron 布罗克豪斯-埃弗
· 龙
Buchholz 巴赫尔慈上校
Bukhariots 不花刺人
Bulesotu 布里索图
Bura 波尔河
Buriats 布利亚特蒙古人
Byélokourov 比耶洛库罗夫
Bykoff, Ivan 布科夫, 伊凡

C

Campredon 康普里顿
Carwin, Thomas 哈尔文, 托马斯
Cataneus, P. Lazarus 郭居静神父
Catherine I 喀德邻一世
Chakdur-tchap 沙克度尔札布
Chaklovitii, Theodore Leontevitch
· 沙克洛维奇, 西奥多尔· 列昂捷维奇
Chaomoto 昭莫多
Chatiloff, Basil 恰提洛夫, 巴西尔
Chestakoff, Isidor 切斯塔科夫, 伊西
· 多尔
Chestopoloff 切斯托波罗夫
Chétnev 谢特聂夫
Chikhireff 启基列夫
Chilka 石勒喀河
Chkader 什卡德大尉
Chorin, Michael 葛林, 米契尔

Choumakher 舒马赫尔
Chtchéglou 谢格洛夫
Chtchenikov, Jacob 谢特尼可夫, 雅
· 可夫
Chtcherbatov 什切巴托夫
Chtchétinin 谢蒂尼宁
Chtchoukin 休金
Chukur 书库尔岱青
Chulgin, Gerasime 楚尔金, 吉拉西姆
Cordier 科尔迪埃
Couplet 库普来
Couvreur 库弗雷
Coxe 科克斯

D

Daba 大坝河
D'Anville 当维尔
Daour 达翰尔
Daoures 达乌雷斯
Darja 达尔加
Darya 大利雅
Dauri 达乌里亚
Derbent 德本特
Dharma-bala 达尔马巴拉
Dolgoroukoff 多尔葛卢科夫
Dordji 多尔济拉布坦
Dourbêtes 杜尔贝特人
Dudgeon 达吉恩
Du Halde 迪· 荷尔德
Dyakonoff, Joseph 狄阿科诺夫, 约瑟
· 夫
Dzoungare 准葛尔

E

Edomskoi 伊多姆斯克依
Elegusa 额连固萨河
Eleuths 厄鲁特人
Emil 叶密里河
Epantchin 雅班沁
Erdenitsza 额尔德尼昭

Eristov 埃里斯托夫
“Eskel” “艾斯凯尔”
Essemun 额森
Etiger 艾蒂格尔
Evdokim 依夫多金
Everard 埃韦拉德
Evréinov 埃弗雷伊诺夫

F

Falk 法尔克
Favoroff, Ivan 法俄罗斯瓦, 宜香
Fefiloff, Stephan 费菲洛夫, 斯捷潘
Fei Yang-Kou 费扬古
Filateff 费拉切夫
Filimon 非里蒙
Filimonoff 费力蒙诺夫
Filipof 费力波夫
Firsoff, Grégoire 费尔索夫, 格里高瑞
Fisher 菲舍尔
Florinskii 弗洛兰斯基
Fomin 福明
Frandia 拂览弟亚

G

Galdán 噶尔丹
Gantimour 根忒木耳
Gargarin, Ivan Pétrovitch 噶噶林,
伊凡·彼得洛维奇
Gargarin, Prince Mathieu Pétrovitch
噶噶林亲王, 马蒂厄·彼得洛维奇
Gaubil 戈比尔神父
Gerasimov, Athanase 格拉西莫夫,
阿法纳西
Gerbillon 张诚神父
Gianpriamo 喜大教神父
Giles 贾尔斯
Glazunoff 格拉儒诺甫
Glazunoff, Ivan 格拉儒诺甫, 伊凡
Glukikh 格鲁基克

Glyebov, Bogdan Danilovitch 格鲁
埃波夫, 波格丹·丹尼洛维奇
Golikov 葛利可夫
Golitsyn 葛利青
Golovin, Theodore Alexivitch 柯罗
文, 费要多罗(一作费耀多罗, 亦作费
岳多罗)·阿列克塞维奇
Golovkin, Gobiél Ivanovitch 葛洛甫
金, 戈贝尔·伊凡诺维奇
Goodfellow, Charles 古德菲罗, 查理
Gorbitza 格尔必齐河
Gordon 戈登
Grave 格拉夫
Grimaldi 冈明我神父
Gruchetskoï 格鲁切特斯柯依
Guignes 吉尼厄
Gusoff, Jefim 顾索夫, 哲费姆
Gusyatnikoff, Michael 古谢特尼科
夫, 米契尔

H

Hami 哈密
Henning 亨宁
Hertrich, P. Christianus 恩理格神父
Hurst 赫斯特
Hutukhtu 呼图克图
Hyacinthe 伊雅森特

I

Ichanga 殷札纳
Ides, Isbrants 义杰斯, 伊兹勃兰德
Ifin, Basil 伊芬, 巴西尔
Ignatieff 伊格纳季耶夫
Imbault-Huart 安博一于阿尔
Ingermoland 英格莫兰德号
Ipat'ev 伊帕特也夫
Irkutsk 伊尔库次克
Irtish 额尔齐斯河
Isaef 伊萨也夫
“Iskel” “伊斯凯尔”

Isphahan 伊斯法罕
Istopnikoff 伊斯多甫尼科夫
Ivanov, Laurent 伊凡诺夫, 劳伦特
Ivanoff, Paul 伊凡诺夫, 保尔
Ivanovskii 伊凡诺夫斯基
Izmailoff 伊兹玛依洛夫

J

Jilin, Elias 基林, 伊利亚斯
Joachim 乔琪姆
Joloboff 卓罗伯夫

K

Kadacheff 卡达切夫
Kaïdanov 凯达诺夫
Kaigorod 凯格罗德
Kalgan 张家口
Kalmuks 喀尔木克人
Kamarovskoi 呼玛尔斯克
Kamchatka 堪察加
Karmarten 卡马尔顿
Karstens 卡尔斯坦
Katchanoff 卡昌诺福
Katun 卡东
Kégler 凯格莱神父
Kérulen 克鲁伦
Khabarov 哈巴罗甫
Khalkhas 喀尔喀
Khilok 昔洛克河
Khludeneff 克卢丹聂夫
Khochoutes 和硕特人
Khotokhotszin 和多和亲
Khoubilai 忽必烈
Kho-uriuk 和鄂尔勒克
Khristizii 克利斯谛齐
Khudyakoff 库迪阿科夫
Khurien-Belchir 基兰·布迟尔
Kibireff 基必列夫
Kircher 基歇尔
Kiryéev 基里叶夫

Kislyanskoi 基斯梁斯科伊
Klaproth 克拉普罗特
Klévanov 克拉瓦诺夫
Klynsoff, Nikanor 克林索夫, 尼卡诺尔
Klyoutchevskii 克柳切夫斯基
Knyaginkin 克尼阿琴金大尉
Kokonor 青海
Kolytchoff, Stephen 阔留赤甫, 斯捷潘
Kondakoff 康达科夫
Kondrat'ev, Nicéas 康达拉耶夫, 尼谢塔斯
Korgt 科尔特
Kornitskoi 库尔尼兹柯伊
Korovin 科洛文
Korsak 科尔萨克
Koshoits 和硕特
Kosso-gol 科赛郭勒
Kostomarov 科佐马洛夫
Kotchamarov 科察马罗夫
Kotochikhin 科托奇欣
Kouchélev 库夏勒夫
Kozlov, Kozma 科兹罗夫, 科兹马
Krasnoyarsk 克拉斯诺雅斯克
Krausse 克劳斯
Krenitsyn 克瑞尼琴
Krieger 克里格尔
Krouchali 克鲁夏利
Kulchitskii, Innocent 卡尔齐特斯基, 英诺森主教
Kulja 固尔札(即伊犁)
Kuznetsk 库兹涅茨克
Kyakhta 恰克图

L

Lanchtchakoff, Grégoire 兰赤查科夫, 格里高瑞(即吉里古里)
Lang, Laurent 郎克, 劳伦特
Lan-tan 郎坦

La-tsang 拉藏汗
Laurent 劳伦特
Le Brun 勒·勃伦
Le Comte 勒·孔特
Léchtchinskii 莱齐香斯基
Lefort 勒福尔
Leibnitz 莱布尼兹
Léjaiskii, Hilairy 赫拉尼翁
Léontieff 列昂捷夫
Leyde 莱顿
Likhareff, Ivan Mikhailovich 里哈
列夫, 伊凡·米哈伊洛维奇
Loginoff 洛吉诺夫
Longota 隆科多
Louchitsky 卢奇斯基
Lübetk 吕贝克
Ludolf 卢多尔夫
Lungkinu 隆庆
Lyalin 莱伊林
Lyangusoff, Spiridon 郎古索夫, 斯皮
瑞东
Lytkin 利特坎

M

Mailla 马依阿
Maikov 马伊科夫
Makchéev 马克切耶夫
Makofsky 马科夫斯基
Ma la 马喇
Mangoute 芒古特
Manutokhai 马奴托海
Marémyaninoff, Alexis 马瑞姆阿尼
诺, 阿列克西
Matsi 马齐
Mayers 迈耶斯
Méjov 梅若夫
Mélétii 梅莱蒂伊
Mentzel, Christian 门采尔, 克利斯丁
Mergen 墨尔根(嫩江)
Mikhailovitch, Alexis 米哈依洛维

奇, 阿列克西
Mikhailovitch, Ivan 米哈依洛维奇,
伊凡
Mikhaleff, Anisim 米哈列夫, 安尼西
姆
Milyoukov 米柳科夫
Misail 米萨尔
Moll 莫尔
Möllendorf 默伦多夫
Molokoff, Dmitri 莫洛柯夫, 狄米特
立
Montgomery 蒙哥马利
Muller 穆勒

N

Nagen 纳颜
Nalédin 纳莱丹
Narim 那里穆柏兴
Navitskii 纳维茨基
Néoustroev 内乌斯托洛夫
Nertchinsk 尼布楚
Nesteroff 聂斯切洛夫
Netchaevskii 聂恰耶夫斯基
Neuville 纳维尔
Névél'skoi 内弗尔斯夸
Nikolev 尼科勒夫
Ninguta 宁古塔
Nieuhof 尼厄阔夫
Nojneff 诺芝聂夫
Nonni (Tola) 诺尼河(即土拉河)
Novikov 诺维可夫

O

Ob' 鄂毕河
Ogloblin 奥格罗布林
Oirat 奥伊拉特
Okka 奥卡特
Ologoi 奥洛该
Omsk 鄂木斯克
Ongun 昂岗

Onkotes 翁可特人
 Orkhon 鄂尔浑河
 Osborne, Marquis de Carmanthen
 奥斯本, 卡尔马森侯爵
 Oskolkoff, Grégoire Athanasius 奥
 斯考尔考夫, 格里高瑞·阿撒拿西亚斯
 《《异域录》译作卧佛那斯夜非翅》
 Oskolkoff, Peter 奥斯考尔考夫, 彼得
 Ostyak 奥斯第雅克
 Oudinsk 乌丁斯克
 Oukraintsov 乌柯兰佐夫
 Ounkovskii 温阔甫斯基
 Ousolé 奥索列
 Oustkamenogorsk 奥斯特卡缅诺格尔
 Oustyong 乌斯蒂乌
 Oubaroff, Lyoubim 欧瓦罗夫, 莱奥比
 姆

P

Pachkov 帕什科夫
 Palace of Ambassadors 四夷馆
 Pallas 帕拉斯
 Pankrateff, Nikita 潘克拉切夫, 尼基
 塔
 Parker 派克
 Parrenim, P. Dominique 巴多明神父
 Pauthier 波蒂埃
 Pavloff 巴甫洛夫
 Pelym 佩林
 Pékarskii 佩卡尔斯基
 Péreyra, P. Thomas 徐日升神父
 Perfileff 伯夫列夫
 Perm 彼尔姆
 Perry 佩里
 Petplin, Evashko 宜完匹特灵
 Petchora 伯朝拉河
 Petroff 彼特罗甫
 Pétrovitch, Ivan 彼得洛维奇, 伊凡
 Rétrovitch, Mathieu 彼得洛维奇, 马
 蒂厄

Pétrouchko 彼得罗施科
 Peyronie, Gauthier de la 佩罗尼,
 戈蒂埃·德·拉
 Philarète 费拉雷特
 Picot 皮科
 Piolet 皮奥勒
 Pisareff 毕萨列夫
 Pivovaroff 皮沃瓦罗夫
 Platkovskii 布拉阔甫斯基
 Plotnikoff, Agapit Larinoff 波罗特,
 尼科夫, 阿格皮特·拉里诺夫
 Polévoi 波列伏依
 Poltava 波尔塔瓦
 Ponomareff 波诺马列夫
 Ponstoborodov 普斯托波罗多夫
 Poppa, Mathew 波柏, 马太
 Poppe, Mathieu 保别, 马蒂厄
 Poryetskoi 波利耶兹柯依
 Pospyélov 波斯比叶洛夫
 Potanin 波塔南
 Poutsillo 普西约
 Préobrajenskii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
 Prévost 普雷沃斯特
 Prokopeff 普罗科贝夫
 Pruth 普鲁特
 Pukhort 朴考特
 Puntchuk 棚楚克

R

Rafailov 拉法伊洛夫
 Ragusa 腊古札
 Rakitin 拉基丁
 Ratzel 拉策尔
 Ravenstein 雷文斯坦
 Rémézov 雷米佐夫
 Rémusal 拉米札
 Renat 勒纳
 Rimskii-Korsakoff 里姆斯基-科尔萨
 科夫
 Romanadovskii, Géorgévitch 罗曼纳

多夫斯基, 乔治维奇
 Romanadovskii, Theodore Grogèr-
 vich 罗曼纳多夫斯基, 西奥多尔·格
 里高瑞维奇
 Romanov 罗曼诺夫
 Romodanovskii 罗莫达诺夫斯基
 Rondnev 鲁德内夫
 Rossokhin, Hèlary 罗索金, 赫拉瑞
 Rummyantsoff 卢米昂佐夫
 Ryazan 梁赞
 Rybnoi 雷布诺耶
 Rykatchev 里加契夫

S

Sabir 萨比尔
 Saltan, Koulyonkov 萨穆坦, 库里尤科
 夫
 Saltykov 萨尔蒂科夫
 Samarin 萨马林
 Sap Sou 萨布素
 Savatyef, Ivan 萨瓦齐耶甫, 伊凡
 Savin, Jacob 撒文, 杰考伯
 Scherer 谢勒
 Schnitscher 施尼策尔
 Schwabe 施瓦贝
 Selenga 色楞格
 Selenginsk 色楞格斯克 (《异域录》译
 “楚库柏兴”)
 Semedus, P. Alvarius 鲁德照神父
 Semipalatinsk 塞米巴拉金斯克
 Séménov 瑟迈诺夫
 Semonovskii 西蒙诺夫斯基
 Sengé 僧格
 Monts Siansk 赛阳山脉
 Simtsku, Ivan 伊番萨费翅 (《异域录》
 的译法)
 Sining 西宁
 Sinyavin 西宁雅文
 Skatchkov 斯卡齐科夫
 Skobeltsyn 斯考贝尔琴

Skourikhin 斯库里琴
 Skrypitsyn, Theodore Isakvitch 斯克
 瑞皮琴, 西奥多尔·伊萨凯维奇
 Slovtsov 斯洛夫齐索夫
 Smyrna 士麦那 (即伊士密尔)
 Sofronoff 索福罗诺夫
 Soimonov 索伊莫诺夫
 Solikamsk 索里嘉木斯克
 Soloveff 索洛维夫
 Soltykov 索尔蒂科夫
 Sommervogel 索马沃热
 Songo-tu 索额图
 Soratchin 索拉钦
 Souciet 苏西埃
 Soultskii 苏洛茨基
 Sourgout 苏尔古特
 Spaskii 斯帕斯基
 Spathar, Nicolas Gavrilovitch 尼果
 赖
 Spéranski 斯佩朗斯基
 Staunton 司当东
 Stepanov 斯特帕诺甫
 Stollenwerck 施托伦韦克
 Stony Mountains 石兴安岭
 Stoupin 斯多宾
 Strahlenberg 施特拉伦堡
 Strakhovskii 斯特拉阔甫斯基
 Stroev 斯特罗叶夫
 Struys 斯特吕斯
 Stryelka 斯切尔卡
 Stumpf, Kilian 纪里安 (或作纪利安),
 斯顿甫神父
 Svistunoff 斯维恩图诺夫
 Syrkou 瑟尔库
 Sytchevskii 瑟切夫斯基

T

Tabbert 塔贝特
 Tamurlane 帖木儿
 Tara 塔拉

Tarbagatai 塔城
Tchabina 察毕纳
Tchaomodo 昭莫多
Tchebaevskii 切巴耶夫斯基
Tchépelev, Ivan 车培列夫, 伊凡
Tchéredoff B. B. 车瑞多夫
Tchéredoff, Ivan Bruitneff 车瑞多夫, 伊凡·布鲁依特聂夫
Tchéredoff, Ivan Dimitrieff 车瑞多夫, 伊凡·狄米特利也夫
Tchéren 车尔润
Tcherkaskii, Prince 切尔卡斯基亲王
Tchernychev 车尔尼舍夫
Tchéchetkin 切切欣
Tchougoutchak 丘古恰克
Tchoulkov 丘尔科夫
Tchoukitcheff, Epiphany 裘基特切夫, 艾披凡尼
Téréchtchenko 捷列辛科
Timoféev 蒂莫费叶夫
Titov 季托夫
Tiumen 秋门
Tkout (Tegut) 塔古特
Tobolsk 托波尔斯克
Tola 土拉河
Tolbuzin 托尔布新
Tolstoi, Peter 托尔斯泰, 彼得
Tomsk 托木斯克
Tongus 通古斯人
Toumunkii 图曼斯基
Tourinsk 图林斯克
Transbaikalia 外贝加尔区
Traité de Bura 布连斯基条约
Traité de Kiakhta 恰克图条约
Traité de Nertchinsk 尼布楚条约
Tretyakoff, Alexis 特列季亚科夫, 阿列克西
Tretyakoff, Stephen 特列季亚科夫, 斯捷潘
Trigautius, Nicalus 金尼各神父

Trousévitch 特鲁谢维奇
Trouvorov 楚沃洛夫
Truchnikoff 楚迟尼考夫
Trusoff 朱索夫
Tsaidam 柴塔木
Tsetsen Khan 车臣汗
Tsevangraptan 策妄阿喇布坦
Tsitsihar 齐齐哈尔
Tsurukhaitu 粗鲁海图
Tsyren-van 额射策零
Tszotba Batur 卓特巴巴图尔
Tuchetu 土谢图汗
Tula 图敏
Tuléchin 图理察 (又作图丽察或图礼善)
Tungats 唐古特
Turfan 吐鲁番
Turguts 土尔扈特人
Turka, Ivan 图尔卡, 伊凡
Turkestan 突厥斯坦(新疆)
Tyel 蒂厄尔

U

Uda 乌弟河
Udinsk 乌丁斯克
Ukrainstov 乌柯兰斯多夫
Ulanbuton 乌兰布通
Uliassutai 乌里雅苏台
Unverzagt 翁弗尔察格特
Upsal 乌普萨尔
Urga 库伦
Ustiugha 乌斯蒂加
Utchon 乌常

V

Valouev 瓦卢叶夫
Vasiliev 瓦西里叶夫
Velyaminoffzernoff 维利亚米诺夫 维
尔诺夫
Venediktoff 维尼狄克多夫

Véniamin 韦尼亚曼
 Venta 温达
 Venyakoff, Micephore 魏牛高, 米起佛儿
 Verbiest 南怀仁神父
 Verkhotur'é 维尔浩土尔城
 Vésélovskii 韦塞洛夫斯基
 Vilyanoff 维利扬诺夫
 Vinogradov 维诺格拉多夫
 Vinius, André 维尼阿斯, 安德烈
 Vitcheгда 维切格达河
 Vladislavitch, Sava Loukich 务拉的
 恩拉维赤, 萨瓦·卢其迟
 Vladykin 伏拉迪金
 Vlasoff, Ivan 维拉索幅, 伊凡
 Vlasoff, Pierre Ivanovitch 维拉索幅, 彼得·伊凡诺维奇
 Voelikoff, Lucas 沃依科夫, 卢卡斯
 Vologda 沃洛格达
 Vorobeff, Dimitri 沃罗别夫, 狄米特立
 Vossius 沃西子
 Vyatka 维雅特卡

W

Weber 韦伯
 Witsen 韦特森

Wylie 怀利

Y

Yablontseff 雅布朗捷夫
 Yadrintsev 雅德林采夫
 Yakutoff 雅库多夫
 Yakutsk 雅库次克
 Yallisheff 雅鲁契甫
 Yamycheff 雅木柴夫
 Yanycher 叶尼塞河
 Yeniseisk 叶尼塞斯克 (《异域录》作伊
 聂谢柏兴)
 Youni 尤尼
 Yousbek 尤斯贝克
 Youzéfovitch 尤泽福维奇
 Yule 尤勒

Z

Zaïssan 斋桑
 Zasekin, Prince 泽谢金亲王
 Zeya 结雅河
 Zinov'ev 齐诺夫叶夫
 Zost 佐斯特
 Zouev 祖叶夫
 Zoudyéi, Boris 祖迪叶, 波里斯
 Zungaria 准噶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

作者=（法）加斯东·加恩

页数=420

SS号=10221967

DX号=

出版日期=1980年03月第1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序言

绪论 十七世纪末叶俄中两国间的竞争

第一章 柯罗文·费要多罗的出使（1686—1689）

第二章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俄国的远东关税政策

第三章 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的俄中早期关系；伊兹勃兰德·
义杰斯（1692—1695）

第四章 十八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在中国的俄国商队

第五章 图理琛的出使下伏尔加的土尔扈特（1712—1715）

第六章 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和喀尔木克人的关系

第七章 伊兹玛依洛夫的出使（1719—1722）

第八章 从伊兹玛依洛夫到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郎克（
1721—1725）

第九章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出使（1725—1728）

第十章 1727—1728年的商队；彼得大帝逝世时边关的改组

第十一章 中俄宗教关系：东正教会在北京

结论

原始文件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